

小 記

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屢聆羅志希（家倫）、蔣廷黻兩先生縱論近代中國史研究問題，欣悉擬合撰一書，囑為襄助。編者時正纂輯近代中國史長編，不自度量，許以追隨。其後羅、蔣先生以任重公忙，無暇及此。編者雖草成長編三冊，印行兩冊，亦以世事多故，歲月蹉跎，未能廣續。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三年，廷黻先生舊事重提，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願相勗勉，因之復為心動，惟終懼力不能勝，遲疑未決，而廷黻先生作古。一九六七年冬，旅寓華盛頓，何淬廉（廉）先生自紐約專程惠蒞，謂友好多盼早日從事，不妨暫以晚清及民國時期為斷，勿懸的過高，總以平實簡明，可供一般閱覽為尚。再三考慮，允為一試。不久獲得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支持，遂於一九六九年秋開始，不意志希先生又繼廷黻先生謝世。一九七二年，初稿大致編就，復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助，重予釐董，年餘而畢。

此書以非學術著作，徵引均不註出處，參考書刊資料，亦概行從畧。為便於讀者核比，僅將近人撰述，擇要列舉。何淬廉先生始終鼓勵，多方關注，固銘感莫名，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誼，同誌不忘。

郭 廷 以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紐約

目 錄

(上 册)

小 記

第 一 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1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1
一、闕放昂揚之世 ₁	二、斂抑沉滯之世 ₄	
三、清的統治 ₆	四、清的衰亂 ₁₁	
第二節	西方的海陸環伺.....	12
一、歐人東來 ₁₂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₁₅		
三、海疆擾攘——繼起的荷蘭與英國 ₁₉		
四、中俄陸上的和戰 ₂₁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26
一、耶穌會士的貢獻 ₂₆	二、西學西教的發展 ₂₉	
三、教士內訌 ₃₁	四、西教被禁與西學之衰 ₃₃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35
一、廣州互市 ₃₅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₃₇	
三、馬戛爾尼奉使的無成 ₄₀	四、糾紛不已 ₄₂	
第 二 章	西力衝擊（上）（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45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45
一、英國的新舉措 ₄₅	二、平行往來與舊章遵守 ₄₈	
三、鴉片與銀漏 ₄₉	四、禁煙問題 ₅₁	
第二節	林則徐的禁煙.....	54
一、道光的決策 ₅₄	二、強制繳煙 ₅₆	
三、堅持具結與交兇 ₅₇	四、西情探求與外交運用 ₅₉	
五、對英封港 ₆₀		
第三節	英國的砲艦政策.....	62
一、決定用兵 ₆₂	二、戰爭初起 ₆₄	
三、無結果的和談 ₆₅	四、戰事繼續 ₆₉	
第四節	中國境遇的初變.....	71
一、南京條約 ₇₁	二、美法效尤 ₇₄	
三、五口通商 ₇₆	四、教士的活動 ₇₇	

	五、西事研究 ⁷⁹	六、造船製砲與撫綏 ⁸¹	七、粵民反英 ⁸³	
第三章	內部動亂（上）（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87			
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87			
	一、鴉片戰爭與內潰的加劇 ⁸⁷	二、洪秀全的反清運動 ⁸⁹		
	三、新王朝的創建 ⁹¹	四、直前北伐與回師西征 ⁹⁴		
	五、對外接觸 ⁹⁸	六、北捻與南會 ¹⁰¹		
第二節	極權統治 ……103			
	一、信仰統制 ¹⁰³	二、兵民合一 ¹⁰⁵	三、官制與政事 ¹⁰⁶	
	四、聖庫與田畝制度 ¹⁰⁸	五、婦女地位與禮俗 ¹¹⁰		
第三節	傳統勢力的對抗 ……111			
	一、曾國藩的領導 ¹¹¹	二、湘軍東征 ¹¹⁴	三、天京內變 ¹¹⁵	
	四、太平軍的重振 ¹¹⁶	五、曾國藩總制東南 ¹¹⁸		
第四章	西力衝擊（下）（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121			
第一節	西方國家的攜手 ……121			
	一、咸豐的對外動態 ¹²¹	二、英美法慾壑的增長 ¹²³		
	三、修約交涉 ¹²⁵	四、二次戰爭的導火線 ¹²⁷		
第二節	英法聯軍與俄國的機會 ……128			
	一、英法的軍事合作與美俄外交追隨 ¹²⁸	二、奪據廣州 ¹³⁰		
	三、進攻大沽 ¹³¹	四、天津要盟 ¹³³		
	五、上海改約交涉與鴉片開禁 ¹³⁶	六、俄國的再度東侵 ¹³⁸		
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140			
	一、戰火重燃 ¹⁴⁰	二、英法大舉進兵 ¹⁴³	三、北京陷落 ¹⁴⁵	
	四、列強的共同收穫 ¹⁴⁷	五、俄國的獨得 ¹⁴⁹		
第五章	內部動亂（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153			
第一節	清的外援與曾軍的奮戰 ……153			
	一、英國態度改變的朕兆與初次上海之役 ¹⁵³			
	二、安慶的爭奪 ¹⁵⁶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¹⁵⁹		
	四、曾軍的分路推進與洋將洋兵的協助 ¹⁶¹			
第二節	太平軍的末路 ……164			
	一、紀綱隳壞 ¹⁶⁴	二、全局瓦解 ¹⁶⁸		
	三、捻亂的擴大與平定 ¹⁷¹			
第三節	西南與西北 ……174			
	一、貴州的苗與教 ¹⁷⁵	二、雲南的回漢反滿軍 ¹⁷⁵		
	三、陝甘回與馬化龍 ¹⁷⁷	四、阿古柏併據新疆 ¹⁷⁹		

	五、左宗棠的遠征181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183
第 六 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 （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	187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187
	一、慈禧恭親王的聯合政變187	二、恭親王的時局認識189
	三、曾、李、左的主張192	四、馮、郭的見解194
第二節	前期的洋務……………	196
	一、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196	二、赫德與海關196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與外交誘導200	
	四、軍事工業的興辦205	五、西式教育的開始207
	六、西學的積極介紹210	
第三節	紛至沓來的外在困擾……………	213
	一、教案疊起213	二、日本吞併琉球與進犯台灣217
	三、中英滇案與煙台條約220	四、中俄伊犁交涉221
	五、朝鮮問題——日本向大陸擴張224	
第 七 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 （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229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229
	一、慈禧繼續當政229	二、海軍初建與陸師訓練230
	三、富強兼顧的企業——輪船招商局233	
	四、煤礦、鐵路、電線235	五、駐外使館的設置237
第二節	中法戰爭與西南危機……………	239
	一、法侵北圻239	二、中法談判241
	三、戰爭開始與天津簡約243	四、福州、台灣、諒山之役247
	五、越南喪失249	六、英滅緬甸與始侵西藏251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252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252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255
	三、台灣建設257	四、內外干阻下的鐵路經營259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261	
第 八 章	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一八八五至一九〇〇）…	265
第一節	日本挑釁求戰……………	265
	一、李鴻章的朝鮮政策265	二、日本的決心268

	三、俄、英動態 ²⁷⁰	四、李鴻章的進退維谷 ²⁷²	
第二節	中國慘敗……………		275
	一、陸海決戰 ²⁷⁵	二、清廷謀和與日軍續攻 ²⁷⁸	
	三、屈辱苛刻的馬關條約 ²⁸¹	四、俄、德、法的干涉 ²⁸⁴	
	五、台灣的抵抗 ²⁸⁶		
第三節	中國的分割……………		287
	一、俄國部署 ²⁸⁸	二、德、俄囊括山東、東北 ²⁹¹	
	三、英、法、日的勢力範圍 ²⁹³	四、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²⁹⁶	
第九章	改制維新與排外（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一）……………		299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299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²⁹⁹	二、西人的建議 ³⁰³	
	三、改制論的萌動 ³⁰⁴	四、孫中山奮鬥的開始 ³⁰⁸	
	五、康有為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³¹⁰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315
	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³¹⁵	二、百日維新 ³¹⁷	
	三、新舊派的明爭暗鬥 ³²⁰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變 ³²²	
第三節	社會不安與義和團的發展……………		326
	一、民生經濟的凋敝 ³²⁶	二、人民鬱憤與教案再起 ³²⁷	
	三、山東、直隸的義和團 ³³⁰	四、慈禧對拳團的縱庇 ³³³	
第四節	孤注一擲……………		335
	一、義和團控制下的京、津 ³³⁵	二、慈禧宣戰 ³³⁶	
	三、戰爭期間的地方與中央 ³³⁸		
	四、北京二次失守與東北初度淪陷 ³⁴²		
	五、自立軍與革命軍 ³⁴⁴	六、辛丑條約 ³⁴⁶	
第十章	滿清傾覆前夕的內外情勢 （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		351
第一節	列強角逐的激化……………		351
	一、日俄戰爭與日本的侵畧東北 ³⁵¹		
	二、日美對抗與東北開放的失敗 ³⁵⁵		
	三、英國與西藏 ³⁵⁷	四、各國權益的擴張 ³⁵⁸	
第二節	反動後的新政……………		362
	一、強顏變法 ³⁶²	二、袁世凱與北洋新軍 ³⁶⁴	
	三、張之洞與新教育 ³⁶⁶	四、實業發展的困難 ³⁷⁰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374
	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374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378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380	四、預備立憲384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386	
第四節	滿清的最後掙扎.....	389
	一、排漢與集權389	二、立憲派的請願391
	三、愈挫愈堅的革命軍393	四、求生與抗捐搶糧395
	五、護權與爭礦、爭路396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401
第一節	革命軍的大起.....	401
	一、湖北的軍中革命運動401	二、武昌新軍起義404
	三、十四省獨立405	
第二節	袁世凱的機會.....	408
	一、袁的再起408	
	二、清政權的轉移與英美的助成，日本的企圖410	
	三、立憲派、北洋派擁袁及革命黨讓袁413	
第三節	妥協中誕生的民國.....	417
	一、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417	二、清朝告終419
	三、袁世凱的臨時政府423	

地 圖

一	十九世紀前期的中國·····	8
二	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期之東北與沿海·····	16
三	太平天國之北伐路線及佔領地域·····	96
四	捻、天地會、苗及回之擾亂地區·····	172
五	中、越交界·····	246
六	朝鮮、奉天、山東·····	276
七	列強在華勢力範圍·····	294
八	山東與直隸·····	332

目 錄

(下 册)

第十二章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427
第一節	攘奪權力	427
一、	黨派分野與政局動盪	427
二、	袁與國民黨的武力決鬥	432
三、	變象的君主	436
第二節	俄、英侵畧邊區，日本謀吞中國	439
一、	俄、英割裂外蒙、西藏	439
二、	日本力圖南滿、東蒙與進兵山東	441
三、	二十一條要求	443
四、	袁世凱對日屈服	445
第三節	洪憲帝制	448
一、	偽造民意	448
二、	日本的一擒一縱	452
三、	反袁的勢力	454
四、	反袁派的聯合行動	457
五、	袁的敗亡	459
第十三章	軍閥恣睢（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四）	463
第一節	袁世凱的後繼者	463
一、	軍閥割據	463
二、	段祺瑞的專橫、參戰問題	464
三、	張勳復辟	467
第二節	大混亂的開始	469
一、	南北戰爭及北洋軍閥的內在矛盾	469
二、	日、段勾結	472
三、	廣州、北京政府的蛻變與南北和議不成	475
四、	赤俄、白俄在滿、蒙、新疆的角逐	477
五、	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480
第三節	循環的內戰	483
一、	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	483
二、	南方的桂系、滇系、國民黨與聯省自治	487
三、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491
四、	吳佩孚的霸權	494
五、	無休止的南方戰亂	498
六、	匪禍與曹錕賄選	500

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	503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	503
一、	思想解放	503
二、	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	507
三、	經濟社會變化與商民工人婦女的覺醒	511
四、	五四運動的擴大	517
五、	新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519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524
一、	中蘇接觸	524
二、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529
三、	蘇俄、中共與孫中山、吳佩孚	533
四、	國民黨與蘇俄、中共實行聯合	537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541
一、	直系的崩潰	541
二、	國民黨的時局主張，張作霖、馮玉祥的對立	544
三、	壯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548
四、	北方軍閥的離合與混戰	551
第十五章	再革命（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	555
第一節	蔣中正的領導	555
一、	早期軍事成就	555
二、	權力的集中	558
三、	制裁中共	561
第二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565
一、	進軍華中	565
二、	鮑羅廷的倒蔣反英活動與蔣之攻取華東	569
三、	清黨與南京、武漢的對立	573
第三節	國共全面決裂	576
一、	武漢政府的危機	576
二、	武漢分共	578
三、	國民黨內訌不已	581
四、	中共武裝鬥爭	583
第四節	繼續北伐	585
一、	華北之戰	585
二、	日本的阻撓與北伐結束	586
第十六章	兩種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	591
第一節	內戰再起	591
一、	蔣蔣的醞釀	591
二、	討伐桂系	595
三、	護黨救國軍的起伏	597
第二節	聯合反蔣	599
一、	反蔣派的大聯合	599
二、	軍閥的內戰	601

	三、擴大會議 ⁶⁰³	四、反蔣軍的瓦解 ⁶⁰⁵	
	五、廣州獨立 ⁶⁰⁷		
第三節	中共武力的發展……………	609	
	一、紅軍與蘇維埃區的創建 ⁶¹⁰	二、紅軍攻勢 ⁶¹⁴	
	三、江西前期圍剿 ⁶¹⁷	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 ⁶²⁰	
第十七章	安內與攘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	623	
第一節	北伐後的對外舉措……………	623	
	一、廢止舊約交涉 ⁶²³	二、中俄中東鐵路之爭 ⁶²⁴	
第二節	日本侵佔東北……………	626	
	一、九一八事變 ⁶²⁶		
	二、國民黨團結不成、國際聯盟決議無效、日本進攻上海 ⁶²⁹		
	三、日製「滿洲國」與義勇軍奮戰 ⁶³²		
	四、熱河續陷、塘沽協定、抗日反蔣 ⁶³⁴		
	五、中樞既阻、各省戰亂 ⁶³⁶		
	六、蘇俄動向、入侵新疆 ⁶³⁷		
第三節	國共全力搏鬥……………	640	
	一、九一八後的中共 ⁶⁴⁰		
	二、鄂、豫、皖攻剿與第一支紅軍西走 ⁶⁴¹		
	三、江西後期圍剿 ⁶⁴³	四、第二支紅軍西走——長征 ⁶⁴⁶	
	五、轉移西北後的紅軍 ⁶⁵⁰		
第四節	日本進圖華北……………	651	
	一、緩和中日關係的嘗試 ⁶⁵¹		
	二、加緊分割華北——河北、察哈爾事件 ⁶⁵⁴		
	三、加緊分割華北——廣田三原則、河北自治運動 ⁶⁵⁵		
	四、南京北平談判 ⁶⁵⁸		
第五節	聯合抗日運動……………	660	
	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⁶⁶⁰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⁶⁶²	
	三、蔣的統一成就 ⁶⁶⁵	四、國防建設的推進 ⁶⁶⁷	
	五、西安事變 ⁶⁷⁰	六、國共二度合作 ⁶⁷⁶	
第十八章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	681	
第一節	中日全面戰爭……………	681	
	一、日本求戰與中國應戰——七七事變 ⁶⁸¹		
	二、初期陣地戰與游擊戰 ⁶⁸⁵	三、列強反應 ⁶⁹⁰	
	四、擴大抗戰基礎 ⁶⁹²	五、大遷徙 ⁶⁹⁶	

第二節	內外危機	697
	一、汪兆銘背叛	697
	二、國共的明爭暗鬥	701
	三、國際情勢的變幻	705
	四、戰局持續	707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	710
	一、中國成爲同盟國之一、平等條約	710
	二、中俄新疆之爭、中美英對反攻緬甸的歧見、開羅會議	714
	三、國共關係的緊張	717
	四、艱險的一九四四年	720
	五、嚴重的物價問題	729
第四節	戰爭結束	731
	一、太平洋日軍大敗	731
	二、雅爾達協定與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732
	三、日本投降	737
第十九章	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	739
第一節	戰後國共之爭、中俄東北交涉	739
	一、赫爾利斡旋國共問題	739
	二、重慶會談紀要	742
	三、受降之戰	748
	四、中、俄東北接收與經濟合作談判	749
第二節	馬歇爾使華	756
	一、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軍隊整編與統編方案	756
	二、國共及中俄關係的惡化	759
	三、關外戰爭擴大	762
	四、日戰且談、美國調處失敗	765
第三節	國民政府險象環生	771
	一、戰局轉變與共軍進攻	771
	二、內政外交的煎迫	775
	三、經濟的加速崩潰	777
	四、民變與層出不窮的學潮	780
第四節	中共的勝利	783
	一、決戰	783
	二、國民黨求和與中共全國進軍	786
	三、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中華民國	790
	補充閱讀書目舉隅	793
	書後小記 郭李心顏	800

地 圖

九	軍閥割據——直系、皖系對抗(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	484
十	軍閥割據——直系、奉系對抗(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	486
十一	軍閥割據——奉系、國民軍對抗(一九二五)……	547
十二	軍閥割據——北伐前夕(一九二六)……	564
十三	北伐(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	567
十四	北伐後軍人統轄區(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	593
十五	紅軍分布區(蘇維埃區)(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	611
十六	圍剿與紅軍長征(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	642
十七	抗戰前夕(一九三七)……	683
十八	日本侵佔區(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	689
十九	日本侵佔區(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	721
二十	一九四五年中共統治及軍事活動區……	746
二一	中共統治區(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	766
二二	中共統治區(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	773
二三	中共統治區(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	784
二四	中共繼續進軍(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	789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¹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²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³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不會使其大變？何以不會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敵，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⁴並未過甚其詞。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一、闔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羣謀求生存與

¹馮桂芬語。

²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

³薛福成語。

⁴郭嵩燾語。

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古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畧、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耻，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軒、犁鞞），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三十年，得知羅馬

爲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爲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爲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畧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蹤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爲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爲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貴霜 Kusana）馬衆，」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爲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爲前秦、後秦，繼爲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爲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衆。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爲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爲中國文化，仍具有漢代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爲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爲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爲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爲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

唐代爲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剌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爲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爲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係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爲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爲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爲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爲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恤。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爲番長。長安、洛陽亦爲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爲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麇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爲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况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耻喪亡，王朝興廢，多

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爲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敵不惶，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爲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爲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會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爲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爲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爲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西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爲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搜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會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爲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爲近。「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份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會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爲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

係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征，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餘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剌、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啓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持，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

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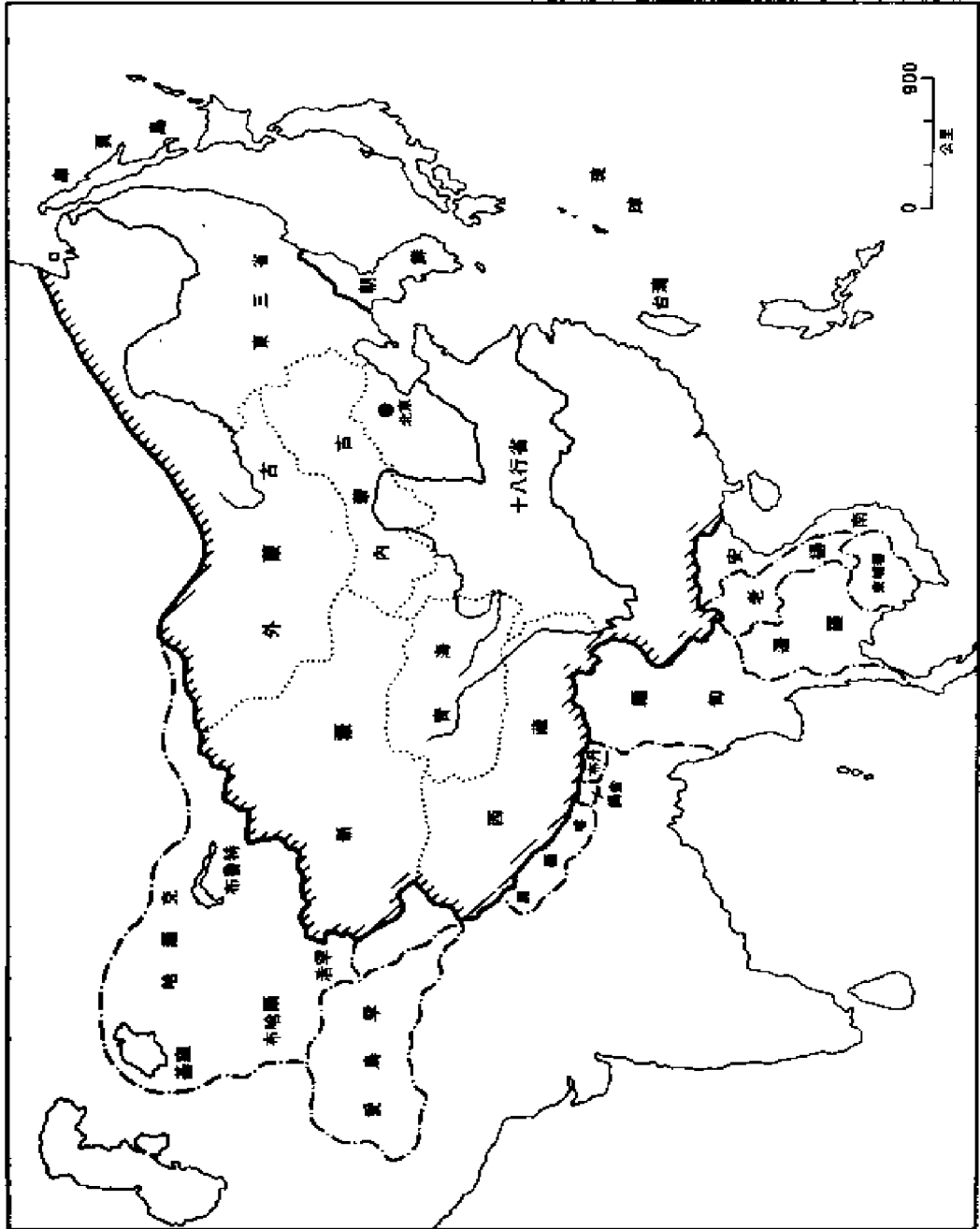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漢各一，互相牽制，職掌有同事務官，而非決計定策的政務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務為主。尚書侍郎限滿、蒙人補授。都察院的長官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給事中按六部分科，監察御史以省區分道，滿、漢並用。明代給事中可封駁詔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則非其比，職在稽查官府，糾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與六部、都察院合稱九卿。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刑獄重辟，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為學術機構，亦為儲才之地，置掌院學士二人，一滿一漢。宗人府、內務府、詹事府、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均為辦理皇室事務機構。

總督、巡撫在明代為中央臨時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首長。巡撫每省一人，總督有專轄一省者（不置巡撫），有兼領二省或三省者。督、撫的職責無大區別，亦無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此一重疊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編制上，督、撫均為獨任，輔佐人員為六房與幕友。六房分職有如六部，以書吏任之。幕友由督、撫延聘，經辦刑、名、錢、穀、章奏，參與機要，有如督、撫的顧問或秘書。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蘇二人），一掌政事錢穀，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為分巡道，各轄數州、府，此外尚有專司某種特定事務之道，如糧儲道、河工道、兵備道、海關道，視需要而設。產鹽的地區另設置鹽政或鹽運使。掌理一省學校文風的為學政或學院，與督、撫為敵體。

分守道與分巡道之下為府、縣，其長官為知府、知縣。一府轄數縣，賦役、訟獄、教化、治安俱為知縣的職責。介於府、縣之間的尚有州、廳，有直隸與普通之分，普通州、廳畧同於縣，直隸州、廳畧同於府，惟轄區較小。



圖一 十九世紀前期的中國

自督、撫至布政使、道、府、縣，共爲五級，層層節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遼濶，交通不便，省內文書往還，有需十餘日者，各省與京師之間，且有多達三月餘者。

滿洲興起，全恃其特創的八旗武力，以旗統民，亦以旗統兵。及征服日廣，續編蒙古及漢軍八旗，惟不及滿洲八旗之衆。入關之後，八旗有京營（禁旅）、駐防之分。京營任戍衛京師之責，以滿蒙八旗爲限，漢軍不與。駐防鎮撫地方之責，與漢人分城而居。初僅行於東北及直隸、山東、山西，後漸推及各省。於形勝要地，酌置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爲旗人專缺。將軍權位最高，含有監視督撫之意，分駐東南的江寧、杭州、廣州，西南的荊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寧夏、綏遠，大都爲十七世紀後期，即三藩亂時及亂後所置。直隸不設將軍，而部署獨稱周詳，所駐盡屬滿、蒙八旗之兵。統計八旗兵力約二十萬，京營駐防各半，兵均世襲。

以漢人組成的軍隊旗用綠色，號爲綠營。京城有巡捕五營，約一萬人，各省有六十餘萬，一省多者六七萬，少者萬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轄，分稱督標、提標、鎮標，號爲訓練兵，互不相屬。總兵之下爲副將，所轄爲協，參將、遊擊、都司、守備所轄爲營，千總、把總所轄爲汛，統名差防兵，平時分守各地，供應差役，遇有徵調，臨時抽撥，拉雜成軍，以防兵權爲少數人所有。

政治軍事的防範外，思想的鉗制所關尤大。清提倡理學之力，有過於明。八股取士之制照舊採行，而益加嚴密。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爲三級，第一級爲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爲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爲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爲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爲解元，餘爲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爲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爲會元，餘爲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爲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爲策論，所重爲書法。

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編修。二甲爲進士出身，三甲爲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餘分爲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爲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爲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嘗舉行博學鴻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諸生試以詩賦，給予科名。復大事採訪遺書，整理修訂成爲巨帙。《四庫全書》規模之大，尤爲前所罕觀。表面是爲了便於流傳，實際上是爲了統一學術思想。凡有乖經術的諸子百家，異端稗說，概予摒棄。不利清室，有礙於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別禁止、銷毀或刪改。文字之獄更是對於學術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筆墨如少有不當，即指爲誹謗，動加刑戮，株連至廣，而以雍正、乾隆兩朝爲烈。

統觀清代的統治策畧，一切以集權、防範、壓制爲尚。君權之隆，君威之盛，超過任何時代。漢、唐君臣之間，尙畧有對等體制，宋、明朝儀雖漸森嚴，臣僚仍可立而陳奏，清則改爲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清則除部院堂官(尙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及撫、督等外，概不得專摺言事。同時厚滿薄漢，中央官滿、漢雖各有定額，但權位懸殊。軍機處並此形式亦無。歷任軍機大臣漢員不及半數，以懼於滿員勢焰，遇事惟有緘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滿員常居優先。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督撫大半屬於旗籍。旗官兵以旗籍爲限，漢人組成的綠營將弁，則滿、漢並用。兵卒的餉銀，八旗高於綠營，升遷亦較綠營爲易。一般旗人復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無處不形成滿、漢的對立。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闕，大臣關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無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

經綸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四、清的衰亂

清朝統治權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後。十七世紀的八十年代至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最稱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為盛世的巔峯，其實是虛有其表，中葉已入衰運。晚期貪婪黷貨之和珅當政，吏治營伍愈為敗壞，民生國計愈為凋敝。嘉慶、道光時上下因循欺蒙愈甚，「朕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雖稱能戰，但人數有限。入關以後，剿平流寇，併滅南明，以降將之功居多。迨中原畧定，八旗習於奢逸，漸失勇銳之氣。三藩之亂，康熙採以漢制漢政策，始克削平，綠營實為主力。其後綠營亦趨腐窳，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半數以上是將就了事。綠營餉糈非薄，侵蝕成風；訓練不施，兵卒疲弱；戰守不足，擾民有餘。嘉慶初年，教亂大起，將帥視出征為致富之道，玩兵養寇。道光時軍紀愈為廢弛，勾結盜賊，吸煙、開賭，一旦徵調，雇無賴代充，見敵即逃。

康熙後期，國家歲入四千餘萬兩，十之七八來自地丁，即錢糧，次為鹽課、關稅。歲出以軍餉、王公百官俸廉、河工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時且有豐盈。乾隆時，由於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決頻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額外加派特徵，直接間接均出於農民。農民所入，來自土地生產。清初全國耕地，約六百餘萬頃，人口約一萬萬，平均每人耕地約五六畝。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約七百萬頃，人口增至三、四萬萬，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畝，縱令「竭力耕耘，兼收並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連年飢饉，人民流離，為了生存，惟有鋌而走險。

清的高壓牢籠政策，並不能使人完全馴服，潛伏的民族意識仍在滋蔓，準備相機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會（一稱洪門或三合會）為著。此一組織，可上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至鄭成功而擴大。稍後再行加強，假托部分神話，而歸本於「反清復明」。入會者，通財互濟，同生共死。福建、台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其後遍及於長江流域及東

南、西南地區。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爲白蓮教，歷史較天地會爲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運動，即以白蓮教爲中堅。清朝初年，白蓮教重張反抗異族旗幟，信者以農民爲多，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

歷代變亂，大都起於中衰之世。清代由於民族的不平，雖在所謂盛世，變亂亦屢次發生。康熙以後的武昌兵變，即白蓮教所策動，雲南、浙江、福建、台灣的反亂，爲天地會所領導。雍正之世，白蓮教、天地會不斷騷動。乾隆年間，復轉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爲大。此外尚有甘肅的回亂，貴州、湖南的苗亂。規模最大的爲嘉慶年間白蓮教之亂。蔓延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其後白蓮教的別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舉，黨衆遍佈華北各省。道光時代，天地會及獠、夷、回的擾攘幾無虛日。

中國之有海防問題，爲明代倭寇發生以後之事，其平定則賴陸師。清初爲海上的鄭成功所苦，應付辦法爲迫令沿海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採取大陸封鎖。鄭氏覆亡，清廷有放棄台灣之議，可見其無意於海上經營，不了解海防意義。嘉慶年間，海盜猖獗，出沒粵、閩、浙江海面，飄忽縱橫，數年始定。

大致看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對於虎視眈眈的西方強敵，又焉能抵禦？

第二節 西方的海陸環伺

一、歐人東來

歐洲與東方往還，最早應爲與地中海東岸及西亞的商務，以後漸及中亞及印度。至於是否與中國有過接觸，尙是疑問，即令有過，亦只是間接的。西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與羅馬間的絲道初通，中國與歐

洲的關係，始趨開朗，但是困難重重。一以絲道所經的西亞、中亞地區，常為不相統屬的部族所據，缺乏長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權對於貨物通過，任意苛徵，多方刁難，甚至予以阻斷。三以運輸全賴畜力、人力，數量有限，運費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險，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羅馬領有埃及時，埃及與印度之間，已有商船來往。至一世紀，羅馬商人開始由紅海進向印度，再繼續東航，遠達交趾，遂至中國，此為二世紀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紀，中、歐間海上貿易不絕。元亡之後，一度中斷。十五世紀初期，鄭和西航，並不會與歐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紀，始行重開貿易，此則出於歐洲人的主動。

以往中、歐間的海上通商，規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國海的航權先後操於波斯、大食及中國人之手，歐人無插足餘地。再者，由地中海東去，無論取道紅海或波斯灣，中間仍要經過一段陸路，歐人在此一地帶既無勢力，對於中國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鐵騎橫掃東西，深入東歐，震慄了整個西方世界，引起了歐人對中國的注意。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精神解放，觀念一新，好奇冒險的心理大熾。同時世界知識進步，馬可孛羅的遊記不再視為神話。中國的豐富物產正為歐人所需，東方的黃金珍寶尤為所愛。地圓學說此時亦漸為部分人士所接受，東達「大汗之國」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經過回教徒所控制的近東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徑，打破回教徒的壟斷，避免他們的剝削。更大的原因是歐洲國家的力量的增強。以往歐洲人的東行，不論其為通商或傳教，多屬於私人的活動，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節，亦乏足夠的支持。十五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最後荷蘭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總望將亞洲人導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來自東方的武力

威脅，並順利發展商務。蒙古時代的教使、教士，大都爲此東來。海道大通之後，愈爲積極。

航海技術與設備的幼稚，爲十五世紀前歐洲人無法推動海外經營之另一原因。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對於自然現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態度改變，科學受到重視，一切均在進步中，不僅能製造堅固的巨船，技術設備亦隨之改善，天文氣象的知識愈趨正確，自中國西傳的指南針裨益尤大。火藥的輸入，復改變了他們的戰術武器，各種槍砲相繼發明，商船均係武裝，不僅可以自衛，且可威脅征服所至之地的國家人民。其後歐人之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印度、南洋，打開中國門戶，就是憑藉這種船砲。

十五世紀的歐洲國家首先致力於遠洋探測的爲西班牙與葡萄牙，目的爲通商中國、印度，而以獲得香料爲主。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西航，結果發現了新大陸，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進，結果發現了真正通往東方的航道。就當時對歐洲的商業利益與今後對中國的關係來說，葡人的貢獻與影響實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個小國，而地理位置則便於海上活動，它一再與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爭戰，熟悉非洲的地理。十五世紀中期，幾乎每年均有遠航隊前往，終於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後，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開通了歐、亞間的直航海道，採購不少印度的珍珠、細布及南洋羣島所出的香料，利市高達六十倍。一五〇二年，再度東來，獲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銳志東畧，奪取波斯灣忽魯模斯（Hormuz），控制紅海口的商道，進而於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擊敗了壟斷歐亞間的海上貿易約九個世紀的阿剌伯艦隊，佔領了印度西岸的臥亞（Goa），設置總督，印度洋的海權大致入於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臥亞總督阿布奎爾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尙欲席捲整個印度洋與南洋。一五一一年攻佔了通往東印度羣島的咽喉要道，馬來亞西岸的滿刺加（Malacca），繼而佔領美洛居（Moluccas），亦即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出產地。

葡萄牙的海上經營，係由國王主持，資本由他供給，貨物歸他支

配。等到東來的葡人日衆，勢力愈擴愈遠，這般冒險家但顧私人的一時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爲所欲爲，國王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爲葡萄牙不能長期保持其東方權勢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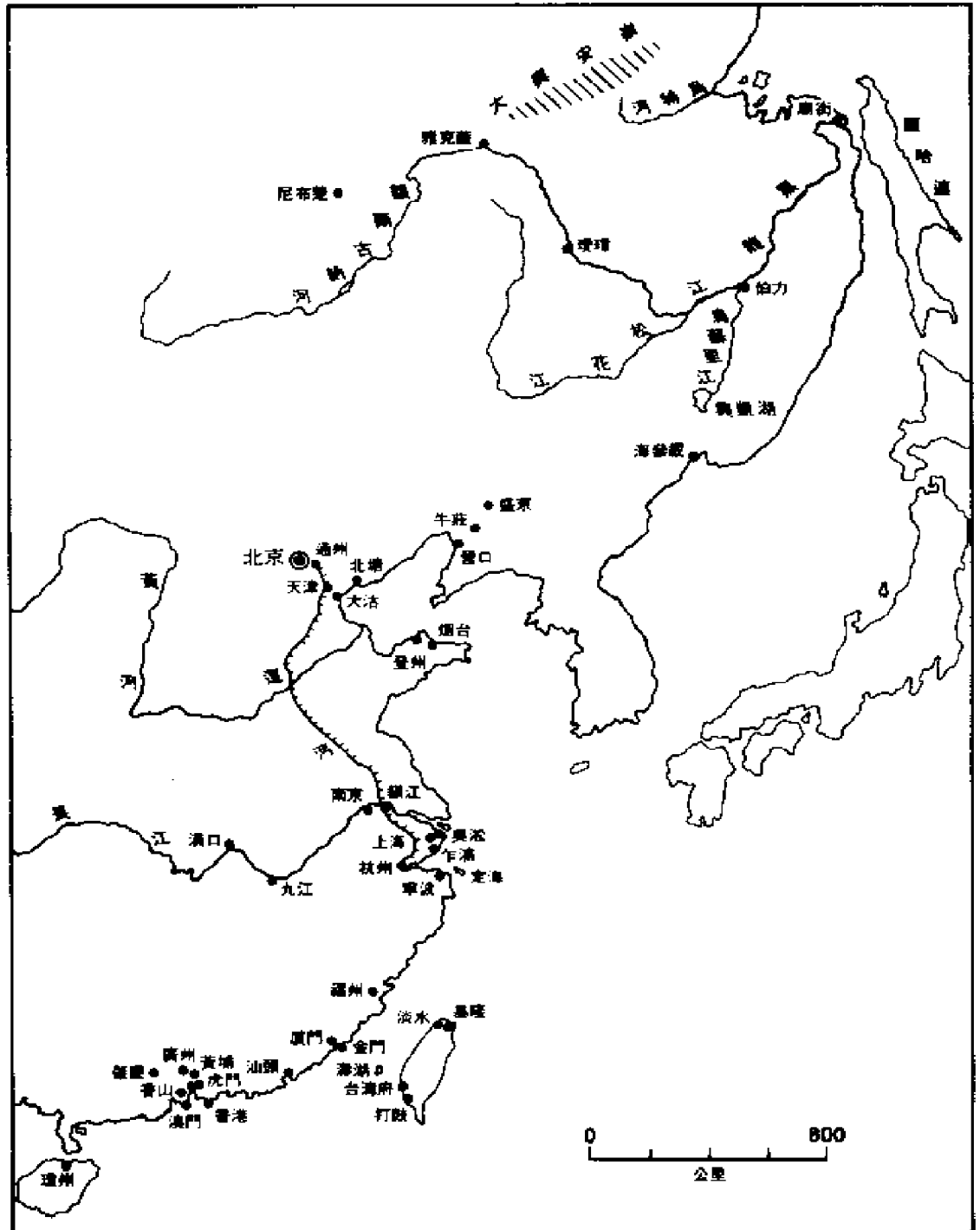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有史以來中國的對外問題均起於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明初，即十四世紀後期，始有來自日本的倭寇，繼之爲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禍，亦隨之嚴重。及倭寇蕩平，而西方給與中國的威脅，反有加無已。

滿刺加爲明的朝貢國，久爲中國人商販之地，葡人佔領之後，得知了不少中國情形。遂於一五一四年（正德九年），東抵粵江口外，爲歐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達中國。一五一六年二次前來，而以第三次的規模爲大，葡船及馬來船各四隻，由安德魯德（Fernão Perez d'Andrade）率領，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於一五一七年至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明人稱之爲佛郎機（Frangues），此爲十字軍時代東方回教徒對歐人的通稱，爲安德魯德擔任通事的大概是馬來的回教徒。

明代南海諸蕃，如非朝貢之國，不許前來廣州，如非貢期，亦予阻回。朝貢其名，互市其實，「私通蕃貨與進貢者混，以圖私利」者，亦頗不少。葡人以進貢爲名，但事先未經明的許可，竟突至廣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狀貌奇異，「銃聲如雷，」「震駭遠近。」這是中國人初次聽到西洋的砲聲，見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張從其所請，有人認爲非例。兩廣總督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因上奏請示。安德魯德退泊南頭，從事交易，皮利留於廣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將葡船所帶「方物」照值收購，貢使遣歸。皮利不肯即去，經回教通事的夤緣活動，卒於一五二〇年進入京師。據說這位通事與明武宗十分親近。

南頭與屯門相去不遠，俱係瀕海關隘。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兩地造屋築柵，剽劫商旅，掠買人口，自爲中國所不能容忍。同時滿刺加



圖二 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期之東北與沿海

亦來請援，明人對此敕封之國的見奪，不便坐視。責令佛郎機歸還滿刺加的命令雖未生效，屯門、南頭的葡人終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詳部署，招致習知葡人造船鑄砲的華人如式仿製，經過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兩次圍攻，獲得全勝，俘虜砲銃二十餘管。此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初次戰爭，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廣東之外，葡人曾到過閩、浙。屯門、南頭被逐，廣東通商停止，北來的葡人愈多，與海盜及倭寇相結，盤踞浙江寧波的雙嶼。初尚無越軌行動，一五四六年，葡人以債務為借口，實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戰，葡人與倭寇聯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禍，亦於是開始。一五四八年，明軍攻破雙嶼，戰爭南移福建，再經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兩次激戰，閩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與福建紳民對於外人的態度完全相反，政府嚴禁通番，紳民則樂與為市。

自粵海葡人被逐之後，南海「應貢蕃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船貨不通，」廣東的經濟財政大受影響，公私皆窘。一五二九年從巡撫之請，詔命凡以往朝貢諸國，仍許照舊來粵，惟佛郎機不在其內。究諸實際，葡人並未絕跡，多居於澳門西南的浪白濠（Lampaco）島，上川島及下川島同為他們所居之地。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貢舶賄通官吏，許其寄泊澳門，每年繳納船課二萬兩。此後逐漸興建房舍，成為聚落，葡人乘機混入。一五五七年，一以金錢的運用，二以助剿海盜之功，取得同樣的待遇，數年之間，至者日衆。南海諸番自非葡人的對手，澳門遂為葡人專據，「歲規厚利，所獲不貲，」「詭行異服，劍芒大砲，彌滿山海。」澳門為一半島，屬香山縣，如果葡人一旦擁衆而入，直趨廣州，將不可收拾。有人建議迫令撤屋，隨舶來往，最好予以剪除。雖未見諸行事，為了預事防範，因於一五七四年，在澳門香山之間的山基建立一座關閘，繼又添設香山縣丞，駐澳門前山寨（Casa Branca），專理民夷案件。一六一四年又與葡人約法五事，亦可說是中西最早的一個條約。終明之世，雖未許葡人朝貢，不過以後雙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視的為印度、南洋，中國居於次要。十六世紀末，葡萄牙本土為西班牙所併；十七世紀，其在東方

的殖民地多為荷蘭、英國攘奪，葡人亦無力在中國生事。

清初沿海遷界，澳門葡人以屬於化外而未內徙，惟航海貿易則被禁止，商務大受影響。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臥亞總督以葡王的名義，遣使請求救濟，始准其入貢，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一七二〇年，清禁內地商船前往南洋，但仍聽葡萄牙諸國前往。臥亞總督為表示感激之意，再遣使前來。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第一次葡萄牙國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中國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週到。乾隆之時，對外的防範趨嚴，以澳門地位重要，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置海防同知，訂立查驗進出洋船及在澳門夷人章程，葡人大為不便。一七五三年葡使至京陳訴，一無所得。

大致說來，首先自海道直航東來和中國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稱雄印度洋及南洋，掌握中、歐通商，但至十七世紀以後，則已日薄崦嵫。

與葡人同時分向海外擴展的西班牙人，其目標實為中國。哥倫布西航之時，即擁有西班牙當局致「契丹大可汗」（即中國皇帝）的國書。但西班牙人真正與中國接觸，則後於葡人約六十年。第一個代表西班牙進入東亞的為到過滿刺加、美洛居的葡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自歐洲出發，繞過南美洲，橫渡太平洋，於一五二一年發現了菲列濱羣島。四十四年後，始由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着手經營，又六年（一五七一）佔領呂宋。呂宋原為中國商販聚集之地，中國人初亦稱西班牙為佛郎機，有時稱為呂宋。

西班牙人佔有呂宋三年，中國海寇林鳳因官軍的攻剿，不克在閩海立足，率領部眾四千，前來爭奪，翌年失利而去。時福建師船跟蹤而至，西班牙總督乘機遣使福州，得到了互市的許可。西班牙人野心勃勃，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國者，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尋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大西洋為英國所敗，此一企圖，自談不到。一五九八年，西班牙請市廣州，以違例被拒，但福建商船前往呂宋者頗多。因為菲列濱缺乏貨物，西班牙人多用銀餅付價，這種銀餅就是來自墨西哥的

銀元。不過西班牙的對華商務，始終不甚重要。

販運呂宋的閩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爲了經濟及殖民地的開發，亦需要華人。於是來者日衆，西班牙人漸生疑懼，時加凌虐。一五九三年，華人憤將菲列濱總督刺殺，西班牙人大事報復。「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時明廷財政困難，有人說呂宋山富銀鑛，樹生金豆，可供開採，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爲中國意欲襲取呂宋，華人將爲內應；遂發兵圍攻，二萬五千商民，盡膏鋒刃，時爲一六〇三年（萬曆三十一年）。明廷無如之何，僅由福建巡撫移檄「數以擅殺之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西班牙人益無忌憚，既不畏懼中國，又需要中國的貨物，華商亦仍然前往。一六三九（崇禎十二年）至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難者二萬餘至萬餘人不等，雖起因不一，終不能不謂爲有計劃的暴行。中國政府固未盡其保護人民之責，而西班牙給予中國的觀感，亦可想見。

三、海疆擾攘——繼起的荷蘭與英國

第三個自海上與中國接觸而引起紛爭的歐洲國家爲荷蘭。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販運東方貨物，十六世紀末年，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後，此舉遂予禁絕。一六〇一年，荷人初到廣州請市不遂，葡人亦拒其進入澳門。「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明人稱之爲紅毛番。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積極與葡、西競爭，竟取代了葡人在東方的地位。

鑒於在粵的被阻，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人得南洋閩人的引導，襲據福建澎湖。以明人嚴禁往來，斷絕接濟，不得已掛帆而去。三年之後，決以武力奪取澳門，發生了西方國家在中國境內的戰爭，結果荷人失利。一六一九年，荷人切實控有爪哇咬留吧（Batavia）。一六二二年（天啓二年）二次進攻澳門，復被拒退，又趨閩海，再佔領澎湖，屢犯金門、廈門。閩吏勸令他去，另在別港拋泊，荷人不肯，反劫掠漁船，奴役漁民、客商，聯同海盜，侵擾內港。福建巡撫差人往咬留吧曉諭無效，遂作進討之計。一六二四年，明軍直搗澎湖，荷人力不能抗，答應拆城遷地，東去台灣。

荷人初至台灣，即於南部的一個島嶼（安平）築赤嵌城（Zeelandia），與閩商交易，這應是退出澎湖的一個條件。不久台灣南北要地，多為所有，仍不時寇擾閩疆，並將佔有基隆、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

據有金門、廈門及閩南，與清軍相抗，奮力於恢復運動的鄭成功（國姓爺 Koxinga），以攻畧江南不成，從台灣閩人的建議，決先取台灣，收復先人故土。經過九個月的圍攻，荷人終於一六六二年請降。此為早期歐洲人在東方經營殖民地所遭到的挫敗。

荷人佔領台灣期間，曾向清廷請市，獲得八年一貢的許可。台灣被逐之後，屢助清軍進攻鄭氏的金門、廈門。及清有台灣，以荷蘭恭順，改允五年一貢。一七二九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荷人在東方的聲勢以十七世紀為盛，然與中國的商務關係則不重要，所重視的為日本的貿易與南洋的經營。在南洋一帶，荷人先後與葡、英角逐，當地華僑備受池魚之殃。明季鼎革，閩、粵人亡命南洋者不少，荷人益肆凌虐，一七四〇年，在爪哇被屠殺者不下萬人，其殘暴一如西班牙人之在呂宋。

約與荷蘭同時向東方活動，同被明人稱為紅毛番的另一歐洲海權國家為英國。十六世紀後期，英人屢謀別覓一通商中國、印度之道，以避開葡萄牙、西班牙的勢力，卒無所成。一五八八年，戰敗西班牙之後，始無所顧慮，開始取道好望角、印度洋東航。一五九六年（萬曆二十四年）英王曾致書中國皇帝，以船沉未達。又四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成立，連續派船至印度、南洋。初與荷蘭分向西班牙進攻，繼與荷蘭相爭。有鑒於荷蘭請市中國的失敗，暫不作嘗試，惟間接在南洋、日本獲得中國的出產。一六三五年，葡萄牙為荷蘭所困，印度、澳門間的交通被阻。臥亞葡總督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協定，由英船來粵代葡人運送貨物。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廣東，澳門葡人竟不之許。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威忒（John Weddell）代表另一英國商業團體，率船續至。葡人既恐英人奪去它的利益，又畏中國官府責難，仍多方阻撓。威忒強入珠江，引起了中英之戰，虎門砲台失守，中國

師船三隻沉沒。經葡人調解，中國允其來省買賣，咸忒答應道歉。此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觸，亦為衝突的序幕，雙方均感不快。

咸忒去後，英國內部多事，葡人續與為難，荷人復與相敵，東印度公司的基礎未穩，三十年間，英船僅來粵三次。以廣東秩序不佳，勒索重重，無貨可購，均告失敗。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轉來台灣，時鄭成功之子鄭經正為清、荷聯軍所苦，對英人表示友好，允免關稅，而以輸入軍火、棉花為交換條件。一六七五年，鄭經再有閩南，英人隨之通商廈門。清平台灣，英人在台、廈的活動終止。一六八八年重返廣州，不惟未因其曾助鄭氏而遭遇困難，此後商務且日有開展，一躍而居於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領導地位。

葡、西、荷、英之外，十七、十八世紀與中國互市的西方國家，以法、美兩國為重要。一六六〇年法國商船初至廣州，一六九八年設置商務經理。時法國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此次又有教士同行，所以頗受優待。約在二十年後，法國印度公司廣州支店成立。不過法國的對華貿易有限，來粵商船每次為一到四艘，且非每年均有。美國獨立以前與中國的關係為間接的，獨立之後，始於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派船來粵，初經大西洋、印度洋，後改道太平洋，中國人稱之為花旗國。「其船較他國為小，隨時可至，非如他國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來船較多，」地位僅次於英國。

此外通商廣州的西方國家，有奧大利（雙鷹國）、比利時、普魯士（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瑞典（藍旗國）、義大利，均為十八世紀之事。

四、中俄陸上的和戰

十六、十七世紀，中西間除了為通商引起的海上紛擾外，北方陸上之爭，更為嚴重，第一次中西的大規模戰爭與正式條約的訂立，即由此而來。自蒙古汗國瓦解後，俄人開始向東擴張，一五七九年後的六十年間，囊括了亞洲北部，而於清軍入關之年（一六四四），進入黑龍江流域，奪佔土地，到處劫殺，以人為食。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

波雅科夫(Poyarkov)及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二年哈巴羅夫(Khabarov)率領的哥薩克最爲殘暴。於是發生了一六五二至一六六〇年間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戰鬥，俄人被迫西退，然仍寇掠不已，中國稱之爲羅刹或羅車。

俄人一面以武力擴地，一面希望與中國通商，屢次遣使前來窺察中國國情。早在十七世紀初年，俄人與西部蒙古已有往來，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第一次來華俄使即係取道蒙古，因無貢物，未獲覲見，僅允通商。一六五六及一六六〇年(順治十三及十七年)的兩次使臣，復以不諳朝儀，不肯跪拜，及表文矜誇，不遵正朔，仍均被卻。

一六六五至一六六六年，俄人築城於雅克薩(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臣屬於滿洲索倫(Solon)酋長根忒木爾(Gantimur)投降，中國在黑龍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響。康熙要求交回，不僅未被接受，尼布楚總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哥薩克人前來，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護。這位使臣似不會提出此一荒唐要求，覲見時且實行跪拜。康熙再令交還根忒木爾，勿再侵擾邊境。時值俄國與波蘭失和，西疆多事，如在東方別起爭端，實非俄國之利，因允約束邊人，並再遣使修好，但對根忒木爾的引渡依然推拖。

這次的使臣人選爲尼果賴(Nicholas G. Spatary Milescu)，他是一位博學之士，於一六七六年到達，覲見時亦行跪拜禮。康熙先問察罕汁(Chagan Khan，即白汗，爲蒙古人對俄皇稱號)好，次問使臣曾否學過哲學、算學。尼果賴提出十二項請求，包括兩國文書往來，應使用一種共同文字，中國遣使報聘，自由貿易，釋放俄國俘虜。康熙不作正面答覆，聲言在下列三事未解決前，兩國斷絕一切關係，第一交還根忒木爾，第二以後使臣須遵守中國禮節，第三不得再有侵犯邊境之事。尼果賴曾作爭辯，未獲結果。他在北京停留三個多月，從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處得知不少中國政治情況及康熙的對俄態度，必要時準備訴諸武力。

康熙初年，國內尚未真正統一，對俄暫時容忍。三藩之亂既平

(一六八二年),國基穩固,康熙正當盛年,決心解決東北問題。他先派人觀察雅克薩形勢,部署水陸交通,然後運糧調兵,置備師船,演習紅衣(夷)砲,設大營於瓊瑋。但仍認「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以往數次遣使行文,令俄人撤回部衆,交還逋逃,互相貿易,各安生業,總無回報,搶掠如故。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在兵臨雅克薩時,再以此意宣示,並諭統帥彭春,如俄人獻地,勿妄殺一人,但仍然無效。彭春全軍四千人,內有長於水戰的台灣兵。經過不到一天的攻擊,俄人請降,此為有計劃而勝利的戰爭。

雅克薩收復後,可能是由於補給不易,彭春毀城引遷,遂復為尼布楚的俄國援軍佔領。翌年清軍二次進擊,久攻不下。適荷蘭使臣至京,康熙帝再以和好條件交令轉發俄皇。康熙望和,俄人亦無戰意,得知中國第一次進兵之時,已派人前來,請求停戰。康熙下令撤圍,等待俄國的正式使臣定議。

俄國的使臣為果羅文(費耀多羅, Feodore A. Golovin),對於遠東情形,畧有所知。俄政府對他有過兩次訓令,第一次是中俄應以黑龍江為界,最少亦須以雅克薩為界,但俄人得在黑龍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雅克薩可以放棄,勿重啟戰端。會議地點,商定為外蒙邊境的色楞格城(Selengask)。中國的代表為索額圖、佟國綱,均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隨員中有兩位耶穌會士,即法國的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綱為黑龍江及其支流,包括尼布楚、雅克薩在內,不可少棄,根忒木爾、逃人悉當索回,准俄人通使貿易,否則不與談判。

索額圖等於北行途中,得知準噶爾部的噶爾丹(Galdan)攻破了喀爾喀(外蒙),無法續進,遂通知俄方,另行擇地會議。遲至一六八九年,中國代表再度出發。康熙另有新的指示,如俄人要求尼布楚,不妨改以其東的額爾古納(Argun)河為界,換言之,就是放棄了尼布楚。他何以作此讓步?諒與噶爾丹的東侵有關。二十年前,俄人已與準噶爾有了接觸,這時噶爾丹復揚言借得俄兵,康熙不得不

慎重將事。喀爾喀問題關係北方國防，必須從速處理，爲不讓噶爾丹爲俄人利用，致事態複雜，又必須及早解決中俄的爭端，統籌全局，對於中俄交涉立場，不能不有所修正，其內容與俄國對果羅文的第二次訓令已無大出入。

是年八月下旬，中俄使臣開始在尼布楚會議，隨同果羅文而至的武裝部隊約二千人，索額圖帶來的官兵約四千人，進入會場的衛士各七百六十人，真可說是武裝談判。果羅文的威儀極盛，索額圖有些相形見拙。雙方的開價，初均甚高，擔任通譯的張誠、徐日昇往返斡旋，方獲致諒解。後來果羅文突又變議，中國全軍即進迫尼布楚城下，果羅文終於讓步。九月七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原文爲拉丁文，出於兩位教士之手，另有滿文及俄文譯本，其中要點：一爲中俄以黑龍江上游的格爾畢齊河、¹額爾古納河與大興安嶺爲界；二爲俄人退出雅克薩；三爲逋逃互不索回，今後不得收納，應擊獲送還；四爲自由交易。

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畧，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爲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克保有。

條約訂後，康熙以全力對付準噶爾，噶爾丹一再勸說俄人反攻雅克薩，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爲所惑，噶爾丹終於敗亡，可說是康熙對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至於俄國，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在東方唯望維持與中國的和好，以便發展商務，一六九三年的俄使雅布蘭（Evert Yorbrand Ides）即爲此而來。表文款式雖然不合，康熙仍予召見，准俄商每隔三年來京一次，不令納稅。旋設俄羅斯館，安置俄人，允俄人通商北京，並得派喇嘛、學生。這些權利爲其後百餘年其他國家所未能享受。

原在新疆北部遊牧的土爾扈特部，七十年前爲準噶爾所迫，西走

¹格爾畢齊河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注入黑龍江。

佛爾格河（Volga），歸屬於俄，仍思故土，屢來入貢。康熙為明瞭實情，加以聯絡，以制準部，因命圖理琛取道俄境前往。對於使團的言行，他均有指示，處處表示對俄的和好誠意。西伯利亞的俄官對圖理琛的接待，亦頗盡禮。彼得大帝以忙於瑞典戰爭，使團又未携國書，所以不曾邀晤。此為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的事。

一七二〇年，為改進對華貿易，有一位名叫伊思邁羅付（Leon Izmailov）的俄使到京。康熙要求先行交還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劃定蒙俄疆界，再及其他，俄使的任務因而未克達成，僅將隨員郎喀（Laurence de Lange）留駐北京。終以中俄糾紛時起，翌年郎喀亦不得不離開北京，貿易同告停頓。及康熙、彼得兩主謝世，俄國有感於邊界問題之勢須解決，復命薩瓦（Sava L. Vladislavitch）率領一個龐大使團東來，於一七二六年抵京，名義為賀雍正登極。薩瓦屢與中國大臣談判，受到雍正的召見賞賜，若干問題大致有了諒解，惟界務則須於蒙邊恰克圖續議。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條約成立，劃定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畢納依嶺疆界，北京照舊貿易，另准於蒙邊（恰克圖）買賣，俄國增派喇嘛、學生來京。嗣後恰克圖成了陸上的廣州。雍正對俄之如此寬大，大約亦與準噶爾問題有關。時準部勢力復熾，中國對俄懷柔仍有必要。是年清軍進剿準噶爾，雍正特知照俄方，如準噶爾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納。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二年間，圖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人對準噶爾問題與中國取合作態度。大致看來，康、雍兩朝，俄人頗受優遇，對於中國實情亦了解較多。

乾隆初年，命將俄人貿易統歸恰克圖，不准再來北京。時俄人對東北亞經營復趨積極，黑龍江為東去捷徑，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請假道運糧。先一年清軍已破準部，對俄無何顧慮，況此項要求實有違尼布楚條約，乾隆嚴予駁拒。準部蕩平，其酋長西逃俄境，乾隆堅令交還，幾乎引起戰爭。一七六四年後，以蒙邊俄人屢次滋事，恰克圖三次閉市，中俄等於絕交。一七九一年，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與俄方於恰克圖訂立市約，條文全由中國擬定，互市如故。

俄國為實現航行黑龍江的希望，一八〇五年（嘉慶十年）復遣使

東來，因不跪拜，中途駁回。俄人十分憤慨，由於拿破崙的牽制，未敢有所舉動。一八一〇年，又請通使，尤望中國先行遣派，嘉慶認為斷不可行，縱令俄人入貢，亦須斟酌。總之乾隆以後，中俄關係已轉入低潮，一般的中西關係亦復如是。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一、耶穌會士的貢獻

東西海道大通後，第一位來東亞的基督教徒為耶穌會領袖之一的西班牙人沙勿畧（St. Francis Xavier）。他於一五五二年抵廣東上川島，以明人對佛朗機印象惡劣，未能進入中國大陸，齋志以歿。葡人有了澳門，給耶穌會士若干方便。一五七九年義大利籍的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到達該地，越三年，西去兩廣總督所駐節的肇慶，以報時鐘餽贈官府，以天文算學啓迪士大夫，改着僧袍，遵行中國禮俗，他是首先來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不過真正奠定天主教在中國根基的則為另一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至一六一〇）。

利瑪竇幼年在羅馬研習法律、天文、算學、物理、製造、地理，一五八二年抵澳門，翌年亦去肇慶，一切照羅明堅所為。他多才多藝，儀表談吐不俗，深知欲使中國人歸附耶穌基督，教士自己首須成為中國人，尤須從知識方面轉變中國人的觀念。他與羅明堅建造了一座教堂，陳列報時鐘、樂器、圖書以及印刷精美的書籍。最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的是世界地圖，和栩栩如生的聖母像。復手製日晷儀器，加以講說，更令人感到新奇，入教領洗的漸多。一五八六年羅明堅隨肇慶知府北上，取了一個中國姓名，此後每一來華教士莫不如此。他到過江西、浙江、湖廣、桂林，復回肇慶，再返歐洲，擬請教王遣使北京，以教廷多事，無暇顧及。

萬曆初年為來華耶穌會士的準備時期。其後利瑪竇前去韶州，易

僧裝爲儒服，於一五八九年至北京，因遭疑忌，改去南京，仍與縉紳交遊，名謀一時。一六〇〇年，再至北京，萬曆對他所進呈的報時鐘、西琴特別喜愛，許他留居。有了這個機會，利瑪竇本其一貫作風，講學論道，五年之間，信教者二百餘人，徐光啓（教名保祿 Paul）、李之藻（教名涼菴 Leon），均在其內。明季來華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故其教驟興。」衆教士之中，利瑪竇之功最大，開啓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土的先河，引起此後一百年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研究風尚，西教與西學並行。一六一〇年利瑪竇卒，萬曆欽賜葬地。

製曆授時，中國一向視爲大政。明代所用的爲參用回回法所製的大統曆，日久常有舛誤。利瑪竇去世之年，欽天監推算日蝕不驗，詔命曾從利瑪竇習曆象學的徐光啓、李之藻、與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參與修曆，因之引起舊派的敵視。一六一三及一六一四年間，驅逐澳門葡人之議復起。南京的禮部侍郎沈淮斥西士變亂曆法，誑惑人心，與澳門諸番通謀，陰圖不軌。以往萬曆帝的優容教士，由於喜愛鐘、琴，此時既涉及政治問題，自不能讓他們再留，各地耶穌會士均被解送澳門。

中國與西人初一接觸，即爲其砲銃所震。當耶穌會士被逐之時，正滿洲努爾哈赤建元稱號之年，跟着大舉西犯。利瑪竇早已告訴徐光啓、李之藻，兵爲國家大事，攻守器械，須新新無已，西洋砲銃奇巧，攻無不摧。至是以遼事急切，徐光啓請練兵自效，召葡人教砲、造砲，囑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 Michael）派人赴澳門洽辦。一六二一年，葡兵百人，携砲北上，中道被阻。同年瀋陽、遼陽失守，徐光啓再請購西砲，於是西士龍華民（Nicolas Langobarde）、陽瑪諾（Emmanuel Diaz）入京，葡兵二十四人携火器續至。一六二六年，明軍寧遠之捷，即得力於西洋砲。善製西砲的孫元化（教名依納爵 Ignatius）曾參與是役。一六二九年，徐光啓復請練兵製器，召葡人携大砲十尊北來。翌年，徐光啓再遣人赴澳門置辦，募葡兵、華兵。以葡人多所要挾，反對西教者，復謂西砲非不可用，惟須以白蓮教爲戒，事遂不成。一六

三六年清軍進薄北京，明廷命四年前入京的耶穌會士日爾曼人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設局造砲，先後成五百二十尊。但潰決之局已成，新武器並未能挽救明的命運。

一六二九年，欽天監推測日蝕又誤，徐光啓依西法所推則驗，奉命開設曆局，延用西士。徐卒後二年（一六三五），新的曆書儀器全成，推測無不密合，貢獻最大的為湯若望。算學物理與天文曆法密切相關，利瑪竇首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復與李之藻合譯關於比例級數之書。物理方面，湯若望介紹光學，艾儒畧（Jules Aleni）介紹力學，熊三拔、李之藻介紹水法。

天文曆法的傳入，增進了中國人對於時間的知識；地理學的傳入，改變了對於空間的觀念。自利瑪竇在肇慶繪刻世界地圖，中國人始知五大洲及地圓之說；到京進呈的貢品中，復有《萬國圖誌》。他如哲學、生理學以及繪畫，耶穌教士均有介紹。宗教書選述，自然尤多。一八二〇年有一位會士帶來典籍七千部，有如西域高僧之傳入佛經。

利瑪竇卒時，信徒約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後，達十萬以上，而以崇禎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為最盛。徐光啓嘗向崇禎進天主之說，湯若望出入禁中，亦屢以為言，宮中立有教堂。一六三六至一六四〇年間，后妃入教者三人，宮女七十八人，內監四十人，皇室一百十四人，各省無不有教堂教徒。南明弘光及隆武曾遣耶穌會士赴澳門求兵，永曆為教徒瞿式耜（教名Thomas）所擁立，皇太后、皇后、太子均受洗禮。

約在一六三二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篤的浙江鄞縣人朱宗光，他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軍政，一篇闡揚基督教義。在前一篇中，他說：「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土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

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砲所擊，皆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爲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三百餘年前有此了解，洵屬難能。

二、西學西教的發展

明清交替之際，在南方的耶穌會士爲支持南明的恢復運動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則轉而擁護滿清的新政權，頗得青睞。攝政王多爾袞到京後，限內城居民於三日遷出，俾八旗居住。湯若望奏稱，天主堂內存有新修曆書雕板、測量天象儀器，及禮器經典，不易搬移，儀器倘有損失，修正購辦亦多困難，請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爾袞准如所請，另給上諭，加以保護。新王朝需要新時憲，多爾袞以湯若望的新曆法，合乎天象，「天運已新，允宜用此新法。」湯若望復面陳新法正確無謬，多爾袞即將所纂曆本頒行，命湯若望爲欽天監正，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爲其後一百餘年他們所常任的職位。各地教士亦多賴湯若望之蔭庇。一六五〇年順治帝親政，湯若望的寵眷愈隆，不時獻替忠言，講說道理，歡洽有若家人，曾於京師賜地建天主堂，御書堂額，御製碑記。甚至太后與大臣商議大位繼承問題時，亦取決於他。耶穌會士希望順治成爲中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輔政，湯若望因曆法舊派楊光先誣陷下獄，賴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釋免，一六六六年卒。

英明好學的康熙親政後，不僅恢復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給予的渥待，且過於順治之時，爲在華耶穌會士的黃金時代。一六六九年，以欽天監楊光先推測不驗，製器無方革職。授比利時籍的南懷仁以欽天監監副的職銜，負責實際製曆之責，他是利瑪竇、湯若望之後的第三位傑出的耶穌會士。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砲，先後成六百八十尊。召見時賜坐、賜饌，禮遇之隆爲滿、漢大臣所罕有。他歿於一六八八年，追贈禮部侍郎，予諡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爲西人所未有過的殊榮。尋復遣官祭奠，稱道他「學擅觀天，克驗四時之序，識

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¹非惟推步無差，抑且藝能兼備，鑄爲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堅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成精，造思獨敏。」御製碑文，尤念念不忘其「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催堅壘，克裨戎行」的大功。三藩之役，滿清存亡所關，南懷仁所鑄大砲爲清軍制勝的一大關鍵。接替他治曆工作的爲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法國的耶穌會士白進（*Joachim Bouvet*）。張誠亦於此時攜帶天象儀器、書籍三十箱入京。

治曆、造砲爲南懷仁受到寵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濃厚求知慾，愈使彼此關係親密。他幾乎每日入宮，爲康熙講幾何、代數。一七一三年，設算學館，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兼及曆象、樂律。御製的《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律呂正義》，多採西說。

第一位服用西藥，相信西醫的中國帝王爲康熙。一六九三年他忽發高熱（瘧疾），經張誠、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進以金藥（*quinine*），一服而愈；特於皇城內賜廣廈一所，並准於附近建築教堂。另一教士羅德先（*Bernardus 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爲御醫。精通外科醫理的羅懷忠（*Joseph da Casta*）在內廷行走。

第一部經過測量繪製的中國地圖，成於康熙之時。一六六五年以畿輔常被水患，命白進等測量，繪成地圖。一七〇八年又要他們測繪全國地圖，一七一七年完成。貢獻最大的，白進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 B.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roix*）、費隱（*Xavier Fridelli*）、馮秉正（*J.A.M.M. de Mailla*）、麥大成（*Joannes Gardaso*），多數爲法國籍。這部地圖即《皇輿全覽圖》，流行二百餘年。

在清初對外交涉中，耶穌會士頗稱活躍。一六八六年俄使到京請和，康熙會命閔明我前往報聘。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張誠、徐日昇斡旋之力實多。條約的正本爲拉丁文，以後中俄文書往來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賴於耶穌會士的翻譯。一七〇五年，命翰林院學習。時俄羅斯館已設置多年，俄國學生在館習滿文、漢文，八旗子弟習俄文。雍正

¹七政爲日月五星。

時，中俄交往愈繁，於是別立西洋館，專攻拉丁文。

西洋教士既受優容，傳教大得便利。一六五〇年信徒已達十五萬，一六六一年約二十五萬，一六七〇年約二十七萬。康熙時，法王路易十四世的聲威方盛，法國耶穌會士開始來華，他們的影響與貢獻，非他國教士所及。但只許京師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有禁止傳習天主教之舉。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索額圖與張誠、徐日昇十分友好，賴他的運用，一六九二年，禮部會同大學士奏稱西洋人德性過人，近來管理天文算學、鑄造之器，隨同辦理中俄事宜，均著勞績。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無為惡亂行之處，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各處天主教堂應照舊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奉旨依議。從此天主教可公開活動。十八世紀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詳，有謂北京一處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屬可信，全國每年入教者當有數萬人。

三、教士內訌

域外傳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歷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時雖曾流行，但斷續無常，元以後中絕逾二百年。自耶穌會士到後，傳布的順利似過於佛教，主要原因為中國在政治、軍事方面有需於西方的科學、技藝。但是數百年來狹隘的華夷觀念，已根深柢固，衛道之士仍攻詆不已。教士內部的傾軋更是致命的打擊。

耶穌會士深知儒家權威之不可凌犯，對佛教則持排斥態度，指所言天地為不經之談。他們雖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對於道學或理學，則多有批評，謂理道為虛字，駁天即理之說，指宋儒妄為註釋。理學家反詆他們為「太極之亂臣賊子，素王之惡逆渠魁。」正宏獎理學的康熙對於耶穌會士的此種議論，當亦非其所悅。

中國歷史上的叛亂，往往與宗教迷信關連，元末白蓮教亂尤為著例。耶穌會士來華前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西班牙人併滅呂宋，荷蘭人寇掠閩、粵。明、清之際已有人說在華教士與澳門諸番通謀，假

旁門左道，「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攻擊他們「廣佈邪黨，踞澳門爲巢穴，接渡海上來往，」「立天主堂於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內外勾結。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許傳布。一六九二年弛禁後，仍有人說教士離鄉背井，國君資以鉅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內訌發生，教王直接干預，康熙的態度隨之而變。

教士的內訌，一是爲了禮儀問題，一是爲了教派競爭。利瑪竇認爲中國所謂天或上帝，同於西教所謂最高主宰耶火華，中國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並非偶像崇拜，當時他的同會教士已有人不以爲然。與耶穌會士原有異見的多明我會士（Dominicans）、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屢欲來華活動，因耶穌會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撓，不甚順利，遂乘機相詆，謂天與上帝不能與真主並論。祀祖、祭孔俱屬迷信。教王對此一爭議，態度忽左忽右，使問題不易解決。一六七一及一六七四年，方濟各與多明我會士得西班牙人的協助，來者日衆，耶穌會士亦將法國的力量引進，雙方縱橫捭闔。一七〇〇年，閔明我、張誠等特行奏陳，謂祀孔爲敬其爲人師範，祭祖出愛親之義，盡孝思之念，所設牌位，不過抒報本追遠，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賜教堂「敬天」二字匾額，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說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爲天下通義。耶穌會士佔了上風，反對派自不甘休。一七〇三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穌會士爲然的顏璫（Carolus Maigrot）爲遠東主教。次年制訂禁約，規定對天地萬物之主須稱天主，禁用天與上帝及敬天字樣，不許祭孔、祭祖，並派一年僅三十四歲的多羅（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爲專使，東來執行。一七〇五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頗加禮遇。次年，顏璫至，斥中國爲無神之地，並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羅復發布教王禁約。康熙大怒，將顏璫發往黑龍江，多羅押送澳門看管（一七一〇年卒），傳諭在京西人，「今後如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留住不去的發給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復回西洋。爲使教廷明瞭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羅馬傳旨，另有與教王接

近的兩位義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rdrins)、馬國賢(Matteo Ripa)上書教王，說明中國供牌與敬天兩事。羅馬久無音信，教王反再將禁約宣布，勢在必行。一七一六年，消息傳至中國，康熙召見西人，要他們必須遵守利瑪竇的規矩。

一七一七年，北京接得教王「奏帖」，僅云即差人復命。康熙再令俄人傳信羅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來粵西洋人帶去，可見他盼望教王答覆之殷。又兩年，他對一位自福建來京的教士說：「以後西洋人來信，必先奏聞，毋得隱諱。爾眾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一七二〇年，教王的第二次使節嘉樂(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將抵京，康熙預囑在京的西洋人，如嘉樂問及行教之事，應公同答以「俱遵利瑪竇規矩，」不可各出己見。嘉樂到後，提出二事：一為准其管理在中國傳教西人；一為准中國入教之人，俱依教王禁約。康熙答以「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主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內，召見嘉樂六次，詳為解說供牌及稱天為上帝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穌會士前往羅馬，但教廷不許他陳訴。中國一向以敬天法祖為訓，教王要一反其道，事關中國立國大本，倘果如此，無異要中國聽命於教王，康熙自難認可。

四、西教被禁與西學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學技藝，愛屋及烏，所以才聽耶穌會士行教。儀禮之爭發生，引起了他的反感，屢露禁教之意。一七一六年，他曾說：「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南洋諸國之遭芟滅，應是殷鑒，教王之定欲干涉中國內政，提高了他的警惕。到了治尚嚴明，性復多疑的雍正，尤不容他人越俎，耶穌會士的捲入宮廷政治，更使他憎恨。他和他的兄弟允禩等為爭奪大權，各樹黨羽。管理北京南堂的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和允禩接近，宗室中

的蘇努父子亦與耶穌會士交好，暗助允禩。雍正繼位後，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將允禩及蘇努之子發往西寧，穆敬遠隨行，他們仍未停止活動，遊說陝甘總督年羹堯，並用拉丁字拼音通信。一向為雍正策劃的閩浙總督滿保請將各省西人除曉通技藝者外，餘俱送往澳門安置，改天主堂為公廨，嚴禁入教。於是天主教被禁，但尚不嚴厲。第二年，教王班納十三世（**Benedict XIII**）的使節以賀祝新君即位為名到京。雍正告以如西洋人遵守中國法令，將照舊施恩。在京的耶穌會士亦懇求寬免逐回。雍正表示：「朕於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中國聖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若果無害，則異域遠人，自應從寬。」不久康熙派往羅馬的耶穌會士歸來，雍正得知教廷不許他陳訴，自感不懌，再度宣布他對宗教的看法，亦可窺見他禁止天主教的原因。他說：「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為本。」「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西洋精於曆法，國家用之，其善不可泯。」「今妄生疑議，以同己為是，異己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棄其短，則彼此可以相安。」此後，耶穌會士仍繼續前來，京師教堂照舊存在，欽天監的西人供職如故。

一七三五年，教王停止耶穌會士的在華工作，中國教禁亦日嚴一日。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廣東行教開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後三十餘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懲治者，時有所聞。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與反教者之常將天主教與白蓮教並舉，不無關係。嘉慶年間，教士不敢多所活動。一八〇五年有兩名在宮內供職的教士，私繪直隸、山東地圖，交人帶往廣東，擬送羅馬，中途截獲。詔以其居心叵測，將一千人犯發往伊犁，西洋堂總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對於在京當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隨，餘俱令回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二〇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在成都、長沙、武昌正法，株連的中國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於繪畫的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為最知名，次為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誠（J. Denis Attiret）。乾隆自負的武功，多由他們繪成戰圖。圓明園內的西式建築，亦係郎世寧設計。園內有鐘房，自鳴鐘多至四千餘座，由西洋人擔任修理。對於西樂他同具興趣，所以亦有懂得音樂的教士出入宮中。

有人說明代晚年，耶穌會士被視為顧問，康熙時以學者、客卿相待，乾隆時則有如僕傭。在不違背道統、治統的原則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獻所長的雅量。雍正雖然禁教，仍承認西洋曆法之精。乾隆所愛的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學。嘉慶時教士的地位更為低落，幾不易存身。道光時（一八三八）欽天監內的西人，為之絕跡。

西洋教士初以學術、技藝而為朝廷縉紳所重；雍正後，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時文字之獄復日加殘酷，縱使利瑪竇復生，亦無以施其技，徐光啓再世，亦不敢從其遊。《四庫全書》雖收有西士譯述，而每有微詞，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為「夸詐迂怪，為異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異端異學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學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發揮，徐光啓的五世孫徐朝俊，承其家學，喜研數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開講求。其他「嗜奇之士，類多委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並未禁止通商，廣州的互市，繼續進行。商人志在謀利，難望與文化發展相聯繫。十八世紀以來，百餘年間，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科學、技藝的進步，思想、社會、政治的演進，空前所無。中國固步自封，孤陋寡聞，依然故我。彼此觀念距離極遠，利害更相逕庭，根本關鍵由於雙方欠缺瞭解。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

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征收課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一七二〇年行商商准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

西洋貨船進口，多在六、七月間，出口在十一月前後，以便利用信風。進口時先由澳門同知撥給引水，代僱通事、買辦，出口時交出兩無帶欠甘結，再由海關監督發給印照(紅牌)。進口收泊地點為黃埔，夷商將貨物分為股份，自行擇定行商，委托銷售，並代置辦所需貨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資本微薄，未能照數如期繳納課稅，因就中遴選殷實者，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但承銷夷貨的各行商於完納課稅，仍多觀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貨銀代墊。

夷商寄寓洋行之內，各國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賃屋開設，及商務繁盛，行商別於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稱為「夷館」。居住夷館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¹不准攜帶眷屬，交易完畢，須退至澳門。一七五一年，禁令加嚴，如有番婦進口，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養生息，開盤踞之漸。

中西通商之前的關稅，係按貨「抽分」。十六世紀以後，改為輸銀，分水餉與陸餉。水餉一名船鈔，按船的廣狹大小為準，陸餉一名

¹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

貨稅，視貨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屬正稅。船分三等，一等徵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二等八百八十兩，三等四百八十兩。貨稅大致為百中取二，或三、四。兩項合計，並不為重。由於海關人員的刁難勒索，夷商的實際負擔不止此數。每船所繳船鈔多在二千兩左右，所納貨稅超出正稅一倍，以至三四倍。當時歐洲貨物銷路不暢，夷船所載，大半均屬現金，每銀一兩須納百分之四的分頭銀，復以海關歲入，定有最低數目，名曰「正額」，超過的名曰「盈餘」。設關之始，正額時有不足，一再核減。其後盈餘增加，常超出正額一倍，雖由於來船日多，亦與政府的獎懲政策有關。正額固須如數，盈餘亦不得短少，否則議處，如有溢額，按數議叙。稅吏為顧考成，不免濫徵。十八世紀初年，粵海關正額每年不過四萬餘兩，盈餘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後盈餘亦列入正額。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規禮」，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務，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准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慙慙

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爲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爲地方官所拒，即携預先備好的呈文，逕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勾結奸商，代爲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爲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布。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約」，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是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爲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爲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鑰，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爲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爲禁止內地人民爲外夷傳遞書信；五爲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餽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公辦夷船，衆志紛歧，於公無補，」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稟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爲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

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啓官」，怡和的伍家，通稱「浩官」。因經營不善，以致傾家破產者亦不乏人，負荷過重，為原因之一。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例須以珍奇之物獻於皇室及中樞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鐘錶、洋鏡、朝珠之類，和珅的難以數計的珍藏，大都由此而來，價款則歸行商賠墊。實物貢品之外，尚有現金（貢銀），每年五萬餘兩，如遇皇帝萬壽大典，須額外報效。軍需的捐派，為數亦鉅，所可知者，乾隆時的金川與台灣兩役，行商曾分別捐銀二十萬兩及三十萬兩。廓爾喀之役，復與鹽商共捐三十萬兩。所有這些支付，無非轉嫁於夷商。

此時期的債務糾紛，亦趨嚴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貨價、借領夷商銀兩，並未生效。這是雙方的責任。拖欠貨價，多由於每年夷商回國之時，將售賣未盡之貨，作價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銀兩，照複利滾算。日久本利累積，遂成鉅額。借領銀兩多由於港脚商人，貪圖重利，¹將款貸於行商，終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除欠英商貨銀一萬兩，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還。一七七九年，另有兩行商因高利貸積欠港脚商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其中三分二為利息，英國派遣兵船強索，政府除將兩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償，於是有徵收「行用」之事，將本輕易售之貨，每銀一兩，抽行用三分，備作還債之用。日後貢項、軍需、捐派均出其中。貨物不論粗細，一體加抽，且不止三分。

關於兇案，一七七三年，一華民在澳門遇害，疑兇英人被迫交出處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鳴砲誤斃華人兩命，貨長遭受拘捕，英人武裝示威，中國派兵包圍夷館，實行封館，卒將砲手縊斃，從此英人

¹港脚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脚為 country 的譯音。

不再交犯。

三、馬夏爾尼奉使的無成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廣州夷商所受的壓迫愈甚，糾紛愈多。一七八四年，砲手處死案使他們感到安全可慮，尤重要的問題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十八世紀末年，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逐年增加，利潤至大，同時又希望為工業革命後的紡織品推廣市場。一七八七年，英國政府決定援以往俄國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使，與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國對於互市的限制，給與英商便利與保護，取得一處地方或海島作為貨棧，兩國互換使節。卡茨喀特道卒。一七九二年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Bengal）長官的馬夏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司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隨員八十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九十五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携「貢品」，約值一萬五千餘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畫、毯氈、軍品、車輛、船式，計六百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的文明。英王雅治第三的「表文」，即致中國皇帝的國書，首先稱道中國地方廣大，皇帝仁慈，繼謂英人的海外活動，非為開疆拓土，亦非為貪圖商業利益，而在增廣見聞，交換知識，互通有無，中國尤為所嚮往，所以派人前來駐紮。在隨行人員中，「如大皇帝用他的學問巧思，要他辦事做些精巧技術，只管委他。」所有在華英人，亦「求大皇帝加恩。」

使團到達之前，由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說是英王因前年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特遣使進貢。乾隆表示歡迎，命沿海督撫照料，另派大員在天津接待。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馬夏爾尼行抵北京，再轉往乾隆駐蹕的熱河。為了覲見禮節，雙方發生爭議。乾隆要他跪拜，馬夏爾尼只肯行英國之禮，乾隆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即將頒賜英王的敕諭與禮品發給馬夏爾尼，含有逐客之意。禮品中有玉器、瓷器、綵緞、茶葉、墨、

扇之類，大可與貢品作一比較。敕諭措詞全是上國口吻，一面嘉許英王恭順，一面不准留人住京，理由是不合體制。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六項請求，因於別一敕諭中逐一駁拒。首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最後誥誡英王，如英船駛至浙江、天津，定當驅逐。

馬戛爾尼於失望之餘，十月初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由軍機大臣松筠護送。行至杭州，改由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伴行，續赴廣州，回抵英倫，已是一七九四年九月。馬戛爾尼之來，雖係爲了英國商務與中英關係，亦望促進中國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驕盈自負的乾隆，與貪庸不學的實際首相和坤均不足以語此。他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過不少中央、地方大員，目覩耳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如一旦與英國發生衝突，勢將土崩瓦解，俄人或將乘機而入。這些觀察，不妨說是他的真正所得。馬戛爾尼曾與長麟談到廣州商務問題，長麟允加整頓。東印度公司即將不滿之事，逐條稟呈，獲准的僅爲英人可於夷館附近花園散步，每月兩天；貨船開行後，英人可在廣州續留二十天；英人得向買辦學習漢語；英人犯法由本人當罪，惟大班須負責將犯人交出；其他貨稅陋規依然如故。

馬戛爾尼曾告訴長麟，將來英王要另具國書，再來進獻。過了兩年雅治第三果然續有書來，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的回答是要他「益勵盡誠，永承恩眷。」雙方在觀念上是南轅北轍，不愉快的事件愈來愈多。

四、糾紛不已

馬戛爾尼東來之時，正值法國革命，英、法對敵之秋。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傳聞法國軍艦在粵洋出現，英兵船亦駛至虎門口外，兩廣總督以停止貿易相威脅，始行離去。一八〇二年，法軍攻入葡萄牙，英兵船又來廣東，準備登陸澳門，北京命粵督嚴陣以待。旋以英法議和，英兵船離去。此一行動，再加上欽天監葡人的中傷，謂英人兇狡譎詐，常懷蠶食之志，印度已為併滅，益增清廷的猜恨。一八〇八年，英軍竟將澳門佔領，粵督實行封船，英海軍提督準備強硬對付，粵督亦調兵備戰。經英國大班的調解，英軍始退。嘉慶痛斥英人，重邀廣東督撫將軍。重訂防夷章程。五年之後，又有英兵船在虎門口外追捕美國商船之事，粵督調集水師制止，責令大班負責，以封船相迫；大班則以撤退貨船為要挾，結果妥協了結。英人傷斃華人事件，一八〇〇至一八一〇年，有過三次，每次均引起交兇爭執，大都不了了之。債務問題，一八〇九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債約一百七十萬兩，仍於行用項下清償。一八一五年復有七家行商負債約一百萬兩，英商以牽涉過廣，恐行商破產，影響貿易，允止息歸還。

以上是馬戛爾尼返國後二十年間，中英間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粵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使團的規模不似上次之大，貢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為曾隨馬戛爾尼到過北京、現任公司大班的小司當東（Sir George T. Staunton），是一位中國極不歡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徵得中國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時，阿美士德已將至大沽。此為英國有意為之，使中國無從拒絕。鑒於以往英國的行動越軌，北京對於英使的再來，自多疑慮。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慶派了兩位大員照料。如馬戛爾尼一樣，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慶定要

他遵行。定期覲見的早晨，經過長夜奔馳，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的宮門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禮。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猝然患病，不能行動。」嘉慶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逐回。當天阿美士德離開北京，失敗甚於馬戛爾尼。是後中英的齟齬有加無已。其犖犖大者，有一八二〇年的交兇案，英船以退出廣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債務案，英船以不進口要挾，中國亦準備斷絕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餘萬兩的債務雖照例於行用內清償，而為數畧同的新債又生。

另一嚴重爭執為「番婦」案。一八三〇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携眷坐轎，入住夷館。粵督限日離去，否則派兵驅逐。大班即招來武裝水手抵抗，公然指責中國官吏妄用權勢，後果正復難測。經行商調解，英婦退回澳門。事為一位粵籍給事中所知，據以奏聞，斥英人「自恃富強，膽大妄為，」「控制之方，不可不稍從嚴峻。」粵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婦居住夷館及夷人乘坐肩輿，夷商如有事須赴總督衙門稟控，應將稟詞交行商代遞。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每年來粵的歐洲商船約三十至四十隻，以英國為多。至十八世紀前期增至八、九十隻，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者約二十隻，俱為一等大船，港脚船約三十隻，十之五六為大船。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對華貿易進展最速，每年三十餘隻，十之八九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國商人為推廣通商地區，港脚船不時私來福建、台灣。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北航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登州，傳教士郭士立（即甲利，Charles Gutzlaff）同行，調查沿海情形，要求貿易，並散發文告，申述在粵所受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地方官照例不准進口，但私與相通者仍眾，胡夏米、郭士立認為北方人民樂與外人買賣，官府既無實力，亦不認真執行禁令。中國武備廢弛已極，如要發展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

第二章 西力衝擊（上）

（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一、英國的新舉措

海運大開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觸已兩世紀，彼此互感不滿。中國雖無調整之意，英國則已不耐，認為非變不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固待開擴，原料亦須爭取。同時交通革命方興未艾，火車開始行駛，輪船利於致遠，自歐洲東來時間縮短，一時雖不能大量使用，要為時不久。制海權業已掌握，軍備日強，印度早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佔領了具有戰畧意義的新加坡，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在在使英人不安於現狀。地大物博的中國門戶必須進一步地打開，中西的關係必須修正，無論中國是否情願，已是勢在必行。

過去英國的東方貿易，由倫敦商人組成的東印度公司獨佔，利益歸其獨享。當英王給予特許狀時，尚無大異議。十七世紀末年，漸不受尊重，十八世紀曾遭抨擊，印度的散商（港脚商）同聲應和，主張自由貿易。因工業革命而新興的英國工商城市，反對公司尤力，經濟學亦高家唱放任論。一八一三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仍保留對華貿易特權。新興的工商城市繼續指責公司業務未能適應新工業產品的銷售，近年對華商務停滯，而採行競爭制度的美國，一八一八年以來的對華貿易額則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廢止後，十五年間，貿易額提高三倍，馬來海峽提高四倍，凡此均為獨佔制度為害的明證。公司辯稱，對華貿易之無大進展，是因為廣州公行的壟斷，中國口岸的限制，和苛索與重稅，如果施行自由貿易，中英糾紛

勢將益多。這些理由並不能緩和各方面的情緒。一八三一年，國會改選，工商業城市獲勝。一八三二年新國會通過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廢止公司的在華專利權，所有英國臣民均得於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經商，設商務監督於廣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職權，管理在華英商，並有裁判權與徵稅權。

在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商務監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對華關係。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公司董事會與駐粵大班主持，事事以商業利益為前提，今後則歸於英政府與商務監督主持；除了商業利益，尚須顧及國家的地位和監督的身份。換言之，今後中英的關係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漸轉為全面的。

英政府的政策，仍為協調的、緩進的。英王頒給律勞卑的敕令，要他採取和善態度，勿激起中國人的猜忌憎惡，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保持彼此的友誼與諒解，調處中、英間所發生的爭執。如須致文中國官府，應和平謙恭，勿大言恫嚇，非不得已不可使用武力。如中國法律公正，英人應當遵守。外相巴麥尊（H.J.T. Palmerston）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謹慎將事，不可危及現有關係，裁判權勿輕於行使，除非遇到非常事變，兵船切勿進入虎門。但同時又要協助英人的合法經營，儘可能將貿易擴展到廣州以外地區，覓得沿海地方，以便海軍使用，設法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尤盼與北京中央直接來往。到粵之後，應先以書翰知照兩廣總督。可見律勞卑的任務絕不限於單純的商務，實兼負政治使命，儼然是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的外交官。今後如何行使他的職權，如何使中國承認他的地位，既不至觸犯中國的現行章則，復能改善中西的關係，推進英國的在華權益，似非一簡單的問題。

二、平行往來與舊章遵守

當兩廣總督李鴻賓得知東印度公司行將散局之時，曾於一八三一年傳諭大班，寄信回國，「仍派曉事大班來粵，總理貿易。」第二年盧

坤繼任總督，復有同樣表示，律勞卑的派遣，多少與他們的要求有關。不過他們希望的為大班而非監督，更非一位外交官。監督的設置與人選，事先均未徵求中國的同意，不能不說是英政府的疏忽，亦可說是對中國的藐視。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勞卑抵達澳門。盧坤知道他係為查理貿易而來，身份與大班不同，七月二十一日，命行商轉告，「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至貿易事宜，如有應須另立章程之處，亦應由行商詢議，稟請具奏遵行。他並非完全拒絕律勞卑前來廣州，亦非絕對不准改變舊章，而且準備商談兩國的新關係，不過他須請示皇帝，因為他無決定之權。

先一天，律勞卑依照巴麥尊的訓令，備好了一封致盧坤的書信，全銜為「大英國正貴大臣、水師船督、特命總管本國貿易人等、正監督、世襲侯爵」，說是奉「大英國恩主特命，」有權治理來華英商。東印度公司貿易業經止息，盼能早日到衙拜會，將有關「更改事理，」和他的任務解明，「代奏皇上聞知。」七月二十五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

律勞卑離澳門前，當然已接到盧坤的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行來省，殊違定例。盧坤念其初來，不加深究，仍責成行商查明傳諭，令於查理貿易事畢，即行回澳。同時再度申明，「事關初始，應候恭摺奏明。」投書一事，以「天朝大臣，例不准與外夷私通書信，」何況律勞卑復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盧坤的立場，並無不合之處，律勞卑「聲言伊係英國監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後一切事件，與各衙門文移來往，不能照舊由洋行傳諭，伊亦不能具稟，祇用書文交官傳遞。」這就是雙方爭執的焦點。

盧坤不願問題僵持，反覆開導。律勞卑態度堅決，概不置理，並報告倫敦，主以武力壓迫。八月二十六日，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英商不必以封船為慮。十日之前，中英貿易已實際停止，現在盧坤益認為律勞卑是「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懲處，何以

肅國體而懾諸夷？」九月二日亦發出佈告，斥律勞卑「妄自尊大，」「愚昧無知，難以理喻，」「自絕天朝，」正式封艙，撤退夷館買辦、通事、雇役。律勞卑立召兵船進口，轟毀虎門礮台，二次佈告，詆盧坤不義、暴虐，引起爭戰。「大英國主，權能巍巍，版圖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屬廣汪，土產豐盛，大清國亦非能比權。有勇猛兵卒，集成大軍，所攻皆勝，亦有水師大船，內有帶至百二十大礮者，巡奕各洋，並中華所未敢駛到各海，亦無不到。請督憲自問此，吾大君主有恭順何人之意耶？」試思這是何種口吻？事既至此，盧坤雖不欲啓釁，亦不得不調兵增防，並於英兵船到黃埔之日，即九月十一日，再諭行商，轉告英商，平情論理。對律勞卑雖仍有斥責，語氣尚屬平和，謂中國向以「情理服人，不尚武力」，現在律勞卑令兵船闖入內河，放炮拒敵，傷擾兵卒居民，恐非英商與散商之意，希望律勞卑改過自新，遵守舊制。英商不願貿易久停，與行商共事調解。九月二十一日，律勞卑及兵船離開黃埔，盧坤算是挽回了面子，中英貿易隨之恢復，一幕爭執暫告段落。律勞卑告訴英商，將來有一天必以武力瀚雪這次的耻辱，使中國尊重英國官員，其憤懣可知。

盧坤與律勞卑似均無不是，癥結在彼此的歷史背景不同、立場不同。盧坤不了解西方，律勞卑亦不了解中國，各執己見。盧坤只求維持現狀，絕無生事之心；律勞卑定要改變現狀，至少自盧坤看來，其言行近乎挑戰。廣州封艙之後，道光曾諭知盧坤，「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兵船進入省河後，仍囑其不可張惶，肇啓邊釁。律勞卑及兵船退去，盧坤請釐剔海關弊端，道光亦命整飭貿易，杜絕苛擾，使夷情悅服。雖尚未觸及問題的根本，要可見中國方面對中英關係的看法。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至澳門，竟至不起，正監督一職由前任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中國通、副監督德庇時（John F. Davis）接任，改採消極的靜默政策，以俟政府的指示。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但是廣州的散商不以爲然，聯名上書，請派遣全權代表，率領破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

一八三五年初，德庇時去職，羅賓臣（George Robinson）繼之，態度與前任相同，英商不服。一八三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

義律謀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待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來省城，管治英國商賈、水梢。經鄧廷楨奏准，「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一八三七年四月，義律至廣州，鄧廷楨拒不與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許遞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來粵，義律復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與馬他倫平行往還，遭原封退回，義律的嘗試亦歸失敗。中英間政治性的國交問題，相持不下，經濟性的鴉片爭執更不易解決。

三、鴉片與銀漏

鴉片來自域外，唐代始傳入中國，初名罌粟，明時稱之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肆亦有貨賣，價與黃金相等，葡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增。十六世紀晚年，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列濱傳入的煙草混合吸食。清初其法益精，「糞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雍正時（一七二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時每年進口約二百箱，每箱重約百斤，至一七六七年，已達千箱。葡人之外，英人亦事販運。

英國對華的輸出，初為毛織品、鋁、錫、銅、鐘錶、玻璃，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中國對英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先是，茶葉輸出，每年約三十萬斤，十八世紀末，漸至一千八百萬斤，十九世紀達二千餘萬斤，¹佔出口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的情況下，英國商品實少市場，要交易茶

¹每百斤價銀十九兩。

葉，惟有用白銀購買。十八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在歐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的時代，英人認為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及發現鴉片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獎勵栽種，統制運銷。中國每年進口增至四千餘箱，漸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白銀一百四十兩上漲至三百五十兩，開始感到鴉片貿易的壓力。

一七九六年，中國裁停鴉片煙稅，視為禁品。四年後，兩廣總督吉慶明白指出，鴉片貿易等於「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將使內地人民，輾轉失業。他是從經濟民生上論鴉片的第一人，詔再禁販賣。自是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全部委之港脚商人，進口有增無減。一八〇九至一八一七年，又有五次禁令，以杜絕來源為主，夷船進口，由行商具結，保證未帶鴉片，一經查出，原船逐回，不准貿易，官員查拏不力，得規故縱，分別議處，私販夷人，加重治罪。但仍歸無效，奸民與地方文武官員勾結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販運，澳門、黃埔公開交易。一八一三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專利權取消後，港脚商人更為活躍，輸入中國的鴉片愈多，銷路愈旺。

中國同樣重視現金。一七八〇年至一八一八年，屢次頒發禁止紋銀出洋的詔令，以為是被西洋鐘錶、玻璃換去，廣東當局則認為與鴉片相關聯。十九世紀初年，中西的正規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一八一二年的進口貨價約一千二百七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五百一十萬兩；一八一三年的進口約一千二百六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二百九十萬兩，這是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但鴉片為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為入超。一八一八年進口總額約一千八百八十萬兩，出口約一千四百萬兩，相差約四百餘萬兩，加上三百萬兩的鴉片售價，合計入超已達七百餘萬兩。

嘉慶朝的禁煙是失敗了。道光前期，此一問題愈為當局所關心。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兩廣總督阮元奏請申明禁令，加重行商責任，夷船進口，照舊認保，另飭身家殷實的四行輪流加保，如有隱徇，分別懲辦，並先將總商伍敦元加以處分。從此夷船預將所載鴉片轉於停

泊虎門口外伶仃洋的躉船，然後進口，由廣州包售鴉片的「審口」與夷商議價立券，持往躉船交貨，再由包攬走漏的「快蟹」小船接運入口。躉船約二十五隻，快蟹近二百隻，行駛迅速，備有武裝，關津巡船不惟無力制止，且通同作弊。閩粵交界的南澳，為煙船的另一集中地，大都為查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所有。福建以北，沿海各省的煙商往來自如，北至天津、奉天，各海口均有專司收國轉販店戶，分銷內地。鴉片貿易史上所謂「伶仃走私」時期，於是開始，銷售的數量直線上升。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平均每年為九千餘箱；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五年，為一萬八千餘箱；一八三五至一八三八年，為三萬九千餘箱。每箱平均價銀約四百兩，最後四年，每年的總值約為一千五百餘萬兩，大都為港脚商人經手，鴉片佔英國對華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印度政府歲入的十分之一來自此項非法而不人道的貿易，孟加拉一處即近一百萬金鎊。十九世紀初年，美國煙販自土耳其運至廣州的每年亦有一千餘箱。

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鑄的制錢，為民間所通用，但國家的收支則以紋銀為準，人民完糧納稅須照銀價以制錢繳抵。銀價的高下，直接影響錢價，制錢的價值視紋銀為漲落。中國的白銀產量不豐，富有之家，常事囤藏，婦女亦用以製造飾品，不能再行流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制錢分量減輕，私鑄的泛濫，亦有影響。銀價上揚，錢價貶值，物價昇高，人民納稅的負擔加重。鴉片進口激增，現銀逐年外漏，無異火上加油，銀荒日甚。伶仃走私時期，尤為顯著。十八世紀末年，紋銀一兩兌換制錢七八百文，十九世紀初年，為一千文上下，一八二一至一八三八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餘文，四十年間，銀價上漲一倍。田賦常不克如期繳足，財政大為支絀，當局遂注意到銀漏問題。

四、禁煙問題

嘉慶朝禁煙的主要動機，是鑒於鴉片的「伐性戕生」，銀漏尚在其次。道光前期，兩者並重，所採措置，不外杜絕外洋來源，遏止內

地分銷，結果依舊無效。來源愈暢，分銷愈廣，銀荒日甚，銀價日高，國計民生日艱，風俗人心日壞，「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一經吸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而此煙能提攝百脈，癮人小病，久之精神大耗，無可救治。」禁令須待官府執行，但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無不吸食，督、撫幾乎半數有癮，王公大臣亦復不少，「若輩豈肯回搬石頭壓自己的腳？」最使朝廷憂懼的是弁兵的吸食，大都鳩形鵠面，各省皆然，粵、閩等省尤甚。一八三二年廣東鴉片之久久不平，官兵一再失利，其故即在於此。而外洋鴉片每歲易銀一千萬兩之多，以致銀價愈昂，錢價愈賤，國計民生愈艱，實為治亂安危所繫，絕不容再等閒視之。

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五年，各方論陳煙禍、銀漏及應如何處置的章摺，朝廷頒布的有關法令，不下數十道，總不外查擊夾帶鴉片的夷商與私販的奸民，驅逐洋面躉船，緝捕內河走私快艇，禁止民間種植、吸食，懲處失察及吸食官吏，不准夷商偷漏銀兩，只可以貨易貨，不得易銀，亦不許以銀易錢，或以洋錢收買紋銀，特訂私運紋銀出洋、私貨入口、與查禁鴉片分銷章程等，而效果適得其反。

一八三一年以後，每年進口鴉片已接近二萬箱，英商自廣州運出的白銀超出四百萬兩，所有禁令等於具文，煙禍、銀漏大有無法挽救之勢。一八三四年廣州士紳主張開弛鴉片關禁，厚徵其稅，仍只許以貨易貨，不得私為售賣紋銀，並開民間栽種之禁，內產既盛，外煙自然不至，紋銀自然不漏。兩廣總督盧坤據以上聞，謂所說均不為無見。過了兩年，有位御史建議一併取消吸食之禁，免資胥吏藉端訛索，況且吸食者無非閒蕩之徒，即使生命自戕，要皆孽由自取，但兵丁不得吸食。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久已傾向弛禁之說，遂綜合以上各種理由，加以發揮，正式陳奏。詔命廣東大吏議覆，總督鄧廷楨等認為是因時制宜的措施，一力贊成，弛禁行將見諸實行，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英國領事亦興奮之至，進口鴉片由二萬箱驟增至三萬餘箱，次年（一八三七）達四萬箱。

主張嚴禁的內閣學士朱樽、給事中許球、御史袁玉麟認為弛禁絕

不宜行，所擬辦法又多窒礙。第一如但禁官弁、士兵吸食，不禁小民，今日之民，即異日之官弁、士兵，何以預爲之地？第二既明知鴉片爲毒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無此政體。第三紋銀出洋，誠爲可慮，要看查辦是否認真，「鴉片禁行，紋銀出洋之禁亦行。」第四中外正規貿易，出入僅足相抵，如添入每年值銀二千萬兩的鴉片，中國安得再有同樣價值的貨物與之相抵？第五栽植鴉片之利數倍於穀，如不禁止，「膏腴之地，將盡化爲鴉片之壤。」第六亦是最重要的一點，銀漏所關尚小，鴉片傷人所關尤巨，若明弛其禁，「是絕民命而傷元氣。」「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畧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辦之審口，護送之蟹船，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然後拘留奸猾的坐地夷人，限期使外洋躉船盡行離去，并令寄信回國，說明中國禁令，勿再私販。凡事「出之以斷，持之以信，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道光是一位惜財尚儉的皇帝，他亦曾吸鴉片成癮，後忽有所悟，謂「此物不禁絕，使流行於內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於是態度轉趨堅定，屢諭鄧廷楨等嚴查紋銀出洋，驅逐英國躉船、煙販，拏辦包攬匪徒。英領事義律對於鄧廷楨的命令，一再借詞推諉，躉船照舊停泊伶仃洋面，著名的煙販查頓（William Jardine）等依然逗留廣州。義律復上書倫敦，主派遣專使，率同兵船，要求北京政府鴉片徵稅開禁。東印度艦隊司令的來粵，即是爲了保護貿易，亦爲英國勢將有所行動的朕兆。

弛禁之議雖已不行，而鴉片走私愈旺，來源無法杜塞，銀荒有加無已。既不能治人，惟有依許球等的主張，返求諸己。於是嚴禁論者，由鴻臚寺卿黃爵滋出名，於一八三八年六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奏請重治吸食。立論的重點，亦爲銀漏。兩年以來銀價一兩由制錢一千二三百文，漲至一千六百有零，亦即上漲百分之三十。此「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所以重治吸食，方是治本之策，限期一年，戒絕煙癮，逾限罪以死論。「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詔命各督撫議奏，雖均謂鴉片在所必禁，而支

持黃爵滋意見的僅為少數，湖廣總督林則徐為其一。

第二節 林則徐的禁煙

一、道光의 決策

林則徐（一七八五至一八五〇）為福建侯官人，進士出身，四十八歲官江蘇巡撫，五十三歲授湖廣總督。就中國的傳統來論，他固然是一位才德俱優，有識、有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亦為一位實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職人員。他一向留心時務，「目覩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搗。」他在江蘇巡撫任內（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的奏摺中，最少有兩次論及煙禍，謂鴉片煙由外洋進口，潛易內地紋銀，「真可謂之謀財害命，」「其為厲於國計民生，尤堪髮指。」除於「洋船未經進口之前，嚴加巡邏，務絕其源，再於進口之時，實力稽查夾帶。如有偷漏縱越，或經別處發覺，即將謀利之奸商，得規之兵役，一併追究，加倍重懲。以期令在必行，法無虛立，應可杜絕根株而除大害。」可見他於鴉片的痛惡和禁絕的決心。

對於黃爵滋的主張，林則徐自予支持。¹他說鴉片流毒已甚，斷非常法所能防，以死刑禁煙，正合「辟以止辟」之義。當即訂定辦法，在湖北、湖南施行。不及三月，已見成效，一聞有論死之法，不特「開館與販者遠竄，吸食者亦相率改圖，可見民情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在另一奏摺中，再論煙害及重治吸食的必要。他估計吸煙的人，至少每人每年費銀三十六兩。全國不止四萬萬人，百人中如有一人吸食，每年漏銀即不止一萬萬兩。目前吸食者，又何止百分之一？「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儼玩心而迴頹俗，不得不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使「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時並無處死之人，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結

¹林則徐與黃爵滋為舊好，黃上奏前後，林均有聞知。

論是「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漏銀外洋等於藉寇資盜。

林則徐自國防及財政上強調鴉片的可怕後果，最令道光心驚，當天加以獎勉，要他廣續執行。接着命軍機大臣等會議覆奏，各督撫上緊查緝。吸食的王公革爵，倡議弛禁的許乃濟罷官，召林則徐來京面商。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一月三日，七天之間，召見八次，每次約一小時三十分。賜予紫禁城騎馬的殊榮，授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的重任。同時命廣東督、撫和他通力合作，「總期積習永除，根株斷絕。」他們君臣二人所談，雖不得而詳，諒必論及今後應採的措置，特別是應付英人。

黃爵滋、林則徐的原議，重在嚴治吸食，先己後人，道光的決策是齊下並進，內外兼及，來源尤須先行斷絕。林的中心任務在於對外，對內責任則付諸各省督撫。但是吸食、開館者罪以死論的章程，遲至一八三九年二月始行制定，可見阻撓者大有人在。

以直隸總督琦善爲首的二十位督、撫，均不以採用死刑爲然。軍機處首席大臣穆彰阿的態度亦曖昧模稜。他與琦善均爲旗籍，權重位尊，素受道光寵任。林的連日召見，榮典重任再施，爲破格之事，「樞臣亦爲之動色。」林「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構，有識者已爲文忠（林）危。」「樞臣」指穆彰阿而言，「中外」之「外」應有琦善在內，這是滿人對漢人的嫉嫉，恐林扶搖直上，取代了他們的權位。支持林的軍機大臣，僅漢人王鼎，無力與穆彰阿相抗。林亦「明知入於坎窞，」「身陷危機，」「但既辭不獲免，惟有竭其愚悃，冀爲中原除此巨患。」道光「訓諭之切，委任之重，」益使他不得不「垂泣而承，」「置禍福榮辱於度外。」出京之前，他的好友龔自珍對他有許多建議，其中之一爲勸他不可爲粵中浮言所動。他答以絕不爲游說多口者所惑。多口不在廣東，事勢實在難言，他所憂慮者是今後北京的態度。以後禁煙不成，原因固不全在此，但道光對他信任動搖，他之不能安於其位，以致獲咎，不能謂與此無關。

二、強制繳煙

林則徐的任務既以清絕鴉片來源爲重，奉命之後，即着手調查廣東私販情形，繼復節飭廣東布、按兩司緝拏內奸。經兩年驅逐不去的英國最大煙販查頓遂離粵回國，可謂先聲奪人，但心存觀望者仍多。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林開始採取行動，發出諭帖兩道，給各國夷人，說明通商之利，販煙之罪，例禁之嚴，私販無望，飭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並須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保證「嗣後來船永遠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聲稱法在必行，「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終止之理。」另一道係給行商，歷數他們勾結夷人，欺蒙官府的罪行，責令於三日內，將上述二事——繳煙、具結——辦到，否則即「擇尤正法一二，抄產入官。」第二天粵海關監督布告，禁止省城夷人下澳，以待欽差大臣查辦。

這是近百年來中國政府對於中西通商從來未有過的堅決表示。但是外人總以爲中國官員做事一向是虎頭蛇尾，只需畧事敷衍，即可了結。三天期滿，他們表示願意繳出鴉片一千零三十七箱，林以爲數過少，拒不接受，實行停止貿易，撤退夷館買辦、工役，拏究地位僅次於查頓的煙商顛地（Lancelot Dent）。義律得知消息，三月二十四日自澳門趕至廣州夷館，當晚林派兵將夷館包圍，斷絕出入，被幽禁的外人約三百餘名，生活大感不便，不過食物尚不缺乏。林之所以採取此種措置，乃以鴉片均寄囤外海躉船，難於控制，圍困夷人及義律，正爲以靜制動，擒賊擒王，迫使就範的有效辦法，所謂「不惡而嚴」。

夷館被圍的次日，義律避開林則徐，遞稟鄧廷楨，要求三日內恢復英人、英船的自由，否則認爲無端留難，將取適當行動，後果不負責任，並請委員面商。林派員赴洋行夷館傳話，義律及夷商不到。林責義律阻撓抗違，如將躉船鴉片全繳，不但一切即可正常，既往亦不追究。另張貼示諭，動以天理、國法、人情、事勢，勸令繳煙具結。

三月二十七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稟，願將英人經手鴉片悉

數清繳，同日布告英人遵照，總計共有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林認為滿意，賞以牛羊食物，允於繳出四分之一後，恢復買辦工役，繳出四分之二後，可往來省澳，繳出四分之三後，開辦貿易，全部繳清，一切如常。義律命副領事赴伶仃洋招集英國煙商，四月十二日開始收繳，約四十日而畢。六月三日，實行銷燬，先於虎門海灘，掘池引水，撒鹽成滿，將鴉片剖切拋入泡浸，投以石灰，用鐵鋤木耙往來翻戳，使顆粒盡化，然後放入大洋，歷時二十二日。在銷燬期間，林與鄧廷楨輪流監視。美國船長、商人、教士亦到場參觀，證實執行的十分認真，道光說是「大快人心。」

三、堅持具結與交兇

英人之肯於繳煙，一是鑒於林則徐的壓力，一時無法抗拒，二是義律聲明代表英國政府接受，將來照付值價，今後的問題可由英政府處理，既無何損失，且有擴大利益的可能。全部鴉片繳清，他們又遵照義律的命令，離開廣州，前往澳門，船隻停止進口，以待英政府決定辦法。

繳煙與具結是林則徐的兩大要求。在粵夷商會聯名稟覆，永不以鴉片帶來中國。鴉片既繳，證明義律有悔禍之意。不過林所要求的具結，須有「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所有夷人均須簽押，再由義律呈繳。義律請予寬限，林認為尚合情理。這是甘結未具，英人得以離開廣州的原因。

這時到粵洋的英船，鴉片之外，尚載有米、布、棉花，日久難免潮濕霉爛，對於義律之不准進口，深為不滿。義律為轉圜計，請林則徐派員會議。林以為他居心誠實，賞給茶葉一千六百餘箱，命空船駛進黃埔裝貨。義律要求改在澳門，林認為如此則澳門將成為鴉片囤積買賣之地，限英船於五日內進埔，否則即速回國。義律謂英船之不進埔，是因廣州當局的種種不當，如不准在澳門裝貨便無可議。林以續來英船，仍在海上私售鴉片，愈認義律存心作對，雖無如之何，然已多少看出義律的弱點。

正當彼此爭執不下之時，七月初，發生了英國水兵在九龍毆斃華人林維喜之事。義律緝擊兇犯，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皇不許。林斥其狂悖誣妄，「該國向有定例，如赴何國貿易，即照何國法度，」「殺人償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國地方，自聽伊國辦理，而在天朝地方，豈得不交官憲審辦？」所論確合於國際公法。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義律置之不理，林不得不採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門，不准英人逗留。八月下旬，義律與英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洋面的英船。林布告沿海村民團練，如英人上岸，即驅逐拘擊，斷絕一切接濟，使其坐困。九月四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砲，中國師船砲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林並無決裂之意，最少取的是守勢。北京的態度則較為強硬，道光的指示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

義律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初欲以不准英船進埔，挾制林則徐，同時聽任美船代英商運入棉花，運出茶葉，進而請求准許英商在澳門交易。及所圖不遂，九龍突擊無效，英人處境漸感困難，重思妥協，致書澳門同知，表示和平，請面商會議。林本不要決絕，只求禁絕鴉片來源，義律既知悔悟，即允所請，而以呈繳新到鴉片，交出兇犯，空臺煙販回國，為恢復正常貿易的條件。九月下旬，義律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兇犯當再查明，如係英人，照英國律例審辦，躉船一俟風順，即可開行。林提出一通融辦法，情願照式具結的英船，准照常貿易，不再搜查，未具結者，逐一搜驗，如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全行入官，兇犯展限十日交出。義律避開照式具結，僅願接受搜查。林以與具結搜查的辦法不合，且搜查須逐船盤驗，有損無益，既無鴉片，何懼而不具結？

林之所以如此堅決，由於此時有一英國船主，與美、法商船均經照式具結。他知道英商對義律不滿，夷人亦非不肯具結。再者，「夷

人愈不肯輕易具結，即愈知結之可靠。」義律以今昔處境不同，不怕林對他及英人再施壓力，過去他可以被迫繳煙，現在決不允照式具結，否則無異自蹈危機。此雖非中、英不免一戰的主因，實為雙方暫時不能妥協的近因。林認定僵局的致成，由於義律的反覆，宣稱將令師船圍擊兇犯、煙犯，火燒英船。義律知林缺乏一支強大的艦隊，無從採取直接行動，毫無畏懼。

四、西情探求與外交運用

百餘年來，中國對於西方世界，隔膜異常，甚至國名與方位亦混淆不清，遑論其他。林則徐自稱「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其實他的西方知識頗為有限，但並不故步自封。他的任務為查辦海口事件，禁絕鴉片入口，事事涉及西人，尤其是英人，必須洞悉他們的動態。離京之前，曾派遣若干熟知廣東貿易之人，先往搜集資料，並於南下途中，與曾任官廣東及通曉時務的人士晤談。抵粵之後，訪習於夷事的梁廷枏，集合廣州三書院學生六百餘人，舉行「觀風試」，詢以鴉片走私實況及斷絕之法。

對於夷情，尤須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他一面命洋商、通事、引水四處探刺西事，按日作成報告，一面羅致通曉外國語文之人，翻譯書報，西人亦有自願協助者。譯出的報刊，多來自澳門、南洋、印度、倫敦等處，輯為《華事夷言錄要》。專書首推《四洲志》（Murra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任其事者為三名中國青年，一人到過美國，兩人到過滿刺加，均受過西方教育。《萬國律例》（De Vattel, *Law of Nations*）的一部分，係美國教士伯駕（Peter Parker）應林的囑託而譯。在處理交兇案時，林會引用。關於火器、輪船製造之書，亦有編譯。外人稱他係「聰明好人，凡有心得，不辭辛苦，常時習用。」

私販鴉片的不限於英人，美人、葡人亦不例外，不過不及英人之衆。林的命令是所有鴉片應一律照繳，美國領事稟稱，美人鴉片是代英人經銷，已交還義律轉繳。林初不置信，經義律證明，即不再追究。

澳門爲鴉片集散之地，葡人表示情願出具切結，不復藏匿鴉片。林謂果能改過遷善，再由「兵頭」（葡總督）加結，可以准行。義律之自願代美人負責，是想使美、英結成一體，共同行動；林不欲多所牽連，以便專對英人。夷館被圍之始，美商京（C. W. King）首先聲明，不惟自己從不販煙，且勸人勿販，給林以良好印象。繳煙後，爲及早恢復中外商務，林先准美船出入，使取代英人利益，英人或易就範。一寬一嚴，含有分化作用，亦即以夷制夷之策。對英、美如此，對英國商人與義律，亦運用相似策略。義律禁止英船進口，林派兩位同知及行商、通事，直接開導英商進口貿易，曾收到相當效果，增添了義律的困難。

爲要根絕鴉片來源，林在陛見時，已面奏以檄諭曉示外夷，勸英人自行禁煙。初至廣州，曾擬就一道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照會，詞句近乎威脅。七個月後，所頒發的與初稿頗有出入。《澳門月報》稱他留心外事，就此一道照會比較，足見其學識的長進。照會的要義在說明通商應當互利，不可「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英國禁食鴉片甚嚴，是明知鴉片之害，既不使爲害於英國，更不可移害於中國。「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英國，誘人吸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貴國王政令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會，俾英商知道中國禁令之嚴。如再能嚴禁印度栽種，尤爲「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弼教明刑，古今通義，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守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無鴉片帶來，則華人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人於死，豈能獨予以生？被害人一命，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從中國的道德觀點來看，林的立論無可非議，從西方的商業利益而論，無異對牛彈琴。

五、對英封港

林則徐對英之逐步加強經濟壓力，是希望外交解決。義律之忽剛

忽柔，目的在拖延時間，以待英政府的訓示。他並不畏懼林則徐的武力行動，使他苦惱的是部分英商的步驟未能和他完全一致，竟有照式具結進口之事，損傷了他的威權，破壞了他的策畧，助長了林的氣焰。十一月二日，義律率兵船兩艘，駛至虎門口外的穿鼻，準備制止英船再行進口，並投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船，准英人上岸居住。第二天，有一具結英船，正報進口，英兵船迫令折回。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兵船開砲，衝突再起。此後一週，英兵船與中國砲台互轟，雙方要再謀妥協已不可能。

十月北京已有「英夷如再反覆，即示以兵威，永遠不再交易」的詔旨。穿鼻海戰後，義律宣布，以實力禁止英船進口，林則徐亦宣布一個月後停止英船貿易，仍欲給義律時間，看他的反應如何。十二月初，對英實行封港。義律又請求允許英人返回澳門，等待英王命令，為林所拒。道光得知穿鼻海戰消息，態度更為堅決，宣示英人罪狀，謂彼曲我直，「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直令其交出。」一八四〇年一月，調林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政策。有人主張封關禁海，各國互市一律不許。林力言不可，如不分良莠，「違抗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實屬事出無名。專絕英國貿易，正可利用他國與英國的矛盾，使彼離心，「若概與之絕，則觖望之後，轉易聯為一氣，」協以謀我，必須「罰不及衆，示以大公。」他的見解畢竟高人一等。

林與義律既無法妥協，英商船又逗留不去，繼續偷賣鴉片，復有軍艦掩護，縱令林改變初衷以實力對付，中國的水師斷不能勝任，惟有繼續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船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英船久泊海上，十分不便，義律要求澳門總督准英人重返澳門，囤貨出售，兵船駛進港口。葡人在林的壓力下，不敢應允。但奸民小艇，為英人的重利賂誘，潛越出海，私運食物、鴉片者仍然不少。林對英船所採的是以守為戰，使英人坐困，對於匪艇則取攻勢，不斷乘夜突擊，施以火攻，英船亦受到威脅。至於海口防務，過去鄧廷楨曾在虎

門口一帶安置木排、鐵鍊，多為風浪飄散。林重行部署，添建砲台，購置西洋砲三百餘位，「甘必力治」(Cambridge)號洋船及小輪船各一，新募水師五千人，一再察看水陸師演放火箭、排槍、子母砲，及列陣操演。所有他的設施雖不足以抵抗英國砲艦的進攻，要已盡了他的力量。

第三節 英國的砲艦政策

一、決定用兵

英人久有以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議論，但尚不便為鴉片問題而斷然有所行動。當中國禁煙運動趨於緊張之時，英政府並無明確決策。一面警告英商，如因鴉片而蒙受損失，自行負責，政府不予保護；一面又命義律不得干涉英商的經營。一八三九年義律答應繳煙之後，在他四、五兩月致英國外相巴麥尊的報告中，一再建議採取迅速而堅強的行動，予中國以重大打擊，同時請印度總督加派軍艦東來。八月初，倫敦商人集會，討論對華問題。和中國有重大關係的英國公司組織的「印度與中國協會」(一八三六年成立)，強調鴉片貿易對英利益，政府縱不再予保護，仍應發展正當商務，迫令中國賠償被沒收的鴉片，開放沿海及長江港口，中英商人直接交易，英人得携眷居住，協議關稅；如中國不願加開港口，可割讓島嶼一處。並以為其時為對中國作戰的最好時機，武力可以收到意外效果。倫敦輿論為聳動聞聽，誇大英國官民在廣州受到暴力挾制，失去自由，飲食斷絕，幾乎餓斃，並以處死相威脅，英國國家同遭污辱。謂中國人之不許鴉片進口，是要自行種植，林則徐及其他官員，均從事這種經營。

九月下旬，巴麥尊接到義律的報告，認為必須用兵。自粵回英的煙商查頓，多方運用，大事鼓煽，提供情報，力主對華作戰。國內各大城市的商人，亦紛紛上書政府，要求速採有效辦法，保護英人在華利益。十月十八日，巴麥尊通知義律，即將令海軍來。查頓擬一具體

方案，要求為派遣軍艦若干艘，弁兵七千人，佔領香港、廈門、舟山，封鎖重要港口，迫令中國謝罪，賠償煙價，訂立條約，廣州之外加開福州、寧波、上海、膠州為通商口岸。一八四〇年一月，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這時英國人離開澳門以及穿鼻海戰的消息，相繼而至，英政府決命印度艦隊增援。二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好望角的海軍提督，義律的堂兄懿律（George Elliot）任海軍統帥兼正全權，義律為副全權。

英國政府的對華方案，大致見於一八四〇年二月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的照會及頒給兩全權的訓令。照會的前部，指斥中國行事不當，作為用兵的理由；一是廣州官憲為禁販鴉片，殘害英人，凌辱英國領事；二是關涉中外的法律，須不偏不倚，且不宜操之太急，廣州官憲一向包庇鴉片，北京政府明知不問，如要認真執行，應首治官憲之罪，今竟先來對付外人，而不預行知照英國政府。照會的後部，一是要求賠償沒收的煙價，昭雪領事的被辱；二是以後英國官員與中國官憲文移來往須待以文明國家之禮；三是讓與海島；四是賠償行商欠款。為早日達成以上事項，決定出動海陸軍「加力追討，封鎖海口，扣留船隻，佔領地方。至圓滿解決為止，否則戰爭不停。英國已派全權，前往白河口，希望中國亦派欽差大臣談判。至於此次所用軍費，須歸中國償付。訓令的要點為佔領舟山，進向白河口，投遞照會，如無滿意答覆，可決定進一步行動。如中國願訂條約，可放棄海島要求。這個條約須使英人生命財產獲得安全，英人在條約口岸得自由居住交易，不受公行限制，尊重領事，明定稅則。英人如夾帶違禁貨物，或走私漏稅，可予沒收，但不得侵害其身體，領事有審理英人之權。口岸以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宜。

當巴麥尊向國會報告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的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膺懲。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但國會終於四月初以極微的多數同意了政府的政策。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

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二、戰爭初起

一八四〇年六月，來自好望角、印度的英軍艦十六艘、武裝輪船四艘、運輸艦二十八艘、海陸軍四千人，到了廣東洋面。英國的預定戰畧是將壓力加於北方，迫使清廷早日屈服，所以未攻廣州，但予封鎖。路過廈門，曾有衝突，中國砲台營房多處被燬，弁兵傷亡二十餘名，英方亦有損失。七月初，英艦抵定海(舟山)附近，限地方官於一小時內交出城池堡台，第二天即將定海攻佔，大肆搶掠，激起了人民的敵視，秩序極不易維持，英軍給養大感困難，染病及死亡的不少。

實行禁煙之初，很少人預料到會引起戰爭。林則徐尤無心啓釁，始終未採攻勢。他的友人龔自珍，雖知道夷民因利源斷絕，將有不逞之行，必須以武力勝之，但僅勸他修整軍備，防守海口，不許夷船入境，勿出海與戰。英軍艦在廣東海面出現後，林恐其趁南風北犯，即知照沿海各省籌防。除了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在福建有所部署外，各省當局以事端起於廣東，均不以爲意。其實即使有了準備，亦難期生效。中國軍備廢弛，紀律精神全無，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鳥槍、扛砲、噴筒。「全國七十萬衆，未必一千合用。」至於水師，英人謂「二艘軍艦即可將其趕散，」「中國之敵外國不過紙上言語。」

林雖無意於戰爭，但形勢所趨，卒不能免。他預測英兵艦如「不能在粵思逞，必然改竄他省，」苟有疏失，各省督撫必然誣罪於他之「惹起夷釁。」及定海失陷，果如所料，舉朝震駭，不以禁煙爲然的穆彰阿更有了口實。道光初尙嚴懲浙江巡撫、提督，仍命沿海剿堵。約十天後，即令兩江總督新授欽差大臣伊里布，密查英人啓釁情形，別諭直隸總督琦善相機辦理，如英船駛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開砲，應將所投文書進呈，政策顯已改變。不只是穆彰阿主和，定海失陷前四天，林則徐亦有密陳，謂英人逕赴天津，求通貿易，可「仍優以懷柔之禮，」倘有涉及他自身之處，請欽派大臣查辦。

英艦以定海為基地，繼續北進。八月十一日，出現於大沽口（白河口），琦善首當其衝。他對林本有芥蒂，穆彰阿是他的奧援。近年林的聲望愈隆，琦善的伎心愈重，切身的利害，與滿漢的畛域均有關係。他歷任督撫二十餘年，深知為官之道。定海不守，中國軍事弱點暴露，天津、山海關一帶的防禦力量，他自然明白。浙江軍政大員已經獲罪，倘一旦京師的門戶不保，他將得何種懲罰？上諭既要他相機辦理並預有指示，他自知如何應付。義律和英國海軍司令伯麥(G. Bremer)一再以文告攻詆林則徐、鄧廷楨「行爲無道」、「玩視聖諭」、「捏詞假奏」英國不得不出動軍隊，讓皇帝明瞭實情，「使太平永承，妥務正經貿易」此外「別無他意。」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照會譯文亦說「因〔廣州〕官憲擾害本國在中國之人民，及該官憲褻瀆大英國國家威儀，是以英國主調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昭雪伸冤。」琦善愈認定英人所不滿的僅為林、鄧，與之勢不兩立。除將照會轉呈北京外，復極言英國兵船之大，大礮之多。「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

道光的心理本已動搖，現在英艦迫臨近畿，威力又如此之強，大禍在於眉睫，但對他本人則仍示恭順。英國興師動衆，痛惡的只是廣州官憲，於是順水推舟，囑琦善告以林則徐「受人欺瞞，措置失當，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另派欽差大臣赴粵，「定能代伸冤抑，」命船艦南還，聽候辦理。對於照會中要求的各項條款，則一概未允，可能是避重就輕，亦可能是未認清問題所在。琦善本着此一指示，與義律在大沽會談，「多方駕馭，」義律「粗豪强悍，」堅持所請，否則開仗。琦善隱忍懇勸，謂文移平行，割讓海島，日後均可相商，繳煙係林、鄧所爲，朝廷不能賠償。道光說他「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再諭以應付方針。琦善改行直接照會統帥懿律，謂將來欽差大臣到粵，必將繳煙情節細查，自有圓滿處理。他自稱係「隱約其詞，」懿律、義律則以爲原則上他已答應英國的要求。加之北方氣候漸寒，不宜久留，定海英軍多病，處境艱難，遂允折回廣東，交還定海，以待續議。九月中旬，英軍艦離大

沽南去。琦善被授爲欽差大臣，入京面陳，林、鄧革職議處。主持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伊里布早已說英艦高大堅厚，不能抵禦，現在天津既經議和，愈爲有詞。十一月初，與義律商定停戰。林則徐獲咎後，雖力言鴉片必須嚴禁，英人慾望無厭，海防不可忽視，應造船製砲。道光謀和心切，斥爲「一片胡言」。

三、無結果的和談

林則徐的國際知識固然欠缺，琦善似又不如。他對於英國的認識，初得之於兩次登上大沽口英船的千總白含章，繼得之於英國煙商的買辦鮑鵬。¹林則徐的態度堅定，琦善一意敷衍，兩人均望和平，結果同爲戰爭。

一八四〇年十一月杪，琦善到廣州，十二月初，派鮑鵬與義律談判，義律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條件，否則開戰。琦善允賠部分煙價及文件平行，惟拒給海島。鮑鵬再往懇商，義律「言語倨傲，動加訶斥，」「一啓口即言打仗。」琦善許賠煙價，義律表示，如於廣州之外，加開廈門、定海爲口岸，即放棄海島要求。琦善有意允諾，但北京不肯。琦善南來之後，道光以定海英軍不即全撤，英艦仍在浙江游弋，復截擄粵海米艇、鹽船兵丁，兇心未已，詭詐多端，命琦善向義律詰問，「如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爲上策；倘竟不遵守約束，種種逞刁，則另籌辦法。」琦善亦說英人較前更加傲慢。道光即調兵赴粵增援，準備大伸撻伐。

琦善一反林則徐所爲，以示對義律和好之誠，並故意磨難，拖延時間。義律看出他的居心，決定戰後再商。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軍突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砲台，守軍死傷七百餘人，師船、拖船沉

¹鮑鵬爲廣東香山人，幼習英語。初充美國某洋行買辦，後爲英國煙商顯地算帳十二年，因林則徐下令拏辦，潛逃山東，投濰縣知縣粵人招子庸。英艦過登州時，招子庸將他薦於山東巡撫托渾布，派往英艦聯絡，英人提出講和通商、追取煙價要求。托渾布轉將鮑鵬推介給琦善。

燬十一隻。琦善隨之讓步，與義律成立初步協議，即所謂穿鼻草約。包括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元，國交平等，恢復廣州貿易，釋放浙江被俘英人，英軍交還大角、沙角及定海。義律之所以願和，他以為貿易恢復後即可運回茶葉三千萬磅，英政府可有三百萬鎊的稅收，有了香港可不必多開口岸，商欠由商人自行解決，加之定海英軍死亡患病者太多，以儘速撤退為是。¹一月二十六日，香港正式歸英所有。翌日，琦善與義律面晤，請將香港改為借居，賠償作為私了，草約亦不必由皇上批准，義律不允。二月十日，二次相會，約定十天後簽字。此時琦善已接到大伸撻伐的上諭，知道條約批准絕無可能。十天期屆，他只好稱病，不再與義律相見。

道光早要琦善攻剿，及至大角、沙角不守，愈為震怒。一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明白對英宣戰，命琦善與浙江的伊里布分別進兵。三日後續知香港已許英人，加派他的姪子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軍機大臣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續向廣州增兵，否認穿鼻草約。復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以主戰最力的裕謙代為欽差大臣，專辦浙江攻剿事宜，痛責琦善無能不堪，革職鎖繫解京，查抄家產，所受處分之重，遠在林則徐之上。

二次會晤後，琦善的態度漸為義律所疑，增兵治防之事亦為所悉，決再採取行動。二月二十六日，亦即北京宣戰的前一天，英軍總攻虎門，礮台盡失，提督關天培戰歿。第二天虎門口內的烏涌礮台續為英軍佔領，守軍被俘及傷亡者各約千餘人，餘多不戰而逃，英兵船進至黃埔。三月初，新任參贊楊芳到達，時林則徐尚在廣州，勸他停戰。義律以兵力不足，廣州一時又無最高的負責入，亦願暫停攻擊，恢復通商。道光的戰志依然堅定，再三嚴促奕山進兵。新到各省的文武官員，「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為事，」亦利一戰，不論勝敗，均可報銷軍餉。五月二十一日（四月初一日），水陸軍一千七百餘人，於黑夜

¹病者一千五百人，死者約四百餘人。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全部撤退。

之間分乘快船，挈火箭、噴筒出動，擲火焚燒。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次晨英軍二千四百人反攻。三路兵丁，一闕而潰。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的一萬八千人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只好豎起白旗。有人說這次的兵敗，是因為林則徐查辦煙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莠民亦怨之，以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夷逆蠢動之時，羣相附和，……反恐夷不勝，鴉片不行，」自不全可信。中英戰爭期間，雖有莠民附和英軍，究竟有限。

義律以廣州是一座人煙稠密的大城，英軍為數無多，炎熱難支，佔領之後，勢將激起粵人的敵視反抗，控制不易，定海已是前例。再者廣州距北京遼遠，清廷未必感到壓力，即行屈服，不如暫仍維持廣州通商，又可獲得現款賠償，待印度援兵到後，再向長江一帶進兵。五月二十七日，他與奕山的代表訂立了一個如下的和約：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六天內退至廣州城外六十里地方，一週內繳出贖城費六百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三十萬元。

年來在林則徐鼓勵之下，廣州一帶人民紛紛團練，敵愾之心頗熾。英軍紀律不佳，五月二十九日，自廣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二百多名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軍二千來援，鄉民依然不退。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二十人。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民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繼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的組織跟着成立。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謊言，對朝廷交代。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第二，行商積債六百萬元，除自籌二百萬外，¹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

¹怡和行伍敦元任一百十萬元，同孚行潘紹光任二十六萬元，其他各行共任六十四萬元。

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爲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舉棋不定，忽剿忽撫的道光何嘗不明內情。事已至此，只好認可。煙禁久已不提了，痛剿也不談了，命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爲中英問題已了，孰料英軍正大舉而來。

四、戰事繼續

北京批駁琦善與義律的協議，爲英軍進攻大角、沙角的主因；奕山的夜襲，爲戰爭再起，導致廣州被圍及和約的由來。但是即令中國照准，不再反攻，問題仍不能了。倫敦同樣不滿於義律與琦善的交涉，如果中英之間當時有了電訊，義律勢必與琦善同時遭受處分。北京痛斥琦善違背命令，喪失的利權太大，倫敦深怪義律未曾達成任務，得到的利權不足。印度總督對大清退兵，極爲憤慨，對穿鼻草約指摘尤力。巴麥尊亦嚴責義律不遵訓令。四月三十日，內閣否認草約，召回義律，改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爲全權代表，對於過去的損失，要求更多的賠款，對於將來的通商，要求充分的安全。巴麥尊的具體指示，一是不在廣州談判，中國如不接受全部條件，軍事行動不停；二是重佔定海；三是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軍費由印度總督決定，賠款未付清前，不退出定海；四是加開廈門以北口岸四處，否則另給東部海島；五是中國須先批准並履行條約；六是禁煙爲不可能之事，最好上稅。另有補充訓令，準備佔領廈門、長江，保有香港。

六月五日璞鼎查乘輪船離英，八月十日到澳門，爲自歐西至遠東的一次最速的航行。十天之後，英國海軍第二次北犯，官兵約三千五百名。第一步攻佔廈門，總兵江繼芸戰歿，英軍將砲台破壞後，留兵鼓浪嶼，續向定海前進。負責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裕謙，數月以來，在定海積極設防，兵力近七千人。英軍三次攻擊，三總兵鄭國鴻、葛雲飛、王錫朋猛烈抵抗，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千人，英軍傷亡約三十人，定海第二次失陷。時爲十月一日。定海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控制縣城週圍十里。爲便於大陸過冬，等候援師，十月

十日，英軍續佔鎮海，裕謙自盡，總兵謝朝恩力竭而死。十三日，英軍垂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英人四十餘。

裕謙殉難，道光派另一皇姪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一萬一千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凡此均非一朝一夕所克收功。奕經沿途逗留，勒索供應，四個月後，始於一八四二年二月抵達紹興。一如奕山，他毫無戰意，但上諭屢催進兵，不能不戰。三月十日（正月二十九日）黎明，水陸兵勇三萬餘人，三路進襲，一枝突入寧波城內，復被擊退。一千二百餘英軍追擊至寧波以西的慈谿，雙方發生交手戰，副將朱貴以下死傷近千，英軍死傷約二十餘人，數月來的反攻準備，徹底失敗。

英軍得到增援後，放棄寧波、鎮海，進向杭州灣的軍事要地乍浦。該地守軍約六千餘人，駐防的副都統疑忌漢人，軍民不和。五月十八日，英軍登陸，陝甘兵及部分旗兵奮勇抵抗，終未能挽救乍浦的命運。戰歿者六百餘人，男女平民被殺者七百餘人，英軍官兵死十三人（內有上校一人），傷六十二人。六月初，英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十六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兩江總督牛鑑倉惶遁走，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吳淞、寶山俱失。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四天後退走。

英軍以華北酷寒，如果戰爭曠日持久，諸多不便，所以不再直趨大沽，改向氣候溫暖而富庶的長江下游進兵。不惟利於長期作戰，且可截斷南北交通。北京亦顧慮到英軍入江，阻止漕運。英軍攻擊的目標，正為長江運河交叉點的鎮江及江南名都金陵。七月初，英艦五十餘艘，輪船十餘艘，運輸船五十餘艘，官兵約九千人，自吳淞溯江西上。江陰要塞守軍竄散，英艦平安通過，遂至鎮江。鎮江駐軍約五千人，城內為旗兵，城外為綠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驚懼失措，縱兵殺害漢人，指為漢奸，民情汹汹。七月二十一日，英軍六千六百餘人擊敗城外駐軍，越城而入，與一千五百旗兵巷戰，英

軍死傷一百七十餘人，旗兵約六百人，居民自盡、被殺者尤衆，全城遭受焚掠，一片廢墟。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接受了英軍五十萬元的勒索，作為不佔領的交換條件。但鎮江、揚州人民不為之屈，紛紛抵抗。八月四日，英軍直逼南京。

第四節 中國境遇的初變

一、南京條約

英國有其堅定的政策，清廷並無一貫態度，戰和不常，根本所在，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開始雖無心啓霧，終於步入戰爭。定海失陷，京畿危殆，轉趨於和。因有所不甘，復行進攻。進攻失敗，被迫屈服。不料對方不肯罷手，不得已出而應戰，仍然不利。定海再陷，鎮海、寧波續失，原本主戰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感到捨和之外別無他途，請起用前在浙江曾與英人辦過交涉的伊里布前來安撫，北京不准。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南部亂起，繼之突經反攻大敗，杭州震動，劉韻珂再就士氣、火器、人心、餉需各方面力陳危機，請妥協辦理，續懇派伊里布來浙，否則「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道光只好如其所議，調耆英為杭州將軍，授以欽差大臣，命伊里布隨往。自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治罪以來，道光所用以主持外交軍事的大員，幾均為滿人，或蒙古人，最後當折衝之任的耆英亦為滿人。在此情勢之下，漢人雖不必勝過滿人，而道光似不無將撫議大任授與他認為最忠實的滿人，以消弭漢人招致的禍難之意。

耆英所恃的是伊里布，伊里布所恃的是他的家人張喜。張喜曾代表伊里布去過定海，見過義律，促成浙江停戰。耆英甫至杭州，即得乍浦陷落的警聞，初由伊里布去書，商請停戰通商，繼由兩人共同照會，英方答覆必須接受全部要求。這時英軍已入長江，揚言將攻南京、天津，直抵北京。道光既恐懼，又憤慨，卒於鎮江失陷之後，允許國交平行，割讓香港，增開口岸，授耆英、伊里布以和議全權，惟不肯

賠款。

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到後，能如所請，可不攻城。八月八日，伊里布先至，派張喜兩赴英艦，晤見翻譯馬儒翰(John R. Morrison)，「允照所請辦理。」耆英到後，璞鼎查限八月十四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十七日，江寧布政使黃恩彤與馬儒翰已將條文商定。二十二日，道光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艦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

八月二十九日，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中文本係由英人譯成，文理不甚通順。主要事項為：准英人携眷居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派設領事；香港給與英國；賠償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兵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¹先付六百萬元，餘於四年內交清；准英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人，寬免與英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准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關後方撤。

此次談判耆英等「拱手受盟，一詞莫贊，」有要價無還價。關於鴉片問題，自琦善以來，已置之腦後，道光的諭旨中不提，條約中一字不見。璞鼎查勸中國開禁徵稅，黃恩彤答以「姑俟再商，」他和耆英等預料道光爲了顏面，不會正式弛禁，不如不聞不問。九月初，道光將條約批准，惟仍認爲尚有須待斟酌之處。經耆英與璞鼎查互換照會，闡明以後商欠，官不代償，英不庇匿奸民，如中英人民涉訟，「英人歸英國自理，華民由中國訊究，」亦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權。

第一批賠款六百萬元，出自江、浙、安徽庫貯及勸派捐輸，交畢後英艦出江入海。釋放被禁英人之事，曾起風波。英人再度北犯期間，

¹揚州所付五十萬元照扣，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不在其內，實際爲二千七百萬元。

先後有兩隻軍艦侵擾台灣，一隻撞礁沉毀，白夷乘艇逸去，黑夷百餘名被俘。此外有一英國商船擱淺，被俘四十餘人，內有英人十九名，暫予禁錮，其餘悉行正法。至是璞鼎查指斥台灣當局擅殺遭風遇難英人，要求抵償。北京與耆英深懼和局決裂，特派閩浙總督查辦，將台灣總兵、道員革職審訊，方行平息。

此次戰爭，在中國以爲是因禁煙而來，英國則認係爲商務與政治問題用兵。南京條約中雖已明訂條款，但僅爲綱領，英國尚要加以明確規定，使更爲具體而詳盡。中國以今後雙方的接觸愈爲廣泛，愈易肇生事端，亦須有一明晰章程，俾有遵循。有關通商的問題，頗爲複雜，例案均在粵省，章程談判又非旦夕可就，中國希望英艦早日出江，英軍亦以久居舟中諸多不便，所以商定將來在廣州解決。北京授耆英爲兩江總督，統辦江、浙、閩通商事宜，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兼廣州將軍，負責商約交涉。伊里布不久病卒，改命耆英接辦。爲表示誠信，耆英到後，即應璞鼎查之約赴香港面晤。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議定貨物估價定稅，值百抽四（茶葉爲值百抽十）；停止舊有規費；華英人民訴訟各按本國法律辦理；英國軍艦准在口岸停泊。十月八日（八月十五日）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商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於是所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條約。耆英和協助他的黃恩彤並不瞭解這些條款損害國家主權之大，反以爲有許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國法律管理，不失爲公道辦法，只要英國不庇護漢奸，他們已感滿意。明定關稅，中國稅收實際上比較以往有盈無絀，以後亦可免再生爭執。劃定租界，對外人可便於防範。利益均沾，可免某一國獨佔，又可施恩各國。過去的中西關係，一切操之於中國，今後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

二、美法效尤

林則徐在粵辦理繳煙之時，美教士伯駕曾勸他與各國訂約。美國商人亦向國內建議派遣代表來華談判，聯合英、法、荷蘭，要求改善中外關係。第二年，美國國會質詢廣州情形，政府允考慮派遣軍艦前往。一八四二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加尼（L. Kearny）奉命至粵，任務是保護美國商船，制止偷運鴉片，不捲入中英糾紛。加尼致書兩廣總督，請准美商一體貿易，利益均沾。負責夷務的當局以美人一向恭順，英人並不反對他國前來新開口岸貿易；如予阻止，是「德在英國，怨在中國，」最好是因勢利導，一視同仁。但加尼並無談判訂約之權，且已先期回國。

美國的正式代表為顧盛（Caleb Cushing），所奉訓令為：美人在新開口岸，應與英人享受同等待遇，不保護非法貿易的美商，並進京覲見。總統泰祿（John Tyler）的國書申明「致太平意，通和好之誠，」「按公平之意義，同參條約，調處經商，冀能兩國有益皆均，無利不遍。」這是美國第一次表示它的對華政策。

顧盛到前，廣州美領事曾請耆英准顧盛晉京覲見被拒。一八四四年二月，顧盛抵達澳門，照會粵督：俟兵船預備停妥，即北去天津，以便進京議約、覲見。又謂：「不與各等官員商論，只與欽差大臣商酌。」他並非定要進京，而是以此要挾，使將來在談判時中國在條約上讓步。此時為「各夷信服」的耆英已回南京，北京知此事非他人所能了，調耆英為兩廣總督，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等於當時的外交大臣。

耆英二次到粵後，親去澳門，拜訪顧盛，商請先罷進京之議。顧盛先仍閃爍其詞。一星期後，始允不北上，惟須將條約妥為議定。耆英深感顧盛狡猾，終不放心，繼請交出國書，以免於定約之後，復作為進京口實。顧盛本無定要進京之意，即行照辦。至於條約，既有英國的前例，耆英早已表示無何困難，顧盛所提草案又無礙通商大局，遂迎刃而解，耆英於不覺中墮入顧盛的術中。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的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的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的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的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值得稱道的是美人不得販運鴉片。顧盛自稱他已將中國門戶更為放寬。

法國在華並無大的商業利益，所重視的為傳教。對於中英衝突，法國亦十分關注，一八四一年曾派兩名視察員來粵。初頗給予廣州當局以希望，欲加利用，繼又恐其別生事端。中英訂約後，法人援例以請，香英原主各國一律看待，立時許可。一八四四年八月，法國代表刺尊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至澳門，狡猾不下於顧盛，復有軍艦八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於有利地位。香英先派人往見，未得要領，於是二次移樽澳門。刺尊尼於此行所為何事，初無一言道及。過了幾天，忽言盼與中國訂立同盟，忽言商約無關重輕，如照英美所訂之約難以覆命，而於所求何款，總不肯直陳。其後他談到覲見及派遣天文學者入京供職，中國遣人赴法學習船砲，給予虎門、琉球諸事。真意所在為天主教弛禁，倘立即吐露，一遭駁回，即不易轉圜，所以他故意提一些難期邀准的問題，然後要求天主教弛禁，使香英不好再駁。結果商定准華人習教，惟教士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十月二十四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之點是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

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香英宣布。刺尊尼堅持必須各行各省，釋放從前習教辦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會，進而定要上諭公開宣示，將康熙年間的天主堂給還習教之人，不然一兩國之事，正未可知。這時盛傳法人將佔領定海，道光深慨時事變遷，以至於此，只可稍從權宜。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依從刺尊尼的條件辦理。天主教既然開禁，基督教隨之照行，因為英、美條約均有最惠國

條款。

英美法訂約後，其他西方小國亦相繼干請，如荷蘭、比利時、丹麥、普魯士、西班牙，俱允其按新章互市。瑞典曾正式立約，葡萄牙要求豁免澳門地租，擴展地界，雖未邀准，而酌減租鈔則已如願。

三、五口通商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五個條約口岸，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依次開市。廈門、福州、寧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務並不繁盛。廣州貿易一經恢復，進口英、美商船五十餘艘，兩湖、江西的商人仍運絲、茶前來，再將洋貨北販，「市肆閭閻，恬熙樂業，」但好景不常。上海扼長江、黃浦江口，水運便利，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久為對內重要商業海口，本地沙船以棉花、布匹、茶葉運往東北、山東，閩、廣商船則運進糖貨、洋布、呢絨。開市之始，洋船至者尚不甚多，年約二十餘艘，一八四七年即超出一百艘。一八五〇年起，壓倒了廣州。一八五五年進口船多達四百餘艘，又三年至八百艘，走私偷稅之風極熾。廣州的洋行，相繼遷來，或設置分行，遂成為全國最大城市。英國初租荒地二十七英畝，一八四五年，取得了土地承租權，面積約一百八十英畝。三年後，擴展至四百七十英畝。法國的租界定於一八四九年，約二百英畝。美國租界形成於一八四七年，範圍不甚固定，約一千餘英畝，一八六三年，與英租界合併，稱為共公租界。¹英、美租界為居留區（settlement），法租界為讓與地（concession），商業之外，亦係作奸犯科、藏垢納污之所。至於割讓的香港，本為海盜出沒之地，僅有漁戶數十家。英人佔有後，鑿山開道，大事興建，成為英人在遠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中樞，一度更是鴉片的集散地，公開交易。

戰前中外貿易由行商控制，實際經手的為洋行買辦。他們初為臨時雇傭，僅代外人購買零星什物及起居飲食的必需品，及外人與華人

¹福州、廣州、廈門的英租界分於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及一八五二年劃定。

交往日繁，兼承辦其他事務，權力漸重。五口通商後，外人雖可自由選擇商人交易，仍須透過買辦。上海興起，已有經驗的廣東人隨之而來，如吳健彰、唐廷樞、徐潤。長於買賣的浙江人，亦以此為業，如穆炳元、楊坊、吳煦。除了經辦本埠業務，且不時深入內地，收購茶絲，推銷進口商品，轉手之間，千金可致。今後的買辦與過去廣州時代的洋行買辦，大不相同。自是沿海人民「爭附洋人，」通洋語、悉洋情者，「趨之若鶩，舉國若狂，」不少人成為巨富，但亦因與外人接觸，而習於西事。

五口通商之後，走私偷稅之風益熾，特別是鴉片。洋商於各海口設有囤集鴉片的躉船及運送的「飛剪船」，香港之外，以上海為最。一般商品亦大量漏稅，如經破獲，領事反予包庇，海關收稅僅及進出口貨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澳門及香港政府，復借名護航，將當地夾板船及浙海盜船，編為護航划艇，配置槍砲，勒索中國商船。更慘暴的行為是掠賣人口。鴉片戰爭前澳門已常有此類事件，戰後擴大至廣州、廈門等地，公然綁架，大都運往拉丁美洲，被虐待而死者甚多，即所謂「苦力買賣」。名為華工，實不如牛馬。

四、教士的活動

鴉片戰爭前，在華天主教士，並未絕跡。一八四六年，明詔弛禁，給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動展開，各有傳教區域。耶穌會再度恢復，傳教區為江蘇、安徽。一八四三年以後，在上海附近徐光啓的故鄉徐家匯設置總會，建立觀象台、博物院、圖書館、學校、印刷所。一八五三年，教區內已有七十八所學校，學生一千二百餘人，信徒與日俱增，直隸南部亦入於他們的勢力範圍。據估計全國天主教徒約三十萬人。

尤值得重視的為新教士的成就。第一位為一八〇七年到廣州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係倫敦傳福音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初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因不易與華人接近，惟有致力於文字工作。一八一五年與米憐（William Milne）在滿刺加刊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一八一八年間設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一八二三年將耶穌會士所譯聖經修訂完成，與自編《英華字典》出版。一八二七年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刊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次年他的《東西史記和合》出版。一八三三年馬禮遜的《英事撮要》繼之。同年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廣州刊行《東西洋每月統紀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三八年他的《古今萬國鑑》出版。

在廣州、澳門最活躍的為美國教士，首先前來的為一八〇三年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的裨治文(E. C. 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一八三二年裨治文在廣州發刊英文《中國彙聞》(*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2*)，並與雅裨理開辦學塾。接踵而至的有一八三三年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八三四年的伯駕。衛三畏著有《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1848*)及《華文註音字典》(*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1874*)。馬禮遜去世之年(一八三四)，裨治文、郭士立、及英美商人創設「益智會」(*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編印淺近廉價書籍，裨治文的《合眾國志》(一八三八)為其一。同年郭士立夫人創立女塾。次年益智會創立「馬公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一八三九年創立馬公書院(*Morrison School*)。第一所醫院為一八三五年伯駕在廣州設置的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一八三八年又與裨治文、加律治(T. R. Callege)組織「醫藥佈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計來華新教士共二十人。

一八四三年英華書院自滿刺加遷設香港，主持人為理雅各(James Legge)。代表十餘個佈道會的新教士爭先恐後而至，分在各口岸設立教堂、學校、醫院，印行書報。截至一八五〇年，重要人物除已提及者外，尚有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艾約瑟(Joseph Edkins)、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約翰(John G. Kerr)。上海、廣州是他們薈萃之地。新教的組織不及天主教嚴

密，但精神活潑，方法新穎，對於近代西方文化的輸入，有較大的影響。新教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力量遠超過天主教國家，當然亦有關係，不過天主教的歷史悠久，勢力深入內地，信徒衆多，新教士的活動範圍大致限於通商口岸附近。

五、西事研究

鴉片戰前，中國知識分子之究心西事者，應推主修《廣東海防彙覽》及《粵海關志》的梁廷枏。戰爭期間，王蘊香以烽煙告警，外洋輿地不可以弗考，特輯刊《海外番夷錄》。戰後梁廷枏據所蒐集的海外舊聞及英美教士所編史志，撰有《合衆國說》等書，再就其見聞，成《夷氛記聞》。夏燮亦以「蒿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輯邸鈔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成《中西記事》。¹姚瑩有介紹英、法、俄情況，乃至印度、西藏間的交通的撰述。²其後有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為關於西北史地及早期中俄關係的鉅著。

對於西事有深一層認識的為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七）。魏為湖南邵陽人，治經世之學，與林則徐友善。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間，嘗參與裕謙戎幕，據英俘口供，成《英吉利小志》。一八四一年七月，與林則徐遇於鎮江，縱談時事，及今後應付之方。其時他的論述清朝武功的《聖武記》已成，繼又增補《洋艘剿撫記》篇，記鴉片戰役。進而從林則徐之請，於一八四三年一月，纂就一部介紹世界大勢的《海國圖志》五十卷，多取材於林在廣州所譯書報，而以《四洲志》為骨幹（一八四一年《四洲志》已在廣州刊行），再「蒐集海談，旁擴西人著錄，」兼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海島志，並近日夷國夷語，鈎稽貫串，」是一部關於世界地理、歷史及西方政教國情的總集。一八四七年，親赴廣州、澳門，訪粵東名儒陳澧，晤葡萄牙理事官。繼至香

¹時穆彰阿當國，防口嚴密，夏燮恐以此書罹禍，經一再補續，至一八六五年始問世。

²見所著《中復堂全集》、《康輜紀行》，鴉片戰爭時姚瑩任台灣道。

港，購世界地圖，將原書擴充為六十卷。又五年（一八五三），再據新見的中西著述，如葡人馬吉士（Marchis）的《地理備考》等，續為一百卷。

魏源可能是戰後第一位體會到時代已開始在變與西方影響之大的中國學者。他說：「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圓體，其自西而東乎？」「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歸中外一家歟？」「東來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內之良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風俗，廣鑒地球，是智士之曠識。」《海國圖志》的用意，首在知己知彼。編者的時代了解自有不足，且好為縱橫家之談，主「以夷攻夷，以夷款夷，」而其「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論，則不可厚非。他所指的長技，首為船砲，應自設廠局，延用法、美之人，製造教演。武試中增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砲艦、火器者，作為科甲出身。有了船砲，尚須得人，所謂「利器不如人和，」必當「去偽飾，去畏難，去人心之寐，及人才之虛，」「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對於西情，須先「立譯館，翻夷書，刺英事，壽夷情。」對於國政，須做到「官無不材，境無廢令，財不蠹，器不窳。兵、農、工、虞並非俗務，心性之學不足治天下，腐儒之無用，同於異端。」他最嚮往美國的民主政治，謂美國的章程（憲法）「可垂奕世而無弊，」「二十七部（州）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既「富且強，不橫凌小國，不桀驁中國，且遇義憤，請效馳驅。」時代在變，古代的天地人物，俱不同於今日，「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豈惟世事，物理有然。」所論激切，多為時人所不能道、未曾聞，有《奇書》之稱。可惜其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遠不及其在日本，對於明治維新，具有莫大的刺激。

與《海國圖志》性質畧同而較有體系的為徐繼畲的著作。一八四〇至一八五一年間，徐歷官福建，由道員、布政使而至巡撫，留意外

事，結識一八四二年來至鼓浪嶼的美教士雅裨理，一八四八年完成《瀛寰志畧》（一八五〇年刊行），按國別敘述，兼及歷史、政治，所附地圖正確新穎。

六、造船製砲與撫綏

官方對於此次戰爭的反應，可就軍事、外交兩方面來看。英人所恃以憑凌中國的爲其砲艦。林則徐革職後，曾力陳「製砲必求極利，造船必求其堅。」又於致友人書中，有所議論，謂「彼（英）大砲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砲不能及彼，彼砲已先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砲，如內地之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復輾轉移時，再放一砲，是技不熟也。」「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中國將弁兵丁皆覲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如大砲不能得用，「雖遠調百萬貔貅，祇恐供隨敵之一哄。」英艦初次北犯，琦善根據千總白含章的查看，轉告北京，謂英船大者吃水二丈七八尺，高出水面亦二丈有餘，分爲三層，每層有砲百餘位，大者重七八千斤。又有火焰船，「輪盤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浙江方面亦有關於輪船的描述，謂：船身窄而長，舳腰有大車輪二個，上有銅煙筒一座，行駛如飛，內貯大砲，壯烈便利。大概此時廣州已在仿造，行商兼鹽茶商潘仕成，先後共成四艘，均爲帆船。另有「兩頭置舵，中設兩輪以激水」的「水輪船」，係用人力推動，浙江所造，未及竣工，定海、寧波已失。江南造成四隻，毀於一八四二年吳淞之役。火輪船初由行商潘世榮僱覓夷匠製成一隻，不甚靈便，浙江龔振麟、丁守存、鄭復光的嘗試，似亦乏成效。廣東水師提督曾參觀美國軍艦，準備就中等兵船製造，下文不明。

道光初斥林則徐的造船製砲建議爲「一片胡言」，及英艦入江，鎮江陷落，才知道各省水師戰船有名無實，而「逆夷所恃，惟有船堅砲利。」以粵、閩、浙、蘇正在用兵，無暇辦理，因先命四川、兩湖趕造大船。英船進至南京之時，又令廣東造船，並設法購買，由行商

伍敦元、潘紹光分購美國及西班牙船各一，重各三百七十噸及一百八十噸。中英和議成立，道光續促整理海防，說是今昔情形不同，造船製砲不可泥守舊制，力求精良適用，戰術亦須講究。於是沿海督撫紛紛提出意見與辦法。耆英、伊里布、牛鑑參觀過英艦，牛鑑疑心機器發動係借牛力；閩浙總督怡良曾週覽廈門英艦，亦「無從測其端倪。」但耆英等已承認英國船堅砲猛，非中國兵力所能制服。

至於火器，一八四一年已有獎勵鑄砲的上諭。丁守存、龔振麟等均有關於西洋火銃地雷的著述，並在浙江製造。更著名的為在廣州鑄砲的福建泉州人丁拱辰。丁曾遊海外，每「遇精於數算者，輒為咨訪，」尤留心製砲、演砲之術，撰有《演砲圖說》。潘仕成曾僱美人製造火藥、水雷。法人則濟勒（Cécille）曾勸粵督祁墳派人赴法，講求修船鑄砲攻守之術。耆英曾將洋槍呈進，道光為皇子時已習用鳥槍，手殲進攻禁城的天理教徒，至是親加對合，贊為「絕頂奇妙之品，靈捷之至，」但認為難於仿造。以上均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年之事。一八四四年，法使刺葛尼再以則濟勒之議，說耆英與廣東布政使黃恩彤及潘仕成，美使顧盛亦以槍砲模型贈送耆英，均被婉謝。

造船製砲所需的設備與財力，當時中國悉未具備。一八四二年十一月，道光已因廣東所造輪船不能使用，命無庸覓洋匠製造，亦無庸購買，他根本缺乏決心。沿海督撫復有對外的顧忌，英國兵船尚散處粵、閩、浙各洋，我若大事經營，「先示以猜防之跡，則彼之懷疑愈甚，設令復生變詐，轉恐剿撫皆難。」中英條約並無限制中國整軍的條款，互換照會中且有聽憑中國修治海防的明文。但戰敗的中國，畏英如虎，處處顧慮，造船製砲，卒成一時紙上空談。

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八年，耆英是外交直接主持人，道光對他頗為信任，英人對他亦具好感。以往他不曾與外人有過接觸，經過南京談判，於時局始有相當認識，就他一八四三年二月的密陳機宜一摺來看，對於時勢頗有新的了解：第一，此次戰爭非突發事件。英人以通商為重，百餘年來，洋行賤削誅求，官吏科斂舞弊，撫馭失宜，積怨既久，以致憤激生變。第二，官兵形同烏合，英軍上下一心，炮火猛烈，「我

砲施放一出之後，彼砲已接踵而來。」第三，目前民心士氣均不足以攘外，官與民，民與兵已同仇敵，不獨不能相顧，且將相防。攘外必先安內，整飭吏治，安定民生，「我圍若固，彼亦何敢鴟張。」第四，「勿以撫議爲必可恃，亦勿以撫議爲必不可恃，更不可稍形懼怯，妄事驚疑，」遇事「挺身前往，曉以至誠，諭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鎮以靜而制彼動，雖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無反覆，而誠內格物，似能令其就我範圍。」

耆英的爲人與功罪，論者不一，中國人大都詆他媚外，西人則多稱他開明。他曾訪問香港與璞鼎查周旋，希望建立私人友誼，互換禮物像片，以後復通音信。就上述密摺而言，原則上他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不可以人廢言。道光亦謂「所論一切情形，均非虛妄。」但除了「倍覺可嘆可恨」外，別無行動。結果他的攘外必先安內主張，一無實際，民間對外的反英運動與對內反滿運動同時並進，方興未艾。

七、粵民反英

英國的砲艦雖迫使清廷屈服，但一時的挫折與一紙的條約，並不能立即改變數百年來中國的對外心理。從另一方面說，今後中西關係不惟未曾好轉，反而惡化。上自政府當局，下至士紳百姓，大都有所不甘，時思報復，真正獲得正面教訓者，少之又少。戰勝的英人，則已有了經驗，有了憑藉，益認強硬態度是對付中國的有效辦法，既得權益必須確保，並企圖擴大，不惟不肯再聽從中國的擺布，且益肆驕矜，因此益增中國朝野的憤慨。這是南京條約後中英衝突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衝突事件以廣州爲多，初起於民間的反英，而由士紳發縱指使，官府暗表同情，消極營息。粵省民風剛強，與外人接觸最久，對外人的情緒亦最惡劣。鴉片戰爭期間，爲虎作倀者固有，同仇敵愾者尤衆，林則徐之獎勵團練，影響亦大，三元里事件加強了他們的信心，「平英團」是他們的武裝組織。一八四二年夏間，建立「昇平社學」，「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一遇有警，聽候調遣。

道光特旨嘉勉，命各府、州、縣仿照辦理。社學原為民間的教育、公益機構，至是一變而為愛國團體，廣州附近大小不下三十餘，西北區由「昇平公所」領導，東北區由「東平總社」領導，西南區由「隆平社學」、「南平社學」領導，各有數萬之眾。不過官府之意只是必要時用以自衛，並非用以尋釁。

戰後，廣州英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動因口舌，徒起風波，愈以忿爭為強。」每「招搖市上，遇平民輒喝令急趨避，否則鞭撲隨之。」流寓廣州的浙人錢江，素負奇氣，以豪傑自命，不以和議為然，刊貼文告，斥詆英人，定期集議，捐資招勇，為粵督祁項所驅逐。約十日後，即發生洋行夷館被焚之事。起因是英人買物而不給值，開槍傷人。夜間夷館火起，死英人二名、華人三名。璞鼎查聲言將帶兵來省，祁項立允賠償，並正法十人。璞鼎查以眾怒難犯，不欲再生風波，案遂獲結。英人繼又索租廣州河南地皮，羣起反對，香港總督德庇時準備強佔，人民投檄醜詆，紳耆致書開導，德庇時終於放棄，時為一八四四年。

經過此兩次事件，朝野均有「民可制夷」之感。廣州進城問題發生後，確證民心可恃。南京條約准英人寄居五處港口貿易，英人指港口為城市，要求進城。上海、寧波俱無困難，福州、廈門亦僅小有糾紛。廣州情形不同，紳民堅拒，主要為感情作用，特別是在民夷衝突之後。耆英時代，並無絕對不允之意，然迫於輿論，不得不設詞對英搪塞。英人以為進城與否，雖不關實際利害，但為條約權利。不准進城即是違約，此風決不可長。為了顏面，亦非進城不可，中國如不拒絕，不必定要進城，今既不允，則必須堅持，實亦近意氣用事。

一八四三年，璞鼎查屢請入城與耆英相見，昇平社學聲勢汹汹。經耆英婉詞解釋，璞鼎查允暫擱置。翌年，德庇時重行提出，亦未如願。粵人每遇三五英人思進城門，或擅入城內，輒聚眾鼓噪，甚至毆辱。一八四五年，德庇時與耆英會商交還舟山問題，復談及進城之事，耆英恐英人借口久據舟山不還，答應考慮，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粵人標貼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進城，必置諸死地。跟着發生暴

動，搗毀廣州知府衙門。耆英大為恐惶，將知府撤職，重行出示，杜絕英人進城。這是民間對外問題的初次示威，並佔了上風。英政府不欲操之過急，致礙商務，擬俟情況妥協，再行辦理。

耆英原主以誠信對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實，殊不以粵人的舉動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言官則常予責難，盛稱粵民為英人所憚，不可「強民從夷」，道光亦謂必須固結民心。耆英雖一樣認為不可「屈民就夷」，須撫柔善導，不過這是不易做到的事。一八四六年，民夷衝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粵民。某次英人無故拘打小販，開槍傷人。英外相撤銷英領事對兇犯的處罪，而於英水手被毆之事，則要求懲兇，否則直接行動。一八四七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時不待查究，率艦突襲省河，佔領礮台，直抵廣州，聲言將攻擊佛山。耆英親至夷館懇商，許兩年後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劃定河南租界，懲辦兇手，粵民愈為憤恨。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廣州附近的黃竹岐被毆致死，粵民亦有三名斃命，德庇時復率軍艦來省，耆英立將兇首四名處斬，方獲無事。

清廷的對外政策，大抵為羈縻夷人，固結民心，而事實證明羈縻並未生效，民心則確屬可用。耆英初頗想做到「民夷各得其平，」但在民夷夾攻之中，實感進退維谷。進城事，尤使他棘手，兩年期屆，眾情是否允洽，毫無把握，曾表示辭意。黃竹岐案結，再度奏陳難當重任。德庇時的突襲，已令道光憤懣莫名，對於黃竹岐事件，更認為英人的要求「荒謬已極，自無允准之理，」而耆英竟將人犯正法，顯係違背了道光的意旨。一八四八年二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廣縉代為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接任廣東巡撫。此一人事調動，為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具體表現。道光給徐敕諭為「疆吏重任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

中國的外交負責人更易，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亦改為文翰(S. G. Bonham)。文翰曾任職新加坡與滿刺加，畧知華事，要求明年履行廣州進城的諾言。徐廣縉答以「百姓不許」。一八四九年文翰約徐面議，徐以「中外大防，在此一舉」，葉名琛亦謂「官民合心，」「實有

把握」。於是部署軍事，密集鄉勇。四月，雙方相見於虎門英艦，文翰請定期許英人入城，徐稱不能自主，須待詔旨決定。道光的密示，謂可暫令文翰入城，惟不得習以為常。如果徐照此原則處理，可望獲致妥協，但他給文翰的照會，則加駁斥，這是因為士紳的態度決絕，他與葉名琛又以為英人謀乘機搶劫藩庫，佔領省城，復認定文翰係虛張聲勢，「婉阻未必遽開邊釁，輕許必致立開兵端。」道光認為有理，一切由他們辦理。時廣州已對英絕市，兵勇晝夜戒備，英軍艦進泊洋行附近。詔命徐、葉準備決裂，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英國政府於進城之爭，並不十分堅持，一八四八年十月已訓令文翰，如中國允公使領事入城拜訪，即可了事。十二月，再度訓令，不必為進城權利引起兵端，武力取得，亦難順利享受，意思是不妨避開這個爭論。虎門會談後，文翰知照徐廣縉，將來署拜謁，徐仍謝絕。文翰隨即聲明「再不辯論進城之事，亦不進署拜謁。」徐、葉張大其詞入奏，說是文翰以省城防禦森嚴，「畏葸中止，」已佈告夷商「罷論進城，大家安心貿易。」道光欣慰之至，謂「如此棘手之事，卿等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分封徐、葉以世襲子爵、男爵，其他廣州大員及紳民均各有獎勉，紳民並為徐、葉建紀功碑，君臣上下俱說是十年來夷務的一大勝利。

英外相巴麥尊得知之後，大為憤怒，命文翰警告清廷，不要忘記一八三九年廣州當局所犯的錯誤及英國軍事行動的後果，必要時英軍可將廣州毀為平地。另有致北京照會，由文翰一併向上海、天津投遞，均無結果。

第三章 內部動亂(上)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一、鴉片戰爭與內潰的加劇

嘉慶一朝，幾乎始終是在變亂中，道光前期仍時有騷動。今文學家龔自珍深感世俗之壞，貧富不齊，憤怨不祥之氣，郁於天地之間，必至發於兵燹，清的治權可能難保。不久中英戰爭發生，中國一敗再敗，有心人愈察覺到今後的內在危機。一八四一年，廣東按察使王廷蘭說中國將一蹶不振，從此不僅為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一八四二年，浙江巡撫劉韻珂說，人情震動，不逞之徒乘機起事。湖南儒生劉蓉說，奸宄之徒，羅布環伺，「外夷之烽燧未銷，而海內之干戈已起。」¹ 南京和議後，劉韻珂復指出各省通商，煙禁大開，漏銀更多，國用民用俱絕，兵無鬥志，民有亂心，以英兵內犯為可喜。給事中董宗遠指出軍興三年，上下交病，民窮財盡，殆不可支，亂民自此生心，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而起。史學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貨無限制的輸入，利權悉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將竭。

民窮財盡非一朝一夕之故，鴉片戰爭更使加劇。廣東、浙江、江蘇為主要戰場，廣東商民捐餉助銀，官吏征夫、征糧，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戶半數流離，半數觀望，地丁漕糧不能催納。江蘇貢荷一向獨重，戰後漕糧每米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銀一兩收錢多至四五千文，²如不遵勒索，即誣以罪名，橫加摧辱。富庶如蘇州、

¹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陽鍾人杰戕官據城，建號稱王。是年廣西、湖南、河南、山東、安徽、浙江、江西、雲南均有動亂。

²銀一兩約值一千八百文。

松江兩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納，棄田不顧者。致成此種現象，與急付對英賠款當然有關。第一批六百萬元，出自江浙省庫，只是借撥，仍須於捐輸項下歸還。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十分之八係由各省攤付，勒限追索。

禁煙是由於銀荒，銀荒是由於銀漏。戰後鴉片大量進口，十年之間，每年自三萬箱增至六、七萬箱，值銀約五千萬兩，其他商品值銀二千餘萬兩，銀一兩自制錢一千八百文漲至二千餘文，米價反下跌一半，錢糧愈難完納。有謂「農之食煙者十之三，賈之食煙者十之六，兵之食煙者十之八，士之食煙者十之五，上至督撫僕隸之私，下至縣門輿台之賤，其食煙者十之八九。」雖不盡可信，以進口鴉片數量估計，加上國內的種植，全國食煙者恐在千萬上下。

進口的其他商品，以洋布洋棉爲要。初雖爲數不巨，已使土布土棉遭受排擠。例如一八四五年，洋布洋棉已充積廈門，「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以往江南松江、太倉木棉梭布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布市銷減大半，棉花花客大都折本，「商賈不行，生計路紉。」廣東順德一帶的斜紋布，利市原大，「自西洋以風火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女工既停其半，」「洋織盛而土布衰。」土布土棉的市場既爲洋布洋棉奪佔，農村自日益蕭條，始以東南各省爲著，後則深入內地。

就政治方面的影響來看，戰後政府的威信大喪，弱點暴露，以反清爲職志的會黨自不會放過時機。耆英對英人撫綏，粵民則對英人抗拒，認爲「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民浸浸乎玩官於股掌，外患彌而內患作。」加之廣州不再獨佔對外貿易之利，內地土產出口，外來洋貨內銷，取道粵北者日少，成千成萬以挑運、護運及開設旅店爲業者，失了謀生之路。¹

一八四三年起，粵、湘、桂三省變亂特多，如廣東香山的天地會，湖

¹湘粵間的肩貨者，近十萬人，閩粵運茶者數千人，大多爲會黨。

南武岡的飢民。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陽人民抗糧，包圍縣城，廣東亂者四起，省城附近明火劫掠。一八四五年，廣州府屬九縣天地會數萬，千百成羣，持械戕官，擄官勒贖。湖南衡州有金丹、大道教之亂。一八四六年，桂東、湘南會黨屢次滋事，廣州焚掠案件仍然不絕。一八四七年，雷再浩領導的湘、桂間的教黨，數敗官軍。廣西天地會響應，圍攻平樂府城，各地土匪紛起，南寧等四府道路阻隔。「不獨流賊、土賊，即團練亦賊。到處裹脅，轉移無定，散而復聚，或旋起旋滅，或附外匪大股，是為流賊。逼脅村民，招納亡命，負隅抗拒，少或數十人，多至數百、千人者是為土賊。」

一八四八年，廣西亂事愈烈，與來自廣東的天地會聯合，北擾桂林，西擾潯州，以及賓州。一八四九年，廣東天地會張釗率大隊艇隻續至，掠梧州、平南、永安。另一首領張嘉祥掠南寧、貴縣。柳州、桂林及武宣一帶尤稱猖獗。廣東北江及南路的若干縣城失守。湖南教黨李沅發攻陷新寧，湘、桂之交，所在蜂起，至一八五〇年方定。同時廣東肇慶被圍，南路官軍一再失利，北路天地會擊敗官軍後，侵入廣西。廣西全省十一府，八府幾盡為天地會（堂匪）所據，洪秀全的正式舉事，亦在此時。

二、洪秀全的反清運動

洪秀全（一八一四至一八六四）為廣東花縣客家人，幼時讀過九年私塾，頗有才氣，十八歲設館授徒。一如其他知識分子，亦思由科考獵取功名富貴，兩赴廣州應試不售。一八三七年，復告落第，心理上受了打擊，大病三十餘日。病後自言天使接他昇天，天父上帝命他斬除妖魔，拯救世人，天兄基督一力相助。在此之前，他在廣州得到一本小書，叫作《勸世良言》，係基督教徒梁發節引基督教聖經並解說教義所成。一連三次科場失意，洪秀全於憤恚之餘，因有異志，新得的一些宗教觀念，大可利用，於是捏造出一個昇天故事。但是此後七年，並未見他有何實際行動，且又兩次赴考。

花縣鄰近廣州，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文武惶恐失措，官兵怯懦畏

戰，信奉上帝的數千英兵蹂躪沿海、長江，所向無敵，清廷俯首屈服。此種種現象，縱非他所目覩，要必有所聞，認為大好時機已至。一八四三年，即戰後的第二年，他再細讀《勸世良言》，愈感書中所說和他虛構的昇天神話，若合符節，他確是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勸世良言》是上帝賜他的「天書」。遂創「拜上帝會」。他的最早同志是他的同里、同窗、同屬客家、同是塾師、果毅善謀的馮雲山。他們毀除了孔子的木主，為鄉里不容，花縣亦非謀大事之地。一八四四年，洪、馮出遊廣州附近各縣及粵北瑤區，再去廣西貴縣，但是信從的人不多，洪回花縣，馮轉往貴縣東北的桂平。

洪秀全家居二年，從事宗教政治著述，說是天下凡間，實為一家，男盡兄弟，女盡姊妹，上帝生養人、保佑人，為一切恩典所自出。蛇魔閻羅妖均為怪誕謊言，二千年來為所迷惑，犯了「反天」大罪。如今「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昇矣。」行上帝的真道，使亂世變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昇天堂，永遠在天享福；」否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惹鬼棍，永遠在地獄受苦。」又製訂「十天條」，勸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題上帝之名、七日禮拜、孝順父母、不殺人害人、不奸邪淫亂、不偷竊搶劫、不講謊話、不起貪心。

文字上他未直接反清，言論間則予痛詆。論及時事，慷慨激昂，恨中國無人，「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誠足為耻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一八四七年，他到廣州，與美國浸禮會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相處約四個月，詳覽《舊約》，然後重去廣西。

同一時期，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已有了驚人成就。紫荊山界於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交界，深林密箐，聚集了不少廣東墾民。在這個有利的地區，三年之間，馮雲山奠定了拜上帝會的基本力量。桂平信徒有二千，附近州縣亦各有黨眾，楊秀清、韋正（昌輝）、蕭朝

貴、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俱在其內。

洪秀全再西來之時，廣西四境騷然，散則爲民，聚則爲寇，每股各有頭目，拜上帝會的活動益力，謂「劫運將興，惟拜上帝會可免。」「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洪秀全率之搗毀象州神像，張貼「天條」，「觀者如堵，州官不敢與較。」「遠近傳開，信徒愈衆，」引起了地方士紳與拜上帝會的衝突。一八四七至至一八四八年之交，馮雲山兩次爲團練所捕。桂平知縣受了賄賂，謂馮並無爲匪不法情事，僅命遞回原籍，中途又折返紫荊山。洪於馮被捕後，親去廣東，設法營救。馮脫釋後，追蹤而至，第二年，兩人又同回廣西。

在馮被捕及洪、馮均去廣東時期，拜上帝會一時失去重心，黨衆恐惶動搖，楊秀清、蕭朝貴分別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教導鎮懾。楊爲種山燒炭工人，富於智畧，蕭爲自耕而食的農民，勇敢善鬥。一八四九年，洪秀全自粵歸來，證實天兄、天父下凡爲真。因爲見過天父、天兄，又係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最有作證的資格，承認了楊、蕭的地位，更可證明他之昇天爲真。從此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蕭成了耶穌基督的代言人。楊最「奸譎」，不時借天父下凡來提高自己的權威，與洪秀全並稱。

三、新王朝的創建

自拜上帝會創建以來，七年之間，洪秀全、馮雲山積極宣傳組織。時廣西鼎沸，官軍無月不損兵折將，民間盛傳辛亥年（一八五一）爲「清盡明復」之歲。一八五〇年二月，道光帝卒，謠言愈熾，拜上帝會的煽惑愈力，往往一人入會，舉家同來。入會者須將財物田產變賣歸公，不許私蓄，並予以軍事組織，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各置伍長、兩司馬、卒長、旅帥、師帥、軍帥。軍帥之上爲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主將、軍師。

一八五〇年七月，拜上帝會號召各地黨衆，前來桂平金田「團

營」。爲避開官方的注意，洪秀全、馮雲山匿居平南，楊秀清佯作耳聾口啞。拜上帝會的總部設於金田韋正家，首先率衆而來的爲貴縣石達開。十一月各方至者漸多，楊秀清開始軍事行動。進向平南，擊敗清軍，會合洪秀全、馮雲山返回金田，又獲得一次勝利。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實行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¹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石達開分任中、前、後、左、右軍主將，衆約萬人，能戰者約二、三千，包括女營。

拜上帝會的組織精神，與天地會頗有相通之處，反清是共同目標。天地會有潛在勢力，洪秀全希望收爲己用，來歸者不少，敵對者亦多，一以他們不習於拜上帝會的嚴格條規；二是彼此的政治、宗教主張不合。天地會以復明爲號召，洪秀全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天地會所奉的是五祖，洪秀全只許拜天父上帝，視五祖爲妖魔。

約畧言之，太平軍的成員，就其領導人物來看，有失意而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有境遇逆裔的工農，如楊秀清、蕭朝貴；有家本素封，通曉詩書的紳士地主，如韋正、石達開、胡以晃；秦日綱則曾充鄉勇。至其下級，農工之外，有挑夫、船夫、商販、散兵、游勇、海盜。如以籍貫說，太平軍上下，幾盡屬兩粵之人，而以廣西爲多，客家的地位頗爲重要。

北京之於廣西實情，並不了了。廣西巡撫的奏報，從未提及拜上帝會。一八五〇年九月，以天地會逼近桂林省垣，始命兩廣總督徐廣縉前往剿辦，調向榮爲廣西提督。徐忙於應付廣東之亂，無暇分身，因起用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林中途病卒，改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前湖廣總督周天爵爲廣西巡撫。所重視的爲「堂匪」。十一月以後，始注意到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楊秀清大破黔軍於桂平，進據平南大黃江口，李星沅知爲心腹之患，決厚集兵力，聚而殲之。經月餘的部署，又一戰而敗。

太平軍有其宗教信仰，行軍秋毫無犯，臨陣各遵約束，成爲一支

¹登極在三月。

意志堅定，團結強固，而又得人民擁護的武力。戰畧取主動，初則「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餽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清軍將帥不和，互相推諉，赴援之師，素不相習，號令不一，畏縮不前。周天爵曾就雙方情況作一比較，謂「賊愈戰愈多，而我兵愈戰愈怯。賊兇悍有力，非烏合之衆。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賊又吃迷藥，受創不知，死而後已，」官軍以爲「賊有邪術，」心惶膽怯。「賊用兵全是洋人之法，」剽忽深沉。官兵紮營之處，各村盡是拜上帝會黨。所謂邪術即是宗教訓練，所謂洋人之法，是鴉片戰爭的餘孽猶在。李星沅自審鉅荷難堪，奏請特簡統帥，加調援軍，否則全局殆不可問。

一八五一年三月，太平軍自大黃江口回師武宣、象州，北趨桂林被阻，折返金田紫金山，遭清軍包圍。八月，突圍東出，問道北進，九月二十五日，佔領了第一座城池永安州，這是永久平安的好朕兆。時男女老幼約三萬餘人，能戰者約五千。在永安停留半年有餘，規畫設施漸臻完備。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正爲北王，分別管制東西南北各國。石達開爲翼王，羽翼朝廷。天王稱萬歲，各王依次稱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秦日綱、胡以晃等封爲丞相。天王是萬國真主，各王須受東王節制，權力不亞於天王。軍中分男營、女營。女將、女兵大都爲客家獠獍村媪，強而有力，赤足健步，裹頭持械，勇健過於男子。男女分別至嚴，不得共處。

軍政部署之外，經濟控制是他們所重視的事。早期加入拜上帝會者，固然須將財物歸公，舉事後被裹脅者，於繳出財物後，尚須將房舍焚燒，以絕顧念，一心隨營。初入永安，天王詔令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新王朝自須有新曆法，名曰「天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氣固定，無吉兇宜忌、生尅休咎，實際是一個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每七天一禮拜，但日曜較西方所通行的早一日。仍用干支紀年紀日，而較中國所通行的亦早一日。

最足以代表太平天國的精神的是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於一八五二年六月所發布的三篇文告。於此可以充分認識太平天國的宗教理論、民族主義、政治號召。其所以由楊、蕭出名，是因為他們分別代表天父、天兄。一篇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旨在申明民族大義，痛斥滿洲無道，文字淋漓雄健，極富煽動性，係對「讀書知古」之士而發。大意說：天下為上帝之天下，滿洲為胡虜妖人，肆毒混亂，改變中國形象，衣冠言語，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水旱不恤，貪污賍削。以中國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滿洲十萬，可謂奇耻。現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掃除妖孽，廓清中夏，「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希望大家「同力戮力，掃蕩胡虜，」「同享太平之樂。」另兩篇神教的意義特濃，詞意較為通俗。一篇係對「凡民、團勇」說法，謂「滿妖咸豐」為中國世仇，叛逆上帝，天所必誅，「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脫妖類，……得享天福。」團勇原指廣西的團練，謂「爾等壯丁，多是三合會黨，蓋思洪門敵血，實為同心同力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敵者也。」到了永安，準備傳檄中原，將這段文字改為「况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含義就廣泛得多了。又云，「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勳。」一篇係對「悞幫妖胡自害中國」之人鼓煽，謂「上帝是爾親爺，……今上帝命天王誅妖……救人，應速去魔鬼，歸親爺，」「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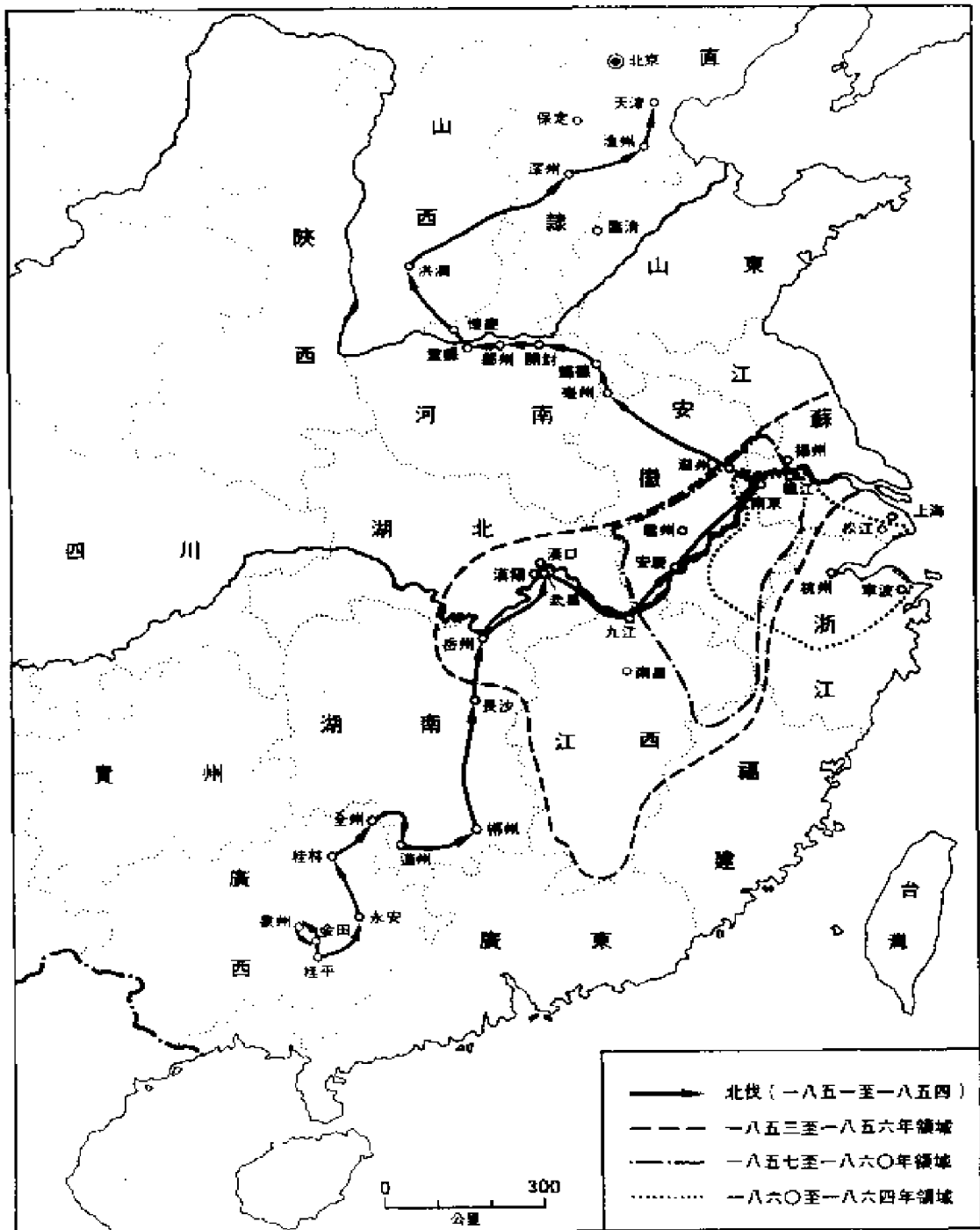
四、直前北伐與回師西征

太平軍佔有永安不久，即被圍困。清軍新統帥為賽尚阿，火器頗為猛烈。太平軍接濟不易，糧食火藥缺乏。一八五二年三月，貴縣礦工來援，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將全力突圍，大破清軍。攻桂林不下，繼續北進，南王馮雲山受傷而死，這是太平軍的一大損失。六月，入湖南，為江忠源的楚勇所敗，放棄順湘江而下的計劃，南佔道州，停留

兩月，會黨二萬人響應。於是補益卒伍，增修戰具，聲勢驟張。旋佔郴州，又得三萬之衆。九月，西王蕭朝貴以輕兵倍道直襲長沙，中敵而亡，這是太平軍的又一損失。十月，洪、楊率主力十萬到達，一再猛攻，終未能下。十一月底，渡湘而西，擄船隻數千，東渡洞庭湖，佔領岳州，水陸兩路進向湖北。五個月前，武漢已發現太平天國的揭帖，足見其滲透之力。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抵武昌城下，近十五萬人。先佔漢陽，繼佔漢口。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武昌。這是太平軍佔領的第一個省會，亦是北伐的第一階段，但殺官兵，不傷百姓。在武昌留二十餘日，大事宣傳，名曰「講道理」。拜上帝者，男子入營，婦女歸入女館，財物悉歸聖庫；不拜上帝者，將金寶錢米交「進貢所」，照舊爲民。

長沙被圍後，清軍統帥易爲徐廣縉。及太平軍進入湖北，清廷加派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河南巡撫琦善爲欽差大臣，分防江、皖及豫南，阻太平軍東下或北上。武昌失守，徐被革職擊問，改以向榮代之。一八五三年二月九日。太平軍放棄武漢三鎮，船隻萬餘，順江而東，號五十萬。清「文武棄城遠避，兵勇聞風先散，」太平軍連破九江、安慶、蕪湖，三月十九日，攻佔南京，駐防旗人二萬餘，幾同一燼。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二階段。計自出廣西以來，九個月間，軍行三千餘里，橫掃長江五省，兵力增至三十餘萬，被裹脅者，固然頗多，自願參加者亦屬不少。此固與其宗教政治宣傳有關，而其經濟軍事方畧收效尤巨。自入湖南以來，「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所過之處，以擄奪衣物散給貧者，散布流言，謂將來概免租三年，鄉民……方幸賊來。」貧民忌恨富室，太平軍之來，害不及己，且甚有利，「賊未至，衆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爭先相迎。太平軍號令嚴，紀律肅，不許騷擾，初則禮賢下士，繼即施以威劫，人人伏首聽命。清軍擄劫姦淫，或見敵即潰，或觀望徘徊。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所向披靡。

攻取南京爲太平軍的預定計劃，未出廣西之時，官軍每與之戰，動曰：「行將取江南矣，豈畏爾官軍乎？」楊秀清曾謂：「今日上策莫如捨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畧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



圖三 太平天國之北伐路線及佔領地域

爲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也。」稱至金陵爲登小天堂。金陵爲明太祖驅逐胡元，光復華夏的基地，有其歷史意義，江南爲財富之區，太平軍多饑寒之士，不論在心理上，物質上對他們均爲莫大的鼓勵與引誘。據說有人認爲應取河南爲基地，楊秀清主張建都南京，改稱天京。爲鞏固天京，並阻斷南北糧運，復佔鎮江、揚州，與天京鼎峙而三。其所以未再繼續東進，是由於志在華北與長江上游。

太平天國的領袖對於定都南京的意見，似不甚一致。四十篇《建天京於金陵論》，或係奉楊秀清之命而撰，說明金陵的種種優點，大致不外城廓堅厚，倉庫充實，形勢虎踞龍蟠，風俗溫文敦厚，全就守勢立言。有人謂應乘摧枯拉朽之勢，一鼓而下北京，方爲上策。楊秀清本其一貫主張，決定都南京與分擾南北並進。五月初，命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繼續北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賴漢英回師西征。北伐軍仍採直前衝擊戰畧，「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掠地，靡時日。」西征軍志在收取長江上游，控有黃河以南。

如果說洪、楊在軍事上犯有錯誤，則在未能厚集兵力，以事北伐。林、李所部有謂不過三千人，一說二萬人，總之，不夠強大。他們取道皖北，進入豫東，擬渡黃河。以清方已作預防，船隻盡撤北岸，不得已，轉而西向。攻開封未下，續行西進，至鄭州之西，渡河，入山西，東趨直隸，大破直隸總督軍，乘勝進逼保定。北京戒嚴，官民逃者三萬戶。以京畿援兵麤集，北伐軍折而東走，循運河北進，十月三十日，猛撲天津，兵力約三萬人。清軍決運河堤岸，太平軍爲水所阻，與清軍暫成相持之勢。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三階段。計自南京出動，經行四千里，爲時五個月，西至天津附近，距北京僅二百四十里。如自廣西算起，亦不過十五個月。

一八五四年二月，北伐軍糧食已盡，天氣酷寒，手足潰爛凍斃者不少，爲清軍僧格林沁所敗，被迫南退。時天京所派援軍正在北上途中，四月中旬，進入魯西北，終未能與南退的北伐軍會合。一八五五

年五月，北伐軍全部消滅。

北伐失敗的原因，一由於兵力不足，且爲步卒，不利於平原戰，難敵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二因南北語言隔閡，北人性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兩湖之時，從者動以萬計。以後太平軍未能再越黃河，清的根基得保。

華北進軍未克收功，西征亦不得手。洪、楊之未能動員大軍北伐，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清的重兵已在長江下游受到牽制，但以輕兵疾進，即可襲取燕都。原因之二，可能是天京城外有向榮的江南大營，揚州附近有琦善的江北大營，須留軍防衛。原因之三，可能是楊秀清預存一如不成事，仍可據有黃河以南之想。

西征軍戰船上千，兵力當多過北伐軍。一八五三年六月，再佔安慶，胡以晃留守，賴漢英西入江西，圍攻南昌，江忠源督楚勇固拒，太平軍反攻無功。九月，撤圍北去，再佔九江，西入湖北，復佔漢陽、漢口，旋退鄂東。胡以晃的一支自安慶北上，翌年一月，佔領安徽的臨時省治廬州，巡撫江忠源敗死，皖北、皖南二十餘州縣悉爲太平軍所有，成爲今後太平天國的主要統治地區。

一八五四年二月，太平軍捷於鄂東，三佔漢口、漢陽，一面圍困武昌，一面進向湖南，再佔岳州，繞越長沙，攻下湘潭。此時湖南新練的湘軍已經出動，太平軍遇到了勁敵。今後雙方的爭奪，全在長江上下。

五、對外接觸

自對外關係密切以來，中國的變亂已不僅是中國內部問題，亦爲國際所關注。在華的外國教士與商人，認爲太平軍係一新興勢力，或革命運動，對於他們的宗教尤感興趣，中國如成爲一基督教國家，可大有裨益於通商傳教，他們的報導大都爲同情的。至於外交官員，認爲正可因利乘便，自清廷或太平天國方面取到更多的權利。上海英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一再建議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翰，主聯合法、美，援助清廷，保護長江、運河的交通，而以開放全部中

國，與北京建立直接關係，鴉片合法為交換條件。這時上海道（蘇松太道），已雇葡萄牙划艇及英、美商船，上駛鎮江防堵，並請英、法領事派遣兵艦相助。文翰即調集軍艦，駛赴上海，相機行事。

一八五三年二月，文翰到了上海，命阿禮國答覆上海道，關於派艦上援南京之事，應由兩江總督正式來文，將予以善意考慮，意思就是要先談妥條件。不久得知南京失守，態度轉變，再行通知上海道，除保護英人之外，不能以兵相助。為明瞭太平軍的實況，文翰先派翻譯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取道蘇州、常州西去調查。繼由阿禮國召開英僑會議，決招集義勇，成立協防委員會，幫助海軍防衛上海租界，美人亦參加此一組織。四月二十七日，文翰乘軍艦抵南京，由艦長費士班（E. G. Fishbourne）致書太平天國當局，謂「此來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相商。」密迪樂携書進城，見到北王韋正、翼王石達開，首言英使之來，在申明英國的中立，次詢對外人的意見，是否將進攻上海，願否接待英使。北王大談其宗教與天王的權力，即使英人幫助滿清，亦不足懼。天王為中國真主，亦為萬國真主，今後彼此可以相安，成為好友。第二天，文翰得東王回「諭」，以詞句倨傲，原件退回，並附南京條約一份，以示英國在華的權利。經天京派員解釋誤會，商定明日文翰上岸與東王相見。文翰恐禮節發生爭執，臨時婉謝，並自行照會，聲明英國並未以火輪船幫助滿洲官，亦不准其雇用英國商民船隻。「對於貴王與滿州相敵，我英國情願兩不干預。」最後說：「聞貴王軍兵欲到蘇、松一帶，後至上海。時貴王之存心立意，欲與英國如何辦理之處，先願聞知。」可見他最注意的是太平軍今後對上海的行動，東王覆書說是：「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爾遠人願為藩屬，天下歡樂，天父、天兄亦歡樂。既忠心歸順，是以降旨爾頭人及眾兄弟，可隨意來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門，均不禁阻，以順天意。另給聖書數種，欲求其真道，可以誦習之。」五月二日，文翰嚴詞駁覆，謂「來書言語無狀，不能理會。中國既准吾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戈從事。」當天英艦東去，過鎮江時，接太平軍守將羅大綱來書，願友好相處，勸英人勿助清兵，

勿售鴉片。文翰覆函，聲明守局外之義，但未提及鴉片。羅爲粵人，「賊中號爲能者，」其應對遠較北王、東王爲得體。

經過此行，文翰認爲太平軍實力強大，勢必成功，英國將來可能較易獲得權益，目前以採取中立政策，等待觀望爲是。密迪樂對太平軍尤多好感，如果他們成功，不僅傳教通商可以推廣，中國亦可走上進步之途。江蘇巡撫對於文翰訪問南京，大爲不安，照會上海英、美領事，「希念兩國通商和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煙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煙之人，無不殺害，統希速發火輪師船來江剿擊。」其後又說到南京太平軍船上載有各處挑選的「美女數千人，」「金銀數百萬，」如英、美火輪兵船前來，必可「獲此厚利。」一八五四年六月，文翰的繼任者包令(John Bowring)，續派翻譯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 Jr.)到南京視察，太平天國當局雖重申「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之說，但仍持「天下萬國皆來降」的態度，否則便是妖魔。一八五五年一月，包令鑒於太平軍之勢不可侮，英國在近東牽於對俄軍事，無力東顧，布告英人嚴守中立。

天主教的法國對於接近新教的太平軍自始即乏好感。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法使布爾布隆自上海到南京，先派人進城，見到一位賴姓(漢英?)丞相，彼此均希望和好。數日後，布爾布隆與頂天侯秦日綱會晤，表示中立及對於在華天主教徒的關懷。他此行所得印象，大致尙佳，承認太平軍紀律嚴整，南京秩序安定。

一八五三年五月，與洪秀全相識的美國教士羅孝全，自粵到滬，擬去南京，以道阻不果。六月，另一美國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鎮江見過羅大綱，觀感頗好。一般美國商人多盼太平軍成功，美國駐華專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亦認爲清朝將被推翻，有承認太平天國之意，他懷疑文翰想由太平天國方面取得長江的通商權，復恐俄人援助滿清，使中國變爲保護國。爲了美國的利益，最好是維持中國的完整，由各國共同要求北京，赦免亂黨、信仰自由、外人往來自由、開放長江，強制太平軍屈服，以免英、俄獲逞，中國遭受瓜分。大概是美國政府見於滿清的命運已不易挽救，列強又難一致，命

他不要干預中國的內亂。

美國政府給馬沙利的後任麥蓮(Robert McLane)的訓令是對中國內亂嚴守中立，如中國分裂為幾個政府，可分別與之接洽，建立外交關係。如清廷拒絕修改條約，即與太平軍談判。一八五四年五月，麥蓮抵上海，二十七日，乘軍艦至南京，派翻譯裨治文上岸接洽，二十八日由艦長布嘉南(F. L. Buchanan)發出照會，說是美國全權欲與太平天國丞相元帥互相照會。並稱美國人將於明日瞻望南門外的報恩寺塔。先由一位太平軍檢點「札諭」，命先稟明來意，遵守規令，方准出入遊看。繼由兩位丞相「札諭」，命「遵照禮制，稟奏東王，」天王為萬國真主，「准年年來貢。」五月三十日，布嘉南照覆，指責「來文言語，盡非友誼，並無尊重美國之辭，不得不暫止照會。」裨治文所得印象，是在軍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國轄境內秩序良好，違亂法紀的行為，立即受到處罰；鴉片受到嚴禁；人人皆有職務；衣食無虞，精神煥發；長江兩岸及湖北的糧米供給不斷，看來必定成功。麥蓮則認為太平軍態度傲慢，即使成功，對於外人並無利益。他對國務院報告，謂太平軍無統治能力，應改變對華政策，維持在清廷控制地區的和平與秩序，以便擴張商務，保持條約權利。麥蓮明白告訴兩江總督怡良，如允許修約，長江通商，即助中華平亂，為北京所拒。

從太平天國與三國的交涉中，可見其外交拙劣，其自大或無知，較鴉片戰前的清廷實有過之，雖有「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說，但必須承認天王的宗教與政治地位。

六、北捻與南會

捻與天地會之亂雖然已久，真正擴大而益加嚴重則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捻」與「股」字意同，捻匪即股匪，由地方豪強，糾合結集，謂之「成捻」，橫行鄉里，以皖北為多。魯南失業的船夫、游民，則以布匹分幅帕首，私相雄長，稱為「結幅」，名曰幅匪。十九世紀中期，淮河、黃河一再泛濫潰決，官吏不恤，飢民無以為食，成捻結幅的愈眾。太平軍北伐、西征，皖北秩序大亂，到處揭竿而起，分據

寨、墟、集、莊，棋列星羅，捻勢大熾。頭目不一，潁州、亳州兩屬以張洛行、龔得樹輩爲首，皖、豫之交，以李昭壽爲著。一八五五年亳州、蒙城之捻，推張洛行爲盟主，以雉河集爲根據地，旗分五色，衆至數十萬。但仍乏真正統一組織，只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劫掠之時，始相聚合，名曰「裝旗」。飽掠之後，負載而歸，「糧盡再出，有如貿易者。」一八五六年，張洛行佔領水陸要衝商賈輻輳的潁州三河尖，淮河南北，遍地皆捻。與太平軍相通，名義上多接受天王封號，實際上是「聽封不聽調。」

遍布南方各省的天地會，亦乘勢大舉。一八五三年五月，福建的黃威佔領海澄、漳州、泉州、廈門，稱「大明漢軍元帥」。翌年，東入台灣，不久失敗。另一支佔領永春、德化、龍溪等縣，歷時五年。一八五三年九月，江南的天地會起於嘉定。九月七日，上海天地會的別支小刀會，由粵、閩人劉麗川、潘金珠等領導，一舉而佔縣城，數日之內，附近州縣俱爲所陷。劉麗川具奏天王，請共取蘇、常。他初稱「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至是將大明國改爲太平天國。南京以其仍敬邪神，吸食鴉片，未予認可。劉麗川因清軍的攻擊，僅能保有上海一隅，英、美、法復與爲難，斷絕城內食用，最後法軍直接參戰，協助清軍，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奪回上海縣城，小刀會失敗。

聲勢尤大的爲廣東的天地會。一八五四年六月以後，東江、北江、西江遍地皆是，其中多爲以往挑運貨物的工人及反英的團練。起於商業巨鎮佛山的陳開，建號「大成」，所部稱爲「紅兵」，呼清軍曰「白兵」，分路包圍廣州，達半年之久。兩廣總督葉名琛肆意濫誅，被殺者七萬餘人，強半爲無辜。清軍因得外國槍砲、火藥、糧米接濟，陳開未能攻下廣州，一八五五年，西入廣西，佔領桂平，直至一八六一年。其他各部（花旗），分於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間北入湖南、江西，投歸石達開。

倘使洪、楊對天地會能積極爭取，東結劉麗川，控有「倉庫」根本、北京性命所繫的江南，及糧源所出的上海，再利用時機，揮師南下，聯合湘、贛及廣東、福建的天地會，收取長江以南及濱海地區，及

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不僅可有廣大後方，並易獲得海外物資、武器，進可攻，退可守。究之實際，不無困難。太平軍爲要攻奪北京，必須繼續北伐，爲要穩定天京的地位，必須回師西征，同時又須對城外的江南大營警戒。上海小刀會舉事之日，正北伐軍深入山西，西征軍圍攻南昌之時，如再要東進，必先擊敗江南大營。北伐已不能動員大軍，這時更無此力量。至於南進，如西征順利，自可由湘、贛而下粵、閩，但結果被阻於南昌，失利於湘潭，違言其他。捻首李昭壽曾一度來歸，中途背叛，張洛行屢次與太平軍聯合作戰，並無助於太平軍在北方的發展。自廣東北來的花旗（天地會），亦未能挽回太平軍晚期在贛、浙的失利。太平軍名將李秀成與捻及花旗合作最久，所部天地會最衆，曾說：「我天國之壞者，一是李昭壽，二是招得張洛行，三是招來廣東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心變。……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是這等人害也。」這是經驗之談。

第二節 極權統治

一、信仰統制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洪秀全自稱是親承天父上帝之封的人間真主，這種資格和他的權力出自神授。但是他的宗教並非真正的西方基督教，而是中國化的，經過他改造的基督教，可名之曰「上帝教」或「洪教」。二十四歲以前，他所讀的是中國經史，所習聞的是佛道、神巫，他的初步基督教知識，與上帝觀念，得之於簡陋晦澀的《勸世良言》。他要以自己的理論，利用宗教以達成政治目的。他不是教徒，而是「上帝教」或「洪教」的教主，與耶穌爲昆仲，甚至權力超過耶穌。他說古代君民，皆拜上帝，中外一同。西洋因天兄耶穌捨身救世，遵行大道到底，中國自秦世「開神仙怪事之厲階」，因而「差入鬼路」。滿洲竊據之後，「誘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極」，天父又命次子，即洪秀全降生，拯救陷溺。

上帝初似只有兩子，約在一八四八年以後，馮雲山、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成了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子，蕭朝貴因為娶了洪秀全之妹，稱為「天婿」或「帝婿」。楊秀清又是天父的化身，並代世人贖病，稱為「贖病王」，一八五三年，復加「勸慰師」(Comforter)、聖神風(Holy Ghost)之號，《新約》是有「錯記」的，他可以「招證」。楊是風師，蕭是雨師，馮是雲師，韋是雷師，石是電師，秦日綱是霜師，胡以晃是露師。《賊情彙纂》的編者¹斥其「人襲神號，尤亙古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實亦彼教之罪人。」言雖中肯，要知道他們本以神自居，而並非人。

上帝教的規條嚴苛異常，儀式尤為煩瑣。拜上帝者必須向上帝悔罪，十天條必須熟記，犯者死罪。平時朝晚祈禱，每飯感謝上帝，有了災病及生日、滿月、嫁娶、作龜、做屋、堆石、動土等事，均要祈禱祭告。每屆七日禮拜，先一日鳴鑼高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不到者，初次枷號七週，杖責一千，兩次不至，斬首示衆。禮拜時頌上帝恩德，唱贊美詩，天王、東王以至翼王，均在贊美之列。然後讀聖經、信條，一唱百和。並朗誦悔罪奏章，高呼「殺盡妖魔」，再誦天條等。每二十五家，有一禮拜堂，軍行所至，必擇宏敞房屋，備禮拜之用。所有廟宇神偶，在所必燒必毀。教育完全宗教化，編刻了許多訓練及宣傳的書冊，自《三字經》、《幼學詩》以至洪秀全的詔書及《舊約》、《新約》，共十餘種，²均為士子所當時時攻習，無不充滿了上帝教氣氛，文字通俗，自成一格。清軍擄獲者，汗牛充棟，足徵其刊印之多。

儒家思想與上帝教的教義，多不相容，洪秀全昇天時，上帝曾說：「孔丘所遺傳之書，甚多差謬，」³「教人糊塗了事。」耶穌亦說這些書教壞了人。孔丘私逃天下，被天使追回捆綁，痛加鞭撻，永不准下

¹張德堅初撰《賊情彙纂》，後至曾國藩所設彙編所，一八五五年成《賊情彙纂》。

²計為《三字經》、《幼學詩》、《千字詔》、《天父詩》、《太平詔書》(包括《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天道書》、《天情道理書》、《舊遺詔聖書》(舊約)、《新遺詔聖書》(新約)、《天(真)命詔旨書》(真約)等。

凡。一八五三年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皆不准賣買藏讀。」所有書籍一律須經天王「蓋璽」頒行，「不使天下良民仍受妖書經傳之蠱惑，」如「世間有書不奏旨，不蓋璽而傳讀者，定然問罪。」太平軍通過與統治地的藏書，「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特設「刪書衙」，削正四書、五經及「凡情諸書」中的「妖話」，再由天王御筆改正。¹

對於知識分子，太平軍力事爭取，所至出榜招賢，希望共建勳業，勸各方投效保薦，「自貢所長，」當「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一八五三年起，開科取士，亦有秀才、舉人、進士之分，試題均出於《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命詔旨書》。會試中者，封授官職。但對於被擄官吏紳衿、儒生，則極端凌虐，「或挫折以死，或分爲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已也。」

二、兵民合一

太平軍舉事之始，首定軍制，以《太平軍目》一書爲準。軍爲最大單位，置軍帥一人，其下爲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每軍官兵合計應爲一萬三千餘人。²入湖南後，添立上營、水營。土營以礦工組成，專司穴地攻城；水營以船多爲上，負有作戰運輸兩種任務。此外有木營、金匠營、織營、鞋營、繡錦營、鐫刻營，總稱諸匠營，「各儲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但令隨營奏技，却不役使打仗。初期置有女營，每軍二千五百人，至進入湖南爲止，女兵約居四分之一。此後以兵源已無問題，長江一帶婦女又大半弱不勝軍，悉編入女館，女兵有減無增。別有童子兵，爲官長所私有，經宗教灌輸，

¹一八六一年，總理朝政的洪仁玕謂「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合於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政策爲之一變。

²一八五五年，據說共有九十五軍，各軍人數多寡不一，有不及二百人者，約計共爲十三萬，當不只此數。

臨陣勇敢，信仰不二，執法無私，及壯大成年，遂為忠實幹部。

對於軍律、訓練，反覆叮嚀，要嚴束隊伍，賞罰分明，秋毫無犯，不許騷擾鄉民。天晴操練士兵，下雨習讀天書，講解分明，互相開導，「人人共識天情，永遵真道。倘若遇有妖來，號鼓一響，趨府聽令，踴躍向前，一德一心。」行營、定營各有規式，陸路、水路、點兵、查察，均有號令條禁。

《賊情彙纂》亦盛讚太平軍制之優，兵術之良，軍紀之整，謂「逆賊荒誕暴虐，惟於軍制似有法則，渠賊，……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試觀其始定軍目，似亦具條理，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身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任意詭造，……然可保既敗不致全潰，……且能反敗為勝。賊之營壘，操縱亦若有把握，度其必不防也，則朝行暮宿，若於慎防堅守之處，則重濠重牆，甚至封堞如城，其負固各無所不至。」又云「賊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治壘，接陣進師，大小相制，視眾如寡，頗能聯合一氣，分合咸宜。」「賊之梟張全恃行軍有法。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畧無姑息。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逾時。朝為散卒，暮擢偽帥。」「使人人矢鬥可倖生、退則必死之志。……桀傲不訓之徒，甘心服役，身臨矢石而不憚，膏塗草野而無悔。」

太平天國的組織，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一元化，而以宗教貫注之。政治體系中的鄉官，與軍事體系中的軍帥以下各級均同。「家備戎裝，人執軍械，」「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尙。」理論上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會貢賦。」但未能徹底實施，兵源大都為裹脅而來。

三、官制與政事

太平天國的政府組織至南京而大備，分朝內官、軍中官、守土官、鄉官，整個制度為軍事化。從中央到地方，幾全為武銜。軍師至丞相、

檢點、指揮、侍衛、將軍爲朝內官。宮內(天王府)、及東殿(東王府)、北殿(北王府)、翼殿(翼王府)又各有職官，東殿規模之大，過於宮內。女官名號與男官同，但員額大減。總制、監軍、軍帥以下爲軍中官。守土官有總制、監軍之別，每郡(府)置總制一人，各州縣置監軍一人，受命於中央，除了治軍統軍，並上給貢賦，下理民事。軍帥至兩司馬爲鄉官，按戶口多少而設，多爲本鄉之人，軍事之外，宗教、教育、司法、政治、經濟均歸其負責。每日兩司馬在禮拜堂教讀所屬二十五家的童子，禮拜日爲男婦講道理，頌讚祭告上帝。每七週由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所屬兩司馬講聖書，兼查其是否遵守條命及勤惰。遇有爭訟，先由兩司馬聽其曲直，如不能平息，依次上達。伍卒與民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由兩司馬保舉。各級官員，定三年一保陞、奏貶，均由天王主斷。其優點爲責功課職，頗協衆情，缺點是極端集權，運用不靈。

定都南京之後，天王養尊處優，侈然自得，深居不出，遇大喜慶，方設朝會。即使東王有事晉見，亦須請旨，批定日時。所有政事，悉由侯、丞相商議停妥，具稟翼王，翼王認爲可行，代東王撰成誥諭，送東王府蓋印，再送北王府登簿，仍歸翼王府彙齊，由佐天侯交官分遞，「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僞旨。」「在外賊目，大小事件，動輒具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一八五四年間，清軍所俘獲的稟諭，成束成捆。行政手續如此煩瑣，難免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

其次是太平天國高級領袖的窮奢極欲。天王以兩江總督署爲宮殿，盡毀附近官廨民宅，每日驅迫男婦萬人，興築半載方成，週圍十餘里，牆高數十丈，內外兩重，用黃色塗飾，金碧輝煌。門扇以黃緞裱糊，門外又用黃緞紮成彩棚，月餘即更換一次。東王以下的府第衙署，無不競爭壯麗。服飾的奢靡，禮儀的隆崇，等級的森嚴，尤不待言。以出行來說，最低級的兩司馬尚有舁夫四人。東王每出，儀仗填塞街市，扈從千數百人，大小官員一律迴避，不及，須跪於道旁。甚至檢點、

指揮驍出，卑小官員兵士均須照此規矩。

太平天國既以宗教建國治國，神權高於一切，代表天父的東王地位，亦高於一切。永安封王詔中，明定各王俱受東王節制。一八五四年十月，天父復命他「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天王不得不承認東王亦是「天國良民之主」。緊要奏章，如未經東王蓋印，天王不閱，雖北王、翼王的奏章亦不能逕達天王。除了東王，任何人不得直接天王。

四、聖庫與田畝制度

公用共享是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這是理想，亦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理論的根據，仍為宗教的。「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無處不飽煖。」軍民日用所需，由政府統籌供給，做到生活優裕而無私財，既可控制黨眾，又可杜絕貪污。聖庫及田畝制度即因此而定。

聖庫掌管一切財物，金田起事之前，已經設置。此後凡攻戰所得金寶衣物，固須交獻聖庫，軍行所至，所有農民米穀亦應齊解，大口歲給米一石，小口五斗。到南京後，分設聖庫館與聖糧館，置總典聖庫與總典聖糧。聖庫館以管錢為主，聖糧館以管穀為主，天王府各有典聖庫、典聖糧。另有分司某種什物（如油鹽），或分任某一工作的各類典官，後者是按技藝之長，使各有所歸，各效職役，有如軍中的「諸匠營」。大小官員俱無常俸，買菜錢（禮拜錢）、糧、米、油、鹽皆有定制，每七日向各典官衙取給。食肉限於天王至總制階層，總制以下不給，朝內軍中皆然。至於民間，原則相同，一切與田畝制度配合。

《天朝田畝制度》一書，包含太平天國的社會結構及經濟、教育、選舉、考覈、司法制度，然只是理論。此書刻於一八五三年，但至一八五五年仍流傳不廣，見者極少，亦可證其並未實施。關於經濟的部分最為重要，而以田畝為主。田畝制度的原則，一為土地公有，依照產量，將田分為九等。二為計口授田，不論男女，按家口多寡，雜以九

等，好醜各半。三爲豐荒相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四爲國庫，每二十五家設一國庫，除足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歸國庫。婚娶彌月，俱用國庫，各有制式。五爲自給自足，每家種桑、養蠶、績縫、養雞、養彘，農隙之暇，兼事陶冶、木石等。

聖庫制度確曾嚴格施行。佔領永安之前，以鄉間富室之家爲實施對象，進軍長江之時，以城市爲對象。天京政權既立，佔地漸廣，始推及於鄉間，「以天下富室爲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爲倉，隨處可以取給。」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自不易持久，而聖庫制度實不失爲軍事時期的有效經濟措置。

理論上「凡物皆天父所有，不需錢買，」事實上難以作到。爲使財物長期流通供應，仍需要商業，除了私營，尚有公營。公營分兩種方式：一爲政府直接出售百貨，將所掌握的剩餘物資，招徠交易，以食鹽、布疋、棉花爲大宗，售價較常價爲廉，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爲一大收入；一爲政府給予資金，令商人購辦所需之物，願爲某業者，赴聖庫領本，發給營業文憑，稱爲天朝某店，限定利潤。商肆所在之區，名曰「買賣街」，多在城外，以防奸細混入城內，天京的商務歸「天買辦」總管，由總典聖庫兼任。

實施田畝制度首須一穩定的統治區域，再行調查戶口、土地，均非兵戎倥傯中所能作到，米穀亦未齊解聖庫，仍由鄉官按田畝徵收。¹不同的爲佃農交納後，不必再向田主交納。

¹強徵係另一來源，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間，太平軍的往來文書中，時有如下字樣：「九江糧米甚屬便宜，安省（安徽）米糧已解天京；」某某率水營軍船，前赴南昌、武昌一帶，收貢收糧；某某應將黃州、漢陽敵人驚走，將米糧裝解天京；某某應將某處敵人駭走，所得糧米已解抵天京。可見天京糧食供應之不穩暢。

五、婦女地位與禮俗

太平天國統制下的婦女，大異於昔日。從宗教上說，男盡兄弟，女盡姊妹。從政治上說，婦女亦可任官，大都供職於天王府及各王府，「無不錦衣玉食，出入鳴鈺乘馬，張黃繹繖蓋，女侍從數人。」從經濟上說，授田無論男女。從禮俗上說，婚姻不論財，有專司其事的「婚姻官」。不纏足，禁多妻，不准宿娼、當娼，不准有淫邪之事。男女不得混雜，婦女盡入女館。

其所以採行這種政策，據他們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太平軍多挈家齊來，創業之初，必先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私，不可私圖一時之樂，急享眼前之福。真實之福須從克己苦修而來，「俟掃盡妖氛，太平統一，方可室家相慶，夫婦和諧。」其次是內外貴避嫌疑，男女各當分別，方昭嚴肅。據他們的敵人解釋，是因為恐黨眾顧家而不肯力戰；特設女館，挈家同行，以繫戀之。一旦天下大定，不僅夫婦得再完聚，未娶者亦許婚配，功高者且可置妾，犯罪者則罰以遲娶，「意謂男女人之大慾，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庶諸惡少，捨死力戰。」

一如其他各項制度，事實與理論往往矛盾。婦女並未能真正得到平等與解放，且備受壓迫荼毒。其一，女館以軍法部勒，善於女紅者，分入繡錦營，餘悉令解足，擔任勞役，磨折而死者，頗為不少。其二，既嚴別男女，而各王不惟仍夫婦同居，且盛置姬妾，執事女官以千百計。其三，婦女對於男子，仍須服從，男理外事，女理內事，敬夫與敬天、敬主同等重要，如此方可享榮華富貴，方得上天。不祇是夫婦關係，一般倫理觀念，與傳統亦無出入。

太平天國的封建意識的濃厚，較任何王朝為甚。王爵固然是累代世襲，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亦然。服飾各分等級，民間不准用紅、黃兩色。尊卑名分，上下稱謂，各有一定，極其苛細瑣屑鄙俚。對敵人則冠以「妖」字，古先帝王貶號為侯，只有上帝可以稱帝，天王等可以稱王。文字、物名、地名亦有更改，不良風俗，如賭博、飲酒、巫覡、堪輿一律禁止。洋煙（鴉片）、黃煙（煙草）不得販賣吸

食，否則問斬。「洋煙爲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害體膚，無補饑渴，且屬妖魔惡習。」

洪秀全準備將中國的一切大事變革，並改造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爲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則是特權階級，舉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濟」。

第三節 傳統勢力的對抗

一、曾國藩的領導

曾國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爲湖南湘鄉人，長洪秀全三歲，同係來自耕讀之家。在早年功名途上，他較洪秀全順利，二十八歲中進士，成翰林，三十四歲官禮部侍郎。平生究心義理與經世致用之學，是一位道統名教的擁護者。他亦不滿時政，殷望有所改革。鄉人友好中和他抱同感的大有其人，均以事變難免爲慮。道光、咸豐之際，湖南、廣西亂作，舉人江忠源爲綏靖地方，首起楚勇，助官軍平新寧事變。一八五二年，邀擊太平軍於湘、桂之交，繼之力保長沙省城。湘鄉諸生羅澤南踵行其事，別立湘勇。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北入湖北，有燎原之勢，清廷正式授曾國藩以幫同湖南巡撫團練，搜查土匪之任，以補正規軍的不足。他因母喪正在籍守制，不欲任事，和他交稱莫逆的郭嵩燾說以乘時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他亦鑒於武昌不守，關係甚大，始赴長沙籌劃。

到長沙的第二日，提出他對團練的主張，謂團練應由地方紳耆董理，搜查土匪應由巡撫派兵剿捕。太平軍凶焰已熾，湖南兵力單薄，不足守禦，決在省城成立大團，招募壯健樸實的鄉勇，認真操練。官軍之不堪任戰，有目共覩，必須改弦更張，而以練兵爲要。易言之，他要編組一支新軍，與太平軍對抗。咸豐批示，要他「悉心辦理，以資防剿」，原則上無異認可。是後他給友人信中，屢有「馳驅中原」，

「蕩平賊氛，」「盪滌羣醜，掃蕩廓清」之言，可見他一開始即抱負不凡。

新軍不僅須針對綠營之弊，亦須兼取敵人之長，成爲確能戰鬥的部隊。綠營的最大弱點，爲營伍習氣與調遣成法，太平軍之善戰在於團結堅固。曾國藩認定「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應可血戰一二次，漸新民之耳目。」他的新軍通稱湘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人員：先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爲將。他說「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也就是有信仰，肯犧牲。然後「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爲尚，不取浮華之輩，擯斥滑弁游卒及市井無賴。

二、編制：十人或十二人爲一隊，什長一人；八隊爲一哨，哨官一人；四哨爲一營，統於營官，每營官兵五百人（初爲三百六十人），合數營，或數十營置一統領。成軍之初，大帥選統領，統領揀營官，營官揀哨官，哨官揀什長，什長挑勇丁。全軍自上而下，非親族故舊，即同鄉同里，「將帥相能，兵將相習，」「弁勇視營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視其父兄。」

三、訓練：兵勇必須「苦心精練，」陣法技擊固要逐日操習，精神紀律同樣注意，他所編的「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歌詞，雖爲勸告鄉民自衛，亦可施之營伍。同時更要愛民，每隔五天集合教導，反覆開說，千言百語，但令勿擾百姓。「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耻，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並使其相激相劑，忠義奮發，一德一心，「以畏難苟活爲羞，克敵戰死爲榮。」

四、待遇：餉銀不裕，不足以養將弁之廉、作兵勇之氣。新軍勇丁每人月銀四兩二錢（後增爲四兩五錢），較綠營提高一倍有餘。餉

源最初來自捐輸及藩庫，其後則以百貨釐金為主，¹次為鹽釐。

如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奉天討胡檄》代表太平軍的主義，曾國藩的《討粵匪檄》，²可說明湘軍的立場。太平軍是為開創王朝而戰，為實現一種理想而戰，曾國藩是為衛護道統名教而戰，為傳統文化而戰。勤王之義，雖在名教之內，但他不過分強調，對太平天國種族思想，亦避開不提，此有其難言之際。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軍的殘暴，以地域觀念打動長江流域之人，並煽動身陷太平軍者，以分化所謂「新兄弟」（在長江各省新加入者）與「老兄弟」。他說，太平軍所過，「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概搶掠罄盡，男女備受荼毒，而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如，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軍，破壞倫理秩序，以名教觀念打動知識分子。不過他對太平天國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確，他說：「中國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太平軍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稱。農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賈，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又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軍毀污廟宇，以神道觀念打動一般鄉民。他說：「自古生有功德，歿則為神，」雖亂臣賊子，亦敬畏神祇。太平軍焚燒學宮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亦被污殘，「此又鬼神所共愜怒，欲一雪此憾。」最後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衛道，救被擄船隻、人民，紓君父之憂，慰

¹釐金係仿照兩湖會館的提釐籌款辦法，大概係就所屬同鄉的商貨中抽收百分之一。一八五三年七月，江北大營始於揚州附近仿行，以助軍需，湖南大約不久亦予採用，倡之者為代曾國藩勸捐最力的郭嵩燾。第二年江蘇加以推廣，一八五五年，遂及於用兵各省。

²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發。

孔、孟人倫之痛，報生靈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義之士，共同奮起，被脅被陷者，自拔來歸。

二、湘軍東征

曾國藩的新軍，初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衆，共約四千人，其後續有增加。一八五三年九月，曾國藩移駐衡州，以避長沙綠營官兵的尋釁滋鬧，兼就近剿辦南路土寇，並興治水師。太平軍順江東下及回師西征以來，擁有大小船隻近萬，飄忽靡常，沿江州邑，不戰即得，清軍無船，防不勝防，追擊不及，束手無策。曾國藩從郭嵩燾之議，開始置辦船砲。兵勇來自湖南，工匠來自廣西，砲位置自廣東，大都為西洋所製。此為日後湘軍奪回長江控制權，阻斷太平軍的水上交通，攻克兩岸城池的關鍵所在，有關於雙方勝負極大。

一八五三年十一、十二月間，西征太平軍進入湖北，安徽情形亦急，清廷連促曾國藩赴援。曾以戰船尚未辦齊，湘南土匪尚未肅清，須待水師能自成一隊，與陸師並進夾擊，否則不能草草一出。一八五四年一至二月，江忠源及湖廣總督吳文鎔相繼敗歿，太平軍三佔漢陽、漢口，圍攻武昌，湖南震動。此時湘軍水師已成，大小戰船三百餘隻，水勇五千人，合陸師將弁兵勇夫役共一萬五千人，砲五百尊，以民船百餘號載米煤油鹽，於二月二十五日出動。全軍每月需餉八萬兩，由湖南、江西、廣東、四川供應。初與太平軍角逐於湘北，陸師敗於岳州，水師潰於長沙以北的靖港，但另隊則大捷於湘潭，不僅士氣一振，長沙亦免於夾擊。經過整編訓練之後，湘軍二次出擊，七月，肅清湖湘。時武昌已於六月再失，十月為湘軍克復，並及漢陽、漢口，這是出乎清廷意料的一大勝利。十一至十二月，再捷於鄂東田家鎮、半壁山，水師直抵九江，太平軍船隻損失至大。

一八五五年初，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援軍西來，湘軍一再受挫，漢陽、漢口、武昌又復不守，武漢至天京全入太平軍之手。曾國藩退往南昌，湘軍首尾不能相顧，決定由湖北巡撫胡林翼及羅澤南規取武

漢，日久無功。¹一八五六年石達開合自粵北來的天地會黨，及北王韋正，連佔江西八府五十餘縣，南昌幾乎不保。

三、天京內變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不久，清欽差大臣向榮的追擊軍跟踪而至，屯紮於城東南郊，號為江南大營，兼統鎮江軍，屏蔽蘇、常的產米區。另一軍屯紮揚州城北郊，號為江北大營，屏蔽淮海的產鹽區。是年（一八五三）冬，太平軍退出揚州，仍據運河口的瓜州。江南大營聲勢頗盛，雖久攻天京無功，終為太平軍肘腋之患。一八五六年，楊秀清乘上游軍事勝利，先擊破鎮江城外及揚州之敵，再猛撲江南大營，向榮敗死，天京解圍。長江上下，太平軍無往不利，皖北的捻勢亦張，囊括江、淮，似為指顧間事。就在此時，天京連續發生自相殘殺的內變，湘軍始得喘息的機會。

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來，取得了宗教、軍事、政治大權，跋扈專擅，視洪秀全如無物，動輒凌辱，對韋正、石達開、秦日綱更是頤指氣使。韋正、秦日綱且嘗受杖責，積怨已非一日。以大敵當前，隱忍未發。早在一八五五年，《賊情彙纂》的編者已經洞悉此一危機，謂楊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甚或意欲仿古之權奸，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云：「楊賊與昌輝（韋正）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天京解圍，上游軍事得手，楊秀清野心愈熾，又詭為天父下凡，脅迫天王，由九千歲進稱萬歲。一八五六年九月，韋正、秦日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殺死楊秀清，天京混戰經月，楊黨死者二萬餘人，此為天京第一次內變。十月，石達開自湖北趕回南京，責韋正不當濫誅。韋正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將所有異己，一併芟除，石達開縋城而逃，此為天京第二次內變。此後韋正仍然不分皂白，屠殺不止，懸賞購擊石達開，人人自危。十一月，石達開集兵東討，洪秀全與天京文

¹一八五六年四月，羅澤南戰歿，李續賓代領所部。

武合誅韋正、秦日綱，此爲天京第三次內變。十二月，胡林翼乘機克復武漢，底定湖北，湘軍不再有返顧之憂，並有了穩固的後方，餉械委輸不絕，傷病休養得所。

石達開是太平軍中傑出的軍中政治人物。曾國藩屢說他「最悍」、「最譎」，「挾詭詐以駛衆，假仁義以要民。」左宗棠亦稱其「狡悍著聞，素得羣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爲，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爲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韋正死後，石達開掌理政務，攻守兼施，重用青年將領陳玉成和初露頭角的李秀成，聯結捻衆，攻畧皖北、鄂東，穩定了太平天國的局面。洪秀全以飽嘗楊、韋之苦，不信外臣，專任他的無才無能的胞兄洪仁發、洪仁達。一八五七年六月，石達開以遭洪氏兄弟仁發仁達的疑忌，出走安慶，轉赴江西，別圖發展，實際上已與洪秀全脫離關係，自樹一幟，此爲天京第四次內變。石達開出走後，鎮江不守。洪氏兄弟專恣愈甚，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曾國藩以爲年內即可攻下金陵。洪秀全的政權之得以延續，一以傳聞清軍對於廣西籍的太平軍一概不赦，惟有死裏求生，抵抗到底；二以陳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戰，艱苦支撐，太平軍的威勢爲之再振；三以清廷始終心存滿漢之見，對於曾國藩未能真正信任，畀以全權。

四、太平軍的重振

一八五八年，清欽差大臣和春及張國樑¹的江南大營復進至南京城下，對江的浦口爲江北大營，天京再度被困。上游湘軍李續賓亦攻下扼長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爲湘軍所得。李續賓乘勝進軍皖北，陳玉成、李秀成聯合奮戰，先破江北大營，再破湘軍於皖北三河鎮，李續賓全軍覆沒，這是太平軍在頹勢中的重大勝利。此後陳玉成當長江上游，保衛安慶，抵禦東下的湘軍，李秀成當長江下游，保衛天京，

¹張國樑即原擾廣西的天地會首領張嘉祥（見89頁），後歸向榮，向榮敗死，改隸和春。

對抗江南大營。

一八五九年，留居香港五年的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立被重用，封爲干王，總理機務，陳、李亦分封爲英王、忠王。洪仁玕頗有新知，擬定了一套改革計劃，名曰《資政新篇》，備論政教方策，世界大勢，主張採用新的制度及科學技藝，「器使羣材，賞罰嚴明，」以期振奮人心。他的建議要旨是權歸於一，改革風俗，仿行西法。在所列舉的具體事項中，值得注意的有設書信館、新聞館、醫院、市鎮公所、鄉兵（警察）、興辦鐵路、銀行、工藝、礦務。除新聞館外，天王均認爲應行，但究屬紙上空談。第二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容闕，¹建議改善軍隊組織，設立陸海軍學校、實業學校，釐定教育制度，建立良好政府，聘任有才能的行政顧問，開辦銀行。亦未能見諸事實。容闕在天京考察月餘，認爲洪秀全實無建設一新中國的能力。

清軍顯然分爲兩大集團，一爲長江下游和春、張國樑所統的江南大營，由綠營組成。一即上游曾國藩、胡林翼所部，以湘軍爲主力。江南大營號稱五六萬，核實不過半數，以長濠困天京，意謂大功早晚可成，「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居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每四十五日僅發一月之餉，士卒怨望，揚言「賊匪一到，我們即走。」

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以天京久被圍困，改採機動戰畧，以輕騎出皖南，直下浙江，拊江南大營之背，斷其餉源，分其兵力。一八六〇年三月，李秀成襲破杭州。和春自江南遣兵來援，李秀成放棄杭州，星夜西返，會集所有兵力，包括來自皖北的英王陳玉成，分道猛撲江南大營。經過十天激戰，五月初，和春、張國樑全軍盡潰，天京再度解圍，是後兩年，城外無清軍踪跡。

七年以來太平軍的戰畧是上游主攻，下游主守，東線始終不會越過丹陽，太湖流域仍爲清軍所有。天京二次解圍後，決攻取蘇、杭、

¹容闕（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二）爲廣東香山人，幼從西人學於澳門、香港，一八五四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

上海，然後置辦輪船，再溯江而西。五月十九日，李秀成長驅而東，張國樑、和春敗死，人民爭殺清軍以迎。除了上海、鎮江，兩週之內，江南爲所席卷。八月，進攻上海，未下，同時上游戰事轉急，太平軍遂陷於兩線作戰。

五、曾國藩總制東南

湘軍之未能乘天京內亂的有利時機，於奪回武漢之後，全力推進，不全由於力不從心，而是滿人對漢人的缺乏信任。湘軍初次克復武漢，某大臣反說曾國藩以匹夫崛起，從者萬餘，恐非國家之福，咸豐爲之色變。曾的責任甚重，而權力有限，僅有一「欽差兵部右侍郎」虛銜。一八五七年三月，因父喪，奏請終制，頗有就此引退之意。七月，再請開缺，並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形。一爲對所部官兵僅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事權不如提督、總兵。二爲籌餉須經地方官之手，與督撫有客主之分，難以呼應靈通。三爲奉命統兵未見明旨，時有譏議，所用木印關防，時常更換，州縣往往疑爲僞造，號令難於取信。清廷竟准其所請。

曾國藩家居年餘，一八五八年，以石達開糾合江西太平軍東進，始再被起用，先命援浙江，繼命援福建。復命前往四川，最後，改援安徽，牽制上海太平軍，好讓和春獨收克復天京之功。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間，曾國藩與太平軍英王陳玉成劇戰於安慶附近，歷時三月，所恃的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支援。

江南大營二次崩潰之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正在安徽宿松會商全局。左宗棠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蹙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蕩，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認爲「否極而泰，剝極而復」的時期已至，均以和春之敗爲慶幸。胡料定北京勢必重用湘軍，曾國藩必可取得「督符」、「兵符」，結果只是要他迅速東援，不免沮喪。及蘇州失守，清廷環顧宇內，將帥之能，兵勇之衆，以湖南爲最，除仰仗湘軍外，無別途可循。一八六〇年六月，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又兩月，實授，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

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從此他可以「破格請將，放膽添兵，」湖南集團滿意了，湘軍名符其實的代替了綠營。

為進兵東南，曾國藩移駐皖南祁門，留軍續攻安慶，以為將來克復金陵張本。不久英法進軍北京（見146頁），詔令北援，對他又是一個難題。他雖會有此請，似非出於真誠。他對曾國荃說：「北援不必多兵，即吾與潤帥（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而已。」又對胡林翼說：「天下有理有勢，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以鞏固現疆土為第一，北援僅是一種姿態。

第四章 西力衝擊(下)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第一節 西方國家的携手

一、咸豐的對外動態

一八四八年廣東督撫易人，是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明徵。香港總督文翰既聲明罷議廣州進城，益信強硬政策有效。一八五〇年二月，道光去世，二十歲的咸豐繼位，意氣似乎更盛。英國並未放棄立場，謀避開廣州，直接與北京交涉。四月，文翰北去上海，投送抗議書及外相巴麥尊的照會，聲稱將往天津。兩江總督怕他越境北上，勉強收下。

抗議書與照會外，文翰尚有致軍機大臣穆彰阿及禮部尚書耆英的咨文。穆彰阿為實際的首相，耆英為熟悉夷務之人，與英人「極敦誼禮」。巴麥尊的照會指責徐廣縉失禮不當，英國要簡派大員赴京面議，文翰的抗議書特提廣州進城問題，及粵民抗英之事。咸豐認為英人欲行反間之計，謂中國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無外交之義，原可置之不理，既有文給穆彰阿、耆英，即由兩人咨明兩江總督轉告開導。進城已作罷議，無庸追論，派員來京，例所不許，命文翰迅回廣東。第二天（五月三十日）文翰的代表到了天津海口，停留十天，一無所成。穆彰阿、耆英的咨文係由蘇、松、太道轉行照會，被文翰退還，謂必須由大學士照覆，結果是虛此一行。

文翰的北行失敗，增長了反英的氣焰，上諭一再命沿海各省嚴防，訓令徐廣縉、葉名琛，如英人因所求不遂，以兵船窺擾，應制之於先。於是各方紛言夷禍之烈，與和不可恃，防夷為救時急務。前任湖廣總督周天爵，痛陳鴉片每年所費，數倍正賦，莠民奸宄，均以口岸為淵

藪，與夷人勾結，「失今不治，伊於胡底？」主張以賊攻賊，誘敵深入內地，合力殲之。徐廣縉謂英兵不過一二千人，決非億萬百姓之敵，爲了商業利益，英人亦不願輕事戰鬥。即或偶生妄念，企圖嘗試，「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未嘗不廢然思返。」咸豐的硃批是「所奏各情甚當。」

咸豐即位之初，下詔求言，保舉人才。大學士潘世恩等首請徵召林則徐，言官亦稱，林爲英人敬畏，如令「協辦夷務，」「英夷必望風而靡。」上諭召林迅速來京，聽候簡用。林於一八四五年自伊犁釋回，先後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一八四九年因病告歸，以仍未痊可，不克成行。他的政敵穆彰阿亦不欲其再起，說他「柔弱病軀，不克錄用。」林如果再出，將有何種影響，無庸推測，要可知當時對外的氣氛。

林則徐雖未再出，而過去及現在主撫的人物，一一遭受罷斥。第一個是曾隨耆英在南京辦過對英交涉，現任浙江寧、紹、台道的咸齡。有人彈劾他前在蘇、松、太道任內，「惟夷首之言是聽，」今「仍以縱容爲事，」遂被開缺。閩、浙總督劉韻珂及福建巡撫徐繼畲以「委曲以順夷情」被參，復以曾勸皇帝勿爲羣言淆惑，受到申斥，相繼罷職。

更大的人事變動，爲穆彰阿、耆英之受懲處。歷代新君與舊時的當權大臣常不易相處，咸豐之於穆、耆，又涉及對外問題。耆英曾論求治之道，謂用人在試其功，不論其爲君子、小人，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說無裨時務，泥古之論難合機宜。詔責其持論過偏。文翰投遞的照會，指明寄交他們兩人，益予強硬派以口實，認定他們與英人有特殊關係。耆英在對英備戰聲中，又勸咸豐不可輕動。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咸豐親筆宣佈兩人罪狀，穆彰阿是自有夷務以來，傾排異己，「僞言熒惑，」與耆英同惡相濟，特別指明他中傷林則徐。耆英是畏葸無能，「抑民奉夷，」兩人「貽害國家，厥罪惟均。」穆彰阿革職，永不叙用，耆英降爲五品頂帶。從此撫馭派不論在地方或中央，均告失勢。

二、英美法慾壑的增長

南京條約訂立之後，中英的爭執反較以往增多，雙方的感情亦較以往更惡，中國以爲英人桀驁愈甚，英人以爲中國仇外益力，跡近挑釁，甚或違反了條約。五口通商不久，英人的不滿即生，最重要的爲以下四事：第一，對華貿易額雖然增加，鴉片大爲暢銷，但工業成品的輸出則距英國工商界的希望甚遠；認爲這是由於口岸的限制；貿易額的多寡與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國全部開放，貿易額自必隨之上昇。第二，鴉片雖然可以進口，且不徵收關稅，但名義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販賣、吸食；最好使成爲合法行爲。第三，基督教雖然弛禁，但教士僅能在五口活動，對傳教事業爲莫大障礙，應准自由進入內地，並予優待。第四，國交雖然平等，依然有名無實，公使不能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總辦夷務的廣州欽差大臣，遇事推諉，照會又常遲遲不覆，甚至欲與相晤亦頗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領；今後公使必須入駐北京，經常與中央大員接觸。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國的心情最爲急切。對北京駐使，英國尚別有用心，即防止俄羅斯館的俄國教士、學生的陰謀活動。

上海英國領事阿禮國主張擴展對華貿易及英人自由進入中國內地尤力，曾向倫敦建議。一八四九年又致書文翰，謂一支小型艦隊封鎖運河口，即可使北京屈服，獲得更多利益。文翰北上抗議無效，英外相巴麥尊亦認爲不久的將來，須再予中國打擊，方可使其低頭。一八五一年準備採取行動，以中國內亂日熾，如再向清廷壓迫，中國勢將益陷於混亂，實不利於英國商務，不妨觀望局勢的演變，以決進止。一八五二年阿禮國對文翰重提前項意見。一八五三年文翰訪問南京，深感太平軍勢不可侮，但傲慢無知，縱令成功，亦難期有裨於英國。是年底，太平軍的進展受到挫折，奪取北京已無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外相克蘭頓(Lord Clarendon)即訓令新任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包令，實行要求修約，做到下列幾點：一、准英人隨意往來中國內地及沿海各城，否則應准航行長江及出入南京以下兩岸，及浙江

沿海各城。二、確定鴉片為合法貿易。三、進出口貨物不得徵收內地通過稅（釐捐）。四、准英使入駐北京，否則亦須准其與中國大臣文移往還。五、英使如願與其住在地的督撫會晤，須立即接見。六、肅清中國沿海海盜。七、訂定華工出洋辦法。八、新訂條約，應依英文本解釋。

中英條約並無修改期限，但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廈條約有「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一款，中法黃埔條約有相同規定。中英虎門條約准許英人「利益均沾」，所以中英條約亦應十二年予以變通。其實英國的要求並不合法，所謂「利益均沾」，應待美、法有了新得權利而為英約所無，英國方可均沾。再者望廈條約明言十二年後可「稍有變通」，英人是要大加修改，無異重訂新約。

克蘭頓希望與美、法共同行動。法國為要擴張在華傳教活動，提高自己的聲勢，此時為土耳其問題正與英國聯合對俄，其支持英國自無問題。中美訂約以來，美國對華貿易增加四倍，一面輸入鴉片，一面積極傳教，但並未滿足所慾。英、法所希望取得的亦是美國所希望的，「利益均沾」已無形中促成西方國家的聯合陣線。馬沙利使華時期，對於中國內亂，主支持清廷，乘機實現全部中國的開放，擴大中西關係。在他預備致大學士的照會中，明言望廈條約議定年久，兩國交易事宜，須重行酌定。他原擬親去北京交涉，未能實現，但與兩江總督怡良會晤時已提起修約。北京堅持已定之約必須遵守。此時（一八五三）英國尚無明白表示，中國局勢不安，美國又忙於日本開放問題，事暫擱置。

馬沙利的修約要求，無論是美國政府或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國務院給他的後任麥蓮的訓令中已有清廷如拒絕修約，可轉與太平天國談判的指示。一八五四年四月，麥蓮、包令到粵。包令曾任廣州英領事四年，一向主張強硬政策，認為除非武力威脅，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會承認英國的修約權。他向麥蓮提議，兩國海軍聯合對廣州示威。麥蓮表

示，在他尙未明瞭中國情形之前，不欲與清廷爲難。再者，英國正牽於克里米亞戰爭，在遠東的海軍無力貫徹這種政策。包令、麥蓮請求葉名琛接見，葉知道他們是爲了修約，借口軍務繁忙，予以拒絕。麥蓮北去上海，轉往南京訪問，對太平軍印象不佳，建議國務院繼續維護北京政府，以換取商務利益。

三、修約交涉

麥蓮南京之行，引起了怡良的不安，既怕他北赴天津，又想知道他對太平軍的態度。一八五四年六月，麥蓮與怡良會晤，說明美國對華友好，希望訂一續約，准許美人赴長江一帶貿易，自由進出內地，租地建立醫院、教堂。如不與談判，或將與太平軍交涉。怡良答以原約所謂「稍有變通」，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畧爲斟酌，必非大有更改。麥蓮出以利誘恐嚇，謂「如蒙奏准，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怡良以所言不足憑信，且恐英、法效尤，一旦進入長江，貽患將來。但又怕他一意孤行，勸令回粵，聽候葉名琛查辦。

麥蓮與怡良晤談後不久，包令續至，照會怡良，要求廣州進城與修約，被拒，改邀麥蓮同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提出修約節畧，准於五口之外，任往他處貿易。吉爾杭阿謂英約「並無十二年後變通章程之文，祇有大皇帝如有恩施別國，英人一體均沾」之語，現在「大皇帝並未准令別國商人前往他處貿易，何得妄有干求？」麥蓮仍照對怡良所說，如欽派全權將規條議定，美國情願隨同清軍剿辦太平軍，開通長江，不然惟有自行前往。吉爾杭阿駁以美約雖有變通之文，而無增添口岸字樣，中國軍務亦非美人所得干預，最後亦是要他和包令速回廣東。麥蓮聲明如葉名琛仍不接見，即去天津。吉爾杭阿因麥蓮的威脅，奏稱美人定欲通商長江，勢難阻止，莫若將機就計，允其所請，否則一朝決裂，美船闖入長江，是又添一鉅患。咸豐要他勿受挾制，另諭葉名琛「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要求。」

八月，麥蓮、包令南返。麥蓮接到國務院訓令，命支持英國的修

約要求。兩人又分別照會葉名琛，派員商談，未得結果。九月，包令、麥蓮與法使布爾布隆（A. de Bourboulon）聯袂北去。路過上海，再晤吉爾杭阿，包令謂以往條約過期失效，葉名琛不允所請，將向北京申訴。麥蓮、布爾布隆謂已奉政府之命，凡事皆與包令商辦，除非修改條約，否則難保和平。吉爾杭阿知三國已合而為一，請派欽差重臣與之商談，北京依然不允。十月，包令、麥蓮及布爾布隆的代表到了大沽，仍說要去京師，如不接待，即轉往南京。清廷雖派人與晤，對於所提條款則斥為荒謬。他們知無法再商，且已屆冬初，不便久留，遂廢然而去。

包令、麥蓮發回國內報告，均主張強硬政策。英國因忙於對俄戰爭，暫不欲再在遠東引起事端，命包令持靜觀態度。美政府亦不以麥蓮的三國海軍封鎖中國海口建議為然。不久麥蓮因病去職，他的未完成願望由他的後任伯駕（P. Parker）繼續推動。伯駕是一位在中國二十年的教士，自顧盛以來，即協助美國專使工作。美政府以明年即屆修約之期，一八五五年九月，正式派他為駐華專使，命與英、法一致行動。伯駕先到倫敦、巴黎，分別遊說。包令的看法與伯駕不盡相同，以為北京駐使，中國必然不允，目前以開放長江為宜。一八五六年五月，美、英、法三使，對葉名琛發出修約照會，不得要領。伯駕主向北京交涉，包令又認為缺乏實力的行動，無裨於事。七月，伯駕單獨北上，路經福州，由閩浙總督接見，允為上奏。大概因為江南大營的潰敗，北京的態度畧趨寬大，準備將舊約酌為變通一二，惟仍須在廣東辦理。伯駕北去上海，怡良怕他前赴天津，派前任上海道吳健彰探視他的動靜。先說太平軍十分猖獗，究應如何方能剿平，以便恢復貿易。伯駕答稱如允將全國開放，獲得英、美、法的援助，必有助於叛亂的平定，否則以後演變，殊難逆觀，三國可能與太平軍交涉。怡良以通商事宜，向係英、法、美會同商辦，英、法二使既未同來，不便獨與伯駕相商。北京亦謂通商以英人為首，美人不能先出講話。伯駕在上海三月有餘，一無所成。適得包令來書，表示願意合作，遂決定南返。等他回到香港，中英之戰已在進行。

四、二次戰爭的導火線

一八五〇年前後，廣東內河艇匪勢張。一八五四年廣州被圍，秩序愈亂。翌年，香港政府准華人船隻註冊，懸掛英旗，受英國保護。這類船隻，時常走私販煙，交通盜匪，「亞羅」划艇為其一。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亞羅」在廣州停泊，水手十二名被捕。英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要求釋放，賠償損失。葉名琛謂其中三名確為盜匪，其餘可以照釋，巴夏禮不受。

巴夏禮在中國十五年，是一位好事的青年。包令久已不滿葉名琛，是年七八月間，一再上書外相克蘭頓，強調要改善中英關係，軍艦是必需的。九月，又分函伯駕和法國代使顧思（Jean de Courcy），謂英國海軍可支持他們的修約要求。「亞羅」事件正好給以機會，他於巴夏禮所提各款外，另要求道歉，尊重英國國旗，保證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限四十八小時答覆。葉名琛謂：「亞羅」船為華人所有，船上並未張英旗，此後中國官兵決不無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華船執照。包令再命巴夏禮抗議，限二十四小時，承認其全部條件，否則武力從事。葉雖將十二名水手全釋，巴夏禮借口手續不合，且未道歉，仍不接受。

表面看來，爭點為中國官兵擅登英船捕人，但是「亞羅」是否英船？在英國國會辯論時，有人指出香港政府允准華船註冊，根本非法，即令合法，「亞羅」註冊的有效期，已經超過了十一天。包令的報告，亦說水手被捕之時，該船已不在英國保護之下。但是英國已決心借題發揮。

十月二十三日，英國海軍提督西馬（Michael Seymour）開始行動，三天之內，連佔虎門口內各砲台。第一天，葉名琛毫不在意，說是英軍日暮自走，不可放砲還擊。第二天，仍聲色不動，惟已從事部署。第三天，令整齊團練，以壯聲勢。二十七日，英艦砲擊督署，葉「危坐二堂，絕無懼色。」二十九日，英軍攻入城內，以兵力不足，無法長期佔領，搶掠督署後退出。包令認為這是解決進城會晤官憲問

題的良機，由西馬向葉名琛提出，葉置之不答，對於廣州紳商與巴夏禮談判，亦堅拒弗納。十一月，英軍攻佔虎門，包令親來交涉。葉覆以進城早作罷論，西馬動兵失禮，彼此已無法相見。

廣州水陸兵勇的抵抗相當猛烈，不時襲擊英艦，社學懸賞購擊英人。十二月，夷館洋行被燬，二百餘年的洋場，盡成灰燼。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遭受騎劫。一八五七年一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香港華人紛紛離去，斷絕對英買賣，禁止出售食物。西馬的艦隊以不斷受壯勇攻擊，被迫退出省河。北京亦命葉名琛設法駕馭，以泯爭端，惟不可遷就。迨英軍撤退，葉奏稱「水陸獲勝，夷情窮蹙，」印度叛亂嚴重，英不能添兵來援。

第二節 英法聯軍與俄國的機會

一、英法的軍事合作與美俄外交追隨

自一八五四年，修約要求失敗，英報屢言，華人難與說理，惟有臨之以威。「亞羅」事件發生之時，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英國政府已無近東問題的牽制。一八五六年十二月，批准了包令對廣州的攻擊。包令即分向國內及印度請兵。國會中不滿政府的人士，激烈反對，斥責包令，謂如以「亞羅」事件為口實，對華使用武力，是英國的恥辱。結果上院通過了政府的決策，下院則加以否決。一八五七年三月，首相巴麥尊解散下院，改選之後，政府派獲勝。包令因不理於眾口，巴麥尊加派前任加拿大總督額爾金（Lord Elgin）為特使東來。

天主教開禁後，法國教士違約潛入內地。一八五六年二月，有一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被廣西西林知縣處死，罪狀是糾結拜會，勾結亂黨。法國代使顧思要求葉名琛懲兇賠償，保障將來，均遭駁斥。拿破崙第三正思向東方揚威，確立法國對天主教的保護權，準備與英國共同要求中國修約，昭雪西林教案，禁止仇外。旋知英軍已進攻廣州，決與英、美一致要求修約，各派軍艦作為後盾。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美俄在遠東的地位，日益重要，國際形勢與十年前大異，列強的均勢已經形成，英國不便獨斷獨行，對華措置一不謹慎，勢必引起他國的嫉妒，致陷危機，頗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致與英國一致。修約交涉期間，麥蓮、包令互相唱和，伯駕更熱心於推動美與英、法合作。英軍攻破廣州時，美領事隨同進城，繼之美艦在省河受到誤擊，美海軍司令立即轟毀砲台。包令以爲美國勢將捲入漩渦，勸說伯駕共同向北京抗議。伯駕深信英國定必利用機會，達到修約目的，美國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一再建議國務院與英、法分佔台灣、舟山、朝鮮。國務院認爲美國領事及海軍司令的行動有違中立政策，亦不同意伯駕的主張。一八五七年三月以後，英國屢請美國與英、法同盟對華作戰，國務院答稱，未得國會同意前，不能派兵進入中國領土，不過美國可以另派代表，與英、法要求修約與賠償。換言之，美國不參加英、法的軍事行動，只允在外交上合作。接替伯駕職務的爲列衛廉(William B. Reed)，改稱全權公使，任務是讓中國明瞭美國贊成英、法的舉動，擴大商業機會，但並無領土及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必要時可斡旋英、法與中國的戰爭。對於俄使，應保持與對英、法相同的友好關係。可見美國決非完全置身事外，僅是不直接參戰而已。

鴉片戰後，俄國再度向東亞推進，與英國分在大陸和海上作侵奪中國的競賽。憑其外交伎倆，與武力威脅，利用中、英間的矛盾，乘中國之危，進行得且較英、法爲省力。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初，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Nikolai Muraviev)，已竊踞黑龍江下游，準備囊括江北地區。及中、英二次戰爭迫在眉睫，木里斐岳幅對美示意，爲對抗英國在中國沿海的擴張，俄國須佔有黑龍江流域。對美予以開放，以增進兩國在北太平洋的商務。英國恐俄國慫恿清廷，與英國爲難，亦希望它參加對華行動。俄國答應作有條件的合作，但不願出以強制手段。一八五七年二月，致文北京理藩院，反覆強調，英、法侵擾廣州，將北犯天津，爲了中俄共同利害，特遣普提雅廷(E. V. Putiatine)前來商辦，「如遲疑不從美意，必致別生事端。」

清廷知俄人狡猾，無非借端恐嚇，欲於黑龍江佔據地方，加以婉拒。普提雅廷轉往天津，仍不得進京。英國初聞普提雅廷將去北京，頗為緊張，及知被拒，自感欣慰。十一月普提雅廷南去香港，與美、英、法三使會商。對美使說，他可以調解修約之事，對英、法使則謂如要與清廷交涉，必須施以壓力，最好是派遣軍艦，前去天津海口示威。額爾金謂所見正同，一俟廣州問題解決，即揮軍北上，歡迎協同行動，抑制清廷驕氣。普提雅廷與額爾金的意見雖然一致，但聖彼得堡不欲使用武力，並非有愛於中國，仍是想坐收漁利。

二、奪據廣州

美俄在外交方面，雖支持英國，軍事和他合作的則限於法國。英政府對額爾金的訓令為昭雪英、法人所受的損害，在廣州等處完全履行條約規定，北京駐使，修改條約。法政府對特使葛羅(Baron Gros)的訓令為補償西林教案，保障教士安全，其餘與英國相同。法國由於軍事準備未就，不克早日行動。英國因一八五七年五月，印度士兵的叛變，東來英軍，中途折回，亂平後始克一意對付中國。十一月，額爾金、葛羅與美使列衛廉、俄使普提雅廷齊集香港。英國初擬將軍事壓力加於華北，至是改變方針，決先佔廣州，打擊粵人與葉名琛，否則清廷必以為廣州民情可恃，英人有所畏懼。十二月十二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葉名琛發出以十日為限的通牒，要求履行條約義務，派員商議定約，賠償「亞羅」事件發生以來的損累，撫卹西林被害的教士，允英、法軍進駐河南。

葉名琛自英軍退出省河後，彼此不通問問，繼傳英軍在印度大敗，益信英人計窮力竭。等到接到英、法照會，仍澹若無事，對英答稱：進城事早作罷議，萬年和約（南京條約）未便更易，上年十月事起，英兵放火三次，中國商民受害更重，英軍駐紮河南，將釀成事端。對法答覆，否認有馬神父其人，依約教士不應進入內地，廣州法人損失應向英人理論。他雖振振有詞，但英、法軍已逕行登陸河南。十二月二十四日，限令廣州駐軍，於四十八小時內退出。葉相信為英人文案幫

辦張彤雲（黃仲奮）的密報，認為斷無變故，既不招募已散鄉勇，又不准紳士與英法商議。

十二月二十八日，英法軍約四千人開始砲擊省城，守軍竭力抵禦，英、法軍傷亡一百二十餘人。第二天，廣州失陷，劫掠自屬當然，藩庫現金二十二萬兩，全被搶去。巡撫柏貴派紳士（舊行商）乞和。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葉名琛被俘。¹

為數無幾的英、法軍，不可能統治一個人口在百萬左右的中國城市，特別是對付富有反抗精神、與英人結怨已久的廣東人。英、法軍的擄掠姦淫，恣睢暴戾，更增加他們的敵愾。英、法採以中國制中國的辦法，擁巡撫柏貴為傀儡，所有兵勇武器一律收繳，由英、法兵與中國巡捕稽查地面，省河砲船統歸英、法人統帶，巴夏禮是廣州的真正統治者。

北京於廣州失陷後約一月，方知消息。咸豐大感詫異，將葉名琛革職，以黃宗漢繼任，一面命柏貴開導英、法，退出廣州，一面命紳士激勵團練，²作武力驅逐的準備。一八五八年四月，盛傳團練大舉攻城，城內外商民遷移一空，英、法人時常失蹤遇害，不敢出城門一步。香港、澳門二萬餘華人，紛紛辭工回鄉。六月英、法軍在廣州郊外遇伏大敗。七月，鄉勇分路襲擊。自後英、法軍固守城內，非數十人結隊不敢外出。

三、進攻大沽

一八五八年三月，四國公使同往上海，分別照會北京大學士，表

¹葉名琛信扶乩，軍機進止取決於呂洞賓、李太白二仙。英法軍進攻之前，他說過了十二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五日），便可了結。城破後，他仍說過了一八五八年一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可無事。紳士請求講和，他又說他事可允，獨進城一節，斷不可許。英軍將他押離廣州時，他尚帶了一本《呂祖經》，第二年四月，這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自號「海上蘇武」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死於印度加爾各答。

²團練的領導人為南海知縣華廷傑，即《觸藩始末》的著者琴閣樓主、番禺知縣李福泰、編修許其光、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德、給事中蘇廷魁。

示一致。額爾金、葛羅要求三月底以前派全權大臣來上海會議，否則即作進一步措置。列衛廉的照會措詞亦頗強硬，¹先聲明對英、法與中國的衝突，保持中立，次述對近年中、美關係的不滿，及美與英、法的友好，同意三國的要求，並將自提條件。普提雅廷除要求使臣入京，增開口岸外，特別提出邊疆問題，如不准各國所請，對中國將更不利。北京命兩江總督何桂清覆以「上海非辦理夷務之地，中國自有辦理夷務之人，」要英、法、美三使返回廣東，俄事照舊辦理。

額爾金、葛羅決按原定方針，進兵華北，普提雅廷贊同，列衛廉亦謂非武力難望收效。爲了不令中國懷疑他們的決心，並早日阻斷海運糧船，額爾金不待香港海軍到達，即命所有可自上海派出的軍艦，隨同北上。四月中旬，四使相繼抵大沽。二十四日，再照會北京，限六日內派全權大臣談判。

四使到大沽口之前，北京已派四年前曾與英、美辦過交涉的倉場侍郎崇綸前往，先解散俄、美，再羈縻英、法。所採的爲分化政策，尤望俄國調停，正中普提雅廷的下懷。他對列衛廉說，俄、美不與中國決裂，既可幫助英、法，滿足慾望，又可博取中國的好感，俄、美的利益即可達成。他首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提出黑龍江分界等事。譚知俄人並不可靠，未和普提雅廷深談，轉而接見列衛廉。列衛廉表示願作調人，跟着就問「能否定議兩國之事。」經過兩次會議，列衛廉頗感失望，英、法使又不以他爲然，改由副使衛三畏與直隸藩司續商；談判正在進行，得知英法軍準備進攻，立即中止，以便坐觀其變。

譚廷襄謀與英、法二使相見，額爾金、葛羅借口所來照會款式不合，加以拒絕。四月三十日，以六天爲限的照會屆滿，英國海軍以準備未妥，不願即時攻擊。額爾金、葛羅照會譚廷襄，限於六天之內，取得便宜行事全權。譚答以中國從來無此辦法。普提雅廷復出調停，譚明知俄、美是想因人成事，自圖便宜，但權衡利害輕重，主酌量讓

¹列衛廉與額爾金初時有欠協調，及看到英軍在廣州總督衙門搜得的美總統批准望廈條約的原件，認爲是清廷對美總統的蔑視，美國有理由開戰。

步，北京不許。

額爾金、葛羅抵大沽口外已經五週，一無所成。五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向譚廷襄發出通牒，限兩小時內繳出大沽口砲台。未待答覆，即開砲攻擊。英法軍艦二十六隻，官兵二千六百餘人，中國守軍約九千人，砲三十尊。戰鬥甫一開始，譚廷襄坐轎先奔，天津總兵聞砲亦走，守軍力抗二小時，戰歿二百人，砲台失陷。英法兵傷亡不滿三十人。

四、天津要盟

大沽不守，京師門戶洞開，清廷的震驚遠超過廣州失陷之時。於是再請美國說合，以救燃眉之急，希望能保有天津，徐圖議和。五月二十八日，知英法兵船已至天津，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大沽戰前額爾金、葛羅之拒與譚廷襄談判，是因為他無便宜行事的全權。桂良、花沙納雖是頭品大臣，而不是「頭品可以主持之全權大臣」，所以聲音仍要進京。咸豐祇好准許他們便宜行事，並起用久置閒散的耆英，協同辦理。復慮英、法不遂所欲，繼續進軍，另授名將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京城實行戒嚴。

交涉的主要對象為英人。六月四日，桂良、花沙納約額爾金相見。額爾金又借口他們未奉全權敕書關防，不到十五分鐘即離座而去。桂、花惶駭之餘，一面託俄、美兩使疏通，一面向額爾金的翻譯李泰國（H. N. Lay）請教。李為江海關的英籍稅務司，額爾金正要他擔任實際談判。此後直至條約簽字，額爾金未再與桂良、花沙納晤面，一切由李身當。六月六日，李來相見，聲稱必須允使臣進京駐紮，方能在津議事，否則開仗。爭執最烈的為長江通商，內地遊歷問題。英方定要開放全部中國，清廷則恐英人深入腹地，與亂黨勾結。李謂如不允所求，即為所欲為。桂良「婉言開導，至再至三，」李負氣而去。桂良懇俄、美兩使向額爾金疏通，六月十一日，李偕另一翻譯威妥瑪（Thomas Wade）同來，氣勢洶洶，謂本日如再不允，「即帶兵直入京師。」當晚桂良照會額爾金，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兩事，俟軍務

完竣後酌辦，兵費交廣州處理，使臣進京緩期再議；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訂稅則各款，亦大概承認。事後與耆英相對而泣。¹

四使在天津的談判，以普提雅廷為最不費氣力，輕易地達成願望。六月六日，桂良向他乞援，他表示如速將俄約商定，即可向英法說合，桂良在李泰國凌迫之下，不得不勉強相就，縱不能收得積極之效，至少消極方面或不致鼓惑英、法。再者，普提雅廷所請各款，有為先已有之者，如往來照會及使臣進京，有為有成例可援者，如海口通商，兵船停泊，領事裁判權，此外為一年內換約。查勘未定邊界一條，雖關係重大，桂良似不甚重視。²六月十三日，中俄條約簽字，順利出於普提雅廷的意料。約中又訂明「日後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所以普提雅廷於其他事項，未再多爭。

列衛廉之善於利用時機與他的地位，不讓於普提雅廷。六月七日桂良初會見列衛廉，列不僅語言傲慢，所開款目，亦較前加多。桂良急於先了中、美之事，未多加辯論。六月十四日，正式談判，十八日條約簽字，除無邊界一款外，不惟俄約中的主要條款概行包括在內，且更為周詳。關於使臣進京訂明遇有要事，每年到京暫住一次，如將來他國使臣到京居住，美國一律照辦。領事裁判權一事，列衛廉自稱有欠公允，此次所定反益為詳密。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為美國主要的希望，約內未有明文，但利益「一體均沾」一款，已應有盡有。較為特殊的為「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相助，以示友

¹北京以耆英與英人有舊，原望他在此次交涉中能起作用，不料反遭李泰國、威妥瑪當面斥責，說是以往為他所愚。桂良、花沙納怕他有礙和局，請他回京。咸豐罪以從前辦理夷務不善，以致釀成今日鉅禍，迫令自盡。按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耆英曾有駕馭夷人情形奏片，廣州失陷後，原件為英人所得。威妥瑪謂其中對英人多辱罵賤薄之語。俄理範（L. Oliphant）的《額爾金出使中國日本記》，附有譯文，謂此奏片係一八五〇年底所上，馬士（H. B. Morse）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加以肯定，謂事在耆英降調以前，均誤。

²半月前，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已訂立璦琿條約（見140頁），不過桂良尚未獲知。

誼關切。」中國一向對於美國的觀感良好，借此以示聯絡，可將美國與歐洲國家分開。

截至六月十三日，中英間懸而未決之案，爲使臣駐京。十八日李泰國、威妥瑪偕副使（秘書）卜魯斯（**Frederick W. A. Bruce**）同來威脅，謂必須辦到，俟使臣自京回後，始退兵船。桂良等計無所出，允其先派人到京看定寓所，換約後，再派使前往，以三十人爲限。北京依然不准，最後的讓步是交還廣州後，再行詳議。二十二日，額爾金發出堅決照會，責桂良遷延，若再無定說，惟有揮軍北進。二十四日，李泰國等將自定約稿，面交桂良，聲言「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得更易」，桂良答以「三、二日內自當定議。」這時他方完全明白俄、美與英、法一氣，俄、美約雖定，並無所裨。二十六日（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卜魯斯、李泰國催即日畫押，不得再有絲毫游移，否則即爲失信，「非至北京不簽條約。」桂良只得說，「本日定議，並無不依。」當日率同隨員及地方官十餘人赴海光寺，候晤額爾金。額爾金用轎三十乘，帶兵五、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數十名，「鼓樂同來，竟將寺內佔滿。」在英軍環伺及刀光劍影之下，中英條約簽字。桂良置酒菓款待，額爾金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大皇帝萬壽無疆。」坐復領第二尊曰：「願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桂良等回寓，「抱恨萬狀，終夜不安。」

英約訂立的次日，中法條約簽字，但商定則在英國之前。六月六日，葛羅初次與桂良等相見，十五日正式談判，二十三日結束。關於使臣進京及領事裁判權的規定與美約相同。長江通商定爲南京一處，沿海新增口岸，除已見之於俄、美約的台灣、瓊州、潮州外，尚有登州、淡水。內地通商，葛羅知道額爾金定必堅持，可不須再爭。稅則七年一修，教士得入內地傳教，「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另有補遺，包括懲處西林知縣，賠償法人損失及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

英約爲四國條約的代表作，通常所謂天津條約，即指英約而言，是不平等條約的進一步完成。一如南京條約，英人說一不二，「俱由

自行譯定，不能增改一字。」全文五十六條，其要點，一為關於國交者：中英互派秉權欽差大員，分別常駐兩國京師，大英欽差以泰西禮節覲見大清皇帝，並依泰西之例，優待其本人及隨員。大清皇上特簡大學士尙書一員，與大英欽差文移會晤。大英亦允依上所開，優待大清欽差。二為關於中國開放者：英人得往內地遊歷、通商。長江一帶，自漢口以下，選擇三口，沿海加開奉天牛莊、山東登州、福建台灣、廣東潮州、瓊州五口。三為關於領事裁判權者：凡與英人相涉案件，皆歸英官查辦。四為關於稅則者：另在上海會議，以後稅則並通商各款，十年重修一次，子口稅按貨價每百兩征二兩五錢，經過內地不得另征。五為保護傳教。六為英人繼續享有最惠國待遇。七為文書條約以英文作準，此後對英官民不得提書「夷」字。八為設法消除海盜。九為一年為期，在北京換約。十為賠償損失二百萬兩，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此款為專條）。

條約訂後，額爾金恐清廷反汗，堅持援照南京條約先例，必須奉到「依議」或「俱照所議辦理」字樣的硃批，始離開天津，否則和議不能認為成立。七月三日，咸豐照行。六日，額爾金東去，美、俄、法使亦於是日前後離津，十七日英、法軍艦自大沽口起碇。

五、上海改約交涉與鴉片開禁

中、英談判期間，清廷認為英方的要求，貽害最大的為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桂良允許通商、遊歷，以免決裂，清廷亦暫時默認，惟駐京一事，則堅執不允，怕的是他們盡窺京都虛實，牽制政令，包庇奸民，甚或發生肘腋之變。如果不能作罷，亦須緩議，「既非全行拒絕，亦非概允所請。」但是桂良終於答應，理由是「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二欲求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觀其仍肯交出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佔踞地方之心。……今議一年始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且彼携眷，是仿古人為質者。防範倘嚴，拘束甚易。……夷人最怕化錢，任其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再者「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

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却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咸豐以使臣進京尚在一年之後，仍有挽回餘地，不妨敷衍一時。

按照條約，有關稅則事宜，須在上海議奪，仍派桂良、花沙納等前往，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辦理。咸豐的真正用意，在修改津約，雖不一定作為廢紙，至少要設法補救。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賠繳兵費後始交還廣州，均須變更，而於前兩事尤為重視。曾一面諭桂良，並密示何桂清，如各國允諾放棄，可許以全免課稅，開弛煙禁。真是可怕的代價。桂良等不以為然，謂會議稅則，未可頓改前約，以致借口失信，另起波瀾。不徵出入口貨稅，利柄將盡歸英人，我必民窮財盡。咸豐定要他設法消弭。

廣東團練與英、法軍的衝突仍然不已，七、八月間，英、法軍屢次屠殺鄉民，官府繼續激勵團練。額爾金要求將兩廣總督黃宗漢革職，削去粵紳特奉的權力，否則上海會議作罷。桂良允通知黃宗漢停兵，不久即予撤任。十月十二日，稅則會議開幕，中國方面實際的談判者為江蘇布政使王有齡、按察使薛煥、候補知縣吳煦，英國為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L. Oliphant）。王有齡隱約提及變更駐京等事，威妥瑪表示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並要先往漢口、鎮江、開立馬頭。桂良照會額爾金，單論使臣駐京一事，謂前在天津時之所以應允，是迫於無奈，將來各國事務可移至上海辦理。額爾金覆以如果明年在北京換約時使臣受到禮遇，天津條約圓滿履行，可另擇一地駐紮，遇事隨時往來。他之所以有此讓步，是顧慮到北京冬季氣候奇寒，白河海口封凍，交通困難，駐使無異坐困。

另一事為入江英船販賣食鹽，這是英商的希望。長江自兩湖以下各省，屬於兩淮食鹽的銷售區，每年正課雜項及商民所得，約數千萬兩，恃以養命的人民實是無數，如果為英人攘奪，勢必商賈凋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雙方爭執十餘日，英方始允將食鹽列入違禁貨物款內。

鴉片走私，遍及於沿海各省，一八五七年，上海一處進口即達三

萬一千箱。英政府希望使其合法化，但天津條約並未提及。美國本不以鴉片貿易爲然，望廈條約曾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則說美人如攜帶違禁貨進口，中國可自行辦理治罪。無異聽任美人走私。偷運鴉片進口的百分之九十爲英、美人，額爾金根本不提禁煙，列衛廉也留有餘地。上海會議之前，列衛廉向額爾金建議協助中國禁煙，否則徵稅，額爾金贊同後一方案。中國既有弛禁之議，雙方一拍即合。十一月六日，中英協議，進口鴉片改稱「洋藥」，每百斤稅銀三十兩，稅率約爲百分之七強。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三），中英、中美通商稅則善後條約分別簽字，進口稅仍爲值百抽五，茶絲亦均照舊。簽字後的當天，額爾金溯江西上，準備及早開通長江口岸。翌年一月，返滬，旋去廣東，處理對付團練之事，請桂良留滬相候，結果逕行由香港返國。

六、俄國的再度東侵

尼布楚條約訂立後，俄國始終未忘懷遠東。拿破崙戰爭結束，俄國在國際上的聲勢昇高，野心益張，積極向外擴展，尤其是對於中國。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即位之初，曾派熟悉中國情形的教士來北京偵察活動，並命人赴黑龍江下游探測。鴉片戰後，進行益力。一八四七年，任命少壯軍人木里斐岳幅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發動第二期對中國的侵畧。有人說木里斐岳幅具有兩種不能相容的性格，既是一位民主自由主義者，亦是一位兇悍獨裁者。這正如俄國的對華行爲，口口聲聲自稱爲中國的良友，處處事事是強取豪奪。

木里斐岳幅的計劃是聯絡美國，防止英國，必要時將滿、蒙、華北置於俄國保護之下。他曾親赴堪察加視察，擬先建立一海軍基地。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一年三次派艦長尼弗爾斯基（G. Z. Nevelsky）探勘庫頁島及黑龍江（混同江）口。木氏連向俄皇報告，謂英國將佔領庫頁島、黑龍江下游，俄國須先着鞭，不使英國勢力北進。一八五〇年強佔黑龍江口的廟街，改名尼古拉城（Nicholaevsky），續於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築城駐兵。一八五三年六月，正式要求中國劃界，並准俄船來上游貿易。清廷拒絕海口通商，但許查勘東北界務，所指是烏

第河近海一帶未定界。

是年冬，俄與英、法為土耳其問題，劍拔弩張，木里斐岳幅請增兵遠東，佔領黑龍江口及鄰近地區，實行移民，逕自航行黑龍江，勿使英法所有。一八五四年五月，克里米亞之戰已經爆發，木里斐岳幅一面知照北京理藩院，一面率領船隊七十餘隻，自尼布楚進入黑龍江。他了解中國的反英心理，在理藩院的咨文說，他雖由黑龍江行走，並不擾害中國，將來中國有為難之事，俄國亦可幫助。六月，船過瓊瑋，中國委員詰阻，他說：「因東面各島，被英吉利侵佔，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瓊瑋副都統恐起爭端，惟有「好言道達，」北京亦謂「不值與之為難，」且允其將來仍由黑龍江駛之歸國。木里斐岳幅順流東去，直抵黑龍江口，後曾擊敗前來的英、法軍艦。清廷雖許俄船原道回航，但此後則不得通過。一八五五年五月，木里斐岳幅復藉口英人將再擾東海地方，須續遣重兵，乘船東去。又說英人「併欲與中國尋釁，且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甚至欲間兩國之好。」清廷知俄人「從無實話」，但又無法制止。是年夏秋之交，俄船一百餘隻，男女兵民二千餘人，蜂擁順江而東。

關於勘界之事，木里斐岳幅面告中國委員，黑龍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屬俄國。中國委員根據尼布楚條約駁辯，自是理直，但東北防務本甚空虛，八旗軍近年大半內調，無力抗拒。清廷的初次讓步，為將黑龍江下游的濶吞屯（Mariinsky）等處借與俄國暫住。木氏對黑龍江的侵佔係自下游入手，至是加緊向中游推進。一八五六年，於精奇里河、雅克薩駐軍移民，船艦絡繹不絕。新任黑龍江將軍奕山許其暫借。¹同年三月，克里米亞之戰終止，俄國全力東注。不久江南大營為太平軍所破，「亞羅」事件繼之爆發，木氏自言，「英人攻毀廣州，我並不以為遺憾，」「如果中國王朝傾覆，自有助於俄，滿蒙將成我們的領土。」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東來作外交活動，木氏則於黑龍江的對岸黑

¹一八四一年奕山曾與英人訂廣州和約（見 68 頁），一八五一年又與俄人訂伊犁商約。

河、海蘭泡等處，駐兵泊船，架設大砲。普提雅廷進京被拒，木氏主聯好英、法，謂英人的經營華南，與俄人的經營黑龍江流域，意義相同，均為擴展「世界文明」。派駐黑龍江的美國商務代表，亦認為俄人取得黑龍江一帶，對人類文明、基督教義的傳播、商業發展，均為莫大貢獻。

一八五八年五月，木里斐岳幅至海蘭泡，二十二日，率同丕業羅幅斯奇（P. Petrovsky），開始與前來瓊瑋恭候的奕山會談，謂俄國之航行黑龍江及蓋房屯兵，是幫助中國防範英人，要求將江北地區歸俄領有，烏蘇里江以東，半屬中國，半屬俄國。奕山答以中俄係以外興安嶺至海為界，木氏偽稱不知。翌日，木氏再來，一味狡詐，將自備的稿留下，遽行回船，反責中國違反尼布楚及恰克圖條約。二十六日，談判續開，木氏仍堅持以河為界。奕山謂烏蘇里河等處，係吉林地面，須查明再定。木氏表示此一地區可暫不割讓，黑龍江以北必須歸俄，奕山不許，「木酋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大聲喧嚷，將夷文（約稿）收起，不辭而去。」是夜江中槍炮聲音不絕，奕山喪膽，派員懇商，木氏限明日照約畫押。五月二十八日（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有史以來失地最廣的「瓊瑋條約」簽字。序文中有「欲期兩國相好，各屬之人，彼此有益，及防範外國，共同商定」字句，頗似一友好互助協定，實際內容則為黑龍江、松花江（混同江）左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國所屬，右岸順江至烏蘇里江為中國所屬，自烏蘇里江至海，所有地方為中俄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各江，中俄共同航行，黑龍江左岸的滿洲人等照常居住。烏蘇里江、松花江兩國居民，互相貿易。一百七十年來的尼布楚條約至是全被撕破，十六天後，普提雅廷又得了一份「天津條約」。

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一、戰火重燃

上海會議之後，咸豐再三諭知桂良等，使臣駐京等四事，如能轉

圍，其餘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辦理，不准夷船再來天津。桂良等以爲欲罷議四事，非口舌能爭，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勝之權，而以時勢來看，應待時而動。咸豐則有意先發制人。及知額爾金已實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聽前往，不准使臣駐京，如至天津，駐軍即先開砲。認定英船入江是勾結叛逆，使臣駐京是心懷叵測。一八五九年一月，又命桂良等，將四事另立專條，津約在滬互換，以何桂清代兩廣總督黃宗漢爲欽差大臣，雖係由額爾金不滿黃在粵出示招勇，亦是準備在上海換約。額爾金回國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進京換約，「如以禮相待，按約進行，」即在他處擇地居住，以後有事進京。咸豐勉強同意，人數限定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不得坐轎擺隊，換約後即行離去，與額爾金所說，基本原則無大出入，不同的是「不得坐轎擺隊」與「依禮相待」的解釋，雙方似可獲致協議。其終於不免決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誠意，新任英使卜魯斯的傲慢輕率，實爲主因。

卜魯斯於去年携天津條約回國。一八五九年二月，英政府給他的指示是必須進京，停留久暫不拘。三月的訓令，則堅持在北京設立使館，隨帶充分軍隊，有權通過白河。卜魯斯路過錫蘭與額爾金相遇，得知英國砲艦已向上海集結，作爲新公使的護衛。四月下旬，行抵香港，續知大沽已經設防，認爲必須武力對付。法國公使仍爲布爾布隆，美國改爲華若翰（John Ward），於五月經香港來上海。六月初，卜魯斯、布爾布隆續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隻。卜魯斯到後第二天，接桂良照會，勸勿逕赴天津，請允行商議。中國並非不允在京換約，惟須讓他回京有準備的時間。卜魯斯拒與相晤，責桂良推辭耽延，條約各款毫不可減，如中國自贖和約，惟中國是問。法國亦決用槍砲迫中國將條約全部實施。桂良遂趕返北京，以便應付。

自一八五八年八月起，大沽一帶的營壘砲台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於十一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艦再行闖入。沿牆修蓋土窖，密佈砲門砲眼，堤外開挖濠溝，豎置木柵。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設砲位，增加兵額。一八五九年三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將北來，命僧嚴

防海口，「勿令片帆駛入，謀定後戰，」如英船膽敢開砲，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係應戰而非求戰。同一天，又諭桂良，在規定條件之下，允入京換約。及聞英、法船與使臣已自上海北來，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諭僧格林沁與直隸總督恆福，知照英、法兵船勿逕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護送進京，當依禮相待，天津、北京均已為預備官舍。凡此足可證明清廷絕非要戰，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點，僅是要他們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通過大沽。參與決策的大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尚書肅順、軍機大臣彭蘊章等。

六月十七日，英海軍提督何伯（James Hope）率艦抵大沽口外，發現海口為木筏所阻，要求於三日內開放，俾公使通過，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艦直迫砲台，破壞工事。二十日，恆福派員通知，請暫候數日，以待前來商議。何伯聲稱本日必進河內，欄河木筏鐵戩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達，卜魯斯命何伯武力掃清海口障礙物。二十二日，北京再諭恆福開導英、法，將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恆福照會卜魯斯，請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內，英人不斷窺伺大沽砲台，「營牆不露一人，各砲門俱有砲帘遮擋，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聲。」因而不知虛實。僧格林沁並不欲決裂，催桂良兼程北來，並將北塘駐軍後撤，以示讓英、法使由該處進口誠意。

卜魯斯定要通過大沽，不走北塘。六月二十四日，何伯發出最後通牒。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英艦十三艘，官兵一千二百人，開始進攻砲台，陸戰隊蜂擁上岸。下午二時，守軍槍砲連環齊發，戰至夜晚，英艦五隻沉沒，六隻重傷，二隻被俘，死傷五百餘人，何伯腿部受傷。是役僧格林沁親自督戰，直隸提督史榮椿以下三十二人戰歿。經此慘敗，卜魯斯、布爾布隆及殘餘艦隊只得南去上海。

決裂的直接原因，是英艦強行通過白河，前往天津。白河是中國的內河，天津並非條約口岸，英艦絕無此權。卜魯斯、何伯蔑視中國的一切，復以為奪取大沽為輕而易舉之事，不料竟受到挫敗，中國設防並非存心挑釁，事先再三勸說，不可擅自闖入，卜魯斯不理。一位外

交使者，率同大批砲艦，侵入他國內河，已是難以令人容忍之事，何況又首先開砲。

清廷有過去年大沽之役的教訓，復為內亂所困，自無意再挑起兵端，只是不滿意天津條約而已。前方主帥僧格林沁於英艦開始行動之後，雖痛恨其驕悖，初仍隱忍，直待英軍撲攻砲台，始行還擊。捷報至京，咸豐一面命恒福與英使接觸，如有轉機，仍允在京換約，並命移駐北塘，會晤美、法二使，試探他們能否斡旋；一面命何桂清在上海設法弭兵息爭。僧格林沁主張將決裂經過宣告中外，以示中國期望和好，特遣編修郭嵩燾入京面陳。郭一向認為洋務非戰能了，應循理而行，此次所陳，諒必相同，不過循理應為雙方的事。

華若翰於大沽決裂前達到，願遵照指示換約。中英砲戰之時，美艦曾搶救何伯脫險，且有一美人被俘，頗起中國猜疑。但恒福仍於七月八日與他會於北塘，予以相當隆重的接待，說明大沽事件曲直，願與英、法恢復舊好，華若翰允為代達。二十七日，華若翰抵京，以不肯跪拜，未曾覲見，國書由桂良接收，條約改在北塘互換，時為八月十六日。英人對華若翰此行，深不謂然，說他在京受了侮辱虐待，並非實事。如果卜魯斯亦照華若翰所行，當不致有大沽的事件。

二、英法大舉進兵

華若翰的調處，何桂清在上海的勸告，俱未生效。大沽決裂的消息一到倫敦，立即掀起政治上的風波，卜魯斯的報告，任情歪曲，認定事件是出於預謀，必須武力對付，力言白河為去京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須通過大沽。國會議員，甚至若干閣員抨擊卜魯斯的鹵莽，當然也有人為他辯護，首相巴麥尊更是堅決地要派遣大隊海陸軍東來，以維持英國的威望。十月，外相羅素（John Russell）訓令卜魯斯繼續對華用兵，戰區限於華北，海軍自英國本土派出，先奪取大沽、天津，再看是否進軍北京。

清廷仍望妥協，責成何桂清繼續向英、法使勸說。一八六〇年三月八日，卜魯斯發出照會，要求於三十日內，承認四事：一為對大沽事

件道歉；二爲公使由白河進京駐紮；三爲全部履行天津條約；四爲增賠兵費，送還英國砲械船隻。北京以大沽之役，係英國尋釁，將來如不帶兵船，可在北塘換約。卜魯斯與布爾布隆決定先封鎖渤海灣，佔領舟山，清廷雖亦聲言作戰，條約作罷，同時又要何桂清竭力挽回，除夷船入江、北京駐使外，餘均可准，惟須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五月初，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北京再命何桂清，斷不可與英、法決裂。六月初，何親訪卜魯斯，目的是想說動英、法助保江南，如此方可望清廷接受英、法的要求。

英政府因輿論對卜魯斯不利，一八六〇年二月，復以額爾金爲特使。法國亦重派葛羅東來。四月，羅素給額爾金的訓令，畧與三月八日卜魯斯的要求相同，有權決定何時談判，何時決裂。六月，額爾金、葛羅至上海，七月，分抵英、法軍在華北的集中地大連與煙台。鑒於去年的慘敗，英、法軍決自北塘登陸，以拊大沽之背。北京再三令恒福勸英、法照美使之例，自北塘進京換約，但恒福已無能爲力。

七月二十七日，英、法軍一萬七千七百餘人，運輸船一百四十三艘，軍艦四十艘，分抵北塘海外。駐軍早經後撤，僧格林沁的精銳部隊是蒙古馬隊，準備俟敵人登陸後，以勁騎衝擊。八月一日，英、法軍在毫無抵抗之下上岸，北塘全鎮遭受洗劫。十二日，聯軍續進，僧部四千騎兵密集衝鋒，人馬相依，佔地多而且高，遂爲衆矢之的，「如牆之隕，紛紛由馬上顛隕，」幾乎全軍覆沒。越二日，聯軍猛撲塘沽，槍砲連環，僧部再敗。恒福兩次照會，謂已派欽差大臣在北京等候面議。十五日，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恒祺奉命前來，準備伴送英、法使入京。恒福再請停戰，額爾金、葛羅要求先交出大沽砲台，拒不與文俊、恒祺相見。

塘沽失陷後，僧格林沁已說大沽砲台能否扼守，實無把握。恒福主張撤防，以示寬大，並曲從英、法所請。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軍攻陷大沽北岸砲台，傷亡約四百人，直隸提督樂善以下死傷約二千人。他們的英勇壯烈精神，頗得敵人讚佩。北岸砲台既失，僧格林沁在南岸豎起「免戰」白旗，當夜退走，英、法軍艦遂入白河，二十三日，

佔領天津。

三、北京陷落

恒福乞和不成，八月二十四日，咸豐再命桂良赴津，與恒福均授為欽差大臣，請英、法使在天津靜候面議。此時額爾金、葛羅的條件為天津通商，增加賠款，先定善後專約，所有前後所開各款一概允准，再入京換約，拒晤桂良、恒福。巴夏禮、威妥瑪和法國翻譯美里登（de Meritens）大肆威迫，謂再有異言，即揮軍前進。九月四日，桂良、恒福允付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兩，現給一百萬兩，巴夏禮可先進京察看，善後專約定七日畫押。但北京堅執不許。

九月八日英軍統領格蘭忒（Hope Grant）知照桂良，明日進軍通州。是日桂良的緊急奏報連續到京，說是如不付現銀，英法軍即佔據衙署，奪取庫藏；不准通商，即硬立碼頭；不准巴夏禮先期進京，即逕自前往；英、法二使亦帶兵千人，先至通州，候派當國第一大員定約，途中遇有防兵，定即開仗。上諭飭桂良繼續駁辯，另授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前去通州交涉。次日宣稱將御駕親征，同時發下僧格林沁懇求「巡幸木蘭」密摺，實際上是要逃往熱河。因王大臣力阻，暫行從緩。

九月十四日，載垣、穆蔭與巴夏禮、威妥瑪在通州商定，俟額爾金到後，即將在天津所議的善後專約畫押，然後帶兵千人，進京換約。咸豐以英人必欲以兵要盟，至為痛憤，命將巴夏禮扣留。十七日，巴夏禮又至，要求使臣須親向皇帝遞國書，皇帝璽書須交使臣帶回。載垣等以事關國體，萬不能許。第二天，巴夏禮進而要求撤退通州附近張家灣的中國駐軍，言畢，驟馬而去，一行三十九人悉為僧格林沁截獲。¹英法軍立即進攻，大敗僧軍於張家灣。二十一日，續攻八里橋，新到援軍統帥勝保，「紅頂黃掛，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全軍大潰。

¹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三人。

巴夏禮被扣之日，咸豐宣布對英法聲罪致討。三天後，八里橋戰敗，已成兵臨城下之勢，改派他的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督辦和局。九月二十二日，北走熱河。協助恭親王的有他的岳父桂良，和軍機大臣文祥，希望英、法退兵。額爾金、葛羅要求先釋放巴夏禮等，並應允所有條款，否則繼續進攻。恭親王答以如英、法軍後撤，即將續增條約畫押，被獲人員送還，「若用兵威迫，不獨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禮等亦必難保。」額爾金、葛羅聲言，在巴夏禮等未釋回前，停止交涉。十月五日，聯軍薄北京近郊，僧格林沁不戰自潰。八日，巴夏禮等獲釋。十三日，聯軍進入北京，西方軍隊初次佔領中國的首都。

圓明園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經營的一座御苑，周圍三十餘里，內有中國式與西洋式的園庭、殿閣、樓台、館榭，有歷代的古玩、珍寶、文物，不僅為皇室的精華所在，亦為中國的文化藝術寶藏。十月六日起，英、法官弁兵丁，大肆搶掠，附近的清漪園（萬壽山）、靜明園（玉泉山），同罹浩劫。搶得的部分贓物，公開拍賣，大部分歸於私有，維多利亞女王與拿破崙第三亦各有一份。額爾金以被俘的三十九人中死了二十人，下令焚燒圓明園，作為對清朝皇帝的直接懲罰。英、法軍再度搶掠，肩荷手提，囊囊累累，無法搬動的，盡行打碎，如古瓷器古銅器。¹十月十八日，開始縱火，煙雲迷漫，連燒三日三夜，剩下的是一片火燼，敗瓦頽垣。執行命令的英軍官，目覩如此宏巍瑰麗的建築付之一炬，亦為之心碎。拘捕及凌虐巴夏禮固然不當，以文明國家自居的西方國家，出此野蠻破壞行為，更不可宥。

開戰以來，英、法之間時有磨擦，法軍不及英軍之衆，補給不及英軍之便，行動遲緩，英軍頤指氣使，法軍心懷不平，額爾金與葛羅亦不十分協調。英國對於這次戰爭，早感厭倦，陸軍大臣曾說，英軍不宜在北京過冬。佔領北京的當日，格蘭忒及法軍統領孟達班（de Montaubon）通知額爾金、葛羅，希望於十二天內撤兵。孟達班復向

¹有一個英國軍官搶到一座金塔，價值二萬二千鎊，一個法國軍官搶得的珍寶價值八十萬佛郎。每一士兵所得，亦值數萬以至百萬佛郎。有人估計被燬的總值超過三百萬鎊，但實際恐不止此數。

恭親王的左右指責華人狂悖，盼早日換約。巴麥尊恐清廷投靠俄國，普提雅廷與恭親王、葛羅的接觸，更使英人不安。圓明園大火之後，恭親王答應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員弁恤金五十萬兩。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中英及中法續增條約，即「北京條約」，分別簽字。並互換天津條約，額爾金表情冷酷，葛羅較為溫和。

兩個條約內容大致相同：中國對大沽事件謝罪；履行天津條約；賠款各八百萬兩；¹天津條約批准後，英、法自北京撤兵，交還定海；賠款付清後，交還大沽、廣州。法約中有給還各天主教產的規定，中文本內多出法國傳教士得在各省租地建造字樣，係翻譯的教士私行添入。英約有將九龍司地方併歸英屬香港內一款。²

四、列強的共同收穫

天津條約的訂立，一時西方人士大為興奮。有的說這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開始；有的說，這是國際經濟事業在中國發展的良機。北京條約為天津條約增續，意義自然相同。中國全部開放了，新開與已開口岸有沿海的牛莊（營口）、天津、登州（煙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台灣（台南）、淡水（基隆）、潮州（汕頭）、廣州、瓊州，長江流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共十六處。新開的如天津、漢口、九江、鎮江均設有租界，舊有的上海租界亦大加擴展。又有內地遊歷、通商之權，外人活動的區域，不受限制，洋貨深入窮鄉僻壤。教士到處租購房屋，設立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便信教，地方官須厚待保護。教士往往行爲越軌，教民依勢欺人，齟齬時生，教案遂成嚴重問題。領事裁判權愈為廣泛，外人盡為特權階級。公使駐京雖為理所當然，而對地主國政府的壓力，更為直接。

¹天津條約賠款在內，恤金在外。

²一八四七年，英人即欲佔領九龍，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日，兩廣總督勞崇光同意租給，至是改為割讓。

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以來，因物價波動，實徵不及百分之五。¹但洋貨進入內地後，所經關卡尚須納釐捐（通過稅）。今則改爲加繳相當於關稅半數的子口稅，即可遍運中國，遠較釐捐爲低。噸稅（船鈔）原定每噸徵銀五錢，今則改爲四錢或一錢。洋商在各口岸自行運帶進口的煙、酒、麵粉、牛油、酪餅、化粧品、肥皂、家庭用品，一概免稅，私行銷售，總值每年逾二千萬兩。鴉片稅率，別有協定，洋商得在口岸銷售，華商運入內地後，照繳釐捐，中國雖多一收入，而流毒則不堪設想。

五口通商後，廣州海關照舊中國管理。²一八五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城，海關衙署被據，英、法領事不准兼任江海關監督的蘇、松、太道行使職權，關稅由領事代徵，英商僅出具一紙期票，法商並此亦不肯遵辦，無領事國家的商船，自由出入。不久美商亦拒不繳納，上海有如自由港。一八五四年六月，蘇松太道與英、美、法領事議定，三國各派一人爲司稅官（稅務司），代江海關監督徵稅，大權實操於英人之手。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稅則章程，訂明各口收稅，劃一辦理，由中國大臣邀請外人幫辦。翌年委李泰國總司海關稅務，各海關所用外人，悉歸選募，海關行政權遂爲外人所有。一八六一年一月，恭親王正式劄諭李泰國幫同總理稽查各洋商完稅事宜，此爲洋稅務司的由來。是後總稅務司爲英人所專任，各口稅務司亦以英人居多。

外國軍艦有權在各口岸停泊，亦即可進入中國領海，長江開埠後並可航行內河。

華人出洋的禁令取消，粵閩人被作「豬仔」販賣至南洋及中南美者愈衆，遭遇的慘酷，甚於奴隸。

鴉片貿易合法化，實行開禁，流毒益加普遍，爲害益加劇烈。

各國條約均有利益均沾條款，中國喪失權利於一國，等於喪失權

¹茶絲爲大宗出口，茶每擔抽銀二兩五錢，絲每擔抽銀十兩，稅率均不及百分之五。

²廣州由粵海關監督管理，福州、廈門由福州將軍兼管，上海由蘇松太道兼管。

利於所有條約國，各國形成一個對華聯合陣線。

當然若干外國人亦作了一些有意義的事，無論其是否確具善意，但對華人的新知多少有些啓發作用。中國有識之士，經過此次幾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亦獲得若干教訓與認識。

五、俄國的獨得

俄國對於中國領土的攫奪，一向是先造成事實，再取得認可。璦琿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為中俄共管，木里斐岳幅並不以為滿足。天津條約簽字之日，即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重施其侵佔黑龍江以北的故技，率船闖入烏蘇里江，於右岸地方安設砲台，搭蓋房屋，理由仍為預防他國「犯境」。天津條約中的查勘兩國未經定明邊界一款，含意頗為含糊，木里斐岳幅自有解釋。十二月，俄國置阿穆爾省（黑龍江以北）與海濱省（烏蘇里以東）。翌年，俄人繼續往來烏蘇里江，深入綏芬河、興凱湖、琿春，逞兇橫行。北京接得璦琿條約報告時，正為英、法所困，急望俄人斡旋，不僅不罪責奕山，反命吉林將軍景淳酌量將烏蘇里江一帶空曠地方，照黑龍江之例辦理。天津英、法兵退，方知不妥，謂吉林地方不在奕山允許之列，命景淳拒絕，俄人狡執不移，定要赴烏蘇里江上游及興凱湖勘界。

中俄天津訂約後，普提雅廷向桂良表示願備送槍礮，派人教習，並為中國修造礮台，清廷均不之許。俄國的用意，在加強中國對英的抵抗力，不致輕易屈服，以便操縱。俄皇又命木里斐岳幅的隨員丕業羅幅斯奇前往北京，表面上是互換津約，照料來京的俄國學生，及致送槍礮。清廷派管理理藩院事務的肅順及尙書瑞常與之商辦。一八五九年四月，完成換約手續。接着丕氏提出八款，要點為東北應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西北界址亦須重議，通商範圍應加擴大。肅順悉行拒絕，謂東界應照尼布楚約辦理，奕山僅將江左空曠之地，暫准俄人居住，並非以黑龍江為界。此後往來辯駁，肅順堅執黑龍江以北係借與暫住，更不得涉及烏蘇里地方，俄使亦不得常川駐京。

不久俄國改派陸軍少將納學（Nikolai P. Ignatiev）率領軍官及

三百八十輛裝載槍砲的馬車東來，以軍事援助爲餌，誘清廷入彀。行抵蒙邊，知北京談判僵持，將槍砲留下，於大沽戰後二日，趕至北京，續與肅順談判。肅順仍稱東界不能更改，否認批准璦琿條約，黑龍江空地僅係借與俄人居住，烏蘇里不在其內。伊納學謂必須照俄國地圖辦理，否則難免強佔。肅順斥其出言無狀，如始終不悟，將閉關絕市，已許之黑龍江地方亦作罷論，烏蘇里等處斷不能借，詞氣極嚴峻。伊納學照會軍機處，指肅順悖禮。軍機處亦說中俄地界久已分定，不應別生枝節。木里斐岳幅即集兵伯力，對黑龍江委員「怒目拍案，愈形桀驁，聲言非用槍砲，斷不遷移。」

伊納學會建議俄國政府，待英、法軍北來之時，再與中國談判，一八六〇年一月，照會軍機處，謂英、法軍數萬現已起程，「中國願圖太平，止有一法，務思良友於本國（俄），」如允將烏蘇里江以東歸俄，即勸令英國止兵。最後謂無論中國准與不准，「定將所佔之地堅守，永不復還。」俄政府尚不欲中國急遽崩潰，英、法捷足先登，復恐中國對英、法屈服，共同對俄，命伊納學仍留京交涉，同時命木里斐岳幅實行佔有烏蘇里江地帶。一八六〇年五月，英、法軍分向華北集中，伊納學再詰軍機處，是否願照所請辦理，限三日覆知。軍機處不爲所動，伊納學即行出京，轉往上海，中俄北京會議破裂。

伊納學到上海後，先與布爾布隆接觸，勸英、法軍艦向大沽示威，願予以外交協助，指肅順爲西方國家的死敵。繼與卜魯斯相晤，特別解釋俄國之擬以槍砲致送中國，意在攻剿太平軍，嗣知中國欲用以對抗英、法，遂作罷論。俄外相亦告法國駐俄大使，伊納學可供英、法軍諮詢，暗示俄應均沾在華權益。英、法使北來，伊納學追蹤而至，告以京、津防務部署。聯軍入京，恭親王以爲俄與英、法狼狽相結，恐伊納學暗中挑撥，俄事一時不了，英、法兵或將一日不退。萬一俄人對蒙古生事，南下熱河，更屬不易措手，因之願和他商議俄國的要求。稍後，恭親王明瞭英、法既欠融洽，俄與英、法更是貌合心離，英、法條約的訂立，與伊納學毫不相干。伊納學則稱曾「竭力挽圖補救，」如能完成中俄未定之件，「兩國和好交誼，益加團結。」恭親王

明知他是冒功要挾，爲求息事，惟有照允。十一月十四日，中俄北京條約簽字，涉及範圍之廣，過於璦琿條約。東北自烏蘇里江口，南至綏芬河、興凱湖、圖們江口以東之地，盡歸俄有，海參崴軍港在內。西北伊犁、塔爾巴哈台之界重劃，准喀什噶爾通商及庫倫設置領事。

關於贈送槍砲，伊納學以俄國會剿太平軍，代運江浙漕糧爲條件。恭親王只許收受槍砲，俄人說原有槍砲鏽壞。至會剿、運漕，恭親王、曾國藩均以爲流弊極多，英參贊威妥瑪復從中阻止，亦終無成。

一八五八年五月至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兩年半之間，英、法、美在中國共得的權利，俄國幾一一坐享。英、法用兵四年，固已滿其所欲，俄國不費一刀一槍，獨自取得了四十萬平方英哩的土地，面積較現在的東北尚大。從此完整的東北成了殘餘的東北，海岸線大半見奪，北太平洋成爲俄國的地中海，海參崴成爲俄國在東亞的海軍基地，殘餘的東北陷於俄國的兩面包圍。

十八世紀俄國的勢力已伸入中亞，在設置東部西伯利亞總督之年（一八四七年），對於中亞的經略，同時並進，要求通商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一八五一年，伊犁將軍奕山曾與俄人訂立條約，允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互市，劃定貿易圈。一八五七年，塔城貿易圈遭受焚掠，俄人撤回領事、商人，斷絕往來。次年派兵壓境，與木里斐岳幅的行動相呼應。

中國東北領土的喪失，至中俄北京條約告一段落，西北則自北京條約正式開始。一八六二年，中俄西北勘界會議無成，俄軍屢擾科布多、伊犁。一八六四年，訂「塔爾巴哈台條約」，塔城以西之地，盡歸於俄國。時新疆回亂大起，俄國又乘機脅迫，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〇年，齋桑湖一帶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亦爲俄所有。原屬中國的塔什干（Tashkent）、撒馬兒罕（Samarkand）、布哈爾（Bokhara）、浩罕（Kokhand），先後悉遭併滅。總計西北見奪於俄國的領土並不小於東北。

第五章 內部動亂(下)

(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節 清的外援與曾軍的奮戰

一、英國態度改變的朕兆與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英、美、法三國所承認的仍為北京政府。它們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讓與，自須維持其繼續存在。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以「萬國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於相處。北京政府雖非事事聽命，可以予取予求，終可迫令相就。開放整個中國是各國的殷切冀求，特別是太平軍控制下的長江流域。然而它們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間，處於領導地位的英國，以為太平軍敗亡不遠，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項權利。

天津條約滿足了各國多年的慾望，堅定了它們和北京的關係。今後的問題為如何使其儘早付諸實施。中英條約訂明長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現在長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國以對付太平軍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國已完全放棄交好太平軍之想，如能早日蕩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簽字之日，額爾金席不暇暖，率領軍艦，溯江西上，考察開埠事宜。路經南京、安慶，與太平軍發生砲戰。太平天國當局來書表示歉意，天王詔旨，稱額爾金為「西洋番弟」，歡迎前來，當以禮相待。額爾金自漢口東下，安慶太平軍守將亦解釋誤會，充分道歉。長江太平軍水營統將函請以洋砲彈藥相讓，說是彼此情同手足。職位相當於太平天國副首相的李春發對於額爾金派來天京的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偉烈亞力，以酒食款待，謂今後英船通

過，可預先知照，以便派員護送。額爾金對太平軍的印象，則十分惡劣，認為終必失敗。李泰國在上海面告桂良，「該夷毫無紀律，……實係賊匪行爲。……口稱奉耶穌教，詢以耶穌教中之語，所答非所問。」怡良以爲「夷人看賊不起，不屑與之往來。」英國對北京雖亦說不上好感，但它仍統有中國大半，尚有體統。太平軍僅有安慶至南京的長江兩岸，勉強掙扎而已。

太平軍對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約是鑒於英國兵力強大，太平軍的困難尚多，不得不爾。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長驅東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衛上海。忠王李秀成佔有蘇州後，致書英使，說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來面商，以敦盟好。繼又去函，勸勿助清軍，免傷和氣，均無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來至蘇州，再與李秀成聯銜邀英國教士艾約瑟相見。艾約瑟詢問卜魯斯的態度，卜魯斯告以英國對清軍及太平軍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蘇布政使薛煥、蘇松太道吳煦與曾任怡和洋行買辦四明公所董事楊坊商定，由美人華爾（F. T. Ward）編組洋槍隊，協防上海。華爾是一個軍事冒險家，多事的中國，對他正是大好機會，小則可趁火打劫，大則可自建一個政權。他的同國人法爾思德（E. Forrester）、白齊文（H. A. Burgevine）是他的同夥。他們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國逃兵、失業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呂宋人爲多，餉糈由上海官商供應。七月，奪回松江，搶掠之外，並得賞銀三萬兩，名利雙收，繼續向太平軍進攻，爲李秀成所敗。

艾約瑟到蘇州之後，諒必將卜魯斯的表示轉告洪仁玕與李秀成，洪、李信以爲實。復以英、法正向華北進兵，不致與太平軍爲敵，留守上海的洋兵無幾，不難一鼓而下，遂於擊破洋槍隊後，乘勝而進。卜魯斯發出警告，謂英、法軍已在上海縣城及租界設防，如果進攻，即行還擊。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聲明不擾外人。八月十八日，開始攻城，二十一日，爲英、法軍及軍艦所敗。同一天，英、法軍奪佔大沽砲台。兩者看來極端矛盾，實均爲自身利益。此爲太平軍初次與洋

兵接觸，亦為英國對太平軍態度轉變的具體明徵，不過這尚不能說是英政府的決策。

在中國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贊成中立，主張對太平軍干涉的為軍人與外交官。額爾金返國之前，曾分函卜魯斯、巴夏禮、何伯，¹說事實上不能不與太平軍交往，可設法和他們成立諒解，以便順利通商長江。太平軍以忙於西征，江南一時無事，訪問南京、蘇州的英、美教士絡繹不絕，長江各地走私的外國商人尤多，駐南京英軍艦的副領事亦作此勾當。一八六一年二月，巴夏禮隨何伯至南京。三月一日，與艦長雅齡（**Captain Aplin**）同晤太平天國贊王蒙得恩之子贊嗣君蒙時雍及韋王林紹璋，謂英國已取得長江通商權，以後英船往來，如遵守太平天國法令，不得阻撓，太平軍如攻漢口、九江，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財產，停泊該地的英國軍艦，亦不與之為難。經天王同意，即下詔宣示，凡未助「妖」（清軍）之人，一律寬赦，外國商人一如兄弟，有關事宜由羅孝全總理，²並送還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五月，美國海軍提督司百齡（**Commodore Stribling**）亦獲得相同的保證。

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禮自漢口東返，路過黃州，警告英王陳玉成勿攻漢口、漢陽，顯然違背三月一日的承諾。二十八日，何伯令雅齡進而要求太平軍不得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內，否則武力週旋，英國亦不准清軍以上海為進攻太平軍的基地，此為英國準備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禮、雅齡與蒙時雍談判五天，聲言太平軍如破壞口岸商務，彼此關係即無法改善。天王初僅允不傷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軍之進攻上海。四月二日，巴夏禮、雅齡親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應本年之內不進入上海附近，詔命中西永遠和約。何伯、巴夏禮的要求，仍為他們自己的主張，尚非倫敦的訓令。外相羅素認為英國無權防衛口岸，曾告誡卜魯斯對於中國內戰的行動勿逾越保護英國人安全與商業所必需的範圍。但是英國終於介入，卜魯斯、何伯的堅執與其他在華外交

¹事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

²羅孝全於一八六〇年到天京，掌管外務。

軍事人員的報告，最具影響力。

一八六一年五月，何伯指華爾誘招英國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國領事。此事與天京已交出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常有關係，意在表示中立，免與太平軍發生新的糾紛。美領事以華爾已入中國籍，將他釋放。華爾允不再收留英國逃兵，何伯允協助他在松江招募華人爲兵，以歐、美人爲軍官，給以西方裝備。是年十一月，洋槍隊擴大到二千餘人，何伯親往檢閱，顯係仍要它對抗太平軍，必要時可配合英軍行動，這是他準備與太平軍作戰的「重大措置」。華爾的新軍，以綠布帕頭，通稱爲綠頭勇，太平軍呼爲「假洋鬼子」。

李秀成說某洋人曾以威脅的口吻，以平分土地爲條件，要求太平軍和英國合作，說「爾天王雖衆，不及洋兵萬人。有我洋兵二三萬又有船，一舉而平，……我萬餘之衆打入北京後說和。爾不與合，爾朝不久，待我另行舉動。」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禮。洪秀全不爲所動，謂「我爭中國，欲想全圖，若與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日後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砲厲害，鑒於幫助清軍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門，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挾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見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堅定不移的國家民族立場。他們雖用客卿、洋將、洋弁，但須服從他們的命令。¹至於輪船、洋砲、洋槍、以及千里鏡等，太平軍亦甚愛好，李秀成部洋槍尤多，大半爲洋人偷售。

二、安慶的爭奪

湘軍佔有武漢、九江後，安慶成了長江上游的主要戰場。安慶不

¹早在一八五四年，羅大綱部下已有洋人。一八六〇年後，來投的洋人漸多，大都爲歐、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軍及富於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 F. Lindley）。一八六一年李秀成、李世賢、譚紹光部下的洋人，共約一百餘名，一八六二年譚紹光一人所屬即達二百人。

僅爲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爲天京米糧所資賴。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來，曾國藩、胡林翼全力以圖，與英王陳玉成展開劇戰。一八六〇年，江南大營再陷，清廷屢命曾移師東援。曾國藩別有所見，謂安慶一軍絕不可動。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向榮、和春〕覆轍。」第二，湘軍已進薄城下，若一撤動，「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即北路……各軍亦將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爲克復金陵之張本。」第三，水師若得此城，「則即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曾氏盱衡全局，深慮遠謀，戰畧的屬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規復蘇、常，以保滬、杭。不得已，乃自統八千人移駐皖南祁門，留曾國荃部一萬五千人續圍安慶。擔任掩護與後援的有多隆阿、李續宜、胡林翼部陸軍，及楊載福的水師，約共四萬人。

太平軍同樣了解安慶關係重大，洪仁玕曾說：「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爲中州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天京）所持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爲頭，安慶爲中，而江南爲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旣中折，其尾雖生不久。」時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轉而經畧浙江，天王嚴令前赴上游，以解安慶之圍，乘英、法軍進向北京的機會，北掃中原。李與陳玉成在蘇州會商後，陳去皖北，當長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進，當長江南岸，會師武漢。另由輔王楊輔清等，挺進祁門，以撥曾國藩，侍王李世賢挺進贛東，抄祁門後路，使安慶之圍不解自解。

陳玉成軍行剽疾，初戰安慶的多隆阿等不下，一八六一年三月中旬，西趨湖北，以破竹之勢，五日之內，攻佔黃州，因巴夏禮的警告，爲避免對英糾紛，所部繞越漢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軍

失期，未能取得聯繫，安慶情勢危急，四月，引軍東還。皖南的太平軍，於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後，一再迫攻祁門，曾國藩幾不能支，屢瀕於危，幸左宗棠在贛東擊敗了截斷祁門糧道的李世賢，始轉危為安。李秀成對於這次西征，似不甚積極，用兵又較持重。一八六一年二月，入江西，迂迴贛南、贛西；至六月方入湖北境內，逼近武昌，得知陳玉成、李世賢均已東返，湘軍鮑超到了江西，恐歸路被阻，漢口英領事對他亦有勸阻，遂於鄂南召集降衆之後，向浙江退卻。

西征無功，一八六一年四至八月，陳玉成糾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諸軍約三萬餘人，先後四次援救安慶。湘軍悉力以拒，曾國藩的大營自祁門移於安慶對岸，胡林翼調湖北各軍相助，戰鬥激烈異常。湘軍指揮統一，水陸犄角，糧藥充足；太平軍衆志不一，隊伍不整，補給困難。以往外人為貪圖重利，常以米糧售與安慶守軍。曾國藩命各營對走私洋商，優予籠絡，以同樣的價格收購所運米糧，卜魯斯亦禁止英船再來，安慶遂無顆粒可得。九月五日（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糧盡城破，太平軍一萬六千餘人，全部戰死，安慶為湘軍所得，這是太平天國存亡的一大關鍵。洪仁玕曾謂：「我軍最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東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

安慶失守，陳玉成退往廬州，受到革職處分。他久有經營山東、直隸的準備，至是認為與其坐困，不如別開生路，命所部北進，攻畧皖豫之交。一八六二年春，清軍大舉圍攻廬州。五月，陳玉成北走壽州，為首鼠兩端、曾受太平天國爵職的練總苗沛霖誘執遇害，年僅二十六歲。陳死，皖北太平軍等於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東退時，已知安慶難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計劃，謀奪取杭州，鞏固東南的根據地。一八六一年底，杭州、紹興、寧波悉為所得。曾國藩深感情勢嚴重，說是「現在浙、蘇兩省膏腴之地盡為賊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寧、紹為餉源，今已被賊踞，全省糜爛，無可籌畫。」如就經濟意義來看，太平軍得到杭州、浙江，與失去安慶、皖北畧可相當；以軍事關係而言，杭州、浙江的

地位則不能與安慶、皖北相比。不過杭州、浙江的佔領，畢竟是太平軍晚年的一大勝利與轉機，亦為最後的一次勝利，此後無何進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統江南、浙江，為此時李秀成的基本戰畧，西征期間，雖未再進攻上海，而對浙江則未放手。一八六一年四月，太平軍佔領乍浦，如渡過杭州灣，即可攻擊寧波。五月，何伯派艦長咲樂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寧波，警告太平軍，不得進犯，並助清軍佈防。太平軍答稱願與英人和好通商。六月，卜魯斯通知何伯，謂保護口岸即為保護英國利益，清已同意英軍代守寧波，並論及攻取南京之事。另報告外相羅素，口岸如為太平軍所佔，商業必受打擊，關稅自必減少，賠款將難照付。何伯不贊成攻取南京，怕上海與內地通商因此停止。羅素亦不主張採取主動，惟應使海口中立。咲樂德克的保衛寧波計劃，獲得了批准。

經過八十天的圍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撫及駐防將軍以下萬餘人死之。寧波於十二天前，已為侍王李世賢部佔領，這是太平軍控制的唯一海口，軍紀嚴整，商務照常，免徵關稅三個月，與外人頗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趕至寧波，與英、法領事自定北岸為居留地，不許干擾。四月，太平軍開始在鎮海設關稽查，英、法出而阻撓。繼又藉口寧波城上鳴砲擾及居留地與英船，要求拆除砲台被拒。五月十日，英、法軍艦助清軍奪佔寧波。

英人最關心的為上海，次為長江口岸。天王僅允在一八六一年內太平軍不進入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圍，何伯預料，如此城一旦為太平軍所得，上海勢必受到威脅。巴夏禮再至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艦長平安（**Henry M. Bingham**）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英人在太平軍領域內被劫損失；二、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軍領域內河流；三、嚴禁太平軍侵入上海、吳淞周圍百里之地；四、漢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內，亦不得進入，並不得擾及鎮江領事署所在地。結果全被駁斥，

平安聲言將相機採取必要措置。

英國關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這個陸上孤島。佔有杭州後七天，即率軍北去，曉諭上海洋商，「各宜自愛，兩不相擾，」「倘助逆爲惡，相與我師爲敵，則是自取滅亡。」這時他已不惜與外人一戰，不似上次的多方懇勸。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軍連佔上海周圍各縣，二月，爲英、法及華爾的洋槍隊敗於浦東。三月，華爾得英軍艦之助，復捷於上海西南，洋槍隊改名「常勝軍」。四月，太平軍慕王譚紹光與英、法軍、常勝軍大戰於上海、松江之間，不利而退，此爲上海之戰的第一幕。

英、法軍決肅清上海周圍百里，改採攻勢，所得城池，交常勝軍戍守，財物平均分配。五月，佔領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於太倉，奪回嘉定，英軍提督士迪佛立（C. W. Staveley）焚城敗走，法軍提督卜羅德（A. Protet）戰死奉賢南橋。六月，譚紹光奪回青浦，俘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直薄上海縣城。英、法軍屢敗之餘，不敢出擊。時李鴻章所統湘、淮軍已至，力戰三日，太平軍後撤。「滬中商人向恃洋人爲安危，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歛兵不動。」李秀成以天京緊急，八月，回師西援，留譚紹光主持東線。十一月，太平軍再迫上海，又爲湘、淮軍及常勝軍擊退。此爲上海之戰的另一幕。

上海會戰之前，地方官紳與英法已成立一「中外會防局」。英方主張參戰最力的，始終爲何伯、卜魯斯與上海領事麥華陀。麥華陀報告外部，謂清軍無力保護上海，卜魯斯強調如英國不欲拋棄在華利益，必須維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說，清廷爲合法政府，應予以道義援助。此時北京的當權者爲恭親王，卜魯斯和他商定中外聯合作戰。雇外國兵輪保衛寧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戰，軍艦可入江協防，常勝軍擴編爲四千五百人。

洪仁玕對於此時李秀成之進攻上海，深不謂然，致書詳論安慶失守後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後東南。李秀成以爲取得東南，即可高枕無憂，湘軍尙無敗勢，須待機以圖。蘇州儒士黃毓（王韜）勸他暫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僅知自守，並非欲與太平軍相敵，對

之寧和勿戰，應移文英、法，定上海爲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長江下游各地，設關徵稅，藉足國用，再溯江而上，規復安慶、九江、漢口，聯絡石達開，盡收黃河以南，然後封鎖上海，待其內變。日後洪仁玕說，太平天國禍害之源，爲「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賴文光詆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不免言之太過。從另一面來說，倘李攻下上海，不僅可無後顧之憂，餉源亦可無匱，但未遂所願。下游的英、法軍公開支持清朝，上游的湘軍長驅而東，太平軍陷於夾攻，首尾不克兼顧。

四、曾軍的分路推進與洋將洋兵的協助

一八六〇年曾國藩的平定江南計劃，分爲南、北兩軍，規復蘇、常及金陵，南軍由浙江而入，北軍夾江而下。曾與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會議之時，商定先由左宗棠經營浙江。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亦湖南人，舉人出身，富於才畧，一八五二年起，佐湖南巡撫駱秉章幕。湖南爲湘軍後方，所有軍餉、援兵、戰器，胥歸他籌策，權盛一時。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幾獲重咎，賴胡林翼與咸豐的近臣郭嵩燾、潘祖蔭力保，始獲無事。經曾國藩的舉薦，自領一軍，初駐贛東，維護祁門大營後路。杭州失守，復因曾的奏請，授浙江巡撫，擔任南路軍的主帥。一八六二年二月進入浙西，與李世賢相持八個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進展，乘浙江太平軍內部不和，一八六三年初，連下數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陽，擢升閩浙總督。

與左部相呼應的爲浙東英、法人組成的中外混合軍。先是，寧波英領事館，募勇三百，號爲「綠頭勇」。英、法軍奪佔寧波後，英軍官唾樂德克仿「常勝軍」之例，將「綠頭勇」擴編爲千人，分稱「常安軍」與「定勝軍」。浙海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參將勒伯勒東（A. E. Le Brethon de Caligny）別募一千五百人，冀與英抗衡，號「常捷軍」，通稱「花頭勇」。一八六二年秋，唾樂德克會花勇、綠勇及上海前來的「常勝軍」，奪佔寧波附近四縣，華爾

因傷而亡。翌年，花、綠勇西攻紹興，屢爲太平軍所挫。「常捷軍」統領勒伯勒東、達爾第福（Tardif de Moirey）相繼戰死，改由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接統，佔領紹興。咳樂德克被召回國，「常安軍」、「定勝軍」解散，「常捷軍」繼續參戰，兵力已達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亂，上海爲富家巨室避難麇集之地，戶口由三十萬增至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官中益得招將募勇，逾年兵至五萬四五百人。然皆市井無賴，或盜竊，或通賊，賊窺伺益甚。」江蘇爲兩江總督轄境，湘軍既有安慶，聲威方盛，上海蘇紳馮桂芬、潘曾瑋等，因有向曾國藩請援之議。蘇撫薛煥、藩司吳煦和之。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杭州合圍，滬局愈危，遂由蘇紳錢鼎銘赴皖乞師。曾國藩以所部無可分撥，餉又無自出，頗感爲難。錢云，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六十萬兩，許以十萬兩相濟。曾國藩大喜過望，準備遣乃弟國荃往保此膏腴之區。

曾國荃志在攻取金陵，不願援滬，曾國藩乃將此一任務付諸他的門生李鴻章（一八二三至一九〇一）。李爲安徽合肥人，進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辦理團練五年，抑鬱不遂所志，改投曾國藩。經過四年的薰陶歷練，大爲曾所賞識，認爲他「才大心細，可獨當一面。」李所招募的均爲淮南的團練，曾國藩爲訂立營制，並將部分湘軍撥歸節制，一八六二年初成軍，名曰「淮勇」或「淮軍」，內定李爲江蘇巡撫。曾一度命他駐紮鎮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餉吏治之樞紐，應先從彼處佈置，然後出京口（鎮江），以應上游。」此一決定不僅關係他個人前途，亦改變了曾國藩的經畧江南計劃。浙江糜爛，杭州失陷，左宗棠無暇顧及蘇、常。李部東去，初尚視作偏師奇兵，現在則成爲進圖江南的主力。

英、法軍的協防上海，就清軍方面來說，不惟保全了一個餉源所繫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個江南反攻基地。一八六二年三月，上海中外會防局雇英國輪船七艘，運李部來滬，何伯派軍艦護航。四月初，李率湘、淮混合軍六千五百人，「鼓輪東下，穿賊境千餘里。賊以其行

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邊遙望，不敢近問。」李的一生事業，多與外人有關，發跡之始，即獲外人幫助。抵滬甫一月，接任江蘇巡撫，升遷之速與左宗棠同。時上海戰爭方殷，湘、淮軍開始參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對他的重要性，曲意聯絡，「欲用夷變夏。」他最注意的為西洋軍伍，與何伯商定章程，撥派所部三千人交英軍官訓練。因為「滬防必須自強，洋人不可專恃，」目前迫於時勢，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九月，淮軍各營多已添練洋槍。十一月，悉數改用，聘有洋教習。復以「華爾打仗奮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華爾允為請洋匠製造砲彈，代購槍砲。李正欲學得外人一兩樣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均不無裨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購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財源可供支配。以往與外人交往最密而「過趨卑諂」的吳煦、薛煥相繼去職，舊有兵勇亦逐步裁編。於是全局在握，實力大增，輔佐他的為馮桂芬、郭嵩燾。

華爾死後，李鴻章從英國提督士迪佛立之請，以白齊文接統常勝軍。一八六二年十月，淮軍與英、法軍、常勝軍再佔嘉定，太平軍譚紹光全力反攻，為淮軍、常勝軍所擊退，上海附近肅清。此為淮軍的第一次大捷。時李秀成正圍攻天京城外的湘軍，李鴻章命常勝軍赴援，白齊文藉口欠餉，遷延不行。一八六三年一月，因索餉不遂，毆打楊坊，搶奪四萬元，被李撤職。常勝軍暫歸士迪佛立的參謀奧倫（J. Y. Holland）統率，縮編為三千人，軍心不服。三月，改由英軍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帶，常勝軍正式歸英人控制。

曾國藩以太平軍「與洋人構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迨亦天亡粵逆之會。」一八六二年初，他派出三路大軍，一為進規浙江的左宗棠，二為東援上海的李鴻章，第三路為直搗金陵的曾國荃，有心讓他建克復太平天國首都的大功。曾國荃之統兵，始於一八五六年，以攻下江西吉安（一八五八）而聲名始著。安慶克復，譽望愈高。一八六二年三月，與其幼弟曾貞幹自安慶率軍夾江而東，國荃循北岸，貞幹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師居中策應。另以多隆阿圖皖

北，鮑超圍皖南，作二曾的掩護。四至五月，江北軍克巢縣、和州，江南軍合水師克蕪湖、太平府（當塗），全軍二萬人，逕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動以來，不過六十餘日。二曾進軍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陳玉成自安慶敗後，實力大喪，復受制於多隆阿；二為皖南的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屢敗於鮑超，二曾無後顧之憂；三為浙西的侍王李世賢為左宗棠所牽，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於上海之戰，為英、法軍、常勝軍所制，一時不克返師。於是天京三度被圍，屯紮城外的曾軍有水師為之輸送聯繫，無孤軍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將來圍困天京的必為湘軍，主張多買米糧，天王不納，洪氏兄弟又從中操縱，搜刮現金；巢湖流域已為湘軍所有，糧源阻斷。兩年以來，天京不見敵蹤，及曾軍突至，天王一日三詔，令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對上海的攻勢。他認為曾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久必無戰鬥之心。」天王嚴命又至，謂「若不遵詔，國法難容，」他惟有勉強從命。十月，李秀成的主力列營天京城南，晝夜環攻雨花台，「洋槍洋礮，驟若飛蝗。」李世賢亦自浙江前來，開掘地道，炸毀營牆。時秋疫大作，湘軍病者幾半。曾國荃先固糧道，拼死不退，屢瀕於危。經過四十餘日的劇戰，太平軍糧食不繼，冬衣未備，在蕪湖附近擔任截斷曾軍糧運的太平軍又為湘軍水師所敗，二李只得引去。是役為湘軍克復安慶後的一場決定性的大戰，曾國藩五內如焚，「心已用爛，膽已驚破，」深恐數年來千辛萬苦的所得，墜於一旦，結果竟轉危為安。洪秀全動員所有可用之兵，終未能撼動曾軍，天京的命運遂告決定。

第二節 太平軍的末路

一、紀綱墮壞

太平軍的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措施，無論反對者斥其如何怪誕詭譎，當清廷失去控馭、人心思變之秋，確能收一時煽

惑脅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領導人正當少壯之年，¹朝氣蓬勃，實充足多。中期之後，一切全非，卒至敗亡。外在的情勢轉變，固然有關，根本所在，為其自身的日趨腐化、惡化，喪失了淬礪奮揚之氣。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的創建確有極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為洪秀全羅致了不少狂熱的信徒，不惜犧牲一切以從，亦因此激起衛護名教者的反抗，招來了勢不並立的勁敵。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沒想到竟至作法自斃。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說，結果演成自相殘殺；在後期，他仍強調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擔當，太平一統，即將到來。但何以久久未能實現，屢屢喪師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從，甚而他的高級將領的信心亦生動搖。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深，極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賴神力，忽視現實，失去理智，無異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〇年，再破江南大營之後，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慶行將不守之時，李勸他預防湘軍來圍天京，反大受責斥，說是「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殘妖易滅，功勳易成。」但太平軍之日暮途窮，則為顯然的事實，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說他精神錯亂，亦可謂為執迷不悟。在如此領導下的軍政，尚有何希望？

經過天京的內訌，洪秀全偏信他的親族寵倖，任其胡作亂為，上下離心。李秀成勸他「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終不見聽。洪仁玕雖有才識，但乏功勳，到天京不滿半月，封為軍師、干王，要人悉歸其制，眾望不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說，自洪仁玕執政，「諸宿將多不服，賊勢之衰，蓋由於此」。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以援安慶失敗革職，朝政復歸洪仁發、洪仁達。李秀成見政情日壞，「屢俱本奏，天王不從，越奏越怒，」甚至說：「政事不與你相干，王次

¹金田起事時，洪秀全三十七歲，馮雲山年與相若，楊秀清、蕭朝貴、韋正均在三十歲上下，石達開約二十歲，秦日綱二十餘，胡以晃三十餘。

兄勇王（即福王洪仁達）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幼西王爲蕭有和，天王之甥，是一個十幾歲的黃口孺子。

濫封爵職爲太平天國的另一致命傷。早期除東、西、南、北、翼王及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外，無其他王號。天京內訌後，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爲陳玉成、李秀成，至一八六一年前期，仍僅十人左右。此後愈封愈濫，多至二千七百餘人，一因出於猜忌，採衆建政策，以分削宿將實力，李秀成的大將陳坤書之封護王，即爲一例。一欲借名號以收買臣屬，但事姑息，不明賞罰。強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顧根本，此爲洪仁玕之批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僞王……不甚服僞天王、忠王之調度，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爲彼王劫掠，」此爲曾國藩的批評。李鴻章亦說：「增封多王，內亂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說：「賊中僞王……彼此猜忌，勢不相下。」李秀成認爲亡國大誤之一，即在濫封多王。至其他爵職，亦大量增加。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之間，新設義、安、福、燕、豫等爵號，「不及一年，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洪仁玕曾感慨的說，大家「動以升遷爲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不足，」若「再隱忍姑息，我輩無生理。」主將初僅數人，其後至少數百。天將、朝將、佐將，更不可數舉。一八六一年，有一位到過南京的英國人說，天京幾全是公職人員，均爲消費者，亦是破壞者。

後期太平軍紀律的惡劣，爲無可否認之事。號稱治軍嚴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約束所部。一八六〇年，江寧李圭被虜，年餘後逃出，著有《思痛記》，記事尚能持平。據云：是年江蘇丹陽被李秀成部佔領後，「殺戮之殘，蹂躪之酷，無日無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贛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於賊，或戰敗而降賊者。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之殘忍也。」「賊亦令禁止騷擾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顧賊衆奉行者少，而以清軍之降附者尤爲兇殘貪暴。」又據江西高安縣志，「癸丑（一八五三）賊至，所擾惟典舖大家爲甚。乙卯（一八五五）再至，惟以仇視官紳，

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殺猶未甚也。至辛酉（一八六一）逆酋李秀成至，而禍斯極矣，分擾各屬，放手焚殺，恣意淫掠，各鄉勇男婦死者不下數千人，所過成焦土。」

浙江爲太平天國晚期的主要轄區，兵戈連年不休。太平軍到後，人民流離逃亡，田畝荒蕪，耕種者不過十之二、三，粟、麥、油、鹽，搜索一空。加之釐捐局卡林立，抽剝重重，以至商賈斷絕，百貨騰貴。曾國藩說，以往百姓不待脅迫，「甘心從逆，樂爲賊用，……今則民間賊至，痛憾錐心。」「粵匪初興，粗有條理，……今則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棄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土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久理？」「昔年粵匪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外人亦言晚年太平軍，缺乏戰意，惟以燒殺破壞爲事。

李秀成、李世賢的直接統治區，情況最稱良好，頗具條理，農民之田，以實種爲準，五畝以下，免徵租捐。缺乏資金的商人，可向官請領本錢，或發給貨品，作定價格，售後還七成，留三成以供轉運，或定期還本，不取利息。蘇州、杭州一帶，市肆貿易如常。

糧食始終是太平軍的大問題，佔有南京的第二年，已有匱乏之虞，晚期許多城池，因之不守。有權勢的各王仍度其奢靡生活，大治府第庭園，競尚豪華，李秀成亦不例外。南京下關的英國副領事福禮賜（R. J. Forrest）謂修建天京忠王府的工匠一千餘人，壯麗僅次於天王府。王冠爲金製，鑲以珠寶。李鴻章謂蘇州的忠王府由七百人修造，三年尙未竟工，已是瓊樓玉宇，曲欄洞房，如神仙窟宅，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爲李鴻章平生所未見之境。浙江嘉興陳炳文的聽王府，磚瓦木石皆取之鄉鎮，用費出自田捐。江蘇金壇李世賢的侍王府，一座宮殿，可容千人。一位英國人說，南京無絲毫興盛氣象，絕不爲人民設想，專恃劫掠爲生，而又十分腐化，吸食鴉片及飲酒、賭博之風盛行。執掌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個煙癮極大的人。¹

¹據英國人說，在一八五八年，南京吸食鴉片的，已佔三分之一人口。

二、全局瓦解

一八五七年翼王石達開的出走，關係太平天國的命運極鉅，不僅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軍事政治領袖，兵力亦因之大為削弱，安慶附近的駐軍隨之而去的約六、七萬人，江西省尤衆。估計太平軍的實力損失恐在一半左右。一八五九年，石達開自贛東經浙西、福建、贛南，西入湖南，擬進向四川，與湘軍劉長佑、李續宜劇戰於寶慶，遭受挫敗，改而南趨廣西。石部約二十萬人，以長江流域之人及廣東天地會爲多，寶慶戰敗，軍心渙散，紛紛脫離。進入廣西之後，軍食不給，前途茫茫，士氣益爲沮喪，或折而東走，或相繼敗亡，窮蹙已極。一八六一年，石率殘部約一萬餘人，再入湖南，取道湘、鄂邊地。翌年，進入四川東南境。四川地險民富，爲清軍主要餉源之一。一八五九年，藍大順、李永和起於川、滇之交，北擾岷江流域，直逼成都，據有產鹽地區，聲勢頗大。石達開謀與聯絡。新任四川總督駱秉章率湘軍先至，藍、李屢爲所敗，李不久戰死。一八六三年，石達開繞道滇邊渡過長江上游，經寧遠（西昌）北趨越嶲，爲大渡河所阻，遭土司與清軍夾擊，陷於絕境，全軍敗沒，石亦被俘。

一八六二年南京城外會戰，李秀成解圍失敗。翌年初，渡江西進，謀合陳玉成舊部與捻攻畧皖北，期撼動湘軍大本營所在的安慶，並打通巢湖一帶糧源。以所部戰志不揚，無功而返。時逢青黃不接，餓斃不少。六月，自浦口南渡，復遭湘軍水陸截擊，損折十萬人，可謂慘敗。南岸太平軍所控制的僅餘蘇州、杭州、南京等城。

一八六三年七月，李鴻章的淮軍與常勝軍分路進向蘇州，戈登、程學啓爲主將，配有大砲輪船，法國人訓練的洋槍隊，亦參加作戰。時白齊文以撤職懷恨，糾合舊部，投蘇州太平軍，仍不得意。九月，李秀成自天京回援蘇州，與慕王譚紹光反攻失利，白齊文降於戈登。十一月，太平軍內變，李秀成以事不可爲，出城西去。十二月，納王郜永寬等殺譚紹光以降。程學啓入蘇州，誅郜永寬等。戈登大怒，與李鴻章決裂，不受節制，因爲事前他與郜永寬曾有諒解，更憤李鴻章

破壞了今後他的瓦解敵人策略。李部繼下無錫，進攻常州。太平軍鑿於蘇州殺降，堅守困鬥。一八六四年二月，戈登承英公使卜魯斯之意，續行參戰。卜魯斯對他說，這全是爲了英國的利益。五月，戈登助淮軍佔領常州，戰事已近尾聲，常勝軍解散。四年以來，常勝軍用餉千萬元，有助於李鴻章的平定江南者頗大。浙江左宗棠部，自一八六三年四月起，圍攻富陽，日久不下。九月，德克碑率常捷軍自浙東來會，始行佔領。復經六個月的苦戰，翌年三月，杭州太平軍棄城而走，左部及常捷軍大肆搶掠。同月，李鴻章軍克嘉興，附近各城均降。

一八六三年冬，南京外圍附廓要地，幾盡爲曾國荃攻佔。蘇州失守後，李秀成知大勢已去，南京無糧，兵力僅萬餘人，勸天王棄城他走，另求出路，確不失爲上策。天王不從，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於水，何懼曾妖乎？」命大家以「甘露」（百草）爲食。城內盜賊蜂起，曾軍「日月逼緊，內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不少高級人員通敵，甚至涉及李秀成。及常州失陷，洪秀全一切絕望。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令大眾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真可謂至死不悟，亦可說是尙在自欺欺人。兩天後，服毒自盡，年五十二歲。他的兒子幼主（天貴福）繼位。

圍城湘軍近五萬，自四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達十分之一。淮軍既下常州，清廷爲早日拔取金陵，命李鴻章派砲隊合攻。李知曾國藩欲使曾國荃獨成大功，托詞不行。曾國荃屢言所少不在兵而在餉。於是加緊開掘地道，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塌天京城垣，湘軍突入城內，四處縱火，太平軍聲言，「弗留半片爛布與妖享用。」三日之內，「賊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煙起數十道，屯結空中不散，如夾山絳紫色。」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及盡得金銀珍物，再放火滅跡。將領「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賞，殆百數。」「城破之後，精壯長毛除抵抗時被陣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城上

四面縋下老廣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戮以爲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爲曾國荃幕友趙烈文日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李秀成護幼主衝出，中途相失，李被俘虜。曾國藩到後，命自書供詞，寫畢被殺，年四十歲，爲太平天國留下一部有價值的史料。曾國藩謂幼主必死，實已逃至浙江。左宗棠方欲張敵勢，江西巡撫沈葆楨爲爭餉事，與曾早有芥蒂，均語多鑄譏。中外復紛傳南京金銀如海，清廷初冀於克城之後，作軍餉賑濟之用，曾則謂全無財物。各方議論不已，爭指目曾國荃。曾國藩近年惟恐權位太尊，聲望太隆，功高震主，畏譏畏讒，至是，告誡乃弟謂「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決心將所部裁撤，曾國荃亦開去浙江巡撫本缺，「軍氣憤鬱慘沮。」

天京陷落之前，李秀成以江、浙無糧，洪秀全又不肯放棄天京，改命各軍西入江西，得糧後再回援天京，就中以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兩軍爲大。他們的口號是「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死江西。」八月，困守浙江湖州的太平軍爲李鴻章、左宗棠及常捷軍擊走，江、浙無太平軍蹤跡。幼主與干王洪仁玕等，經皖、浙而西，期會同李世賢進向湖北，合扶王陳得才部。十一月，在贛東被擒。李世賢由贛而粵、而閩，十月佔領漳州及閩南諸城。左宗棠、李鴻章派軍前來，一八六五年五月，克復漳州，李世賢爲汪海洋所殺。是後汪部出沒閩、粵、贛邊境，據有粵東嘉應，至一八六六年二月爲左軍消滅。¹

扶王陳得才及遵王賴文光於一八六二年自皖北經河南入陝西，尋復東還，以英王陳玉成敗歿，李秀成命再西去，招兵回救天京。翌年，

¹一八六二年，台灣天地會戴潮春等舉事，衆至二十餘萬，規模頗與太平天國相近，越二年失敗。一八六五年，餘黨再起，盛傳李世賢部將入海，並有美船偷運太平軍入台之說。

佔陝西漢中。一八六四年分路東下，合捻入湖北，知南京不守，徘徊於鄂、皖之間，爲僧格林沁所敗，陳得才自盡，賴文光與捻合流，別創一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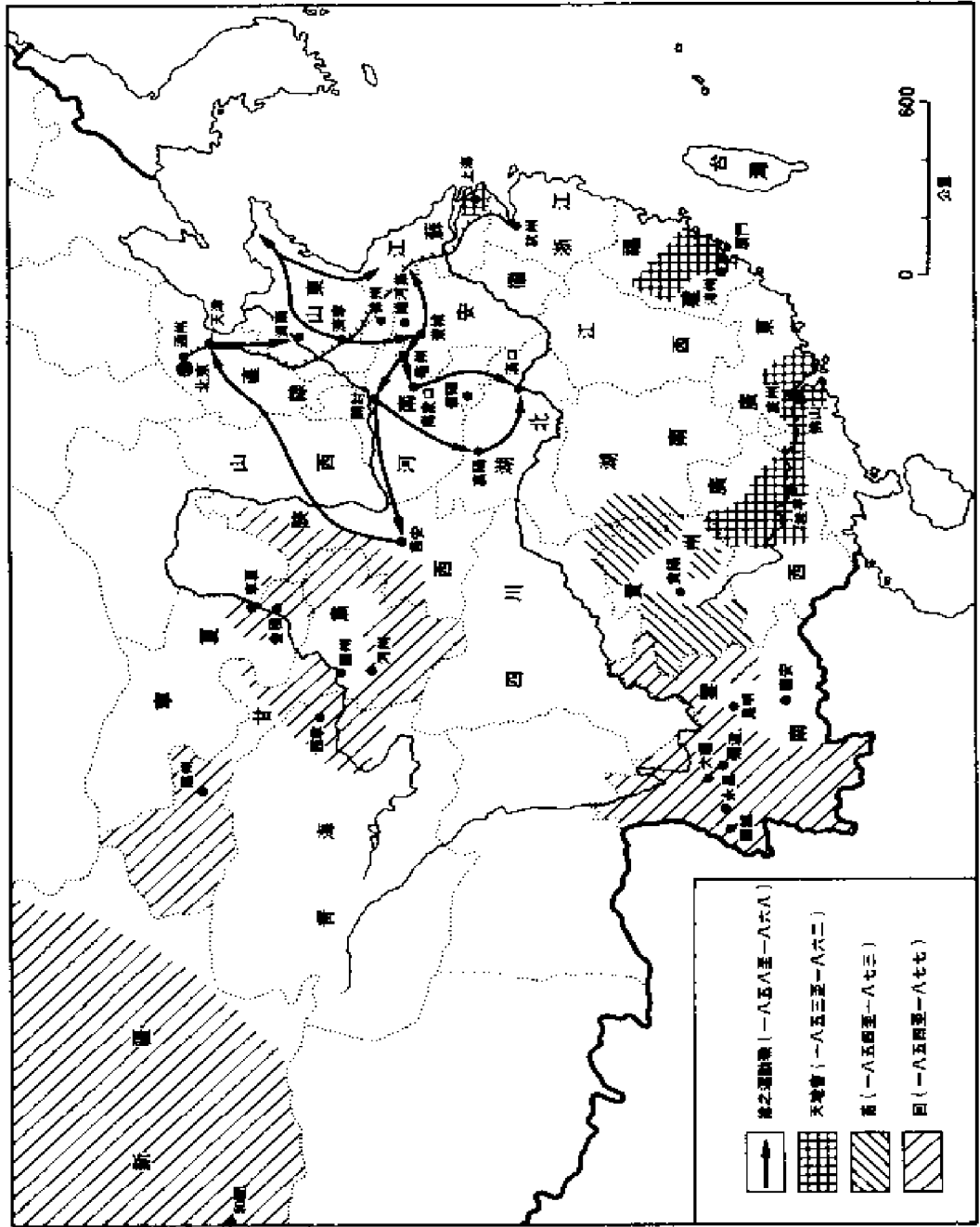
三、捻亂的擴大與平定

太平天國後期的軍事活動，限於長江下游，與兩淮的捻關係甚爲密切。陳玉成、李秀成的早期兵力，半數爲捻。一八五八年，捻首李昭壽背叛，對李的打擊殊重，張洛行等則始終與陳合作。捻的根據地原在淮河以北，是年進入河南、魯西，雖志在虜掠，亦予太平軍以聲援。翌年，分道四出，東至魯中，西至豫西、豫南，飄忽往來，乘虛蹈隙。一八六〇年，西支大掠河南開封，縱橫三十餘州縣；東支入山東，擾濟寧、泰安，所經二十州縣。復折返皖北，途中「夾擁資糧數百車，牲畜數萬，歌呼而行。」一八六一年，捻尤爲活躍，西路爲配合陳玉成軍的西征，二至五月，一支入河南南部，一支入河南東部、中部，經南陽、鄧州，破湖北老河口，然後返回亳州。九至十一月，再度西來，一支攻開封、鄭州、洛陽，一支攻湖北襄陽、樊城，東路入山東，屢敗自京畿南來的僧格林沁，兩逼濟南。僧軍「疲於奔命，芻糧不繼，士馬疲羸，」惟有守黃河，以固直隸。捻長驅而東，進至煙台，爲英、法軍擊退。

同年（一八六一），山東白蓮教蜂起，魯南以宋繼鵬爲首，稍後又有冀南的張錫珠。魯中的劉德培，似亦屬白蓮教。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奔波於直隸、山東、河南、安徽四省。皖北太平軍失敗後，捻勢大衰。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下雒河集，擒張洛行，繼平苗沛霖。張洛行的餘部由其姪梁王張宗禹及魯王任化邦統率，流竄河南境內，後合遵王賴文光。賴文光工於謀畧，張宗禹富有機智，任化邦最爲善戰，專採飄忽馳驅的運動戰術。

一八六一年以來，清廷恃黃、淮流域的主帥僧格林沁若長城，與長江流域的曾國藩儼然爲兩大柱石，但彼此並不十分融洽。僧部爲英、法聯軍敗後，拼集成軍，戰鬥力大不如昔，且毫無紀律，所過殺掠如洗，民間極爲仇視。一八六四年九至十二月，與捻角逐的即爲僧軍，



圖四 捻、天地會、苗及回之擾亂地區

捻屢敗僧於豫南、鄂東及鄂豫之間。翌年一月，又大敗於豫西魯山。三月，捻疾走魯、蘇之交，僧窮追不捨。五月十八日，全軍在山東曹州覆沒。捻本以行動敏捷勝，每戰先以游騎四出，「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盡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官軍，馬嘶人謹，剽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至是盡得僧軍的蒙古馬匹，如虎得翼。

僧格林沁敗死，華北震動，京師戒嚴。詔命曾國藩督辦直、魯、豫三省軍務，又命直隸總督劉長佑、天津通商大臣崇厚統洋槍隊，扼守直隸南境，李鴻章亦自上海派軍由海道增防天津。曾國藩以所部湘軍多為南人，不宜於北，且半數解散，須添募黃、淮一帶兵勇，增購戰馬，置備砲船，月餘後始行北上。他的戰畧，第一改追擊為堵剿，以靜制動，分置四鎮，於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第二為控制捻的根據地，於亳州、蒙城、宿州及有捻地區，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以拔除捻的來源，並絕其物資。四鎮兵力約八萬，三鎮由淮軍分任，接近南方的臨淮關歸湘軍負責，原因是淮軍多為北人，習慣適宜。

捻於殲滅僧格林沁軍後，折回淮北，補充休息。為突破湘軍、淮軍的大包圍，穿越河南，進入湖北，逼近武漢。一八六六年春，復入山東。曾國藩以四鎮圍堵無效，改採堤牆防河辦法，北自開封附近的朱仙鎮，南至周家口，守賈魯河，朱仙鎮至開封挖河築牆以守，周家口至安徽槐店以迄正陽關，守沙河，此為西線。自正陽關東至臨河關，守淮河，此為南線。東線守運河，北線為黃河，將捻逼於山多田多的豫南、鄂北，以制其馬隊。是年秋，捻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堤牆，東走山東，曾的防河戰畧又告失敗。他亦知河防實難週密，惟以官軍馬隊遠不及捻，專恃步隊追擊，斷不能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捻雖突破河防西線，但為東線運河所阻，返回豫東。

三年以來，捻屢戰屢捷，賴文光終感獨力難支，孤立難久，命張宗禹西進陝、甘，聯合回衆，以為犄角，自與任化邦留於中原，因有西

捻、東捻之稱。曾國藩以督師年餘無效，復爲言官所劾，奏請開缺。詔以李鴻章代爲欽差大臣。賴文光率領東捻，再入湖北。一八六七年一至三月，屢敗淮軍、湘軍於鄂北、鄂東。曾國藩時代，對於淮軍的指揮已感困難，李鴻章繼任，湘、淮軍意見愈深。六月，東捻於八日之間，自湖北疾入山東，破運河堤牆，走膠東。李改守膠萊河，東捻返撲不利，精銳大喪。次年一月，賴文光被俘，東捻平。

西捻張宗禹，入陝西後，大破清軍於西安附近。因受湘軍劉松山及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部的壓迫，北走陝北。聯合回衆不成，東渡黃河，入山西、直隸，謀援東捻。一八六八年二月，逼近保定，北京爲之震撼。捻「以走自活，」亦以走疲官兵。官兵十餘萬人，不能遏其竄越，各將領彼此觀望，縱勇擾民，「民仇兵甚於仇賊。」而且號令不一，直隸各軍統於左宗棠，左之外尚有兩位欽差大臣，山東各軍統於李鴻章，李之外尚有兩位巡撫，李、左之間復不協和。捻一度進至天津城外，尋南走山東，屢次撲攻運河。七月，連日大雨，直、魯之交，成爲澤國，捻騎不能奔馳，爲淮軍圍困於魯西北境。張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平。

自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捻馳騁於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陝西、山西、直隸八省，傾湘、淮軍及數省兵勇之力，始予蕩平，雖由捻之善戰，實以官兵暮氣太重。淮軍爲剿捻主力，驕逸亦爲各軍之冠，所恃者實爲西洋槍砲。捻亂平，太平軍方算全部消滅，自廣西舉事以來，首尾十九年。

第三節 西南與西北

咸豐、同治兩朝，可謂多事之秋。除縱橫南北的太平軍，出沒黃、淮流域的捻與白蓮教及遍擾兩粵、閩、台的天地會外，僻遠地區的西北、西南亦叛亂疊起，先後二十年，無一不直接、間接與太平軍相關，或多或少受到太平軍的影響。

一、貴州的苗與教

貴州漢、苗交錯，地瘠民貧，歲賦所入，僅當浙江一大縣，官祿兵餉多仰給他省。苗性強悍，素稱難治。改土歸流後，官吏貪暴，一切供應力役，悉取之於苗民。漢人復侵奪其地，重利盤剝，苗民生計陷於絕境，以致鋌而走險。嘗謂：「吾輩不知何者為反，以兵來則戰，以好來則撫，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惟有強者勝耳。」此為苗疆多事之主因。以往官府所恃的是武力鎮壓，太平軍起，部分戍軍他調，協濟餉銀不至，治安遂不克保。此次事變，通名為苗亂，其實苗人之外尚有夷人、回人、及更多的漢人，不過首先發難，勢力最大的則為苗人。

一八五五年，苗亂起於黔東，張秀眉為首。漢人領導的白蓮教紛起響應。白蓮教支派不一，各以紅、黃、白、青布作為頭巾、衣褂、旗號，有紅號、黃號、白號、青號之別，官方稱曰「號匪」。此外尚有齋教、燈花教、太平教。就中以紅號、黃號、白號為大，分佈於黔東及黔東北十餘縣，與苗聯合後，蔓延及於全省，合計約三十萬人。一八六〇年，石達開部的一支，自廣西進入黔南，與苗教逼攻貴陽。清命湘軍赴援，苗教聞兵至，四散伏匿，兵過復行嘯聚。太平軍平定後，北京從曾國藩之議，命湖南巡撫統籌黔事，由在四川的湘軍策應。一八六七年，西路湘軍平定貴州西北，一八六八年，東路湘軍攻破教黨的根據地荆竹園（屬石阡）。一八六九年，苗軍大敗東路湘軍，惟以久戰無糧，勢漸窮蹙。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湘軍屢勝。一八七二年五月，苗教的根據地台拱、凱里失陷，張秀眉被俘，降者十餘萬，被殺者二萬餘，全黔底定。苗民存者僅十之二，各地城廓田廬亦多變為廢墟，苗人精壯殆盡，漢人亦流離失所，死亡幾半。

二、雲南的回、漢反滿軍

雲南變亂的原因，與貴州畧同，在貴州是漢、苗不和，在雲南是漢、回仇視。回民有信仰，有組織，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識強，與漢

人雜處，風俗各異，利害衝突，相互輕侮忌恨，會黨復從中播弄。回民勢衆心齊，有清真寺公費，緩急相通；漢人亦團練自衛，各出「保家錢」、「買命錢」。法令規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漢、回相爭，往往偏袒漢人，回民不得其平，逕行尋仇報復。一八四五年，滇西永昌（保山）漢回爭地互鬥，官軍助漢攻回，回民死者四千餘。他處回民繼起，燒殺漢人家室，歷久不平。一八四七年，林則徐任雲貴總督，剿辦回亂，懲處滋事漢人，命雙方具結互保，此後七八年間，相安無事。

雲南回教徒中最具聲望的爲大理掌教馬德新，曾赴麥加朝聖，遊君士坦丁堡。洪秀全假基督教自立王朝，他何嘗不可以回教作號召？杜文秀、馬如龍（獻）均入其門。杜文秀爲保山秀才，頗有才畧，永昌變起，親至北京上控，聞見益廣，遂生輕視清室之心。馬如龍爲臨安武生，勇狠好鬥。一八五四年，亂事擴大，回民抗官兵，漢人殺回民。馬德新嗾使回衆，包圍昆明，城內回民數千被屠。雲南西部之亂，繼之而起，一爲李文學領導的夷人、漢人，據有彌渡，以「鏟除滿清賊官，殺絕漢家莊主，」田畝悉歸庶民，不別夷、漢爲口號。一爲杜文秀領導的回民，是年九月，奪佔大理，蓄髮易服，建號「平南」，稱總統兵馬大元帥。他知道漢衆回寡，欲成大事必須聯合漢人，亦要結好夷人。承認「三教（回、漢、夷）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相助相安。「春秋祀孔子，錢帛濟貧民，委鎮地方，回、漢同任，招待賓客，回、漢同席。」所屬官職，漢人居其大半，漢兵十之七八，回兵十之二三。設學校，給耕牛，興修建，建行店，以安士、農、工、商。他說他之舉兵「純爲滿人奪我中夏，傷我同胞，滅我回族，」「但得回、漢同心，以雪國恥。……始則除滿，次則樹漢，三則除奸。」除了宗教信仰與太平軍不同，反滿的立場是一致的。

由於地理的關係，初期杜文秀的重要性原不及馬如龍。馬如龍的勢力距昆明不遠，可以直接威脅省城。一八五七年，昆明二次被圍，數月不解，總督恒春自縊，人民餓死數萬。清廷改取安撫政策，授馬德新以管理雲南清真寺事務之權，回衆陸續退散。一八五九年官軍西

征，杜文秀力不能拒。翌年，馬如龍又攻昆明，西征軍腹背受敵。馬如龍與杜文秀曾有協議，如杜先有省城，馬聽杜號令，如馬先有省城，杜聽馬號令，鹽課均分。馬屢攻省城，杜未相助，反獨佔鹽課之利，馬遂起不平，杜亦對馬生忌。馬餉精不足，練勇更是他的勁敵，既不能佔領昆明，成功可能殊鮮。一八六二年，馬受雲南巡撫的招撫，此為滇亂的重大轉變。從中運用的為岑毓英。

岑毓英原為廣西西林土司，一八五六年，募勇來滇，歷任知縣、知府，馬如龍投降後，岑一躍而代理雲南布政使。馬德新希望取得平南王的封號未成，一八六三年春，召東路回首馬榮，襲據昆明，殺總督潘鐸。岑聯合馬如龍，驅逐馬榮，從此馬德新漸無能為。馬如龍屢勸杜文秀歸順，杜以勢成騎虎，自信縱不能大成，亦可偏安小就。一八六七年，杜乘岑毓英駐軍迤東，大舉東進，昆明附近城池盡為所有。如以雲南情勢而論，十分危殆，但就全局來看，官軍已漸入佳境。中原捻亂已近尾聲，北京以湘謀黔，以川謀滇。一八六八年，授平定黔西的湘軍統帥劉嶽昭為雲貴總督，岑為雲南巡撫。岑回援省城，劉為固後方，各省協餉續至。岑再施其分化政策，說杜的大將漢人李芳園來歸，杜軍大敗，省城四圍肅清。

雲南地鄰越南、緬甸，勢力已進入越、緬的法、英謀乘機擴張利權。久在雲南傳教的法國高司鐸（P. Fenouil）代岑毓英、馬如龍製作彈藥，來自上海的法國軍火商涂普義（Jean Dupuis）為他們購運軍火，設廠造砲，並有法國武官為他們練兵。英人司萊登（Edward B. Sladen）亦自緬來騰越貿易。杜在緬甸開設商號，所以杜軍亦有洋槍，惟不及岑、馬的精利。收復昆明附近諸城後，再度西征，大理勢危。一八七一年，杜遣使前往倫敦，乞援納貢稱臣，但無所成。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盡，降回三萬餘人被殺，李文學亦兵敗被擒。次年，岑部克騰越，雲南亂平，前後十八年。

三、陝甘回與馬化龍

陝甘為漢、回雜處的另一地區。一八六二年，太平軍進入陝西，關

中回勇潰散滋擾，與漢人互相焚殺，渭河南北數百里咸爲焦土，西路及甘肅回紛起響應。清命多隆阿與勝保分由皖、豫赴援，勝保一再失利，革職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肅清東路，解西安之圍，續肅清西路，屠殺極酷，回衆退甘肅。¹

甘回有新教、老教之別，互爭不已，官府左袒老教。馬化龍爲新教首領，與滇回相通。一八六一年，亂事初起於西寧，以馬桂源爲首。翌年陝亂大作，馬化龍舉兵於寧夏金積堡，控有隴北、隴東，稱「總統隴郡兩河（黃河、湟水）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繼起的爲據有河州的馬占鰲，佔有肅州的有馬文祿，甘肅全省僅存蘭州、秦州、鞏昌三府。滇亂爲回、漢聯合，甘亂爲回、漢仇殺。甘肅地本乏糧，加之耕耘廢時，回騎剽疾，出沒隴東，西來官軍糧運時爲所阻，統將又多貪蝕，屢爲回敗，譁潰相繼。清廷不得已，授湘軍將領楊岳斌爲陝甘總督。楊原統水師，用違所長，一籌莫展。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七年，蘭州兵變，同時捻衆西來，陝回再起，以白彥虎等爲著，與馬化龍相結。甘肅土寇董福祥聲勢亦大，蹂躪陝北，關、隴全境幾乎不保。於是左宗棠代楊岳斌。

左的戰畧爲「剿捻宜急，剿回宜緩。欲清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官軍無後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一八六八年，左自陝回師，追擊西捻。及西捻蕩平，重返西安。西北用兵最感困難的爲無法就地取給。左原擬「且防且剿，且戰且耕。」事實上不易做到，仍賴東南、華中諸省協濟。復向上海洋商兩次借款三百四十萬兩，由海關擔保攤還，用以購置洋槍。²左先靖陝北土寇，降董福祥，繼破隴東陝回。³

一八六九年秋，左軍進攻金積堡。金積堡形勢險要，周圍堡寨四百餘座，北經蒙古，交通俄人，輸入洋貨、槍砲。回衆拼死力戰，左軍屢攻不下，大將劉松山陣亡。一八七一年一月，馬化龍糧盡，請降，

¹一八六四年，多隆阿進攻來自四川的藍大順於鼈屋，受傷而死。

²主持人爲胡光墉。

³湘軍中多哥老會黨，關中甫平，左軍因哥老會的煽動，相繼在陝、甘之交譁變。

被凌遲處死，甘回瓦解。一八七二及一八七三年河州及西寧回降。一八七三年，左收復肅州，屠回民七千餘，甘境肅清。此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進軍新疆。

四、阿古柏併據新疆

清朝對新疆的措施，天山南路不同於北路。北路本為蒙古游牧之區，征服準噶爾後，各地設官駐兵，實行軍屯，招兵承墾，開置郡縣，分立義塾學校，漸與內地無殊。南路為回民居住之區，城市佈列，人口較密，文化俗尚，自成一格。回部平後，戍卒商民概不得携眷，有賈販而無耕戶，有武員而無文吏，仍沿舊制，置柏克(Beg)以治轄境人民，惟不得世襲。對於回民信仰風俗，採放任政策，柏克判斷詞訟，一依其教規，不從國家法令。漢人赴回疆者須持有護照，寓居漢城，使回、漢隔離。表面上回民似享特殊待遇，實際則不能與蒙、藏並論。回教的和卓(Khodia聖裔)，既無西藏喇嘛的崇高地位權利，亦不能與蒙古的王公相比。滿、蒙互為嫁娶，蒙人之居軍政要津高位者，指不勝數，回人無此幸運。加之官兵貪橫，益使憤怨。同種同教的中亞汗國，從而構煽，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後裔伺機而動，無時不思恢復其故有權位。

陝、甘變作，新疆孤懸塞外，接濟不至，東干回(陝甘之漢、回)西來鼓誘，大亂隨之爆發。初期以一八六四年起於庫車的纏回布格聶丁(Burghanuddin，即黃和卓)之勢力為大，西併阿克蘇、烏什，東有喀喇沙爾(焉耆)，稱東土耳其斯坦王。同年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回繼為亂，此為南路的大勢。北路的東干回以烏魯木齊(迪化)為中心，其首領妥明，與馬化龍相通。庫車亂起，烏魯木齊官軍赴援挫敗，妥明乘機舉事，屠殺官民二萬餘人，東西各城先後為其所有，號清真主。伊犁應之。一八六六年諸城悉陷，將軍以下死者數萬。塔爾巴哈台於同年失陷，東部的哈密旋失旋得，全疆未陷者巴里坤(鎮西)一城而已。

舉兵於喀什噶爾的為金相印、思的克(Sadic Beg)，以攻城不下，

乞援於中亞的浩罕。時浩罕王數敗於俄人，無力以大軍爲助，命阿古柏（**Yakub Beg**）奉張格爾（**Jehangir**）之子布什爾克（**Buzurg Khan**）前往。張格爾爲回疆大和卓之孫，道光年間曾據南路，兵敗被俘，但威勢仍在。一八六五年一月，阿古柏至自安集延（**Andizhan**），沿途應者頗衆，一舉而佔有喀什噶爾，東敗黃和卓，衆約一萬五千人。翌年，兼併葉爾羌。一八六八年，阿古柏廢布什爾克，自稱回疆國王、幸運汗（**Batauter Khan**），成了東方回教徒的英雄。其後續有和闐、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各城，與北路的妥明分有新疆。一八七〇年，妥明來攻失敗，吐魯番亦爲阿古柏所有，妥明投降，阿古柏控有天山南北。前應妥明之約自陝、甘西來的白彥虎，亦歸阿古柏。

阿古柏在新疆擴張之時，正爲俄國積極經畧中亞之時。阿古柏與俄國均不願多方樹敵，一八六六年雙方成立諒解，互不相犯。一八六八年，俄軍破布哈爾及基窪聯軍，滅布哈爾，命阿古柏稱臣。阿古柏素惡俄人，曾參與中亞回教汗國的抗俄戰爭，一度受傷，這時他的祖國浩罕又受到俄國威脅，拒絕了此一要求，轉與英國通好。印度的英人得總督支持，前來喀什噶爾，贈以軍火。是後四年，彼此使節往來不斷。阿古柏亦曾派人赴俄交涉，未得要領，所以仍留妥明於北路，以作對俄緩衝。一八七一年七月，俄軍佔有伊犁以制阿古柏。次年六月，阿古柏被迫與塔什干總督濶幅曼（**Von Kaufman**）訂約，許俄人通商新疆，俄國承認阿古柏爲東土耳其斯坦首領。

阿古柏對於俄人的商務活動，多方阻撓，同時廣結與國。一八七三年遣使土耳其，奉爲上國，接受東土耳其斯坦愛密爾（**Amir**，即聖裔）的封號。一八七四年二月，復與印度總督的代表福錫特（**T. D. Forsyth**）訂約，允英國通商，派設使領，英國承認他爲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地區的愛密爾，亦即祇承認他是天山南路西部的統治者，而不及東部與天山北路，以免刺激俄國。英國對新疆的貿易頗爲興旺，俄國受到打擊，準備武力對付。惟一以一八七五年浩罕戰爭發生，不得不先其所急；二以阿古柏與英國交密，勢須出以慎重；三以左宗棠已動員西征，不妨暫觀其變，相機而行。

五、左宗棠的遠征

關、隴戡定之前，清廷無力顧及新疆，及肅州克復，左宗棠即奏籌出關，詔命各軍西進。適日本侵犯台灣，東南吃緊，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當外交之衝，認爲日本爲中國大患，主張暫停西征，節餉以備海防。李係就經濟時勢立論，謂平時新疆年需兵費三百餘萬兩，縱令收復，徒增今後漏卮，殊爲不值。況新疆界於英、俄及各回國之間，斷難久守，阿古柏與英、俄相結，皆不願中國得志。目前兵力財力，萬不能及此，且慮別生他變。惟有嚴守現有邊界，招撫新疆回首，准其自爲部落，畧奉中國正朔。「新疆不復，與中國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另有所見，謂目前海防並不急於塞防，停兵不進，劃地而守，不惟兵餉不能裁減，無益海防，反同自撤藩籬。中樞大臣文祥深贊其議，遂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命左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於新疆久有認識，屢言他之所以以六十有五之年，毅然負起此一艱鉅之任，實爲國防前途計。「中國盛世，無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俄人擴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

左宗棠之經營陝、甘，全恃東南各省的接濟，得之於上海、廣州海關者尤多，但不能如數解撥，積欠達二千七百餘萬兩。現在遠征天山，需費孔急，上諭命每年協餉五百餘萬兩，而實解不足三百萬兩。一八七七年，左宗棠請續借洋款一千萬兩，李鴻章與兩江總督沈葆楨均不謂然，結果僅得半數，另由戶部於庫存關稅項下提撥二百萬兩。翌年，又借三百五十萬兩，一八八一年再借四百萬兩，共計一千二百五十萬兩，均由海關擔保。甘肅產糧無多，無力供應大軍，哈密屯田所得有限，且緩不濟急，不得不分地採購。一爲河西；二爲口北，即歸化、包頭、寧夏；三爲關外，即新疆東部；四爲俄國，實際來自伊犁。河西之糧由官民分運，逐段接遞；關內用騾車、馱驢；關外用駱

駝，兵卒並隨帶生薯，既可止飢，又可解渴。口北之糧由商人負責，全用駱駝。道路關係運輸、行軍極大，左初至陝西，即修築潼關至西安一段，然後接至蘭州，以迄玉門，沿途栽植楊柳。玉門以西，工程最爲艱難。兵力編配，尤費苦心。因爲道遠運艱，不能用衆，必須汰弱留強，以湘軍爲主，輔以豫軍、皖軍、甘軍、蜀軍，共約七萬，一部分使用西洋軍火，俱於上海採購，大都來自德商泰來洋行(Telge and Co.)，借款亦與該洋行有關。復以玉門以西，水草奇缺，只好分批行軍。凡此均可見用兵新疆之不易。

更棘手的爲國際的牽制。英人力圖與阿古柏結好，冀使回疆變爲印度的外圍，不願中國的勢力重行進入。一八七六年，英使威妥瑪恫嚇李鴻章及總理衙門，謂阿古柏「雄桀能軍，與俄人狼狽一氣，左軍殊難制勝，」最好認爲藩屬。左堅決反對。北路收復後，英外相又屢與中國駐英使臣郭嵩燾相商，主回疆別立一國，尊中國爲上國，左仍執不可。當左軍順利推進之時，上海英國報紙反捏造挫敗的新聞。俄人初欲假手左軍，直接打擊阿古柏，間接打擊英國，消耗中國的力量，使兩敗俱傷。左軍動員之初，俄國軍官曾至蘭州，對左佯示友好，謂一俟中國收回北路，即交還伊犁，並願代置辦糧食。及阿古柏戰敗，俄人反濟以軍火，不再以糧食轉售左軍。左的勝利似出乎俄人預料之外，此後不惜多方與中國爲難。

一八七六年四月，左的大營自蘭州移設肅州。他的戰畧爲「緩進速戰」，先事充分準備，再相機猛攻。阿古柏利用陝回白彥虎與妥明舊部守北部，而以主力守南路。八月，左軍大破白彥虎，乘勝收復烏魯木齊。阿古柏集重兵二萬餘於吐魯番，翌年，復敗。五月，阿古柏死，回衆內訌，已成崩潰之勢。阿古柏之子伯克呼里(Beg Kuli Beg)西走喀什噶爾，左軍連復南路各城，十二月，克喀什噶爾，伯克呼里、白彥虎遁入俄境。左遂收復了淪沒十三年的新疆。

左之得以順利的成功，一以阿古柏雖稱善戰，兵力財力終屬不足，本地回（纏回，即維吾爾回）不堪阿古柏的搜括，復與東干回不和，人心思漢。二以他未能獲得切實的外援，英國爲地理所限，又顧慮俄

國，僅給以有限度的外交與物資支持。俄國欲坐收漁利，雖曾助以軍火，但阿古柏敗局已成，俄國牽於中亞及土耳其之戰，不欲再捲入新疆之事，以免引起與中國之爭。三以左宗棠意志果決，計劃周密，清廷全力支持，湘軍主將劉錦棠又善於用衆，卒能使生長於魚米之鄉的湖湘子弟揚威於風沙漫天、冰雪載地、石田千里的西域。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中國經過二十八年的全國性與局部性的變亂，直接蒙受災害的當然是人民。滿地瓦礫，遍地白骨，喪失生命財產幾何，不易得知。人煙稠密的長江流域，爲太平軍與清軍往復爭奪燒殺之區，湖南爲時約四年，湖北約五年，江西約八年，安徽、江南約十二年，浙江約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廣西、廣東爲久，次爲四川、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直隸，多則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戶口有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時溫飽之家，大半成爲餓殍。號稱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餘萬減至數萬。皖南「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黃蒿白骨，並無居民市鎮，竟日不見一人。」江西數百里「不聞鷄犬聲，惟見餓民殞斃於道。」曾國藩謂「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我們不妨說各居其半。有謂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五年十四年間，中國人口之死於戰亂者，至少爲二千萬或五千萬，雖不一定正確，恐亦相去不遠。據官方的統計，一八五一年江蘇人口約爲四千四百三十萬，浙江約爲三千萬；至亂後十年，即一八七四年，江蘇約爲二千萬不足，浙江約爲一千一百萬不足。如屬可信，此兩省人口已減少四千餘萬。安徽、江西所受戰禍不亞於江、浙，人口的死亡當亦不少於江、浙。數十年後尙未能恢復以往的盛況，依然是殘破蕭條。

至於西南、西北，亂前雲南人口約爲七百五十萬，亂後據說僅存三百萬，死亡百分之六十；貴州亂前約爲五百四十萬，亂後約存三百

三十萬，死亡百分之四十。陝西亂後，城邑堡寨，民靡孑遺，回人原有數十萬，除西安城內的二三萬外，餘均盡族西去。亂前全省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亂後十年，仍僅八百萬。甘肅原來漢多於回，亂後回多於漢，隴東千里荒蕪，炊煙斷絕。固原州城，漢人存者不過十數，靈州不過數家，寧夏幾無遺類。河西肅州城中漢民原三萬餘，被回人先後殘殺，存者僅一千一百餘口。回人死於兵戈者，亦不在少數，官兵每克一城，屠戮輒以千計。通省漢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亂前人口爲一千五百萬，亂後不足二百萬，雖未必屬實，死亡的數目恐在半數以上。

大亂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亦至重大。顯而易見的爲正規軍的沒落，代之而興的爲地方練勇，即湘軍與淮軍，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雲南的岑毓英，甘肅的馬占鰲。八旗軍久已空有其名，綠營亦驕頑腐敗。江南大營兩次陷落，其主力幾乎全部崩潰。保衛湖南，肅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復金陵，底定閩、粵的爲湘軍，平定江南、閩南，及捻亂的爲湘、淮聯合軍。至於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的底定，固均湘軍之力，雲南的底定湘軍亦與其役。簡言之，二十餘年大亂之削平，無一不賴湘、淮軍，尤其是湘軍。清的統治之得以續延五十餘年，可說是湘、淮軍所給予，但是清的權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恃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蹤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軍留防，成爲勁旅，稱爲「勇營」。綠營益同虛設，因就中選擇訓練，編制、餉章，悉仿湘、淮軍之制，名曰「練軍」，始於直隸，各省相繼踵行。此爲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實綠營與湘、淮軍互有利弊，綠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非將有，爲國家的軍隊；但官不久任，兵爲世業，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團結不堅，指揮不靈，白難言戰。湘、淮軍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則是國家的武力變爲私人的武力，而以淮軍爲尤甚。湘軍的領

袖多爲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爲向背，不惟王鑫、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爲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爲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攝。繼承他的衣鉢的爲袁世凱。

湘軍餉糈來自捐輸、釐金、鹽課，多由自籌，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軍將領初任巡撫者，除甫抵任即戰歿的安徽江忠源外，僅一湖北的胡林翼。清廷雖採以漢制漢政策，而對於轉戰七年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不給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至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始不得不授以殘破的兩江。及浙江糜爛，復命兼辦浙江軍務。此後七年之間，湘軍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廣西巡撫劉長佑，旋升直隸總督，安徽巡撫李續宜，浙江巡撫左宗棠，旋升閩浙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後署兩江總督，遷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劉坤一，廣東巡撫郭嵩燾、蔣益澧，陝西巡撫劉蓉，湖北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李瀚章，雲南巡撫劉嶽昭，後升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楊岳斌。他如河南巡撫嚴樹森，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湘軍亦有相當淵源。湘人「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自一八七〇年起，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位居督撫之首，擁有數萬新式訓練裝備的淮軍，分駐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廠，國防外交，一歸其經劃。一八六〇年以前，督撫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漸減少，最後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雖非盡屬湘、淮系統，而湘、淮將領實奠其基。他們握有地方軍政財大權，不僅爲漢、滿權力消長的關鍵，亦爲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關鍵。當然中央的一紙命令，仍可決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有顧慮，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

第六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

(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一、慈禧、恭親王的聯合政變

咸豐原非有爲之主，又值內外多故，憂鬱焦慮，束手無策，厭於政事。一八五五年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至一八九八），遭忌被黜，兄弟失和，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用事，端華之弟肅順尤得寵信。肅順恃才傲物，對外主張強硬，西人目爲排外者，對內以嚴爲尙，勢焰薰灼，怨毒繁興。恭親王是他的主要政敵，次爲貴妃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后（一八三五至一九〇八）。

那拉氏初以秀女入宮，漸晉至嬪。皇后鈕祜祿氏無出，一八五六年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豐的獨子，獲封貴妃。她有權力慾，又畧通文墨，常代皇帝批答奏章，但並非獨擅恩寵，且受肅順裁抑。咸豐出走熱河時，不得已，命恭親王留京辦理撫局，似有意給他難題，結果是給他一個再起的機會。中外和議後，他的聲譽驟隆，謠傳外人將擁他爲帝。他與留京其他大臣，奏請回鑾，謂外人並非爲爭城奪地而來，不至心存叵測。咸豐深懼再受挾制，如率意而歸，必將去而復返。肅順亦說夷情反覆，竭力阻止，欲久留熱河，以便把持。恭親王又請前來面陳，亦未邀准，益與肅順水火，王大臣中儼然形成熱河、北京二派。時咸豐病劇，皇子載淳年僅六歲，雙方均在作奪權準備，那拉氏更恐一旦母子成了孤兒寡婦，受制於肅順等。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豐卒，載淳繼統。先一天，授載垣、端華、肅順及御前大臣、四軍機大臣爲贊襄政務大臣，¹總攬朝政，實

¹御前大臣爲額駙景壽，即咸豐的姊丈，四軍機大臣爲穆蔭、杜翰、匡源、焦祐瀛。

由肅順主之。事前多以為恭親王必當輔政大任，他自己亦存此念，不料竟然落空。文祥是他的心腹，又為不在贊襄政務內的唯一軍機大臣。那拉氏母以子貴，此時與皇后鈕祜祿氏均為皇太后，¹不甘聽人擺佈。恭親王奏請叩謁粹宮，兩太后正欲和他面商，如何排去肅順等。恭親王在熱河停留六天，單獨進見兩太后，堅請速歸，力保外人無異議。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因恭親王的聯絡，亦同此請。因為肅順的黨羽佈滿熱河，必須待回京後方好處置。咸豐臨歿時，曾授皇后與那拉氏印章各一，可代硃筆，無疑默許她們問政。九月十四日，董元醇之奏請太后垂簾，似非無據，亦可能是出於在京大臣的授意。肅順等謂清朝向無太后聽政之禮，擬旨痛駁，兩太后無如之何。

十月四日，大學士桂良等奏上兩太后徽號曰慈安、慈禧。十一月一日，兩太后與新皇帝自熱河返抵北京。這時恭親王已有部署，第二天，擊問載垣、端華、肅順，其他五贊襄政務大臣革職。勝保奏請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羣臣，另簡親王佐理庶政，盡心匡弼。」大學士賈楨、周祖培等合疏請太后「操出治之威權，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慈禧定要名實兼居，命折衷古今制度，妥議垂簾之儀，授恭親王為議政王兼領軍機處，恭親王的親信桂良、文祥、寶鋆等為軍機大臣。這應是交換條件。十一月八日，殺載垣、端華、肅順。十一日，新皇帝即位，年號同治。二十八日，宣布垂簾，十二月二日，正式實行。兩太后性格有別，時人謂「東宮（慈安）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西宮（慈禧）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詔對時諮詢利弊，悉中窳會。東宮見大臣訥訥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西宮太后秉性機敏，銳於任事，東宮太后悉以權讓之。」從此國之大政，漸入於慈禧之手。

政變出於肅順等的意外，自以為全權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滿三十歲的太后與恭親王之敢於有何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為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為勝保。更大的關鍵則為外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卜

¹皇后居鐘粹宮在東，那拉氏居儲秀宮在西，通稱為東太后、西太后。

魯斯。他不喜肅順，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清正人物，多方對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執掌大政。英使館的祕書威妥瑪亦云卜魯斯可給他以任何援助，對新皇帝及皇太后回京，決無冒犯之事，恭親王方敢採取斷然處置。上諭宣佈載垣等罪狀之一為「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各國。」這顯然是對外人討好，上海英國報紙，頗表欣慰。卜魯斯自云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維持友好關係使然，此一令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在某種程度上，英國人已成爲這個政府的顧問。

恭親王與慈禧的合作，是相互爲用，恭親王欲假垂簾之名，自操實權；慈禧需要恭親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敵。垂簾之始，慈禧亦知於理不順，權力未固，政治經驗欠缺，外交軍事均不能不借重恭親王。恭親王自恃功高，不免專斷，彼此衝突，終不能免。南京克復的第二年，即以妄自尊大、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的罪名，革去恭親王的一切差使。無異又一次政變。親藩樞臣羣起力爭。慈禧以既誅怡親王載垣等，今又罷黜恭親王，深慮皇族宗室解體，內外心危。曾國藩得知消息之時，即「嘆訝良久，惴慄之至，忡忡不能自克。」慈禧所更顧慮的仍是外人的態度，恭親王「夙主和議，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機要劫，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數日後，復命重值軍機處，惟議政王的名義，則從此撤消。彼此意見愈深。¹

二、恭親王的時局認識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恭親王領導中樞後，急待應付的仍爲軍事及外交問題。前者付之曾國藩，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雖有聯絡安撫作用，事勢亦不得不爾。是後五個月內，先後授曾

¹慈禧寵信的太監安德海久爲恭親王所惡，常搬弄是非。太監例不得出京，一八六九年，安德海奉慈禧之命，赴江南辦理織造，恭親王命山東巡撫丁寶楨捕拿，毋庸訊供，就地正法，慈禧無如之何。

國藩爲協辦大學士，擢湘、淮軍統將左宗棠爲浙江巡撫，李續宜爲安徽巡撫，曾國荃爲浙江布政使，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後者由恭親王自任。他對於世界大勢，原少所知，在英、法兵臨城下，強敵壓境，天子播遷，京師不守，事機間不容髮，存亡繫於旦夕的情勢下，他與英、法使臣照會來往，忍辱負重，艱辛備嘗，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雖惟外人之命是從，總算保存了清朝的政權。他性頗聰敏，復有與外人周旋兩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幹練的文祥作他的輔弼，同時外人又多方開導，從此次的痛苦經驗中，獲得了相當教訓和觀念，決定了今後因應的方針。

第一，對於中西關係有了新的了解。他說，自南京訂約，夷情嗚張，「至本年（一八六〇）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各夷以英國爲强悍、俄國爲叵測，佛（法）、米（美）從而陰附之。」法人貪利，美人「性質諄厚」，俄有侵佔疆土之志，英則志在通商。「換約之後，該夷（英）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爲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稍異。」從前屢戰屢和，迄無定局，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在內無深知夷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中外交往已爲不可避免之局，不能再事固拒。對於外邦，不外戰、和兩途，「剿（戰）亦害，撫（和）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易言之，宜和不宜戰，諸事按約而行。兵部尚書沈兆霖同歷此次事變，事後亦云，「外兵雖衆強，其意不過藉以脅和，」否則入京之後，即可爲所欲爲，但竟「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彼等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第二，外人似頗有心爲善，不妨相機妥爲利用。俄人首先表示，願派兵船會同中國陸師平亂，並願與美人採辦米糧，以濟京師。法人亦有此請。曾國藩以爲此舉目前困難尚多，自後貽害無窮。恭親王等對於俄、法用心亦多顧慮，英人更是疑忌。事雖未成，但一八六〇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實賴洋兵之力。清廷原堅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來，英人一再詆譭太平軍。一八六一年巴夏禮告上海士紳，英軍願保衛上海、寧波，攻取南京、蘇州。繼又面告恭親王，太平軍斷無成

事之理，但是官軍餉項不足，船砲不利，亦不易勝。恭親王本有「妥爲牢籠，使爲我用」之意，一八六二年，遂決定借洋兵助剿。他雖知洋人係爲自身之利，雖確可爲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於近年「駕馭得宜」的結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關，可吞不吞，稅收悉行交出，使軍餉充裕，辦事的屬公正。

第三，今後國事，必須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計。洋人雖講信義，甚至「睚而就我，」要知「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其害則實相同，」「外憂與內患，相爲倚伏。」洋人目前尚稱安靜，太平軍勢已衰頹，正應及時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所需經費，可於海關提解，以收夷之稅，爲練兵之需。練兵須先有利器，自洋人構釁以來，內患外侮並至，不盡由於中國不善治兵，乃因「有制勝之兵，無制勝之器。」人多知英、法諸國「惟恃船堅砲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何以堅，砲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祕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李鴻章已在上海雇覓洋弁，教練兵勇，並購求洋匠，製造夷器，應托名平亂，加以推廣。「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阻撓。」趁此「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械火器，實力講求，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爲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所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窺其取勝之術。」「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時爲一八六四年，自強運動已經展開。

恭親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員亦有同感。編修趙樹吉奏稱，中外和議並不可恃，唯一辦法在求所以自強之術。「誠能日夜祇懼，奮發有爲，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悍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爲強，此中國無疆之慶。」御史魏陸庭說得更爲具

體，謂火器爲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爲最精。西洋以商販爲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爲暢流。應向各國價購火器、輪船，並在上海等處設局學習、演放、駕駛，先掃清長江，再攻堅城。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就原則而論，恭親王等的看法，與二十年前耆英的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的國防主張，無大出入。不過二十年前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漸形成一種運動。固由於外患轉烈，而所重實在平亂安內。

三、曾、李、左的主張

中樞主政者倡導於內，各省有力督撫同時呼籲於外。恭親王、文祥的主張爲外交與軍事並進，以曾國藩爲首領，李鴻章爲中堅的疆吏的意見亦屬相同，一面信守和約，一面力圖自強。他們所重視的偏於軍事，此與他們的目前直接需要有關。曾國藩練兵之始，即於廣東購置洋礮，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長沙、武昌有專人製造，湘軍之肅清兩湖，多得力於洋礮。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席卷江南，但於進攻上海之時，數萬之衆，竟敗於千餘的英、法軍，外人訓練的洋槍隊，同稱能戰。素號北方勁旅的僧格林沁部，一與英、法軍接仗，即潰不成軍。凡此均足以發曾國藩的深省。是年十二月奏稱，中外和議雖成，決不可忘備，須師法外人之智，製礮造船，以期永遠。約在一八六一年三月，胡林翼在安慶江岸，目覩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爲之色變嘔血，可見輪船給他的刺激之深。八月，曾國藩籌議購置船礮，力言此爲今日救時第一要務，不僅應陸續購買，且當「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不久輪船必爲官民通行之物。安慶克復後，精習科學製造的華蘅芳、徐壽、李善蘭、張斯桂等均爲他所延攬。一八六二年六月，他在日記中論到自強之道，認爲「學作炸砲，學造輪船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長，在炸砲、輪船，中國應取法的即在於是。

李鴻章久居曾的幕府，東援上海的前夕，已決心「用夷變夏，圖與番酋無為畦畛，而求自強之術，」力邀深通洋務的郭嵩燾為助。淮軍得以順利的通過太平軍領域，全賴英國輪船運輸，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輪船的第二位中國高級官員。¹他在輪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書曾國藩，稱道洋兵隊伍之整、炸砲之準，每遇攻戰，「槍砲齊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如神技，」令淮軍將弁，隨隊學習，這是他的親歷目觀。又說：英國「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一切裝備，皆中土所未見。」他「深以為中國火器遠遜外洋為耻，日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久駐上海，不能取資洋人長技、悔咎多矣。」一八六三年，復屢向曾國藩論及，謂外國餉足而兵少，一萬人即可當大敵。中國兵多數倍，而不易收功效，實由槍砲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亂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年俄國、日本學得西法，槍砲輪船漸能效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國如亦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在與友人書中，亦謂中國通商利權，已為外人所操，無可禁阻，但望大亂早平，講求戎政，痛改陋習。使我能自強，外人尚不致覬覦，否則後患當不可思議。可見曾、李的倡導自強，不只是對內平亂，亦為對外自衛。

李鴻章頗望曾國藩領導此一運動，曾氏自謂洋務未曾諳究，性復謹飭，謙退不違。兩年餘來，李與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認識益明，益知欲圖自強，必須學西人製器之器，欲學其製器之器，必須變通舊章。一八六四年致書恭親王，發揮他的主張，議論更為透徹。原書畧云：「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淪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噴外人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

¹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廣州乘輪船去香港。

事則驚外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爲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爲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爲國家利用者，以爲顯宦，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其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尙世習之，必求通而後止。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爲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研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砲。……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尙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所謂製器之器就是機器，初意在製造槍砲彈藥。第二年太平軍大致弭平，李進而論及機器與民生經濟的關係，謂「西洋機器於耕織、印刷、陶埴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爲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於鴉片戰爭。及進軍浙江與法人接觸，對於西洋軍事所知愈多，已有仿習之志。太平軍平定後，復因法人的啓迪，建議中樞，羅致人才，籌措經費，以製造輪船，整理水師。「泰西巧，中國不必安於拙，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以實。謂我之長不如外人，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何況「善因者究易於善創。」

四、馮、郭的見解

乾、嘉時代的學者，多致力考證與理學。道光後期，士風漸變，

先是注意到國家的內在危機，繼復注意到外來的禍患，認為必須有所更張，取人之長（見81—82頁）。英法聯軍之役，給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尤大，對於洋務的認識日益深刻。馮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燾（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為代表人物。馮桂芬早年受知於林則徐，咸豐末年，避難上海。一八六一年著《校邠廬抗議》，論中國自處之道。他說：「今既和議，宜一於和。……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須及時自強。中國之不如西洋者，為人無棄材，地無遺利，軍民不隔，名實必符。既須反諸求己，亦須取法於人。「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以軍旅論，中國之不如人者，為船堅砲利，應設特科以獎才能。通商各口設船砲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衆匠。……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或曰購船雇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為無弊也。」曾國藩指為「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李鴻章仍據以勸說恭親王。

郭嵩燾二十二歲時身預浙東鴉片戰爭，意氣慷慨激昂。戰後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邊患，皆由措理失宜。」他與馮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時又須明勢，「勢相激而理隨之易，」「順必然之事者理也。」歷史是變的，當適時應世。一八五六年遊上海，益驚佩西人強富，於勢理之認識愈明。第二年廣州事變發生，他以翰林資格入京，欲有所建白。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師盛倡主戰之論，他獨謂「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一八五九年，協辦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兵，」「僧不之聽。及僧軍大捷，人人稱快，郭反引以為憂，深痛中國與西人交接二十餘年，迄未獲得教訓。郭對外始終謂應通洋人之情，審勢循理，濟之以誠，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談練兵製器，馮則外交軍事並重，影響李鴻章頗鉅。

第二節 前期的洋務

一、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

一八六〇年北京議和之後，恭親王等所重視的事，為今後如何與西人相處，以求彼此相安。鴉片戰前，海上國家的對華貿易，歸廣東當局處理。五口開港，中外商務分歸兩江、兩廣總督主持，而以兼有欽差大臣銜的兩廣總督為重心。英、美、法的外交代表駐香港、澳門或廣州，遇事不易和他們商談，久已不滿，希望能與北京直接往來。此為修約要求的由來，亦為第二次戰爭原因之一。

戰後英、俄、法、美四國公使正式駐京。按照中俄條約，俄使可與軍機處來往，他國公使當然可以援行，但非清廷所願。因為軍機處掌理最高軍政，不惟涉及機密，亦有關體制。再者，今後中外交涉益繁，必須悉心經理，專一其事，期能合乎機宜。恭親王等考慮的結果，擬訂《辦理通商善後章程》六條，其中之一為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並派軍機大臣兼管，庶免歧誤。應置司員，分別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挑取，輪班入值。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詔如所議，派恭親王與桂良、文祥辦理。此為中國專設外交機構的開始，亦為關於新政的第一項措置。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恭親王以中外交涉不限於通商，為免外人滋生疑慮，對外簡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刪去「通商」二字，通稱為總理衙門，再簡稱為「總署」或「譯署」，性質與軍機處頗多相似之處。其一，兩者均為臨時組織，並非正式官署，擬俟外國事務較簡，即予裁撤。實際上今後洋務日多一日，終成為永久機構。其二，兩者的組織均為委員制，各有首領一人，大臣均為兼任，司員由他處調用。總署大臣初為三人，僅文祥為軍機大臣。稍後恭親王、桂良均入軍機處，續加入的寶鋆亦係軍機大臣，總署與

軍機處幾成一體。軍機大臣通常四至六人，總署大臣常在十人左右。其三，兩者的名實均不相符，軍機處原司用兵機密，後成爲一切政令之地。總署原司中外通商交涉，後成爲洋務的總匯，商務、教務同歸辦理；海關、輪船、火器、學堂以及鐵路、電線、礦務、海軍等，凡與西洋有關的新政，亦無不由其籌劃主持。簡言之，同、光年間的自強事業，俱屬於總署，成敗亦繫於總署。恭親王主持總署約二十四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在此期間，軍機大臣兼值最久的爲文祥（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六）、寶鋆（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後爲沈桂芬（一八六九至一八八〇）、李鴻藻（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四），文祥又爲早期的關鍵人物。

恭親王等擬訂的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中有一條爲南北口岸分設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莊，南迄瓊州，地方遼濶，如仍俱歸原設的五口欽差大臣辦理，「不獨呼應不靈，各國亦不願從。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紮辦理，尤恐諸多窒礙。」時五口欽差大臣，已由廣州移置上海，先由兩江總督兼任，旋由駐上海的江蘇巡撫署理。天津開埠後，以直隸總督不能專駐該地，將天津、牛莊、登州三口合設一辦理通商大臣，遇有要事，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奉天府尹辦理，通稱爲北洋通商大臣。舊有五口及新增長江沿海各口，仍令駐上海的欽差大臣辦理，通稱爲南洋通商大臣。

通商大臣的設置，除上述理由外，尙別有用意。一則各口事務如有專人辦理，總署既可減輕負荷，必要時復可用作緩衝。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辦理，駐京公使，將無事可爲，日久或自行退去。一八七〇年以天津對外交涉日繁，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以直隸總督爲欽差大臣，所有洋務、海防事宜，均歸經營，每年春間移駐天津，冬令再回保定。這時直隸總督已爲李鴻章。同年命兩江總督曾國藩充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從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兩江、直隸總督的固定兼職。畿輔爲重鎮，直督爲疆吏領袖，李鴻章又久於其位，北京倚爲干城，北洋的重要性遠在南洋之上。北洋大臣大都爲出身淮軍系統的人物，南洋大臣大都爲出身湘軍系統的人物。

二、赫德與海關

新政或洋務的推動，直接間接皆受了西方的刺激和啓發。以個人而論，關係尤大的應推赫德（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不論其動機如何，而其影響則不可否認。

赫德（Robert Hart）爲愛爾蘭人，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貝爾法斯特（Belfast）皇家學院，習語文、哲學。一八五四年來香港，受知於總督包令。初任寧波英領事館助理翻譯，一八五八年調廣州領事館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員會秘書。翌年，任廣州領事館翻譯，轉粵海關副稅務司。一八六一年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因醫治舊傷，請假返英，自行指派江海關稅務司費資賴（G. H. Fitz-Roy）與赫德共同代爲負責。費資賴不通中文及中國事情，實際歸赫德主持。李泰國時年二十九，赫德年二十六，這兩位青年均長於行政組織，但性情大不相同。李泰國狡悍跋扈，陰狠自大，赫德比較和易，事理明達。是年六月到京，先見文祥，繼謁恭親王，報告徵收情形及今後應採辦法。又建議購置兵輪，入江助剿。文祥、恭親王對他的印象極佳，正式委他代辦總稅務司事務。長江開埠，本應俟亂平之後，因赫德之請，提前辦理。湖廣總督官文之得知北京政變消息，即來自赫德。一八六三年，李泰國去職，赫德實授總稅務司，直至一九〇八年。

清朝海關行政一向操之於與內務府有關的人員，營私吞蝕，弊竇叢生。五口通商後，對內蒙混如故，對外復乏知識，外商乘機偷漏，以多作少，虛報貨品，常將貴重者列入價廉者之內，甚至全部走私入口；土產出口，亦常概不報驗。由商人兼任的各國領事，與之互通一氣，以至每年數百萬兩的正額無法徵足。一八五四年，上海海關由外人代理，一八五九年洋稅務司制度正式成立。李泰國曾擬訂海關行政計劃，及新關開辦章程，規模漸備，恭親王給他的劄諭說明總稅務司的職責，一爲幫同海關監督辦理各口岸海關事宜，一爲考核海關洋員功過。據赫德估計，今後每年可得一千萬兩。¹一八六四年赫德與總署

¹時各關每年所收近七百萬兩，一八七一年後，超過一千一百餘萬兩。

議定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赫德有任免關員的全權，總稅務司衙門自上海遷設北京。洋員包括正副稅務司、幫辦、扞手，除極少數的法、美、德人外，悉為英籍，雖係以個人才學為準，亦與他們國家的貿易額有關，各國公使力事爭取。稅務司總攬一切，關監督形同虛設。七十年代，洋員共約四百人，旋達六百人，薪金總數至百萬兩以上。每一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六千兩，或九千兩，副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三千六百兩，助理自九百兩至三千兩。¹ 低級人員如書辦、文吏、通事等為華人，年薪僅二三百兩至一二千兩。洋員估價驗貨，往往不盡不實，陰袒外商，復常為其本國搜集情報，並非盡忠於職守。

李泰國時期卜魯斯已說，此一外人管理海關制度，不但可保證中國稅收，並可保障英國利益，又可作為中國的外交顧問，供給英國情報，無形中左右中國政府。赫德期間，稅收逐年上增，十餘年後，每年達二千萬兩，為最可靠的財源。同治年間，新政的經費，十九取之於此，中央與疆吏對他信任有加。他的影響力量更大，新政的舉辦多出於他的建白。恭親王、文祥遇事徵詢他的意見，有時任用督撫亦和他商量，外交問題，自不待言。他如新式教育及郵政亦歸他兼管，最大的權力仍在財政。關稅所入，先扣除賠款外債。一八六〇年對英、法的賠款，除一百三十萬兩由戶部及直隸、廣東支付外，餘悉於各海關稅項下提四成攤給。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上海所借的外債六十三萬兩，一八六二年及一八六四年福建所借的六十五萬兩，一八五七及一八六六年廣州所借的六十二萬兩，及左宗棠西征期間的借款，或由關稅歸還，或由關稅擔保，此後成為常例。

九十年代倡導變法的陳熾，對於外人掌管海關之害有如下之論：「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不可輕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類，久假不歸，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清關釐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為盈虛。引黨數百人，糜工二百萬。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偶

¹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畢業生亦有來應徵者，哈佛出身的馬士(H. B. Morse)等四人係一八七四年參加。

或侵之，顛蹶立至。噸鈔數及百萬，本國家有利之源，乃一意把持，據爲己有。……家資之富，可以敵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貌類忠誠，心懷鬼域。……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西人之入中國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視官吏蔑如也。」赫德的權勢確是極大，除了恭親王、李鴻章，當時無人可與比擬。不過如專就海關本身而言，他的建樹終不可泯滅。總計赫德在華五十四年，任職海關四十九年，其中四十六年爲總稅務司。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與外交誘導

一八六〇年之後，恭親王、文祥立意與西方國家和好相處。各國亦欲逆取順守，互不猜忌，使中國安定，方好享受已得權益，進而再予擴大，使中國聽從它們的指導。獨佔中國貿易額大半的英國，尤望順利地發展商務，除幫助清朝收平內亂外，並儘可能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同時加強其自衛力量，以免主權領土爲某一國攘奪。英國駐京第一任公使卜魯斯（任期爲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四）和他的繼任者阿禮國（任期爲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九），所採行的就是這種政策。美國對於東亞市場十分重視，日本開放後，更具興趣。南北戰爭後，國勢重振，工商業復興，爲將來利益計，必須使中國不爲列強分割，方可爲自己保留餘地。利益均沾、機會均等是它的一貫對華方針。英國認爲今後列強應當携手，避免競爭，不致相互抵消。美國具有同感，國務卿西華德（U. H. Seward, 任期爲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八）爲對華政策的製訂人，第一位駐京公使蒲安臣（任期爲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七）爲執行者。英、美採取平行外交，勸導恭親王、文祥對外結好，對內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謂「合作政策」。從好處說，他們是與人爲善，如中國應付得當，可以爲利，否則爲害亦鉅。俄、法態度與英、美不盡一致，不過俄國在東亞所獲已大，轉而經營近東及中東，不妨暫觀一時。法國形勢較孤，忙於經營越南，希望乘機加強其在華的保教地位及推進他種權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現，可以中外續訂新約爲例，恭親王等預料其

他西方國家勢必步英、法、俄、美後塵，請求立約，命上海欽差大臣預為阻止，但勢不可能。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後與中國訂約的計有普魯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麥、荷蘭（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時（一八六五）、義大利（一八六六）、奧大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魯（一八七四）十國。普魯士為新興強國，總署初示猶豫，英、法代為說項，謂普為大國，不可不允。丹麥亦因英、美的協助，如願以償，約中關於商務條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約簽字後曾生波折，遲至一八六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國承認澳門永為葡有，葡允協助中國徵收澳門煙稅，此為赫德的調解。秘魯因有虐待華工之事，特立查辦專條。這些條約大都係在天津簽字，原因是總署不願於立約前讓各國代表入京，避免和他們直接談判。條約的內容，與前此各國所訂者相同，包含各種特權，可見總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識，任聽外人擺布。較為例外的是中日條約。

清廷的內部興革，亦非完全自發。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勸恭親王編練一支能戰的軍隊，表面的理由為平定內亂，另一不便明言的動機在強化華爾的常勝軍，增高美國在華的發言權。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將攻下之時，蒲安臣通令美國領事，與中國官員合作，承認中國的合法利益，正當執行條約規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僅先後在天津、上海為中國練兵，並勸購置兵輪，用意與美國相同。及太平軍瓦解，清廷政權穩定，於是分由赫德與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出名，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總署呈遞《局外旁觀論》與《外國新議畧論》，建議興辦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參與其事。時駐京公使經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會，商討未來對華的應行政策。《局外旁觀論》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國均願以公正態度與中國交涉。文祥亦稱道他是中國的真實友人，處事和平，知中外大體。赫德總掌海關行政以來，稅收激增，總署對他自多好感。威妥瑪為最諳悉中國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國新議畧論》係由阿禮國代致，無異作赫德的支援。兩人所論，不外內治外交的種種利弊，而歸之於急需

借法自強。他們首先強調條約關係至大。赫德說：某事當行或不當行，有條約可憑，如不遵照，勢必召來戰爭，而出以強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辦、早辦。他所重視的為鑄銀錢、修鐵路、造輪船、設電線，主張洋商華商合辦，明言此為日後外人所必請。其次為允許公使覲見，派遣使臣駐劄各國。威妥瑪措詞更為激切，等於恫嚇。他說：「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係中華立約相保，」如不照行，難免干預，中華將不能一統自主。如決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除遣使、鐵路、電線外，並應開採五金、煤炭，所需經費均可借貸，所需人材並可約外人相幫，亦即中外合辦。又說：「各國代謀諸事，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大益。」阿禮國聲稱威妥瑪係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輕予擱置，總署自不得不加理會。於是又可知所謂新政不盡出諸中國自發，而是外力脅迫所致。

一八五八年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十年後應將稅則及通商章程加以修改。總署知道屆時定有新的要求。覲見、遣使、電線、鐵路、開礦諸事，近年外人既一再提及，內河通航，他們亦極重視，而內地私設行棧，偷運食鹽，層見疊出，教案日益嚴重。一八六七年六月，恭親王等根據數年來的經驗，又感於各國深險狡黠，遇事矯執，不獨於條約中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未載者，更為添增，來歲修約，必求大遂所欲，深恐再為修約之事，引起嚴重後果，必須預擬對策，因奏請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派人來京，以備查詢。十月，再請通飭與交涉有關各省當局，就上述覲見、遣使等事，各抒所見，詳慎籌劃，謂今日已成列國戰國，「非空言道德所能談笑而卻兵戎，亦非徒抱殷憂所能涕泣而銷禍患。」曾國藩認為除覲見、遣使、開礦外，其餘俱不可行。左宗棠久惡赫德、威妥瑪的慢悖，僅同意覲見、遣使。李鴻章與沈葆楨（船政大臣）的主張大致相同，贊成覲見、遣使，電線、鐵路、輪船、開礦，可自行試辦。一概反對的為直隸總督滿人官文。

一八六八年阿禮國曾三次向總署致送修約簡畧，要求免徵洋貨釐金，改正關稅，准許內河航行，添開長江沿海碼頭，設立海關官棧，內地設棧，洋人由外國設官管理，洋鹽進口，開掘煤礦等。總署不肯

全允。阿禮國於內河航行，內地設棧，開掘煤礦始終堅持，對添設碼頭數目亦有爭執，兼及電線、鐵路。十一月，邀同美使勞文羅斯（J. Ross Browne）同至總署談判，言詞不遜，最後雙方擬定了一個約稿。英、美、法政府恐操之過急，可能激起中國人民反抗，開礦、築路及內河行輪更會直接影響人民生計。而且原則上曾國藩、李鴻章等已表示贊同，總署於推廣貿易亦有了讓步，一切不妨出之以漸。翌年，英政府決定修約暫行延期，以待中國人民心理演變，美國表示同意。阿禮國向總署提議，將上年約稿作為暫行章程，不算修約。總署謂如不算修約，須再俟十年，方可議修。阿禮國願再相商。十月二十三日，中英新約畫押，進口鴉片及出口之絲，稅率均予提高。英國商人以未全遂所欲，竭力反對，英政府未予批准。直至一八七六年，煙台條約訂立，方告一段落。英、美所謂對華協和政策，終不許損及到它們的現實利益。

同治年間與各國訂立新約，多為外人促成，遣使出洋同樣與外人有關。英國公使頗以為請，總署藉口「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婉謝。然又感於外人於中國虛實，無不洞悉，中國於外國情偽，一概茫然，有意派員出國，探其利弊，以資籌計，所顧慮的為禮節問題。一八六六年赫德請求返英完婚，建議恭親王、文祥酌派同文館學生隨行，以廣見聞。恭親王以與特派使臣體制無關，表示首肯，由總稅務司文案斌椿率同文館學生三人前往。¹先後至巴黎、倫敦及瑞典、俄、德諸國，英女皇曾予接見，往返五月。此為中國初次派往西洋的觀光團，在斌椿的遊記中多少可發現他的西方認識。

一八六五年蒲安臣返美述職，總署大臣請他代向所經國家解釋誤會。他答以如中外之間發生爭執，願從中調解。蒲安臣到華盛頓後，西華德令他轉告總署，歡迎中國遣使來美，一八六七年蒲安臣決定辭職，恭親王設宴祖餞。蒲安臣「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為修約交涉，赫德屢勸總署遣

¹斌椿及三學生均旗人。

使，以緩和各國要挾，恭親王、文祥爲之所動，難的是人選。現在蒲安臣既有此表示，文祥乘機請他擔任中國使臣。經多次商議，赫德從旁敦促，蒲安臣毅然接受。十一月正式派他往有約各國，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總署章京記名道志剛、記名知府孫家毅亦以同一名義偕行，實際爲會辦，英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 M. Brown）、海關法員德善（E. de Champs）爲協理（祕書），意在籠絡英、法，組成一個混合使團。一八六八年，蒲安臣先到美國，謁見總統朱文遜（A. Johnson）。所至發表演說，謂中國正在採取西方文化，步入和平進步之途。七月，與西華德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即天津條約的附約，訂明兩國人民聽便往來居留，優待遊學，設立學堂。美不干預中國內政，如中國有意興辦電線、鐵路等，亦願予技術協助，可謂爲平等條約。其中自然顧及到美國利益，如人民聽便往來居住，是由於美國需要華工，設立學堂是爲在華傳教事業的便利。及抵倫敦，英國的態度頗爲冷淡，兩個月後方得謁見女王。英外相聲明，「無勉強中國，致干自主之權」之意，惟必要時仍將使用武力。翌年（一八七〇），蒲安臣至巴黎，歷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一八七〇年抵俄，二月病卒於聖彼得堡。志剛、孫家毅率領使團轉赴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再經巴黎東歸。

各國公使雖已入駐北京，但未能謁見。總署所持的理由爲「皇上沖齡，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有所不便。公使責以不以客禮相待，言多憤激。總署謂如要謁見，必須跪拜，但亦知不許謁見，實不易爲辭，如必繩以中國之禮，其勢不能。預籌修約之時，曾國藩等均主於同治親政後，准如所請，儀節不必強以所難。一八七三年，太后撤簾，各國公使舊事重提，總署不再堅持跪拜。六月二十九日，同治御紫光閣，因日本專使副島種臣的力爭，首先進見，繼之爲俄、美、英、法、荷五國公使。此爲中國皇帝初次以平等儀式接見外使。紫光閣向爲外藩君長朝賀賜宴之所，各國仍有不滿。不久光緒嗣位，太后二次垂簾，至光緒親政，始再准謁見。

四、軍事工業的興辦

在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以製器爲先的原則下，恭親王主雇用洋匠製器，曾國藩亦倡師法外人，造砲製船。一八六一年，已命徐壽、華蘅芳在安慶試造。一八六三年容闈因華蘅芳的推介，說曾國藩自置機器，設廠以製造機器，不惟可造船砲，亦可造其他器物。¹ 曾國藩即派他前往美國採辦。同年李鴻章自香港購得機器，募集洋匠，設局鑄造砲彈、短砲，以供常勝軍、淮軍之用，委任英人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及丁日昌等分別綜理。一八六五年，容闈所置機器運至上海，李鴻章命與上海已有的設備合併爲江南製造局，一稱江南鐵廠。次年又設金陵製造局，仍由馬格里負責。² 一八六七年成立的天津機器局（後改名北洋機器局），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籌設，總辦爲英人密妥士（J.A.T. Meadows）。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重加整頓，以江南製造總局的沈保靖代密妥士。

上海、金陵、天津三機器局設置最早，規模較大，影響日後兵工生產亦鉅，其經營締造均與李鴻章有關，且均有外人參與。所需經費均來自關稅，成績以江南製造總局爲優。剿捻戰爭期間，淮軍所需槍砲彈藥，多爲金陵製造局所製。以後大沽砲台的大砲亦由該局鑄造，試放時竟二次發生爆炸，如非馬格里不願增強中國對外的防禦力量，即是技術不精。天津機器局爲北洋軍大總匯，除供應直隸、江南的淮軍、練軍外，並撥濟吉林、奉天、河南等省。北洋海軍彈藥亦多取給該局與江南製造總局。總計十年之間，除上述三局外，西安、蘭州、福建、廣州、濟南均相繼設局。

早在一八五六年，李泰國曾建議購買輪船，以供對太平軍作戰之用。江南大營潰敗，金陵克復無期，如有輪船炸砲，必易收功。因之

¹容闈簡歷見117頁。

²蘇州克復後，馬格里的砲局自上海移設該地，至是再遷南京，擴大爲金陵製造局。

赫德又條陳自辦輪船，經費於洋藥(鴉片)項下籌措，進口正稅之外，如運銷內地，再徵銀若干；雇用外人司砲，華人從而學習。恭親王、曾國藩俱表贊成。次年(一八六一)命在英國的李泰國經理。李泰國委英國海軍大佐阿思本(S. Osborn)承辦，購砲艦七艘，募弁兵六百餘人。李泰國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凡事須加強制，他自稱不是中國官員，可不聽中國命令，此次存心把持，擅與阿思本訂立合約，兵輪歸阿思本統帶專主，凡事由他轉行，中國政府不得直接指揮，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亦悉歸阿思本調度。總署拒不同意，主由中國派員為總統，阿思本為幫統，聽督撫節制調遣，餉項可歸李泰國經營。一八六三年七月，總署又許李泰國以如得金陵，所得財物的百分之三十五歸阿思本，若係阿思本獨力克復，則為百分之七十。時亂事平定不遠，湘、淮軍欲獨成其功，且恐受外人挾制。曾國藩、李鴻章，對新訂辦法堅決反對。阿思本定要照原合同行事，否則輪船官兵解散。卜魯斯出面干預，總署雖進退兩難，仍力持以中國人為總統，即令決裂，亦不將兵船移交外人。曾國藩改請將兵輪分賞各國，使李泰國失去憑藉，或由阿思本與湘軍將領分帶，以分其勢。總署、卜魯斯均免請蒲安臣斡旋。蒲安臣既不欲英人獨握中國海軍之權，又不願中國有一支新式艦隊，復恐兵船落入中國海盜或美國南方政府之手，建議遣返英國出售，獲卜魯斯、阿思本同意。十一月，兵輪撤回變價，原用一百六十七萬兩，僅收回二十餘萬兩，其餘付之東流。總署向惡李泰國刁詐，於是即以辦船貽誤，予以革退，總稅務司由赫德實授。於此又可見清廷舉辦新政的不易。中央與地方不相協調，外人別有居心，列強之間復有其矛盾。經過此一不愉快事件，倡導新政的恭親王、文祥等大為沮喪。

造船、製砲為自強運動的兩大新政，在購置兵輪期間，徐壽等已在安慶造成小輪船一隻，惟行駛遲鈍。江南平定後，李鴻章依丁日昌的主張，請總署設廠造船，並獎勵華商購買。江南製造總局，負有製砲、造船的雙重使命，以剿捻戰爭方殷，先造槍砲。一八六七年開始造船，次年第一艘輪船工竣，船殼汽鍋自製，機器購自外洋。是後三年，續

成三艘。一八七二年的「海安」(宴)兵輪，長三十丈，馬力四百匹，砲三十六尊，被譽為中國第一大船。一八七五年，又完成一同級的「馭遠」號，實際仍不及外洋兵船堅利，成本復昂，遂停止製造，一共成船六隻。始終以造船為專業的係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左軍之克復浙江湖州，得力於兵輪之助，事後左仿製一隻，試航西湖。法人德克碑、日意格勸他覓購輪機，可代為監造，一八六六年七月奏准。日意格曾任職於法國海軍，左委他與胡光墉籌備。不久左調陝甘總督，以沈葆楨總司船政事務，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獲得法國海軍部的支持，着手購辦機器，招募工匠。一八六八年正式開工，廠址設於福州馬尾。左的計劃不僅是借此整理水師，並要發展海運。兵輪、商輪兼造，使「漕運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五年之內用費約三百餘萬兩。主要出自關稅，次為釐金，共成兵輪十隻，商輪五隻，每隻排水量自五十噸至一千五百六十噸不等，是後歸中國自辦。

五、西式教育的開始

清初以對俄關係重要，康熙年間，命八旗子弟於俄羅斯館學習俄文。十八世紀的中英交涉，多由在華西人及廣東的買辦通事擔任翻譯。南京、天津、北京的談判，則假乎外國教士。買辦、通事流品不一，貨利是嗜，外國教士不惟往往不能達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與外人交涉必須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蒙。一八五九年，編修郭嵩燾奏陳御夷之道，其中之一即為諳習外國語言文字。北京立約後，恭親王等所擬善後章程，亦謂與外人交涉，如語言不通，文字不辨，則一切隔膜，絕不能望其妥協。請於廣東、上海商人中，挑選曾習英、法文字語言之人，派來北京，挑選八旗聰慧子弟，從之學習。事過年餘，粵、滬均無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國教士包爾騰（J. S. Burdon），招學生十人，於一八六二年七月，開始教學英文，名為「同文館」。經費由海關撥付。翌年，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包爾騰辭職，另一英國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

韃良（W. A. P. Martin）繼任。至於學生之限於八旗子弟，大約係沿襲俄羅斯館的辦法，不欲漢人預聞外事，不過日後終於開放。

繼京師同文館而成立的爲上海「廣方言館」，馮桂芬首發其議。京師同文館的訓練以交涉肆應爲主，馮的見解更進一步。他說上海、廣州爲洋人總匯，洋務亦爲國家招携懷遠大政，應爲讀書明理之人所共能，不僅有裨交涉，且可培養端人正士，究習西學，多譯西書。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據以入奏，請仿同文館之例，於上海、廣州添設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資敏端靜文童，及年少聰慧的候補佐貳、佐雜，入館學習。人數既多，人才自出。「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術，格物之理，製器尙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纔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賸索隱，由粗淺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逐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奏准之後，由馮擬定章程，名曰「廣方言館」，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爲最早的英文教習。學生三年期滿，能譯西書全帙，作爲畢業。一八七〇年，併入江南製造局。廣州同文館的西文教習爲美人譚順，學生以八旗子弟爲多，貢獻不大。江南製造局附設有「機器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有「求是堂藝局」。求是堂藝局又分法國學堂與英國學堂，一習輪船製造，一習駕駛，總名船政學堂。日後重要海軍將弁多出身於此，名翻譯家嚴復（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親王、文祥亦有感於製造機器、火器，以及行船、行軍，無不與天文、算學有關，若不從根本作起，仍無裨實用。一八六六年決於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總稅務司赫德代爲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指爲「用夷變夏」，以師法西人爲可恥，因而引起一場激烈辯論。恭親王等再說明天算的重要，與西學之必須肆習，「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礮，即以輪船槍礮而論，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究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在我。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天下之耻，莫耻於不若人，……今不

以不如人爲恥，而猶以學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進一步主張令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一體學習。倭仁則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以夷人爲師，將「盡驅中國之衆，咸歸於夷。」恭親王續予駁斥，並云倭仁「如果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爲外國所制，」他們願意追隨，否則「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實未敢信。」倭仁仍說以夷爲師「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必將墮入夷人術中。這次的爭論，表面上的勝利歸於恭親王，而士大夫聚黨私議不息，阻攔投考同文館的人員，多方譏詆，斥恭親王爲「鬼子六」（恭親王行六）。

算學館的學生大都爲中年之人，無何基礎，某洋教習拒絕講授，同文館幾乎解體。時丁韞良返美進修，因赫德的敦促，於一八六九年回抵北京，被任爲總教習，即館長，積極改進，學生約四十餘名，仍以旗人爲多。不久添設德文館。一八七一年學生增至五百餘，不限旗籍，有的來自上海廣方言館，或廣州同文館。肄業期限定爲八年，前三年學習語文及西洋史地，第四年授以算學、代數，第五年爲幾何、三角、博物，第六年爲實用重學，微積分、測量，第七年爲化學、天文、地質、礦務，第八年爲政治、經濟、國際法，程度相當於初級文理專科學校。總稅務司中的西人亦有任教者，如馬士等。中國初設駐外公使時，卒業於同文館的學生供職使館者頗不乏人，以一八七九年爲例，倫敦使館三人，巴黎二人，柏林三人，聖彼得堡四人，華盛頓二人，東京二人。丁韞良在職約三十年，一八九四年辭職，繼之者爲歐利浦（G. H. Oliver）。

教會學校亦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發展爲速，美國的新教傳教士最爲積極。舉其著者，如一八六四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文會館，一八六五年英國浸禮會在山東青州開辦廣文書院，後合併爲齊魯大學。一八六五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開辦聖約翰書院，即日後的聖約翰大學。一八六六年，美國監理會在北京開辦匯文書院，即日後的燕京大學。一八六七年，美國公理會往直隸通州開辦華北書院，同年美

國長老會將原設寧波的崇信學校，遷於杭州，易名育英學院，即日後的之江大學。

官辦學堂開設之後，進而派遣幼童出洋學習。倡之者為容闈，傅蘭雅亦宣傳頗力。容闈認為復興中國的根本途徑在教育，以西洋文化改進中國文化，他之樂於為曾國藩採辦機器，意在相機實現此一理想。一八六八年以來，屢與江蘇巡撫丁日昌談及，具體方案為先試派十二至十四歲的幼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洋，以十五年為期，派漢文教習同往。中美續增條約載明互相優待學生，容闈主張將幼童送往美國。一八七〇年，丁日昌商之於曾國藩，由曾正式上奏，並與李鴻章聯名致書總署。美使從旁慫恿，英使亦謂可先赴美國，將來再派往英國。容闈在上海設一出洋局，招學生三十名，大多為來自香港的廣東幼童。一八七二年，陳蘭彬、容闈被派為正副委員，經理留學事宜，設辦事處於康尼狄克特州的哈特福（Hartford）。是後三年，第二至第四批學生陸續前往。及吳嘉善任遊學委員，不滿學生的言行，斥其「適異忘本，目無師長，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力主撤回。李鴻章、容闈爭之無效，一八八一年竟從所請。其中有的已大學畢業，有的尚在大學、中學肄業，回國後，多任職海關、海軍、路礦與其他洋務機關，最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

六、西學的積極介紹

明清之際，為西學輸入的第一期。第二期肇始於咸、同年間。五口通商，傳教工作展開，新教士尤稱活躍，創辦報刊為其一。自一八五三年起，二十餘年間，重要期刊有在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寧波的《中外新報》（*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上海的《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中外雜誌》（*Shanghai Miscellany*）、《教會新報》（*Church News*），北京的《中西見聞錄》。《教會新報》後改為《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 或 *The Globe Magazine*），並增出《益智新錄》（*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專言科學。《中西見聞錄》易名《格致彙編》（*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日報，有香港的《中外新報》、《華字日報》，上海的《上海新報》，及日後成爲中國第一大報的《申報》。報刊的宗旨，大都爲通中外之情，述西學概況。不論果否是真正爲中國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中國人的西方了解，及啓發中國人的學術觀念，自有其作用，進一步爲西方專著的介紹。

英美新教士在近代譯書事業上的地位，頗似明季的耶穌會士，重開風氣的爲英人偉烈亞力，所成最多的爲傅蘭雅。中國則以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的貢獻爲大。偉烈亞力長於天算之學，設墨海書館於上海（一八四七），致力於譯書印書。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九年與李善蘭合譯《幾何原本》的後部及《談天》(Herschel, *Outline of Astronomy*, 一八五九)。李又與艾約瑟合譯《重學》(Whewell, *Mechanics*, 一八五八)。姜別利(William Gamble)主持的上海美華書館(一八六〇)以出版爲主。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主持的登州文會館，傅蘭雅主持的上海格致書院(一八七四)，林樂知主持的上海中西書院(一八八二)，均兼事編譯科學圖書。合信、嘉約翰介紹的以關於生物、生理、醫學爲主，慕維廉等介紹的以關於人文社會爲要。一八七七年，在華新教傳教士舉行大會，以教會學校增多，決設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擴大纂撰各種教科書工作，以供高等小學及中學之需，由丁韞良、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樂知、傅蘭雅、利啓勒(R. Lechler)主持。十三年間，出版九十八種，以圖說、須知之類爲主。韋廉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同文書會(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 一八四四)規模亦大，後改稱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又名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官方譯書首推江南製造總局，次爲北京同文館。同文館爲培植交涉人才而設，開館的次年(一八六三)，丁韞良譯成《萬國律例》(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蒲安臣介紹於總署。前此赫德與總署大臣論及國際法的重要，恭親王恐外人別有用心，強中

國以必行，頗爲猶豫。經丁韋良解釋，知不無可探之處，即派人和他商酌潤色，一八六四年刊刻。是年普魯士與丹麥戰爭，普魯士兵船在大沽口扣留丹麥商船，總署援引該書，責其侵犯中國領海，普使認錯。證明公法確爲有效。其後丁韋良遴選同文館高年級的優等生，由教習指導，續成《公法便覽》（*Wools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公法會通》（*Hall, Treaties on International Law*）、《星軺指掌》（*Der Martens, Guide Diplomatique*）、《法國律例》（*Code Napoleon*）、《富國策》（*Faweate, Political Economy*）。同文館自設印書處（一八七三），出版各書，裝潢精美，僅分送各衙門，流佈不廣。

製造局首重工藝，譯書以實用與理論科學爲多，倡之者爲曾國藩，實際爲徐壽（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四）。徐入曾國藩幕府之前，已與上海英國教士相識，博覽譯書，究心格致製造。深知西方工藝精良之原，悉本於專門之學，必須翻譯有用之書，以探索根底。曾國藩據以疏陳，謂「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造之所以然」。認爲翻譯係製造根本，曾重刻《幾何原本》等書。李鴻章之設立廣方言館主要目的，在造就科學人才，期能閱讀、翻譯西書，亦曾刊印《重學》。一八六七年製造局創設翻譯學館，即由徐壽主之。廣方言館併入後，聘偉烈亞力、傅蘭雅、馬高濤（*D. J. MacGowan*, 美人）、林樂知、金楷理（*C. L. Kreyer*, 美籍德人）參與其事，西人口譯，華人筆述。除徐壽外，知名者有華蘅芳、趙元益、王德均、李鳳苞、賈步緯、鍾天偉及徐壽之子建寅等。前後成書二百種，約計算學二十三種，工藝三十一種，物理十一種，地質礦冶十二種，天文九種，地理八種，軍事五十八種，關於化學的十種，最稱精博，多出徐壽之手。一八七一年開始出書，發行三萬一千餘冊，此後範圍擴及於醫藥、農業、理財、外交、法律、歷史。一八七三年復編印《西國近事彙編》。此外金陵製造局、北京海關總稅務司、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亦兼事譯書。當時大都視天、算、聲、光、化、電爲西學主體，英、美傳教團體及

中外私人所譯，則內容比較廣泛。

第三節 紛至沓來的外在困擾

一、教案疊起

在自強運動的推進期間，中國連續不斷地遇到外來的困擾。首為教案，十之八九與天主教有關。中國重開教禁是出於無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動對象為官紳士大夫，現在轉向庶民。可能是因為他們受過一百餘年的委屈，如今時異勢移，西方在中國的聲威，與往日大為不同，不免趾高氣揚。

依照條約，第一，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具有特殊身份，不受中國管治，並常庇徇中國教徒。一八六一年總署雖曾與法使議定，不准教士過問公私事件，但又通令各省，依禮接見教士，示以體面。無形中提高他們的地位，益使其昂然自大，藐視官府，不時進出衙署，干預詞訟。州縣畏其勢焰，一味縱容。不肖之徒，爭相入教，作奸犯科，欺凌善良。貧窮之人復貪圖小惠，作其爪牙。第二，舊有天主堂及教產均應賠還，這是他們生事的另一借口。雍正禁教以來，教產悉遭沒收，屢經滄桑，原址大都改建，或數易其主，難以查明。因之或重索賠償，或於原址以外，強行擴展，或硬指高屋華室為當年教堂，勒迫遷讓，且於體制有關之地，以及書院、會館、公所、倉廠、寺廟、菴堂，為闔境紳民所重者，皆任意需索作抵，復利用置買田產、建造自便之權，霸佔土地民房，亦為常事。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頻遭攻訐，以至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禮俗的鑿柄，今則又加以實際的利害衝突。過去反教者多為官紳士大夫，今則又加以平民。官紳士大夫所憂慮的為世道人心、國家安危，平民所憤恨的為切膚之痛。官紳自始即認為教士心懷叵測，隱蓄異志，假邪說以惑眾誣民，借行教以窺探山川地理，一旦有事，外則脅之以兵，內則會合響應。西人之開疆土，蠶食小國，率用此術。經鴉片戰爭，

與英法聯軍之役，覬覦中國益急，其所以和議而退，乃畏中國人民之衆，不得不先以通商取中國財利，以傳教結中國人心。國家安危繫於人心，人心一離，國本動搖，洪秀全即係假借基督教煽構。

中國以名教爲治，天主教不敬祖宗神祇，所奉唯上帝，所尊爲教主、神父，等於無父無君，悖理敗倫。教化民德大壞，以致忘本而無忌憚。入教的婦女與男子齊集一堂，禮拜誦經，婚嫁悉由自願，不經媒妁，不拜天地。甚至傳說神父常藏少婦，新婚初夕，神父與新婦共宿；終身不嫁的修女，亦須承倚神父。可謂廉恥道喪，人倫漸滅。育英堂收養孤兒，目的在挖眼剖心，用以製藥。開設醫院、學校及救災卹貧，亦係別有用心。凡此誤解，清初的反教者已屢屢言之，道、咸年間信以爲實者尤衆。

一般人民仇教的重大原因，爲教士的橫行霸道，教民助紂爲虐。一八七〇年曾國藩的一段扼要解釋，足可說明個中內情，不過他漏掉賠還教產之事。他說：「天主教屢滋事端，……但求教民之衆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互鬥，平民恒屈，教民恒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而卒思逞。」總署復從法使之請，凡祈神賽會、修廟、演戲、建醮，教民免予攤派，更令百姓憤嫉。教士外出乘坐轎輿，盛陳儀衛，布列銜牌，自稱欽命，儼然是方面大員，一樣爲他們所厭憎。

來華歷史較短的新教士行事，與天主教士不同。他們爲數不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不足二百人，七十年代，爲數四百餘人，仍集中於通商口岸，側重文字宣傳，信徒約有數千。一八六六年，英國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創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爲新教開一新紀元。他個人生活儉樸，刻苦耐勞，組織不分派別國籍，十年之間，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均有會所，漸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萬三千人。

民教衝突之事，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十年之間，不下數十起，

遍及十餘省，幾悉與天主教有關。以貴州、江西、四川、天津諸案爲最嚴重。貴州主教初一到達，即與官府分庭抗禮，時坐大轎，雇用鼓吹，招搖過市。提督田興恕少年氣盛，通諭地方官痛斥教士，命稽查驅逐，最好藉故繩之以法。一八六一年，時有教堂被搶，教會、學堂被焚，教民遇害。次年，又以教民不參加祭賽，法國教士一人及教民四人被殺。法使向總署抗議，英、俄助之，要求嚴懲田興恕，賠償謝罪，限期答覆，否則將自行辦理。恭親王認爲事關國家體制，祇許賠償，不能抵命。交涉四年，終於將田興恕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江西的法國主教，自稱總理江西教務，全權大臣，巡撫升砲開中門以迎，教民借勢鴟張。一八六二年，南昌府試，童生搗毀教堂、育嬰堂，法使以絕交開戰相威脅。巡撫沈葆楨謂傳教並非用兵，不可以力屈人，須以信服人，「若謂備之以兵力，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勸人爲善者當不出此。」最後賠償了事。

一八六三年四川重慶天主堂醫院、學堂被毀，教民數十人被殺，起因是法國主教強指寺院爲教產。結果川東道撤職，四川總督、成都將軍議處，賠款十五萬兩。一八六五年四川酉陽法國教士被毆而死，法使聲言，將派兵船入川，總督允懲兇、賠款。同年又以賠還南京天主堂不遂所願，法使警告恭親王，倘不如所請，即行絕交，「清朝國祚勢將不保，」恭親王只有照允。一八六八年，台灣天主堂及英國教堂被毀，英海軍砲擊安平，殺傷官兵二十餘人，並勒索兵費。江蘇揚州天主教育嬰堂及內地會教堂被毀，上海英領事不俟查辦，率領兵船脅迫兩江總督曾國藩，承認其全部要求。一八六九年，發生第二次四川酉陽案，鄉團與教民互鬥，團民死者一百六十餘人。法國代辦羅淑亞(J. de Rochechouart)又以絕交開戰相恫嚇。接着貴州遵義天主堂被毀，毆斃法國神父一人，北京雖命湖廣總督李鴻章前往處理，羅淑亞仍率兵船溯江而上。李鴻章在重慶將酉陽教案主犯正法後，趕返漢口，續將遵義教案議結。同年，英軍殺害潮州鄉民六十九名，焚燒民房四百餘間，此事雖與教案無涉，而給予中國朝野的反感則一。在此不斷的刺刺激與壓迫之下，不惟保守的醇郡王奕譞(一八四〇至一八九一)。

大學士倭仁力主對外備戰，開明的恭親王奕訢亦說羈縻不可常恃。翌年，軒然大波又起於通商口岸、京師門戶的天津。

一八七〇年春夏之交，天津時有小兒走失，天主教仁慈堂的幼童又常有死亡，謠言係遭謀害，剖心挖眼，用以製藥、鍊銀，被捕拐匪復供稱受天主堂指使。於是民情洶洶，六月二十一日，包圍天主堂。法國領事豐大業（H. V. Fontanier）面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咆哮不遜，開槍示威，打毀器物，憤憤而去。途中槍傷天津知縣隨從，致被毆斃。法國領事館、教堂仁慈堂被焚，法人及俄、比、英、義人十餘人被殺。

一向橫蠻的法國代辦羅淑亞立召軍艦前來，要求嚴辦首從各犯，各國公使亦聯銜抗議。詔命直隸總督曾國藩持平辦理，並將天津地方官議處，派崇厚為出使法國大臣。醇郡王奕譞則謂津民宜加撫循，地方官勿輕更動，海防應密籌，住京洋人宜密察。曾國藩立意不與法國開衅，力辯洋人挖眼剖心之誣，出示查拏兇犯，修葺教堂，嚴禁滋事，並將天津知府、知縣撤任。於是京內外議論紛起，斥其偏護洋人。

中樞雖亦欲保全和局，惟仍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同時命沿江沿海戒備。羅淑亞堅持將天津府、縣及涉嫌的某提督正法，法軍艦即直駛天津。北京亦不得不調兵遣將，召李鴻章尅日率部北來，情勢至為緊張。時普法戰起，羅淑亞的氣焰一挫，各國復恐普、法之爭波及東亞，均希望津案速結。旋以曾國藩舊病復發，調為兩江總督，¹以李鴻章繼為直隸總督。九月，李鴻章到天津，十月，將天津府、縣發往黑龍江効力，滋事人犯二十五名處死，二十五名軍流，賠償法國損失二十一萬兩，撫卹二十八萬兩，崇厚赴法國謝罪。

總署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棘手問題，雖一一解決，而十年以來所持的對外講信修睦方針，並未收到預期成效，外人有心相啗之說，不

¹曾國藩原已患病，至是以內外交迫而轉劇，自謂「內慙神明，外愧清議。」兩江為湘軍的勢力範圍，原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與湘軍無何淵源，一八七〇年八月被刺而死，復命曾國藩任之，一八七二年三月卒。

全可信，所謂對華聯好政策，一遇實際交涉，即置之腦後。中國自強運動，不僅不能仰賴外人的同情支助，反使保守派振振有詞。總署懲前毖後，於一八七一年擬訂一教務章程，包括停止或限制教堂收養孤兒，祈禱時不應男女混雜，教士不得干預公事，教民滋事，曲直由地方官憑斷，教士不得任意遨遊，信教者須查明身家，教士與地方官往來應守禮節，舊有教堂不得任意索還。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民教衝突依然不息，各國的侵畧亦日甚一日。

二、日本吞併琉球與進犯台灣

日本與西方接觸遲於中國十二年。鴉片戰爭給予中國的挫辱，是日本的前車之鑒，漸知如何去何從。其購置機器、兵船，仿造槍砲、鐵路，派人往西洋留學，均較中國為早。初志雖在自衛，而中國的內外危機與積弱不振，迅即重啓其對華野心，實現十六世紀豐臣秀吉的夢想。第一步為取得通商之權。馮桂芬早已注意到日本的發憤為雄，李鴻章初至上海，對於日本的新政即頗表欽慕，或係受馮的影響。一八七〇年，日使柳原前光以商訂條約為名，前來天津。時李已任直隸總督，天津教案甫了，柳原說以中、日最為近鄰，同為西方所迫，理應通好，同心合力。李為所動，欲「推誠相待，縱不能倚為外援，亦可稍事聯絡，」遂允與妥議，柳原留下約稿而歸。一八七一年，日本全權伊達宗城與李續談，所請事項，均係比照西方國家成例，謀取得一切特權。雖是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 de Lony）的教唆，亦為日本的希望。經一再駁辯，九月十三日，條約簽字。值得注意的為兩國所屬邦土，不可侵越，這是李鑒於歷史上日本的對華行為，預事防制，特別是為保障朝鮮。二為兩國互相關切，若他國有不利於中、日之舉，彼此相助，或從中調處。此即柳原所說的兩國合力，以抗歐美之意。三為兩國人民詞訟，由領事各按本國律例審理，互享治外法權。四為關稅各照本國則率。五為兩國人民不得進入內地買賣貨物。事後日本以未能得到利益均沾及領事裁判權，大為不滿。第二年即要求改約，李責其無信。遲至一八七三年，日本以別有企圖，始行互換。李鴻章一生

簽訂了許多條約，第一個即是中日條約。

日本向外擴張的對象，為陸上的朝鮮及海上的琉球與台灣。首先被其併吞的為琉球。琉球臣屬中國已五百年。十七世紀初，一度為日本屈服，但仍入貢於明、清。一八七一年琉球船隻遭風飄流，難民數十為台灣生番所殺，福建督撫立即查辦，遣送生還琉民回國。日本決心生事，翌年冊封琉球國王，進而窺伺台灣。一八七三年，外務卿副島種臣以換約為名，親自來華，試探清廷態度，美使德朗為他策劃，並介紹熟習台灣情況的前美國廈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er）為隨員。副島並不正式行文，僅由副使柳原前光向總署口頭提出琉民遇害之事。總署答以琉、台俱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柳原謂將自行問罪，總署重加剖辨，柳原未再深論。正如李鴻章所說，「彼蓋預懷奸計，姑以游詞告詢，口說無憑，為日後狡賴地步。」

日本一面實行南取琉球，一面計劃西侵朝鮮，即所謂「征韓論」。大臣中的緩進派，認為朝鮮情形複雜，主張慎重，急進派西鄉隆盛憤而辭官。政局抗拒。為要安定內部，決先進兵台灣。一八七四年四月，派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於是年五月七日登陸台灣南端，實行襲擊。番人勇猛抗拒，日軍肆行焚殺，等於不宣而戰。清廷抗議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調淮軍六千入台。日本亦準備大舉動員，一時劍拔弩張，但雙方各有顧忌。其在清廷，新疆問題急待處理，李鴻章雖稱以「中國兵將之衆，斷不畏彼（日本）三四千人，」但「利器勁兵，難遽備集，」海防尤為脆弱。其在日本，改革伊始，內部意見紛歧，駐日英使巴夏禮一再詰詢，美使德朗亦感事態複雜，臨時禁止美人協助日軍，不准美船受日雇用，在台日兵傷病死亡五百餘人，中國大軍正在集中，日本自不得不再作考慮。

沈葆楨負有籌防、談判的雙重使命，而以談判為先。到台之後，即派員與西鄉會議。日本政府於出兵之時，已派柳原前光為首任駐華公使，故意散播謠言，謂日軍將進犯天津。李鴻章明知是虛聲恫嚇，希望中國速就和議，對柳原「嘻笑怒罵，厲聲詰責，」斥其「一面發兵

到我境內，一面叫人來通好，口說和好之話，不做和好之事。」他請總署不必遷就，「沿海兵力兵餉，雖無必勝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與總署的談判，亦無結果，關鍵在於兵費。九月，日本續遣特使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前來，依然不協。英、美均不欲中、日決裂，分勸李鴻章及總署懲兇撫卹。十月十日，大久保發出最後通牒，同時浼英使威妥瑪斡旋，總署讓步，協議成立。一為承認日本此次行爲為「保民義舉」，無異承認琉球屬於日本；一為賠款五十萬兩，無異宣佈中國怯懦畏戰。李鴻章亦云，「未免微失優柔，稍損國體，漸長寇志。」

一八七五年，日本實行佔領琉球，不許再向中國入貢。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撫與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論，否則各國將謂中國無力庇護屬邦，日本將更圖朝鮮，台灣亦難得安。李鴻章則說如為琉球「區區之貢」，與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無謂。」一八七九年日本改琉球為沖繩縣。適美前總統格蘭忒（M. S. Grant）來華遊歷，恭親王、李鴻章明瞭日本所恃的為美國，請他調處。格蘭忒勸與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對日失和，應亟求自強，能自強，日本即不敢生心。到東京後，亦勸日本勿訴諸戰爭，以免引起歐洲干涉。傳說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測之詞。事後日本向李鴻章提議，琉球南部可歸中國，惟須修改中日條約，允日本享有西方國家所有特權，不僅仍要併吞琉球，並欲加緊侵畧中國。李雖然拒絕，總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結之說，恐拒之太甚，日必結俄益深。且利益均沾諸款，各國修約均有明文，不得不對日讓步，遂於一八八〇年十月與日使擬訂了一個草約。但是廷臣議論紛紛，不以爲可。李鴻章亦力言琉案不當與條約混爲一談，俄事關係全局，「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備日。」這是他的聯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說中國宜及時自強，俟水師練成，日人囂張之氣，自可稍平，目前可採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於是草約作廢。俄事甫了，朝鮮問題繼起，中、日爭點轉移，琉球卒爲日有，但始終未獲中國承認，成了

懸案。

三、中英滇案與煙台條約

元、明之時，緬甸北部已隸中國版圖，清代全境臣屬，列為貢國。自英國的勢力進入印度後，東圖緬甸，北窺西藏。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開始對緬甸尋覓，緬甸割地賠款。一八五二年再度用兵，奪據下緬甸及仰光，進而覬覦雲南，有建築自仰光至雲南鐵路之議。一八六八年派人探測路綫，時值全滇大亂，僅到了滇西騰越，但來自越南法國的探測隊則深入雲南腹地。英國為與之競爭，一八七四年，組成一支約二百人的探測隊前來，由柏郎（H. Browne）率領，北京英國公使命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緬邊境相迎。回亂期間，杜文秀曾與英人交往，此時滇西秩序仍未大定，雲南巡撫兼署總督岑毓英素惡英人，對於此次英人之來，頗有戒心。馬嘉理過騰越不久，參將李珍國受岑的指使，與當地士紳共謀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馬嘉理自緬境折返，行抵蠻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一八六八年中英修約不成，威妥瑪正待時而動，至是乘機要挾，提出六項條件，三項均與馬嘉理事件無涉，性質甚為廣泛，為總署所拒。威妥瑪以絕交相威脅，赫德亦說英軍將進往滇邊。總署鑒於日軍侵台之事，深懼再起兵端，命湖廣總督李瀚章赴滇查辦，威妥瑪派參贊格維納（T. G. Grosvenor）前往。威妥瑪知總署諸事取決於李鴻章，因向李轉施壓力，痛斥總署顛預，必須整頓，並將要求範圍擴大，包括派員赴英謝罪，岑毓英革職議處，訂定滇緬貿易章程，妥議稅則，否則滇案交印度總督辦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師提督辦理，停納關稅。這時英海軍已向煙台集中，總署大為震怖，派郭嵩濂為出使英國大臣，責岑毓英辦理遲延。岑毓英拘捕滇邊夷人十五名，指為兇犯，將李珍國等撤職，岑亦以母喪解任。威妥瑪定要將岑提京審訊，並須增開口岸，劃定洋貨免徵釐金地界。總署不肯全允，威妥瑪下旗出京赴滬，決裂似在眼前。時為一八七六年六月。

威妥瑪的暴橫，不惟使清廷難堪，亦為各國公使所不直。總署以

海防空虛，中、日朝鮮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進行，因囑赫德赴滬調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問題緊張，欲早了滇案，無意定要訴諸戰爭。八月二十一日威妥瑪與李鴻章在煙台續談，幾經波折，終於在九月十三日將條約簽字。條約計分三端：一為昭雪馬嘉理事件，包括謝罪賠款（二十萬兩）及商訂滇、緬通商章程；二為優待往來，包括妥定各國公使領事與中國官員往來禮節及各口岸承審章程；三為通商事務，包括租界內免收洋貨釐金，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口岸（重慶俟輪船到後再議），長江六處地方准輪船停泊、上下客貨，入口鴉片於售賣時完納稅釐，至應抽釐若干，由各省酌辦。附款為允英國派員入西藏探路。除提審岑毓英一事外，威妥瑪一一如願。法、俄、德、美等國對於此次中、英交涉，時在密切注視中，頗惡威妥瑪的專斷。約中二、三兩端復涉及他們的利害，尤不滿洋貨免釐之僅限於租界。英國政府及印度總督對於抽收鴉片釐金一款，極為反對，中國雖立即批准煙台條約，英國則要求修改。直至一八八五年七月，中英續訂專條，規定進口鴉片除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繳釐金八十兩，英國始將煙台條約批准。

四、中俄伊犁交涉

新疆伊犁叛亂發生之後，清廷曾乞援於俄，為俄所拒。及阿古柏勢張，俄使詰詢總署，能否剋期肅清，聲言不能坐視。侵佔領土及擴大陸路通商是俄國對中國的一貫政策，清廷雖於貿易、邊界方面，給以若干利益，它並不以為滿足；一八七一年七月，實行佔領伊犁。伊犁為經濟、軍事要地，據有伊犁即可控制新疆。總署商請交回，俄人推拖不允。左宗棠西征之時，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歸還。迨阿古柏失敗，俄人不僅食言，且多方挾制，屢次曠使逃入俄境的白彥虎與中亞回人寇，以轉移中國對伊犁的注意。

在中俄交涉期間，一八七八年春，俄使忽而返國。清廷不得已，派崇厚前往俄京，與俄外務大臣格爾斯（M. N. de Giers）會議。崇厚參與過英法聯軍之役的交涉，擔任過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又做

過總署大臣，具有十餘年的外交經驗，但庸懦無能，於俄情及新疆形勢皆無所知。一八七九年三月，俄方提出商務、賠款、分界三事，將中俄一隅問題，擴大為全面交涉。總署認為不能接受，特別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於十月二日在裏海附近的里發的亞（Livadia）擅自與俄人訂約。按照這個條約，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盡為俄有，伊犁成為彈丸孤注。第二，俄人得於蒙古、新疆無稅貿易，自嘉峪關至西安、漢口，張家口至通州、天津往來販運，另設置領事七處；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償款五百萬盧布（約二百八十萬兩）；第五，改定塔爾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認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國所得的僅為伊犁空城，朝議大譁。詔命左宗棠、李鴻章籌議。李謂我若先允後翻，兵燹一開，將來俄所要求，勢必更苛，日本或將俟機而動，主待換約之時，再酌議更改。左的意見不同，謂俄人不踐交還伊犁前言，庇匿叛逆（白彥虎），已無信義可言，「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鑿其所欲，……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左、李對西北問題的看法一向相反，中央則每同意左的主張。一八八〇年一月，將崇厚革職拿問，否認里發的亞條約。俄代辦提出質問，各國公使亦認為不應懲處崇厚，繼起抗議。清廷不為所動，進而定崇厚以死罪，同時左宗棠出駐哈密，作武力規復伊犁之計。號稱「清流黨」的張之洞輩尤為激昂，隱為主持者為軍機大臣李鴻藻。總署大臣沈桂芬曾保崇厚使俄，為脫身計，從而附和。俄人自不示弱，亦增兵中亞，並遣兵船東駛，集結日本，盛傳俄、日相結，侵擾沿海、東北，直趨京畿。

清廷並無求戰之意，在懲處崇厚的同時，改命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赴俄，商請改約。曾紀澤通曉時事，不主用兵。關係最大的為歐洲國家的態度。英使威妥瑪恐中、俄一朝將變，英國在華與在印度的利益將蒙受影響，曾有心加強中國的防禦力量。英政府不欲直接加入，惟願從中調解，不得已時，英人可以私人資格參加中國軍事。德國以為

中、俄失和，雖可削弱俄國對歐洲的壓力，然亦可能予英國以在華漁利的機會。法國爲對德問題，不欲俄爲亞洲之事所牽，因之德、法兩使與威妥瑪均向李鴻章勸告和平了結。李自無異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一力支持，親向總署陳說，崇厚的罪名遂獲撤銷。另一關鍵人物爲前常勝軍統帶戈登。戈登時在印度，應赫德之邀東來。赫德的動機所在，衆說不一，不過事前確得總署及李鴻章同意，戈登自稱此行目的爲勸和而非助戰，倫敦方面亦謂可假手戈登使北京主戰派就範。戈登先晤李鴻章，繼向總署及醇親王勸和，謂如果開戰，俄軍可能於兩個月內佔領北京，勢須遷都內地，採游擊戰術，作長期抵抗，結果清的政權必不能保，外人久有李鴻章可取代清廷的說法。此時復盛傳俄人有擁李牽制的陰謀，慈禧以下，不無戒心。戈登離華不久，即召左宗棠入京，表面上仍說備戰，實際已決定言和，或與對李的謠言有關。時爲一八八〇年八月。

俄在遠東的兵力有限，徵調運輸困難。左宗棠的軍威方盛，戰爭一起，勝負之數，固不易言，英國態度尤堪顧慮。俄、土戰後，俄國外交陷於孤立，國庫匱乏，如戰事延長，支援實感不易，中國既願轉圜，大可乘機多索賠款，樂得順水推舟。八月初，曾紀澤開始與格爾思談判。曾所重視的爲界務，對兵費、商務表示遷就，這正是俄方意之所在，不過初仍多方刁難。德使巴蘭德(M. Von Brandt)明告李鴻章，如他事能令俄滿意，界務即易商改。時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爭已起。美國又有排斥華工之事，清廷苦於招架。曾紀澤乃舍伊犁西境不提，專爭南境，因爲南境爲通往天山南路的孔道。十二月，大致議定。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條約畫押，與原約不同之點，一爲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帶之地；二爲西路俄商販運，至嘉峪關爲止；三爲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爲願入俄籍的伊犁人遷入俄境；五爲賠款增爲九百萬盧布(約五百萬兩強)。憑借外交收回了部分領土，總算難能可貴，曾紀澤的聲望亦爲之提高。

中國經營天山南北路，歷時已二千年，清平準部、回部亦一百三十餘年，但依然爲特殊區域，僅於北路設治。十九世紀前期，西北史地

引起學者注意，魏源主增設郡縣，龔自珍建議別立行省。左宗棠同此意見，一八七七年進軍南路之時，曾奏請實施。一八八二年，伊犁實行交收，清廷從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劉錦棠之議，改新疆為行省，歸陝甘總督兼轄。又二年，以劉為巡撫，新疆名符其實地納入中國版圖。

五、朝鮮問題——日本向大陸擴張

十三世紀以來，朝鮮已為中國藩屬。十六世紀末，因日本入侵，明朝兩度派兵赴援。到了清朝，照常入貢，而於西方國家則無接觸。一八三三年，英船試來通商，地方官告以朝鮮為中國臣屬，藩臣無外交之義，予以拒絕。一八六三年，朝鮮國王李熙的父親大院君李是應執政，殺戮潛來的天主教士。一八六六年，法國派軍艦問罪，無結果而去。美國久欲開放朝鮮，亦以商船被燬，水手遇害，兩次對朝鮮用兵，均未得手。首先打開朝鮮門戶的為壤地接近的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致書朝鮮，要求訂交，朝鮮以其款式不合，置之不理。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日本再來詰，連遭拒絕，征韓論大起。所顧慮的為中、韓關係，此為副島種臣來華目的之一。

總署於法、美的對韓行動未加聞問，此次對日的答覆，復稱朝鮮雖為中國屬國，但對其內治外交，向不過問。朝鮮對日原乏好感，大院君更惡其效法歐、美，侵擾朝鮮的法國軍艦又多來自日本，下令斷絕日本交易，日本主張征韓者，益為有辭。中日台灣事件以賠款結束，日本對中國愈為輕視。一八七五年測量朝鮮海岸的日艦，遭受砲擊，日本即出動海陸軍相威脅，命駐華公使森有禮通知總署。總署引據中日條約，謂「兩國的所屬邦土，不相侵越，」加以駁斥。森有禮謂朝鮮為獨立國，與中日條約無關。李鴻章為息事寧人，主聽朝鮮自決。朝鮮國王李熙時已親政，懦弱無能，閔妃干政，與大院君為敵，一反大院君所為。一八七六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允日本駐使通商，訂明朝鮮為自主之國，否認了中國的宗主權。日本聯結親日派，即所謂開化黨，與大院君的親華派即所謂事大黨對抗。

日韓爭執告一段落，清廷從李鴻章請，設置出使日本大臣，希望

對日加強聯繫。森有禮曾和李論及俄國對東亞的野心，中日應合力應付，李頗有意。日本得寸進尺，接着即吞併琉球。中國朝野認為對韓政策必須改變。日韓訂約前，郭嵩燾即主中國負起處理日韓爭端之責，命朝鮮與各國交往。一八七七年，李鴻章勸朝鮮與英、美立約，至是續行進言，用以敵制敵之策，作箝制日本之術，兼備禦俄人。一八八〇年，紛稱俄將奪朝鮮，李再度開導，朝鮮始幡然變計，答應遵辦。

第一個與朝鮮建交的西方國家為美國。日、韓訂約後，美國大感興奮，以為朝鮮開港有望。一八八一年，美水師總兵薛斐爾（R. W. Shufeldt）得日本介紹，至韓交涉不遂，轉請李鴻章斡旋。李認為美、韓如立一平等條約，既可杜日本覬覦，又可據以與他國訂約，囑朝鮮派員來津商議。次年約稿在津議就，再由薛斐爾與朝鮮全權在仁川簽字，馬建忠代表中國監臨。李原望將朝鮮為中國屬邦字樣列入約文，薛斐爾不允，訂約後改由朝鮮另備照會聲明。同年，英、德依同一方式與朝鮮立約，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義、俄繼之。各國對朝鮮為中國屬邦的照會，均未置答。美國在漢城設置使館，以示兩國平等，日本十分欣慰。

朝鮮自閔妃當權，態度傾向日本，大院君失勢，用事的閔妃親族多貪，加之國用不足，軍餉積欠十餘月。一八八二年七月京城（漢城）駐軍受大院君鼓煽，殺執政大臣及日人，進犯王宮，焚日本使館，是為「壬午（一八八二）事變」，日本立即出兵。時李鴻章丁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採馬建忠及幕府薛福成之議，派提督吳長慶率淮軍三千人會同馬建忠、丁汝昌所率三兵船趕往，隨員有張謇、袁世凱。吳長慶到後，先逮捕大院君，再剿平亂黨，韓局大定。此事如由李鴻章處理，未必如此果決。張謇告朝鮮某官云：「此次之師，賴李相不在，張公得以出力。」

中國在軍事方面雖稱成功，外交上則殊為失着，仍聽朝鮮與日本直接交涉。八月，日韓訂立濟物浦（仁川）條約，朝鮮允懲兇謝罪、賠款，並許日本駐兵保衛使館，擴展商務，內地遊歷。李鴻章為確定中韓關係，十月，與朝鮮訂立貿易章程，明定朝鮮為中國藩封，委派

總辦朝鮮各口商務委員，駐紮漢城。這時各方意氣至盛，張謇代吳長慶擬朝鮮善後策，主改朝鮮爲郡縣，或置監國，或置重兵，改革朝鮮內政，爲練新軍，出師規復琉球。清流黨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有相似的建議，請迅練水陸各軍，以備東征日本，派員管理朝鮮外交，代爲購械練兵，以軍艦駐守仁川，防護朝鮮海口，並令吳長慶箝制駐韓日軍。給事中鄧承修且主集中南北洋艦隊向日本問罪。李鴻章不以對日決裂爲然，亦不贊成改朝鮮爲郡縣或置監國，但於其他意見幾均逐一採納，除與朝鮮訂立商約外，復代聘前德國天津副領事、曾任職中國海關的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襄理朝鮮海關，兼外署（統理衙門）協辦，撥贈槍砲，派員教練韓軍，實際負責人爲袁世凱。

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爲河南項城人，早歲在故里及南京已習知軍事，又居北京數年，洋務時政亦頗留心。因考試不第，一八八一年，前往山東登州投靠他的父執吳長慶，從張謇受業。因張的推介，隨軍援韓，表現甚佳，膽識不凡，敢作敢爲，大得吳的賞識，韓人亦另眼相待。韓亂甫定，他即勸朝鮮練兵，朝鮮國王亦頗樂從，有意請他主持。一八八二年十一月，李鴻章正式委以此項任務，計兵丁千人，一個月已見成效，時袁二十四歲。

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日增，日本與親日派的忌恨日深。朝鮮君臣初尚對中國存敬畏之心，久則漸起不滿之意。一八八四年吳長慶及所部半數，以中法關係緊張，奉命調防遼東半島，留韓三營由總兵吳兆有統率，袁世凱副之，名義爲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營務。同年中法戰爭擴大，中國失利，駐韓日使加緊勾結親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國王李熙，說是中國行將崩潰，朝鮮欲圖改革獨立，正爲其時。李熙的態度動搖，思稱雄自主。駐韓日使與親日派密謀舉行武裝政變，袁亦嚴行戒備。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變發生。日軍佔據王宮，親日派奪得政權，親華派大臣多人遇害。袁世凱立即率軍彈壓，以美、英、德使領勸暫緩進攻，朝鮮大臣爲了國王安全，亦有顧慮。第三天，情勢愈爲險惡，袁即進王宮，擊敗日軍，中日各傷亡數十人，洪英植被殺，

日使出走，使館焚燬。是爲「甲申（一八八四）事變」。

中國恐事態擴大，中樞密諭李鴻章切勿與日生衅。本此原則，李與赴韓查辦的吳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兩快艦先往，命袁不得妄動。日本軍人高唱「膺懲清國」，法、美從中慫恿，日本政府當局則決定利用中、法戰爭，以談判方式與朝鮮解決，不追究事變責任，不許中國過問。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韓訂立京城條約，朝鮮對日謝罪，撫卹傷亡日人，賠償損失。一如壬午事變，中國在軍事上一時佔了上風，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詰問，含糊了事。更大的失策爲中日天津條約的訂立。

日本對韓策略，自始即爲將中、韓分開。京城條約既訂，趁中、法戰爭尙未結束，特遣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在天津會議，要求中國撤兵，懲處營官，補償日本民命財產。李於伊藤未到之時，已考慮共同撤兵問題，表面上爭辯雖烈，實無關宏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簽字，中、日駐兵一律撤回，兩國均不派員教練韓軍，由朝鮮選雇其他外國武弁擔任。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如須派兵，應先互相知照，事畢撤回。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遠戍，操縱難盡合宜。二爲駐兵本爲防日，日兵既撤，中國已無再留兵必要。三以約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規定，將來日如用兵，可隨時爲備，不虞其潛師突襲，即他國侵佔朝鮮，中、日亦可會商互援。他忽畧了中、韓關係與日、韓不同。有了這個條約，無異承認日本的在韓地位，並束縛了中國的行動。他又認爲伊藤無意吞併朝鮮，日本的富強尙須十年內外，係中國的遠患，非目前之近憂，中、日暫可相安無事；中國如及時自強，朝鮮可保。但是中國致力於自強已二十餘年，日本僅十餘年，今後十年中國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無把握。他於伊藤的雄心，缺乏認識，甚至希望與日本併力以抗第三者對朝鮮的侵畧，始終不忘「以夷制夷」，結果反爲日本所制。

第七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

(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一、慈禧繼續當政

慈禧嚴刻寡情，對同治甚少假以詞色，動輒呵斥，使其唯命是從。同治頗有小慧，性好嬉戲，母子之間遂生隔閡。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歲，舉行大婚，次年二月親政，慈禧驟感寂寞。復以不喜她的兒媳皇后，同治夫婦生活受到干涉，鬱鬱不樂，左右嬖倖乘機媚誘，微服出入市廛，涉足酒肆青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為逢迎慈禧，博其歡心，宣布重修圓明園。以西北軍事需餉孔殷，大婚用費已近二千萬兩，府庫支絀，言官奏請從緩，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同以為言。同治不許，並以察看園工為名，一再出宮。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等相繼上疏，或勸讀書、勤政，或請節用、愛人，或言焚燬圓明園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為？」凡此皆非同治所願聞。

時中日交涉正急，恭親王等聯名規諫，列舉六事：一曰洋人盤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擾台灣，恐生不測，應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時召對臣工，務崇儉樸；三曰傳聞時與太監等演唱，且數至圓明園觀遊，言動不可不愾；四曰摺奏往往留中不發，將開拒諫之風；五曰內廷用款浩繁，圓明園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復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論，非一二千萬兩不辦，又何從得此鉅款？應即停止；六曰學問必須講求，每日仍至書房，既可收斂身心，又可通達治理。以上所陳，無異訓誡，同治因羞成怒，責恭親王離間母子，把持政事。恭親王反覆指論，不為稍讓。同治指其朋比脅制，謀為不軌，予以革職貶爵的嚴

重處分，並擬盡黜進諫的王大臣。事為慈禧所聞，第二日（九月十一日）悉行賞還，命停園工，謂恭親王輔政以來，不無勞勛。最大原因，仍與一八六一年同（見189頁），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對外仍需要恭親王肆應，特別是目前的日本問題（見218頁）。她雖亦不滿恭親王，惟尚無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來孱羸，近年復耽於冶遊，染上了惡疾。這幕政治風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對外說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親裁決摺奏，仍須由她與慈安權為披覽辦理。十二月十八日，二次垂簾。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卒，無後，慈禧以醇親王之子，同治的從弟，年甫四齡的載湉承繼咸豐為子，並為嗣皇帝，年號光緒。表面的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則在繼續執政，何況醇親王福晉又是她的胞妹，不惟親近，亦易控馭。醇親王懼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為慈禧不容，今生難見天日，只好自裁。

二、海軍初建與陸師訓練

阿思本兵輪為中國建立海軍的嘗試，結果完全失敗（見206頁）。左宗棠之主張自造輪船，主要目的為整理水師，此為福州船廠的中心使命，亦為江南製造局的任務之一。截至一八七四年，除廣東自國外購置的小型兵輪七艘、福州購置的二艘外，共有輪船十九艘，約二萬二千噸，成本高、機器舊，不僅無法與歐、美相比，亦不及後起的日本，因之對於台灣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後恭親王痛陳以往自強新政之毫無實際，對於小國日本已備禦無策，倘西洋各國一朝猝發，弭救更無所憑。目前所最不宜緩者，惟防日本為亟。日人習慣食言，不能保其必無後患，至時雖欲將就，亦恐不能。李鴻章早已說過日禍之可慮。今則「其勢日張，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國者，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謂日本「新習西洋兵法，僅購有鐵甲二隻，竟敢藉端發難，〔我〕若再因循泄沓，而不急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應趕緊購買鐵甲船、砲船及應用軍械等件，無論如何為難，務須設法辦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詔命李鴻章籌款購置。

一八七五年四月，總署採赫德之議，集中購船，統一指揮，先向英國訂砲船四艘。五月，授沈葆楨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與李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此為中國興治新式海軍的肇始。一八七六年，四砲船由英國軍官率領相繼到華，最為新式，李鴻章極感滿意。一八七八年，囑赫德續購快船（巡洋艦）、砲船各兩艘。¹

一八七九年，因日本併吞琉球，情形叵測，命李與沈葆楨購鐵甲船、水雷。赫德條陳設海防衙門，自任海軍總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國海軍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製的四砲船到後，²亦歸北洋差遣。復從李之請，添購快船。不久沈葆楨卒，詔命今後購船事宜，統由李經理，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³一八八〇年，伊犁及琉球問題轉急，李改向德國訂購鐵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遠」、「鎮遠」、「濟遠」，由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經辦，以免赫德包攬。一八八一年，派丁汝昌為北洋海軍統領。翌年，北洋又向德國訂購魚雷艇四艘；一八八三年南洋向德國訂購巡洋艦二艘；一八八二及一八八四年，廣東向德國訂購雷艇十一艘。至於軍港的經營，李首建船塢於大沽，設魚雷營、屯煤所於旅順。

海軍人才與船艦同等重要。船艦的來源分自製與購置兩途，李鴻章側重購置，對於福州船廠雖仍支持，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則幾同停頓。人才來源，亦分自行訓練與國外訓練。日本鐵甲船未到前，中日海軍的裝備在伯仲之間，中國自製的揚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國之不及日本的為日本軍官多受歐洲教育，訓練、編制已經現代化，西人認為如中日發生戰爭，勝利可能屬於日本。最早主張海軍學生出洋留

¹此四砲船為「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即 *Alpha, Beta, Gamma, Delta*，前兩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噸，後兩船各四百四十噸，均係駐英海關稅務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經購，阿姆斯特壯鐵廠（Armstrong and Co.）承造，經費出自關稅。續購兩快船為「超勇」、「揚威」，兩砲船為「鎮遠」、「鎮中」，一八八一年到華。

²四砲船為「鎮東」、「鎮西」、「鎮南」、「鎮北」。

³派曾在法國學習政法的馬建忠主持。

學的爲沈葆楨，台灣事件結束，即派學生五人，隨日意格赴歐洲遊歷。一八七六年正式遴選十二名赴英，學習駕駛，十四名赴法，學習製造（另有藝徒七名），四名學習礦冶，二名學習律例。一八八一年續派十名。李鴻章負有海軍總責，福州船政學堂不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八八〇年，別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學生嚴宗光（復）爲總教習，次年於大沽設水雷學堂。

購船之始，以海軍官生的歷練學藝不足，不得不借才異域。一八七九年，英國海軍大佐琅威理(William M. Lang)率領中國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來華，李鴻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參與阿思本艦隊，不願聽命於李，希望諸事透過赫德，爲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爲教習。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國海軍，赫德再薦琅威理，李請駐英公使曾紀澤與洽。一八八二年十一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軍總查，職司訓練，勤於任事，爲海軍官弁所敬禱，軍容頓爲整肅。統領丁汝昌出身淮軍騎兵，雖曾管帶長江師船，而於近代海軍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從。

建設海軍需要巨額經費，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萬兩，實得僅半數。一八七七年，復以山西、河南大饑，詔命借撥海防經費，以應賑卹之急。一八七八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經費充作京餉，最少被提用七十餘萬兩。翌年，李鴻章請撥足用款，僅解到四十餘萬。

截至一八八四年，統計北洋擁有兵船十四艘，八艘爲購置，餘爲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爲購置，餘爲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爲購置，餘爲自造；廣東僅有雷艇，全爲購置。此四支艦隊，不相統轄，而且速率不一、槍砲不一、編制不一。

陸師的改革先於海軍的興治。天津英軍尚未撤退之時，英國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練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繼復於八旗漢軍中挑選三百六十名，一併交英人教練。爲保衛上海，一八六二年士迪佛立及英海軍提督何伯又請撥兵三千代練，李鴻章予以半數，另以六百人撥交法人。其後廣州、福州相繼仿行，以英、法競爭，由兩國分任，可見內幕之不單純。

淮軍爲最早用西法訓練而有成效的部隊。李鴻章之不願將華兵交洋將代練，是怕權力旁落，不受中國調遣，因募洋將教練，使居於客位。及李任直隸總督，主將現有兵勇選汰，一律改用洋槍、洋操。中樞雖未採行，然已命劃一訓練。英、俄、法對華各有企圖，英人已參與海軍，李不欲其過問陸軍。他認爲德國近年軍政修明，與中國無邊界毗連，又無傳教與販賣鴉片之事，極應聯絡，以助軍謀。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瑾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動，因於一八七三年，聘德軍官李勸協（Lehmayer）爲教習。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學習，回國後，任親兵教練，由德瑾琳之婿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瑾琳是德國在中國的赫德，漢納根在北洋陸軍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於北洋海軍。中法戰爭時，李續雇德國軍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設天津武備學堂，選淮軍弁目肄業，學成後分發各軍，擔任教官，但非統兵官。

三、富強兼顧的企業——輪船招商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爲自強運動第一期，舉辦的新政，限於官辦的製砲造船，認爲這是自強的捷徑。但是需款頗巨，有出無人，不易作無止境的挹注，何況軍事工業與其他企業息息相關，彼此必須配合。其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經濟勢力，日益膨脹，利源多爲所奪，長此滋蔓，國計民生，勢將俱敝，沿海長江的交通運輸受害尤烈。爲了挽救此兩大危機，必須別闢蹊徑，利用民力。民與官積不相信，向不樂與官交涉。縱令有人情願，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後是民間出資經營，政府總其大綱，扶持監督，且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此即所謂官督商辦。此爲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強運動第二期對於各種企業所採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見諸實施的爲輪船招商局的開辦。

五口通商之後，以香港爲中心的英國輪船，往來上海、南洋，中國舊式船運幾全失其利。及東北、華北、長江開港，外國輪船愈增，航行的地區愈廣。過去以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輪船爲主，一八六二年後，又有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

上海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專載沿海及長江客貨。是後數年，英國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北清輪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輪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 或 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繼成立。寶順洋行(Dent and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亦均營輪船業務。加之進口洋貨有特別優待，關卡於洋船不敢過問。華商與合夥貿易之船，由洋商報關，華商自行貿易之船，亦多託洋商代報。各口生意，洋商佔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計壅阻，國家稅餉尤損失不貲。

另一嚴重問題為漕運。漕運積弊已深，官吏節節侵漁，運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費亦巨。一八二五年，試雇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運，然載重不大，運腳過昂。一八六四年丁日昌會請由華商置買輪船。兩年後，左宗棠復力陳輪船之利，無事時可用之轉漕，有事時可用之運兵運糧，並強調外國輪運，對於中國南北經濟的傷害。「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資本，寔至歇其舊業。……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唯一辦法為自備輪船。

三十年來富而多金的洋行買辦投資於英、美輪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為領導，給以利便，大可冀其轉而相就。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燦光謂「欲弱西國，必自富中國始；欲富中國，必自暗抑洋貨，流通土貨始；」如准商辦輪船兼運漕糧，縱客貨未能充裕，亦可藉資彌補。李鴻章深表贊同，認為華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幹之員出而擔當，復有專門生意(漕運)，自不至為洋商傾奪。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總辦為曾任怡和洋行總買辦十餘年、負責輪運業務的唐廷樞，會辦為曾任寶順洋行總買辦十餘年的徐潤，均稱得起「熟悉生意，股實能幹」之人。¹ 另一會辦為李的親信盛

¹唐廷樞、徐潤均兼營錢莊，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輪船公司董事。

宣懷。初擬招商股百萬兩，實收約半數，官方墊付約二百萬兩，分年於漕米等物運價內抵還。

招商局初僅有輪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紛紛跌價，招商局不得不隨之削減。因為獨佔漕運，有固定收入，尚可與之周旋。旗昌輪船多往來天津、煙台，因無法競爭，翌年將所有輪船、碼頭、棧房售與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傾擠，招商局的近海業務，尚可勉強支持，遠洋則無法抗衡，不得不與兩公司妥協。一八七八年，與訂「齊價合同」，劃一運價，分配貨源噸數。華商顧全大局，貨物多交招商局承運，招商局的業務，不亞於洋公司的全部。一八九〇年「齊價合同」滿期，怡和、太古不肯續訂，雙方又開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賴政府協助，華商有愛國熱忱，仍有盈餘，但船數與噸位的發展，已落兩公司之後，中日戰後，處境更為艱難。

四、煤礦、鐵路、電線

第二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為開平煤礦。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屢以開採煤礦為請，希望輪船用煤，就近取給，不必自歐洲轉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以煤為日用之物，又為機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贊同借外國挖掘之器，為中國永久之利。議辦輪船招商局之年，馮煥光已論到進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機器開採，洋煤可不阻自絕。李鴻章亦說「船砲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閩、滬各廠所需外洋煤鐵極夥，……設有閉關絕市之時，不但各廠廢工坐困，即已成輪船，無煤則寸步不行。」如「採鍊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推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之計，殊有關係，」所以輪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開採煤礦一款。

一八七四年，籌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認為開礦為富強要圖。一八七六年，李鴻章命盛宣懷開採湖北廣濟、興國之礦，唐廷樞調查直隸開平之礦，後者蘊藏甚富，決定設局招商。因熔鐵爐需款過巨，技術上復有困難，鐵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決專採煤礦。一八七八

年，設開平礦務局，總辦即唐廷樞，工程師為英人柏愛特（R. R. Burnett）、金達（C. W. Kinder）。開辦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噸，除分供各廠、局及中外輪船之用外，兼可顧民用。李十分滿意，謂「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強之基，以為嚆矢。」約在同一時期，各省興辦的煤礦，在十處以上，大都為官督商辦，而以台灣基隆、安徽池州、直隸門頭溝、臨城、山東嶧縣、江蘇徐州利國驛，較具規模。

輪船招商局的成立，為促成興辦開平煤礦的近因，開平煤礦又促成了鐵路經營。英人對於中國鐵路最為熱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廣東至江西鐵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蘇州一線，蘇撫李鴻章認為必有主謀，此事果屬有利，應由中國自辦。一八六四年，英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斯梯芬生（M. Stephenson）東來，代中國擬訂了一個築路計劃，自漢口西經川、滇至緬甸、印度，東至上海，南至廣州，再自上海至寧波、福州，另一線自鎮江北至天津、北京，實有經濟、政治兩種企圖。英使阿禮國勸總署採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籌議修約時，除了李鴻章外，各省當局幾無人贊成修建鐵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淞滬鐵路，翌年完成一段，開始行車，輾斃一名華人，引起騷動，結果由中國贖回拆除。中國第一條完成而繼續發展的鐵路為開平運煤鐵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築台灣鐵路計劃，獲得批准，¹ 唐廷樞乘時請李鴻章築開平地區鐵路。李雖首肯，但在淞滬鐵路即將拆毀的情形下，仍有顧慮。一八八〇年，唐變更辦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蘆台向東至胥各莊，挑一運河，再由胥各莊接一快車路，直達礦所。快車道為鐵路的別稱，礦所即唐山，長十八英里。路成後，初用騾馬拖車，一八八一年始駛行機車，工程師為金達。

唐胥鐵路修建之時，伊犁、琉球問題緊急，淮軍宿將劉銘傳稱，中國欲圖自強，機括在急造鐵路，建議以北京為中心，分向清江浦、漢

¹因經費無着未成。

口、盛京、甘肅興建四線。反對者謂鐵路爲害有三：一爲洋人從旁覬覦，借端要求；二爲礙田、廬、墳墓、橋樑；三爲奪輪船招商局之利。李鴻章雖力言有利無害，亦承認風氣未開，籌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頗多，大舉修造尙非其時。

列強對於中國應辦的新事業，幾無一不虎視眈眈，而以電線爲最早。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間，俄、英、法、美屢以爲請不遂，但丹麥大北電線公司已於一八七一年自設香港至上海海線。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奏准安設福州、廈門、台灣電線，由大北公司承辦，先辦陸線，以居民阻止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李鴻章於大沽、天津試行，用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遂於一八八〇年，請籌辦津滬之線，設立天津電報學堂，謂用兵以神速爲貴，電報實爲防務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議。一八八一年，津滬通報，設電報總局，官督商辦，已非專爲軍事，負責人爲盛宣懷。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漢口，天津至北京、山海關、旅順，廣州至廣西龍州各線，一律竣工。其後愈擴愈廣，各省及西北、西南邊區諸線，陸續完成。

五、駐外使館的設置

有約國家，公使長期駐節北京已十五年，中國迄未派人駐節有約國家。斌椿出洋是觀光性質，蒲安臣奉使是臨時性質，崇厚赴法係爲謝罪。中英滇案發生，英使要求條件之一爲中國須派大員赴英國通好謝罪。謝罪只是一時的，通好應是長期的。清廷從恭親王、李鴻章之請，命夙曉外情的前署廣東巡撫郭嵩燾，以侍郎候補授爲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即駐英公使。時人多視出使外國爲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並請將出使著爲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倫敦。他認爲出使外洋，固當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則須以理求勝，無所屈撓；尤當「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弊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則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西洋立國，本末兼資，……正宜推考其情

勢。」英人對於他的風采，深致好評。不久又兼使法國，他的高尚爾雅風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屢次致書李鴻章、沈葆楨，盛言西洋氣象日新，學校規模整肅，討論精詳，一皆致之實用，凡百取成於學。四十年來，中國之不知洋務，由於不學。復將來英途中聞見觀感，撰為日記，稱頌西洋政教修明，中國如能知其本末，應付得宜，即可致富強，否則必被其禍；並斥宋、明諸儒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鴟張虛憍。國內的議論對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議益為沸騰。編修何金壽劾他「有二心於英國，」他的至好王闓運說他「已中洋毒，」一向欽佩他的李慈銘責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劉錫鴻內結軍機大臣李鴻藻，蓄意構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一八七九年召回，繼任人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郭離英之前，英國朝野皆惜，說他到任以來，不亢不卑，進退合度，遇事用心，見識宏遠，對於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無私之心，逕告國內，知無不言，不愧國使。返國之後，英人仍懷念不置，說他鎮定持重，與外國處無損其影響與威儀，對中國政府確已盡職；說中西情勢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僅為中國得人慶，外國亦將受益。但是他不僅未獲重用，且不敢入京。

中英關係最為煩劇，中美關係素稱友善，在美華僑獨多，又有留美學生，所以第二個使館設於華盛頓。首任正、副使為前留學生監督陳蘭彬、容閔，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為出使大臣的盡屬粵籍，此或為便於照料華僑。新近使中國感受極大威脅的為近鄰日本，所以第三個使館設於東京，首任正、副使為何如璋、張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這時德國已成了歐洲大陸一等強國，中、德修約交涉方急，李鴻章又在積極仿行德國軍制，採購德國軍械，所以第四個使館設於柏林，首任使臣為劉錫鴻，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製造局、時任留學英、法海軍學生監督的李鳳苞繼任。俄國是中國設置使館的第五個國家，近因為伊犁問題，人選為前已說及的崇厚。法國因地理關係，由駐英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相繼兼任。曾紀澤為改議伊犁條約，復兼使俄國，一八八七年，仍改為專設。一八九五年法國亦改為專設。駐美使臣為華工問題，初兼使西班牙、秘魯，最後免兼西班

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意、奧、荷、比，大都由駐俄、駐德、駐英使臣兼任，二十世紀初年，相繼改爲專任。總署規定出使大臣須將各國虛實及大小事件撰爲日記，按月彙報，並須翻譯外洋書籍、報紙，隨時咨呈。用意未嘗不善，久則漸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記而論，確有所見的，殊不多觀。

第二節 中法戰爭與西南危機

一、法侵北圻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可說是中國四境多事的十年，除了俄據伊犁，日犯台灣、兼併琉球、進圖朝鮮，英國窺伺雲南、逼訂煙台條約外，法國亦加緊對越南侵畧，卒至演成近代中國第三次的對外戰爭，其嚴重性遠過於俄、日、英在此一時期所加諸中國的威脅。

自西元前二世紀以來的一千一百年間，越南始終爲中國的郡縣，此後爲中國的屬邦，其間（十五世紀初）又一度成爲明的郡縣，文化制度，完全華化。法人之來越南南部（南圻）傳教通商，始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中期，法人在印度的勢力爲英人摧毀，謀取償於越南。時越南南北對峙，黎氏據河內（東京），阮氏據順化。一七七七年，另一阮氏（新阮）奪取順化，繼有河內。順化阮氏（舊阮）透過法國教士，乞援於法。法允以武力助其復國，而以割地及許法人往來居住，獨佔商務爲條件。一八〇二年順化阮氏王朝再興，統有全部越南，並未得法國實際的援助，仍臣屬中國。

法國革命後，對越南的經營復趨積極，越南態度改變，雙方關係惡化。一八五八年拿破崙三世一面追隨英國與中國開戰，一面聯合西班牙，向越南壓迫，先後佔領西貢等城。一八六二年越南乞和，允割地賠款，北圻開港，湄公河通航。其後越南謀收回失地不成，南圻反全爲法有，時爲一八六七年。

法人經營越南的進一步企圖爲打開中國西南的陸上門戶。一八六

六至一八六八年間，法人安鄴（Francis Garnier）率探測隊由西貢溯湄公河北上，深入雲南、四川，知道湄公河不適用於航行，滇、越交通孔道實為紅江（富良江），法人的注意力遂移至北圻。法國商人涂普義一再自上海至雲南販賣軍火，巡撫岑毓英、提督馬如龍許其往來紅江。一八七二年涂普義得西貢法總督之助，強行通過河內，取道紅江，直駛雲南，再滿載銅錫而去。涂普義為圖長期利益，擬運越鹽入滇。鹽為越南政府一大收入，自所不許。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西貢法總督派安鄴率軍北來，襲奪河內，連陷附近各城，勾結盤踞桂越邊境河陽的「黃旗軍」，大事滋擾。越南亦召與黃旗軍素不相能的「黑旗軍」來援。黑旗軍為廣西天地會的餘黨，由劉永福統率，據有紅江上游保勝，恃耕牧、私販及徵收過往船隻稅捐為生，深惡涂普義，率部疾趨河內，大敗法軍，陣斃安鄴。

時距普法戰爭不過三年，法國元氣未復，河內法軍一時非黑旗軍之敵。如繼續用兵，勢將引起與中國的衝突，因於軍事失利後，出以外交應付。一八七四年，先與越南協議，允退出河內。旋訂「西貢條約」（法越和平同盟條約），承認越南為獨立國，代弭外患內亂，開河內等處為通商口岸，法船可航駛紅江，以越南為保護國。不僅否定中越關係，並決心進向雲南。

中國對法人在越南的行動，似不甚了了，未加注意。及涂普義強航紅江爭執發生，廣西巡撫劉長佑主助越南平亂，北京俱令派兵警戒越邊。安鄴奪據河內，劉長佑聲明華軍僅為堵剿越境各匪，與法兵絕不相干，亦即不過問法、越之事。一八七五年，中、英滇案方急，法使乘機將西貢條約通知總署，要求華軍不得進入越境，開雲南一處為通商口岸。總署答以「越南自昔為中國藩屬，」中國派兵乃應越南國王之請，隱含否認法越條約之意，並拒雲南通商。法方將「自昔」二字譯為「昔」字，曲解為中國自行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中國為履行對藩屬義務，扶助越南振復，派軍赴援，剿平黃旗軍，越南亦虔修屬邦之禮。一八七九年，已革廣西總兵李揚才叛變，侵入北圻，越南乞援，中國再度為之定亂，越南貢使復一再前來。

法國對於越南之向中國入貢乞援，及中國之代越平亂，大為不懌。一八八〇年一月，法外長雖向中國公使曾紀澤否認對越有任何企圖，中法不至發生衝突，但暗中則準備出兵北圻。德國頗望將法國的注意力轉移於遠東，表示不反對法國在越南的擴張。不久，醉心於殖民主義的茹費禮（Jules F. C. Ferry）任法國總理，對越政策強硬。十一月曾紀澤質問法外部會否發兵越南，重申越南為中國屬邦。法外部覆以法、越關係，已由西貢條約規定，法有維持越南和平治安之責，並令駐在北京之法使，不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宗主權。欲先有越南，再圖雲南，其伎倆一如日本之對朝鮮。

伊犁條約改訂後，中國聲威增高。一八八一年，曾紀澤一再警告法國，不得妨礙中國在越南權利，否認法越條約，中國有保護越南決心。法方謂總署對西貢條約並無異議，法對越有自由處置之權，中越宗屬關係為過去之事。曾紀澤請總署加撥兵船南下，使法有所顧慮。恭親王、李鴻章均不以為然，只求法國不兼併北圻，並無定要不承認西貢條約之意。一八八二年四月，法軍二次奪佔河內。曾紀澤立即抗議，申述中國有過問越事之權，措詞十分犀利，法方延宕七十餘日，謂越事已由法使與總署商妥。

二、中法談判

以「清流黨」為中堅的輿論，對外素主強硬，至是更趨激昂。伊犁的收回，自亦有關係。侍講學士陳寶琛、張佩綸，山西巡撫張之洞（一八三七至一九〇九），力主存越固邊，大集水陸各師，必要時立劉永福為越南國王，派李鴻章或左宗棠赴越督辦。原較持重的恭親王亦謂法若盡佔北圻，後患將無窮期：「環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國，相逼而處者不只一越南，此不特邊疆之患，抑亦大局之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同請及時部署，聯絡劉永福。詔如所議，用意只在對法嚇阻，並不欲開衅。

法國的越南政策為不使中國干預。巴黎談判不協，改由駐華公使寶海（F. A. Bourée）與總署交涉。此時因援韓成功（見225頁），各

方意氣方盛，但以韓、越問題同起，不能不審慎將事。寶海質詢總署，華軍是否前進；抑或後撤。總署僅云，華軍係會剿土匪，目前未議前進，亦不能遽撤。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寶海與李鴻章會於天津，主彼此不提宗主權或保護權，專議邊界與商務，惟中國應先撤兵，以免不必要的衝突，李認為可行。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草約商就，十二月二十日簽訂備忘錄，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不侵佔越地，亦不損礙越南主權，定雲南保勝為口岸，驅逐匪徒，於滇、桂、紅江之間劃界，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此為中法關於越南的第一次協議。

兩個月後，法國政局變動，茹費禮二次組閣，不滿李、寶草約，將寶海撤任。滇、桂督撫亦指摘草約種種不當。法國既然變議，北京令滇、桂軍停止後撤，派李鴻章往廣東督辦越事，左宗棠籌劃江南防務。劉永福得雲貴總督岑毓英的支援，及萬里請纓的吏部主事唐景崧的激勵，二次進至河內附近。一八八三年五月，再度獲捷，斃法國大佐李威利（H. Rivière）。六月，法援兵反攻，滇軍假黑旗軍旗號截擊，中法戰爭已實際開始。八月，另支法軍進攻順化，迫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正式受法國保護，北圻由法官管理，紅江由法軍駐守。九月，黑旗軍、越南軍俱敗，潰退山西，滇軍亦向後撤。

法國一面進兵，一面派駐日本公使德理固（A. Tricou）為來華特使，繼續談判，並偵察中國備戰實情。李鴻章之被遣赴粵，或係主戰派迫他走向同一道路。李謂法人志在通商紅江，非欲吞併全越，中國「稍一進兵，勢必惹禍上身。」六月，他與德理固在上海相見。德理固故示驕蹇，聲言決對越用兵，即與中國開戰，亦所不惜，要求保證不再管越事。李接曾紀澤電，如讓法得手，則有進無止，主待之以嚴，或竟不理；遂斷然拒絕。德理固的態度果然轉趨緩和，謂法無併北圻之意，僅欲驅逐黑旗軍，通商雲南，中國如不阻撓，法亦不犯中國邊境，中法劃分疆界。李早認黑旗軍為中國之累，中國海防絕不可恃，對於德理固的方案大致同意。

李、寶協議無效，曾紀澤再與法外長沙美拉庫（Challeme-Lecour）商談，沙美拉庫否認越南為中國屬邦。曾紀澤以法國議論未定，且與

英、德不睦，力主備戰，暗助越軍及黑旗軍，最後不妨歸之於各國通商紅江、中、法分有北圻。萬一法方不肯，即堅持續戰，與之長期周旋，法國實不易如願。沙美拉庫促中國撤兵，曾紀澤要求法越停戰，黑旗軍歸中國處理，法國承認中越關係，不再兼併越北，俟法軍退出北圻，再商紅江下游開放。沙美拉庫拒絕討論，但不欲決裂。及黑旗軍戰敗，沙美拉庫又建議劃接近廣西之地為中立區，主將中立區移至紅江流域，彼此條件距離甚遠。

時德理固挾法軍戰勝黑旗軍及越軍之威，北來天津，向李鴻章提議，由北圻海岸至滇邊劃一直線，線以北定為中立區，李堅持中、法以河內為分界起點。總署聲明，法軍如侵入華軍防地，惟有開仗。德理固警告李鴻章法有保護越南全責，俟法兵到齊，即將北圻境內持有武器者一律掃清，不論是否華軍，均以匪論，遂無法續商。

中國內外當局對於越事，皆不願用兵，主和的恭親王、李鴻章如此，被視為主戰派的曾紀澤同樣希望和平解決，出兵北圻只在防禦，使法國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朝鮮多事，李更認為無暇兼顧越南。另一派則以為要保朝鮮，須先保越南，倘法國垂手而取越南，中國坐視不卹，日本必將加緊圖謀朝鮮。正宜乘法國立足未穩，軍事不甚得手之時，亟圖挽救。兩次河內之役，法國損兵折將，黑旗軍名震宇內，縱不能收回全越，最少可保有北圻。國際方面，英國不欲法在越南得勢，鼓勵中國抵抗，不可割地棄權。表面上德國對中國亦表支持。甚至已撤任的寶海亦勸李鴻章採堅定行動，指法政府違約。於是議戰的奏摺紛上，清廷重作軍事部署，命李與左宗棠、彭玉麟分辦北洋、南洋、廣東防務，滇、桂巡撫備，激勵劉永福續戰。李久成衆矢之的，對於德理固的要求，既不敢承諾，又力言目前中國實力絕難將法人逐出河內，他國援助亦不足恃，爭端應早結束。但他並無妥善辦法，復昧於敵情，直至法軍行將進攻之時，尚說法國無意用兵。

三、戰爭開始與天津簡約

中法戰爭之終於未能免，責任不在中國，實由法國主動。中國如

要和平，惟有一任法國所爲。法國認定中國的抵抗力脆弱，滇、桂軍不堪一擊，必要時且可自海上進攻。一八八三年夏，陸、海軍集中河內，如不能透過談判，盡有北圻，即訴諸戰爭。十一月，北京法代辦謝滿祿（De Semallé）聲稱，將驅逐黑旗軍與滇、桂軍。總署重申中國對越宗主權，法軍如進至華軍駐地，惟有開仗。以往是中國利用黑旗軍抗法，中、法是在暗戰，現在已無迴旋餘地。

山西、北寧爲北圻軍事要地，滇、桂軍約七千人守山西，桂軍二萬人守北寧。河內法軍九千人，由海軍提督孤拔（A.A.P. Courbet）指揮，沿紅江西上。十二月十六日，佔領山西，法軍死者三百人，滇、桂軍傷亡千餘，黑旗軍損失尤重。法軍以紅江航行困難，又須鞏固後方，停止前進，以待援軍到後，轉趨北寧。北寧爲華軍主力所在，軍紀不整，官兵半數吸食鴉片，半數携有宰家，或納越妾。廣西巡撫徐延旭與將領復不能和衷共濟，坐視法軍進攻山西不救。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法軍一萬二千人進攻北寧，十二日，守軍潰走，太原續陷。四月，西路滇軍亦退。詔學問徐延旭及滇撫唐炯，罷恭親王奕訢。

北寧失陷數日後，前天津稅務司德瑾琳過香港，晤法國海軍副司令利士比（J. Lespés）、艦長福祿諾（F. E. Fournier），從事調解。福祿諾與李鴻章有舊，提出辦法四條，其一爲速撤曾紀澤。北京以法兵船已在北上途中，許李與福祿諾講解定約，允撤曾紀澤駐法兼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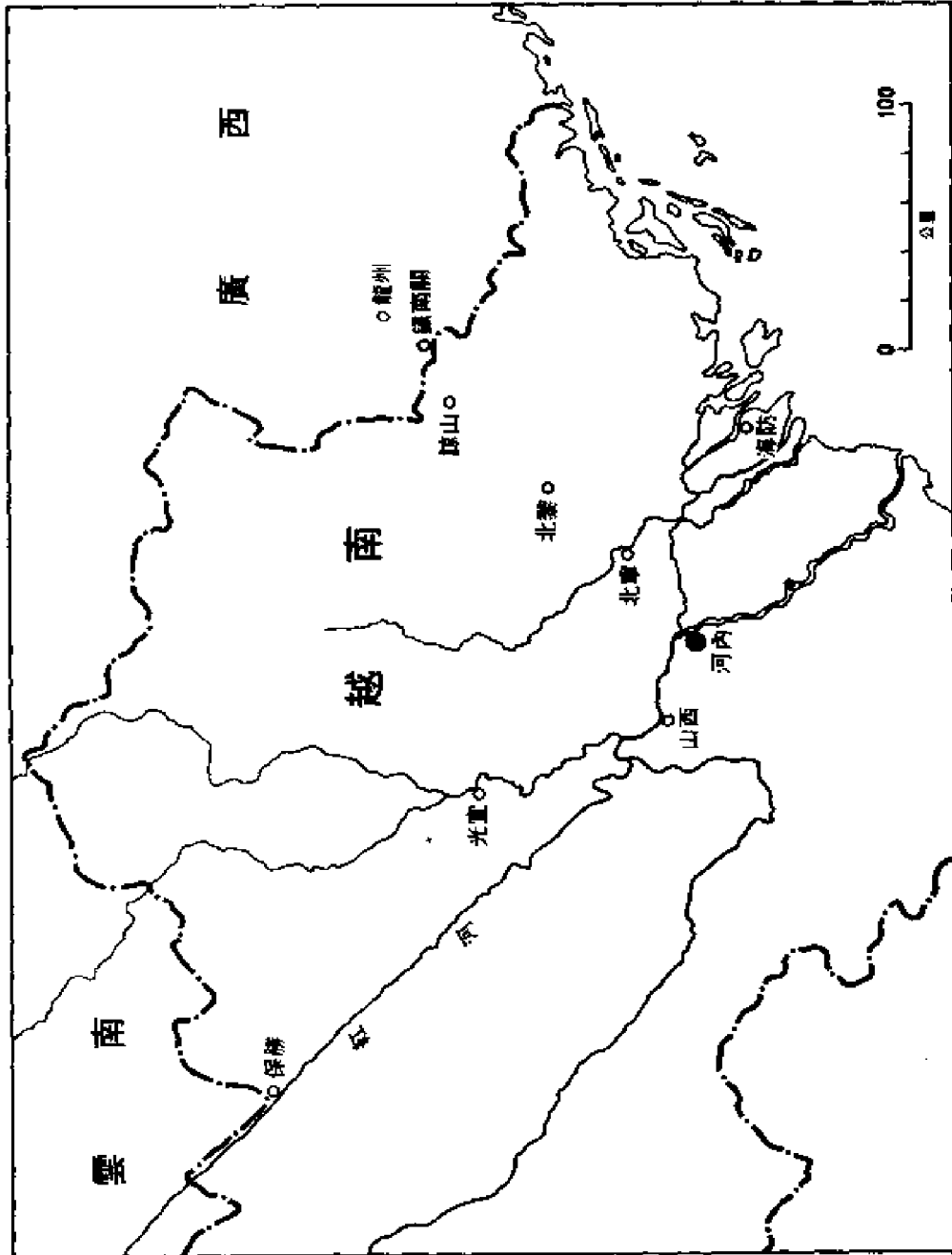
李、福得雙方政府授權後，五月六日，會於天津，談判十分順利。十一日，協議成立，通稱「李、福簡約」或「天津簡約」，法允保全助護毘連北圻之中國南界；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准其在南境通商，不問法越條約；約內不得有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中、法於三個月內會訂詳約。此爲中、法關於越事的第二次協議。

¹曾紀澤與法國外部關係惡劣。山西戰後，法人紛紛主向中國要求賠款，佔有舟山、台灣、海南島。曾紀澤致書德報，倍加譏誚，謂法得山西，舉國「手舞足蹈，如收回麥次（Metz）及士塔士布（Strasbourg）情狀。……中國雖失山西，尙未似十年前法國失師丹（Sedan）之故事。」法人認爲莫大侮辱。

李與福祿諾談判之前，已說今昔事勢不同，難期辦到與寶海所訂草約，但望中、法劃界分守，滇境通商。北京大不謂然，上諭要他切實辨明越南爲中國藩屬，杜絕滇境通商，不賠兵費，保全劉永福。並命北圻各軍仍紮原處，派主戰最力的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會辦福建、南、北洋海疆事宜，授張之洞爲兩廣總督。但是李、福簡約，除不賠兵費一項外，餘均未做到，不滿者愈衆。朝廷命李務須將藩屬、商務、界務於日後詳約內確切註明。

福祿諾在談判之時，要求華軍定期撤退，以便法軍巡邊，爲李所拒。簡約訂後，福再以爲請，桂邊華軍須於六月六日撤畢，滇邊須於六月二十六日撤畢。李在各方抨擊與朝廷命令之下，更不敢讓步，答稱俟詳約定後，再行商議，勸法兵勿急於前進。福以爲原則上李已默認，即通知法軍司令接防。李僅函告總署，謂福臨行之時，提及派兵巡邊等事。詔不准稍退，倘法兵撲犯，惟有決戰。六月二十三日，法軍抵北黎（觀音橋），限華軍於三天內交出諒山。駐軍告以未奉明令，勸勿啓釁。由於譯文的詞不達意，法軍又十分驕妄，強行前進，戰鬥遂起，法軍慘敗，死傷近百。法方指中國破壞簡約，甚至另有陰謀。其實中國雖不滿李、福簡約，然並無決裂之意，仍願開議詳約，前方將領既未接撤兵命令，自不能擅自後退。

巴黎得知消息，至爲激動，茹費禮電責李鴻章，法代辦謝滿祿亦向總署抗議。總署謂簡約並未將界務議定，亦無華軍應撤日期，衝突之責實在法方。謝滿祿要求立即退兵，總署稱可待新任法使巴德諾（Jules Patenôtre）北來續商。謝滿祿不理，發出最後通牒，限華軍於七日內撤退，賠款二萬五千萬佛郎（一千二百五十萬兩）。總署覆稱現已開始撤兵，惟不能賠款。此時法軍艦已至福州，巴德諾在上海面告赫德，在中國撤兵及允賠軍費的條件下，願在上海與中國商訂詳約，否則將據地爲質。北京答應一個月內撤兵，派兩江總督曾國荃與巴德諾會議。七月二十八日，會議開始，曾的使命爲商談詳約，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部由中國處置，分界應設甌脫地，通商限於雲南保勝，賠款萬不能允。巴德諾堅持先議賠款，限七月底解決，然後照李、



圖五 中、越交界

福簡約，訂立詳約。三天之後，曾根據李鴻章的來電，願以撫恤名義付給五十萬兩，巴德諾拒不接受，會議破裂。八月二日，巴德諾聲言自由行動。

四、福州、台灣、諒山之役

法國早有佔領中國沿海土地，以迫使北京屈服之議。七月中旬，法艦在閩海出現，八月五日砲擊基隆，佔領海口，為督辦台灣軍務的劉銘傳所逐退。福州為法艦攻擊的主要目標，負責福州海防的張佩綸於法艦之來，束手無策。李鴻章、曾國荃不滿於以往張佩綸的主戰，復為了自固，不肯應援；粵督張之洞雖與張佩綸一氣，然有心無力。基隆戰起，總署除抗議外，並請各國公評，均無裨於事。李鴻章認為法國不致為要索賠款而開戰，巴德諾則宣稱決以兵力迫中國照辦。八月十九日，謝滿祿再發最後通牒，限二日內允賠款八千萬佛郎，總署仍然拒絕，遂下旗出京。

法國海軍以進攻基隆不逞，改由海軍提督孤拔在福州行動，破壞馬尾船廠。此時駛入福州馬江的法艦九艘，共一萬四千五百噸，大砲七十七門，中國大小兵船十一隻，九隻為木殼，共六千五百噸，大砲四十五門。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五十六分，遭法艦突襲，中國海軍勇猛抵抗，¹沉沒兵船七艘，官兵一千四十人死傷十分之七，張佩綸狼狽而逃。法國損失魚雷艇一艘，死傷三十人。戰鬥僅三十分鐘，一說七分鐘。福建艦隊覆沒，船廠砲台繼被轟毀。

月餘以來，中國人心憤激，輿論力主與法國一戰。八月二十六日明詔宣布，旋派左宗棠督辦福州軍務。張之洞、彭玉麟告示廣東沿海居民及越南、南洋華人共起抵制法人。廣州、佛山、潮州等地法人逃往香港。香港華工拒為法人修船及搬運貨物，被英國當局拘捕責罰，激起罷工、罷市，海外華僑紛紛捐款助餉。

¹曾留學美國、日後成為傑出鐵路工程師的詹天佑，時在「揚武」艦任職，參與是役，表現極為優異。

孤拔突襲福州獲逞後，擬轉向華北，奪取威海衛、旅順口。法政府不欲戰區擴大，以免招致各國的干涉，影響李鴻章的地位，增加法軍補給的困難，決定待佔有基隆，再作計議。劉銘傳在台灣的兵力不多，器械不利，接濟不易，制海權全在敵人之手，處境極為艱險。但他善用地方之力，官民一心，人人感奮。基隆在敵砲射程之內，難於防守，自行將煤礦破壞，以免資敵，再將駐軍後撤，集中滬尾（淡水）。基隆後路有險可守，滬尾、台北之間，道路平坦，一有意外，則全局瓦解。十月一日，法軍奪據基隆，八日登陸滬尾，為湘、淮軍及台灣團勇所敗，這是中法戰爭期間，中國的一大勝利。孤拔知攻奪台灣不易，改採封鎖政策，此舉確使台灣感到威脅。各省竭力接濟，南北洋亦派艦赴援。十二月，以朝鮮發生亂事，戰鬥力較強的北洋快船中途調回，僅有南洋五艘南去。一八八五年二月，駛抵浙江海面，被法艦邀擊，沉沒二艘。以後對台灣的增援，只能潛渡。三月，基隆法軍西犯，擬取台北，湘、淮軍及團勇奮力以拒，激戰四日，法軍以傷亡頗大，未再深入，成相持之勢。同月，孤拔佔領澎湖，加緊對台封鎖。

北圻為雙方主要戰場。八月初，華軍已奉令撤退，上海會議破裂後，復折回原防。十月，東路法軍向桂邊攻畧，桂軍兩路俱敗，法軍亦無力續進。西路法軍因滇軍及黑旗軍圍攻宣光，僅能固守。一八八五年二月，東路法軍萬餘再向桂邊前進，諒山不守，鎮南關繼陷，提督楊玉科戰歿，廣西大震。法軍意在示威，焚掠後南退諒山。西路法軍尋亦解宣光之圍，敗滇軍及黑旗軍。華軍之敗不全由於器械不利，主要原因為號令不一，士氣不振。詔嚴飭各軍反攻，在新自廣東來援的提督馮子材指揮之下，聯合王孝祺、蘇元春、陳嘉、王德榜、蔣宗漢各軍約一萬餘人，主動出擊。三月二十四日，七十老翁馮子材躬親陷陣，大破法軍於鎮南關，繼續前進，二十九日克復諒山，傷法軍統領尼意立（de Neglir），斃法軍數百，恢復原有陣地，是為諒山大捷。約在同時，西路滇軍亦積極反攻，法軍陷於苦戰。

五、越南喪失

列強對於中、法之爭，因利害不同，態度亦殊。俄、日惟恐天下不亂，以便趁火打劫。美、德、英不願法國過份得逞，並欲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均曾從中調處。美國的初步試探遭到法國的謝絕。及觀音橋衝突發生，美國復應清廷之請，再作努力，仍無所成。福州戰後，李鴻章轉與德國相商，德國不甚熱心，德外長僅於形式上一度約中、法兩使會晤，自無結果。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曾以私人身份有所活動，總署以英為埃及問題與法不睦，謀與英同盟未成，但英為商務利益，不欲中法戰爭繼續，因試行斡旋。法要求中國撤兵，承認天津簡約，允法軍佔管基隆、滬尾。中國堅持越南入貢，中越分界，無法妥協。

法國之拒絕國際調處，原以為在軍事壓迫下可使中國完全就範，然不如預期的順利。北圻陸戰始終未獲決定性的勝利，福州海戰雖捷，並不光榮，且受阻於滬尾，不得已而封鎖台灣。不意引起英國的指摘，認為中法已正式交戰，不准法艦在香港停泊、添煤、修理。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宣布所有運往廣州以北各口岸的米糧均視為違禁品，企圖斷絕北京接濟。往來上海以北的糧船，多為英、美所有，英國立即表示，如英船被扣，將武力抵抗，法國進退維谷。至於中國，自知處境與國力皆難與法國敵對，不惟李鴻章力主早日收束，恭親王的態度亦復如是。慈禧之罷斥恭親王，出於憎惡忌恨之心，無關於對法政策。代替恭親王當政的醇親王的外交意見，雖素與恭親王參商，及身當其任，亦不得不多方衡量。福州之戰，張佩綸的表現極為不堪，清流黨不再放言高論，主戰派的氣魄頓挫。慈禧惟恐法國海軍北犯，所謂宣戰乃出於無可如何，強顧顏面的表示。跟着朝鮮亂事爆發，中國大有陷於日、法夾攻之勢。李鴻章愈感日患大於法禍，朝鮮重於越南，必須先了法事，方可一力對日，最少亦不致法與日結。復次，台灣勢若危卵，以之與越南相比，一係海防要區，且為郡縣，一為邊遠藩封；台灣尚屬完璧，越南幾已全部淪沒。審量事勢，權度輕重，惟有固保台灣。倘戰事延長，大局將益不堪問。總之中、法各有弱點，對於英、

日的動態，各有顧慮。

赫德對於調解工作始終不懈。一八八四年底，總署對他所擬方案，表示可以接受。赫德遂命總稅務司駐倫敦委員金登幹，以交涉釋放在台灣洋面被法艦扣留的海關巡船為名，赴巴黎商談。一八八五年一月起，金登幹頗唔茹費禮，提出赫德的建議。一為中國批准李、福天津簡約，法不另作要求；二為立即停戰，解除台灣封鎖；三為會議詳約，定期撤兵；四為金登幹有權先訂草約。經金登幹與法國外部司長畢樂（A. Billot）續議，將草約即休戰協定商就，三月二十二日獲得總署的同意。八日後，諒山敗訊傳至巴黎，國會不信任內閣，茹費禮辭職。同日，赫德來電，謂中國已接受草約。茹費禮仍欲於任內完成和議，四月四日由金登幹與畢樂將草約簽字，接着談判詳細和約。北京方面並不因諒山之捷改變態度，李鴻章謂「此時平心與和，可無大損；」曾紀澤亦稱「如能和，中國極體面，稍讓亦合算。」遂宣示中法言和，停戰撤兵。張之洞力言不可撤兵，上諭謂草約已經畫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法即據澎，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糧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頗能道出當局者於軍事勝利後仍然謀和的內情。

四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簡約，法國解除台灣封鎖，桂、滇軍及劉永福部撤回。六月九日（四月二十七日），法使巴德諾與李鴻章將在巴黎已談妥的和約在天津簽訂，即「越南新約」：雙方各自解散，驅逐匪徒（黑旗軍），法軍不侵中國邊境，並保他人不犯，中國不派兵赴北圻，越南華人受法保護；法、越訂約，不得有礙中國威望體面；會勘邊界，開埠通商；中國如創造鐵路，應向法人商辦相助；法人退出台灣、澎湖。劉永福初不肯內撤，岑毓英、張之洞再三相勸，方行入關，所部三千人陸續遣散，或由滇軍收編。

這次的條約與李、福簡約無甚出入，一年來的戰爭近乎毫無意義。法國雖未得到賠款，但終於達到兼併越南的目的。中國除喪失了唇齒相依的越南，法國的勢力進入了雲南、廣西，取得了在中國築鐵路的

優先權。閩海艦隊之被摧毀，證明二十年來之所謂自強，毫無實際，中國仍無力自衛。諒山之役雖曾獲勝，而不敢繼續進攻，又證明中國缺乏戰鬥決心，重啓侵畧者的輕視。

六、英滅緬甸與始侵西藏

經過中法戰爭，越南之外，另一藩屬緬甸繼之喪失。舐糠及米，遂及於對外尚鮮接觸的西藏。

十九世紀中期，緬甸已爲英國的囊中物，亦爲進入中國後門的捷徑。法國在越南得手後，一八八五年，又自緬甸取得種種特權。英國印度總督決採對抗行動，藉口緬甸政府扣留英商木材，實行干涉，派軍艦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北上，兩週之內，進至緬京曼德勒，俘緬甸國王。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宣布緬甸屬於英國。

清廷對英、緬之爭，一如對法、越之爭，初不聞不問，及馬嘉理事件發生，始行注意。李鴻章要求威妥瑪，以後英、緬問題，須先知照中國。一八八四年，以英國謀緬愈急，曾紀澤建議招降緬北土司，推廣邊界。總署爲越事所困，不敢採納。英國行將進兵緬京之時，始令曾紀澤提出質問，主由中國調處。英稱英軍行動在伸雪緬甸對英人的虐待，一俟目的達成，即與中國共商善後。曾紀澤以緬甸與中國關係，疏於越南，在交涉期間，不明言緬甸爲中國屬邦，只說是貢國。又因緬甸命運難望挽回，如英實行併吞，中國可佔有八莫，以固滇邊。總署希望英國保存緬祀，續向中國朝貢。英國初表同意，允另立緬王，管教不管政。後又變議，主由緬甸總督照緬王舊例，遣使呈儀。曾紀澤仍請「存緬立王」，並將伊洛瓦底江劃歸中國。此項建議，不惟英國不許，總署亦以分界關係綦重。且中國以中、英西藏糾紛已起，緬甸朝貢有名無實，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欲先了緬事，再處理西藏問題。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與英訂立「緬甸條約」，緬甸當局每十年循例向中國進獻方物一次，勘定中緬邊境通商章程。從此中國與緬甸的宗屬關係不復存在。

中法越南條約亦有勘界通商的規定，因之有一八八六及一八八七

年的「中法越南邊境通商章程」及「界務商務專條」，開廣西龍州、雲南蒙自、蠻耗（後代以河口）為商埠，中國西南境如有新的利益許予他國，法國同樣享受。又規定中國得於河內、海防設置領事，法國按照西例優待華人。法國一再推拖，迄未做到。一八九四年中、英訂「滇緬境界及通商條約」，開雲南蠻允為商埠，雲南遂成法、英角逐之場。

英國圖謀西藏，始於一七七四年的要求通商，此後百年，無何發展。中英「煙台條約」，允英派員入藏，為藏人所拒，齟齬遂起。中英「緬甸條約」將前款作罷，日後酌察情形，再議西藏與印度商約，但日久未成。屬於西藏的錫金（哲孟雄），早為英人所控制。英人停止入藏後，一八八七年，藏兵進入錫金。翌年，印度英軍來攻，毀藏兵營房，佔有錫金全境，連陷西藏春丕、亞東等要隘。清廷自始即令西藏退讓，藏兵既敗，由駐藏幫辦大臣升泰會同總署所派海關稅務司赫政（James H. Hart，赫德之弟），與英代表談判。一八九〇年，訂「藏印條約」，錫金歸英國保護，重訂錫金境界商務。一八九三年，根據這個條約，再訂「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條約及續約」，開亞東為商埠，仍係赫政經手。中國失去了錫金，英國的勢力初步進入西藏。藏人愈惡英人，不准亞東開市。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自一八六一年來的二十餘年，中國繼續在內亂外患的困擾中，其得以勉強渡過大難，是因為地方督撫尚能振作，中樞執政大臣，相與配合，慈禧並非唯一的權力人物，尚不敢肆行無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為左右中國命運的列強利害不盡一致，互相牽制，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行動。慈禧原是一個仇外者，英、法軍進入北京前後，據說她曾主盡殺洋人。及中外和議成立，仍勸咸豐再與英、法開仗。其後為奪取

政權，不得不結納頗得外人好感的恭親王。恭親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勸導，她又不得不降志以從。但是恭親王終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屢予裁抑，必去之而後快。

恭親王的異母弟醇親王奕譞，秉性憨直，對於恭親王的煊赫權勢不免妒嫉，尤不滿其對外措施。一八六九年，曾主驅逐洋人，激勵紳民，打毀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傳爲他所主使。事後因懲兇賠款，憤請辭職，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爲務，」恥與同列，並謂「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夷務之無起色，由於「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對抗恭親王，溫諭慰留，恭親王大爲不安。

光緒繼統，醇親王爲了避嫌，自請開去差使。恭親王亦謂昔爲父子，今爲君臣，如仍值朝列，於禮不便，應令歸邸第。不無排擠之心。但醇親王貴爲皇父，無形的影響仍大，慈禧復有意籠絡優崇，每遇國防外交大事，皆命以親王身份預議，他的發言，常具有決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親王形單勢孤。一八八〇年，慈禧的太監違禁携物出宮，與護軍互毆，慈禧定要嚴懲護軍，與恭親王發生激烈爭辯，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時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從中協調。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親王與慈禧之間失去了緩衝。

恭親王年逾五旬，飽嘗憂患，無復早年的豪氣，與慈禧同樣好貨。越南事起，清議激昂，慈禧、醇親王隱爲護持。他與李鴻章成爲指責的目標，益使其前瞻後顧，舉棋不定，忽戰忽和。慈禧召見之時，恭親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戲、進呈禮物等淺俗末節之事瀆請，不僅爲慈禧所輕鄙，同僚翁同龢亦譏其瑣屑，缺乏識量。於是樞臣奉職無狀的彈章隨之而上，慈禧即以「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相責。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親王再遭譴懲，與全體軍機大臣悉被革罷，代之以禮親王世鐸及醇親王的親信工部侍郎孫毓汶等，遇有緊急要件，會商醇親王辦理。至於總署，醇親

王久謂辦理夷務之臣應與秉政之臣分開，三天後，命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懲恭親王的理由是軍機處爲用人行政樞紐，恭親王「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祇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所說雖非完全無因，其實不過是表面口實。新任的軍機大臣更等而下之，經驗、才識、資望，遠不能與舊任相提並論，貪鄙且尤過之。詔下之日，朝野驚愕，謠傳騰起。原劾恭親王之人，亦謂越南正有軍事，不宜概易生手，「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請仍令在軍機處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謂恭親王等多爲二十餘年親舊，有贊佐之功，縱有小過薄愆，面加戒飭已足，今則以爲舉不足信，一朝俱罷，實難服天下之心。醇親王並非明達有爲之人，禮親王復懵懂不曉世務，大權落於孫毓汶之手。從此事事專仰慈禧鼻息，「賄路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以往清流黨喜放言高論，君臣尙畧有顧慮，現在清流黨的魁杓李鴻藻被罷，張佩綸、陳寶琛等外放，不久落職。中法戰後九年，內外無何重大戰亂，以爲天下太平，諸事日益廢弛。

總署與軍機處爲平行機構，舊有總署大臣多由軍機大臣兼領，彼此一氣，現在總署成爲軍機處的隸屬。新任大臣大半不兼軍機大臣，包括總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爲遠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從未涉足洋務，名望能力皆無可述。他自知難以勝任，滯陳種種窒碍。一爲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隨時請旨；二爲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將對總署輕視；三爲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闕，事理必至掛漏；四爲總署與疆臣勢將呼應不靈，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務爲當前大端要政，重洋務必須重視總署，總署之權必不可輕，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樞臣秉國之鈞，焉可不明洋務？樞臣不兼及洋務，不成其爲軍機大臣，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爲總理衙門，所以軍機處與總署斷不可分。但是慈禧與醇親王認爲以不合爲上。此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總署大臣約爲九或十人，其中兼軍機大臣者不

過二、三，奕劻不在其內。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恭親王復起，總署與軍機處的關係始再恢復。

慈禧與恭親王在明爭暗鬥、貌合心離之下，尚能勉強相處二十餘年，而與醇親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揮霍無度，嗜利好貨，為之通關節的為宦官李蓮英，醇親王嘗有諷勸，漸為慈禧所惡，憂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緒親政，仍受制於慈禧。翌年，醇親王再病，終於不起。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

一八七五之興辦海軍，係以東方新興的日本為假想之敵。一八八二年，李鴻章鑒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國兵船僅可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且分駐數省，號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統歸海軍省節制，呼應一氣。萬一中日有事，勝負不易逆料，除在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外，須再添購新式快船為輔佐，中樞與地方合謀，方可成一局面。年餘之後，再請統一海軍事權，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聘洋將。時中法戰爭已起，陸戰尚互有勝負，海戰則一再失利。戰後痛定思痛，決大治水師，續購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總理，慶郡王（奕劻）及李鴻章會同辦理，漢軍都統善慶，兵部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所有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先練北洋一支，由李負責。十一月，第三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定遠」、「鎮遠」及「濟遠」三船到大沽。

海軍衙門設置的前二日，李鴻章電促前被英國召還的琅威理再來。赫德恐中國海軍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電懇勸，並請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採行英制，雇用英人，授以訓練全權，得李同意後，於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親王、李鴻章校閱水師操練，李意氣至豪，琅威理獲授海軍提督銜。八月，北洋艦隊遊弋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衝突，各有死傷。琅威理請對日開仗，李鴻章持不可，互給撫恤了事。有謂如用琅威理議，一舉而挫日本艦隊，以後的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遠」、「靖遠」、

「經遠」、「來遠」四快船自英、德駛至。翌年十二月，北洋海軍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學的林泰曾、劉步蟾任左右翼總兵，各艦管帶亦多為留英學生。除已竣工的大沽軍港外，旅順、大連、威海衛均在興建、佈置。琅威理主再經營膠州灣，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順最具規模，一八八〇年着手佈置，船塢由法人承辦，砲台由漢訥根主持，一八九〇年工竣。

北洋艦隊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購自英國，五艘購自德國，餘為自造，另有練兵魚雷艇各若干，約計四萬噸，砲一百二十餘門，官兵四千餘人，以「定遠」、「鎮遠」兩艦為巨擘，各七千餘噸，次為「經遠」、「來遠」等五艦，各約二千數百噸。成軍前數月，李鴻章從琅威理及各將領之議，請續購戰艦，曾紀澤亦有建白，均不獲採納，曾紀澤且受同僚旗人傾害，抑鬱而卒（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閱後，李稱旅順船塢已成，軍艦有了歸宿根本，大連、威海衛砲台行將完工，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但實際情形並不如他說。前此戶部以籌款困難，主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李的左右勸他奏駁，不論允否，亦可披露心跡，李不之從，怕的是有違慈禧之意。時慶親王奕劻主海軍衙門，更難期有所獻替，北洋海軍發展，陷於停頓。

海軍餉絀，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於園庭修建，關係至大。初議創立海軍之時，傳說李鴻章命人託李蓮英轉告慈禧，將來圓明園工程可併入辦理。圓明園計劃作罷，又議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鴻章之經營北洋海軍，是為鞏固京師門戶，醇親王意欲自行掌握，並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囑李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名義，借款百萬兩。李以越事為人所不諒，恐蹈恭親王後塵，唯命是從，即作為海軍經費開支。三海並不能令慈禧滿足，定要仿照圓明園的規模，別營頤和園，以「頤養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興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軍經費挪墊，且曾借動出使經費。究竟提用幾何，說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餘萬兩，有云二千餘萬兩，有云三千餘萬兩，雖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請續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後丁汝昌復主

從速添船換砲之未獲准，不能謂與園工無關。翁同龢所謂「以昆明（頤和園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艦的維持費，尚須依賴借款。南洋艦隊更不必言，是後未再增一船。

人事爲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職位多爲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諳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爲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爲難。一八九〇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蟾、林泰曾爲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携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此一時期的陸軍改革，除了開辦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外，無其他積極措施，大約以爲有了海軍，海防鞏固，陸上即可無虞，而且各軍多已採用洋槍、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時財力亦不許海、陸軍並建。

三、台灣建設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國海防的積極建設，亦促起了朝野對於台灣的重視。就地理上說，台灣關係海防極大，一有意外，全局牽動。過去兩百年的消極政策，斷不能應付當前及今後的情勢，躬蒞其境的沈葆楨曾說：「彼（日本）退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吾備遂弛，則又抵隊而來。」「台地向稱饒沃，久爲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眈眈而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爲門戶，其關係非輕。」台灣善後，絕不容緩。所謂善後，實即剏始。沈初到台灣，即修建砲台，爲治標工作，其後從事基本經營，作長治久安之計。

沈的主要措置，一爲開山撫番，藉衛地方，以弭內憂。開山工作爲修通道路，沿途築堡、設屯。撫番工作爲安撫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戶，安定番業，設立番學。二爲招徠墾戶，廢除內地渡台例禁，設招墾局，內地來台者免費乘船，到後官給口糧、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三爲增置郡縣。於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外，南部添設一縣，中部、東部各添設一廳，北部添設一府、三縣、一廳。¹四爲推行新政。沈未來台灣之前，已派員勘探基隆煤礦(一八六八)，到台之後，經營益力，聘用英國礦師，再行勘查，添置機器。又備置輪船，行駛閩、台之間，準備以台灣爲將來南洋艦隊的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繼沈葆楨經營台灣的，以丁日昌爲重要。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撫，幾乎是以全力籌劃台灣建設，認爲購鐵甲船、練水雷軍、槍砲隊、造砲台、開鐵路、立電線，皆屬應辦之事。基隆煤礦開採已有端緒，硫磺、煤油、樟腦、茶、鐵亦當逐漸招商開拓。惟籌款不易，李鴻章勸他先專力路、電、礦、墾。基隆煤礦有了改進，中國最早的電線在南部架設，聯貫南北鐵路亦在計劃。

首發台灣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爲沈葆楨，十年之後，終於實現，此爲中法戰爭所促成。戰爭期間負責台灣軍事的劉銘傳具有進步的觀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爲福建巡撫。中法戰事甫了，他自請開缺，以便專心經營台灣。中樞及李鴻章因此次戰爭的教訓，即決心大治海防，於是一面命劉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設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改建行省的上諭同時頒發，即以劉爲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作爲富強的基礎。他採行的政策，與沈葆楨、丁日昌無大出入，而成就過之。除改進番人經濟、

¹原有台灣府(台南)，台灣(台南)、鳳山(高雄)、嘉義、彰化四縣，淡水(新竹)、葛瑪蘭(宜蘭)、澎湖三廳；新添南部恆春縣，中部埔里廳、東部卑南廳(台東)，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蘭縣及基隆廳。

教育，調整行政區域外，一是整頓財政。首先清丈地畝，重定賦則，使豪室之家不得隱匿霸攬，胥吏無由朘削，人民負擔平均。台灣原額賦銀為十八萬兩，今則達六十七萬兩。次為清理稅收，由九十萬兩增至二百餘萬兩，最後與田賦合計為四百餘萬兩，台省之財，足供台省之用。二是軍事建設。編練艦隊，雖力有未逮，陸防則大為增強，營建新式砲台，上架西洋大砲，配以水雷。所有防營，皆用洋槍，延洋員教練，並設機器局。三是舉辦交通實業。鐵路計劃為北起基隆，南達台南。台北、基隆之間，於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間，於二年後竣工，共長六十英里。輪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遠及南洋。電線南北聯接，及於福州、澎湖。郵政隨之開辦，較大陸的正式設立尚早。基隆煤礦，新購機器開採，並設煤油局。農產方面提倡水利、種茶、植棉、蠶桑。商務方面，招徠南洋華僑投資，獎勵對外貿易，建築台北商埠，創辦電燈、自來水。四是興辦科學工藝學堂。建設需要專門人才，開始暫用洋員，為永久計，必須自行作育。先立電報學堂，繼立西學堂，延英國及丹麥人為教習。此時全國設有公立新式學堂的不過四省，台灣為第五。

經過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慘淡經劃，台灣步步前進。中國的自強運動已三十年，而以劉銘傳為最努力，在二十三省中台灣最具規模。

四、內外干阻下的鐵路經營

一八八〇年劉銘傳的鐵路計劃雖遭頓挫（見236—237頁），李鴻章仍不願將此問題長期擱置，總望設法開示朝廷，並「使世人畧知此種底蘊。」他首謀說服醇親王，借以影響慈禧太后。醇親王表示可先試行煤鐵之礦、開墾之地，及屯軍設防口岸，再謀推廣。李為轉漕運兵便利，請先築沿運河一線，再及於京師至漢口一線。一八八三年，李復函總署，力陳欲求富強，舍鐵路莫由，「倘海有鐵船，陸有鐵道，國家真實聲望，始得樹立，外人斷不敢輕易動手。」不久中法戰起，無暇再議。及醇親王當政，李和他商討海軍問題時又談到鐵路。一

八八六年，與唐胥鐵路有關的工程師金達向李建議，就唐胥鐵路分段延展。李得醇親王同意，設立開平鐵路公司，以曾留學英國的伍廷芳任總理，自胥各莊向西南修至閻莊，長約二十英里。開工後醇親王又與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將來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東北邊防，時為一八八七年。此路為官督商辦，改開平鐵路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後向英、德借款。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車，長約八十五英里，李曾試乘，十分興奮。台灣鐵路亦同時興造。

唐胥鐵路完成後，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國如辦鐵路，須借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請。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許法國以辦理鐵路的優先權。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師既為金達，一切採行英制，英國實已佔先。李鴻章於通車後，立請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鐵路，向英國進行借款。為使慈禧、光緒得以親觀，先已於京師修了一條長約二英里的小鐵路，可謂煞費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對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場軒然巨波。初反對的為幾位御史，最大的理由為鐵路有害於國，有害於民，其利僅在洋人。鐵路一成，險要盡失，通州密邇京師，又萬不可修築。正在此時，宮門被火，認為是天意示懲，不以鐵路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書翁同龢、孫家鼐、軍機大臣孫毓汶等數十人，同聲請求停造。有的係由於政治上對李不滿，如翁同龢、孫毓汶，有的是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通州為運河終點，如運河為鐵路取代，一向倚靠漕運為生及借漕倉舞弊的，失其憑藉，所以反對者之中亦有倉場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車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喫漕為事的痞棍，更是極力滋鬧，反對者愈加有詞，詆李不恤民情，勢將引起意外。李十分憤慨，致書醇親王，謂：「辦天下事，貴實心，尤貴虛心，非真知灼見，不能辦事，亦不能論事，貴耳賤目，最是誤事。……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實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詔命海軍衙門及軍機大臣會商，並命沿海重要當局籌議。海軍衙門、軍機處及劉銘傳支持原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別有新的方案。

張的方案為緩造津通鐵路，改築自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以貫通南

北腹地，使土貨可出、機械可入，不僅利商利工，鄉間農產與製作，亦得以遠行，又可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征兵轉餉是矣」。利國與利民實相表裏，張之立論重點在民生經濟，同時亦及於國防，仍為富強兼顧。李一樣注意二者，惟規劃不及張之宏遠，認為須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漸。張反對借款購鐵，主自行積款製鐵。李並非根本不贊成張之建議，只說張的辦法過於迂濶，仍主購用外洋鐵軌，分南北兩段試辦，經費分商股、官款、洋債。朝廷大體採李的主張，一八八九年，調張為湖廣總督，命與李會同海軍衙門籌辦。但張的製鐵計劃非短期可成，李於此一鐵路又乏熱忱，仍謀修造東北鐵路。津通線作罷，蘆漢線亦因之擱置。

近年日本對朝鮮窺伺愈急，俄國復有築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中國對東北邊防益為重視。一八九〇年，李鴻章籌議朝鮮事宜，其一即興辦鐵路。路線為自唐山東出山海關，至于瀋陽，以達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鴻章為關東鐵路督辦。是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要求承辦關東鐵路，期與聯接。總署允將橋樑及車輛所需鐵料歸法商供給。所需之款初與奧國商洽未成，為顧慮俄國作梗，亦不便向英國借貸，不得已而緩修蘆漢鐵路，將每年原撥之二百萬兩，改用於關東鐵路，以金達為工程師。俄國終不願中國建築此路，又恐英國的勢力侵入東北，仍多方為難。一八九三年自唐山修抵山海關，翌年東至關外中後所（綏中），以中日戰起，所有鐵路一律停辦。無論如何，天津至山海關附近總算通車，為一八九四年前中國最長的一條鐵路，約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

機器局、造船廠所需的煤鐵，俱來自外洋。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已謂「船廠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閩、滬各廠，日需外洋煤、鐵極夥，中土所產，多不合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開平煤礦解決了燃料問題，但不曾解決材料問題。中國鐵礦既未開採，煉鐵亦非咄嗟可辦，

均要相當的時間與財力、技術。但槍砲製造，急不容緩，機器局須推廣設置，鐵的需要數量隨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左宗棠力言必須另開大的鐵礦，添置機器，從事煉冶，始可免向外洋購買。最後促成其事的為張之洞。

張之洞於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粵，北圻前敵軍火多賴他接濟，不惜重金分向歐、美廣求利器。但十分艱難，種種吃虧。戰後決將廣州機器局擴充改新，自行採礦煉鐵，作根本之圖。廣東每年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出口，他以為兩廣產鐵不少，廣東鐵質優良，不必再行開礦，即可設廠煉鐵，遂開始籌備。初擬修造蘆漢鐵路時，每年進口之鐵約值三百萬兩，如仍取之海外，則漏卮太多，主張先行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待新鐵之採日旺，舊鐵之煉日精，積款已足，路工已爛，再行開建，朝廷從其所議。時張已向英、德定購機器，延聘礦師、洋匠。及張調湖廣總督，他的繼任者說是廣東的鐵砂不豐，財力亦難負荷，不主在粵建廠。既有此阻力，張得知湖北有大冶鐵礦可開，欲一手完成煉鐵事業，即請將所定機器移至湖北，廠址定為漢陽，時為一八九〇年六月。此即日後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的由來。

除原有的機器外，張之洞又自比利時添購，工程師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漢陽鐵廠的主要任務為製造鐵軌，其後蘆漢線雖然暫時緩辦，關東線又開始興築。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鐵廠告成。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此時全亞洲皆無鐵廠，上海各報大事宣傳。究之實際，成本過高，品質又不見佳，並不能與洋鐵競爭。支援製造槍砲為漢陽鐵廠的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無所成。統計六年內用款達五百數十萬兩。規模較上海、天津兩局為大。

五口通商以來，輸入中國的商品，在正規貿易中，以紡織品為主，第一為棉紗棉布，其次為呢絨，沿海地區先受到影響（見 88 頁）。左宗棠到西北後，以甘肅盛產羊毛，可用以織褐織毯。一八七一年設立蘭州機器局，除製軍火外，並自造機器，試製洋絨，進而添購絨呢機器，由上海德國洋行承辦。一八八〇年成立機器織呢局，技師盡為德人。左離西北後，德人以合約期滿回國，織呢局鍋爐破裂停工，為時

僅約三年。另一原因為成品的質量、售價均不能與洋呢相爭。

一八五六年以來，英商兩次謀在上海設立紡織廠未准。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有感於英國洋布輸入為中國耗財大端，亟宜購置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願意承辦，獲得李鴻章的協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樞陳述「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價，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先購用，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不得不設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享有十年專利權，這是第二個非軍事性的企業。曾任洋行買辦的鄭觀應為初期的主要籌劃人。但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影響尤大，股本至一八九〇年始行募足，有三萬五千紗錠，五百餘台布機。終因官為總辦，弊端叢生，三年後燬於火，損失不貲。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一如鐵廠，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錠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辦湖北紡紗局、縲絲局、製麻局，與織布局合稱為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張的願望是能將盈餘撥補漢陽鐵廠，亦即以民生工業所獲之利，作軍事工業的佐助，實際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辦而非官督商辦的華新紡織新局，此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年專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別行設局的規定，自屬違背。它之得以設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願附股於官督商辦的企業，李鴻章或感於辦法有變通的必要，華新局的規模又不甚大，股東復為有力之士，如江海關道聶緝槃，¹所以特予許可。最後作為華盛機器紡織廠的分廠。

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津海關道盛宣懷及聶緝槃奉李鴻章之命於一八九四年，在該局原址另行籌設，名曰華盛機器紡織總廠，仍為官督商

¹曾國藩之婿。

辦，並於上海、寧波、鎮江等處招商分設十廠。預定總廠紗錠為七萬枚，布機一千五百台，各分廠二萬枚至四萬枚不等，布機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年共值銀二千五百萬兩（時進口紗布共值銀五千二百萬兩），仍享有十年的獨佔權，紗布如果出口，除關稅外，概免內地沿途稅釐。此一新的紡織廠，即由盛宣懷督辦。

第八章 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

(一八八五至一九〇〇)

第一節 日本挑釁求戰

自強運動的動機，一為對內，一為對外。對外實指西方國家，志在自保。一八七四年以後，日本亦為對象之一，甚而更為重要。其後雖經中法戰爭，仍時刻注意日本的動態，但仍係守勢。日本明治維新，高唱「尊王攘夷」，尊王是鞏固皇權，攘夷是防衛歐、美，所採亦為守勢。及維新稍有所成，則轉對中國，所採全為攻勢。中日遂不免一戰，亦為兩國新政的一次決賽。朝鮮當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之衝，所以爭端即起於朝鮮。

一、李鴻章的朝鮮政策

中國之重視朝鮮是爲了東北的安全，因爲東北的安全，關係北京的安全。十六世紀末年，日本之進攻朝鮮，目的在先據朝鮮，再圖東北，然後直下北京。明朝不得不全力赴援，日本未能獲逞。後以種種原因，明朝失去了東北，以致於亡。這段歷史清朝自然知之甚稔，決不讓其重演。日本圖謀朝鮮益急，中國防範益力。

俄國自取得烏蘇里江流域以東，與朝鮮毘鄰，亦生覬覦之心。甲申事變後，朝鮮外署協辦德人穆麟德雖爲李鴻章所薦，並不忠於中國。可能是爲了德國的利益，欲引俄東進，勸誘朝鮮聯俄。一八八四年俄、韓訂約，穆麟德因有促成之功，俄皇賜以勳章。俄國駐韓代辦韋伯(K. Waeber)與閔妃及朝鮮大臣相結，共謀排斥中、日。一八八五年二月，朝鮮與俄國在海參崴訂立密約，允俄人代爲練兵，使用永興灣。不久消息外洩，最感不安的，中國之外，首爲日本，次爲英、美。日本自度尙難與俄相爭，如朝鮮入於俄國之手，不惟難再插足，日本

本土亦將受到威脅，如朝鮮仍聽命中國，可不必畏懼，遲早終可爲己所有，目前正不妨利用中國防俄。英國爲阻止俄國南下，遂自佔領朝鮮的巨文島（Hamilton Island）。美國對朝鮮的態度，自始即與日本一致。朝鮮因中國的責難，不敢履行對俄密約，擬改聘美國將弁，俄國不許。日本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向李鴻章提出應付方案，大致爲中日今後協議朝鮮外交與用人行政，由李責令朝鮮施行，遴派一幹練的中國駐韓大員，遇事與駐韓日使相商，斥退穆麟德改用美人，釋回大院君，以制朝鮮政府的親俄派。李雖不願日本過問韓政，但原則上已同意變通。

袁世凱於救平甲申事變中，大顯身手，因日人誣其首啓變端，統率中國駐軍的吳兆有亦不滿袁的專斷和露才揚己，多方排擠，袁不安於位，憤而歸國。但李鴻章對他深爲賞識，獎勉有加，查辦韓事的吳大澂又代爲揄揚，譽爲「天下奇才」。及李決定釋回大院君，即命袁負護送之責，盛贊他「才識開展，明敏忠亮，」「足智多謀，」「膽畧兼優，能持大體。」一八八五年十月，正式派爲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委員，由同知升爲知府，加三品銜，從此中韓關係轉入另一階段。李爲決策人，袁爲執行者。李將此獨當一面的重任，付之與一位不滿二十七歲的青年，可算是破格用人。

閔妃與大院君結怨已深，對於大院君的歸來，極力抵制，大院君終不能恢復舊時權勢，反加重親俄派對中國的怨懟。今後數年李、袁之所以仍能有所施展，是由於日本的暫時放手，與英國的支持。李與榎本諒解成立，即致書朝鮮國王，勸勿認海參崴密約，委任美人練兵，罷斥穆麟德，重用親華派大臣主管外交、軍事、財政。穆麟德撤職後，朝鮮允以中國海關副稅務司美人墨賢理（H. F. Merrill）爲稅務司，前任天津美國領事德尼（O. N. Denny）爲內務府協辦，均爲李所推薦。穆麟德逗留不去，繼續播弄。袁揭發俄國詭計，誠告韓王，逼走穆麟德。一八八六年，韓王又密函俄國保護，袁聲言將興師問罪，李亦準備於必要時實行廢立。朝鮮君臣一再辨白密函出於偽造。俄國以對英國有所顧慮，保證不佔朝鮮土地。李、袁分說韓王，勿持兩端，固依

中國，改革內政。

美國雖無侵佔朝鮮土地之意，而所採政策，則不利於中國。駐韓美代辦福久（G. C. Foulk）嘗散布指摘袁世凱的消息，袁授意朝鮮外署駁斥，要求美國撤換。對於倡導朝鮮自主的德尼亦極不滿。北京美使質問總署，袁在朝鮮究係何種職位。英國與中國合作無間，不在漢城設置使館，但置領事館，受北京英使館節制。墨賢理之任朝鮮海關稅務司，係赫德直接委派，無異將朝鮮海關納入中國海關行政範圍。一八九〇年，朝鮮謀以美人李仙德為稅務司，赫德令現任稅務司拒絕交付，遇事與袁商辦，聽其指示。

袁為權力慾極強的人。據張謇說，袁初至朝鮮，即有統治朝鮮之心。甲申亂平，他曾建議李鴻章乘此時機，派遣人員，統率重兵，代理內治外交。不到一年，他成了中國在朝鮮的最高權力人，不僅負責商務，兼主外交，朝鮮內治亦須與他相商，一切居於指導監督的地位。朝鮮大臣遇事須向他請示，或召來曉諭；或逕見朝鮮國王。他不常參與各國外交官的會議，以示身份不同。美、日均有煩言，李鴻章則說理應如此。一八八七年朝鮮受德尼教唆，自行派使分赴美國及英、德、法、俄、義。袁謂派使須先向中國請示，到任後受中國使臣節制，並追回私自啓程赴美的使臣朴定陽。最後李鴻章准以屬國體例派遣，朴定陽不肯遵照。在袁壓迫之下，德尼去職，朴定陽召回，前往歐洲的使臣中途而止。李鴻章並非忘了他過去勸朝鮮與西洋通好的政策，而是通好須透過中國。

朝鮮一再舉借外債，袁要求今後借款須得中國同意。他與赫德主張歸中國承擔，由在韓華商出名借與，實際是中國政府撥付，在朝鮮關稅內扣償。近十年來，日本幾獨佔朝鮮對外貿易，一八八七年起，華商日漸抬頭。次年招商局輪船開始往來於上海、仁川之間，中國政府不惜給以補貼，仁川至漢城亦有華商小輪航行。奉天至漢城、釜山電線歸中國電報局貸款架設，他國不得另設。朝鮮自設的漢城至元山電線亦歸中國管理。

朝鮮以袁世凱每事干涉，有如監國，面從心違，屢請更調，美國

有同樣要求，均爲李鴻章所拒。李向中樞稱袁實心任事，操縱得宜，晉升爲道員。一八九二年復盛讚袁的功績，說他「先正藩屬之名，以防其僭越，復籌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體制所繫，利害所關，或先事籌劃，或當機立應，或事後補救，無不洞中竅要。……其國中之事，纖悉皆聞。」袁的成就亦即李的成就。不過李、袁所爲，消極的防範干涉多於積極的輔導啓迪，但知維護中國的宗主權，漠視了朝鮮的自尊心，不僅朝鮮君臣愈爲離心離德，日本更不甘長期坐視。

二、日本的決心

一八八五年，日本已有人主張爲朝鮮與中國一戰。伊藤博文以爲不可冒昧；中國發奮圖強，皆是空言，日本應先努力內部建設，再看中國情勢行事。一八八七年，日本參謀部擬定一「征討清國策」，一旦對華作戰，以主力進攻北京，分兵畧取長江，最後割取遼東半島、山東登州、舟山羣島、台灣、澎湖及長江兩岸，再分裂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甘肅、華北、江南。以五年爲準備時期，相機發動。一八九〇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施政演說，指朝鮮、東三省、台灣悉在日本「保護利益線」之內。一八九二年，日本的擴軍計劃完成。第二年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親至朝鮮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偵察。一八八五年李鴻章曾說，日本富強，尙須十年左右，目前可望無事。現在去十年已不太遠，中國依然故我，日本的國力則大有可觀，遂決志尋衅。

朝鮮君臣對李、袁的舉措雖常生違言，但尤銜恨日本。一八八九年，朝鮮某地歉收，禁止豆、糧出口，日本要求撤銷，賠償日商損失。一八九三年，發出最後通牒，首相伊藤博文直接對李恫嚇，將對韓絕交，朝鮮允許賠款。

金玉均的被刺，加重了日、韓的惡感。甲申事變後，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繼續謀奪取政權，朝鮮要求日本拘辦被拒，計劃實行暗殺，袁世凱預聞其謀。一八九四年三月，金玉均爲韓人洪鐘宇誘至上海，被刺而死。朝鮮不理日使勸告，將金屍凌遲。在東京謀刺朴泳孝的另一韓人逃入朝鮮使館，被日警拘捕，韓使憤而返國。日本輿情

甚為激動，謂金玉均的被刺戮屍，出於中國的主使，對日本為莫大污辱，應斷然與中國宣戰。日本當局認為理由有欠正大，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唆令以侵畧中國為職志的「玄洋社」另行製造口實。

東學黨為朝鮮的一個宗教性團體，有排外色彩，遭政府禁止。人民以不堪苛政，仍相率加入。一八九三年，東學黨請願弛禁，官府迫害愈烈，遂聚眾大起。朝鮮政府一面宣撫，一面向袁世凱請援。時傳金玉均與東學黨勾結，袁速電李鴻章告急，東學黨旋即解散。一八九四年二月，東學黨再度舉事，傳檄四方，「逐滅夷倭，」痛斥官吏虐民肥己。四月，日本軍人前來活動。五月，玄洋社組織「天佑俠團」，對東學黨煽惑接濟，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這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的良機。六月二日，得知朝鮮已請中國代為平亂，決定不問中國以何種名義出兵，日本亦將派遣相當軍隊，以示不惜訴諸武力的決心。陸奧訓令即將回任的駐韓公使大鳥圭介，軍事採取主動，外交採取被動。六月十日，大鳥率陸戰隊四百餘人入漢城，控制朝鮮首都，海軍隨之動員，以保海上交通。

日本惟恐中、日在韓軍事對抗之局不成，六月三日，日本駐韓代辦及天津領事分向袁世凱、李鴻章表示，希望中國及早派兵為韓平亂。一向精明機警的袁，以為日本似無他意，李亦深信不疑。駐日公使汪鳳藻復謂日本政爭劇烈，斷無生事餘力。李一面出兵，一面命汪照會陸奧，告以中國應朝鮮之請，按保護屬邦之例，派軍赴援，事平即撤。陸奧復稱，日本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亦要派兵保護使、領、商民。同日(六月七日)，北京日本代辦小村壽太郎照會總署。總署駁以日本無派大兵必要，且非出於朝鮮之請。小村二次照會，謂日本出兵係根據日韓及中日天津條約，惟有行其所好，毫無受中國掣肘之理。

李鴻章派出的陸軍約二千餘人，屯駐漢城東南五十英里的牙山，軍艦三艘，泊於仁川。日本第一批動員的兵力倍於中國，另有軍艦八艘。在中、日軍抵朝鮮前，東學黨已經受撫，朝鮮安謐無恙，日本失去了保護使、領、商民的口實。大鳥顧慮西方國家的指摘，轉與袁商談共同撤兵。袁於日兵之來，焦慮萬狀，對大鳥的提議，正求之不得，

當與成立諒解。李鴻章亦以爲華軍一撤，日本自無常駐口實，命牙山駐軍定期內渡。陸奧定要貫徹求戰決心，況既已出兵，不能一事不成而退。成敗之數，全在兵力之優劣，命仁川日軍入漢城，俾軍事上常能先發。然苦於缺乏尋衅理由，必須設法使局面轉換。六月十四日，決定以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亦即共管朝鮮，強中國以難行；無論中國允與不允，非有結果斷不撤兵，必要時獨自任之。陸奧自云：「非欲調和已破裂之關係，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機，」方可「實行最後決心，」命大鳥終止與袁談判，並分別通知汪鳳藻、總署與李鴻章。

汪鳳藻要求先行撤兵，再商善後。陸奧謂非至朝鮮確然安堵，決不撤兵。汪謂整頓內治，應由朝鮮自辦，中國不便干預，日本承認朝鮮爲自主之國，更無干涉之權。陸奧稱中日所見相違，日本對朝鮮利益甚大，非協定足以保持朝鮮將來安寧，並保證其政治得宜辦法，決不撤兵，縱令中國看法不同，日本亦斷不撤兵。他說這是對中國的第一次絕交書，時爲六月二十二日。次日，命大鳥單獨執行韓政改革，亦即根本不理中國的態度。

三、俄、英動態

一八八五年，俄國因英國的明白對抗，日本與中國的暫時携手，自身在東亞的力量有待加強，暫從朝鮮退却。一八九一年，決定興建西伯利亞鐵路。俄、法同盟亦於同年成立。財政大臣威特（*Sergei Witte*），有控制滿洲、併吞華北的雄圖，知道中、日在朝鮮的衝突，終所不免，屆時大可捲土重來。日本既忌中國在韓勢力的膨脹，又畏俄國的加緊東進，希望於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以前，予以遏制，先俄而有朝鮮。

李鴻章之贊同朝鮮與歐、美建交，意在牽制日、俄。英佔巨文島後，俄國聲明無佔領韓土之意，證明他的政策大爲有效。日本將要出兵之時，他首請英使歐格訥（*N. R. O'Connor*）設法勸阻。撤兵爭執不決，李與總署再請歐格訥調處。英政府恐啓俄國猜忌，不表積極。遠在一八八〇年，李即有借俄懾日的建議（見219頁），現在更盼俄國肯助一

臂之力。六月二十日，他向俄使喀希呢（A. P. Cassini）表示，願與日本同時撤兵，並以英國願作調人相激。喀希呢反應迅速而良好，謂「斷不容日妄行干預，……務望彼此（中俄）同心力持。」過了幾天，又告以俄已勒令日本與中國共同撤兵，日如不遵，恐須用壓力。李與總署至為欣慰。駐東京俄使希特洛渥（Hitrovo）確曾為撤兵之事向陸奧質詢，陸奧反責中國不講信義，撤兵須待韓政改革之後。希特洛渥二次警告，又為陸奧婉拒，謂日本絕無侵畧韓土之意，一俟秩序恢復，自當撤兵。希特洛渥不復堅持，惟望中、日協議，不違犯朝鮮與各國所訂條約。陸奧大為寬心。俄外長格爾斯電告喀希呢，對日全屬友誼忠告，不便直接干涉。李雖極感沮喪，然仍不死心，又詢喀希呢以倘中日交戰，俄當如何？喀云：「未便袖手。」在中、日海戰爆發前後，又一再說，俄對日勢須動兵，勸李勿接受英國調停，俄、英已經商妥，共出調處，並約德、法、美一致行動。

俄國何以虎頭蛇尾？喀希呢何以大言炎炎？真實內幕雖不易知，仍不難理解。俄國初時確有對日干涉之意，以提高其在東亞聲勢，防制中國求助於英。繼以日本既出動大軍，強令撤回，並非易事，如施以壓力，英或轉而助日。日知俄有此顧慮，暗與英洽，對俄不肯就範。駐俄英使曾對俄表示，對於中日爭端，列強須共同行動，但不可出之恫嚇。言外之意，即反對俄國的單獨強制干涉。美國左袒日本，亦謂不願強迫日本撤兵。俄絕無愛於中、韓，對中國在韓勢力的增長，一樣不快，不妨讓日本予以挫折，坐收漁利。如對日強硬，日本或將後退，中國益將得志，所以就適可而止，只強調日本不侵畧韓地的承諾，以約束日本的行爲，同時聲明並非完全旁觀，預佔地步。又深知李鴻章缺乏決心，若不獲第三有力者的支持，勢將對日妥協。喀希呢之一再對李鼓勵，即在造成非戰不可的情勢。喀希呢與格爾斯的態度雖似不盡一致，仍係殊途同歸。俄如對日強行干涉，一個可能是促成日、英的結合，另一可能為日本屈服，兩者俱非俄之所願。有謂喀希呢不能代表俄政府的政策，這是不近情理的事，否則他後來不會再出使美國。無論如何，李鴻章是為俄國所欺，最少是為喀希呢所誤。

英國對於調解工作初雖不甚熱心，但不願中、日相爭，予俄國以漁利之機。見於李與喀希呢之頻頻接觸，為自身利益計，態度改變。一面與俄洽商，主各國聯合調解，一面勸總署與日協議，整頓韓政，同保朝鮮領土完整，英可使日本撤兵，慶親王奕劻首肯。李亦慫恿天津英領事實力調解，勿任俄着先鞭。在東京英代辦轉告陸奧，謂中國願與續議。陸奧要求中國須承諾改革韓政，中、日在韓應處於平等地位，至撤兵之事，可於開議之初商談。奕劻在歐格訥勸說之下，曾與小村會晤，堅持先行撤兵。陸奧原不望英國調解成功，遂訓令小村，指中國有意生事，嗣後發生不測之變，日本不任其責。他說這是對中國第二次絕交書，時為七月十二日。歐格訥繼續努力，請李鴻章懇勸奕劻，如保證朝鮮整頓內政，即由各國促日撤兵。奕劻雖然應允，日本已無心再商，要求中國於五日內同意日方的改革方案。因為此時俄已不再對日施行壓力，英國態度緩和。在日本決心挑戰，俄國不肯與英合作的情形下，英國的調解自不會成功。

美國在表面上持中立態度，實際上同情日本，認為改革韓政為出於善意，頗感欣慰，拒與他國聯合作任何干涉，不相信日本將訴之戰爭。其不欲捲入俄、英的鬥爭漩渦，亦為原因之一。朝鮮曾呼籲給以援手，中國亦以調解為請。美對朝鮮的答覆是允以友誼方式勸告日本尊重朝鮮獨立與主權，勿使朝鮮化為戰場；對於中國，則建議將問題付諸公斷。不僅日本不願，中國亦有顧慮。如果公斷，將不利於中國對韓的宗主權，何況公斷為不可能之事。此外德、法均抱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心理。

四、李鴻章的進退維谷

李鴻章自始即竭力避免與日本決裂，外交積極，軍事落後，不明日本的決心。所謂外交只是妄想俄國的相助，與英國的調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懷抱，各有顧忌。日本提出改革韓政要求後，汪鳳藻電告，謂日本部署，若備大敵，中國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李恐日疑中國必戰，而不之許。袁世凱請先調海軍，續備陸軍。牙山駐軍統領葉志

超稱日軍已在漢城、仁川備戰。李仍不肯增兵，誠葉切勿移兵進向漢城，即令將來添兵，「係壯國威，當無戰爭。」陸奧所謂第一次絕交書發出後，日軍續向朝鮮出動。六月二十三日，李向總署說：「我再多調，日亦必添，不易收場。」兩日後，又告袁世凱，俄國已勒命日本撤兵，「似日不能不遵，」並屢囑葉志超「靜待勿妄動，」飭海軍提督丁汝昌不必請戰。袁擬下旗回國，李仍謂俄國正在調處，「畧忍耐，必有區處，」「必有收場，」深信日本不先開釁。袁在漢城見聞較切，七月初，再三電李「日蓄謀已久，志甚奢。俄、英如只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日欲尋釁，何患無隙，」葉軍應調往鴨綠江或平壤，以待大舉。又說日決無和意，應速決和戰。李僅命葉相機繞赴北路，仍無戰意。

中樞同樣寄望於俄、英的調處，至六月二十五日始感到與日「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現倭已多兵赴漢〔城〕，勢甚急迫，」應如何及時措置，要李妥籌辦法；並詢以喀希呢「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應「沉機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李始謂喀希呢壓服日本之說，恐為空言。這是他為自己預留地步；對於軍事部署，依舊遲徊不進。七月初，以事機已迫，上諭迭次催令籌備戰守，詳報海軍兵力。李稱海軍難調，須別募陸軍。又說喀希呢尚係實心，俄國必有辦法。過了三天，李對俄雖感失望，而總署對英的希望繼起。七月十四日，總署接到所謂日本的第二次絕交書，詔命李派軍進駐朝鮮邊境，布置旅順等處海防。十六日大臣會議，結論為令派出各軍，先以護商為名前進，不明言戰，以待英人調停。光緒一力主戰，嚴飭李進兵，斷不可畏蕙。此時歐格訥仍在調處，喀希呢恐其成功，請俄外部聯合列強，要求日本和平解決韓事，並對李說，俄國願繼續調處，態度十分堅決。李對俄的癡情又起，允與日本改革韓政。但是日本已決心與中國作實力的較量。

值得注意的為當時各方的議論，自中央到地方，均不若以往對於越事的激昂，疆吏中以兩江總督劉坤一（一八三〇至一九〇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地位最為重要。劉較持重，張素稱敢言，亦未多所主張。

京官中倡主戰論者，雖仍有其人，已不及十年前之盛。七月中旬，摺奏漸多，或請李鴻章一意決戰，或言中國練海軍已近十年，日本亦不過十年，應切責北洋抵禦，否則軍法從事。另請速購兵船，會同南洋各船，游弋於日本近海，以分其謀韓之力，再調重兵直趨漢城。或言朝鮮得失為大局所關，若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霧之端。今徒恃外國調處，初則專賴俄使，俄使不成，復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將誰易？請飭李厚集兵力，迅赴事機，「壯我之氣，而後可以講和，充我之力，乃亦無妨言戰。」中樞大臣對光緒具有影響力的首為翁同龢，次為李鴻藻，翁深不以李鴻章的措置為然，李鴻藻素主對外強硬，二十七歲的光緒，意氣方盛，慈禧亦憤日本煎逼太甚，會有不准示弱的表示。

李鴻章之所以趑趄不前，是自知實力不足。是年五月，他於校閱海軍後，謂操演成熟，技術精密，礮台堅固，布置嚴整，只是官樣文章。一個多月之前，他尚請添換各艦新式快礮，添購新式快船。海軍衙門允先換「鎮遠」、「定遠」兩艦快礮，時間已來不及，餘俱未准。校閱期間，他曾查看煙台英、法、俄艦，見其規製精堅，所以他又說，西洋船式日新月異，縱橫海上，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歲添巨艦，中國近六年來，未添一船，恐後難為繼，意謂中國海軍不如日本。陸軍主力為淮軍。駐防天津附近的盛軍又為淮軍的精銳。約在二十年前（一八七五），已有人說淮軍「兵勇……逸樂已久，……統領、營官腴削日甚，……每人（兵）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紛紛，每哨僅十餘人，將弁利其虛伍，以為乾沒。」近年且常有携械逃亡，甚至譁變之事。李亦承認所部三萬淮軍，「餉源支絀，譁潰為患。」淮軍已接受德國式的訓練數年，武備學堂成立已有九年，畢業學生所能影響的，至多為形式的操演。以武器而言，有槍的士兵，僅十之六七，槍的式樣，多至十餘種。有人說「淮軍宿將勁兵，十去六七，今之所用，皆新進未經戰陣之人，」自屬事實，即令是宿將，一樣不能任戰，吞餉容或更甚。李雖不認識日本的決心，最少了解自己的弱點，無論為國家，為個人，均想避戰。他的高級幕僚周馥建議謂：「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

抗，必籌足三軍軍餉，不挑戰而與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練新軍三萬」，否則必敗。但和或戰，權非全操諸李。此時李為七十二歲老翁，暮氣已深，得失心重，以致舉棋不定，進退失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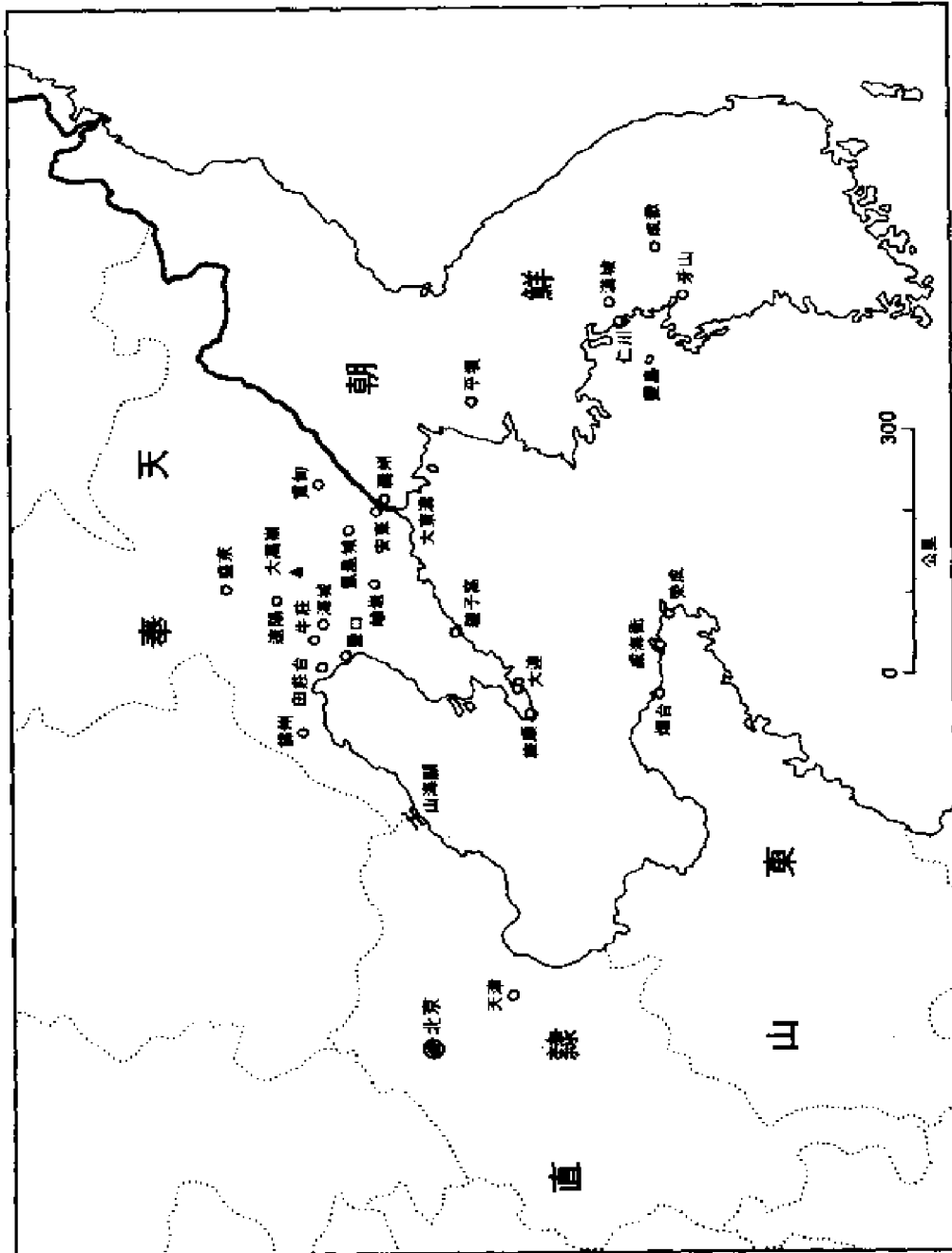
第二節 中國慘敗

一、陸海決戰

一八九四年七月初，日本在朝鮮的陸軍近一萬人，中國駐牙山的兵力不足三千。中旬之後，李鴻章始決定增兵，向平壤集結。另雇英國輪船運兵二千人赴牙山。日本於兩個月前李鴻章大閱海軍時，已窺悉北洋艦隊的弱點。此次增援，事前毫無保密，天津日諜充斥，日本軍艦即出動搜索。七月二十四日，中國「濟遠」、「威遠」、「廣乙」三艦，掩護英輪所載援兵抵牙山上岸。「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自英艦獲悉日艦將至，命「威遠」先回。翌日「濟遠」、「廣乙」駛至豐島，遇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日艦首先開砲，互轟約一小時，「廣乙」焚燬，「濟遠」力不能敵。運兵英輪「高陞」號沈沒，死者七百餘人，「操江」兵船被俘。此為中日海戰序幕。「廣乙」無何作戰能力，「濟遠」無異一對三。日本以為陸戰必勝，海戰殊少把握，所以決定不宣而戰，先挫中國海軍，以振士氣。戰勝之後，欣喜可知，但於「高陞」之被擊沈則大感驚駭。英國輿論一時頗為激動，英使歐格訥則稱「高陞」既經中國租用，與英國已無關涉，結果賠償了事。因為日軍連捷，英國不願為此與日本失歡。

豐島海戰前二日，日軍已完全佔有漢城，劫持朝鮮國王。海戰的同日，迫令宣布為自主之邦，請日本代為剿逐華兵。牙山的華兵約四千人，以陷於孤立，移守附近的成歡。七月二十九日，為日軍所敗，北走平壤。統領葉志超諱敗為勝，清廷予以獎賞，以為海戰雖敗，陸戰則勝，尚可自慰。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得知豐島海戰消息，準備宣戰，又二日得知



圖六 朝鮮、奉天、山東

成歡之戰，召回駐日公使。三十日，總署照會各國公使，責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衅，實行對日絕交。八月一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宣戰。

八月初，中國陸軍約一萬四千人抵達平壤。主力爲衛汝貴的淮軍（盛軍）六千，紀律最壞，開拔兩日，逃者四百，一入韓境，姦淫搶掠，大失韓人之心；但仍冀其勝利，逐退漢城日軍。各將領不相統屬，被任爲總統的葉志超，乏統馭能力，部署無方，坐守平壤，兵餉不足果腹，武器「藥不配彈，子不對槍。」日本以兵力尚未集中，韓事尚待解決，未即前進。八月下旬，日韓成立所謂攻守同盟後，日軍遂大舉分趨平壤，兵力與中國相當，由第三師團司令野津道貫指揮。九月十四日，即中秋節，開始攻擊。次日戰鬥劇烈，防守東路的總兵馬玉崑及防守南路的總兵衛汝貴力拒，防守北路的總兵左寶貴戰歿。葉志超倉惶棄城而走，軍械糧糈盡失，死傷二千餘人。十六日，日軍奪得平壤，這是陸上的主力戰，規模並不算大。此後朝鮮境內不再有華軍蹤跡，全部退至鴨綠江西岸。

海戰發生於平壤陷落後第二天。戰前不僅中國對於海戰抱有信心，西人亦有作如是觀者，甚至琅威理亦說，中國海軍不可輕視，雖有不及日本之處，要相去不遠，惟有李鴻章自己明白。豐島敗後，北洋艦隊三次巡弋朝鮮洋面。日艦爲使陸軍平安向朝鮮輸送，不時窺伺威海衛、大連，以圖牽制，北洋艦隊遂改取守勢，不再輕離旅順。於是廷臣交責，提督丁汝昌受到革職留任處分。李鴻章謂可用之艦，僅「鎮遠」、「定遠」，但質重行緩（速率爲十四半海里），「濟遠」等船亦行駛不速（約十五六海里）。「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遲速爲準。」日艦最快者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他主張不必與之拼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使日艦不敢來犯。「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八月初，北京始決購快船三隻，此爲海關巡船管帶英人泰樂爾（W. F. Tyler）的建議，未能有成；即使購妥，仍緩不濟急。除了船的速率不如日本外，礮的發射速率亦不及日本，而且礮彈極少。據說「鎮

遠」、「定遠」的兩門十吋口徑大砲，只有三枚砲彈，因要舉辦慈禧六旬祝嘏，無款可撥。至於戰志，中下級軍官十分旺盛，高級人員則多畏葸，握實際指揮權的劉步蟾又缺乏膽識。

九月十六日，丁汝昌率北洋海軍全隊到鴨綠江口的大東溝，掩護陸軍登陸。十七日（八月十八日）中午，正擬折返旅順，日艦十二隻（共三萬八千噸）出現，司令為伊東祐亨，當然是預先獲得情報。丁部大小十四艦，參戰的為十艦（共三萬一千噸），以「定遠」為旗艦，管帶為劉步蟾，洋員泰樂爾、漢訥根均在艦上。原定陣形為兩行縱列式，「定遠」、「鎮遠」為首。劉步蟾擅自改為橫列式，「定遠」、「鎮遠」居中，以弱小船隻分列兩翼，布置錯亂。日艦先迫右翼，丁汝昌、泰樂爾命全隊右移，以主力迎戰，劉不之應。此時砲聲已作，丁自瞭望台震落受傷。下午一時，戰爭開始，「揚威」、「超勇」兩艦先後沈沒。管帶以下俱亡。「致遠」作戰勇猛，受到重傷，彈藥將盡，管帶鄧世昌下令鼓輪直衝日艦「吉野」，為魚雷擊中，全艦官兵二百餘人殉難。「經遠」因船身碎裂，管帶林永升與船同盡。「定遠」、「鎮遠」遭日艦五艘夾攻，力戰不怯。「定遠」曾擊中日艦「西京丸」，自身亦受彈起火。「鎮遠」管帶林泰曾與官兵表現甚佳，一面護衛「定遠」，一面與日艦惡戰，以巨彈擊中日旗艦「松島」，傷亡日官兵八十餘人。丁汝昌裹傷苦鬥，頗為沈着。下午五時三十分，戰鬥結束，中國失去四艦，死傷一千餘人；日艦三艘被創，死傷五百餘人。此為中、日海軍的主力戰。從此日本陸軍可自由進向朝鮮半島，深入遼東，威脅北京。是役決定了這次戰爭的勝負，亦決定了今後中國四十年的悲運，助長了日本的侵畧野心。

二、清廷謀和與日軍續攻

李鴻章固然主張對日妥協，慈禧所謂不可示弱，亦非要戰，仍想在頤和園慶賀她的六十萬壽。光緒頗欲振作，他的師傅翁同龢亦望一戰而勝，樹立光緒的威權，擺脫慈禧的控制。主和者，為有實力的當權派；主戰者，為僅能作空論的幻想派。平壤、黃海慘敗，北京駭怖

萬狀，開始布防，不惟主和者有詞可借，主戰者亦爲之氣餒，建議起用威望尚在的恭親王奕訢，得慈禧同意，九月底，光緒勉強允許，仍命管理總署並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李與俄方的接觸，始終未停。八月，俄國已決定不許日本破壞朝鮮現狀。黃海戰後七天，李告訴總署：「俄廷初意不改，不願日得韓地。」海參崴的海陸軍不少，兩個多月前俄軍確已向韓邊調動，目的是等待機會。慈禧命翁同龢赴津，一爲對李責備，一爲問他對俄方洽談情形。李說俄盼中國派專使相商，保證不佔東北。實際內情，是俄於中、日宣戰後，曾由喀希呢通知李鴻章，仍願共保朝鮮領土，如中國肯與俄商，俄必出講話。翁認俄不足恃，回京後，主再問赫德，亦即再請英國調停。喀希呢時在煙台，十月中旬，趕至天津。李極力慫恿，喀希呢謂須待中、日和議後，日如久居朝鮮，俄必干預，目前暫守中立。李詢以停戰辦法，喀希呢答稱須與他國商明。李勸俄單獨行動，喀希呢表示不肯，因爲俄國尚有所待。

翁同龢對俄國的態度，早已疑慮，他的建議再請英國出面，多少或受到張之洞的影響。八月中旬以來，張屢向各方論陳聯英的重要。十月初恭親王約晤赫德。英國初未料到中國海陸軍之如此不濟，深恐清政府投靠俄國，或政權崩潰，滿洲爲俄所有。這時它已商諸各國調停，以朝鮮獨立、中國賠款爲條件。德、美認爲時機未至，俄、法別有企圖，甚至英國輿論亦反對壓制日本。歐格訥勸李鴻章早日議和，李要求先行停戰，再議朝鮮善後，拒絕賠償兵費。恭親王對英國的條件有意應允，翁同龢、李鴻藻反對，請慈禧俟喀希呢到後再商，但慈禧已決意謀和。日本屢戰屢勝，亦不以英國的方案爲滿足，仍要繼續進攻，在各國干涉之前，美、德對調停冷淡之時，再予中國打擊，多佔土地。十月二十三日，照覆英國，聲言暫尙不能表示停戰意向。

同一天，日本山縣有朋的第一軍二萬人，開始西渡鴨綠江，進入奉天，清軍總統宋慶的淮軍，依克唐阿的滿洲軍約四萬人，望風潰敗。五十日內，連失安東、九連城、鳳凰城、寬甸、岫巖，僅總兵聶士成部堅守大高嶺，鄉勇抵抗亦力。日本大山巖的第二軍二萬餘人，於十月二十五日，登陸遼東半島，拊旅順之背。旅順爲北洋海軍基地，砲台三

十座，大砲一百五十位，最稱險固。十月中旬，北洋殘餘船隻，移泊威海衛，置旅順於不顧。日本第二軍登陸後，未遇任何抵抗，佔有金州、大連。旅順駐軍萬餘，觀望不前，互不相顧，守將爭先逃走。總兵徐邦道力戰不支，經營十餘年的形勝軍港，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陷落。日軍屠殺四日，婦孺不免。同時鴨綠江以西的日本第一軍陷析木城、海城。翌年一月，合第二軍續陷蓋平，遼河以東要地幾乎盡失。

遼東屢敗，十一月初，恭親王正式邀請英、美、德、法、俄五國調停，條件一如英國所擬。英國表示不便再與日商，歐格訥乘機推薦赫德為中國練兵，以期握有軍、財大權，為恭親王所拒。德國謂英國原議，日本未必滿意，俄、法仍不積極，美國允徵詢日本之意，但不欲與歐洲國家會同辦理。

戰前及戰爭中，美國始終站在日本方面，希望做到朝鮮獨立，並抑止俄國，但不欲日本軍事行動過度，致使中國瓦解，東亞情勢更為混亂。大連失陷之日（十一月六日），美國對日勸告，謂如日軍再進，將招歐洲國家干涉，詢以是否接受美國調解。時佔領旅順已在目前，日答以在中國未直接求和之前，日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及旅順陷落，恭親王同意美使田貝（C. Denby）的方案，託其轉達日本，由美國單獨調解，並依李鴻章之議，先命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携李致伊藤博文函前往，日本拒絕接待。李之出此安排，是不願遽派大員，為日所輕，日之拒絕德璀琳，是說他資格不合。十二月，慈禧與恭親王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及湖南巡撫邵友濂直接求和，同時恭親王再被授為軍機大臣，加重他的權力。張曾出使美國，現兼總署大臣，邵亦有多次辦理交涉經驗，另以美使推薦的前美國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

光緒和他的左右均反對和議，瑾妃、珍妃以及她們的胞兄志銳及師傅文廷式亦然。平壤戰敗，李鴻章曾受處分，旅順失陷，又被革職留任，慈禧亦降瑾妃、珍妃為貴人，將志銳治罪。及決定派張、邵議和，御史安維峻劾李鴻章通敵賣國，挾制朝廷，並明指和議出自慈禧及太監李蓮英。漢訥根請趕練新軍，添購砲艦。然遠水不救近火，不得

已改用湘軍以代淮軍，更易統帥，以湖南巡撫吳大澂主持山海關防務，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吳勸張蔭桓「展緩行期，以俟捷音。」上海揭帖遍布通衢，攻訐張、邵。

清廷對張、邵的訓令為朝鮮可許自主，不另割地，兵費可以酌賠，為數不能過鉅，日本要求事項，應候旨遵行，不得擅允。日本的條件，除朝鮮獨立及賠款外，尚有割地及取得在華特權，預料中國不會全部應允，必須再予打擊，張、邵之來不能了局。一八九五年二月初，張、邵與伊藤、陸奧會於廣島。伊藤借口張、邵全權不足，拒不開議，指責中國缺乏誠信，扣留張、邵所發密電。雙方相見兩次，談判即告終止。清廷修改國書，添入張、邵可以訂約畫押字樣，日方依舊不理。

日本既決心續予中國挫辱，攻擊的目標為北洋艦隊的第二根據地威海衛。威海衛一帶防軍約萬餘人，北洋艦隊尚有相當力量。不幸主力艦「鎮遠」觸礁重傷，管帶林泰曾自殺，士氣愈為不揚。日軍仍採以陸軍為主攻的戰術，一八九五年一月，日軍二萬餘人自威海衛以東的榮成灣上岸，先奪據南幫礮台，而以海軍迫堵海口。二月初，水陸夾攻，「定遠」沈沒，「來遠」、「靖遠」等艦繼之，道員戴宗騫、總兵張文宣及劉步蟾自盡。丁汝昌拒絕招降，下令沈船，部將不應，服毒而死。二月十四日，洋員假丁的名義，致書投降，「鎮遠」、「濟遠」大小十一艦，悉為日有，北洋海軍掃地以盡。

東北陸戰繼續進行，中國官軍雖一再敗退，鄉團則紛起抵抗，遼東的寬甸、長甸、岫巖，遼中、遼南的遼陽、海城、旅順尤為猛烈。一八九五年二月，日軍四次進犯遼陽，皆被擊退。新到湘軍二萬人，會同吉林、黑龍江軍三萬人，反攻海城，未能得手。三月初，日軍連陷牛莊、營口、田莊台，燒殺極慘，湘軍損折大半。遼西吃緊，北京感受的威脅，更為嚴重。同月，日海軍進向台灣，澎湖不守。這時李鴻章與日本的談判，已經開始。

三、屈辱苛刻的馬關條約

日本拒絕與張蔭桓、邵友濂談判，全是人的問題。伊藤明告張、

邵的隨員伍廷芳，中國必須派一有切實全權，名爵資望最高的大員，最好是恭親王、李鴻章；對東京美使亦有同一表示。這時遼陽、盛京勢危，威海衛的命運在旦夕間。二月十日，光緒召見軍機大臣，謂時勢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聲淚並發。慈禧決命李鴻章前去，十三日，授為頭等全權大臣。日本亦非事事遂心，俄國已示意，不可向中國大陸擴展領土，外交情勢於日本頗為不利。軍事上以戰場擴大，漸感力拙，亦望中國早日重派使臣，並將媾和條件預告北京，使給新使臣以應允的權力，特別是割地一條。李對光緒表示：「割地之說，不敢擔承。」軍機大臣中有謂多賠款勝於割地；有謂不割地，勢難了局。其實李本人與恭親王並非絕對反對割地，所考慮的是何地為宜，「允之，北則礙於俄，南則礙於英、法。」

清廷與李鴻章仍盼能獲得外力援助，分向各國洽商。李告英使歐格訥，如能使中國不喪失領土，願給英人以政治、軍事、鐵路、礦山、商務特權。英國以列強在華爭奪日劇，已準備聯日，歐格訥勸李接受日本的要求。美國公使田貝，亦勸他放棄各國干涉之念，割地之外，並須賠款，日後可用美人築鐵路、開礦山、辦銀行以增加收入。俄國最關心的為日本是否要侵佔朝鮮、滿洲，在未確悉之前，暫不採行動，只說日本如要素過大，即聯合他國干涉。德國亟欲在中國取得軍事、商務、海港權利，中國困難愈大，德國的機會愈大。法國以俄國的馬首是瞻，亦要等待日本要素土地的具體事項，再出而評論。清廷與李鴻章的願望全部落空。及至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盡殲，日本大有轉犯天津、北京的可能。三月三日，清廷終於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原因是倘不如此，「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三月二十日，李與伊藤、陸奧開始在日本馬關談判，隨員中有他的兒子李經方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與在日本參加的美籍顧問福士德。¹李要求先行停戰，盼中、日永結和好，共維亞洲大局，否則有

¹伊藤及陸奧亦有一美籍顧問。

害於華者未必有益於日。伊藤不加理睬，翌日提出如下條件：日軍佔領山海關、天津、大沽，該地華軍一律繳械；天津至山海關鐵路歸日軍管理，中國負擔停戰期日本軍費。李認為太苛，伊藤迫他於三日內撤回停戰要求。二十四日，第三次會議，李允不談停戰。日本浪人欲使和議不成，李於返寓途中，遇刺受傷。此一狙擊，反予李以幫助。伊藤、陸奧恐李藉口回國，招致歐洲國家干涉，立許停戰，但台灣、澎湖不在其內。

四月一日，伊藤提出狠毒的講和條款，限四天決定。李酌加修正，委婉懇求，希望日本為兩國久遠關係着想。伊藤仍逼他作諾否確答，並威嚇李經方說：日本為戰勝者，如談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則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國全權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李鴻章與北京最不肯接受的為賠款三萬萬兩，割讓奉天南部（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經過伊藤的威嚇，李允割鄰接朝鮮的四縣及澎湖。十日，伊藤將條款畧為削減，遼東半島的遼陽除外，賠款改為二萬萬兩，其餘均照原案，「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北京希望賠款再減，並保有台灣北部，倘無可再商，即與訂約。日方於李與北京往來電報內容完全知道。第五次會議時，李雖作最後乞求，伊藤堅稱不能再讓。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氏父子與伊藤、陸奧將條約劃押，即馬關條約。

條約的主要內容，一為中國承認朝鮮自主，即默許朝鮮由日本宰制，中國不再過問。二為割讓奉天南部，及台灣、澎湖。奉天南部包有鴨綠江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以南的整個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在內，台灣、澎湖為台灣全省。以往雖有對俄、對英失地之事，或為邊遠荒涼之區，或為海中小島，此次所割均屬「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三為賠款二萬萬兩，三年內付畢，約為一八四二及一八六〇年對英、法賠款的七倍，超過中國全年收入的兩倍。清廷不得不飲鳩止渴，在種種勒索之下，舉借外債，以致財盡民窮；日本則以這筆相當於全國三年收入的巨款發展實業，擴張軍備，加緊對華侵畧。四為日人得在中國各口岸從事工藝製造，機器只納進口稅，所製造貨物豁免內地稅、

鈔課、雜派。即是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就近利用中國的原料、人工，產品又可免納稅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西方各國亦援例辦理。李與清廷力爭割地、賠款，對於這項關係經濟命脈的條款，則輕輕放過。五為開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口岸，日船得航行長江、運河、吳淞江，擴大深入內地的範圍。六為另訂商約，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與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取得以往及今後西方國家所已得及將得的特權，同時亦提高了它的地位。七為日軍佔領威海衛三年，以待賠款交清、商約批准，佔領軍費五十萬兩歸中國負擔。從此日本不僅為侵略中國主要國家之一，且最為兇毒。

四、俄、德、法的干涉

條約簽訂前後，國內痛憤萬狀，紛紛力爭，促勿予承認，重行備戰。國際形勢一時於中國似頗有利，此即俄國領導的對日干涉。日軍行將進入東北之時，俄之將有舉動，為世所週知。十一月，俄已對日示意；十二月，俄使希特洛渥告訴陸奧，如欲佔有台灣，俄或不反對。言外之意即是不許佔有東北地方。一八九五年一月，俄國開始加強太平洋艦隊。張、邵被拒後，希特洛渥又告陸奧，希望勿向大陸擴展土地，勿進攻直隸。二月間，中國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已自俄國外部得知，如日本要求太奢，俄將約英、法干涉，有不許日本佔地之意。三月初，俄國邀請列強聯合對日勸阻。英國不願開罪戰勝的日本，且欲聯以對俄，婉詞謝絕。德國久思染指遠東，尤欲在中國取得軍港，亦對英表示，倘第三國自中國取利益，德國定要取得補償，希望英國支持。英國答稱無意在遠東有所行動，德國轉而就俄。外部侍郎前任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持之最力，謂如此可影響俄國在歐洲的對德態度，減輕德國東境的壓力，疏遠俄、法的關係，復可向中國要素報酬。德國此一行動，正為俄國求之不得。不過俄國外務大臣初只望日本放棄旅順，財政大臣威特堅主迫令放棄全部遼東半島，西伯利亞鐵路既可免受威脅，復可穿過滿洲，進而改變中俄疆界，陸、海軍大臣一致贊成，必要時不惜對日實力強制，準備一戰。俄皇尼古拉二世亦認為瓜分中國為

期不遠。四月十五日，正式批准。法國爲俄國的同盟者，亦恐日本過分得勢，危及法在亞洲地位，遂允追隨俄國，於是三國的結合形成。德國因尚需要一番準備，不克立即行動，這或是巴蘭德勸李鴻章不妨先簽和約的原因，亦可能是有意置日本於爐火之上，造成俄國非干涉不可之局。

日本對於俄國的動態，時在注意，以爲俄於英、美尚有顧忌，不相信它會出以斷然措置，應儘可能強迫中國屈服，造成事實。當時中、俄之間雖無何諒解，不過李鴻章赴馬關之前，已得許景澄的電告，又自法使處獲悉，俄、法有干涉的可能，預料如割讓遼東，俄必出而阻止。就清朝的利害言，遼東與台灣的輕重有別，李之力爭台灣，而於遼東反未多堅持，自有他的看法。

馬關條約簽字的同一天，俄國正式邀德、法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放棄領有遼東半島，四月二十三日提出，同時俄國海、陸軍加緊部署。三天前北京已自柏林得知消息，至是多主暫勿批准和約。總署請俄、德、法轉商日本，展期換約，並向俄致謝。趾高氣揚的日本，震愕憤慨，但衡度情勢，經過對華戰爭，人員疲勞，軍需缺乏，不僅無力對三國作戰，亦無力抵抗俄國。一方向俄懇商，一方求英、美相援。俄國拒不讓步，英國表示概不過問，惟有美國答應勸告清廷批准和約，由美使田貝及福士德共同對北京施用壓力。李鴻章亦說，如不批准，戰爭勢必再起。五月二日，光緒與翁同龢「相顧揮淚，戰慄哽咽，」卒將條約批准。同月八日，在煙台互換，由福士德協助辦理。

日本的政策是萬不得已時，對三國讓步，對中國則一步不讓。四月底，陸奧對俄表示，希望保有旅順、大連，允放棄遼南其餘之地，由中國付予酬金，在中國未履和約前，日軍繼續佔有遼南。俄堅執原議，不許日本佔有中國大陸寸土尺地。五月七日，日本接受了三國的干涉，要求另給贖款五千萬兩。俄國認爲過鉅；德國對日欲留餘地，復因對華借款事，不滿於俄（見 288 頁），認爲並不爲多。最後由三國核減爲三千萬兩，而以俄國不反對將來中國借用德款爲條件。十一月八日，中日簽訂「遼南條約」，贖款於八天內交清，日軍於三個月

內撤退。中國收回遼東半島，又增加了一大筆賠款。

五、台灣的抵抗

日本之決心與中國開戰，不僅要攘奪朝鮮，亦要達成掠取台灣的宿願，方可由陸、海兩道向中國大陸並進。一八九四年底，西方已盛傳日本將以讓與朝鮮、台灣為和議條件。馬關談判開始之日，日艦已出現澎湖。李鴻章首告伊藤，台灣為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光緒亦謂：「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輿論的反對更是激烈，謂台灣萬不可棄，否則民心一去，欲為小朝廷而不可得。然而終於割讓。各方章奏雪片飛來，請勿批准和約，北京請願者途為之塞。台籍京官及翰林舉人聲言「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張之洞及台灣巡撫唐景崧初謀借英國之力以阻日本的佔有，未有結果。法國對台灣頗有興趣，張、唐又欲透過法國將三國干涉的範圍擴及於台灣，從中策劃的為留法學生、曾任駐法使館參贊的陳季同。但是俄國有意讓日本南進，無心顧及台灣，謂對日本不能再有表示。德國欲見好日本，責中國煽惑台民。法國只好說日本已允放棄遼東，今昔情形不同，不便出而干涉。其實即令張、唐的運用成功，台灣亦將為另一國家所有。外援無望，日本催迫交割愈急，李鴻章依福士德的勸告，請照約辦理，清廷就將此一任務付予李經方，將唐景崧開缺。交接手續於六月二日在基隆口外完成，協助李經方的仍為福士德。

戰爭一起，台省積極治防。台省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過去之反滿及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的表現，可以見之。割台消息傳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聲稱「誓不從倭。」清廷既不之顧，外援又復無望，惟有「據為島國，固守以待轉機」，以武力拒抗日本，「願人人戰死而失台，不願拱手而讓台。」在邱逢甲等的領導下，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建立為「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以示「永戴聖清」之意，「事平之後，再請命中朝，」仍歸中國。新政府設內務、外務、軍務三衙門及議院。

台灣兵勇約四、五萬人，割讓後半數奉命撤營內渡，官吏亦紛紛離去，兵力士氣大受影響。餉械初時曾得到沿海各省當局的接濟，如兩江的張之洞、兩廣的譚鍾麟，後因英、德的指摘，清廷加以禁止。復以倉促成軍，單位又雜，唐景崧乏統馭之才及決心，又與駐防南部的前黑旗軍統領劉永福，及另一參加抗法戰爭的地方領袖林朝棟存有意見，抵抗力因之大減。五月底日軍自基隆東北登陸，六月三日基隆失守，次日唐景崧出走，八日一位美國記者戴衛遜（J. W. Davidson）引導日軍進入台北。

台灣的悲壯抗日戰爭，是在台北淪陷以後，以義勇為中堅，領導者劉永福。張之洞原以為俄國的干涉可望，電劉堅守，不日援兵可至。愛國詩人易順鼎奉劉坤一之命，往返台灣、內地之間，為劉永福請援。日本初懼於黑旗軍的聲威，不敢輕進，中南部多雨，山洪時發，行軍甚為不易，所以暫時停進。七月，義勇屢殲新竹日軍，首領姜紹祖戰歿。日軍近衛師團大舉南犯，義勇、黑旗節節阻擊，苦戰不敵，台灣府（台中）、彰化不守，統領吳彭年及義勇首領吳湯興戰歿。九月，義勇、黑旗軍與日軍往復激戰於彰化、雲林之間，傷亡頗重，義勇首領楊泗洪陣亡，日軍旅團長一人亦被擊斃。日本加調兩師團會同海軍南犯。近衛師團為黑旗軍王德標所敗，嘉義旋失，義勇首領徐驥殉難。日陸軍自海上分別登陸台灣西岸及南端，海軍陷旗后（高雄），鳳山不守，台南陷於重圍。劉永福以援斷餉絕，事不可為，西去廈門。十月二十一日（九月初四日），日軍入台南。不及萬人的義勇及黑旗軍對抗數萬人，明知勢不相侔，仍能喋血奮戰四月有餘。日軍初以為垂手可得台灣，及遭到勇猛抵抗，傷亡慘重，乃肆行屠殺，搶掠姦淫，所至人亡家破。台灣雖然淪陷，台人仍然不屈，在日本統治的半世紀中，台人的反日運動，始終未曾停止。

第三節 中國的分割

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軍初

次侵台亦爲十五年，自日軍初次侵台，中經馬嘉理事件、伊犁交涉以至中法戰爭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亦爲九年，其間中國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戰後，情勢急轉直下，外來的兇猛壓力，跟蹤而至，片刻未弛，真可謂危急存亡之秋。

一、俄國部署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俄國對中國所採的策畧，不外誘騙威脅，希望不戰而勝。中日戰爭前後，俄國的翻雲覆雨，出爾反爾，表現得更爲淋漓盡致。對日干涉之後，俄以爲有德於中國，日本暫時已被制服，英國處於孤立，大可爲所欲爲。此時俄國有兩大計劃，一爲迫令清廷向俄國借款，一爲向清廷借地築路。中日戰前，中國所負外債無幾，戰爭期間，先後向英國貸借四千萬兩。戰後對日賠款急待償付，勢須舉債，俄、法、德、英皆欲承攬，而以俄國爲尤。一八九五年五月，已表示願借一萬萬兩。清廷主半數歸俄，半數由德、法分擔，俄國不許。清廷爲希望俄國幫助減少遼東半島的贖金，俄亦以此挾制，必須先定借款。七月，合同簽定，總額爲一萬萬兩。三十六年內還清，以關稅擔保，此後不得再以稅收權許與他國。借款的大半是由法國承擔，俄國的政治力量，與法國的財政力量，在中國合流，以謀共同控制中國。

德國以未獲參加借款，與俄、法發生裂痕，英國更爲不滿，兩國公使共同向總署抗議。時盛傳法人將代赫德爲總稅務司，英使嚴厲詰責。俄、法借款僅足以支付第一批對日賠款及遼東半島贖金，第二批又須照交，急待續借。英、德與俄、法激烈競爭，英使向總署咆哮，法使亦肆意要挾。經赫德調解，英、德條件畧爲放寬，一八九六年三月合同成立，仍爲一萬萬兩，未還清前，海關管理不得變更。兩次借款，仍不足以清付對日賠償，總署再分別與英、德及俄、法磋商，雙方條件均極苛酷，總署無法接受。俄使謂如不借俄款，俄必問罪，英使聲稱如不借英款，將取必要行動。不過此時俄國所重視的爲租借旅順、大連，只是以借款作爲挾制手段。一八九八年三月，英、德又獲得了一萬萬兩借款權，折扣大至百分之八三。

俄國之決心對日干涉，與西伯利亞鐵路之穿過滿洲直達海參崴有關，此線不僅可以縮短路程，節省建築費用，軍事經濟上又便於控制東北，以至華北。要穿過滿洲最好是以外交途徑取得中國同意，此為日本接受干涉後五天俄國所決定的方案。跟着即派人勘察路線，並通知總署。總署建議由中國關外鐵路於與俄交界處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俄國定要借地自築，對於此事的重視，甚於貸款。

三國干涉後的三個多月，中國自中央到地方當局，欣慰莫名，謀與俄進一步聯合。張之洞認為俄國「舉動濶大磊落，」請與訂立同盟密約，脅日盡廢前約，酬俄以新疆之地，許以推廣商務及各種便利；劉坤一認為俄國「信義素敦，」「為德於我更大，」主酌予土地金錢，讓以便宜。他們均不惜任何代價，「以結強援，」「以結俄歡，」聯俄狂熱，達到高潮。等到十月，俄國正式要求築路，方知俄國並非「濶大磊落」。

俄皇尼古拉二世，定期舉行加冕典禮，清廷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為致賀專使，俄國擬借此機會解決借地築路問題，借口王的資望不稱，請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學士前往，心目中的人物為李鴻章。李於馬關訂約後，權位喪失，所任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已被開去，各方對他的攻擊不已，光緒對他尤為憎惡。李自日本返天津後四月，始行入京，成了入閣辦事的閒員，但仍有他的地位。在聯俄的熱烈氣氛中，他雖無明白表示，他之同情，當無可疑。俄方既不歡迎王之春，一八九六年二月十日遂由慈禧作主，命李代替。李正欲有所施展，自云「但有益於交鄰之道，何敢憚夫越國之行；一息尚存，萬程當赴。」所謂「交鄰」，即他與軍機大臣、總署大臣翁同龢談及的「密結外援」。為沖淡他的使命，復奉有商改海關稅則，訪問英、德、法、美，親遞國書的詔旨。隨員除李經方等外，有英、德、法、美的稅務司作為參贊，但李對於稅則問題並不太感興趣。

李於啓行前，與喀希呢作過密談。俄國於李之來，給以隆重接待。抵聖彼得堡三天，即五月三日，開始與手腕老練的威特會晤。威特先說以往俄國之如何對華相助，為使今後便於永久相助，以保中國完整，

必須將中、俄鐵路聯貫，而此一鐵路又必須由俄建築，經過滿洲，無論就軍事或經濟上論，於中國均屬必要。李初表示不肯，怕的是他國效尤，主張中國自辦。次日李晉見俄皇，尼古拉二世又當面提及，謂此事實為中國利益，中國自造，力有不足，可令華俄銀行承辦，李為所動。是後李與威特由築路而談及同盟，將大綱商定。李電告北京，說是「俄方動機，純與我成立友好關係，我若拒絕，彼必深憾，將為我之害。」鐵路若成，「不論營業盈虧，中國年得二十五萬元。」北京再三考慮，五月底命李定約。六月三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俄同盟條約簽字，要點為：一、日本如侵佔中、俄或朝鮮土地，中、俄海陸軍互相援助；二、中、俄共同與敵議和；三、戰爭期間，俄兵船得駛入中國所有口岸；四、中國允華俄銀行於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合同另訂；五、禦敵時俄可用此鐵路運兵、運械、運糧，平時亦可運兵、運糧；六、此約自鐵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以十五年為限。這是中俄第一次對日同盟條約，亦為中國與外國間的第一次同盟條約。李與清廷所重視的為對日，俄國則在借地築路，同盟只是騙局。因此加速促進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據云威特曾向李的左右和李本人行賄，計給李的為三百萬盧布，分三期交付，經手人為李的舊識，華俄銀行監督吳克托穆（E. E. Ouchtomsky），最後李實得一百萬，是否可信尚不易言。李之簽約與否，似非賄賂所可影響，他殷望能報復日本加諸他的恥辱，重振他的勳望，對於三百萬盧布未必感到太大興趣；不過他的隨員中，或有被收買之人。

華俄銀行為經營遠東的機構，大部資金來自法國。九月，中俄訂立「華俄道勝銀行（Banque Russo-Asiatique）合同」，名為中俄合資，大半股票均在俄政府手中。接着訂立「東省鐵路合同」，由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另立一東省鐵路公司，股票由中、俄商民購買，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委派，鐵路所需地段，歸公司經理；自通車之日起，八十年內，鐵路利益全屬公司，期滿之日，鐵路及一切產業全歸中國，無庸給價。又自通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有權給價收回。實事上公司股票盡為俄人所有，鐵路由俄人把持，所需地

段，無異俄國的殖民地。

同盟條約訂後，李前赴柏林，覲見威廉二世，會晤俾斯麥，參觀海、陸軍演習。繼遊荷蘭、比利時，轉至巴黎。八月抵倫敦，歡迎不及在歐陸之盛，但維多利亞女王亦予延見。八月二十九日抵紐約，二日後覲見美總統克利佛蘭，渡太平洋返國，過日本未登岸。李在海外有不少軼聞，多不可信，不過他的言談舉止，常帶傲慢輕侮，喜擲揄弄人。回京後，光緒對他依然不喜，曾予斥責，不久被授為總署大臣，應為慈禧之力。數日之後，復以擅遊圓明園，罰俸一年，大可想見他的處境。

二、德、俄囊括山東、東北

德國參加三國對日干涉的初步報酬，為一八九五年十月所得的漢口、天津租界，但並不滿意。三十年來，德國總想在中國有一軍事基地。對日干涉初起，威廉二世即向尼古拉二世表示此一願望。在獲得租界的同月，駐俄德使正式向中國公使提出，李鴻章到柏林時，德外相又一度談起，俱無結果。德羅琳建議德政府發展中國交通，推廣在華工商業，協助清廷重建新軍，加強其對內的統治，置清廷於控制之下，所有中國港口，德國將均可使用。德政府雖然同意，但仍欲取得專有軍港，德羅琳又謂膠州灣最為適宜，獲得威廉二世的批准。德使海靖（Von Heyking）兩次向總署要求租借，未克如願。中國的態度如何，非德國所重視，顧慮的為俄國的意向。一八九五年俄艦曾以過冬為名，在膠州灣借泊。根據中俄盟約，俄國有使用中國所有港口之權，自不願膠州灣為德所有。一八九七年八月，威廉二世與尼古拉二世相會，面提膠州灣之事，尼古拉二世謂必要時德艦亦可停泊。十月，海靖通知總署，德艦將在膠州灣過冬，又被婉拒。十一月一日，德教士二人在山東鉅野為匪殺害。德國有了借口，同月十四日，逕行佔領。英國認為德有膠州灣，大可平衡對俄的勢力，予以支持。俄以英、德有了諒解，不易阻遏，俄正可援例取有較膠州灣尤為便利的旅順、大連。俄、德互商之後，德國不僅表示贊同，並承認滿洲、直隸、新疆為俄

的勢力範圍，俄亦承認黃河流域爲德的勢力範圍。德復分向英、日聲明不侵犯英國在華利益，不再反對日本向中國大陸伸展。

德國奪據膠州灣後，海靖以教士被害爲理由，要求總署謝罪、撫卹、賠款，革山東巡撫李秉衡之職，給德國以山東路、礦權，允許租借膠州灣。總署大都承諾，對於最後一項，願以南方一港抵換。海靖不肯稍讓，德軍進而佔領膠州灣附近的即墨。總署託俄國設法，無異與虎謀皮。十二月十五日，俄軍艦駛入旅順，佯稱助華抗德，總署信以爲真。海靖明白告訴和他談判的翁同龢、張蔭桓，俄國已得旅順，不致另有要索。翁始恍然醒悟，中國的同盟俄國，實與德通，合以謀我。威廉二世對東來海軍演說：「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海靖警告翁、張，若再推拖，即使用武力，俄、法、英斷不能幫助中國。第二天，總署接受了他的全部條件。海靖得寸進尺，認爲懲處山東地方官，不夠嚴厲，鐵路建築權須再擴大，總署一一照辦。三月六日，李鴻章、翁同龢與海靖訂立中德膠州灣租借條約，租期九十九年，周圍一百里內，德軍可自由通過；准德國修造兩條鐵路，一自膠州灣至濟南及山東西界，一自膠州灣經魯南沂州，再至濟南；鐵路附近三十里內煤礦，由德國開挖，山東境內如開辦各項事務，德國有優先權。翁同龢說這是將山東全省利權形勢，拱手讓人，絲毫不曾誇大。

俄、德爲甲午戰後首先實行分割中國的國家，於是掀起了列強分割中國的狂潮。中俄同盟條約簽訂後，北滿已入於俄國掌中，富庶的南滿洲與旅順、大連的良好軍港更爲所欲得。威特曾面向李鴻章表示，希望將東省鐵路展至南滿某一海港，未獲結論。他總想於李與慈禧在世之日，得到解決。一八九七年續在北京交涉，仍然無成。膠州灣事起，俄、德狼狽相結，旅順、大連、膠澳與滿洲、山東的命運同時決定。俄艦進入旅順，李仍相信俄國斷不佔中國尺地寸土。兩週之後，俄代辦巴布羅夫（Palvlov）即要求租借港口，建築南滿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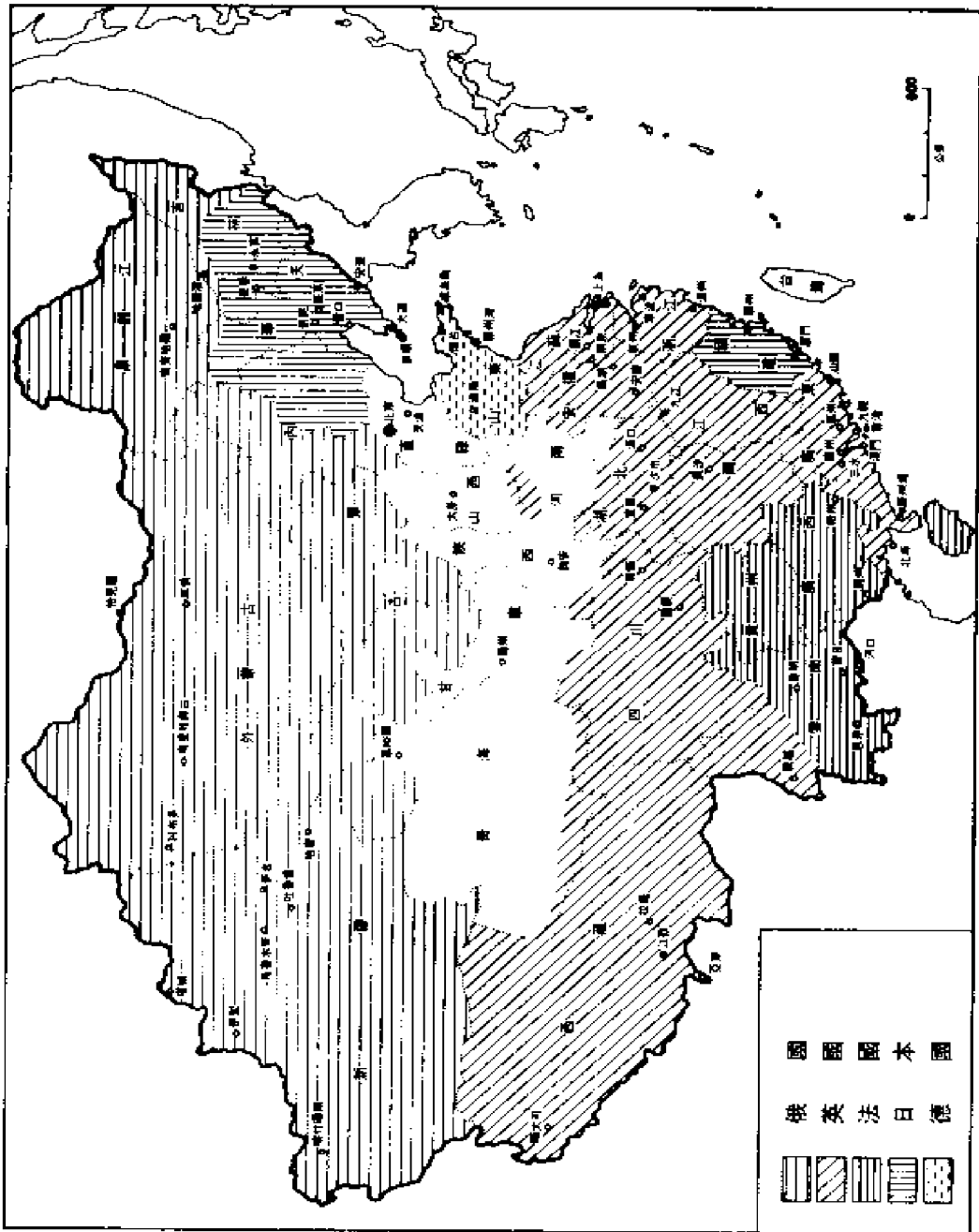
俄國與德國雖然一氣，爭取英、日的諒解亦有必要。爲了對華貸款，俄、英競爭方烈，巴布羅夫之屢對總署蠻橫，主要目的在迫令許

以旅順、大連。英國急欲獲得貸款之權，有意與俄妥協。俄國同意退讓，並允許各國船隻自由出入旅順、大連。在俄、德結合之下，英不再反對旅順、大連的租借，自取威海衛以爲補償。對於日本，俄以朝鮮爲餌。中日戰後，俄在朝鮮勢力驟增，至是聲明不再積極干預，撤回俄國顧問，日本亦不過問俄國在中國的舉動，承認滿洲爲俄國的勢力範圍。

一八九八年三月初，英、德對華借款成立，膠州灣租借條約行將簽訂，巴布羅夫逼迫總署立即應允他的要求，俄外部亦聲言須於三月二十七日前訂約，否則自行辦理，不能顧全同盟交誼，任何他國阻止，均所不計。光緒君臣揮涕，一無善策，惟有照俄國指定的日期，將旅順、大連租借條約簽字，租期二十五年，劃租地以北爲中立區，南滿鐵路由東省鐵路公司建造。租借地的範圍，包括金州所屬，中立區北至蓋平，較馬關條約所割與日本的奉天南部，小不了多少，整個東北實已盡爲俄有。據說李鴻章又得俄賄五十萬盧布，張蔭桓所得爲半數，他們均爲條約簽字者。威廉二世致賀尼古拉二世，說他已成爲北京主人。

三、英、法、日的勢力範圍

中日戰後，俄、法、德在東亞的聲威盛極一時。過去是英國獨步，現在勢孤力單，霸權動搖。俄、法分由南北而進，相互呼應，英國陷於夾擊。一八九五年法國首先取得了雲南、廣西、廣東的開礦優先權，及越南至中國境內建築鐵路與架設電線權，可說是甲午後第一個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的國家。英以阻止不成，次年與法妥協，將來兩國在川、滇所獲利益，共同享有，並相互幫助。一八九七年總署答應了英國的要求，開雲南騰越、思茅、廣西梧州、廣東三水、江根墟爲口岸，建築緬甸至雲南鐵路。法國立即要求建築越南至雲南省城鐵路，並將越南鐵路展至廣西西部的百色，實行開採滇、桂、粵礦，海南島及廣東海岸不許他國屯煤。總署僅允不以海南島讓與他國，經法使的威迫，其餘各事亦皆照許。法使自云他之能有此收穫，是得力於李鴻



圖七 列強在華勢力範圍

章，因為李視法與俄為一體。

一八九八年初，英國要求建築自緬甸至長江流域鐵路，開奉天大連、廣西南寧等處為口岸，長江流域不割讓與他國，永任英人為海關總稅務司。後兩事總署照允，前兩事則因俄、法的反對，不敢輕許。英謀與俄劃分在華利益界線，俄國氣餒萬丈，謂全部華北盡為俄的勢力範圍，早晚將併有直隸、山西、陝西、甘肅。法國以英國得到了總署對於長江流域及總稅務司的保證，亦獲得總署對於與越南崑連的中國領土不讓於他國，任用法國襄辦中國郵政的承諾。

中國的分割，源自馬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一八九六年七月中日改訂商約，日本又完全享有了西方各國在華的特權。十月以換文方式取得天津、漢口、廈門、福州、杭州、蘇州、沙市、重慶租界。及分割運動白熱化，一八九八年四月復獲得總署不將福建沿海讓租他國的認可。

英國既不能阻止德、俄之佔有膠州灣、旅順，遂一再表示須與他國享有同等待遇，目的在威海衛。威海衛時尚在日本佔領之下，德國則視山東為禁錮，尚須取得此兩國的諒解。對日本允許將來不阻撓其對華要求，對德國保證不侵犯其利益。日、德利於英、俄的對抗，日又有意聯英，均無異議。於是英使寶納樂（C. M. MacDonald）警告總署，如不應允，英國「水師提督到煙台，事且不諧，」兇橫不下於德、俄，總署唯有惟命是從。五月日軍自威海衛撤退，英軍立即進據。七月一日，中英威海衛租借專條簽字，租期與旅、大同。

同年四月，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以界址未決，至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方訂立條約，租期九十九年。唯一要求不遂的為義大利之租借浙江三門灣。

列強在華攘奪權利的競爭，以俄、法與英、德為最烈。俄有了東北，又謀向長城以內擴張。一八九八年五月，華俄道勝銀行與山西商務局訂立自直隸正定（石家莊）至山西太原鐵路合同，同一天，英國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亦與山西商務局訂立山西探礦敷設鐵路合同。一個月後，又與河南豫豐公司訂立河南探礦章程。此外各國要

求開礦權者，爭先恐後，是後兩年，四川煤鐵礦由英、法合辦，山東沿鐵路的礦權當然屬於德國，江西萍鄉煤礦由德國借款開採。

一八九六年，中國設立鐵路公司，先辦擱置已久的蘆漢線，所需經費，半借洋款，對象為比利時，幕後支持比國的為法、俄。英、德、美一致抗議，英國以法、俄勢力侵入長江流域，反對尤力，但中、比正式借款合同卒於一八九八年六月成立。德國亦思伸足長江，蘆漢鐵路之外，中國尚欲興造自天津經山東至鎮江線。英為確定其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一面對德聲明尊重其在山東利益，一面於一八九八年五月與總署訂立滬寧鐵路借款合同。此路為英國長江鐵路計劃的發端，將來準備自南京向西，經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雲南以達緬甸，接通印度至上海的陸路。德國認為山東路權為所獨有，長江路權亦須分享。英國於反對蘆漢鐵路失敗後，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對德兼對俄、法，除要求承造津鎮鐵路外，並提及山西、河南至長江，江蘇浦口至河南信陽，蘇州至杭州，九龍至廣州各線。九月，總署照允。津鎮鐵路英、德另行協定，北段歸德，南段歸英（南段終點後改為浦口），英承認黃河流域為德的勢力範圍，德承認長江流域為英的勢力範圍。十月中、英訂立關外鐵路借款合同，因俄國反對，改為中國自築。一八九九年三月，英、俄成立協定，長江流域的鐵路由英建築，長城以北的鐵路由俄建築。

美國於路權競爭，並未置身事外。一八九八年中國決定興建粵漢鐵路，不願英、法或德承攬，四月，與美國合興公司（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成立合同，並訂明如比國不能修建蘆漢鐵路，一併歸該公司承造。一九〇〇年，雙方又訂續約，規定借款不得轉讓。

四、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開戶開放政策是由美國出面提出的，亦為美國對華的一貫主張，實際發動的則為英國。所謂門戶開放的簡單含義，即開放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門戶，大家利益均沾。中日戰前，英國在中國的利益遍於南北，現在情勢大異，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黃河流域

爲德國的勢力範圍，西南爲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英國勢力所及的只是長江流域，活動大受限制。英國之參加港灣、路、礦的攘奪狂潮，以及要求長江流域不得讓給他國，是要自保權益，最好是能一仍舊貫，不分此疆彼域。一八九八年初，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in）頻頻宣稱不許他國關閉中國門戶，維持中國的完整，自由通商，保護既得的條約權利。英國會亦有中國領土與獨立必須維持的決議，然均不生效果，各國與英的爭奪日烈，特別是俄、法。英與俄妥協未成，不得不改變其「光榮的孤立」政策。首先與德國商談，主確定英、德在華地位，制止俄國勢力的侵入。德的雄心不減於俄，且利於俄的東進，如與英聯合，則僅利於英，非其所願。對於美國，英說以在東亞利害相近的國家，須結爲同盟，以免中國遭受肢解。

三十年來美國國勢蒸蒸日上，對華貿易逐年升高。九十年代前後，輿論力事鼓吹向太平洋發展，如中國爲列強瓜分，對於美國的將來大爲不利。當列強據奪中國港灣，劃分勢力範圍之時，美國得到了粵漢鐵路借款建築權。同年（一八九八）併有夏威夷，擊敗西班牙艦隊，佔領馬尼刺及關島。美國報紙聲言菲律賓爲美人到中國的踏腳石，最後實行兼併，消滅了菲人的反抗。英國對美表示友善，戰爭終了，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增強。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張伯倫再度呼籲中國市場必須開放，領土必須完整，美英合作可保世界和平。新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原爲駐英大使，具有同感。十二月總統麥荊萊（William McKinley）於致國會咨文中，謂中國沿海已成各國勢力，但對美國商業不得侵害，大爲英人歡迎。一八九九年一月，英國正式邀請美國在華採取一致行動，商請列強贊同中國門戶開放主義。因爲英與俄、法不睦，又曾身預瓜分中國之事，不便出名領導，因由處境超然的美國向各國徵求意見。起草通牒的爲美國的中國通柔克義（W.W. Rockhill）及曾任職中國海關的英人賀璧理（A.E. Hippisley）。

一八九九年九月，海約翰照會英、德、俄三國，十一月，復照會日本、義大利、法國。照會內容一爲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或租借地內對通商

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二為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之口岸之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三為在勢力範圍內之口岸，對他國船舶所課碼頭稅不得較本國船舶為高，在勢力範圍內之鐵路，對他國貨物所收運費，不得較本國貨物為高。英國最先同意，惟須他國同樣遵行。日、義俱無異議，法國表示如他國不予反對，亦可贊成。俄國的答覆模稜，德國初在觀望，後亦接受，以便進入長江流域。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海約翰宣告列強均已贊成對華門戶開放主義。至於當事人的中國，約於英國發動門戶開放運動的同時，即一八九八年三月，翁同龢曾有相似的主張，由中國自行開放各港口，許各國以屯船處所，然後定一大和會之約，不佔中國土地，不侵中國政權，不壞各國商務，共保東方大局。他曾商之於英使寶納樂，寶雖首肯，總署其他大臣多不謂然，大概是認為有傷國體，且難期各國一致，甚或合以謀我。

海約翰的通牒，仍然承認所謂勢力範圍，僅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為美、英的經濟利益着想，未顧及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中國依然是在列強分割之下。就中國而論，遠不及翁同龢的方案。不久義和團事變發生，海約翰感到原通牒的含意過狹，再度通牒各國，添入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見343頁），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方算完備。

第九章 改制維新與排外

(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一)

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已逾三十年，時間不為不久，結果證明全部破產。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為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恭親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總辦軍機處與總署，當政二十四年（一八六〇至一八八四）。李鴻章在疆吏中權高勢隆，歷任巡撫總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間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九五），為新政的實際計劃者及執行者，更是成敗所繫。初受知於曾國藩，因工於謀畧，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細」見稱。復以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煊赫一時，曾國藩又說他「拼命作官」。不過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貴，缺乏恢宏抱負、遠大器識，於國家全局、人民福澤，未能遠慮慎思。

李以軍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槍之力，此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為第一的觀念所自來。抱此見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謀國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動機，在平內亂、禦外侮，但一開始即有輕重緩急之別。恭親王曾說，太平軍為心腹之憂，英、俄各國為肢體之患。換言之，平內亂為第一，禦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復，大亂救平在望，各國對華復

採協和政策，一時海不揚波，清廷的自強熱忱隨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灣的刺激，自強運動再起，雖仍不外強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強，則「不獨東人(日)無慮，即西人亦無覬覦地。」不久事實證明，兵並未能強，原因又復安在？恭親王說，是因為以往十年，「並無自強之實，從前事情，幾於日久漸忘。……屢經奏請籌辦，而歧於異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他殷望此後「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侮之計。」舊勢力之排斥新觀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國一千年來的道統、治統思想與種種根深柢固的積習，如欲使其頓然改易，徹底破除，尤屬困難重重。然亦非絕不可能，全繫於最高當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識、定見、公誠無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國權力的為一無知多慾而陰狠的慈禧。

恭親王的措詞，尚有着干滿蓄。李鴻章則明白指出，太平軍平定之後，清廷最感不安的為地方勢力的增強，處心積慮，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憤慨地說：「都中羣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總總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探無根浮言。」又謂中國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併力。中國朝廷無人，誰作主張？朝議不定，早作晚輟。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國強，更恐大權旁落，尾大不掉。恭親王無拳無勇，尚屢遭譴懲，以至罷黜。李鴻章手握重兵，屯駐近畿及黃河、長江下游，各大兵工廠以及輪船、煤礦，亦無不由他控制，與外人復頗相得。西人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時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時，他們說他將自立為帝，光緒繼位之初，又有他謀自建王朝之說。他的實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問題發生，他與朝廷的意見不合，西人推波助瀾，謠傳他將與戈登進軍北京。戈登雖然否認，然亦承認歐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國皇帝。報載俄人如佔領北京，李必應允俄人的條件，俄人必擁李稱帝。曾出使德國的通政司使劉錫鴻劾他跋扈不臣，

儼然帝制，假外援以窺神器。詔責其信口誣議，加以處分；但慈禧愈不能無動於心。中法戰後，更有人請置李於死，可想見他的處境，不免憂讒畏譏。即使他於自強之道，有真知灼見，亦不敢多作主張。

李自始即認定如能強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再三說以西洋政教風俗善良，官民相與講求，臻於上理，國以富強。日本有見及此，在英國的日人，大都學習律法、經制，學兵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祇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家國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民氣常鬱結不能上達，」必須使「吏效其職，民輸其情，……羣懷踴躍之心，以供國家之用。」簡言之，欲圖富強，應革新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發揮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擁護，始克有成。李仍謂兵為立國大端。他亦曾興辦學堂，派遣學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終不離軍政、製造。留學歸來的嚴復、馬建忠對於西洋富強原因，亦均有認識。嚴復主持北洋水師學堂十餘年，自言「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馬建忠只是受命辦理交涉，均無裨於李的自強觀念。他亦非不知學堂、博物院之應開辦，時文小楷之當廢，此不過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於軍事之外，別求其大其遠者，亦斷不得以行。他又說，自強之難，事之不易猝辦，由於「人材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設防，猶畫餅也。」人材繫於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歸咎朝廷，其他困難則多來自中央。慈禧在財政上藉口經費支絀，同時又假新政之名籌款，從中分肥，以供揮霍。在輿論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訐，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鴻章有恩怨及利害衝突之人，加以阻撓。與李名位相當的左宗棠，意見往往與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縱，以分其勢，其他督撫亦非盡以李為然，未必合作無間。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強路線而論，各種事業的本身弱點，亦

復不少。人事、設備無一健全。經營不善，技術不精，原料不給，以致產品惡劣，式樣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辦廠局的主管，有爲有守者少，把持營私者衆，恣意侵蝕，濫用人員，掛名分肥。官督商辦者或官商合辦者，亦無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歸於總辦、會辦輩，商人視入股爲畏途。間有自好之士，又拙於才學，不明工藝，諸事依仗所雇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僅一知半解，而又專橫自是。馬格里主持的金陵製造局，所鑄大礮，在大沽口兩次演放爆炸，終不認過。日意格之於福州船廠，密妥士之於天津製造局，無不獨斷獨行。所用洋匠，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詳，事事一成不變。所購機器，陳舊不堪，一聽洋員矇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購自外洋，既不經濟，復不可恃。開平煤礦雖解決了燃料問題，鋼鐵木材仍須進口，平時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戰時勢必有斷絕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槍礮，大半購自各國；即對內用兵，如左宗棠之於西北，同樣須由海外置辦。產量無多，爲一原因，中國自製終不及外國之利，爲又一原因。英國國會議員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謂機器局所造爲無用之器，祇便各督撫之私。李鴻章亦說船廠徒增糜費。

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爲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爲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爲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爲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爲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爲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圖，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爲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爲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爲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持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〇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中國強而且富，不強不富，固於中國有害，亦於西人不利；中國的貧弱，在不善變，變的根本在改革科舉，學習西方的興學育才方法。此一議論，引起了不少中國人的共鳴。是後類此的主張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建議先於現有書院設天文、輿地、格致、船政、法學等科；狄考文建議廣設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大學，將男女以及士農工商悉納於學。

李提摩太來華遲於林樂知十年，主張畧同。他說中國圖強，莫先於教育，應派官員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國學習，國內設西學書院。並撰《七國新學備要》（*Modern Education*），勸設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改組，以《萬國公報》為機關報，四年後會務歸李提摩太負責。他的交遊至廣，上至達官，下及士民，宣傳益力，業務發展迅速。五六年間，出版的書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繙譯的馬瑟西《泰西新史攬要》（*Robert Mackenzi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撰編的《中西四大政》、《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興華新義》、《文學與國策》、《治安新策》，最為暢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萬國公報》幾乎每期均登載有批評

中國政治腐敗的文字，指陳清廷的險象，認必須一變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則爲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爲聘用西人，設立新政部。林樂知的建議爲提高中央的權力，畧予人民以自主權，使其參與商務、工藝、農務等局。他們不贊成中國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應聘用「西國賢臣」，甚而將全國或若干省歸英人臨時治理。不過他們亦認爲政事當爲人民謀福利，予人民陳說之路，中央可不設議院，民間則當設議局。此外復有人說到日本開集議院，大布新政，丕變故法。有了議會「上以備官府之咨，下以慰黎民之願，民情之愛樂於以見。」林樂知、李提摩太的譯述，常常比較各國新政，《泰西新史攬要》實際是介紹近代西方國家變法的成效，自有啓發作用。張之洞曾說：「海濱人士稍稍閱讀《萬國公報》，……接西國教士，漸有省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謂「智」，不只是科學。

對於中國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們已倡導「遠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則中國將爲土耳其、波蘭之續。李鴻章爲琉球問題，有聯俄制日之意。他們力言，俄國慾壑難填，中國聯俄將失各國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與中國交合，在華教士立即響應。甲午戰後，極言俄爲中國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約，無異投肉虎口；「俄欲華弱，英欲華強，」中國必當親英。日本戰勝中國後，英國另眼看待，傳教士因而又主中國對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遊說張之洞，勸連好日本，結論仍是授權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聯絡康有爲、梁啟超，分訪李鴻章、翁同龢、恭親王。翁稱他是位「豪傑」、「說客」，承認所言富民、富官，學人要通各國政事，甚爲切摯。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英國公使歐格訥，亦分向王大臣進言。福士德在上海《時務報》發表的各項辦法，與傳教士無甚出入。

三、改制論的萌動

自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咸視變法爲大忌，相戒不輕彈此調。爲時將近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因襲無革。十九世紀中葉，若干讀過西人著述，及身歷目睹會與西人交遊之士，對於西方政教，漸生

嚮慕，間有論著，但無人正面主張中國應該仿行。曾國藩在日記（一八六二）中曾說「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只是空泛感想，與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見諸議論而有積極表示的為馮桂芬，他列舉中國之未能富強，是因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處（見195頁）。他的改革主張，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達，依公論以定黜陟，採會推保舉之法，裁汰冗員，省減則例，仿行地方自治，變革科舉學校之制，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西方之術，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先河。郭嵩燾較為急進，主張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為本。否則「即頓國考究西法，亦無裨益。」

馮、郭的議論發於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漸形成一種輿論或運動。代表人物與著作，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〇年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籌洋務議》，一八八〇年左右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¹一八八七至一九〇〇年何啓、胡禮垣的《新政真詮》，²一八九〇年湯震（壽潛）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陳虬的《經世博議》、《救世要義》，及約與同時的陳熾的《庸書》。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視。馬曾留學巴黎，薛曾佐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廣交西士，復遊英、法、日本，鄭曾習西文西學，供職美、英洋行，何留學英國，胡肄業香港大學。他們論及的範圍與馮、郭無何出入，而深度過之，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

外交方面，他們力主維護國家主權，指陳以往所訂條約之害：關稅必須爭回自主，對於民生必需的貨物，寬其征以蘇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征以濟國用；現行的稅率盡奪中國利源，與保

¹ 係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訂。

² 何啓初撰《新政要畧》，胡禮垣衍為《新政真詮》，一名《新政論議》。

護商民之理，大相背謬。馬建忠主張於修約之時，堅持改約，取消釐金，提高關稅，以爲轉虧爲盈、轉弱爲強之基。鄭觀應的意見，約畧相近，凡關稅有不利人民、有礙國家自主之權者，均應隨時自行更變，這是與公法相合的。海關行政權當操之中國，自總稅務司以至各稅司幫辦，逐步易用華人，「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於權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尤大。」陳熾於洋員管理海關之害言之亦切（見199頁）。領事裁判權爲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國何地，即受治於該地的有司，在中國則不然，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張各口岸專設衙門，最好是參用中西律例，審辦華洋訟件，否則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華人。對於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他抨擊極力，有了此款「一國所得，諸國安然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羣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目前雖難頓廢，不妨另訂一通行之約，會歸於一。¹ 鄭觀應又指出國際公法不全可恃，強國可執國際公法以繩人，弱者惟有隱忍受屈，惟有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關於外交政策，王韜主張結好英、日以抗俄，鄭觀應、湯震、陳熾等意見亦然，薛福成主聯絡美國或俄國，但首須自強。

經濟方面，他們一致強調發展工業，亦即發展社會經濟。馬建忠說：「治國以富強爲本，而求強以致富爲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富強以工商爲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開商之源，」工爲其基，商爲其用。閉關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須發展商務，不使外人盡佔中國之利。益事推廣茶、絲，使用機器紡紗、織布，抵制洋紗、洋布進口。同時大興礦政，以求自給。王韜、鄭觀應的主張相同，鄭於商務尤多所發揮。他說外人不患中國練兵講武，特患中國奪其利權，「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西洋有專理工商的機構，中國亦當仿行：中央設商部，地方設工商公所。中國商務一日不興，外人的貪謀一日不輟，「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就是經濟戰，日本採行的即此政策，企業歸人民

¹ 駐英大臣曾紀澤亦曾論及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條款之害。

經營，商辦而不官辦。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仿行後定可超過日本。「國既富矣，兵奚不強？」既富且強，方可與各國講信修睦。

學術、教育的改革，鄭觀應主張亦力。國家盛衰，繫於人才，人才出自學校。西洋之強在於學，西學精微廣大，中國人尙未涉其藩籬。應一面廣設西學書院，變通文武科考制度，試以西學，一面仿西洋程式，擴充學宮、書院，州縣設文武小學，府省設中學，京師設大學。文分文學、政事、言語（外交）、格致、工藝、雜學（商農醫）六科；武分陸軍、海軍。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長，「以之治國則國富，以之治兵則兵強，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無不理，事無不舉。」女子學塾應行增設，纏足應申禁令，立限一年，違者罪其家長。學生出洋，應繼續遣派，但宜選年在二十左右而識大體者；有用西書亦須譯出。馬建忠且有設翻譯書院之議。

最突出的為政治革新主張，他們開始倡導涉及國體的民主或議院問題。馬建忠雖不滿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但亦謂議院立則下情可達。王韜謂「民可順而不可逆，」以往的新政，只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英國的君民共主制度，方為富強基礎所在。積極主張開議院的為鄭觀應，「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闕，志必乖違，」有了議院可詢謀僉同，上下同心，「君國大政，君秉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君民相洽，情誼交孚，」自無敵國敢相凌侮。君主之國，權偏於上，民主之國，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湯震提出一緩進方案：以王公至各衙門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組成上議院，由軍機處主之；以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下者組成下議院，由都察院主之；省、府、州、縣之事有應議者，凡巨紳以至舉人貢生、生員、監生，皆令與議。

從學理上鼓吹民主政治的為何啓、胡禮垣。他們說古今政治雖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分，實際「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乎民。民有性命而不能保，則賴君以保之，民有物業恐不能護，則藉君以護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業方能護，則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法令之不能行也。於是乎奉一人以為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王

者欲保世滋大，國祚綿長，則必選舉以同好惡，設議員以布公事。」持論有如黃宗羲與盧騷。泰西立國，「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怨之民情，而富強之體已傳。」富強之本在政治，政治之本在法度，最好的法度為民主，他們與鄭觀應、王韜均認為英國的君主立憲最足為中國所法，均認為有議院則民志伸、民心結，無異合中國四萬萬人為一人，中國將為世界至強的國家。

這一時期主張改制的人，往往引證中國歷史及孔子之言，以破中國不能維新之說。王韜謂西人以五千年來中國未之或變，其實不然，遼古為創制之世，唐、虞為文明之盛世，三代至秦而一變，漢、唐至今又一變。西人又常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對於典章制度，「惟求不悖於古，以宜今而已。」何啓、胡禮垣亦謂孔子對於以常法為訓的諸經，皆有刪削，而獨保全以無常法為教的《易經》，並加以闡明，用意至為昭著。至於漢學、宋學，皆須摒棄，然後儒教乃昌。可見他們求變的殷切。

四、孫中山奮鬥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第一位領導中國政治革新運動的為孫文（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文號中山，廣東香山入。香山密邇澳門、香港，距廣州不遠，對外接觸的機會較多，赴海外謀生者亦眾，並有遠去英、美就學者，直接間接易於獲得新知。他在幼年時代，對於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英、法軍在廣州附近的蹂躪，及西方事情，均有所聞。影響他最大的應為他所受的教育。七歲入村塾，十三歲去檀香山，就讀於英美學校，「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深讚西方教學的完善，遠勝中國。」課暇與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羣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使我國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十九歲以後，學於廣州、香港，最後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不僅給他以科學訓練，並啟發了他的政治意識。「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

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地如香港，其故安在？」於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因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這是他自述他的政治革新動機的由來。西醫書院為何啓所創，何啓的政治議論，對他應亦有影響。他又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雖不免言之過甚，而英人在香港的設施，曾引發了他政治改造志趣則無可疑。

廣東與越南的關係，有若唇齒。中法戰爭期間，廣州一夕數驚，清廷忽和忽戰，一無是處。香港華人因抵制法船，遭受英人壓迫，為他所目覩，益惜清廷之無能，開始聯合同志，宣誓驅除滿人，實現大同。「以學校為鼓吹之地，借醫學為入世之媒，」結交同學及天地會人士。二十七歲西醫書院畢業，懸壺澳門、廣州，施醫贈藥，進行革命不懈，認定必須喚醒民族，中國方克根本得治。

一八九四年春，孫北去上海，見到王韜、鄭觀應。鄭和他同里，約長他二十四歲，先已相識，見解頗多相通之處。六月，孫至天津，投書李鴻章，陳富强大計，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與改良派的議論無何不同。因為他希望李能有作為，自不便說以革命。時中日朝鮮事起，李對他未加理會。孫旋去北京，以窺虛實，並入武漢，觀察長江形勢，然後再赴檀香山。

孫雖早有傾覆滿清之意，促成他最後決心的，一為對李鴻章失望，一為中日戰爭。在他到檀香山前後，中國陸海軍已經戰敗。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聯合華僑，成立「興中會」，初僅二十餘人，不久增至一百餘人。為了便於活動，雖仍以愛國富強號召，但已痛論中國國勢之危，斥責在上者因循粉飾，在下者矇昧無知，以至辱國喪師，「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瓜分豆剖，實堪虞於目前，」皆由於「庸奴誤國，」所以必須「振興中華。」革命的意味已躍然紙上。一八九五年二月，孫回香港，合併了另一救國團體，即楊衢雲領導的「輔仁

文社」，正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爲會員誓詞，明顯的揭示民族、民權主義，積極進行以武力奪取廣州。不僅與滿清絕不兩立，與當時其他維新派的立場行事，亦全不同。

廣東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會黨紛起。戰爭期間，招募的勇丁、漁民，戰後多被遣散，與會黨合流。一八九五年夏秋之交，亂事愈熾，遍於東江、北江及西路，各州縣風聲鶴唳，未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時生事端。官府嚴厲鎮壓，大事誅戮，粵督自言「日以殺人爲事。」廣東之外，廣西右江一帶亦有民變。甘肅回亂更爲嚴重，直隸大雨成災，山東黃河多處決口。人民痛心疾首於清廷的對日屈辱，紛紛請願，悲憤的情緒，撼動北京。種種情勢無一不利於革命行動。興中會計劃於十月下旬在廣州舉事，準備策應的會黨傳說有四五萬人之衆。以事機洩露，歸於失敗，革命黨多人殉難，陸皓東爲其中之一，供詞直言「非廢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滿清。……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革命黨的行動從此開始，聲威從此揚播。

孫中山於事敗後，東去日本。以往他們自以爲是「造反」，因日本報紙稱他們爲革命黨，今後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孫的革命據點，一爲檀香山，二爲香港。到日本後，於橫濱設興中會分會，建立了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爲革命的中樞。第二年（一八九六）孫經檀香山、美國轉往倫敦。清方對於他的行蹤，十分注意，到倫敦十天，即被誘拘於清使館，設計者爲使館參贊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獲釋，報紙競相刊載，孫撰文說明他的主張，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革命有了認識。孫在倫敦留居約九個月，致力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學理的研究與實際的觀察，知道專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於幸福之境，尙須於經濟上善爲處理，使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一併解決。

五、康有爲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知識分子之致力於中國制度改革運動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並一度使之見於實施的爲康有爲（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他不是此一

運動的首倡者，而是積極的推行者。康為廣東南海縣人，幼年致力於史學、理學、經學，而以經世致用為歸。二十一歲，獲交一位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各種新書、及道光以來掌故。同年遊香港，復受到深刻啓示，開始閱讀有關西事及世界史地遊記之書，尋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歲到上海，益感西人治術有自，鑽研西學的興趣愈高，對於當時的中外譯書、報刊，無所不讀。他富於想象、推理，能自闢境界，因而會通中西之說與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論。

中法戰爭對他亦是一大刺激。一八八六年勸說兩廣總督張之洞擴大譯書的範圍，謂西學甚多新理，政治書極為重要。一八八八年到北京，上書光緒，首就外患內亂，指出國家的危機；次論吏治腐敗，過去舉辦洋務，未見其利，反見其害，必須及時變法，方可圖強。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他想透過國子監代為上遞，管理國子監的翁同龢頗服他的議論，但以語太訐直，未敢代達。孫中山的奮鬥係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係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後他繼續活動，為人起草封奏，請停頤和園工，勸醇親王勿預政事，責樞臣無狀，禁宦寺干政，均告無效。因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培植幹部，然後再作政治請願。他的步驟仍着重於上層說服，希望朝廷覺悟振奮。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三年，康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從他受學的有梁啟超等。所講的為中國學術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國以為比例推斷，闡明變法救國之方。每講辨入微，聽者歡喜踴躍。「有時語及國事忼陸，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歔歔，或至流涕，」聽者又為「振蕩怵惕，懷然於匹夫之責。」他的重要著述，一為一八九一年刊行的《新學偽經考》。「新」是指王莽的國號，「偽經」是指古文經書。劉歆為要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偽造了幾種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作理論根據，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乃「新學」而非「漢學」。這一說法，不論是否能夠成立，確可代表他的懷疑精神，動搖了泥古的保守觀念，舊的學說不全可信。

二爲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的《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年定稿），謂經書係孔子假古人的言論，按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托古改制，將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諸子，無不如此。證明孔子亦是一位維新派，用孔子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書中又論到政治社會的演變分爲三個階段，由據亂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歷史是在變的，是在進步的。梁啓超說《新學僞經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孔子改制考》則如火山的大噴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三爲《大同書》，一八八五年着手草擬，一八九三年輪廓已具，主旨在發揮天下爲公，人己同權理論與辦法，以期實現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一切平等。不過目前尚爲據亂世，只可講小康，即升平世，應先改革政治，以謀國家的富強。

在變法運動期間，康的得力輔佐是梁啓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梁爲廣東新會人，才氣至高，十歲成秀才，十七歲中舉。¹從康受業後，見解一新。一八九四年，康、梁入京會試，均未獲售。康之落第是因爲他的議論有悖於聖賢之言。接着有人彈劾他的《新學僞經考》，不許他講學。第二年他再至京會試，時正中、日議和，在他的策劃下，由梁發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都察院，請求拒約，其他各省舉人紛起響應。條約互換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作大規模的請願，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²實爲知識分子的聯合政治運動。請願書爲康所起草，陳戰守之方及他日自強之道。一爲請皇上發罪己、明罰、求才之詔；二爲遷都西安，以對日賠款收充軍費，決不求和；三爲選將、練兵、購械，與日本續戰；四爲變法，以成天下之治，力行富強、養民、教民之法。「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總之「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都察院拒不代遞，但已流傳京

¹ 康有爲中舉遲三年。

² 公車指舉人言。

滬。第二天，康成進士，復單獨上書，專論變法，終於六月三日達到光緒手中，發交軍機處，軍機大臣翁同龢曾訪康商談。康大為興奮，進行愈力。

七月，康在北京創刊《中外公報》。八月組織「強學會」，參加的有京官陳熾、沈曾植及道員袁世凱等，梁啟超為主要負責人，曾獲翁同龢、孫家鼐、張之洞、劉坤一等的贊許。守舊大臣徐桐、剛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則加以攻詆。康旋往上海，設強學會分會，發行《強學報》，入會者有黃遵憲、張謇、汪康年等。黃遵憲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一八九〇年出版的《日本國志》是他的名著，其中關於明治維新的記述，對於讀者頗有影響，康為其一。張謇受知於翁同龢，汪康年與張之洞接近。一八九六年一月，北京強學會與《中外公報》遭受封禁，上海強學分會與《強學報》亦停。黃遵憲、汪康年改辦《時務報》（旬刊），梁啟超主筆政，撰《變法通議》諸文，謂各種制度無時無事不變，今日尤需要變，主動求變，否則必為列強分割而亡國。以往的自強新政無不仰助西人，只利於外國，中國反蒙其害。「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官制應伸民權，中國二千年來，君權日尊，國威日損，如設立議院，使君權與民權合，議法與行法分，自然可強。再不變法，可能發生革命。最好是採英國、日本的辦法，行民權而不取民主。梁的文字奇詭，一時爭誦，數月之內，《時務報》銷行一萬餘份。一八九七年，又編印《西政叢書》，計三十二種。設大同譯書局、女子學堂、不纏足會。時康創刊《知新報》於澳門，開「聖學會」、「廣仁學堂」，發行《廣仁報》於桂林。風氣素稱閉塞的湖南，由於巡撫陳寶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與地方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輩的領導，創設「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新報」（旬刊）、《湘報》（日刊），舉辦各項新政，氣象頓變。梁啟超應聘主講時務學堂，中學以經史為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而以興民權為救國途徑。南學會為一政治團體，集合南省志士，講求救亡之策，有總會、有分會。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具有議會規模；萬一華北不保，南省

仍可自立，為國家留一生機。梁任教雖僅四月，而留下的影響則繼長增高。

譚嗣同(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傾心於王夫之、黃宗羲之學及龔自珍、魏源的議論，對康有為十分景仰。著有《仁學》，強調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性，必須衝決一切束縛網羅。今日外患已深，「分割兆矣，已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痛斥滿清當道之愚與私，甚至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君主為公眾所推舉，君權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會近於康的大同，而措詞則多為激烈。

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的為嚴復(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嚴為閩人，十四歲至二十七歲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及英國海軍學院受過八年的科學教育，有過五年軍艦實習經驗。二十八歲起，總理天津水師學堂教務十五年。甲午戰後，他認為西方之勝於中國者，不僅在器械而在政教風俗，其所以富強，由於公理日伸。中國不惟不足以當西洋，「即東洋得其餘緒，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因決以言論警世。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連續在天津《直報》、《國聞報》發表精闢之論，與《時務報》南北相應。他說西洋命脈之所在為「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恆，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講富強、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術。富強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今日之要政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實施的事項莫亟於廢八股，即漢學、宋學、詞章亦皆宜束之高閣。他復就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原理，闡發救亡的論證。一八九六年刊行所譯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就自強保種事，反覆致意，使讀

者休焉知變。¹

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維新人士最活躍的地區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為湖北、江西、廣西、浙江、福建、陝西等省。他們的機構有學會、報館、學堂。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散歸各地後，自有推動的作用。學會的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據說多至百餘，報紙亦由十九種增至七十種。清代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現在已被打破。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政，始終以海防為中心。經過長期經營，多以為縱不能抗衡西方大國，要足以與日本相敵，而事實證明大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認為應改進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謂兵為立國之本的李鴻章亦稱道日本各項政治日新月異，中國亦宜於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國人才無教，學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並不能轉移大局。在他當權之日，尚不克大有作為，此時更不待言。翁同龢為光緒的近臣，對於新學西政，所知無多，但不失為有心之士，盡力啓導光緒的政治觀念，光緒十九歲時（一八八九），翁為講說聖賢治績，不必盡同，特進呈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謂為最切時宜，勸他留心洋務。一八九一年，光緒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湯震的《危言》、陳熾的《庸書》進呈，並讀《泰西新史攬要》，翁盛稱他英爽精明。翁接觸過不少維新人物，²頗賞識他們的才學，承認變法的必要。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

¹ 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六年嚴讀譯斯賓塞爾《羣學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亞丹斯密《原富》（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穆勒《自繇論》（J. S. Mill: *On Liberty*）、孟德斯鳩《法意》（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s*）等書，影響不及《天演論》之大。

² 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

主變則一。他說：「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西藝非要，西政爲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¹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爲要。作全面推動的爲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爲。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爲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爲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爲開端，惟有以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爲法。「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爲偏安，無能爲計。」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爲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爲，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爲，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恒、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爲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此地爲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法律官制爲先」。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爲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准其具摺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¹ 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局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集羣臣，躬身誓戒，除舊布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游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宋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梁啟超再合各省舉人上書，可說是第二次的公車上書。康開「保國會」，講保國、保種、保教歸之於變法。各省類似的自保會，繼之成立。一言以蔽之，變法維新的動機是為對外自保。守舊派雖加攻訐，光緒則謂「會能保國，豈不甚善？」

二、百日維新

維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獲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當支持與光緒的同情，聲勢似乎頗壯，但阻力亦屬不少。榮祿及軍機大臣剛毅，對康有為極為痛惡，飽經事故的恭親王態度消極。翁同龢以頻頻受劾，不敢積極主張。五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卒，康促翁及時而行，翁反希望他離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為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摺請明定國是，力行維新。光緒下了最後決心，以去就爭。他告訴慶親王奕劻：「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允不過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緒命翁擬變法上諭，十一日正式頒布。畧云：「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

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便之才。」「百日維新」於是開始。

國是詔下，維新派爲之歡騰。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爲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君臣一致認爲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康說，近年非不言變法，然只是局部的變，是變事而非變法。變法須先將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對於守舊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關變法之事，可特下詔書，使守舊大臣無從駁議。中國大患在民智不開，八股試士必須廢除，並論到籌款、築路、練兵、興學、譯書諸事。光緒對康本欲重用，爲剛毅所抑，僅命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動之下，百日之內，變法的奏摺紛上，上諭日或數頒，大致可歸納爲四類：一爲教育學術，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問題。國是詔發布之日，首命舉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設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宗室出洋遊歷，挑選學生赴東洋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試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講求實學實政爲主。停止朝考，殿試後即可授職，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派梁啟超辦理。頒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命保薦精專製造、格致人才，印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及張之洞的《勸學篇》。

二爲經濟建設。康曾謂西人「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必須講求富國養民之法，以工商立國。以往的製造企業爲官辦，率多偷減，敷衍欺飾，今後應「縱民爲之。」本此原則，詔命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分局。廣設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訂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洋農學各書，採中西各法，切實開墾。獨立開闢地利者，給予特賞。頒製器、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就各地物

產設立工廠。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弛八旗經商之禁，命習士農工商。訂開屯徙戶，計口授田新章。

三爲軍事。改練洋操，挑留精壯，裁空糧，節餉需，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準備舉辦民兵。定興造槍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四爲政治。最重要的爲變革機構，提高效率，廣開言路。見諸命令的爲刪訂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與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其餘應裁文武各缺，均分別詳議趕辦。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爲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爲官報，創京師報館，准報紙臚陳利弊，據實昌言，一律呈覽。每年出款入款，分類列表，按月刊報。¹

九十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德佔膠州灣後，英、日開始分向劉坤一、張之洞游說，日本更爲積極。兩年以來，劉、張對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爲英、日與中國利害一致，應與相結。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武官訪張之洞，力言中國聯交英、日的重要。復說譚嗣同、唐才常，謂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從前交戰，願與中國聯結，救中國亦爲自救。如中、日聯盟，再引英國相助，定可遏止俄國在東亞的侵畧。日人新成立的「興亞會」，邀宴上海名士，謂白人「席捲六合，直注東邦，印度、緬甸、安南依次被滅，至今屹然爲狂瀾砥柱，……以爲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欲與日本釋怨修好。

¹ 康有爲想像中的與計劃中的新政尙多，如尊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定立憲，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不分，皇帝親統陸海軍，改年號爲「維新」，斷髮易服，遷都上海，以爲新京。據他說，軍民合治以下諸事，已得光緒的同意。

維新派對於聯好日、英的意見，初不盡相同；旅順事起，漸趨一致。康有為先向翁同龢進言，繼為兩御史草疏，稱「英真救人之邦，」日願相助，亦為真情。復撰《聯英日策》遍告朝野，主開旅順、大連，准各國通商，俄國公使警告李鴻章，如不許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約作廢。康再說翁同龢，謂以英、日抗俄必無害。光緒責恭親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年，不獨不能阻人（德）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恭、李答稱：「若以旅、大予之，密約如故。」慈禧亦對光緒施用壓力。維新派之親英、日至為明顯。

三、新舊派的明爭暗鬥

康有為憑他一片熱忱與動人言論，一躍而起，以為只要獲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獨斷，即可暢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緒缺少真正權力，但畢竟是一國之主，慈禧或不致毫無顧憚。其實慈禧與光緒之間的嫌隙已深，一八九五年光緒革退接近慈禧的軍機兼總署大臣孫毓汶、徐用儀，慈禧亦革退擁護光緒的總署大臣汪鳴鑾、長麟，第二年又將翁同龢罷毓慶宮，¹使他們君臣不能經常相見。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惟知攬權。有人說如果奉戴她來變法，她將不會反對，似屬可能，此可於同治朝及光緒前期的推行新政見之。現在光緒要爭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內心益憤。國是詔頒發後四天，翁同龢革職，派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書崇禮兼署步軍統領，分別掌握京師駐軍，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禮部尚書懷塔布、軍機大臣剛毅分管京營，對光緒均極不利。

新舊觀念的衝突為歷史的必然，實際的利害更為彼此的水火的主因。康有為本想透過他的學說來推動變法，絲毫不曾生效。衛道之士指《新學偽經考》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就是傾向維新的翁同龢亦斥為說經家的野狐，孫家鼐責他學術不端，心術可疑。《孔子改制

¹ 光緒的讀書處。

考》亦遭到相同攻訐。湖南舉辦新政早於百日維新一年，地方士紳，詆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爲「禽獸之行」，時務學堂爲製造無父無君之亂黨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說康想借保國會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說他聚衆滋事，圖謀不軌，還有人說各省自保，國家將從此分裂。國是詔發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騷阻撓新政。許痛詆康有爲居心不可測。舊派的御史謂變法勢將召亂，保國會徒保中國，不保清朝。這是新、舊派的公開鬥爭。

廢八股爲變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對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廢除，「勢必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¹等於斷送了他們和現職官吏子弟的前程。次爲興學堂，舊派雖不便逕行反對，但是此事連帶涉及改書院、廢淫祠，²而把持書院及依淫祠爲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婦，亦爲之譁然。至於裁綠營，及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使身無一技之長的百餘萬人陷於絕境。

開制度局關係變法的根本，六七月間，流言紛起，說是將盡廢軍機處、內閣、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撫、藩、臬、司、道，內外震撼，奕劻、孫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門及疆吏對於新政上諭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會。光緒屢頒嚴旨，飭令於交議事件，迅速議覆，應辦諸事，限期執行，否則懲治不貸。復申誡各省督撫不得掩飾支吾，指名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直隸總督榮祿。

康以變法的進行不如理想，八月二十八日，再上一長達數千言的奏摺，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光緒決採猛進政策，八月三十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門，鄂、粵、滇三巡撫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紛請慈禧保全。九月四日，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騷及四侍郎阻撓該部主事王照上書，悉予革職，王照則不次擢升，舉朝爲之錯愕。五日，加新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卿銜，派爲軍機處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實權。又二日，撤李鴻章、敬信總署大臣差，

¹ 不在祀典之祠。

舊黨益惴惴不安。

康有爲力主早日開設議院，九月九日，詔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以期集思廣益。十三日，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以議制度。但情勢的發展，對新黨日益不利。康有爲之弟康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變

慈禧成竹在胸，着着部署，待機而動，翁同龢的開缺與榮祿的出任直隸總督爲顯而易見之事。軍機處實際歸剛毅領導，總署仍是慶親王奕劻主持，接近維新派的張蔭桓遭受參劾。八月二十四日，上諭宣布慈禧、光緒定於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閱兵。盛傳屆時將行廢立。舊派承慈禧之意，與榮祿密商。新派日夜憂懼，但缺乏武力。康請仿日本之制，立參謀本部，選勇士與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統馭，但爲情況所不許可。

袁世凱自朝鮮歸來，李鴻章派他會辦遼東前敵糧台。戰後他向督辦軍務處提出練兵計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得到李鴻藻、榮祿的支持，奉命督練天津小站的新軍。第二年爲人所參，賴榮祿之力，方獲無事，可見他們的關係不同泛泛。袁亦不時奔走於翁同龢之門，百日維新行將開始之時，與翁深談時局，慷慨自誓，儼然是位愛國志士，這時他已升任直隸按察使。康有爲以袁頗知外事，參加過強學會，使人和他聯結，袁表示對康極爲欽佩，於榮祿則有不滿之詞。康信以爲真，說光緒召袁來京，收備不測。

皇帝與近臣在懋勤殿議政並非創舉，光緒以爲應無困難。九月十四日，向慈禧請示，竟未獲准，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楊銳勸他對慈禧將順，不可固執，變法宜有次第。光緒賜以密詔，說是太后堅持不肯變法，自己權力不足，如操之過急，「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朕今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而又不致有拂聖（慈禧）意。

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候朕熟思審慮，再行辦理。」看來態度漸轉緩和。十六日召見袁世凱，擢授侍郎，專辦練兵。十七日，二次召見，命與榮祿各辦各事，暗示他可不受榮祿節制。同日，派康有為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以去反對者的目標，密諭以此舉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十八日康與林旭、譚嗣同、梁啟超等共商，決定勸袁舉行政變。是晚譚嗣同訪袁，說以誅榮祿、圍頤和園、保護皇上，以袁為直隸總督。袁答應將來光緒來天津閱兵時，即先於軍中殺榮祿。譚滿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議康有為延伊藤博文為政府顧問。八月初，有人奏請「借才」、「聯邦」，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內政實權，特別指名伊藤。如與日本聯合，可長保太平之局，「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九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請光緒召見，宣示中、日和睦之誼，甚至用為中國宰相，因之盛傳伊藤將任軍機大臣或顧問大臣，舊黨益為惶悚。¹

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同一天，康有為乞助於李提摩太，李再提出他的聯邦主張，中、日、美、英合而為一。接着楊深秀奏請趁伊藤在京，早定大計，團結英、美、日，實行合邦。御史宋伯魯奏請派李鴻章、康有為與李提摩太、伊藤商酌辦法。

新黨的武裝改變，尚需時日，合邦計劃尚待商議之時，舊黨已斷然行動。九月十八日御史楊崇伊請太后訓政。十九日慈禧自頤和園還宮，榮祿節制的董福祥軍入京，轟土成軍向天津集中。二十日上午，光緒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下午伊藤博文覲見，光緒謂中、日同在一洲，最為接近，當同心合力，親密國交，並問以對中國改革意見。伊藤答稱，日本天皇意亦相同，願與王大臣相商，均為慈禧在簾內聞見。二十一日慈禧宣布訓政，幽禁光緒，完成了她第三次政變。

政變的導火線多謂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據袁自言，他於九月二十

¹ 伊藤過天津時，自言光緒對他等待已久，榮祿在宴會上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奕劻接見伊藤時亦表示冷淡，惟有張蔭桓熱誠招待。

日下午返抵天津，僅向榮祿畧述內情，並說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羣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第二天即政變之日，始對榮祿備述詳細情形。」即使如此，二十日下午所談，已足令榮祿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當晚榮祿定必將消息報告慈禧。政變如箭在弦，絕不能免，以袁的機警，自知何去何從。袁的兵力不過七千人，京津一帶駐軍不下數萬人，北京、天津皆榮祿掌握，不要說袁部難以開往北京，縱使於天津閱兵之時，採取行動，亦無懾服他的勝算。何況慈禧的威嚴猶在，中樞及地方要津幾盡為舊黨所據，毫無權力的光緒與僅放言高論的康有為輩，如何能和他們對抗。袁為自身利害，不僅不聽從新黨之議，冒此大險，且欲向對方建功。慈禧之所以於光緒第三次見袁及會晤伊藤後的次日實行政變，可能是顧慮萬一袁果有舉動，日、英果有表示，將不易應付，遂當機立斷。

政變之後，慈禧除將光緒幽囚外，一為懲治他的政敵，二為推翻新政。她所欲得之而甘心的康有為，已於政變前一天出京，因李提摩太及上海英領事之助，南走香港。梁啟超、王照得日本公使林權助及伊藤之助東渡日本。譚嗣同自願為主張犧牲，與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張蔭桓被逮。張以口、英使營救，與禮部尚書李端棻遣戍新疆，餘俱於二十八日被殺，是為「戊戌六君子」，其他新黨人物獲罪者尚多。¹

策劃政變的榮祿內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操軍政大權。被光緒革罷的懷塔布等，一一起用，被裁撤的職官，照常設置。復八股舊制，停經濟特科，禁士民上書、結會，撤農工商總局。百日維新期間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概推翻，一切恢復舊觀。

百日維新期間，英、日與俄對立，政變後俄國為勝利者。九月二十七日，各國公使在俄使館會議，英、日公使不至。自英東來的英國

¹ 徐致靖（禮部侍郎）父子下獄，陳寶箴父子、宋伯魯、張元濟、黃遵憲、熊希齡、江標、王錫蕃（禮部侍郎）、文廷式拿問，張百熙（廣東學政）革職留任。

議員貝思福會晤康有爲於香港，十月四日到上海，三次與伊藤博文商談英、日、美、德同盟。北上後，訪奕劻、榮祿、李鴻章，願派將弁代練陸軍，他們同意先由張之洞在南省辦起，以免與俄國在華北衝突。貝思福旋去天津，晤袁世凱。最後致書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主英、美在華合作。伊藤亦曾訪張之洞、劉坤一，諒不外爲防俄。

政變後圖謀廢立愈急，先製播康有爲毒殺光緒的消息，繼改說光緒久病，中外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劉坤一勸奕劻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這是內在的有力警告。英公使寶納樂亦謂如果光緒於此時去世，將爲各國所不諒，後果異常嚴重，這是外來的有力警告。奕劻極力解釋，允由法國使館醫生入診，事後醫云光緒僅是身體虛弱，無大病症，但是廢立的陰謀絕不因此中止。十二月將駐紮近畿的聶士成、董福祥、宋慶、袁世凱四軍及添募的一軍合編爲「武衛軍」，仍歸榮祿統轄。舊曆新年前後，一再宣布光緒尚未痊癒，並由榮祿再試探劉坤一的態度。劉稱「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請榮祿考慮，慈禧不得不暫爲從緩。

梁啟超到日本後，發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康有爲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加拿大組織成「保皇會」，¹頌揚光緒，慈禧恨入骨髓，必去光緒而後已。十二月，召劉坤一來京，使不能再行阻撓。李鴻章亦不以廢立爲然，謂光緒的罪不明，倘冒然從事，各國必先抗議，各督且將仗義聲討，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機會，慈禧採納了他的意見。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同治之子，滿語曰「大阿哥」，是爲「己亥建儲」，傳說將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即位改元。詔發後一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等一千二百餘人通電反對，海內外紛起力爭。各國雖無何表示，但英人對於拿辦經元善之事則多方阻撓，慈禧無如之何，緝捕康、梁更不可能。

¹ 全名爲「保救大清皇帝會」，一稱「中國維新會」(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

第三節 社會不安與義和團的發展

一、民生經濟的凋敝

南京條約訂立後，進口貨第一為鴉片，第二為紗布，以其物美價廉，土紗、土布不能與之競爭。沿海一帶首先受到打擊。一八六〇年起，中國全部開放，進口激增。鴉片因中國內地栽植日多，進口漸減，紗布躍居第一位。九十年代紗布在每年進口的總值二萬七千萬兩中約佔一萬萬兩，較六十年代增加了八十餘倍。土紗、土布的生產銳退，不能自給，須以現金購買洋紗、洋布。現金大都為出售糧食所得，而糧食又常不敷自食，尤以貧苦的華北為然。¹茶、絲原為出口大宗，八十年代以後，茶以印度、日本的競爭，出口開始下跌，九十年代末由佔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四降至百分之十八。絲的出口，亦在減少之中。

甲午戰前外人已在各口岸設立工廠，戰後正式取得此項權利，包括船舶修造、紡紗、自來水、電氣、製茶、繅絲、製糖、打蛋、榨油、捲煙、造紙、製藥等，以船舶修造業為大。最大輪船公司為怡和與太古，九十年代共有輪船五十餘艘，招商局有二十六艘，往來沿海長江。海運完全取代了河運，運河兩岸城鎮隨之蕭條，依漕運為生者，大都失業，長江流域的船戶、水手、工人，同樣受到影響。最早通車的鐵路，如津榆線、津通線、蘆漢線北段，均在華北地區，舊有的交通運輸自蒙打擊。電報、郵政的開辦，亦使不少人的生計發生問題。

水旱飢饉的災難，亦以華北為甚。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晉、豫災情為數百年所未有，餓死者不可數計。黃河自一八五五年在豫東決口，由蘇北改道山東，奪大清河入海後，以河身逼仄，水流不暢，堤工草率，屢次漫溢。一八八七年九月，鄭州決口三百餘丈，南入賈魯

¹ 華北每人耕地不足二畝，豐收時每年夏秋兩季產糧約二三百斤，全部所得，勉強可不受飢餓。

河、淮河，豫東、皖北被害特巨。一八八九年一月，始行合龍，死亡百餘萬人，用款千萬兩。同年及一八九〇年，山東境內兩次潰決。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八年，幾乎無歲不決。田舍漂沒，人畜死亡，山東災區達六十州縣，直隸為二十六州縣。一八八八、一八九〇、一八九二、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永定河連續潰決，決口自十丈至百餘丈，直隸災區達二十六州縣。一八九九年，直、魯、晉及蘇北復久旱不雨，糧價猛漲，貧者多賤價出賣子女。

人民苦痛加重的第三個原因為政府的搜括。政府的搜括由於支出的增多，財政拮据。財政拮据由於連年戰亂，宮廷揮霍，河工賑濟，以及舉辦新政所需，再加以對外賠款。一八九五年前，每年應付外債本息（賠款與貸款），約三四百萬兩，勉可負荷。甲午之役，軍費借款約一萬二千萬兩，對日賠款本息為二萬六千餘萬兩，皆來自借貸。每年應還二千三四百萬兩，須另行籌措。於是扣廉俸、增釐金、折漕米，土藥（國內所產鴉片）、茶葉、鹽、糖、煙、酒加稅，整頓田房契稅，勒令典當各商捐輸，仍然不能彌補。一八九八年發行「昭信股票」一萬萬兩，命官民領票繳銀，民間所存銀票不得不向銀舖、銀號兌現，舖號猝無以應，以致倒閉，闔市騷動，商家納賄以求免。農民計田苛派，按戶嚴傳，不准稍減，否則鎖擊扣押，政府所得不過一千萬兩。據一八九九年戶部報告，每年息債（外債）、軍務、洋務（新政）各需二千餘萬兩，中央、地方經常所費約二千萬兩，合計近一萬萬兩，歲入為八千餘萬兩，不敷一千數百萬兩。詔命查核關稅、釐金、鹽課，限三個月內辦就，急若星火，特派軍機大臣剛毅赴江南、廣東督籌。其他各省均有增解，多係強令藩司、鹽運使、糧道認繳，中飽之數自然不少。

二、人心鬱憤與教案再起

天災、人禍為民不聊生的兩大因素，而以人禍為最。所謂人禍，一為官府的橫徵暴斂，二為洋貨的充斥。洋貨為洋人所輸入，徵斂與對外賠款有關。傳教士的所作所為，又常使人民感切膚之痛，因之怨毒

多集於洋人。從中煽惑者多為地方士紳，羣起而應者則為平民，認定洋人為一切禍源，掃除了洋人，中國即可太平。傳教士與教民首當其衝。

天津教案解決後，七十年代，四川、安徽、福建仍時有教民衝突之事。一八八五年，重慶教民向考生尋釁，考生死傷三十餘人，人民憤而搗毀教堂，中國反賠償二十萬兩。一八九〇年，川東大足余棟臣（余蠻子）起而領導打教，參加者以哥老會、鄉團為多，歷數三十年來洋人如何欺侮中華，傳教上的種種不法。

哥老會聲勢的增長，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事。湘軍中本多哥老會，「楚師十萬，無人不結盟拜兄弟。」太平軍及捻亂既定，湘軍解散，江、浙兩省不下十萬人，回籍後，多不能斂手歸農。稍後白陝、甘遺還者，亦以萬計，相繼入哥老會。川、滇軍事結束，兵勇裁撤十數萬，大都成為「袍哥」（哥老會）。湖北、江西、安徽之退伍者，紛紛效尤，傳習哥老會者無縣不有，由兵勇而及於無業遊民與鄉農，通財尚義，以「打富濟貧」相號召。余棟臣起事之年，江西、安徽、湖南哥老會的暴動，尚與傳教無涉，但是一八九一年，鄂、贛、皖、蘇及山東教案的不斷發生，幾悉哥老會所為。張之洞曾說：「長江口岸，匪黨布滿，……上起荆、襄，下至武、漢以下，皆已聯為一氣。」打教滋事主之者為李鴻。李鴻為前被正法的江南提督李世忠（捻首李昭壽）之子，為報父仇，聯通哥老會焚燒教堂，不祇是要為清廷製造對外的困難，而且準備攻取南京。鎮江海關稅務幫辦英人梅遜(C. W. Mason)為之招募洋人，購運槍械，事洩未成。同年有四川、雲南、貴州的叛亂。熱河金丹教（白蓮教的一支），眾至數萬，攻陷朝陽、平泉、赤峯等城，焚燒教堂，波及吉林。各國公使動輒聲稱將採聯合行動，最後是撤革官員、懲處人犯、賠償、撫恤，款悉出自地方。湖南候補道周漢素惡洋教，編撰文告、歌謠，繪製圖畫，刊刷流播。一八九三年，詔令查禁，周漢革職管束，但兩湖反教之事，依然不停。

一八九五年後，教士教民氣讖益高，民教衝突隨之轉烈，各國的態度，更為蠻橫。是年先有四川成都教堂被毀，繼有福建古田英國教

士遇害。德使因德教士在山東兗州被毆，對總署百般恐嚇。一八九六年，蘇、魯之交又有多處教堂被毀。與教案無關的動亂，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屢起於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河南。一八九五年的甘肅回亂，蔓延西寧、河州，頭目不一，各擁衆數萬，歷時一年七個月始定。廣西、廣東的天地會亦紛紛舉事。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列強在華的掠奪最爲猛烈，國內動亂亦最爲嚴重，遍及於滇、黔、湘、鄂、贛、豫、皖、浙、閩、粵諸省，而以川、桂、直、魯爲甚。四川仍由余棟臣領導，於一八九八年再起，檄文中就社會、經濟、禮教、領土，指陳洋人的如下罪行：「海舶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之生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煙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姦淫我婦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佔據我都會，巧取我銀錢，小兒視如瓜果，國債重於邱山。焚我皇宮，滅我屬國。既佔上海，又割台灣，膠州立埠，國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橫，未有甚於今日者。」此番興師，專爲打教，不擾地方，「但誅洋人，非叛國家，」事成之後，日本軍費之賠償，昭信股票之派款，一概可免。余的黨衆約萬人，直接擾及地區爲川東十餘州縣，間接受到影響的三十有餘。鄂西的「江湖會」（哥老會別支），亦假余的旗號而起，宜昌、湘西爲之震動。安徽北部的白蓮教起於一八九九年，從者二萬餘。廣西天地會於一八九八年連陷數城，擾及廣東。某御史說他們爲孫文的黨羽，軍械火藥爲孫所接濟。又有人說，如一旦入湖南，順江而東，將成爲第二個洪秀全。清廷命兩廣總督確查孫文蹤跡，沿江沿海警戒，可見其張皇的一斑。其實廣西之亂與孫文並無關涉。

余棟臣的反教滅洋運動，性質與同時在華北萌動的義和拳甚爲相近。四川通商口岸僅有重慶一處，長江上游輪船行駛困難，川人所受洋人的侵害尙不爲大。四川又爲多山腹地，向外聯絡發展不易，余的勢力僅限於一隅。起於華北的義和拳則情勢大異，終於釀成震撼中外的空前事變。

三、山東、直隸的義和團

山東民風剛強，向有「山東好漢」之稱，具有反抗精神的白蓮教，遍於城鄉，許多武俠小說以山東為背景。加之人口稠密，生計維艱，嘯聚滋事，時所不免，六十年代，所在蜂起。煙台開埠，洋貨湧入，漕運改道，黃河潰溢，山東被禍獨甚。山東為天主教士最早活動的區域之一，全省新舊教徒約八萬人，以魯西運河兩岸為多。一八八八年，德國取得了山東的保教權，教士愈橫，強佔田產，包攬詞訟，庇護歹徒，擅自收稅，重利盤剝，囤積居奇，勒索訛詐，人民為其魚肉，官府受其挾制。

一八九五年，日軍攻峇威海衛，盤踞三年，登州、萊州一帶備受蹂躪。一八九七年，膠州灣及附近城池為德軍佔領。一八九八年，日軍甫去，英軍又來，山東南北兩港皆為外人所有。德國的勢力且深入堂奧，築路開礦。教士教民動輒傾陷某人譏謗洋教，或指某人為會匪，怵以兵威。一八九八年及一八九九年，魯南發生教案及德人被毆之事，德兵焚掠村莊，濫行屠殺，拘禁士紳，勒索賠款。一八九九年英國以肥城教案，亦索款佔地。德人復為修築鐵路而侵奪田畝、拆毀廬墓，人民抗阻，被德軍殺斃二十餘命。一九〇〇年初，衝突再起，官兵開槍轟擊，逮捕首要。德人聲言再度出兵，山東巡撫不得不與訂立築路開礦章程。英人以自勘威海衛界址，人民不服，亦曾發生相似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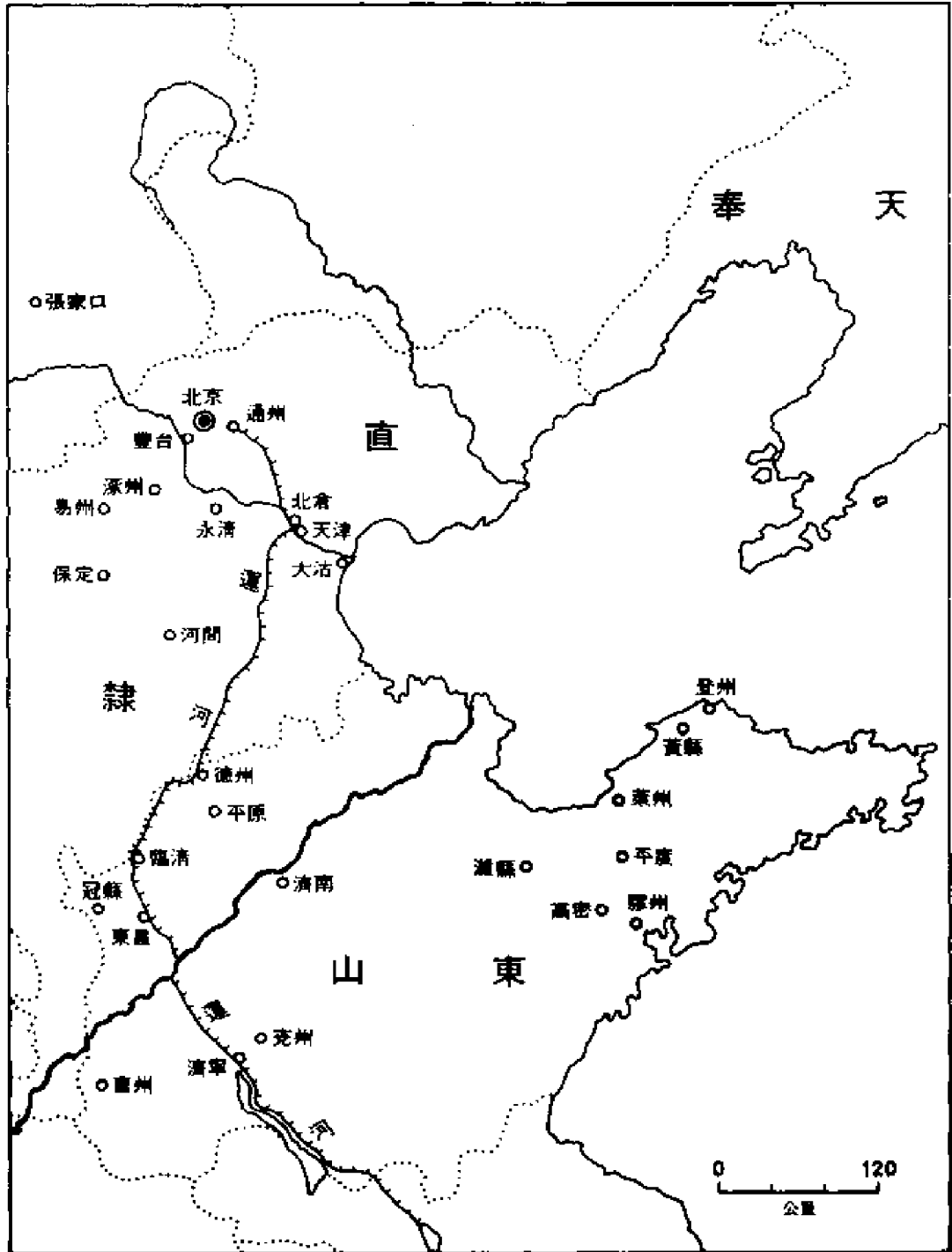
反教或反洋事件，如要形成一個運動，定然有其組織。四川余棟臣之所以能有相當聲勢，得力於鄉團。鄉團本為民間保衛身家而設，其在山東，鄉團與白蓮教原不兩立。教亂弭定，地方治安仍賴鄉團維持，白蓮教徒散歸鄉里，漸行滲入。此輩大都練習拳棒，鄉團亦多七技擊。鄉團由士紳領導，憎惡教士、教民，白蓮教徒的信仰與教士、教民不能相容，與鄉團立場漸歸一致。鄉團大抵忠於官府，白蓮教徒亦由反清而反洋，遂至合流。白蓮教原奉彌勒佛為主宰，後漸雜採道教成分，及其他迷信，支派不一，以「八卦教」的勢力為大，別有「天理」、「金丹」、「紅燈」教之分，成員以鄉農為主。八卦教所練之拳曰「義和

拳」，一名「梅花拳」，各有神壇，自稱祈禱後降神附體，口誦咒語，金刀不入，槍砲不傷。

義和拳初流行於運河兩岸，為教堂、教民麇集之地，與教民時起爭執。李秉衡任魯撫時（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目拳民為義民，傳習者日衆，有「大刀會」、「紅燈照」等名稱，揚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避刀劍，可避槍砲，……興大清，滅洋教，」大清代表中國。李秉衡因鉅野教案受到處分，然為官廉正，魯人為之不平。魯西北冠縣民教互鬥已久，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延及數十州縣，義和拳之名大著。魯東南的反教事件亦所在蜂起，沂州一處多至數十案。魯東的阻止德人築路，亦有義和拳參加。冠縣教案擴大，清廷下令嚴查，巡撫張汝梅掩耳盜鈴，將義和拳歸入鄉團，名曰義和團，無異認可其合法地位。

一八九九年春，暴戾無知的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拳衆多富神力，以禦洋人，必可大勝。拳衆氣焰愈張，到處毀教堂、殺教民，豎「傳神、助教、滅洋義和拳」紅黃旗。毓賢以為凡與教士、教民為難者，即係良民。九、十月間，魯北義和拳不服官軍彈壓，被袁世凱部擊散，知縣、營官因之撤職。總之，是年秋至次年春、夏之交，山東義和拳最為猖獗，魯北的中心為平原、德州，魯西北為臨清、東昌，魯東為登州、萊州、黃縣、平度、濰縣，魯西南為濟寧、兗州、曹州，魯南為沂州、莒州，魯中為濟南附近。

直隸南境毗鄰山東，一八九八年，義和拳已不時出沒。翌年十二月，袁世凱任山東巡撫，一面採取分化策略，勒令教民出教反教，釜底抽薪，以減少義和拳的滋擾對象，一面武力剿辦，擊潰義和拳的組織。勒令出教、反教，因煙台美領事的抗議，半途而止，武力剿辦則貫徹到底。訂立嚴禁拳匪章程，如有設廠教習，不分首從，該管州、縣照縱匪例參辦；吏役、莊長、首事、地保分別監禁、正法；設廠之家，家產充公，習邪拳者，殺無赦。官民遇匪即開槍痛擊，但求境內無事，不惜以鄰為壑。拳團在他的大力鎮壓之下，相率北走，沿途發布揭示，謂「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



圖八 山東與直隸

人共怒。……吾等俱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北京爲外國公使的駐紮地，中華君臣直接受他們的欺侮，天津爲距拳團最近的洋人集中地，中華黎民常遭他們的侮壓，因之拳團即以此兩處爲目標，期一舉殲滅，根絕禍源，此或爲拳團北去的更大原因。加以這時冀北亢旱，瘟疫流行，拳團乘機宣傳，將災害歸罪於教士、教民之不准敬天。駐天津的直隸總督裕祿庸懦畏怯，駐保定的按察使廷雍有意庇護。拳團遂由冀南而冀中，一路進向天津，會合靜海、獨流、永清一帶的拳民，一路進向保定，一九〇〇年五月，北及涿水、易州、涿州，以至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豐台、黃村，殺傷教士、洋人、教民，焚燒教堂及教民房舍，抗拒官兵。

四、慈禧對拳團的縱庇

義和團在山東之得以立足，以至日益擴張，是由於近五年來歷任巡撫的有意袒護，放縱鼓勵；最後成爲燎原之火，慈禧的態度爲極大關鍵。年餘以來，慈禧對外人之同情變法，援救新黨，干涉廢立，認爲是存心作對。一八九九年，各國暴橫之行，連續而至。除山東德軍外，有俄軍之圍困遼東半島的金州，殺傷皮子窩、旅順人民，英軍之驅逐九龍城中國官員，法軍之強踞廣州灣兩島，義大利之要索浙江三門灣，在在增加她的對外仇恨。中樞較有力量的人物，一派爲巧滑的榮祿，庸鄙的奕訢，但事依阿固寵，見風轉舵，一派爲悍愎的軍機大臣剛毅、啓秀，愚昧的大學士徐桐、端郡王載漪，只求一時快意，推波助瀾。

義和團的立場與慈禧的希望不盡相符，而仇洋反教的心理則一氣相通。慈禧初時所採的應付辦法，近乎兩面政策，取締之令甫頒，縱容之詔又下。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曾命對義和團加意彈壓防範；繼又謂山東保甲團練，紳民踴躍從事，應講求推行，以備緩急。十二月，申諭朝廷於民教一視同仁，地方官應隨時勸導，以杜爭端；繼又嚴飭各督撫認真辦理團練保甲。一八九九年四月，密諭毓賢對教案不可事事忍讓，亦不可稍涉孟浪；五六月間又屢命各省查保甲、練民團；十一月，命毓賢於義和團撫綏彈壓。以上指示，對義和團庇護之意，

實多於禁止。

各國公使對於山東情勢的發展，時在密切注視。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美使康格（E. W. Conger）接連要求切實保護該省外入，最後堅請將毓賢撤職，改派幹練人員繼任，並調天津附近訓練精良的駐軍前往協助。於是袁世凱代替了毓賢。慈禧雖畏懼外人，仍欲利用義和團，再三訓令袁世凱不可操切剿擊，「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前在魯北因剿拳而革職的袁部營官袁世敦（袁世凱之兄）之被逐回籍，即為對袁的警告。對於人民阻止德國築路事件，復諭以不可用兵，「致失國家團結民心本意。」

毓賢至京，極力揄揚義和團忠勇可恃，得有神助。慈禧召見時，賞以親書「福」字，旋授山西巡撫。載漪統帶的「虎神營」員弁，亦受到獎叙。「虎」、「神」與「羊」（洋）、「鬼」兩字相對，虎能食羊，神可制鬼。一九〇〇年二月，各公使因拳眾北進，要求速頒剿滅詔旨。慈禧無奈，十九日命直、魯督撫出示禁止「私立會名，聚眾滋事，」「務宜革除惡習，勉為良民。倘執迷不悟，即從嚴懲辦。」各使請將詔旨公布被拒，始知事態嚴重，除電本國請兵外，各國軍艦蜆集直隸灣示威，限總署於兩個月內剿除拳匪，否則將代為執行。四月十五日，雖將二月十九日詔旨公布，但十七及二十一日，又各有上諭，一係通令各省，謂「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果能安份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為難，……（應）隨時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遠相安。」一係專指直隸，謂該省「有外來義和拳會，到處煽惑，……應切實開導，……止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是在該督（裕祿）嚴飭地方官吏準情酌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遙制，」左袒之意，已十分顯明，五月一日且擬將拳民團練。朝廷如此，不僅裕祿任其橫行，慈禧的心腹，節制武衛軍的榮祿亦依違觀望。

第四節 孤注一擲

一、義和團控制下的京、津

一九〇〇年五月以前，慈禧尙未必有與洋人一決雌雄之心，至多不過是想利用民間聲勢，使洋人有所畏忌，不再動輒相欺。四月下旬，義和團出現北京城內，五月中旬，公然張貼揭帖。約十天後，蘆溝橋一帶的鐵路、火車、電線被毀，洋人四名被戕，四名受傷。各國公使調兵來京。慈禧有感事態嚴重，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命嚴擊首要，解散脅從，實力保護教堂、教民，斥滋擾的義和團爲「拳匪」，「倘敢對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六月三日，又有兩道幾乎相反的命令，一是要裕祿對拳衆諄切勸導，不可操切，帶兵員毋得輕傷民命，啓露邀功；一是要武衛軍統帥榮祿不得孟浪從事，率行剿辦，激成事端。五日及六日分派軍機大臣趙舒翹赴涿州宣撫，剛毅往保定曉諭，倘各軍藉端騷擾，即治以軍法。

此一重大轉變，原因有三：一爲所謂天潢貴胄，師保樞密，如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啓秀、大學士徐桐，皆抱與洋人不共戴天之志，「盈廷惘惘，如醉如癡，……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均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千真萬確，……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着他們，」使慈禧不得不信。畧明事理的榮祿、奕劻、王文韶雖知邪術萬不能成事，對外不可橫挑兵釁，但不敢強作主張，縱有諫阻，慈禧亦不之聽。二爲武衛軍爲直隸境內最大武力，右軍（袁世凱）已調往山東，左軍（宋慶、馬玉崑）駐山海關，前軍（聶士成）駐天津，衛戍北京的爲後軍、中軍。後軍統領董福祥出身甘肅土匪，桀驁不馴，所部幾盡爲義和團。中軍名義上由榮祿兼統，重要將領張俊與董本爲同夥。載漪的虎神營，個個是義和團，載瀾又作了步軍統領衙門的總兵官。慈禧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義和團）打通一氣，因此不敢輕言剿

辦，「確爲實事。三爲公使團不俟許可，即召軍入衛。六月初，洋兵百餘人，進入使館，六百人開入天津租界，海參崴俄軍四千向天津四出動。公使團要求增兵來京，覲見太后、皇帝，頑固派益振振有詞。六月九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紮北京城內，董揚言「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爲先鋒，我軍爲接應。」次日派載漪管理總署，自此都中人人謂拳團可以包打洋人。義和團大隊湧入北京，到處設立神壇，高懸「奉旨義和團練」、「義和神拳」或「助清滅洋，替天行道」旗幟，上至王、公、卿、相，下及娼、優、隸、卒，紛紛祈拜，如癡如狂。裕祿禮迎拳團首領，入天津督署，待以上賓，凡持義和團名帖者，無不延見，拳衆遇官弁坐轎騎馬，喝令下轎下馬，脫帽旁立，不從者則揮刀恐嚇，怒目相加，武衛軍望影走避。

董福祥軍入北京後，天津英、俄、德、法、美、日、義、奧八國海軍司令應公使團的要求，決再派軍二千餘人赴援。六月十日，由英國海軍提督西摩（E. H. Seymour）率領出發。十一日，董部殺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十二日起，肆行焚燒教堂、教民住宅，以及經售洋貨的店舖，火光燭天，通宵達旦，沿途喊殺，哭聲震天。十三日，教民被殺者達三百餘人，載瀾輩親督縱火，號稱繁榮之區的前門外，火勢尤猛，越城而入，延及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鄰近，財帛精華所聚的北城，亦焚掠一空，十室九逃，北京成了恐怖悲慘世界。天津情形相同，電報局、海關署同遭搶毀，居民扶老携幼，男女滿街奔避。洋兵不准進入租界，開槍射擊。十三日前後，因榮祿的婉勸，曾發布幾次剿捕解散義和團的上諭，慰問各國公使，然無絲毫效力。拳黨已控制北京，慈禧縱有心轉圜，已不可能。奕劻面告公使團，自認無力平亂。

二、慈禧宣戰

西摩率領的聯軍行抵天津西北十里的楊村，以鐵路毀拆，隨修隨行，勉強抵達天津中途的廊坊，義和團猛勇阻擊，不得續進。西摩初以爲二千聯軍足可擊潰清方的任何抵抗，至是方知不似他所想之易。慈禧聽說洋兵又來，調聶士成軍回防天津附近鐵路地方，命裕祿攔截

續到洋兵，大沽口加緊戒備。西摩被困之日，又有千餘俄軍到津，裕祿亦向大沽增防。大沽口外泊有外國兵船三十餘艘。六月十六日，各國司令限期交出大沽礮台。同日中午，慈禧舉行御前會議，到王大臣、六部、九卿一百餘人，反對與祖護義和團的兩派互相爭辯。反對派之一的總署大臣袁昶謂「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慈禧駁以「法術無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併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遂命另一總署大臣侍郎許景澄等出京勸阻洋兵，榮祿派兵警戒東交民巷，如使館人員願去天津，可俟鐵路修復以後再定，可見尚無意攻擊使館，只希望洋兵不來。十七日上午八時，聯軍攻奪大沽礮台。下午三時，召開緊急御前會議，慈禧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鬻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四條的最後一條，是勒令她歸政，她未便出口。有人謂這四條是出諸捏造，但亦非無因。丁韞良曾向公使團建議，為恢復中國秩序，第一，須令太后退隱，恢復皇帝的權力，由各國共同監督；第二，戊戌政變後的措施，一律作廢；第三，皇帝的改革計劃予以繼續，促其實現；第四，各國控制其勢力範圍內各省政府。均與慈禧宣布的大致相似。她之所以決定一戰，是由於洋人有迫她交還政權之說，寧肯亡國，亦不讓光緒恢復權力。她以為西摩的進軍，洋兵攻奪大沽，大舉增兵天津，皆是為了強制她退位。於是載漪輩衆口一詞地說：「非戰不可。」慈禧對大臣說：「今日之事，諸臣已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不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於予一人，謂皇太后送三百年天下。」她亦知道「事不可知，」並無戰勝把握。只「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這是她事後的自白。榮祿告訴劉坤一等亦謂：「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

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回。」

奉命查驗義和團的趙舒翹對慈禧極口誇說他們的神奇。剛毅回京後(六月十八日)，更向她張大其詞，並「裝出拳匪模樣，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餘外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處兒敦迫着我(慈禧)，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在十九日的會議中，慈禧表示她的最後決心，限各國公使於二十四小時內出京，命裕祿召集義和團，幫助官軍，抵禦洋兵，此於昨日聯軍受挫當有關係。二十日黎明，召見軍機大臣，宣布開戰。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五日)下宣戰詔，痛斥三十年來，洋人的種種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貢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公然令我退出大沽礮台。……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朕今泣涕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二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兇獍，張國之威。」

宣戰書中所說多係事實，文字激昂悲壯，頗可同情。令人痛惜的為慈禧一任感情衝動，罔顧時勢，不惜孤注一擲，公然對所有的外國宣戰，誠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舉。

三、戰爭期間的地方與中央

北京城內是主要戰場。五月以後，外人紛集位於前門內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六月中旬，義和團與洋兵屢次衝突，德國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指揮洋兵攻擊。二十日上午，克林德被戕，下午四時董福祥

軍與義和團數千人進攻。使館區的面積約四平方哩，內有十一國公使，男女四百七十餘人，防衛洋兵四百五十人，教民二千餘人，擔任修築工事。董福祥以為五天內即可將其夷為平地。六月二十四日，附近的翰林院、海關總稅務司署被焚。七月十三日，攻勢尤猛，至二十四日，洋兵死傷百人。由於榮祿的暗中庇護，慈禧的心情變幻無常，時而猛攻，時而停止，時而談判，時而餽贈食物。天主教教士、教民四千餘人集中的城西北堂（西什庫），防守的洋兵僅四十人，亦未能攻入。

另一戰場為天津。大沽砲台失陷的同日（六月十七），清軍及義和團圍攻天津租界，六月十九日，西摩部在廊坊戰敗東退，遭聶士成軍截擊，得俄軍援救，二十六日，返回天津，傷亡近十分之二。大沽方面的聯軍，先解天津租界之圍，繼佔機器局，攻擊天津城垣，武衛軍拒戰九日，聶士成壯烈身殉，馬玉崑撲攻租界亦敗。天津先遭義和團的焚劫，再經近月的劇戰，殘破不堪，七月十四日失陷。聯軍加倍兇殘，死屍累累堆積，房屋十毀八九。此後各國劃分佔領地界，「日、美兵最和平，英兵次之，惟德、法、俄三國兵鈔民無虛日，婦女被污者無數。」七月三十日，設置「暫行管理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生殺予奪，任情而為。

宣戰前北京、天津已成拳團的世界，宣戰後直隸全境無處不在燒殺。洋人、教士大都逃避，教民多據寨以守，一被攻破，屠戮無遺。直隸之外，殺洋滅教暴動以奉天、山西、河南、湖南、浙江為著。六、七月之交，瀋陽、遼陽教堂、鐵路被毀，教士二十人被殺，延及其他州縣與吉林長春。山西拳團為新任巡撫毓賢一手製造，北京宣戰後，首焚外國醫院教堂。毓賢佯稱為便於保護，將教士男女老幼誘集太原，七月初，悉予處死。各州縣教士被害者一百七十八人。河南南陽教堂被圍，全省教堂大半被毀。湖南衡州有教士三人被殺。浙江衢州有十一人被殺。他如陝西、甘肅、雲南、四川、湖北均有類似之事。統計全國喪命的洋人教士約二百五十人，以英國為多，次為美、法、比、荷各國。教民家破人亡者當以千萬計。

慈禧宣戰之日，通諭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

共挽危局。」重要督撫多為漢人，拒不受命，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拳亂之初，李無何表示，劉首請速剿，張立即贊同。英國恐俄國乘機漁利，尤恐長江流域發生事端，不僅予俄國以干涉口實，更損害英國的利益，希望中國秩序及早恢復，不使事態擴大；劉、張的態度與英國的希望符合。上海士紳及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亦恐各國兵船分駛沿海沿江口岸保僑，一有衝突，大局瓦解，謀有所補救。六月十四日，上海英領事建議倫敦協助劉、張，維持長江地區治安，立獲批准，美、日同表支持。盛宣懷等所擬原則，為由劉、張與各國立互保之約，外國兵船不入長江，內地外僑由劉、張負責保護，上海租界歸外人保護。宣戰詔下，盛連電劉、張及李鴻章，請與各國訂明「剿拳匪，保教民，護商業，各不相犯，」「欲全東南以保宗社，須以權宜應之。」上諭有「各省撫聯絡一氣，保守疆土」之語，正可以之為據。劉、張初尚猶豫，恐朝廷不諒，經張壽、沈曾植分別解說，始毅然以行。請盛幫同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妥議辦法，並聯銜入奏，以示非背叛朝廷。六月二十六日，余聯沅與領事將《保護南省商教章程》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章程》草案商定。不久各領事得知有命各省誅殺洋人的上諭及德國公使遇害，發生異議。七月三日，劉、張聲明諸事照所議辦理。英國以劉、張既照規定履行，長江各省晏然無事，復以章程草案中對外國兵船停泊、水手行動有所限制，不願定為條約。德、法持同一態度，甚至唯恐天下不亂，所以互保協定，終未簽字。

南省初指劉、張治轄的五省，章程草案議妥後，浙江、福建相繼參加。李鴻章先已聲明自保兩廣，斷不遵奉所謂宣戰詔。山東巡撫袁世凱為剿辦拳匪最力之人，自與劉、張一致。四川、陝西、河南督撫亦均同意劉、張的主張，互保的區域實際上包有十三省。當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已經對外宣戰，地方當局仍獨自行動，與敵人成立「兩不相擾」的中立協議，等於獨立，無怪有人斥劉、張為「海外叛臣」。然亦因此使亂事未至擴大，黃河以南得免兵燹，否則不惟全國糜爛，野心國家勢必乘機進兵華中、華南，中國的瓜分將真正實現。

慈禧在矛盾的心情下，發動戰爭，滿望一舉而肅清在華洋人。不料以數萬之衆，區區使館竟久攻不下。尤其使她苦痛的爲疆吏的抗命，無如之何，惟有降志低心，爭取他們的諒解。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一再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解釋，謂「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剿撫兩難之際，而各國兵船已在津索大沽礮台。」「爾督撫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無如此次義和團，……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希望李籌兵籌餉，勿再觀望。二十九日電命出使大臣將委曲情形向各國聲明，照舊保護使館，相機懲辦亂民，外債按期照付。七月三日分致俄、英、日、德、美、法國書，盼中外仍歸於好。但同一天，復命各督撫同力同心，「務將和之一字，先行解除於胸中。」六日獎勵義和團，賞內帑十萬兩。七月中旬，以李、劉、張等疊請保護公使，天津繼之失陷，命榮祿、奕劻商請公使移居總署。十九日，又謂保護公使，非爲和議之地，命各督撫仍力籌戰守。所有這些命令，即使各督撫唯命是聽，亦無所適從。七月杪，派主戰的李秉衡節制前敵各軍，殺主和的總署大臣許景澄、袁昶。¹慈禧態度真不可捉摸。事後她說，拳匪「攻打使館，攻打教黨，……殺的搶的，我眼看不像個事，心下早已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這時太監們連着護衛的兵士都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其勢洶洶，呼呼跳跳，如像狂醉的一般，全改了平日的樣子。……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衆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了他們，使他們對着我還有幾分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又云：「我本來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太甚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拳黨），始終總沒叫他們十分儘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着餘地。我若由他們儘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攻不下來的道理？」雖爲自解，要爲實情。

¹ 八月十一日，殺總署大臣徐用儀、聯元及內閣學士立山。

四、北京二次失守與東北初度淪陷

聯軍佔領天津之後，所以未即進兵北京，一以有鑒於天津戰役的劇烈，華軍的抵抗相當堅強，目前兵力不足，不可輕舉，致蹈西摩的覆轍。二以南方各省既然中立，如進攻北京，或將激起他們的反感，須先撤退內地的僑民，以防萬一。三以列強互相猜忌，俄、德、英均欲爭取領導地位，俄正以全力侵奪東北，英忙於南非洲戰爭，一時皆不能派出大軍。德軍尚在東來途中，美、法在東亞的駐軍無多，義、奧更不足道。可以而又願供給大軍的惟有日本，西方國家初示冷淡，至不得已時，始得英國的贊同，與他國的默許。

八月四日，聯軍出動，左翼日軍八千，英軍三千，美軍二千，右翼俄軍四千，法軍八百，奧、義軍各數千人，總計約一萬八千人。德軍以未能居重要地位，暫不參加。五日，聯軍佔北倉，敗末慶、馬玉崑軍，此為一次大戰。六日，佔楊村，直隸總督裕祿自盡。九日及十日，佔河西務、馬頭，武衛軍幫辦李秉衡亦自盡。十四日，聯軍進入北京，使館解圍，計被圍五十五天。

一八六〇年洋兵第一次佔領北京，約十八天，為害尚不甚鉅。此次大為不同，為時長達十三個月，採取報復性的、有系統的搶殺。八月二十三日，德軍開始到達，月餘後德軍司令瓦德西（Von Waldersee）繼至，入據紫禁城，行為倍加殘暴。德軍約二萬人，日軍增至二萬二千人，俄、英軍各二萬人，法軍一萬五千人，美軍七千五百人，義軍二千人，比軍六百人，奧軍一百四十人，合計十萬有餘。義和團及清軍早已鳥獸散，商民已成為洋兵荼毒的對象，遇難者不可數計。「街上屍體枕籍，旗人多舉火自焚，或闔室雉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存不過十室。」這是中國人的記述。「巍然之櫓樓，……留者僅一二，」街市毀失十分之二三，婦女任人凌辱。聯軍將校率軍士，公然大肆搶奪。金銀珠玉自不必言，此外書畫、骨董、衣服，以及馬匹、車輛等值錢之物，無論兵卒、平民所獲之數均屬不少。……城中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屍，鳳冠霞帔、補服、紅裙之女屍，觸目皆是。」這是日本

人的描寫。西人所記畧同，頤和園的寶物，聯軍運往天津，累月不絕。

洋兵將北京分區佔管，俄軍界內，存者惟狗而已；法、義軍界內「觸目蕭條，幾無人迹；」德軍界內，慘況倍之，利瑪竇以來的天文儀器亦搬運一空；英軍界內，「雖有人煙，亦甚寥寥；」日軍界內雖「熙熙攘攘，往來如市，」但戶部近三百萬兩的存銀，則全為所有；美軍界內「安堵如故，市肆全開，人心靜謐。」這次事變，外人遇害者約三百，中國人之死於洋兵的恐千萬計。

慈禧於聯軍進城的次晨，携光緒狼狽向西北奔逃，抵懷來縣後，驚魂畧定。她對知縣吳永哭訴禍亂經過，吳永留下了一部生動的記載。¹又說逃出京後，「連日歷行數百里，……不得飲食，既冷且餓。……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櫬相與貼背而坐，仰望達旦。」光緒蓬頭垢面，衣著不整，憔悴已極。在懷來停三日，續向西北逃亡，經宣化、大同，九月十日抵太原。沿途勒索供應。傳洋兵將攻山西，復自太原南去，十月二十六日到西安，鋪張益甚。其後南方各省接濟漸至，又恢復了她的豪華生活。

拳亂甫起，美國恐歐洲國家乘機瓜分中國，再三警告清廷。七月三日，國務卿海約翰照會列強，請仍承認能保護外人的地方當局為中國人民的代表，與之保持和好。各國應先拯救北京的外國官民，再使中國獲得永久安寧，保全中國的領土行政，保證各國的條約與公法權利，維護各國在中國的平等公正原則。這是門戶開放政策的補充。俄國決逞其大慾，軍事上單獨行動，外交上利用李鴻章。德皇威廉二世更是野心勃勃，克林德的被害，愈使他理直氣壯，鼓勵東來德軍盡力殺戮。為提高德軍的聲望，授瓦德西以聯軍統帥名義。英國為遏制俄國的擴張，一面聯絡美、日，一面與德國成立協定，互允開放勢力範圍，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實則同床異夢。

聯軍不時向天津、北京附近焚掠。瓦德西及二萬德軍，為一顯身手，十月以後，一路會同英、法、義軍進向西南，佔領保定，殺護理直隸

¹ 《庚子西狩叢談》。

總督廷雍，勒索贖銀十萬兩。冀南、冀中備受蹂躪。一路進向西北，佔領張家口。一路進向東南，至山東邊境。復與法軍屢攻山西，威脅西安。自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一年四月，聯軍共出動四十六次，三十五次為德軍單獨行動。教民結隊成羣，四處打家劫舍，聲言「奉命復仇」，所奉係外國教士之命。直隸官軍亦助洋兵教民攻打。

俄國久視東北為囊中物，年來積極築路築港，擅自駐兵，侵佔民產，凌虐居民。拳亂既起，俄軍十七萬餘分路進攻。七月十五日，北路屠黑龍江海蘭泡商民六千，瓊瑋、墨爾根、呼倫貝爾、呼蘭相繼失陷，黑龍江將軍壽山自盡。八月三十日入齊齊哈爾省城。西路經呼倫貝爾，越興安嶺，繼之而至。七月三十日，東路一支佔依蘭，一支陷琿春，會師哈爾濱，繼佔寧古塔，九月二十一日入吉林省城。八月四日，南路佔營口，繼佔海城、遼陽，十月二日入瀋陽省城。七十天內，東三省全部為俄軍所據，東北第一次淪陷。俄兵毒性殘忍，所至搶掠、焚殺、姦淫，齊齊哈爾為之一空，吉林省城百數十萬存款及軍火，盡歸所有，機器局拆毀，營兵繳械。瀋陽的營壘、機器、槍彈，一概被奪。瓊瑋城被毀，依蘭、琿春等城居民被屠，營口房屋大半被焚，沿南滿鐵路的鐵嶺、海城、蓋平，遍地屍橫，婦女被擄者不可數計。

五、自立軍與革命軍

南方督撫的中立，只是暫時不服從慈禧的命令，仍與保持君臣的名分。另有兩派與慈禧不並存的勢力，一派為謀恢復光緒的權位的保皇會，一派為根本否認滿清的統治的革命黨。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留倫敦重蒞日本。孫以康有為、梁啟超亦志在救國，過去曾與談過合作，至是與梁訂交。康昂然自大，視興中會為會匪，不屑同流，認為光緒必有復辟之日，計劃起兵勤王。梁少成見，頗為革命之說所動。湘人唐才常為譚嗣同的至好，矢言與慈禧不共戴天，此時亦來日本，出入於孫、梁之門。

慈禧陰謀廢立之時，孫、康、梁、唐均決定舉事，唐返上海，康去新加坡，梁赴檀香山。梁以孫中山在檀香山有他的影響力，行前對孫

表示，仍望一致行動。孫雖知雙方合作不易，但終欲引梁入於革命之途，即爲之介紹。梁抵檀香山後，宣稱保皇與革命，名異實同，宗旨無別，不過借保皇以行革命。於是檀香山大部分興中會員轉投保皇會。

唐才常一面聯絡上海知識分子，一面聯絡長江會黨，以湘、鄂的哥老會爲主。康、梁所重視的爲廣東，梁主先暗殺李鴻章，消除阻力，將來縱不能於北部（長江）得手，尚可於南部有所收獲。興中會亦準備全力謀粵，與保皇會的願望衝突。一九〇〇年三月，梁告康：「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圖，廣東一落其手，我輩更何處發軔乎？」致書孫中山，謂用勤王名號，事半功倍。「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勸孫勿輕易舉動，怕的是他捷足先得。對於康，則勸他親臨前敵，破釜沉舟，成敗決於此舉，又言舉大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爲功，保皇會的作風每與「濶達大度，開誠布公」八字相反，多抱「同門不同門之圈限。」梁本人又何嘗不然。

唐才常先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拳亂發生，認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但未獲保皇會的全力支持，或係因爲他非「同門」。唐不能再事等待，爲便於號召，改「正氣會」爲「自立會」，似係影射南省的自保，以期減少阻力。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在上海召開「中國議會」，宣布不承認清政府，聯外交、平內亂，保全中國自主，推廣文明進化。舉容闈、嚴復爲正副會長。實際擔任聯絡會黨的爲林圭、秦鼎彝、沈藎等，名曰「自立軍」，定期分於湘、鄂、皖發難。有主起義後宣布民主，有主仍擁光緒，有主擁張之洞獨立。唐會否與張接洽，不得而知，不過五六月間，西報已有革命黨人將在南方四省舉兵的消息，不論所指爲孫或唐，張當有所聞。張與英國有自保之約，英國不欲長江一帶發生變故，哥老會又常有打教的行爲、滅洋的口號。唐在漢口的機關設在英租界，張得英領事通知，謂南方哥老會、維新黨，與北方團匪相彷彿，準備爲亂。八月九日，自立軍的一路在安徽大通舉事不成，二十一日，唐等被張逮捕處死，湘、鄂各地的自立軍俱歸失敗，先後遇害者二三百人。果如梁所說，「若一擊不中，則再舉難矣，」從此保皇會無類此之事。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興中會鄭士良、畢永年邀約粵、閩、湘、鄂的會黨首領會於香港，別立「興漢會」，孫中山為總會長。唐才常發動之前，約孫同舉，應為誠意。在廣東活動的興中會以鄭士良、史堅如為首。台灣日本總督允於革命軍進抵廈門時濟以軍火，或係企圖相機佔領福建。日人宮崎寅藏游說李鴻章與孫共謀獨立，未得要領。香港議員何啟亦請香港總督卜力（H. A. Blake）向李勸告，卜力雖頗有意，但倫敦不以為然，李更無脫離清廷之意。七月，孫至香港，擬入內地領導，以不得上岸，轉往台灣策應。十月七日，鄭士良於惠州附近發動，連破清軍於沿海一帶，眾至二萬人，進向閩南。不意日本新內閣總理伊藤博文決追隨各國，維持清廷，不准台灣總督援助革命軍。鄭士良轉戰半月，被迫解散。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不遂，慷慨就義，年二十一歲。自立軍與革命軍的失敗，均與外國態度有關。

六、辛丑條約

五六月間，盛宣懷、劉坤一先後請李鴻章領銜奏請剿辦拳匪，俄使勸總署召李北上，於是有六月十五日命李迅速來京的上諭。李主先定內亂，如有眉目，即行啓程。宣戰後各方對李繼續敦促，他以「無能為力」辭，實際上已與俄國暗洽，所採的是等待態度，一方面希望俄國予以支援，一方面迫使慈禧授以實權。他之不參加南省中立運動，可能是欲避親英之嫌，以保持慈禧與俄國對他的信任。七月一日電覆劉坤一，謂榮祿、奕劻尚不能挽回大局，他又有何能？「各國兵一二日抵城下，想有一二惡戰，乃見分曉，」「大有弦外之音。三日慈禧請求各國調解，同時一再催李北上。八日，調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官復原職。慈禧對他既然倚重，遂於十七日離粵，二十一日到上海，又停留不前，或係觀望聯軍行動。八月八日，慈禧因聯軍已越過楊村，北京不保為旦夕間事，授李為和議全權大臣。及北京失守，劉坤一兩電懇他北行，說是「大清存亡，惟公是賴，」「中堂（李）不到京不能會議，事局非惟難定，且慮各國改易初心。……惟公念四朝恩遇之隆，兩宮倚畀之重，同僚推許之切，天下仰望之殷，迅速北發。」八月二十

日，慈禧下罪己詔，二十四日，准李便宜行事。九月八日的上諭，期望尤切，獎勉有加，謂此次禍變，「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繫之，抑且存亡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不只是向李哀求，而且完全認過。八九月間，俄國表示自北京撤軍，希望慈禧歸來，和議速開。已到北京的另一全權奕劻，英、日相待頗好。九月十四日，李離上海，十九日抵天津，十月十一日抵北京，由俄兵衛護。

聯軍意見分歧，英、美、日爲一陣線，俄、法爲一陣線，德國自豎一幟，時左時右。談判之前，先須獲得內部協調，特別是對清廷的根本態度。俄國支持李鴻章與慈禧，英、德初有不承認李的資格之意，亦即不承認慈禧的政權。德國主先將重要禍首交出，再行開議。所謂重要禍首，第一個應爲慈禧。此一建議，俄、法固然反對，英、美、日亦不贊成，怕的是清的統治瓦解，中國陷入更大的混亂。列強的矛盾衝突愈爲擴大。再者經過這次事變，證明中國的民族意識極爲強烈，以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衆，萬一中國改革真正成功，出現一強有力的政府，對列強愈爲不利。最安全的辦法，爲照舊保存無能而馴順的清廷，由列強監督控制，方可享受既得及將得的權益。任職中國四十年的赫德，力勸各國採寬大政策，勿作瓜分及改朝換代之想，在現政權之下，徐圖改進中外關係。本此原則，列強遂仍以慈禧的政府爲交涉對象。此項決定，與南方督撫的態度亦不無關係。拳亂期間，新黨人物如張謇、何嗣焜、陳三立等，一面說劉坤一中立，一面勸他迎光緒南下，排去慈禧。劉謀之於張之洞，張不以爲然。一因張曾同情變法，幾遭不測，恐畫虎不成，反被其禍。二因光緒無南下可能，如輕有舉動，勢必治絲愈亂。即令光緒得重掌政柄，彈冠相慶的將爲康有爲輩，亦非李鴻章、袁世凱所願。劉、張曾請慈禧勿去西安，早返北京。慈禧明白表示「如各國真心與中國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不强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所謂「自主之權」，與「必不能行之事」，即指歸政而言。劉、張既擁護慈禧，各國不得不審慎考慮。

十月四日，法國向各國提出和談建議要點，包括嚴懲禍首、禁運

軍火、賠款、使館駐兵、拆毀大沽砲台、保持北京至海口交通。經各國商討補充後，製成一個大綱，十二月二十二日送交李鴻章、奕劻，聲言無可更改。二十七日，慈禧照允。關於禍首問題，李依俄國的勸告，先已奏請自辦，以示謀和誠意。慈禧所怕的是自己在禍首之內，焦慮惛憊，自言「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日一見京電，喜少驚多，實令人膽怯。」如採取主動，或可獲各國諒宥，因先後將載漪等治罪。各國堅持，必須正法，若再袒護，禍將及身。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命將載漪、載瀾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趙舒翹、毓賢、啓秀等處死，已死的徐桐、剛毅、李秉衡追奪原官，撤銷卹典，董福祥革職，有干繫的地方官被處死者一百餘人，湘、鄂、豫、浙、桂巡撫及盛京、黑龍江副統革職。

賠款為各國所重視的實際問題。德國要求七萬萬五千萬兩，俄、法以為多多益善。英、美、日認為須顧及中國的負荷力量，應酌予從寬。赫德建議以三萬萬兩為度，結果定為四萬萬五千萬兩（約六千七百萬英鎊），相當於中國五年的收入，百分之八十六歸於各國政府，餘為對民間補償。各國所得，超過了它們的兵費實支及公私損失。原來主張減低賠款的美國，所得即多於實支費的一倍。至於賠款分配，俄國佔百分之二十九，德國百分之二十，法國百分之十六弱，英國百分之十一強，日本百分之八弱，美國百分之七強，義大利為百分之六弱，比國百分之二弱，餘歸奧、荷、西、葡。對於賠款的償付，俄、法主借外債，德國主提高關稅，美、日為了對華商務利害，均不同意，英國反對尤力，最後決定於三十九年內分還。年利四釐，合計九萬萬八千餘萬兩。加上各省教案賠款，及折合金價的損失，總數在十萬萬兩以上。擔保的財源，一為進口稅切實的值百抽五，及免稅的物品照徵後，償付舊有外債的餘款；二為常關¹所徵之數，在通商口岸的常關，歸海關管理（內地常關所入，解上海道轉交）；三為鹽稅全部。中國所有重要收入，除田賦外，盡用於償還賠款，每年實付之數為二千五百餘萬兩。

¹ 常關為中國在水陸要道及貨物集散地設立的稅關。

上列財源不僅不敷，政府的他項開支亦無着落，仍須由各省攤派，每年爲一千八百八十萬兩，主要出於田賦、附捐及鹽捐、貨物稅、營業稅。

賠款爲對人民的直接壓榨，駐兵保護使館區及北京至海口交通爲對政府的監視。使館區域較以往擴展數倍，計一千二百畝，界內歸使館管理，華人不准居留。駐兵數目約二千餘，日本四百，俄三百五十，德三百，英、法、奧各二百五十，義二百，美一百，築壘架砲，警衛森嚴，形同京師內的敵國。北京至海口駐兵的地點，爲沿鐵路線的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二處。

其他事項，一爲派遣親王及專使分赴德、日謝罪，並於德使被害及污損各國人民之墳墓處立碑，停止戕害凌虐外人城鎮考試五年，永禁仇外，如再有此類行事，地方官立即革職懲治。目的是使中國官民在心理上徹底屈服。二爲禁止軍火進口，兩年內不准製造軍火材料運入。爲的是削弱中國的抵抗力量。三爲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並改公使覲見禮節。爲的是表示外交的重要。四爲修改商約，疏濬北（白）河、黃浦江水道，前者係爲增加關稅收入，償付賠款，後者係爲便利外國輪船出入。

十二條議和大綱，十二月二十七日經慈禧照准。此後所談的爲細節及實施事項。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訢與德、俄、英、法、美、日、義、奧、西、比、荷十一國代表簽字。十七日，聯軍退出北京，二十二日退出直隸，惟天津除外，直至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八日，清廷允聯軍照舊駐紮，自由操練演習，華兵不進入天津附近二十里內，直隸總督衛兵不得過三百名，砲台不得重修，城垣不得重建（已由聯軍拆除），大沽口、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不得設防等項條件之後，始行交還。其中操練演習一款，損害最大。

慈禧逃亡到西安後，揮霍納賄如故，榮祿的貪黷與一般官員的酒食徵逐，聲色歌舞如故。聯軍退出北京後，一九〇一年十月六日，慈禧離西安回鑾。出亡時，一身之外無長物，此時裝載箱籠的車輛多至

三千，所過修築御道，繕治行宮，「一驛之費，幾五萬金。」中途得知十一月七日李鴻章病卒，至為震愕。李以七十九歲高齡，身當此幕前未曾有的危局，憂思焦慮，肝病增劇，外人屢屢論及他的後任人選。山東巡撫袁世凱，年來頗獲外人好評，又握有實權，成了各方矚目的人物。李力疾簽訂和約後，自知不起，保袁自代。至是繼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離西安前，德國已提出大阿哥問題，抵開封後，即將大阿哥名號撤銷。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電告「各國均無困我詞氣，且互有意見，不能協以謀我。」慈禧大為放心。十四日，離開封，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自正定乘火車北去，過保定畧停，七日，還京。為示好外人，命榮祿致書各國公使，代為致謝保護宮掖，並由光緒正式在乾清宮接見，慈禧亦接見公使夫人。

天津、北京一帶為義和團的集中地，與洋兵有過兩個月的戰鬥。聯軍佔領之後，情況大變，天津民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舖戶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佔管區居民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忝顏媚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繙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歛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但是不少百姓仍不斷抵抗。炸毀洋兵佔領的火藥庫，襲擊鐵路。仇外當然不可，媚外尤為可痛，對於國家民族的傷害，更甚於有形的賠款、駐軍。從另一方面來說，義和團的行為雖然愚昧，動機則不可一概抹煞。有識的外人亦承認「中國羣衆含有無限蓬勃生氣，」「中國地方廣闊，民氣堅勁，殊非印度、南洋可比。」任何國家，均無法統治此佔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大夢將醒，已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覺悟。赫德謂今後各國對待中國，應尊重而不可卑視，協和而不可強制，同情而不可冷淡。中國終將成為強國。處理中國問題必須慎重，使中國將來感激而不致報復。但是一般外人的觀念不改，指此次事變是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恨歐洲文明所引起。今後列強採取的政策，仍是利用清廷為傀儡，滿足各自的慾望，列強之間復爾虞我詐，變本加厲的侵畧爭奪。

第十章 滿清傾覆前夕的內外情勢

(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

第一節 列強角逐的激化

一、日俄戰爭與日本的侵奪東北

俄軍之侵入東北，係由拳亂而起，應屬於八國聯軍行動的一部分，理當由各國共與中國處理。但是俄國別有居心，謀單獨解決。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九日，旅順俄海軍提督阿萊克息夫(Alexieff)挾制毫無權力、無異俘虜的盛京將軍增祺私訂一暫時協定，置奉天於俄軍控制之下。清政府命駐俄公使楊儒交涉取消，願另立正約。代表俄國的威特所提條款反更為苛刻，不僅剝奪了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且涉及華北、蒙古、新疆。消息傳出，英、日大為震動，警告李鴻章、奕劻，分說劉坤一、張之洞不可接受，一切應與各國公商，否則他國必將效尤。俄對李聲言如不立約，即不再相助，將永據東北。李望俄國助成北京公約談判，主將俄約早定，劉、張極力反對。慈禧既畏俄國，又不敢開罪其他各國，一面懇請俄國將條約放寬，一面允許開放東北，請英、日、美向俄說項。俄對李與楊儒一再威脅。英、日勸李斷然拒絕，鼓勵劉、張阻止。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威特將原提約稿畧事修改，限楊儒於十五天內畫押。李與劉、張的爭論，俄與英、日的外交戰，均達到高潮。俄使雷薩爾(P. M. Lessar)對李說：「願與俄好，則畫押，若願決裂，聽便。」英、日領事對劉、張說：「俄約萬不可允，當全力相助。」李請畫押「以保危局，」劉、張謂不畫押不過緩交東北，一畫押即成瓜分之局。慈禧再求俄國展限改商，謂暫時不敢遽定。

威特對楊儒百般誘迫無效，續向李鴻章恫嚇，責「中國信英、日讒言，不信俄廷忠告，……從此應絕交，任俄所為。……以後再議公約，祇

可兜剛。]李惶恐萬狀，電告西安，說是「禍患即在目前，乞速定大計。」劉坤一則說「英、日力助，不可鬆勁。」其實俄國因英、日、美抗議，已足色厲內荏，四月初，宣布東北問題，俟中國事定再提。八月，各國北京公約即將簽訂，李續請俄撤兵，威特表示如將東北建築鐵路、開採礦產及工商業優先權讓與道勝銀行，即可撤兵。表面上由道勝銀行出面，將經濟要求與撤兵問題分開，實際上是朝三暮四。十月，李願先訂撤兵協定，惟拒絕經濟要求。雷薩爾「笑罵不止，謂聽他國讒言，橫生意見，」「此時再不定約，俄決不續商，再佔二十年亦不着急。」威特曾許李以重賄，如不簽約，即不付款。¹ 在李去世的一天，雷薩爾尚來逼迫。李卒，奕劻及新任全權大臣王文韶續與談判。

三國干涉還遼以來，俄國在東亞的勢焰不可一世，日本以力不能抗，欲與妥協。俄為先行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經營東北，因於一八九六及一八九八年與日本兩次成立協定，對朝鮮暫作讓步，惟仍不真正放手。日本則希望朝鮮成為自己的保護國。英國以對俄妥協失敗，謀與他國聯合。及俄軍佔有東北，英、德一度成立協定，以保中國完整，事後德謂該協定不適用於東北。日本恐東北倘為俄有，朝鮮勢必為所囊括，願與英採一致行動。英早認為在東方有實力助其對俄的、而且可望助其對俄的，惟有日本。英如不聯日，萬一日被迫向俄屈服，或與俄一戰而敗，對英俱屬不利。一九〇一年夏秋之間，中俄交涉緊急，英、日聯合的具體條件大致商就。翌年（一九〇二）一月三十日，同盟條約簽字，強調係為了維持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共保英、日在中、韓的利益，如英、日兩國中有一國因此而與他國開戰，另一國應守中立，如另有他國協助敵人，英、日即共同對付。有了這個條約，日本可不畏懼俄國，國際地位提高，儼然成了東亞的領導國家，對中、韓問題有權過問。美國認為英日同盟符合門戶開放主義，德國認為可使俄在東亞受到牽制。俄國當然震驚，不肯迫使他退出東北。至於中國，盟約雖有侵犯主權之嫌，由於俄國的暴戾，內心不無

¹ 此項賄賂仍為中俄密約談判時所允而未付者。

欣喜之感。

英日同盟既成，俄國以國際情勢不利，不得不重行考慮對華態度。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中俄交收東北條約」簽字，俄允恢復中國在東北的權力，如不再有變亂，他國亦無牽制，俄軍將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離。其實這是緩兵之計，不僅無履行之意，且準備兼有朝鮮。德國爲了歐洲問題，是年八月，威廉二世與尼古拉二世會晤，縱論所謂黃禍，及共同對付英、日問題，力勸俄國東進，願爲鞏固後方，對於俄國是有力的鼓勵。第一期撤兵之時，僅將奉天遼河以西俄軍退集南滿鐵路附近。第二期根本不理，反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對中國提出新的要求。日、英勸中國勿允，同時向俄抗議。美國爲使東北開放，繼之而起。美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惡俄人，寧願中、韓依附日本，決不許俄人得逞。威廉二世再勸沙皇，不可後退。七月，日本桂太郎組閣，逕行與俄談判，謂朝鮮爲日本防護線的緊要前哨，俄國須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殊利益，但不得妨礙日本及他國的權利，並不得干涉朝鮮之事。俄國態度強硬，設置遠東總督府，主張緩進的財政大臣威特去職。威廉二世致書尼古拉二世，謂朝鮮、滿洲應均屬於俄國。日、俄交涉四個月，一無所成。

日本久擬與俄一決勝負。英日同盟成立，自認已有把握。日、俄交涉破裂在即之時，羅斯福總統對俄猛烈抨擊，並知照德、法，倘再助俄對日，美即以一切方法助日。日本遂決定於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以前，對俄一擊。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實行宣戰。中俄同盟本爲對日，但七年來中國的怨憤所集，已非日本而爲俄國。雖爲時勢所限，不能公開有所表示，且明知日本非爲中國而戰，而同情則在日本。二月十二日，宣布劃遼河以東爲戰區，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日、俄之戰既不在日本，亦不在俄國，而係以中國領土供廝殺。

日本的戰畧仍爲戰而後宣。二月八日，日海軍突襲旅順，翌日又捷於仁川，然後控制朝鮮，封鎖旅順港口。五月，日陸軍一支西渡鴨綠江，一支登陸遼東半島。至十月，兩敗俄軍於遼陽及其以北的沙河。一九〇五年一月，攻下旅順，三月，佔領瀋陽，陸戰結束。五月，日

海軍名將東鄉平八郎殲滅歐洲東來的俄國艦隊於對馬海峽，結束了全部戰爭。

日本的勝利，固由於存亡所關，舉國一致，不惜任何犧牲，而英國海軍對東來俄艦的牽制，美國財力對日的援助，與兩國在外交上對日的支持，所關最巨。東北民間的「正義軍」（鄉團與鬍匪）之襲擊俄軍後方，破壞交通，亦有影響。俄國戰敗，日亦力竭，經羅斯福總統調停，兩國在美國樸資茅斯（Portsmouth）談判。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和約簽字，俄國承認朝鮮歸日本保護，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及庫頁島南部，讓予日本，兩國於滿洲各自留兵保護鐵路。

樸資茅斯條約，並未能使日本滿足，然無法使俄多作讓步，因有「日本戰勝之報酬，不必逕取之於俄」的決策。朝鮮雖歸日有，日本得隴望蜀，又想重溫馬關條約的舊夢，伸足東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中、日在北京會議東三省善後，日本除要求追認其繼承俄國讓與的有關東北權利外，並將範圍大加擴大。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論，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一「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正約為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利，悉歸日本，附約所含事項包括東北增開商埠十六處，日本援俄國之例留兵護路，繼續經營所築安東至奉天（瀋陽）鐵路，並予改良。另有存記於會議節錄的事項，包括中國未收回東省鐵路前，不於南滿鐵路附近，修築並行幹路及支路，中國如建造吉林至長春鐵路，應向日本貸款半數，護路日軍不得越出鐵路界限。翌年，日本置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主管鐵路業務及煤礦、製鐵、電氣、航運、港灣、教育、學術等業務，為侵畧東北的經濟機關；又設關東都督府，統治旅順、大連，警護鐵路，監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為侵畧東北的軍政機關。

日本戰勝不久，即多方布署，首與英國續盟，英承認日本對朝鮮有權採必要措施，美國亦同意其在朝鮮的宗主權。一九〇七年的日法協定，訂明確保兩國所統治、保護或佔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之秩序和平，維持兩國在亞洲大陸之地位，則直接涉及東北。同年，日、俄化敵為友，訂立第一次協定及密約，劃分南滿北滿為兩國勢力範圍，

日承認俄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俄承認日與朝鮮的政治關係。從此日、俄攜手，擠絕第三者於東北之外。

二、日美對抗與東北開放的失敗

清初定東北為封禁區，不許人民出關。然久已虛有其名，不惟常有遣戍人犯，商販、工匠、冀魯流民前往謀生者尤衆，市街村鎮，相繼而興，墾戶散布各地。十九世紀中期，以俄患日急，黃河下游多災，移民實邊與就食已成要圖，因訂吉林、黑龍江兩省放荒章程，招來墾民，開設郡縣。中、日及日、俄戰後，經營益力，對內封禁完全解除，鐵路的興起與關內的飢饉，加速促成流民的東去，人口由數百萬增至千餘萬；對外籌議開埠通商，舉辦實業。東三省官制與關內不同，置將軍管理，僅奉天有專理民政的府尹。一九〇六年，為改進三省政治，應付新的時勢，派尙書載振、徐世昌前往考察，迭命三省將軍整飭吏治，廣開利源。一九〇七年四月，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三省分設巡撫，以徐世昌為總督，唐紹儀為奉天巡撫。徐、唐與袁世凱關係至深，以期關內外通力合作。

美國助日抗俄的動機之一為維持東北的開放，日本亦作過開放的承諾。日俄和議後，美國鐵路企業家哈利曼（E. H. Harriman）與日本訂立收購南滿鐵路合同。及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簽字，日本決心獨霸南滿，不願美國分享，將合同作廢，美國方知日本無信，謀與對抗，由瀋陽總領事司戴德（W. Straight）與唐紹儀接洽。唐曾留學美國，又曾在朝鮮協助袁世凱，袁扶搖直上，唐步步高昇。唐與袁的政策為使東北問題國際化，借英、美的力量，以遏制日、俄的侵畧。一九〇七年八月，唐與司戴德初步協議，由美國貸款發展東北實業，改革幣制，主要業務為興建自奉天新民經法庫門、洮南至黑龍江鐵路，北接中東鐵路，南接京奉鐵路，以營口、秦皇島為吞吐港，抵制南滿鐵路與大連。第一步完成新民至法庫門一段，即新法鐵路。日本以該路為南滿鐵路並行為口實，堅決反對，美國遲疑不決。十一月，唐與徐世昌改與英國簽訂草合同，日本繼續阻止。交涉年餘，新法鐵路計劃擱

置，如將來興造，允與日本商洽。

是年（一九〇七），日、美關係緊張，德國亦忌日與俄、法、英交密，意欲與中、美同盟，乘機在華取得經濟權益。袁世凱時任外務部尚書，甚為贊同。一九〇八年，美國減收部分庚子賠款，作為中國教育用途，中國派唐紹儀為專使前往致謝，實為商議借款及中、美、德同盟問題。日本搶先一步，在唐抵華盛頓之日，日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務卿羅德（E. Root）換文，維持在華商工業機會均等及中國領土完整，因為羅斯福仍患以日對俄，唐的使命失敗。

一九〇九年十月，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繼續徐、唐的政策，與司戴德訂奉天錦州至黑龍江瓊瑋鐵路草合同，路線距南滿鐵路愈遠，避開所謂並行線，日俄同起反對。美國務卿諾克斯（P. C. Knox）另提滿洲鐵路中立計劃，由列強貸款中國，收購滿洲現有鐵路，並投資建築錦瓊線及日後其他各路。英國反應冷淡，法、德持保留態度，日、俄仍堅決反對，美國孤掌難鳴，又成泡影，反促成日、俄的進一步勾結，而有一九一〇年的第二次協定與密約，相約不在滿洲競爭，維持滿洲現狀，保護日、俄特殊利益，制止他國（中國在內）的任何政治活動，性質有如軍事同盟。

一九〇七年以來，日本在東北一再生事，攘奪了不少權利。比較重要者，一為吉長鐵路問題。俄國讓與日本的南滿鐵路，北起長春，日本欲自長春向東延至吉林省城，再至朝鮮，與安奉鐵路呼應，使朝鮮滿洲成爲一片，強迫中國借款，先建吉、長一段，如再展修，仍須向日借款。二為安奉鐵路問題。日本事前未得中國許可，擅自改築，變更路線，修建兵營。三為間島問題。間島為圖們江中的灘地，韓人違禁越界墾種，強指江北岸地區為間島，日本公然設官駐警管理，搗毀中國衙署。以上三案，一九〇九年，在日本威脅之下解決，吉長路展至朝鮮會寧，安奉路由日本改造，開吉林東南四處為商埠，韓人照舊墾居。

三、英國與西藏

俄國與西藏的接觸，是假手信奉喇嘛教的布里雅特人（Buriat）多治夫（Dorjjeff）。多治夫久居拉薩，甚得達賴十三親信。達賴十三深惡英人，亦不滿清廷，多治夫說以聯俄。九十年代，西藏與俄信使往還。一九〇二年盛傳中國以西藏權益許俄。時英、藏爭執再起，英遂進軍藏邊。俄對英質問，英答以英、藏關係密切，惟望西藏遵守條約。一九〇三年，印度總督派榮赫鵬（Younghusband）上校率兵入藏。一九〇四年三月至五月，連敗藏兵，達賴對英宣戰。七月，英軍大破藏兵於江孜，直趨拉薩，達賴北走青海，輾轉去庫倫。八月三日，英軍入拉薩。九月七日，西藏攝政大臣（協擺）與榮赫鵬訂立和約，開江孜、噶大克、亞東為商埠，英軍留駐春丕，削平藏印間的礮台，賠款五十萬鎊，非經英許可，不得將土地、路、電、礦產讓與外國，亦不得將稅收或貨物金銀向外國抵押。

中國不承認「拉薩條約」，決負起西藏外交之責，期挽回損失。一九〇五年三月，唐紹儀與英代表會議於加爾各達無成，返國後，與英使薩道義（E. M. Satow）再談。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訂「藏印續約」，拉薩條約作為附約，英允不佔藏地，不干藏政，中國亦不准他國佔領藏地或干涉藏政。此約對中國雖仍有不利之處，但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已得英國的承認。一九〇七年，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抵拉薩，重建中國威權，說藏人以天演公理，勿蹈印度、哲孟雄（錫金）滅亡覆轍，西藏當局大為感動。關於西藏的對英賠款，由張具名交付，對於英人的違約行為，嚴行取締。是年八月，英俄協議，互認中國在藏的宗主權。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中英再訂「藏印通商章程」，又挽回若干權利。並以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負責經營西康。兩年之間（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規劃頗力，以操之過急，致藏人生怨。

達賴逃至庫倫，因俄為日本所敗，無力為助。一九〇八年九月，清廷召其來京覲見，予以加封，再度確定對西藏的宗主權。達賴見於

俄不足恃，中國在西藏的聲勢增高，轉而親英，面晤英使朱爾典（John N. Jordan），朱爾典自樂於相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達賴返回西藏。一九一〇年二月，川軍抵拉薩，達賴二次出奔，南走大吉嶺，請印度總督保護，清廷革去了他的名號。朱爾典抗議，指摘中國擾亂西藏和平，如對藏政策改變，須先與英國相商。外務部答稱入藏軍隊的任務同於警察，達賴無故出走，中國並不以其個人去留，變更西藏現存制度。朱爾典爭論不休，並警告不得妨害尼泊爾、布丹、錫金（哲孟雄）。外務部申明尼泊爾、布丹均中國屬邦，不能與錫金視同一律，其實英國早已將布丹收為保護國，認尼泊爾為獨立部落。

四、各國權益的擴張

根據辛丑條約，須修改中外商約。首與英國談判，英代表馬凱（James L. Mackay），主廢除釐金，中國代表呂海寰、盛宣懷及參與其事的劉坤一、張之洞要求以關稅加至百分之十五為條件。歷時十月，始於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成立「續訂通商行船條約」（通稱馬凱條約）。一為進口稅提高至百分之十二，出口稅為百分之七，俟各國同意後徵收（即裁釐加稅）。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復分與美、日訂約，美約所定稅率相同，日約未有明文。二為內河航行及商業便利的擴大，外國輪船可於西江十餘處停泊搭客，開放廣東之惠州，長江之安慶、長沙、萬縣，東北之瀋陽、安東、大東溝及北京為商埠，往來於各口岸之中國帆船應徵貨稅不得低於輪船。三為給外人以投資便利，准華、洋合股經商，妥訂礦務章程，製定國幣，統一度量衡。新商約最重要的為加稅，但是口惠而實不至，仍為值百抽五。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益增，十年之間，多至三倍，外人投資亦增加一倍以上。

鴉片戰後的五十七年（一八四二至一八九九），中國共開條約口岸四十五處，拳亂後的九年（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加開三十八處。前此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台、蕪湖、重慶、杭州、蘇州及沙市設有英、法、美、德、俄、日租界。是後自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天津添設俄、比、義、奧租界，鼓浪

嶼添設公共租界。一九〇四年長沙添設日本租界，原有的英國天津租界，日本的天津、漢口租界，以及澳門的界址，皆予擴展。租界有如殖民地，為各國商店、銀行、工廠的集中地。

外國在華直接經營的鐵路，舊有的，如俄國的東清（東省中東）路及南滿支路於一九〇三年完成，日俄戰後，日本於一九〇八年將南滿路改建，德國的膠濟路於一九〇四年完成。新取得的有英國的道清路（河南道口至清化）於一九〇七年完成，法國的滇越路（越南至昆明）於一九一〇年完成，日本的安奉路於一九一〇年改造完成。借款修建而由外人控制的鐵路，舊有的，如美國之於粵漢路的廣三線（廣州至三水），於一九〇四年完成，比國之於蘆漢路，於一九〇六年完成（一九〇〇年已自蘆溝橋展至北京，改成京漢路），英國之於關內外路（京奉路），於一九〇七年完成（一九一一年東段自新民展至瀋陽一段係日款）。新取得的有法國的正太路於一九〇七年完成，英國的滬寧路於一九〇八年完成，滬杭甬路（上海至杭州、寧波）的滬杭線於一九〇九年完成。廣九路（廣州至九龍）於一九一一年完成，比國的汴洛路（開封至洛陽）於一九〇九年完成，日本的南潯路（南昌至九江）北段於一九一一年完成，吉長路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德的津浦路（天津至浦口）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法、德、美的粵漢路於一九一一年部分完成。清季的中國鐵路，幾無一不在外人手中。

十九世紀後期，往來中國與外洋之間及中國沿海、內河的外國輪船，為英、美、德、法、俄諸國所有。一八九八年起，加入四家日本輪船公司，一九〇六年復有美國大來洋行（Robert Dollar and Co.）的輪船。一九〇七年日本各輪船公司合組為「日清輪船公司」，主要航線為長江及沿海，與英國的怡和、太古兩公司最為巨擘。總計外國輪船約佔中國全部航業百分之四十。

中國驛傳屬於兵部，分舖遞、驛遞。舖遞以人力，驛遞用馬匹，擇地分立驛站，除傳送軍報公牘外，兼辦官物與官員乘傳。別有民營之民信局，傳送私人書信，以沿海各省為多。五口通商以來，英國郵務由領事兼理，稍後上海租界工部局設有書信館。駐京各國使館文書

由總署交驛代寄（俄國自行辦理）。海關總稅務司文書初亦歸總署代寄，不久自行僱人遞送，一八六六年起，使館郵件一併歸其辦理，於各海關置書信局。一八七六年赫德建議官辦，一八七八年命天津稅務司德曜琳於天津、北京、上海、牛莊、登州試行，兼收民信，一八八二年設「海關撥駟達（Post）書信館」。一八八五年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從李圭及寧波稅務司葛顯禮（Henry C. T. Kopsch）議，請加推廣，總署與李鴻章雖均贊同，然仍多顧慮。一八九二年，上海租界書信館擬加入萬國郵會，赫德再勸總署設官郵政，收回外人書信館。中日戰後，續以為請，獲得翁同龢、張之洞支持，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上諭照准，派赫德管理，葛顯禮為總辦，中國新郵政正式成立。

郵政為交通的重要部門之一，成立不久，即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一八九八年，法使一再要求任用法人襄辦，一九〇二年以帛黎（T. Piry）任之，郵政行政權入於法人掌握。客郵（外人私設的郵局）為另一侵害中國郵權之事，始作俑者為英國，各國相繼效尤，拳亂之後如雨後春筍，遍及於各口岸。一九〇三年外務部要求撤銷，各國託詞推諉。截至一九〇七年，日本共有郵局二十一所，法國十五所，德國十三所，英國十二所，美國一所，共六十二所。此後十年續有增設，有郵局郵務處、郵寄代辦所、信箱、代售郵票所諸種名稱，約計八百餘，屬於日本者六百餘。

中日戰前，外人在華私設的各種工廠已近百數，馬關及辛丑條約後，兼及礦產。工廠以棉紡織業為主，礦產以煉炭為要，大都為英、日所有，共八十六廠、礦。棉紡織業有一八九七年英商在上海所設的「老公茂紡織局」（Laokungmow Cotton Spining and Weaving Co.）、「怡和紡織局」（Ewo Cotton Mill）。一九〇二及一九〇六年日商收購上海中國兩紗廠，一九〇八年合為「上海紡織株式會社」，另創「日信紗廠」。總計英、日在華紗布產量佔中國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造船工業，有一九〇五年英商在上海設立的「耶松船塢」（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一九一〇年日商的「東華造船株式會社」。

攫奪中國礦權的國家，以德、英、俄、日為主。一八九八年，德

國取得山東境內鐵路線三十里內的挖煤權，英國「福公司」繼之，取得山西東南境及河南北部的挖煤權。一九〇〇年德國擴大要求，將山東鐵路附近三十里內華人所開各礦，作為合辦。一九〇八年又取得直隸井陘礦權。最大的開平煤礦則為英人所奪。聯軍佔領天津及關內鐵路後，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為保礦產，委德瑾琳添招洋股。德瑾琳與工程師美人胡華（Herbert Hoover，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美總統）擅行作為中、英合辦，大權歸英人獨攬。中國雖不承認，卒未能收回。東北礦產初為俄國所佔，日俄戰後，南滿撫順及煙台煤礦為日本所有，一九一〇年復將本溪湖的煤鐵礦定為中、日合辦，建立製鐵所，成了日本最大的煉鐵業。總計清季外人的礦業投資佔全國總額的十分之八。

在華外國銀行的開辦，始於一八四五年英國在香港設立的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一作麗如銀行）分行，一八四八及一八五〇年續設分行於廣州、上海（一八九二年停業）。一八五七及一八五八年英國有利銀行（Merch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及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即渣打銀行）各設分行於上海。尤重要的為一八六五年在香港、上海開業的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二十餘年間，分行遍設於各口岸以及北京。由法國資本支持的俄國道勝銀行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分行遍設於滿、蒙、京、津、上海、漢口、香港。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德國的德華銀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均於一八九八年在上海設立分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於同時設置，續及於天津、東北，朝鮮銀行、台灣銀行於東北、廈門各有分行。花旗銀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上海分行成立於一九〇二年。此外尚有荷蘭、華比等銀行。外國銀行的主要業務為進出口貿易、國際匯兌、吸收存款、發行鈔票。十九世紀末年，鄭觀應已論到外國銀行對於華商的不利，「西商所用銀票，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粵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獲利二百餘萬之譜。雖有華商股份，不與華商往來，即有股費華商公司股票，亦不能抵押，惟

外國公司貨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權，華商失其利，華商助其資，而西商受其益。」匯豐銀行吸收的存款，十九世紀末年已達一萬四千餘萬元，不僅用供西商資金的週轉，並供清政府貸款，鐵路工礦同受控制。海關所入而待分配的庚子賠款亦由匯豐銀行保管。

第二節 反動後的新政

一、強顏變法

慈禧扼殺了戊戌變法，造成了一場幾乎使國家毀滅的滔天大禍。等到洋兵進入北京，倉皇出奔，有同喪家之犬，知道今後她的命運繫於外人的喜怒，迭下罪己詔、保薦人才詔，最後竟亦宣布變法，動機實為對外獻媚。擁護慈禧政權的張之洞曾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旺盛。」「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仇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仇視朝廷之見。」新授軍機大臣鹿傳霖與張為郎舅，當權的榮祿亦想借變法表示開明，慈禧終覺由她來宣布變法不好啓齒。有人說：「變法自變法，康有為謀逆自謀逆。」她認為頗可解嘲，於是有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命內外大臣督撫條陳改革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的上諭。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再以光緒的名義，正式頒布變法詔，首謂：世無一成不變的治法，「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變。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這是表示振作，取法洋人。次謂：「康逆（有為）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皇太后何嘗不想更新，朕何嘗概行除舊？……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這是為慈禧洗刷戊戌政變罪名，表示她亦非頑固者。又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居上寬，臨下簡，言必行，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這是檢討中法之

弊與爲政之原則。最後是徵詢各方的具體意見。

上諭提示的變法的主旨，與張之洞的《勸學篇》如出一轍。戊戌變法是康有爲與光緒的合作，康爲推動人，這次是張之洞與慈禧的合作，張爲推動人。七月間，張與劉坤一連上變法三摺，稿出張手。第一摺重在興學育才，包括設文武學堂，改文科，停武科，獎游學。第二摺論整頓中法，列舉治、富、強三原則，及辦法十二端。第三摺論采行西法，凡十三端，如派游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譯書。

一九〇一年四月，添置督辦政務處，主持者爲榮祿，輔佐者有鹿傳霖及稍後加入的瞿鴻禨，列名的有奕劻、李鴻章、崑岡、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及袁世凱。李卒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劉卒於一九〇二年十月，榮祿卒於一九〇三年四月。繼榮祿的奕劻，根本不知變法爲何事。督撫中的柱石爲袁、張，張年將七旬，而袁四十餘，春秋方盛，取代了甲午前李鴻章的地位。

見於文字的變法上諭大抵與戊戌年相似，不過非集中頒布，而係於數年內爲之。涉及的事項，也與戊戌年無大出入，僅新機構的添置較多。四十年來，總署統司一切洋務新政，職位淆雜而少專官，一九〇一年七月，因各國要求，改爲外務部。主動設立的爲一九〇三年九月的商部，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巡警部，十二月的學部及練兵處。其他部、處，以後隨時說明。裁撤的衙署，中央有詹事府、通政司，地方有河東河道總督、湖北、雲南巡撫、廣東漕運總督。

督辦政務處設置之初，頒布了一些支離的紙上興革。如一九〇二年准滿、漢通婚，勸漢人婦女除纏足積習。過了兩年，規定陸軍官制得兼用漢人，旗民一律用新刑章，滿籍御史一體考試。一九〇五年命議訂劃除滿漢成見辦法，這是有鑒於革命排滿空氣瀰漫，準備立憲時所採取的撫綏政策，但均無實際。張之洞失望地說：「京朝門戶已成，廢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債重，民愈怒。」

比較可觀的新政，一爲北洋警察。聯軍佔領北京期間，多於所管區置「安民所」，日本招華人爲巡捕，以維持治安，修繕街道。日後清廷襲用其法，設京師工巡總局。袁世凱亦於天津、保定舉辦警察，主其事者爲趙秉鈞。一九〇二年詔命各省仿行，結果是爲善不足，擾民有餘。

二爲禁煙，光緒年間，每年進口鴉片多達十餘萬擔，內地所產倍之，最多時爲四十萬擔。鄉村嗜食者十之六，城市十之九，吏役兵丁幾乎無人不吸。一九〇六年九月，詔定十年禁絕。繼與英國協議，自一九〇八年起，英國允將印度輸入鴉片，每年遞減十之一，但必須中國禁絕自種。一九〇九年二月，由美總統塔虎脫（W. H. Taft）建議，在上海舉行萬國禁煙會議，對於中國禁煙成就，頗致贊許。至民國初年，除僻遠地區外，幾無種者。其後軍閥橫行，視鴉片爲利藪，私種及洋商偷運進口之風又起。

領事裁判權，因各國借口中國司法不良，不肯放棄。一九〇二年三月，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國律例，責成袁世凱、張之洞，保薦專家，以備開館編纂。五月，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開始修訂。沈諳於中律，伍曾習西律。是年中英及次年中美、中日商約均訂明各國允協助中國整頓律例，俟一切臻於妥善，願將領事裁判權取消。一九〇五年四月，宣布刪除凌遲、梟首、戮屍，死刑至斬決止，並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清查監獄、羈所。新式審判廳於一九〇七年初設於東三省，並先於直隸、江蘇、湖北試行，司法與行政逐步分離。

二、袁世凱與北洋新軍

中國陸軍之用洋槍、練洋操約已三十年，然徒有其表，舊習不改。甲午戰起，一敗塗地，於是有趕練新軍之議。一八九五年一月，首命長蘆鹽政胡燏棻督練五千人，號曰「定武軍」，復將以能戰知名的聶士成部改爲「武毅軍」，均駐天津附近。同年，張之洞創「自強軍」及陸師學堂於江蘇，次年立「護軍營」及武備學堂於湖北，均以德人爲教習。袁世凱深痛舊有各軍之腐窳，上書當道，縱論整頓軍伍的必要，

主亟檢名將，優以事權，按中西營制律令，參酌改革。定武軍成軍將一年，效果不著，政府即將此項任務付諸袁世凱，定武軍及新募的二千餘人，悉歸督練，名曰「新建陸軍」，諸事模仿德國、日本規制，以翰林徐世昌任督練處參謀，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分任步兵、砲兵、工程兵學堂總辦兼統帶，曹錕、李純等任隊官，此外有來自防勇的張勳、倪嗣冲等，洋教習以德人爲多。李鴻章時代，武備學堂畢業生平時只任訓練，戰時由官弁調度，袁將訓練與指揮的權責合一，統兵者與練兵者爲一人，此爲新軍與淮軍最大不同處。袁本人亦無間寒暑，躬親考校。戊戌政變後，全軍增至一萬人，英國議員貝思福參觀後，印象至佳，於袁稱道不置。不久改編爲「武衛右軍」。拳亂時期，武衛軍悉歸消滅，右軍以調往山東，不僅獨獲保全，並增編二十營，兵力擴大至二萬人，自強軍亦歸袁訓練節制。

辛丑和約定後，詔命擴充北洋、湖北武備學堂與袁的隨營學堂，裁汰綠營（練軍）、防勇（湘淮勇營），精選若干營分編爲常備、後備軍及巡警營（憲兵）。常備軍每鎮萬餘人，因尚未施行徵兵，仍爲招募而成。一九〇二年，袁創設軍政司，所部改稱常備軍，置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由王世珍、段祺瑞、馮國璋主持，先編練兩鎮。詔命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及南方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分赴北洋、湖北學習，學成後回本省管帶新軍，每年由北洋、湖北派員校閱。張之洞爲書生，與居無節，不諳軍旅，但能紙上空談。袁世凱久歷戎行，深知他之能有今日，由於他擁有一支精練的部隊。北洋爲國防要衝，中樞復以大力支持，結果張無所成，袁一枝獨秀。

一九〇三年，袁兼辦京旗練兵事宜，鐵良爲會辦。中央設練兵處，各省設督練公所。奕劻任練兵處總理，袁爲會辦，鐵良爲襄辦，徐世昌任提調，劉永慶、段祺瑞、王世珍長軍政、軍令、軍學三司。一九〇四年北洋三鎮成軍，其中一鎮爲京旗。每鎮步兵兩協（每協兩標，即團），騎兵、砲兵各一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一營，計官兵共約一萬二千五百人。一九〇五年，定各省新軍均名陸軍。九月，北洋陸軍於直隸河間秋操，一九〇六年又於河南彰德舉行。北洋陸軍外，尚有湖

北陸軍參加，兩次均由袁與鐵良任閱操大臣。此時北洋已有六鎮，湖北一鎮，江蘇一鎮。十一月，陸軍部成立，鐵良任尚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改歸陸軍部統轄。一九〇七年，設軍諮處，馮國璋爲正使，八月陸軍部定分省限年編練全國陸軍計劃，近畿四鎮，四川三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雲南、甘肅各二鎮，其餘諸省及江北、熱河各一鎮，大抵係依各地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與財力爲準。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國新軍計十六鎮，十六混成協(旅)，訓練裝備以北洋六鎮爲精，分駐直隸、山東、東北。袁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雖不及李鴻章之久，而實力過之。

關於軍事教育，除隨營學堂外，一九〇二年，袁又開辦保定行營將弁學堂，一九〇三年開辦武備小學、陸軍速成學堂。一九〇六年，改陸軍速成學堂爲保定軍官學堂，爲最高教育機構。各省亦分設武備學堂、講武堂、陸軍速成學堂、預備學堂及小學，北京清河、江蘇南京、湖北武昌、陝西西安設有陸軍中學。前往日本學習軍事者亦復不少，一八九八年已有二十八名，爲湖北、浙江所派，次年南北洋各派二十名，浙江八名。一九〇二年，北洋派五十五名，練兵處派一百二十餘名。自費生以湖南、浙江爲多。所有學生，大都先入東京成城或振武學校，再進士官學校。截至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士官學校者，共六百七十餘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重要將領，除北洋武備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出身者外，餘多受過日本軍事教育，參加革命者，頗不乏人。

三、張之洞與新教育

以往政府設置的學堂爲數無多，性質亦隘，僅限於外國語文、技藝、軍事。近年大員中最熱心興學的爲張之洞，特別是在湖廣總督任內，設立兩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六門。又立自強學堂(一八九三)，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中日戰後，奏請廣開學堂，創儲才學堂於南京，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繼立農務、工藝學堂於湖北，各府均設學堂。盛宣懷亦於一八九五年設天津中西學堂分頭、二等，頭等相當於大學，二等相當於中學。次年設

南洋公學於上海，分上、中、外三院，相當於大、中、小學。

劉坤一、張之洞的變法奏摺中的第一摺，即論興學育才，分設學堂、改科舉、停武科、獎游學四事。一九〇一年八月，詔命自明年起，鄉試、會試等均試策論，不用八股程式，並停武科。九月，改各省書院爲學堂，省城及府、州、縣分設大學、中學、小學及蒙養學堂。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張之洞首設湖北學務處，次年袁世凱設直隸學校司，以前貴州學政嚴修爲北洋學務總辦。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學堂先後俱備。湖北自強學堂改爲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爲大學堂（後改爲高等學堂），另有師範學堂，及爲生員、官員及官員子弟而設的學堂。一九〇二年詔頒行學堂章程。翌年張之洞、袁世凱以科舉爲發展學堂的障礙，奏請遞減科舉。即派張之洞與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學堂章程釐定，大致取法於日本。一九〇四年一月頒布，置學務大臣，各省置學務處，兩年後，將鄉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俟學堂辦齊，有了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停止。

日俄戰後，革命立憲風潮猛漲，袁世凱、張之洞及兩江、兩廣總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羣將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詭謀。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上諭宣布自明年始，鄉試、會試、科考一律停止，較康有爲的主張更爲徹底。而其所以斷然出此，最大動機仍在假利祿以籠絡知識分子。又三月，學部成立，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爲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是爲衛護治統、道統，即中學爲體；尚公、尚武、尚實是爲救私、救弱、救虛，即西學爲用。高等教育歸學部直轄，中等以下的學堂歸各省新設的提學使。各縣設勸學所，大都爲侍郎嚴修的規劃。官辦、公辦之外，私人興學先已蔚爲風氣，以江蘇、湖南爲盛。一八九八年，嚴修已在天津設立私學，延北洋水師學堂出身的張伯苓（壽春）主持。一九〇四年改爲中學，一九一一年定名南開中學；後爲南開大學，此爲一九一九年之事。

戊戌政變後，京師大學堂幸獲保存，拳亂時閉，一九〇二年恢復，

設預備科及速成科。預備科分政科、藝科，速成科分化學館、師範館，另有由同文館改組的譯學館。學生來自各省高等學堂及保送的生員、監生、貢生、舉人。天津中西學堂於一九〇三年改名北洋大學，美人丁立(Chores D. Tenneg)任校長。上海南洋公學上院(大學)，由美人福開森(John D. Ferguson)任監院。山西大學成立於一九〇二年，將李提摩太所辦的中西學堂併入，名曰西學齋，英人敦崇禮(Mair Duncan)任總教習。各省城設立的高等學堂，相當於大學預備科。又有專門學堂，以法政優級師範為多，一因預備立憲，一因興辦中學，需要法政人才及師資。法政學堂對於立憲運動有其影響，優級師範以一九〇三年張之洞所創的南京兩江師範為著。一九〇九年左右，京師大學堂學生約七、八百人，預備科速成科畢業生約一百餘人，其他各大學本科畢業生亦約一百餘人。就西學造詣論，不及教會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九)。全國高等學堂學生約四千餘，專門學堂學生約二萬餘人，普通中學堂學生約四萬餘人，實業師範學堂學生亦約四萬餘人，小學生約一百五十餘萬人。四川、直隸居首，次為江蘇、湖北、湖南。

四年之前全國各級學生約僅十萬人，就增加的比例而論，不謂不大。但師資、設備均極缺乏，合格的學生亦為問題，而以大學、高等、專門及中等學堂為甚。一九〇八年學部曾謂各省城大都注重高等學堂，而中學或猶未備；府城注重中學，而小學僅有數區；州縣設高等小學堂，而初等小學未設。學生但冀進入名稱較崇學堂，越級躡升。今後凡學堂之屬於高等教育者，不得招收未經中學畢業的學生。大學及高等、專門學堂的教師，出身科舉的佔百分之二十五，留學日本的佔百分之三十，日本人佔百分之十。中等學堂出身科舉的教師佔百分之三十三，小學堂佔百分之四十五。所謂合格的教師，亦僅受過短期師範訓練。至於女子學堂，初為傳教士所設，中國人自辦的以一九〇二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愛國女學為早。一九〇四年慈禧設毓坤會，係為王公及高級京官的女眷學習外國語文而設。張之洞的敬節學堂、育嬰學堂係為已婚婦女而設，講習家庭教育。一九〇六年定女子學堂章程，限於師範

及小學。袁世凱於天津設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女學。

留學教育隨着變法興學而大盛，尤其是留學日本。留日學生始於一八九六年，僅十餘人。張之洞極口誇說留學外國的神效，謂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以路近費省，文字易曉，西書多已刪繁存要。中、日情勢風俗相似，不難仿行。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勸總署派學生二百名前往，日本願予便利。一八九九年鄂、浙及南、北洋共派學生六十四人赴日。一九〇一年張又謂為加速培養師資，以多派士人出洋留學為第一義。重定學生章程中，訂明辦理學堂的員紳，須先出洋考察，即使不能往西洋，日本則不可不到。於是各省選派及自備資斧前往者日衆。一九〇三年，東京有特為中國學生而設的學校。一九〇五年學生達數千人，並有女生。翌年約近一萬人，¹未能入學者三千餘人，均自費生。已入學者半數為各省公費生，習師範、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專門學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百分之一。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學生規則，駐日公使亦以學生參加革命，屢次滋事，請嚴定選派學生章程，學部遂停派速成學生。是後數目銳減。

留學西洋的遠不及日本之衆。自一八八〇年留美學生撤回，除赴英、法的海軍官生及少數自費或教會資送者外，至一八九六年，總署始於英、法、德、俄各派四名。一九〇三年京師大學堂與江南各派十六名赴美、德，湖北派四十名赴美、比、德、俄。比國學費較廉，一九〇四年起，准每省派十至四十名前往。美國減收庚子賠款後，一九〇九年開始用以選派留美學生，平均每年六十名。²設遊學肄業館於北京西郊清華園，一九一一年改名清華學堂。自費及教會資送者亦增，其中間有女生，一九一〇年，約數十名。

¹一說為一萬七千八百人。

²美國早有退還多收庚子賠款之議，一九〇七年正式決定，計本息二千九百萬美元。鑒於留日學生衆多，因將該款用於選派留學生，期增進中美關係。一九二四年續行減收一千二百餘萬美元，亦用於文化教育事業。

教育的改革，短期間雖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仍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二千餘年的私家教育與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從此告終，五百餘年的八股考試，從此取消。自今以後，教育成爲國家要政之一，學科種類與內容大爲擴張，啓發了更多的時代觀念，增進了更多人的愛國思想，認爲現狀必須改造，因之嚮往於革命或立憲運動。這自非提倡新教育的當局之所希望，亦爲他們始料之所不及。

四、實業發展的困難

練新軍所以救弱，興新教育所以救愚，救貧則賴實業。以往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政策，絕不足以適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有識者已呼籲民營。郭嵩燾會上書當道，謂求富與強，當導民以從，因民之利，而爲之制。中國製器、造船均爲官辦，應仿西洋之法，歸商人經營，則民得其利，國受其益。進而有人倡議以官廠租給商人，聽其爲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礦、挖河、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馬關條約後，張之洞預料蘇、杭、川、楚的絲綢紗布工匠生計將大受不利，奏請派人經理商務局，主持設廠，一八九七年命官紳附股。一八九八年定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計五年之間，新興民營廠礦約八十家，爲過去二十年的八倍，以紡織業爲多，張謇的南通大生紗廠爲其一。麵粉廠以孫多松、孫多森兄弟的上海阜豐麵粉公司，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無錫茂新麵粉公司爲著。

張之洞、劉坤一力言，西國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國之富以工。一九〇一年命各省設農務、工藝學堂，興辦農工諸務，定礦務章程。一九〇三年制訂商律，籌劃工藝、路礦、農務公司。商部爲最早設立的新機構，職掌商務、工、路、電、農、桑、畜牧、銀行、貨幣。一九〇四年，頒布獎勵公司章程、公司律、公司註冊章程、商標註冊章程、保護獎勵工商辦法，保證投資利益，給以專利免釐。一九〇二及一九〇三年，設北洋工藝總局及四川勸工局。一九〇五年，商部設勸工陳列所、商標註冊局、礦政調查局。一九〇六年商部改組爲農工商部及郵傳部。一九〇七年，制訂「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集股

自二十萬至百萬元以上者，授該部各等議員，集股在二百萬元以上者，授各等顧問官，集股在一千萬以上者，分別授予子孫三代世襲顧問官或議員。個人所辦實業資本在一千萬至一千四百萬元以上者賞男爵，一千六百萬至二千萬元以上者賞子爵，實業與軍功等視。中國鐵路礦產多為外人所有，是年郵傳部設鐵路總局，袁世凱設灤州礦務局。¹一九〇八年，雲南設箇舊錫務公司，復以紗布進口增多，定獎勵植棉章程。一九〇九年，武昌舉行武漢勸業改進會，一九一〇年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一時稱為盛事。

各種民營企業的展開，為一九〇五年以後的事，此與抵制美貨（見 377 頁），及日、俄戰爭的刺激有關。以棉紡織業來說，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年並無新廠，是後五年之內，增加十一廠，四在上海，一在寧波，一在河南安陽，餘五廠分設於江南無錫等地，生產量增加二分之一。南通大生紗廠發展最速，紗錠由二萬增至六萬五千餘枚，資金由五十萬兩增至二百萬兩。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北京、湖北均設有新廠，大都為官辦或官商合辦。繅絲工業以長江流域及廣東為盛。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由二十二廠增至四十六廠。麵粉工業亦以長江流域為發達，大小約十餘廠。水泥工業首推周學熙的天津啓新洋灰公司（一九〇六），廣州的士敏土廠，湖北的水泥廠（一九〇七）。煙草工業有簡照南等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一九〇六），陶器有景德鎮瓷器公司（一九〇七），此外有造紙、製茶、玻璃、火柴各種輕工業。

重工業方面，有一九〇六年自江南製造局分出的江南船塢，專造商船，四千噸的「江華」輪即其所造。華商所設的造船廠，有上海求新製造廠、漢口揚子江機器公司。官辦的漢陽鐵廠成績欠佳，一八九六年委之於盛宣懷，改為官督商辦。為了開採江西萍鄉煤礦，修築運輸鐵路及添置設備，向日本借款，一九〇三年獲得預付鐵砂價三百萬元。一九〇八年改組為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作為商辦，資金內仍有日

¹關於鐵路礦務經營，以收回主權運動為中心，分見 377-378 及 396-399 頁。

本預付的購鐵砂款及借款，因之受到日本的控制。

中國自造鐵路以京張線(北京至張家口)爲著，工程師爲詹天佑，一九〇八年竣工。華商自設輪船公司，始於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僅有數家，多爲航行內河的小輪。一九〇三年張謇創辦大達內河小輪公司，一九〇四年煙台有小清河輪船公司。是後二年，陸續設立的十餘家，資金超過百萬元者僅數家，統計船隻噸位較前增多一倍。

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行設置的廠、礦約三百三十餘，資金七千餘萬兩(軍事工業除外)。如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一九〇一年的二十餘年相比，廠、礦數約增二倍餘，資金約增一倍餘。就比例言，進步可謂迅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爲最高峯，資金多集中於輕工業，約佔百分之廿五，次爲礦產，約佔百分之十八。工廠多在長江下游，次爲直隸、山東，然絕不足與外人競爭。以棉紡織工業爲例，除大生紗廠外，無一不困難重重。一由於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無法採取保護政策，新與英、美、日訂立的商約又准許華洋合股經商。二由於外人有權在中國口岸設廠製造，中國工資既低，又可減少原料及成品的運費，中國的技術設備均不能與之相抗。三由於資金不足，缺少銀行以吸收內地資金，用於工業投資，民間對新式工業既少投資信心與習慣，政府又無有效的保證制度。虛名獎賞，空口倡導，效力畢竟不大。資金在百萬兩以上的工廠，只有十餘家，大半數在五萬至二十萬兩之間，且有少於五萬兩者。政府自顧不暇，當然談不到協助。

農業的生產，毫無改進，洋貨的侵入有加無已。自耕農與地主縱有餘糧以交換所需，又須經過商人的盤剝。對外貿易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一年，每年入超平均爲一萬萬餘兩，最多時超過二萬萬兩。新的雜稅、捐派，益加速農村的破產。自一九〇二年起，每年應付的外債(包括賠款)即須四千餘萬兩左右。舉辦各項新政，事事需款，而以練兵爲尤鉅。是年命各省竭力籌措，是爲了支付賠款。一九〇三年又命各省將浮收、優缺、優差款目歸公，切實整頓房田稅契，歲增之款，按省派定額數，煙酒稅額亦按省派定，是爲了練兵。一九〇四年優獎捐輸，清查各省陋規與錢糧，亦是爲了練兵。戶部訂籌餉辦法，並派侍郎鐵

良往長江各省，查明進出款項及財稅機構利弊，不外竭力搜括，竭澤而漁。

清代幣制為銀兩、制錢兼行。銀圓流入後，民間樂於使用，每元成分為七錢二分，竟換純銀八錢。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始在廣州鑄造，摹為龍紋，號曰「龍洋」。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武昌、上海、濟南、成都繼之，規格不一，幣制反趨雜亂。庚子賠款是按金幣折算，以銀價下跌，金銀比價時變，中國損失不貲。復以便利交易，穩定對外匯率，幣制必須統一。一九〇二年中英商約有立定國幣的條文，遂專設北洋鑄造銀元局。一九〇三年赫德建議確立金本位，以期劃一，規定銀與金鎊比價。一九〇五年設造幣總廠於天津，¹北洋、南洋、廣東、湖北，各設一局作為分廠。定一兩銀幣為國幣本位，並鑄五錢、二錢、一錢銀幣，同銅圓制錢相輔而行。²但一兩銀幣與龍洋重量不同，頗為不便，終作罷論。一九〇七年頒布新幣成色章程，銀幣一圓合銀七錢二分，每圓十角，仍然爭議紛紜。一九一〇年四月，再頒布幣制則例，以圓為國幣單位，仍以銀七錢二分為準，另有五角、二角五分、一角銀幣及其他各種輔幣。每銅圓一枚當制錢十文，百枚兌銀圓一枚，後以鑄造日濫，百十枚以至百三四十枚方可兌銀圓一枚，制錢逐漸減少。

舊時金融機構為銀舖、當舖、錢莊（錢舖）、銀號、票號。銀舖以打造飾器、鑄銀錠為業，兼營金銀買賣。當舖從事放款，以實物作抵押。錢莊銀號以兌換為業，以北京為中心，漸及於長江流域。一九〇〇年北京最大的四家錢舖（四大恒）為八國聯軍搶掠一空，此後金融中心集中上海，入於江浙人之手。銀舖、錢莊、銀號皆經營放款、存款、匯兌、發行銀票，具有銀行性質。商營之外，有官錢舖、官銀號、官錢局、官錢號、官銀錢局。票號為山西人所經營，以匯兌放款為主，各地設有聯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獨盛，與官方交往最密。

舊式的金融機構，難與新式的銀行競爭，中外通商後，外國銀行

¹原由天津機器局附鑄。

²銀圓始於廣東，一九〇四年起各省仿行。

已喧賓奪主。一八九六年盛宣懷創立中國通商銀行於上海，設分行於各大口岸，但官款仍多存入銀號、票號、錢莊，商款仍多存入外國銀行。一九〇四年，定試辦銀行章程，官商合資。一九〇五年，成立戶部銀行，一九〇八年改稱大清銀行，資金增為一千萬兩。繼之而起者，以一九〇七年郵傳部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為著。截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辦銀行共十二家，以發行紙幣、存放款為主，不重視工業貸款，民間亦不願將款存入中國自辦銀行。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

甲午戰敗，中國的變政運動正式揭開，孫中山的反滿革命起義自是開始，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活動自是轉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頌揚光緒。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時與孫中山往還。孫與暢談革命，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清議報》停刊後，一九〇二年二月，梁再創《新民叢報》，於民族、民權主義宣揚愈力，謂中國之亡於異族，在乏國家思想。要救中國必須徹底摧毀專制政體，革命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同年又創辦《小新說報》，專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

《清議報》每期銷行數千冊，《新民叢報》至萬餘冊，在清廷嚴禁之下，仍風行海內外，雖由於梁的筆端富於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適合人心的需要。黃遵憲謂其論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却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矣。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梁)

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嚴復亦稱「為亞洲二十世紀運會之先聲。」

一九〇〇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為一百餘人，大都志趣不凡，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革命思想與歷史。一九〇一年，倡言革命排滿的《國民報》及「廣東獨立協會」，均得孫中山的支持。以後學生人數激增，一九〇二年又創刊《游學譯編》，宣揚民族主義與軍國民教育，成立留學生會館，參加者以各省獨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東京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舉人吳敬恒（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憤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自費生入日本陸軍學校，至使館抗爭，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學生自行退學返國。一九〇三年，東京留學生千餘人新年團拜，演說反滿復漢，全場激動。各省學生同鄉會分別創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湘籍學生陳天華（一八七五至一九〇五）著《猛回頭》、《警世鐘》（一九〇四），明言惟有革命獨立，推翻滿清，中國方能得救。

國內的革命潮以上海為洶湧，中心人物亦多為留日學生。一九〇一年，曾參與唐才常召開的「國會」之戡翼翬發行《大陸月刊》，宣傳排滿。一九〇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及章炳麟、黃宗仰組織「中國教育會」，助南洋公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發行《學生世界》，高談革命。一九〇三年自日本歸來的四川青年鄒容（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五），刊行《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同為激烈而淺直的宣傳小冊。《蘇報》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間，屢載《革命軍序》、《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及章炳麟的排滿文章，斥光緒為無知小醜。租界工部局應清方要求，拘捕章、鄒，封禁《蘇報》，此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¹人心愈憤，排滿的書報愈多，如《國民日報》、《蕩虜叢書》、《自由血》、《女界鐘》、《女子世界》等。

¹章被判監三年，鄒二年。一九〇五年四月，鄒死於獄。

一九〇三年，黃興（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陳天華、宋教仁在湖南成立「華興會」，蔡元培、徐錫麟、龔寶銓、陶成章成立「光復會」，加入者多為青年及會黨。一九〇四年湖北學生及青年軍人劉貞一（敬菴）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相通。是年華興會計劃在湖南舉事，屬於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的湖北、浙江學生五百餘人，哥老會數萬人，準備響應，以事洩失敗。一九〇五年湖北青年王漢謀刺在長江各省搜刮的欽差鐵良於彰德，安徽青年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於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對內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對外亦要抵抗侵略。後者可說是前者之因。清朝腐敗，無力衛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列強暴戾，欺凌有加無已，惟有奮起自救。知識分子固有此覺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條約甫經簽訂，一九〇一年十一月，直隸南部即有抗拒攤派教案賠款之事，聲言「掃清滅洋」，延及山東、河南，歷時半載。繼之為四川、湖南的暴動，張揭「滅清、剷洋、興漢」及「大漢滅洋軍」旗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廣西會黨大起，勢力幾遍全省，謀與興中會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度督師；徵調及於五省，其嚴重可知。

近數年來，俄國最為不義，東北俄軍不撤，愈增國人敵愾。一九〇二年，上海愛國之士發刊《俄事警聞》，以警惕國人。¹陳天華呼籲各界合力殺退侵犯中國洋兵、改條約、復政權，使中國完全獨立。黃興領導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代表回國請願，北京、湖北學生紛起以應。同年，廣西旅滬紳商憤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亂，聯合各省人士舉行拒法大會。翌年，安徽青年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被捕後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雲南周雲祥組織「保滇會」，反對法人修造鐵路，衆至萬餘。一九〇五年，上海商民因租界巡捕擅拘華婦，會審公堂審理不公，一度罷市。陳天華憤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壯的絕命書，中國留學生

¹一九〇四年改名《警鐘日報》。

全體罷課。至於爲華工被歧視而引起反美運動，更是轟動一時。

華工大批赴美，始於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國爲開發中西部，修築鐵路需要勤勞而工廉的華人甚切，不久增至十餘萬，竟召致美人的敵視，迫害事件達二百六十餘次。一八八二年美國制定限制華工案。一八八五年窩民（Wyoming）州、加州對華工肆行搶掠燒殺，死者數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以十年爲期。期滿（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中國宣布禁約終止，美國不理。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紳商反對與美再訂禁工新約，要求美國於兩個月內改良排華案，公平待遇華僑，否則抵制報復，不用美貨，不用美船，不任美商買辦、通事，不爲美人工作，不入美國學堂讀書。首起響應的爲利害關係特深的廣東、福建商人，上海各幫業、各社團、各學校及婦女代表一千四百餘人，一再集會，認爲華僑遭受苛待爲奇恥大辱，應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實行對美抵制，南至杭州、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西至蘇州、鎮江、南京、安慶、漢口、長沙、重慶，北至濟南、青島、煙台、牛莊、開封、鄭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國各大都市的商、工、學生、婦女以及海外華僑。美國屢次抗議，加派軍艦，歐洲國家誣爲類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經清廷及地方官開導禁止，一年餘後，方告止息。美國的對華貿易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國的工業生產量爲之提高，廠、礦投資均增加二倍，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此後抵制外貨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一種工具。

收回主權運動是愛國心的另一表現。一八九八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一九〇〇年，中國與合興公司所訂粵漢鐵路條約，言明借款不得轉讓（見 296 頁）。第二年合興公司股票大半售與比國，實爲法國所得。法與俄爲一體，中國南北交通將受法、俄宰制。一九〇四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湖南、廣東、湖北紳民爭之最力，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留日學生組織湘粵鄂三省鐵路聯合會，留美的學生王寵惠等復引證法理，指出美政府無權干預。美政府鑒於三省民氣激昂，爲緩和當時的排抵美貨運動，原約終於一九〇五年作廢，從此不

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要收回礦權。

各國在華所營礦產，遍及於黃河、長江各省及西南、東北。一九〇三年起，各省漸行自辦。一九〇四年開始要求收回礦權，謂礦爲民命所繫，如探礦之柄非中國所操，資本非中國所出，一有意外，各國必實行其保護政策。中國人民必須自奮，而且可以自奮，日本對俄即爲其例。一九〇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國福公司的礦權運動同時轉烈，士紳與山西大學及其他文武學堂學生一致表示此事爲「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亡之樞機。」留日山西、河南、陝西學生之激昂亦不稍讓。一九〇六年，李培仁爲此蹈海而死。

在排滿愛國情緒高漲而普遍、青年不惜犧牲性命的情況下，革命的總領導機構乃應運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〇〇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見 344 頁），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固受到梁的影響，但對於首倡革命的孫中山更爲欽佩。孫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不少留日學生自動和他接觸。檀香山早有他組織的兵學會，一九〇三年又於東京設軍事學校，誓詞中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增入「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在內。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是年秋，孫再蒞檀香山，爲文演說，駁斥梁啟超「名爲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爲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爲華僑中的會黨，所

以特別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一九〇四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復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以告歐、美人士，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

一九〇三年有一批排滿的鄂、湘學生被派往歐洲。一九〇五年春，孫中山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餘人願參加革命。東京留學生雖「思想無系統，行動無組織」，而排滿的情緒，則如火如荼，曾在國內起義不成的黃興、宋教仁、張繼等尤殷望孫中山領導。是年七月，孫返東京，受到盛大歡迎。他說中國不必怕各國瓜分，但怕自己不團結，如各省自號召起義，演成紛爭之局，各國將乘而干涉，中國必亡，所以總以互相聯絡為第一義。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會，推孫為總理，加盟者三百餘人，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稍後的日知會的會員。興中會時期，會員以粵籍為主，同盟會則兼有全國人士，以粵、湘、鄂、川籍為多，次為皖、晉、魯、桂、蘇、閩、冀、滇諸省。一九〇六年同盟會訂定革命方略、軍政府組織、及中華民國國號。在軍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與前代不同，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外，尚須改變國體為民主，「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將來治國的大本(政綱)，一為傾覆滿洲政府，寬容滿洲、漢軍人等；二為恢復中華，光復「民族的國家」，歸還漢人的政權；三為建立民國，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國民享有參政權，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四為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地價，歸於國家，由國民共享，鑿造「社會的國家」，使家給人足，無一人不獲其所。措施程序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為軍法之治，破敵之後，軍政府總攝地方行政，掃除一切政治社會積弊。第二期六年為約法之治，將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軍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由約法規定。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軍事行政權，組織國會，政事依憲法行之。

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紀元，各不相屬的革命團體由此統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為同一目標而奮鬥。政綱中的排滿及建立

民族的國家，爲共同要求；推翻專制，國民平等及建立「社會的國家」，尤其鼓舞之力。孫中山成了愛國革命者公認領袖。不及一年，會員達一萬餘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係「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

興中會時代，革命黨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各有報刊，但影響力不算太大。同盟會成立之後，以《民報》（月刊）爲機關報。第一期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孫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今後建國的基本原則。他先就西方的歷史，闡明三者遞嬗演進的必然性，始爲民族主義，繼爲民權主義，二十世紀則爲民生主義擅場的時代。中國遭異族的摧殘，外國的侵逼，及千年專制之毒，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應立即實行。這時的民族主義已非單純的排滿，已兼及對外，不過尚帶有妥協性，如承認已有條約，意在減少阻力。經濟問題亦須及早解決，所以同時又須實行民生主義。歐美人民已困，社會革命爲時不遠，中國爲弭其禍害於未萌，須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學生新創刊的雜誌，有《雲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聲》、《晉聲》等十餘種，專書一百餘種，國內出版的書報亦不在少數。抨擊滿清，鼓吹愛國革命，反抗列強侵畧。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

一八九九年以後的四年，爲梁啟超執言論界牛耳的時代，影響之巨，莫可與京。一九〇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轉變。是年二月，梁遊美洲，仍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無別法。」不數月，忽然說「不敢復倡革義。」十一月，刊登啓事，謂不僅不談排滿、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據他事後解釋，是見於學生因革命思想傳播而常鬧風潮，不欲青年爲破壞之說所誤；二是自由平等之說流弊無窮，秩序一破，苦於收拾；三是國家人民艱窘皆達極點，事機一發，爲人劫持，或至亡國。在美國的見聞，對他亦有影響，選舉競爭不擇手段，

當選者多屬庸材，深嘆共和政體之不如君主立憲。他的富於感情的「流質」性格可能關係最大，「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因為「隨感情而發，」遂與革命黨徹底破裂。

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一九〇三年前，保皇會較居優勢，康在南洋的活動亦頗得手。是年起情勢一變，海內外傾心革命者日衆，如果革命得成，梁將失去重要性。他去美洲的目的在募款，原望「轟轟烈烈再做一場，」以轉移視聽。但是光緒復辟已無可能，他知道要勸捐，就須談革命，否則「有何名目耶？」此時上海《蘇報》已對保皇會抨擊，孫中山旋亦追蹤赴美，揭發梁的虛偽，此可能為梁不使再談革命的又一原因。其次，初倡破壞之時，已說破壞有「無血」與「有血」之分，「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絰而哀之！」可見他所希望的為無血破壞，即立憲，現在不過是返回他向所馨香以祝之途。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〇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〇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民報》創刊時，梁的論調已轉變兩年，急待加以廓清。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四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精衛）、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必致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干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

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三為民權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只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具有共和國民資格，國民的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精神為人類所共具，中國人亦不例外；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較西方為優，土地兼並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軍興之時，游蕩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係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全國土地歸於國有，則全國資本亦歸於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

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一九〇六年七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我報可以相提携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徒焉，不賢於今日曉曉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民報》終不之許。梁說他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三年前他已是革命黨的直接助力，這次論戰才是間接助力，使革命黨有了發抒革命理論的機會，充分說明排滿革命的絕對必要，逼得保皇立憲者無以自圓其說，暴露了他們的弱

點。一九〇六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的事實。¹接着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見385—386頁），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爲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

論辯爲時兩年餘，一九〇七年八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一九〇八年十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爲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爲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一九〇六年十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爲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爲無理由之宗教。」他對梁說，此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議者又目爲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叢〕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孫中山云：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雖是時代人心使然，《民報》之功實不可沒，而《新民叢報》則有如爲叢驅雀。革命黨不僅能坐而言，並能起而行，拋頭顱洒熱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

¹《民報》週年紀念會，到者近萬人。一九〇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爲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爲《新民叢報》血戰之功。但事實全不如此，是年正爲革命黨積極的行動年。

下，有關彼此的信譽至大。

四、預備立憲

君主立憲論的倡導，八十年代以後，漸趨熱烈，開議院以行君民合治的日本制度，是康有為變法的藍圖。一九〇三年，維新派張謇曾游日本，一九〇四年，說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刻《日本憲法》送之內廷。並印行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亦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起以應。有的舉日本對俄戰爭為證，說是俄為西方大國，「竟為日本所大困，種族強弱之說，因之以破，凡我黃人，其亦可以自奮矣。」日本君民一心，是由於立憲。立憲之足以致強，已不容置疑。甚至慈禧看到張謇所進《日本憲法》亦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

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一八九八年十月的上諭，表明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端方所編《勸善歌》，頌揚清朝的種種德政，但未收絲毫效果。為緩和空氣，一九〇四年六月，以慈禧七旬生辰為名，宣布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據說是由於端方的密奏，幕後向端方進言的為梁啟超，但梁並不在赦免之例。

及日、俄的勝負已決，排滿革命的空氣仍在瀰漫。梁啟超認為定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的特效藥。俄國亦因革命而準備立憲，中國「稍有人氣者，其必睠然返視而有所鑒。」張謇亦以革命之說甚盛，懼致成大亂，召來外國干涉，立憲「可以安上全下，」於是再向袁世凱陳說立憲之不可緩。謂「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專制當衆立憲，尚可倖乎？」他希望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完成一部憲法。

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袁與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於十二年後正式立憲。慈禧認爲不妨採摭塞手法。她已年逾七十，十二年後大概已不是她的問題，否則自身亦或難保。¹七月十六日，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鎮國公載澤等三人赴日本、英、法、比，湖南巡撫端方等二人赴美、德、義、奧，臨行，革命青年吳樾對他們行刺，雖然未成，益證立憲確不利於革命，有利於滿清。十一月，慈禧爲進一步表示立憲姿態，命督辦政務處籌定大綱，設置考察政治館，纂訂合乎中國體制的專書。

十二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再度起程，先到東京。端方的隨員熊希齡與梁啓超頻頻接觸，由梁與楊度爲他們草就了所謂考察報告及奏摺，建議以五年爲期，改爲立憲政體。然後去美國、歐洲，一九〇六年八月回國。袁世凱首請實行，先由京官及州縣紳商分別參與地方政務。載澤說是立憲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憲法仿日本，實業仿日本及德國。九月一日，上諭命先議定官制，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再察看情形，以定實行期限。此即所謂預備立憲詔，除了以望梅止渴之技，期收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效外，尙別具作用。

五大臣載澤等在日本所上奏摺，說是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官。回京後，又陳述改革官制的必要，否則唐代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復出現於今日。數十年來，清廷深忌地方權重，準備借立憲的名義，於改定官制時，排擠漢人督撫，集權中央，袁世凱爲第一目標。排袁最力的爲與袁一同參加編訂官制會議的載澤及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滿人。袁不必有滿、漢之見，但載澤輩則以爲可能有如梁啓超所說，在立憲政體之下，漢人在政治上將益居優勢。預定改官制的原則爲將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朝廷。會議之時，袁與鐵良衝突，言官亦

¹ 年來康有爲屢謀暗殺慈禧。

說官制不可一切更張，宜逐漸變革。總司核定的奕劻等探延宕辦法，主先議中央官制。十一月六日頒布，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巡警部改爲民政部，戶部改爲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海軍部、軍咨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改爲法部，大理寺改爲大理院，理藩院改爲理藩部。除外務部外，各部置尙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新任各部主管，計七滿、四漢、一蒙古、一漢軍。各省官制則尙待編訂。終以阻力太大，除學政已於一九〇六年改名提學外，僅將按察使改爲提法使，增設巡警道、勸業道、審判廳。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

革命黨無時不在準備行動。同盟會成立後，更爲積極。吳樾之炸考察政治大臣，海內外爲之震動。孫中山赴南洋策畫，派人赴長江、兩廣、川、滇、天津調查，聯絡學生、會黨，尤注意新軍。一九〇五年，長江各省騷動，或爲反教，或爲抗捐，或爲搶糧。同盟會的劉道一、蔡紹南及長沙學生，運動江西萍鄉、萬載、湖南醴陵、瀏陽的會黨、礦工，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衆至數萬人，東京同盟會會員爭先回國從軍。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倪映典等，有意響應而未果。起事的領袖龔春台稱「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揭示同盟會的政綱，謂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建立共和民國，」「使地權與民平等，」亦有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衆至三萬。雖名號有別，而排滿則一，奮戰月餘失敗，劉道一等在長沙遇害，武昌日知會被封，南京趙聲等革職。革命黨在長江各省的基礎遭到摧毀，但同盟會的聲望則因此大振。

一九〇七年二月以後，江蘇、浙江、安徽民變屢起，情勢對革命黨自屬有利，所以這一年是革命黨舉事最多的一年。六月，同盟會連在潮州發動，均告失敗。光復會的徐錫麟與同盟會的秋瑾分在安徽安

慶及浙江紹興活動，訓練學生，聯合會黨，組織光復軍。¹七月，徐錫麟在安慶舉事，殺巡撫滿人恩銘，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洩被殺，她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中國女子。徐案發，兩江總督端方恐懼地說：「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浙江巡撫及紹興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備受輿論指責。革命黨的行事，震懾了滿清官吏，激動了人心公憤。

一九〇五年孫中山與法人已有聯絡，一九〇七年三月，孫自日本赴越南河內。接近越南的欽州鄉民，組織「萬人會」，號召抗捐。粵督周馥派新軍進剿，孫一面命黃興游說新軍、結合欽州團紳，一面向日本購械，延法國軍官在越南練兵，謀一舉而收有兩廣。九月，欽州革命軍發難，以新軍躊躇瞻顧，未曾響應而失敗。孫又糾合桂邊團勇，十一月，奪據廣西鎮南關砲台，孫偕黃興、胡漢民親來督師，力戰七晝夜。一九〇八年初，孫以河內不便再居，轉往新加坡，命黃興再圖欽、廉，黃明堂經營雲南。三月，黃興入欽州，四月擊敗清軍，轉戰粵、桂邊境，威名大著，五月初返回越南。黃明堂於四月底佔領滇、越交界的河口新街二十餘日。十一月，安徽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徽城外起事，死者二百餘人。²

年餘之間，革命軍屢仆屢起，為對滿清立憲的有力反擊。保皇黨大異其趣，預備立憲詔下，梁啟超十分樂觀，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改官制後，梁的同志雖為沮喪，梁說對滿清改革不必望之太奢，仍須自為。保皇會的名稱太狹，須組織政黨，期促成政府的再度改革。預聞其事的有楊度、蔣智由、熊希齡、徐佛蘇，並暗中聯好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康有為暫不列名。康搶先一步，已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宣布將保皇會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擬別立一會，取名「政聞社」，網羅國中豪傑，統一力量，似乎是有意仿

¹秋瑾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身經庚子、辛丑之變。一九〇四年赴日本，兩年後返國。

²一九一〇年，熊成基在哈爾濱遇害，年三十四歲。

照同盟會的行事。梁之不欲康有爲參加，是因爲康的反動力太大，清政府與革命黨將藉以摧殘新政黨。上海的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對於清廷之預備立憲，頗爲欣喜，十二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梁啓超殷望有湖南才子之稱的楊度參加政聞社，但是楊的雄心萬丈，不甘居人下，一九〇七年五月，在東京自組憲政公會。

清廷大概是震於安徽巡撫的被刺，七月，詔詢各方以預備立憲之方、施行之序。袁世凱奏請昭示大信，採內閣制，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府、州、縣設議事會。九月，宣布設資政院，十月，設諮議局，預籌議事會。立憲派又以爲有了機會。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成立，宣言要救國惟有改造政府，要改造政府惟有求立憲政治的成立，「以有秩序的行動，爲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他們謀與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提攜，並上書訪問日本的資政院總裁溥倫，既欲聯絡袁世凱，又拉攏袁及慶親王奕劻的政敵岑春煊。慈禧決不會忘懷對康、梁的舊恨新怨。是年湖南、浙江士紳請設民選議院，學生開會演說，下詔嚴禁立憲派的活動招來了相反的結果。

政聞社初成立，人事即有弱點，康、梁不能出面，不得已而擁戴一七十老翁馬良（相伯）爲領袖。一九〇八年總社在上海公開活動，與預備立憲公會一唱一和，由各省及華僑代表分別上書，要求於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清廷給他們的初步打擊是懲處政聞社的一位社員。

與政聞社爭寵的楊度宣揚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世凱，亦不利於張之洞。袁向慈禧指該社爲康、梁所發起，圖謀不軌，復以華僑請願書中有請慈禧歸政，遷都江南，改國號爲「中華國」等事，愈招慈禧之恨。八月十三日，政聞社遂被查禁。以各省代表多爲地方負有重望之士，不能不畧示安撫，八月二十七日，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於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九年依然是個漫長的時間。憲法綱要訂明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權，有宣戰、戒

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範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一言以蔽之，不外永保君主地位，極度提高君主的權力。

第四節 滿清的最後掙扎

一、排漢與集權

經過戊戌變法，加深了自慈禧以下的滿人對漢人的仇恨，庚子拳亂又加深了他們對漢人的猜忌。仇恨的是保皇會、革命黨，猜忌的是有權勢的疆吏。劉坤一公然反對廢立，竟敢與朝廷立異，南省的中立雖然為滿清保全了半壁江山，同時亦證明督撫確是不聽朝廷號令，以致與敵人聯通。但時勢所迫，對於地位已固的劉坤一、張之洞不得不曲意籠牢，對於名噪一時、實力已具的袁世凱，不得不授以畿輔重任。袁任直督二年，連遭彈劾，初指他派餉練兵，恣意無厭，有「帝制自為」之嫌。繼說他權勢過重，為禍亂之源。袁請辭各項兼差未准，維護他的為慶親王奕劻。跟着又有御史直接彈劾奕劻貪黷。在中央與奕劻對抗的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加上兵部尚書鐵良，在地方與袁對抗的為兩廣總督岑春煊。

奕劻、袁世凱認為他們之一再被劾，與瞿鴻禨、岑春煊有關。一九〇六年，岑被調職，但袁所轄北洋新軍六鎮中的四鎮亦收歸陸軍部，雙方的傾軋正式揭開。第二年，瞿、岑失敗，¹袁與張之洞均內調為軍機大臣，袁主外務部，張管學部，奕劻的權位如故。慈禧顯係利用政

¹庚子慈禧出亡，岑春煊區駕有功，歷官巡撫、總督，為袁世凱、奕劻所忌。一九〇六年九月，岑左遷雲貴總督，不肯赴任。一九〇七年五月，改授郵傳部尚書，面劾奕劻，排去奕劻的親屬郵傳部侍郎朱寶奎。接着袁的私人黑龍江巡撫段芝貴及奕劻之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亦因瞿鴻禨系御史之劾撤革。時廣東多亂，奕劻謂非岑春煊不足鎮懾，再出岑為兩廣總督。慈禧以奕劻不理於眾口，意欲去之，密商於瞿鴻禨，事為外人所聞。瞿曾請赦免康有為、梁啟超，奕劻乘機誣以謀翻戊戌舊案，正中慈禧之忌。六月，奕劻、袁世凱使人參瞿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當日瞿被開缺。奕劻辭軍機大臣，袁稱病乞假，均不許，瞿系言官劾袁權重勢高。岑出都南下，逗留上海，負氣不赴廣州，袁系言官劾其驕蹇不臣。兩江總督端方承袁之命，謂岑與康有為、梁啟超交結。八月，岑罷職，九月，袁內召。朋黨之爭，告一段落。

爭奪漢人之權。是後奕劻與袁仍不斷被參，並指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直隸總督楊士驥、四川總督陳夔龍爲袁的黨羽，獨不及兩江總督端方，大概因爲他是旗人。

光緒一生受制於慈禧，潦倒困頓，戊戌後，有如囚犯，愁病交集。一九〇八年六月，虛損益甚。時慈禧亦病。「有譚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大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一月初，光緒、慈禧病劇，十三日，慈禧命將醇親王載灃之子，年甫三歲的溥儀在宮中教養，授載灃爲攝政王。十四日下午酉刻，光緒卒，年三十八歲，由溥儀繼統，載灃監國。第二天下午未刻，慈禧卒，年七十四歲，距光緒之死不過二十小時，有謂光緒爲慈禧謀害，有謂爲袁世凱毒死。

溥儀的年號爲宣統，尊光緒皇后爲隆裕皇太后，大政由載灃裁決。十二月，立禁衛軍，載灃自行統轄，派貝勒載濤、毓朗爲訓練大臣。兩週後，即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凱開缺，踉蹌出京，返歸河南彰德。載灃原擬置袁於死，賴張之洞反覆開陳，始獲倖免，怕的是北洋新軍不穩。據說光緒恨袁入骨，及病將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隆裕太后與光緒有夫婦之誼，與載灃有手足之情，親貴載澤（妻與隆裕爲姊妹）、載濤、載洵、毓朗、善耆、鐵良輩久欲去袁，保皇黨又暗事運用。慈禧死後，梁啓超致書載灃，並與康有爲通電，謂：「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爲罪魁，乞誅賊臣。」謠傳袁已被處死。經過四十多天的醞釀，袁終遭放逐。不久徐世昌、唐紹儀內召，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休致。

康、梁派對於袁的罷斥自然大快，深佩「監國英斷」。梁函善耆，請再明正袁的罪狀，宣布朝廷勵精圖治與民更始之意，革命黨人亦將歸心。他所殷期的爲赦免政治犯與開放黨禁。載澤竭力阻撓，隆裕亦云光緒晚年的不幸爲康、梁造成。皇族親貴所不忘的是如何集權於滿人，尤要掌握軍權。設立禁衛軍後，一九〇九年七月，宣布皇帝自爲海陸軍大元帥，由攝政王代理，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¹載洵、薩鎮

¹即參謀本部，一九一一年改名軍諮府，仍以載濤、毓朗爲大臣。

冰充籌辦海軍大臣，擢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排漢最力的良弼爲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一九〇九年九月，命陸軍部尙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十二月，設海軍部，以載洵爲大臣。於是陸海軍悉歸載濤、載洵兄弟主管。

軍機處仍是行政中樞，過去的大臣大都六人，滿、漢各半。袁世凱罷，接替的爲那桐。一九〇九年九月，張之洞卒，漢大臣的地位愈輕。一九一〇年七月，鹿傳霖卒，軍機大臣僅有奕劻、那桐、毓朗、徐世昌四人，徐爲唯一的漢人。一九一〇年，奕劻又爲御史所劾，上諭謂「親貴重臣，不得任意詆誣，」原參的御史落職，激起都察院全體公憤，聯名抗爭無效。

二、立憲派的請願

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成立不久，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相繼出現，其他類似的社團，不下數十，雖然被禁，仍暗中活動。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成立，議員多爲科第或留日學生出身，及曾任官吏的士紳，立憲派聲勢大增，上海、北京及各大都市均有他們的宣傳機關。在張謇策動之下遂有諮議局的三次請願。張謇頗有時譽，重要督撫多和他相識。他任江蘇諮議局議長後，邀請十六省諮議局代表會於上海，組織諮議局請願聯合會，要求速開國會，由直隸孫洪伊領銜。請願團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到京，上書之外，遍謁王公大臣，請於一年內召開國會。所得的答覆是國民知識不齊，俟九年預備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再定期召開。代表不滿，準備擴大組織，再度請願，先後成立「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國會速開期成會」。六月，第二次請願，除了諮議局外，有各省商會、教育會、政治會社、旗籍紳民及華僑代表，表示速開國會是國民的公意。清廷的答覆如舊。請願代表定於明年二月，作第三次請願。時日、俄第二次協定及密約成立，英國抗議中國派兵入藏，日、韓訂立合邦條約，大局愈爲危急，請願代表決提前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在北京集會。

第三次請願，不僅要求速開國會，並要求組織責任內閣，參與的代表較第二次更爲廣泛，各省督、撫亦預通聲氣，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學生罷課響應。十月，十六省督、撫聯名電請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同月，資政院開幕，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不僅民選議員支持請願代表的主張，欽選議員亦多贊同。「各省督撫連翩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爲之震悚，始翻然改圖。」十一月四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之期，縮短爲六年，一九一三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重加釐訂，預行組織內閣，編訂憲法，各省代表應即日散歸。除江、浙的代表外均甚失望，湖南譚延闓、湖北湯化龍、四川蒲殿俊及孫洪伊等，最稱激昂，輿論指斥朝廷「蔑視代表，直爲蔑視四萬萬人，」革命黨益得利用時機，相爲鼓煽，……顛覆政府。請願代表留京不去，誹議朝政，抨詆親貴。十二月十八日，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奉職無狀，應迅行組織內閣。攝政王援據欽定憲法大綱不許。資政院二次彈劾，攝政王置之不理，遷怨於請願代表。二十四日命先將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撫彈壓，如有違抗，查拏嚴辦。一九一一年一月，將號召各省罷學，要求速開國會的全國學界同志會會長溫世霖遣戍新疆。

請願不准，立憲派已無可再忍。高壓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議相機反抗，遇有可以發難之事，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他們的公開報告亦說國勢危殆，外有列強環伺，內則昏老老臣把持（指奕劻），將有亡國之禍，今後「非一請願書可以力爭，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利圖之，」暗示和平要求絕望，惟有別探有效途徑。梁啟超在三次請願之前，已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一九一六）召集國會爲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現在更爲憤懣，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併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九一一年初，外有日、俄對錦陵鐵路的抗議，俄又借口陸路通商問題提出無理要求，緬甸英軍強佔滇邊片馬，漢口英租界巡捕槍殺

華人；內有廣州將軍被刺。四月，廣州革命黨的起義，更使滿清當局膽悸（見393—394頁）。五月八日，頒布內閣官制，設立責任內閣，裁撤舊內閣、軍機處，以示履行上年十一月四日的諾言。新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二人，各部大臣十人，計漢人四名，滿人八名，蒙古一名，滿人中皇族又佔五名，人稱爲皇族內閣。¹奕劻聲名狼籍，餘或昏庸無知，或爲纨绔少年，攝政王優柔而寡器識，不到半年清的政權即告瓦解。

三、愈挫愈堅的革命軍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革命黨至少八次起兵，雖均告失敗，然前仆後繼，意氣彌厲，且「經一次失敗，多一次進步。」檢討過去的得失，不再作無把握而不足制滿清死命的零星軍事行動。加之官方搜捕益嚴，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生活艱難，一部爲立憲運動所迷惑，日本、香港、越南不准孫中山居留。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復對他不諒，力事詆譏，引起同盟會的內訌，所以一九〇九年革命氣氛至爲消沉。梁啟超曾欣喜地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汪兆銘於憤激之餘，認爲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偽立憲，昭雪對黨人的誣誣，振起消沉的人心，決從事暗殺，選擇的對象爲足以轟動內外的監國攝政王載灃，使國人知道立憲，絕不能引革命風潮。一九一〇年四月，汪以事洩被捕，清廷恐與革命黨結不解之仇，處以永久監禁，心理上已爲革命黨所懾伏。

一九〇九年春，孫中山以不爲暹羅、新加坡所容，前赴美國籌款。黃興、胡漢民留香港，主持國內計劃。清季之派遣留學生和廣興學堂是爲改進軍事、政治、教育，鞏固權力；編練新軍是爲「防家賊，非

¹漢人爲協理徐世昌，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蒙古爲理藩部壽春，滿人爲總理奕劻、協理那桐、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部符昌、農工商部溥倫，皇族爲奕劻、善耆、載澤、載洵、溥倫。

爲禦侮。」結果不少學生與新軍同情革命，參加革命。同盟會與新軍早有關係，新軍第一次採取行動爲熊成基在安慶的舉事。趙聲、倪映典在江南被撤差後，南來廣州，與黃興積極聯絡新軍，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發動，當天失敗，倪映典以下死者百餘人，經年的經營，又付東流。

孫中山在美得敗耗，趕往檳榔嶼，約黃、趙、胡來會，決再向華僑募款，捲土重來。¹全盤計劃仍爲攻奪廣州，得手後，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爲黃在湘、鄂，趙在江南各有潛在力量。²

孫中山以南洋各地不能久留，再赴歐、美，由黃興等於香港設統籌部，廣州亦分置機關，青年婦女參加者不少。擔任發難的「選鋒」數百，大都爲來自各省及海外青年，以廣東、福建籍居多，四川、廣西、安徽、江蘇次之，有學生、教員、新聞記者、軍人、工人、農人、商人，均抱必死決心。林覺民、方聲洞的遺書，尤爲悲壯排側，一字一淚。

準備已近完成之時，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忽有華僑青年溫生才單獨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廣州加緊戒嚴，起義計劃改變。最後定於四月二十七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路發動。黃興親率一百七十餘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總督張鳴岐雖逃，水師提督李準的大隊已至。黃興苦戰一晝夜，所部大半捐軀，第二天趙聲、胡漢民統二百餘人趕到，然已無及。是役革命黨殉國遇害者八十六人，皆爲成仁取義的民族英秀，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遺體葬於黃花園。黃興痛不欲生，趙

¹一八九五年之役，除前香山及香港華僑捐助萬餘元外，餘爲孫所自籌。一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各役共費約二十萬元，多爲南洋華僑及浙江張人傑所出，此次約募得十九萬元。

²武漢、長沙方面的主持人爲宋教仁、居正、孫武、譚人鳳、焦達峯，上海方面爲陳其美。此外，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有不少與同盟會有關的地方性革命團體出現，如陝西的「同盟堂」，貴州的「科學會」、「自治學社」，安徽的「信義會」，湘、鄂尤多。廣西、四川、雲南、直隸、江蘇、浙江、福建、東北的革命黨人均在聯絡新軍、學生、會黨。一九一〇年，長江各省民變及兩廣、川、黔、滇、閩叛亂蜂起，形勢確有可爲。

聲不久病卒。但久蟄的人心則因此次的壯烈犧牲而大為興奮。

四、求生與抗捐搶糧

清季財用入不敷出，辛丑之後愈甚，惟有多方羅掘，加稅派捐，復三令五申，嚴飭籌解。在政府威信掃地，民不聊生，反感日熾之時，自易激起事變。一九〇二年爲了反對分派賠款，各省屢有聚衆抗拒之事。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爲了反對舉辦新政的苛細雜捐，復有搗毀官署及罷市之事。一九〇六及一九〇七年爲了飢饉無食，搶米之事特多，最富庶的江、浙兩省，約達三百數十次，至一九〇八年不息。同時學堂及警察、釐金、郵政、鐵路等局，常被搗毀，內河輪船連遭截劫。

尤值得重視的爲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全國性的民變，此與清廷的財政措施大有關係。此時歲出超過歲入約八千萬兩上下，其中六千萬兩是由於對外賠款。一九〇九年一月至四月，陸續頒行「清理財政章程」，「清查財政處章程」，派置各省財政監理官，正遇到米穀歉收，以華東爲甚。一九一〇年夏秋之交，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大錢莊及最大的源豐銀號的倒閉，亦有影響。兩年之內，江蘇、浙江、安徽的暴動，遍於各地，不下二百餘起。

一九〇九年以江西爲烈，一九一〇年以湖北、湖南爲烈，長沙事件，更是震動內外。湖南災情特重，米價飛揚。四月，長沙飢民請願減價平糶，鬧開巡撫衙門，搶劫米店，警察武力彈壓。飢民縱火燒巡撫衙門、稅局、官錢局、大清銀行，波及洋行、教堂、領事住宅，軍警開槍，死傷者數十人。詔將巡撫岑春煊革職查辦，其他文武官員及團集居奇、挾私釀亂的士紳，均遭懲處。但動亂仍然不止，湘潭的「神拳黨」公然與官兵接仗。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以鄂督爲岑春煊及士紳曲脫，要求覆查。上諭責其不安本分，如再借名抗阻地方公事，從嚴參撤，民氣愈爲不平。同年江北安徽飢民一再滋事。

一九〇九及一九一〇年，直隸以不堪苛捐，時有暴動，有衆至數萬者。一九一〇年河南不少縣署被人民搗毀，有衆至二萬人者。山西人民因抗拒官兵，死傷動輒逾百。山東萊陽事件最爲慘重：五月，萊

陽四鄉「聯莊會」要求清查備荒積穀，停止苛斂不遂，領導人被拘。六月，憤而焚燒鄉董房屋，包圍縣署。七月，官兵恣意燒殺，鄉民數萬圍困縣城，官兵開砲轟擊，傷亡一千餘人。一九一一年豫東各地荒歉，餓死十餘萬口，豫南飢民擾及鄂北。

一九一〇年廣東人民因反對調查戶口，聚眾滋鬧，經月不止，連州城池被佔。廣西全州不靖。四川、雲南縣城失陷或被圍。貴州抗拒官兵案件達七十餘起。奉天及新疆亦有類似之事。

總之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的民變成了普遍性，或為抗捐，或為搶糧，總不外為求生存，雖非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其不滿現狀，仇視政府則一，而以長江各省為最。為了維護權利，引起對外運動，至是亦高潮再起，對革命黨而言，均屬有利情勢。

五、護權與爭礦、爭路

庚子之後，中國人的愛國心及民族意識與日俱張，對內是要改造或改良政治，對外是收回喪失的利權。一九〇七年以來，日、俄步步侵畧，各國分贓勾結，尤為強烈的刺激。一九〇八年日本輪船「第二辰丸」因偷運軍械，在廣東領海被扣，清廷反答應道歉、賠款、懲官。上年廣東已有「國權挽救會」的組織，至是上海、廣州實行抵制日貨，為時將近一年，並舉行國恥紀念會。一九〇九年葡萄牙要求澳門擴界，粵人開會反對，上海亦有反對英人推廣租界之事。

收回路權運動，一九〇五年已稍有所成（見377—378頁）。此後在礦權方面，對於各國的要求，不只民間反對，政府亦不肯輕讓。山西自設礦務公司，紳商堅持撤廢英國福公司的辦礦合同，於一九〇八年實現。是年法國承辦的福建礦務合同期滿，亦收回自辦。一九〇九年，河南紳商組織中原公司，以抵制福公司，結果改為雙方合營。安徽各界要求取消英人開採皖南銅官山礦合同，召開抵制大會，於一九一〇年贖回。一九〇九年山東保礦會收回德人的五處礦權，一九一一年又收回膠濟線、膠沂（沂州）線、津浦線礦權。英人承辦的四川江北鹽煤礦於一九〇九年收回，法人在雲南的礦權於一九一一年收回。被英

人侵佔的開平煤礦，未能全部收回，一九一二年議定與灤州礦務公司聯合辦理。收回礦權已蔚為一種國民自覺運動。

爭路運動更是如火如荼，由對外變為對內，成了民間與政府之爭。自粵漢路收回商辦，各省紛紛自設公司，自辦本省鐵路。一九〇七年十月，蘇浙鐵路公司請廢除與英人所訂的蘇、杭、甬鐵路借款合同，組織「國民拒款會」，東京留學生及上海、杭州、蘇州士紳分開蘇浙鐵路拒款會。英公使抗議，上諭命「嚴防亂黨從中煽惑。」商辦鐵路頗難籌集鉅款，政府當局又思於借款中漁利，限令各省將已准各路，如期完成，否則由郵傳部另籌辦理，最重視的為粵漢、川漢鐵路。一九〇八年派張之洞督辦粵漢及川漢鐵路，次年，與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湘、鄂境內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美國跟着亦請參加。廣東鐵路公司股東堅持自辦，張之洞責其阻撓，命予看管，此為政府採取強制政策的初次表現。張去世後，兩路歸郵傳部接辦，湖南鐵路公司及諮議局繼起反對借款，湖北成立商辦鐵路協會。一九一〇年湖北獲准商辦，英、法、德抗議，並與美國組織四國銀行團，一致要求履行原訂合同，湘、鄂力持不可。同時河南亦反對借款修築開封至徐州鐵路，蘇、浙的拒款運動再起，攻訐盛宣懷尤力。

盛宣懷早年受知於李鴻章，歷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後因張之洞之力，經理漢冶萍公司，督辦鐵路總公司。一九〇三年後，盛的權力大部為袁世凱所奪。一九〇六年，鐵路總公司復為唐紹儀所取代，改置鐵路總局，由梁士詒主之，盛大為失意。江、浙爭路之時，盛謀再起，力主借款。一九〇八年，清政府與英訂立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授盛為郵傳部侍郎，以輿論不容，未克到任。載灃監國，親實用事，極欲假借款以歛殖私財，並用盛以抗袁世凱系。盛得度支部尚書載澤之助，一九一〇年八月，遷郵傳部本官（侍郎），兼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準備與四國銀行團談判。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斥盛為蘇浙鐵路罪魁禍首，不應回任。盛為固寵，益與親貴結納。一九一一年一月，繼唐紹儀為郵傳部尚書，三月，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鐵

路公債借款一千萬日元，四月，載澤與四國銀行團訂立整頓幣制、興辦實業、推廣鐵路借款五千萬元。五月五日，給事中石長信疏陳商辦鐵路弊害，主幹路國有，支路民營。八日，奕劻的新內閣成立，盛仍長郵傳部，決定執行幹路國有政策。九日，上諭宣布，所有各省商辦幹路由國家收回，「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明知勢必引起反對，決心施以高壓，既不考慮各方民情久已洶洶，又不知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大動亂隨時可以爆發。

幹路分東西南北四線，川漢路為西幹，粵漢路為南幹的一段，實際要收歸國有的即此兩線，派端方為督辦大臣。五月二十日，盛與四國銀行團成立湖、廣鐵路借款，建築湘鄂境內的粵漢線、川鄂間的川漢線。截至此時，廣東所集股本約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粵境粵漢鐵路需款的半數；湖南所集約五百萬兩，相當湘境粵漢鐵路需款的五分之一；四川所集約一千六百萬兩，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需款的六分之一；湖北所集之數尤少，約百萬兩。如要使粵漢、川漢兩路完成，不知待至何年。川、湘為了集股，有米捐、房捐，並抽收租股（按畝收租股）、鹽股、茶股、土藥（鴉片）股，貧農、小戶皆所不免，鐵路公司職員復侵蝕挪用，而以川路為最，更予政府以口實。鐵路國有政策未可厚非，但在當時則不得人民的諒解，一以列強投資鐵路為一種侵畧行為，二以人民對滿清毫無信心，三以紳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剝奪，四以革命黨及請願失敗的立憲派正在俟機而行，於是反對的呼聲隨之大起。

反對最力的當然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盛宣懷為眾矢之的。立憲派控制的諮議局與鐵路公司，開始尚採和平方法，但請收回成命。湖南、四川當局，亦謂商民力能自辦，不甘借債，請暫緩接收。詔嚴行申飭，「如有匪徒煽惑，擾害治安，格殺勿論。」立憲派中的溫和派張謇面勸載灃、載澤、盛宣懷勿操之過急，不為採納，以為兵力可以鎮服。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以粵人不用官發紙幣，紛兌現金，擬擠倒大清銀行，迫使政府讓步，載灃命粵督拏辦，重言「倘敢糾眾作亂，格殺勿論。」旅美廣東華僑，亦還以「有劫奪商路者，格

殺勿論。」留日學生聲稱「路存亦存，路亡亦亡。」

四川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等一向主張川路自辦，該省鐵路董事會實際亦受他們控制。請願立憲被拒，他們已十分憤慨，對於鐵路國有，更認為是倒行逆施。郵傳部所定的收回四省鐵路公司股票辦法，尤令他們不平。湖北湯化龍請將民股作為路股，許商民以稽查財政權，為盛所拒，只准由國家鐵路股票換給。湘鄂路股照本發還，廣東路股發六成。川路獨異，實用工料之款四百餘萬兩發給國家股票，現存租股七百餘萬兩或入股、或與實業聽便。川路股東拒不同意，六月組成「保路同志會」，要求將股本照數發還，引光緒上諭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兩語為據，痛斥川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擅允郵傳部接收。盛及端方聲言如將已用之款及虧損之數照數發還，必將再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作抵，川人既怒且懼。盛與端方輕信川中密報，謂川人情緒已漸收縮，不必多慮。同時湘鄂兩省的態度亦趨緩和，廣東部分紳商被迫出走，清廷決心以威力對待川人，命新任川督趙爾豐擊辦首要。八月奏請將李稷勳撤職，以平眾怒，北京不許。

川人忍無可忍，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舉行保路大會，議決罷市，罷課、停納稅捐，革命黨及哥老會領導各州縣響應。趙爾豐連電告急，謂羣情疑憤，如不准所請，變生頃刻，全國將受牽動。九月一日，全省實行抗糧抗捐。二日，清廷命端方帶兵前往。五日，成都發現「川人自保商權書」，趙亦認為「勢必剿辦」。七日，誘拘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及保路會會長、股東會會長、鐵路公司董事十餘人。哥老會合組的「同志軍」數萬，包圍成都，新軍將校亦有人加入，於是川人由和平爭路，變為武裝反抗。詔命將首要正法，加派陸、海軍入川，命曾任川督的岑春煊會同端方辦理剿撫事宜。經過十餘日的攻擊焚殺，趙爾豐報稱局勢畧定，意在阻止岑春煊、端方前來，實際上「成都府屬各縣無地不匪，各州縣紛紛告警」，官軍屢敗，防營譁變。十月初，嘉定府及距成都數十里的灌縣等城為同志軍佔領，不數日，武昌革命隨之而起。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第一節 革命軍的大起

一、湖北的軍中革命運動

聯絡會黨、俠士、綠林、防營，一向為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及新軍成立，爭取更力。新軍以北洋為大，袁世凱視為禁嚮，不容異己插足，革命黨人不易滲入。其他各省督撫，不若袁用心之深，需要新的軍事人才正急，不得不多方培植羅致，對於留學日本者，不惜從優位置。中央陸軍部、軍諮府同事延攬，其中屬於革命黨及傾向革命的頗不乏人。

湖北為僅次於北洋的新軍重鎮，張之洞選派前往日本習兵的學生頗多，¹畢業士官學校的吳祿貞最有才氣與革命熱忱。一九〇三年返鄂，深受張的器重，委以將弁學堂總教習、護軍全軍教習、武普通學堂會辦，因得乘機宣傳。一九〇四年六月，湖北最早的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成立，繼之為一九〇六年二月的日知會，²加入者大都為鄂籍的士兵、學生，次為湘籍。科學補習所準備響應在長沙起事的華興會未成。日知會與同盟會互通聲息，準備響應起於湘贛之交的革命軍，亦歸失敗。約在同時或稍後，其他大小革命團體不下二十餘。

張之洞提倡新教育最力，湖北、湖南學堂日增，學生出路發生問題，從軍蔚為風尚，有的是為了糊口，有的是為了救國。救國必須革命，革命需要實力，投身營伍，運動軍隊轉為己用，實為最直接而有效的捷徑。一九〇八年三月，日知會舊人聯合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分子，

¹一八九八年有二十四人，以後續有派遣。

²日知會先已存在，主幹多科學補習所舊人。

發起「湖北軍隊同盟會」，七月，正式成立於武昌。他們認為軍官多缺乏冒險精神，因專事招納士兵，會員約四百餘人。為避免官方疑忌，五個月後，改稱「羣治學社」。一九一〇年四月，長沙飢民暴動，羣治學社擬乘機起事，以防範綦嚴而不果，遭受頓挫。同年八月，重整旗鼓，嚴密組織，再易名為「振武學社」，社員二百餘人。不久風聲外洩，復遭官方壓迫，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次易名為「文學社」，以示無政治意義，蔣翊武為社長，漢口《大江報》為言論機關。兩個月內，社員至三千人，不僅在湖北新軍中的勢力突飛猛進，且益為統一。

另一重要團體為一九〇七年四月在東京組織的「共進會」，以「共拼死力，有進無退，取回中國，仍為漢人作主」為號召，會員十九為同盟會的種族主義者，主急進力行，文學社的社員以來自湖北、湖南者為多，共進會的會員亦以此兩省人士為重心，此外為四川、江西、安徽籍，一九〇八年，積極向鄂、湘活動，設總機關於漢口、長沙，主之者為鄂人劉公、孫武、湘人焦達峯，交結會黨及山澤豪帥。一九一一年初，有感於會黨品類不齊，器悍不受羈勒，發難易，而成功難，新軍文化程度較高，對於革命主義認識較為正確，訓練、紀律、實力均非會黨所及，遂改向新軍活動，會員達二千人。共進會的領導人，有的曾參加過湖北各革命組織，有的與文學社社員相識，彼此目的相同，照理似應攜手，但互相競爭仍所不免。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革命黨舉兵十一次，起於長江流域的三次，即湘、贛之交的醴陵、瀏陽、萍鄉之役及兩次安徽安慶之役，其餘六次起於廣東，一次起於廣西邊境，一次起於雲南邊境。一九一〇年二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同盟會的湘、鄂領袖，主張今後應力事北圖，不應專力廣東，邀約十一省分會會長集議。宋教仁謂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有北京，然後號令全國。中策為在長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為據有邊地，然後徐圖進取。結果採取中策，因為革命黨在長江流域有相當基礎。湖北居中國之中，宜先倡義，由湖南、四川響應，以固上游，為湖北後援；再由山西、陝西繼起，斷京漢路，阻清軍南北交

通；長江下游並舉，控制長江，封閉海口，使敵方軍艦孤立。他建議同盟會組織中部總部，作為統籌機關。後來的發展大致一如他之所說。十月，宋與于右任在上海發刊《民立報》，對於長江各省的革命宣傳，收效甚偉。

一九一一年，同盟會準備再於廣州發難，俟得手後分道進向長江，命鄂人居正，湘人譚人鳳前往佈置，湖北革命黨至為興奮。是年五月，得知廣州起義復告失敗，共進會不為稍餒，照舊進行，計劃聯合文學社，以武昌方面為主力，由湖南響應。文學社在新軍中的勢力大於共進會，自視不免頗高，原則上雖允與共同行動，惟未定具體方案。同盟會亦以廣州失敗，益認長江革命的重要。七月，宋教仁、譚人鳳及浙江陳其美領導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決定於武昌發動，與共進會、文學社的經營相配合。同時發布宣言，指出過去革命黨之不能戰勝滿清，由於「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所以屢起屢蹶。」此後須聽命總部，不輕易一發，培元氣，養實力，同心同德，共造時機。

爭路問題初起，宋教仁在《民立報》猛烈攻擊清政府假國有政策之名，以圖中央集權，暗中漁利，不惜舉湘、鄂路權付與外人，使為東三省之續，湘、鄂人必須自救。四川風潮擴大，宋又勸勉川人，勿規規於消極的爭路，應積極的為全國人民請命，將專制惡毒一掃而盡。湘、鄂、粵人當同聲相應，翻然而起。八月，同盟會中部總部命文學社與共進會實行聯合。黃興先已請孫中山早籌巨款，以謀響應川人。及知湖北運動新軍已有成效，弦滿待發，乘路潮洶湧，倚為主動，確有把握。一旦佔領漢陽，「兵工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虞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馳檄可定。……今既有此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皖、陝、蜀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勢可不難一舉而定。急宜乘此機會，猛力精進，較之在粵發難者，事半功倍。」在革命黨看來，武漢舉事的有利條件俱備，主要是從軍事上着眼。

二、武昌新軍起義

湖北新軍有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約共一萬七千人，加入文學社、共進會及已有聯絡的約六千人。一九一一年八、九月之間，爲鎮壓四川爭路風潮，新軍被調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陽、岳州的近九千人，留守武漢的約八千人，其中約有半數與革命黨保持關係，就比例上說，情勢反於革命黨有利。時全川有如鼎沸，武漢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盛傳「八月十五（西曆十月六日）殺韃子。」革命黨盱衡全局，湖北舉事不宜再待。九月十六日，文學社、共進會集議，實行合作，派人赴香港、上海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推文學社蔣翊武爲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劉公、孫武分任軍政府總理、參謀長。二十二日，武昌一度兵變。二十四日，城外砲兵暴動，謠言愈熾，外國教士謂不久將有更大事故。同一天，革命黨決定於十月六日發動。北京密令湖廣總督瑞澂防範，¹瑞澂亦得相同報告，下令戒嚴，兵艦游弋江面，新軍彈藥被收，革命黨不克如期行事。

十月九日共進會首要在漢口俄國租界裝製炸彈，失慎爆炸，機關被俄國巡捕破獲，名冊、文告、旗幟、印信悉被搜去。蔣翊武即日在武昌發布命令，定於夜十二時起義。同日，武昌文學社亦被破獲，捕去三十餘人，內中三人於次日遇害，²列名文學社、共進會的新軍士兵人人自危，不得不死中求生。當晚七時，第八鎮工程營在武昌城內發難，³先奪軍械庫，再迎砲兵入城，進攻總督衙門，參加者約二千人。瑞澂及第八鎮統制張彪相繼逃亡，一夜之間，武昌全城爲革命軍佔領。時爲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八月十九日。

革命黨機關連遭破獲，領導人星散，參加起義的資望不足，成了羣龍無首的局面，不得不另推戴一有資歷的湖北人出而主持。初屬意於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但他素與革命無涉，湯亦自稱不諳軍事，應於

¹瑞澂爲鴉片戰爭時琦善之孫。

²三人爲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

³首先開鎗者爲熊秉坤。

軍人中擇一爲衆所信仰者出任，方可抗拒南來清兵，易得他省響應。於是強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八）爲鄂軍都督。黎出身天津水師學堂，參加過甲午中日海戰。其後追隨張之洞，改入陸軍，去日本考察過三次。他雖非革命黨人，但有其地位，復得軍心，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十一日，黎元洪以鄂軍都督府的名義，昭告此次起義，爲對滿清的民族革命，以期永建共和政體。湯化龍聯合各界，以湖北諮議局、教育會、武昌商會的名義，呼籲各省奮起。兩天之內，光復漢陽、漢口，形勢大爲穩固。

十月十二日，革命軍擴編爲步兵四協（旋增至八協），另有馬、砲、工程輜重兵，省庫有現金四百餘萬元，財政頗稱充裕。同日，對外聲明，以往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擔任，各國人民財產與既得權利，一律保護，毫無排外之意。十月十七日，鄂軍都督府組織法與鄂州約法分別公布，以都督府爲軍政府，孫武長軍務，當權的多爲革命黨人，湯化龍長政事，所用多爲與立憲派有淵源的士紳。鄂州約法，規定人民自由權利與義務，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可視爲民國憲法的先聲。

十月十六日，漢口革命軍進攻，十月十八日，各國總領事布告中立。革命軍「雖無指揮，亦各自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毀拆鐵路者，指不勝屈，甚至有婦孺親送麵包茶水入陣。」十九日，敗南來清軍。黎元洪始知時機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

三、十四省獨立

武昌革命是由新軍先發，諮議局附從，繼起各省，大致相同。新軍所恃的是實力，諮議局憑藉的是政治社會聲望。諮議局議員一向多屬立憲派，張謇領導的一支較爲溫和，梁啟超領導的一支較爲急進，聲勢較張謇爲大。張謇與袁世凱爲近，希望他東山再出，同時和皇族載澤通聲氣。梁與載濤爲近，希望開放黨禁，由梁或康有爲執政，爲載澤及隆裕太后所壓制。三次國會請願不成，橫受摧殘，梁派遂萌推翻現政府之念，相機與革命黨合作。

湖北、湖南的革命運動是不可分的。策動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不少爲湘籍。十月二十二日，焦達峯與陳作新在長沙實行響應，驅逐湖南巡撫，分任正、副都督，諮議局議長譚延闓（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爲參議院院長。焦、陳少年氣盛，爲士紳所不滿，譚冲和中正，久負時譽。十月三十一日，長沙兵變，焦、陳遇害。譚出任都督，與各方均稱相得，湘局漸趨穩定，武漢無後顧憂。

與湖南同日起義的爲陝西，參加者有新軍，有陸軍學生，有會黨，有諮議局副議長，都督爲新軍管帶張鳳翽。駐防旗人抵抗兩日，將軍以下數千人被殺。

江西九江於十月二十四日起事，新軍標統馬毓寶爲都督，長江交通被阻。三十一日，南昌諮議局及紳商學界亦宣布獨立。巡撫出走，都督初爲新軍協統吳介璋，巡防營、會黨不服，一再易人，最後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歷任軍職的革命黨人李烈鈞所得。

山西太原於十月二十九日起事，巡撫被殺，諮議局推標統閻錫山（一八八三至一九六〇）爲都督，亦爲士官學校畢業的革命黨人。十二月，清軍攻入山西，閻北走綏遠，翌年重返太原，自是統治山西達三十餘年。

十月二十七日，雲南騰越獨立，三十日昆明省城繼起，領導人爲新軍協統湘人蔡鐸（一八八二至一九一六）、標統羅佩金、前講武學堂總辦李根源，雲貴總督出走。蔡任都督，羅任軍政部長，李任參議院院長。蔡曾受業於梁啓超，但與革命黨頗近，羅、李隸同盟會，三人爲日本士官學校同學。

貴州於十一月四日獨立，領導者爲籍隸同盟會的「自治學社」社長張百麟，「憲政預備會」亦預聞其事。諮議局推新軍教練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楊蓋臣爲都督，張百麟及憲政預備會首領爲樞密院正副院長。立憲派與革命派水火，哥老會尤爲囂張。蔡鐸派唐繼堯率滇軍前來，奪得了都督。據云，梁啓超曾命蔡鐸進取四川、貴州，蔡亦欲使滇軍向外發展，以安定內部。

江蘇的響應以上海爲早，事在十一月三日，領導人爲留學日本的

革命黨人陳其美。革命軍有了上海，也有了餉源軍火。同月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從立憲派之請，在蘇州獨立，他是第一個參加革命的滿清疆吏，張謇實有促成之力，目的在牽制革命黨。接踵而起的為鎮江等處，而以南京的關係為大。十一月八日，南京城外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舉事，攻城不下，東退鎮江，得江、浙聯軍的協助，二次進攻，經過八天戰鬥，擊敗了江南提督張勳，十二月二日佔領南京，長江以南遂無清軍蹤跡。時漢陽不守，武昌危殆，南京勝利使革命軍聲威重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策劃支援，為功最多。

浙江諮議局議長為立憲派，副議長為革命黨，原擬以和平手段促成獨立，巡撫與駐防將軍遲疑不決。十一月五日，新軍佔領杭州，推立憲派的湯壽潛為都督，革命黨人任總司令及政事部長。

廣西響應始於柳州，巡撫沈秉堃及諮議局因新軍迫脅，十一月七日，宣布獨立，沈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副之。甫三日，巡防營兵變，沈、王以北伐為名離開桂林，都督為廣西提督陸榮廷所得，從此據有廣西十年。

安徽的響應始於壽州。諮議局擬仿行江蘇之例，使政權轉移。議尚未定，安慶新軍已準備行動，乃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獨立。為了爭奪都督，擾攘月餘，後歸於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孫毓筠。

武昌起事時，廣州戒備至嚴，革命黨人活動亦力。十月二十四日，廣州將軍鳳山遇炸而死，諮議局及士紳商議自保，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允而後悔，省城附近革命軍紛起，水師提督李準通款於革命黨。十一月九日，諮議局及各社團議決獨立，舉胡漢民為都督。

福建立憲派與革命黨頗稱融洽。十一月初，盛傳福州駐防旗軍將攻擊新軍，諮議局決定獨立，新軍協統許崇智發難，閩浙總督自盡，福州將軍被殺。十一月十日，全城大定，新軍統制孫道仁任都督，革命黨人任政務院長，立憲派的諮議局議長任民政部長。

山東巡撫因濟南各界聯合會及新軍要求，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獨立。時袁世凱已重握北京政權，山東新軍屬於北洋系，態度轉變，獨立取消，為時僅十二日，惟革命軍仍據有煙台。

辛亥革命實際是起於四川，九月八日，革命黨、哥老會的「同志軍」，進攻成都時，即可算是爆發。湖北、湖南、陝西、雲南、貴州獨立，四川已是四面楚歌。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慶獨立，川漢鐵路督辦端方為所統湖北新軍殺於資州。總督趙爾豐知不可為，釋放了為爭路問題被拘的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等，雙方成立協議，蒲任都督。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宣布獨立，准軍士自由十天，軍紀蕩然。十二月八日，巡防營譁變，蒲殿俊去職，陸軍小學總辦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尹昌衡繼任總督，革命黨當權，立憲派失勢，但情況並不曾好轉。¹

除以上各省外，十月，奉天諮議局與新軍謀獨立，為總督趙爾巽及起自草澤的巡防營前路統領張作霖（一八七五至一九二八）壓制。十一月，改設國民保安會，趙爾巽任會長，仍擁護清廷，革命黨雖續在各地起事，而影響不大。吉林、黑龍江亦仿照奉天之例，各設保安會。十二月，河南革命黨人策動豫西綠林舉事，開封學界準備響應而未成。翌年一月，直隸灤州部分新軍獨立，為時僅八日。同月，新疆伊犁新軍獨立。

長江下游為清軍與革命軍的主要角逐場，海軍舉足輕重。清軍集中長江的艦隊由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黎元洪與薩是師生，湯化龍與海軍參謀湯壽銘是昆仲，分勸他們反正。海軍官兵知識較高，同情革命者不少。十一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歸附革命軍。停泊上海、鎮江的海軍船艇則已先期輸誠，清軍無法飛渡而南。

第二節 袁世凱的機會

一、袁的再起

滿清對於漢人的成見，牢不可破，經戊戌政變而益深，革命黨、

¹十二月二十二日，尹昌衡殺趙爾豐。一九一二年三月，重慶軍政府併入成都，都督仍為尹昌衡。

維新派固爲所仇視，袁世凱亦屢遭裁抑，以至罷黜。袁生報復之念，其他中央大臣及地方大吏中的漢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離心離德。辛亥革命期間，督撫將軍除少數身殉者¹外，不是逃走，便是附和，加速了清政權的崩潰。

袁世凱罷斥後，踉蹌出京，回河南彰德（安陽）。彰德是河南境內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爲京漢鐵路經過之地，交通便利，消息靈捷，奕劻、徐世昌、那桐始終和他保持聯絡，袁的長子克定仍任官北京，有如坐探。

滿清權貴久爲革命黨的聲威所懾，武昌的警耗更令怯懦的載灃、無知的隆裕太后、昏庸的奕劻及向未經過大事的載澤、載濤輩張皇震愕。十月十二日，一面將瑞澂革職，「帶罪圖功，」一面派陸軍大臣蔭昌剿辦。陸軍編配三個軍，每軍約兩鎮。第一軍當前敵，蔭昌自統，第二軍警戒直隸、山東，由軍諮使馮國璋（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督率，第三軍駐守近畿，由軍諮大臣載濤督率。第一、第二軍以北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鎮組成，第三軍以禁衛軍及京旗改編的北洋第一鎮組成，有如御林軍。蔭昌爲旗人，曾留學德國，而短於才學，載濤不知軍旅，毫無戰爭經驗，馮國璋惟袁世凱的馬首是瞻。

四川爭路風潮擴大，奕劻已有意起用袁世凱。現在時機到了，先向袁世凱問計，再與徐世昌、那桐向載灃及隆裕太后勸說，北京公使團亦謂非袁不能平亂，言官復以爲請。載灃、隆裕及諸親貴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應允，以救燃眉之急。十月十四日，授袁爲湖廣總督，另以岑春煊爲四川總督，均督辦剿撫事宜，不無以漢制漢之意。岑無所憑藉，袁則大肆施展。命令發布之日，袁的左右勸他不可重作馮婦，否則亂事一平，有性命之憂。袁成竹在胸，明知清廷目前非他不可，但湖廣總督的職位，並不能使其滿足，稱病請辭，以退爲進，希望取得更高的官秩，更大的權力。詔促力疾就道，有權節制調度長江一帶

¹真正殉節的爲旗人，如閩浙總督松壽，福州將軍樸壽，西安將軍文瑞；漢人死難的僅山西巡撫陸鍾琦及先逃而後自盡的江西巡撫馮汝駉。

水陸各軍，並由徐世昌至彰德面促。袁提出六項條件：一為明年即開國會，二為組織責任內閣，三為寬容武昌事變人員，四為解除黨禁，五為總攬兵權，六為寬予軍費。總之，不外獨握軍政兩權，憑他自主自為。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准添募一鎮，撥款四百萬兩。二十五日改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段祺瑞（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充第二軍總統。二十七日，授袁為欽差大臣，召回慶昌。三十日，袁自彰德赴湖北督師。

在日本學習軍事的中國學生，參加同盟會的不下百餘，不少人供職陸軍部、軍諮府。一九〇八年袁罷職後，他們乘機勸說親貴，引用他們的同學，借以削弱袁在軍中的潛勢力，正中載濤輩的下懷，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遂得分任統制、協統，掌握了一部分北洋軍兵權。¹袁南下之前，湖南、陝西、九江已經獨立，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獨立，同日駐紮北京以東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駐紮奉天的第二十混成協統領藍天蔚要求速開國會，組織非皇族的責任內閣，擢用政治犯，聲言「軍情浮動，向背可慮。」清廷在直接軍事威脅之下，全部照允。十一月一日，袁世凱代奕劻為總理大臣，又取得了政權。

屯兵北京以南石家莊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以袁為革命勁敵，與張紹曾及山西閻錫山聯合，準備北取北京，南襲彰德，斷絕袁的後路。十一月二日，截留運鄂軍火，要求速停戰爭，這真是清廷與袁的生死關頭。五天之後，吳忽被刺殞命，張紹曾的兵權解除。²北京化險為夷，袁的地位無恙，轉與革命軍周旋。

二、清政權的轉移與英美的助成，日本的企圖

清廷之起用袁世凱，是要他出力効忠，蕩平叛逆。袁所採取的為兩面政策，對清廷乘機要挾，對革命軍軟硬兼施。他不是六十年前的曾

¹從中運用的為陸軍部的蔣作賓。蔣與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為日本士官同學，吳、藍又是蔣的湖北同鄉。

²刺吳祿貞的主使者，有謂為袁世凱，有謂為禁衛軍協統良弼。張紹曾意志不堅，且不能真正控制所統部隊，因而不敢抗命。

國藩，情勢亦和六十年前大異，深知清廷的威信盡喪，命運已不可挽回。他縱能一鼓而下武昌，北洋軍不過數萬人，實難望迅收戡定全局之功。倘曠日持久，左支右絀，勢將窮於應付，進退失據。當他南下之時，他對他的一位親信說：「余甚穩健，對革命黨決不虐待。」這位親信亦勸他「凡事留有餘地。」所謂留有餘地，不只是對革命軍要適可而止，對清廷亦不輕於推翻，始可操縱自如，予取予求。

革命軍壯志如虹，須先施之以威，挫其銳氣。十月底，袁軍獲勝，十一月二日，奪回漢口。袁以為革命軍或可就範，遣使致書武昌言和。革命黨對於袁與清廷間的矛盾，及袁的野心，至為了解，乘機動以利害，勸共同反清，謂「我軍（革命軍）聲勢日大，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伏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隆裕有生之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無待游移。」果能「返旆北征，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所言雖洞見袁的肺腑，指出他的心病，但在他尚未全局在握之時，他不會立即出此行動，必須待時機成熟，水到渠成，順利地取代清的政權，同時確保總統到手。

袁於十一月十三日，由湖北到北京，十六日他的內閣成立。以往軍機大臣或內閣總理須每月入對奏事，現在則予停止。各衙門應奏事件，概歸內閣核辦；應請旨事件，由內閣代遞；無須上奏事件，以內閣命令行之；內外奏摺均遞至內閣，由內閣擬旨進呈鈐章。換言之，一切政務集中於袁、取決於袁。至於軍務，湖北境內的陸海軍已歸袁直接指揮，袁抵北京後，又取得近畿的軍權，撤消載濤的第三軍，禁衛軍由馮國璋接統，新編的巡防軍一鎮，改為拱衛軍。

漢口失守，革命軍退漢陽，由新到武昌的黃興任戰時總司令，主力部隊為鄂軍及湖南援軍。十一月十七日，黃興自漢陽反攻，兵力約八千人，為馮國璋的一萬餘人所敗。復劇戰六日，終以訓練不精，武器不利，二十七日，漢陽陷落，黃興東去上海。馮國璋擬乘勝奪取武昌，袁親去電制止，另電黎元洪提議停戰，命馮就近商洽。新任湖廣

總督段祺瑞亦謂應休息兵力。袁的謀士王錫彤復謂「革命之氣已盈海內，若再以兵力蹂之，後患方長。爲袁公計，亦殊不值得。蓋專制國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結果只有兩路可走：一爲岳武穆，身死而國危；一爲曹孟德，風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殺臣，則臣弑君，將何以處袁公乎？」袁更明白這種道理。他的老友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亦勸他終止軍事行動，¹由代理漢口英國總領事葛福（H. Goffe）斡旋。革命軍以武昌危在旦夕，允如所請。十二月一日，協議成立，此後武漢未再有戰事。

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益隆。罷黜之後，清政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武昌事起，美國公使嘉樂恒（W. J. Calhoun）在公使團會議席上首稱，惟有袁可擔平亂之任。除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外，其他各國一致贊成，此爲奕劻等勸請載灃起用袁的有力理由之一。袁任湖廣總督的上諭發布之日，朱爾典電告英國外相葛雷（E. Grey），說是此一任命，可使北方軍隊的忠誠獲得保證，增加清政府處理危機的力量。第二天，上海美人《大陸報》發表社論，說是清廷雖將統率全軍的任務交與袁世凱，並不足以保證他回京任職。任何低於內閣的位置，是和他的才能與成就不相稱的。除非命他參與國務，無法使清廷取得內外的信任。十月二十八日，美國銀行團駐北京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認爲如清政府肯給袁以他要求的權力，由他組織內閣，南方的革命必然失敗。四天後，袁即被任爲內閣總理大臣，朱爾典連電葛雷，謂此舉可收安定人心作用，北京亦有振作氣象。

英、美爲了經濟利益，希望中國安定。日本的態度相反，中國愈亂愈對日本有利。十月十六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電令伊集院，願以軍械供應清廷。二十四日，西園寺公望內閣決定以永保日本在東三省權益，維持日本在中國一切利益，保全清的政權，阻止革命軍北進爲

¹袁與朱爾典相識於朝鮮，一九〇六年起，朱爾典任駐華公使。

政策。伊集院欲將中國分爲華南、華中、華北，由清廷統治華北，使永久與漢人對峙，曾請朱爾典勸清廷實行君主立憲。朱爾典窺知他的用意，深恐中國因此而被瓜分，不利於英，答以中國政體應由人民自決。爲替袁世凱減少阻力，在袁到北京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朱爾典對袁克定說，外國人的一般看法是，最好象徵性保存清廷，實行憲政改革。十一月十五日，葛雷來電，謂英國政府對袁友好敬重，希望中國有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可以公正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內部秩序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英政府將給以一切的外交援助，英、美、德、法銀行團亦將給予財政援助。朱爾典據以告袁，謂英國對他（袁）所領導的政府必加支持。

公使團爲使袁內閣的權力更爲擴大，十一月二十二日，依照嘉樂恒的主張，由朱爾典與袁商議，進一步行動。朱爾典告訴奕劻，說是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政治不良，政治不良是由於監國攝政王載灃措置乖方。清廷如欲獲得外國援助，載灃必須辭去攝政王，從中奔走運用的爲唐紹儀。十二月五日，葛雷一面照覆倫敦日本代辦，一面訓令朱爾典與伊集院合作使載灃引退。一月六日，隆裕准載灃退歸藩邸，嗣後用人行政，皆由內閣總理大臣擔承責任。王錫彤說，載灃之革去名義，政權一歸內閣，「英使朱爾典實助袁公成之。」

日本爲分裂中國，亦欲爭取袁世凱。袁內閣成立第三天（十一月十八日），伊集院表示日本決極力相助，袁亦表示効忠清室。於是日本又請英國政府，合力促成清廷立憲。英方雖口稱贊成，但仍不主干涉內政。武漢停戰後，伊集院怕袁與革命黨妥協，主援助南方對抗北方。袁與革命軍和議開始後，日外相內田向英、美提議，保存一名義上的清政權，命伊集院警告袁世凱，不承認改行共和，命頭山滿、犬養毅通知孫中山，反對革命黨的主張，不惜以武力幫助清廷。終以國際情勢不許，未敢悍然出之。

三、立憲派、北洋派擁袁及革命黨讓袁

張謇領導立憲派意欲與袁世凱合作。一九一一年六月，張自上海

去北京，特迂道彰德，與袁晤談。袁表示如將來再出，當尊重張的意見。張深感此行不虛，盛稱「慰亭（袁字）畢竟不錯。」不久袁果然復出。十月十六日，江蘇巡撫程德全採用張謇代擬的奏稿，請清廷將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對革命軍用撫不用剿。所謂賢能，不言而喻，指的是袁。二十日，張謇復以諮議局名義，要求宣布立憲，開國會。十餘日後，與清廷脫離關係的已有七省。隨着情勢的轉移，張謇施展他的影響力量，助成程德全的獨立，目的是為預站地步，不讓革命黨全部勝利，立憲派方可取得日後的發言權，擁袁建立一政治中心。資政院及其他各省諮議局的立憲派議員，同此心理。

原與袁世凱不共戴天，近又因開放黨禁為載澤所阻的康有為、梁啟超派，力圖結納載濤與吳祿貞、張紹曾，擬作非常之舉。而武昌變起，於是又計劃用禁衛軍發動政變，倒載澤、奕劻，奉載濤為內閣總理，停止討伐革命軍，運動各省督撫暫行自立，以殺革命黨之勢。十一月，梁啟超由日本去奉天，準備親入北京。不意吳祿貞被刺，張紹曾罷職，乃改以「和袁、慰革（革命黨）、逼滿、服漢」，同戡大難為政策。復以奉天情勢對他不利，所謀亦成泡影，廢然返回日本。此時袁的地位已固，大權在握，梁又倡「虛君共和」之說，各方活動，聯袁、聯岑（春煊）、聯黎（元洪）並進，尤重聯袁。十二月間，進行益力。袁亦欲利用梁在資政院、諮議局的影響力和他在社會上的文名，以抗革命黨，雙方頻頻密洽。

袁的故舊於袁的再起，無不與高彩烈，僕僕於天津、北京、彰德道上，籌議大計。參與其事的有唐紹儀、楊度、梁士詒、袁克定，與張謇互通聲息。他們的具體方案為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共和國體，擁袁為民國總統。袁入京後，此一運動隨之展開。十一月中旬，詔命各省派代表來京，公同會議國是。同時楊度與獲釋出獄的革命黨人汪兆銘發起「國是共濟會」，明白主張由國民會議協議君主、民主問題。奕劻頗有贊成之意，載灃「恐國民會議專要共和，」不肯答應。楊度上書資政院，謂國民會議的結果是否必為君主，固然沒有把握，不過「君

主立憲之言，僅能言之於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袁惺惺作態，說是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不能贊成共和。但是「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又對汪兆銘說：「國民會議我極贊成，惟我站地位，不便主張民主，仍主君主立憲。」汪說：「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袁說他個人必服從國民會議多數決議，只是辦到公平和平不易。遂由袁克定派遣密使携汪函前往武漢洽商。汪另電上海黃興，主南北聯合，強清室退位，推袁為總統。武昌方面先已表示，袁若反清，當以總統相酬。孫中山亦自倫敦來電，主推黎元洪或袁為總統。¹至是黃興亦謂，如袁作華盛頓，使中國為民國，各省無不聽命。

載灃解除監國攝政王名位後，召開國民會議的阻力大減。十二月七日，隆裕命袁委託代表與南方討論大局，代表人選即唐紹儀，參贊為楊士琦。革命軍方面以伍廷芳充任。和議地點，初定為漢口，革命黨重要領袖多在上海，為了籌組中央臨時政府，武昌與上海之間已有歧見，更恐武昌左右和議，要求改在上海舉行。公使團為便於上海領事運用，袁為便於蘇、浙立憲派活動，一致贊成。²

唐的計劃是透過國民會議，擁袁登上總統的高位，他自己亦可望成為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楊士琦主張先使清室禪位，再與南方議和，袁認為不妥，怕的是南方不允，和議不成，不若由共和弋取總統的順利。楊度亦說：可先為總統，將來仍可為拿破崙。公使團希望中國及早息爭，袁的政權及早實現，不惟已有的權利可免受損失，將來的權利必更有保障，決定請雙方儘速解決和局。

十二月十八日，伍、唐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廳開始會議，商定各處停戰。第二天，英、美、日、俄、法、德公使分電伍、唐勸告，意在使南方讓步。英國外相葛雷訓令朱爾典，殷盼中國統一，政體由中國

¹時為十一月十六日，據云係吳敬恒的主張。

²唐紹儀、伍廷芳均廣東人，曾留學美、英。清末唐官至尚書，伍官至侍郎，原為舊識。唐到上海後，下榻英商李德立（E. S. Little）住宅，與英國總領事傅磊斯（E. A. Frases）保持聯繫。

人民決定。實際是爲袁聲援。唐按照袁的指示，竭力爭取立憲派的支持，曾面告張謇，如舉袁爲總統，其他可無問題。張答稱他僅能代表蘇、浙兩省，不能保證同盟會的必從。唐復向江蘇都督程德全疏通，程允悉力而爲。浙江都督湯壽潛與張、程一致，大勢遂十定八九，唐轉與黃興相商，亦甚順利。二十日，伍、唐二次會談，伍請唐承認共和，取消滿清政府。唐雖不反對，惟須由國民會議作最後決定。同日，黃興的代表與北方密使成立協議，訂明確定共和政體，由先推覆清室者爲總統，對清室予以優待。¹

二次會議後，唐與革命黨、立憲派日夜聚晤。汪兆銘力勸同盟會領袖勿操之過急，否則欲速不達，並電袁克定，謂「項城（袁世凱）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唐亦電梁士詒，希望袁爲中國的華盛頓，袁謂「不能自我先發。」大概由於禁衛軍統領馮國璋仍主君主，陸軍部大臣王士珍態度消極，前方的段祺瑞尚在猶疑，日本公使伊集院聲稱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袁不無顧慮。正在此時，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唐爲貫徹原定計劃，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清廷大事恫嚇，謂「民軍以改建共和爲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艇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人，聲勢愈大，並擬組織臨時政府爲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爲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啓，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紹儀出京時，總理大臣（袁）以和平解決爲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爲轉圜之法。」袁與徐世昌、奕劻商議之後，向隆裕太后奏陳，亟言不可決裂，否則戰事再起，「度支如何？軍機如何？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如召集國會，采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

¹北方密使爲廖宇清，這些條件是十一月間他和段祺瑞的親信靳雲鵬等所商定。

福，尙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勢皎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二十八日，隆裕如其所請。唐與伍廷芳繼續會議，商定國民會議辦法：直、魯、豫、甘、新及東三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餘由民國政府召集。

第三節 妥協中誕生的民國

一、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

革命軍控有大半中國之後，認爲有設置中央政府的必要。湖北、雲南倡議各省選派代表，前往武昌籌議規劃，江蘇、浙江主在上海，請孫中山返國組織。十一月十五日，蘇、浙、閩代表決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承認鄂軍政府爲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由於武昌力爭，一部分代表赴鄂，一部分留上海。赴鄂代表到武昌時，漢陽已經失守，武昌受威脅，改在漢口英租界開會。十二月二日，議決如袁世凱反正，即舉爲臨時大總統。三日，通過中央臨時組織大綱，設臨時總統、國務院。次日得悉南京克復，又議決以南京爲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日留滬代表有同樣決議，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負責籌劃臨時政府，名爲使軍政府早日統一，實爲不願由武漢領導，這是陳其美、宋教仁的主張。赴鄂代表及黎元洪與立憲派、光復會表示反對，克復南京有功的浙軍將領聲言不願受漢陽敗將黃興的節制，黃遂堅辭不就。十七日，全體代表在南京集會，改舉黎爲大元帥，黃爲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黎雖承認，黃終不受，代表左右爲難，中央臨時政府一時無從組織。

武昌變起之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向華僑募款。十月十二日，得知此一意外消息，他認爲今後的成敗，列強的態度關係至大，特別是英國與日本的態度。華中、華南屬於英國勢力範圍，日本爲英國的同盟，英國的動向實可左右全局，必須取得其對中國革命的諒解，決先去倫敦。時清廷正欲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朱爾典爲迫令清廷將政權交袁世凱，請倫敦拒絕。十月中，四國銀行團在巴黎集議，決

定暫不與中國談判。十月下旬，孫抵倫敦，繼續努力，並請英國阻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十日，轉往巴黎，晤法國朝野人士後東歸。十二月二十一日過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來迎，謂袁世凱心懷叵測，孫一至南京、上海，必被各方擁戴。但無兵可用，意見紛淆，命令難行，不如暫留廣州，整理軍務，再鼓行而前，方有勝算。孫不以爲然，謂南京、上海爲前方，須身當其衝，應四方之矚，弭內部歧趨。否則東南不保，廣東亦難獨支。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抵滬，黃興、陳其美、宋教仁決定組織中央政府，大元帥問題不了了之。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選舉孫爲臨時總統，並設置臨時參議院。¹三十一日，通過孫的提議，採行陽曆，以中華民國爲紀元，有如歷代的改正朔。中央臨時政府大綱原爲總統制，現在改爲內閣制，增置副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在南京就職。次日，臨時參議院因孫的要求，復變內閣制爲總統制。一月三日，黎元洪當選爲副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黃鍾瑛任海軍總長，王寵惠任外交總長，伍廷芳任司法總長，陳錦濤任財政總長，程德全任內務總長，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張謇任實業總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陸軍、外交、教育總長屬同盟會，內務、實業、交通總長屬立憲派，海軍、司法、財政總長無所屬。實際在南京任職的僅同盟會二總長，其餘經常駐上海。此一混合內閣，不能算是健全，各省都督又不盡聽命中央。武昌、上海革命黨人早已壁壘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統自居，武昌方面以首義功高，而在中央未佔重要位置，憤憤不平，遇事立異。²

孫中山之所以不肯暫留廣州的另一原因是，孫「若不至滬、寧，則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非他人所能勝任。」關於對內，孫亦主張將總統讓袁，假袁之手，推翻滿清，早日實現共和。此後社會當以工

¹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議員爲各省都督的代表。

²王寵惠、伍廷芳、陳錦濤爲廣東人，王、陳均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蔡元培、湯壽潛爲浙江人，張謇爲江蘇人，程德全爲四川人，黃興爲湖南人，黃鍾瑛爲福建人，湖北人任次長者雖不少，但無任總長者。

商爲競點，他願爲中國開一新局面，不爭政權。關於對外，孫在巴黎時，曾向記者宣布，民國政府成立後，將與各國商議重訂關稅，取消領事裁判權，政回租界。及就任總統，一月五日正式發布告友邦書，願與各國人民平等交往，益求輯睦。清政府所訂條約，繼續有效，至期滿爲止，清政府所借外債，照舊償還；各國或個人所得權益，照舊尊重，希望各國更篤交誼，靜待民國之成，並盼予以承認，交相是挈，勉進世界於無窮。各國大都不予理會，視爲無足重輕。總之，孫的對外對內，所採同爲妥協態度，袁與列強亦相互爲用。

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僅三個月，大部分時間忙於對袁交涉。最後始顧及到內政改革。較有意義的措施，一爲提倡平等觀念，革除官廳的「大人」、「老爺」稱謂，均以官職相稱呼，民間「先生」或「君」相稱呼。二爲維護人權，不准刑訊、體罰，鞠獄當視證據爲斷。禁止買賣人口，所有人民均得享有公權、私權。三爲尊重言論、出版自由。四爲男子剪除髮辮，女子不許纏足。五爲提倡女權。革命軍興，青年知識婦女爭起以應，或組織女子軍事團、女子國民軍、女子北伐隊，或從事看護、縫紉、募捐。又有女子參政同志會、女界共和協濟會，政府曾予資助。以上政令，雖一時未能貫徹實行，社會觀感則逐漸轉變，平等自由思想遂以普及。

二、清朝告終

對於南方之選舉總統，袁世凱至爲不滿，上海和議所訂的召集國民會議辦法同爲所不喜。前者他無從阻止，乃以後者爲口實，不肯承認。但他並不要決裂，仍施展剛柔並用手段，期達最後目的。一是繼續和談，通知伍廷芳，已准唐紹儀辭職，嗣後彼此直接電商，實際上唐仍在上海與伍接觸。二是利用軍人，曠使馮國璋聲稱誓死反對共和。三是勾結外力，希望各國相助。

孫中山當選總統的一天，立即電袁，謂係暫時擔承，仍虛位以待，請袁早定大計。袁答以國體尙待公決，不願預聞臨時政府之事。孫再去電，如由袁之力不勞戰爭而達成共和，總統必屬於袁。袁轉而質問

伍廷芳以此次選舉總統的用意，並爭國民會議代表名額與召集權，及開會地點。伍謂選舉總統與國民會議絕不相妨。唐紹儀單刀直入，詰伍以總統讓袁，有何把握？孫明白回覆，如清帝退位，即推袁為總統。孫一意思由和平途徑，使共和實現，袁定要確定總統能夠到手，始贊成共和。

上海和議發生頓挫之後，各國公使指責南京的要求不近情理，倘和議因此破裂，南方應任其咎。對袁則盛稱其公平正直，為當代中國最有才能的人物。英、美報紙斥南京政府專橫，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與恢復和平的能力，法國且建議由各國逕自提名袁為總統。南京為確立自己的地位，一再籲請各國承認民國政府，並要求清政權不得私相授受，袁不得自設臨時政府，各國承認民國政府後，孫始辭職，再舉袁為總統。英國輿論指為根本動搖過去的協議，使中國陷於嚴重危機。對於承認民國政府，各國均無反應。袁恐清已退而孫不退，全國只有一個南京政府，他將成為南京政府的屬下。伍廷芳以國際情勢不利，勸孫勿再堅持各國承認。一月二十二日，孫提出最後通融辦法，不堅持各國承認，惟清帝退位須知照各國公使，袁須宣布絕對贊成共和，孫接到公使通知，即行辭職，推袁繼任，袁宣誓遵守參議院所定憲法。如併此而不能行，證明袁不願和平解決，須負戰爭之責。二十七日，復致電各國公使，說明他之對袁讓步，係為了共和。此時蒙古、西藏已因俄、英的煽動，實行獨立，日本高唱對華干涉，準備與俄國分有東三省。孫如與袁相持不下，中國長期爭擾，兵連禍結，前途的屬可慮。

南京自身的弱點亦為孫中山不得不讓步的重大原因。山西大半復為袁軍所有，陝西岌岌不保，皖北要地多失。革命軍大都為臨時招募，有如烏合，北伐徒托空言，財政更是困難莫名，各省極少解款，公債分文未得，借債不能成交，餉糈無着。陸軍總長黃興自承若和議不成，動員為不可能的事。加之內部意見不一，武昌離心，袁又從中分化，漢口、漢陽的局部和議，實際已經成立。江蘇、浙江的立憲派盼和尤殷，總望與袁妥協。無政府主義派復稱，倘為政權而延長戰爭，將無可自

恕。¹同盟會會員不盡了解全部革命主義，但求推翻滿清。醉心民主的幹部，亦謂名不必自我而立，功不必自我而成，武力革命時期已過，今後當注全力以爭憲法、國會、內閣。孫早已表示不爭權利，但求共和及早實現。

孫中山以總統讓給袁世凱的第一個條件是清廷必須退位。袁要使清廷退位並不十分困難，但不欲蒙篡奪惡名。他對外國公使說，他之所以不接受孫的條件，是因為不願背棄清朝恩義。欺人孤兒（宣統）寡婦（隆裕），祇圖自身安全。不過他總想取得最高政權，從各方運用，使其達成。先以利害游說奕劻、那桐以及隆裕太后的親信太監張蘭德，謂大勢已去，退位可享種種優待。次由馮國璋輩強親貴大臣捐獻。袁亦說若要對南方討伐，須軍費有着，不然他只好辭職。隆裕至為惶懼，溫諭慰留，發予內帑黃金八萬兩，並命親貴大臣輸財贍軍，而應者寥寥。袁的另一手段，仍為挾外人以相威脅，謂外蒙古已脫離中國，如再不決定態度，東三省亦將難保；南方擬自行召集國民會議，各國勢必承認；各口岸洋商擬請本國政府，強制清廷遜位。不久上海西人商會果然致電奕劻、載灃，勸告遜位。一月十二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善及恭親王溥偉反對，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十六日，袁向隆裕奏陳情勢危急，內而億萬所趨，非兵力所能平定，外則強鄰虎視，朝廷無地以容。革命軍但求民主，各國調停亦在改革政治，若久事爭持，難免不加干涉。法國革命之時，路易十六如能早順民心輿情，何至子孫靡有孑遺。隆裕聞聽之下，唯有流淚。十七、十八日，御前會議，俱無結論，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請求「概允共和」的電奏又至。最有效的仍為武力與外交脅迫並施。袁克定早在聯絡北洋將領，張寶請袁示意段祺瑞結約黎元洪，修正國民會議辦法，倘清廷不允照行，軍人即不任戰鬥。袁與各國公使保持密切聯繫，一月二十三日，通知朱爾典，說是處境困難，準備辭職出

¹吳敬恒、李煜瀛均屬無政府主義派。

京。當天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¹一月二十三及二十五日，段祺瑞兩電內閣，一稱軍心動搖，共和思想難以遏止，一責親貴阻撓共和，各將領憤憤不平，將聯銜陳情。革命黨有以爲清廷之遲遲不退，係袁作梗，必除之而後已。²滿清親貴則痛恨袁與革命黨裏應外合，亦欲置之於死地。擬以封爵爲餌，誘袁入宮謝恩，加以殺害。事被袁和他的左右所窺破，袁憤怨地說：「余力竭聲嘶，爲保皇室尊嚴，不意竟以此相待。國之將亡，殆無能救，公輩願如何，即如何。」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的聯銜電報發出，³要求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代表政府，擔任對外事項，再行召集國民會議，組織共和政府。同日，宗社黨健將軍諮使良弼爲革命黨人炸死。⁴反對退位的親貴喪膽，善耆、溥偉分逃大連、青島。隆裕太后哀求民政大臣趙秉鈞、外務大臣胡惟德、郵傳大臣梁士詒，懇袁保全她與宣統母子的性命，實行封袁爲一等侯爵。袁再四不受，謂人心乖離，軍事困難，外交棘手，請收回成命。馮國璋亦辭禁衛軍總統，以示不負京師治安之責。二十九、三十日御前會議，王公大臣對於退位無人敢再持異議。二月三日，命袁全權與南方商優待條件，不再提國民會議。五日，段祺瑞續責王公敗壞大局，阻撓共和，即率全軍將士入京，和他們剖陳利害，已有兵臨城下之勢。

優待清室爲袁與革命黨間的預定方案，上海和議時唐紹儀已將原則提出，汪兆銘草擬具體條款，由袁奏明，遍告親貴。二月十日，經臨時參議院通過，要點爲清帝辭位，尊號仍存，中華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給以歲用四百萬元，暫居宮禁，清及蒙回藏世爵照舊。這是妥協的另一面，亦是一個奇特現象，中國境內除了自己的政府，另有

¹日本以大勢所趨，知維持清廷已無可能，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

²一月十六日，袁進見隆裕後，行至東華門外，革命黨人張光培、楊裕昌、黃之萌拋擲炸彈，傷斃多人，袁竟倖免，張等被捕遇害。

³列名將士有段芝貴、倪嗣冲、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孟恩遠、靳雲鵬、徐樹錚、盧永祥、李厚基、吳光新等。

⁴革命黨人爲彭家珍，當場身死，良弼重傷，一日後卒。

一個外國君主，民主政體之下，仍有特權階級。

二月十二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頒布宣統皇帝辭位懿旨，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並由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各王公多避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突動逃往天津租界。退位詔為南京所預擬，出自張謇之手，其中「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字樣，則係袁所添入，作為自立政府的依據。無論如何清朝總算告終。

三、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宣統退位雖為定局，袁世凱仍怕孫中山不肯辭職。二月初，再由段祺瑞分電孫及黎元洪，主張南北兩政府同時取消，預行推定總統。黎以不滿於革命黨人的挾制，為見好於袁，以固自身地位，首先贊同，退位詔頒布的前一天，袁電告南京，謂共和為最良政體，清帝辭位之日，即帝政的終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以示履行孫的要求，孫自當實踐辭職諾言，由袁任總統。退位詔頒布的後一日，袁即告「膺命組織政府」，自稱「首領」，建立事實的政權。同日，孫向臨時參議院辭職，薦袁自代，惟袁不當以清帝委任為據，自組政府。袁稱北方軍隊與蒙古代表已推他為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表示他已經成了總統，無須定要南方相讓，孫不再深究。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袁為第二任臨時總統，仍選黎元洪為副總統，袁不俟正式受命，即改稱「新舉臨時大總統」，一似他的職位先經清帝委任，北方推戴，再由民國臨時參議院予以追認。

和談期間，孫中山已提出臨時政府須設於南京的條件，在致參議院的辭職咨文內，再加聲明，不得更改，新任總統到南京就職之時，孫始解職，目的是要袁離開他的北京根據地，擺脫使館區的特殊勢力，使列強在北京至海口的駐軍亦失去作用。袁的南北成見甚深，更不願置身於革命黨控制下的南京，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須加部署，東三省人心未盡一致，推拖不肯南下。參議院一度同意政府設於北京，因孫與黃興堅決反對，不得不出爾反爾，議決政府仍設南京。但是不

滿意孫、黃的章炳麟及蘇、浙、湘、滇等省都督，均主建都北京。於是袁的態度益為強硬，聲稱舍北而南，窒礙無窮，北方軍民意見紛紜，隱患實繁，外交團屢言袁不可離開北方。如果因為他不能南去，而不能統一，他情願不做總統。南京堅持不移，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為迎袁專使，令袁無迴旋之地。蔡元培等到京兩天，二月二十九日，北京發生兵變，天津、保定、通州，接連而起。各國公使調兵前來京津。黎元洪電請早定國都，成立政府，以杜外人干涉，萬不宜舍北而南。段祺瑞、馮國璋力言政府須在北京，袁不能赴南京受任。蔡元培亦說兵變後外人極為激昂，設再行發生，外人將自由行動，必須速建統一政府於北京。南京有派兵北上助袁恢復秩序的提議，袁斷然拒絕，參議院卒許袁在北京受職。兵變是否出於袁的授意，雖不易肯定，事後變兵未受任何處分，則為事實。此後兵變成為民國史上的常事。

遵守憲法為孫對袁的另一要求，憲法制定之前，先制定臨時約法，三月七日，臨時參議院開始討論，三月十一日公布，規定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參議院、總統、國務員行使統治權。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種族、階級、宗教，均在法律上享有身體、家宅、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書信秘密、居住、遷移、信仰自由，有請願、陳訴、訴訟、任官、考試、選舉、被選舉權利，及納稅、服兵役義務。立法權由參議院行使，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總統總攬政務，統率陸、海軍，任命文武職員，但制定官制、官規，任命國務員、大使、公使及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則須經參議院同意。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命令，均須國務員副署。約法施行十個月內，召集國會，制定憲法。

就約法條文而論，關於民權的規定，與一般民主國家無大不同，為中國前所未有之事。對於國會的權力，儘量提高，對於總統的權力，多方限制，與內閣制相近。袁自然知道這是同盟會為他而設，不甘俯首聽命。今後袁與同盟會的衝突即由此而起。

同盟會既以總統讓袁，仍希望自行組織內閣，捨名取實，然非袁所願，折衷的方案是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出任內閣總理。唐與袁有二十餘年的私情公誼，交非泛泛，與孫中山同為粵人，復有促成共和

之功，正可居間折衝，溝通南北之見，調和新舊之爭，促進袁和同盟會的合作。三月十三日，袁任唐為國務總理，袁系的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分任內務、陸軍、海軍總長，柔順的陸徵祥任外交總長，立憲派的熊希齡任財政總長，同盟會的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分任司法、教育、農林、工商總長。¹四月一日，孫中山解除臨時總統職務，黃興任南京留守，統轄南方各軍。二日參議院正式議決，臨時政府遷設北京。

¹交通總長由唐紹儀兼代，後由施肇基署理，工商總長陳其美不就，由次長王正廷署理。

第十二章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第一節 攘奪權力

自武昌起義至清廷遜位，在短短四個月內，三千年的中國君主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舉國上下對此前未之見的新情勢，既不相習，亦不了了，大都以為不過是由滿洲皇帝換了漢人總統，與歷代王朝的更易無大區別。革命黨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運用的藝術與經驗，僅有理想與熱忱，舉措往往不切實際。立憲派之病與革命黨畧同，革命期間，一度與革命黨携手，不久又分道揚鑣，轉而依附實力派的袁世凱。袁昧於時勢，以舊政權的繼承者自居，一意圖謀鞏固地位，擴張權力，予智自雄，排除異己，不明共和為何事。對於革命黨，先之以欺弄，終之以摧殘。曾為効命的立憲派，同遭遺棄，民國僅存虛名。

一、黨派分野與政局動盪

民國成立，同盟會聲勢煊赫，莫之與京，攀附者爭先恐後，嚮義者固然不少，趨炎附熱者更衆。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組織改為公開政黨，以完成行政統一，促成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男女平權，厲行徵兵，整理財政，力謀國際平等，移民實邊為政策。除力謀國際平等、男女平權兩項較為富有了新的意義外，原有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主張，變為空洞的國家社會政策。為便於與袁世凱聯好，曾有推汪兆銘為總理之議，未成事實，仍由孫中山任之，以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凡此皆可見同盟會的妥協性。

同盟會為多種派系結合而成，內部久有爭執。和同盟會抗衡的立憲派，步調亦不齊一，大致可分為海外與國內兩支。前者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後者以張謇、湯化龍、孫洪伊、譚延闓為中堅。辛亥前

二、三年，華僑痛憤清廷的冥頑不靈，專事壓迫漢人，康、梁的保皇號召失去作用，傾向革命者漸增，辛亥革命軍起，加入同盟會者愈衆。梁自云：「海外吾黨，今止餘百分之二三。」康仍持保皇之說，梁則贊成共和。梁以未身預民國締造，較之張謇、湯化龍等，一時雖頗有遜色，但在立憲派中的聲望仍非他人所及。

首先脫離同盟會而別樹一幟的爲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與張謇等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繼更名「統一黨」。湖北孫武亦別立「民社」，聲勢不小，一九一二年五月，與統一黨合爲「共和黨」，舉黎元洪爲理事長，以保持全國統一，採用國家主義，以國家權力扶植國民進步，以平和實利立國爲政綱，在臨時參議院中事事與同盟會對立，而爲袁世凱張目。不久章炳麟派仍號統一黨，立場與共和黨並無大異。另一自同盟會分出而與立憲派有相當關係的政黨爲「統一共和黨」。此外尚有性質相似的若干政團，純粹立憲派組成的爲湯化龍、林長民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的「共和統一黨」，林林總總，大小政黨不下十餘，影響力較大的爲同盟會，次爲共和黨。

立憲派多認爲康有爲的主張已不合時宜，推梁啓超領導，重整旗鼓，有聯交袁世凱或與黎元洪派合流的兩種意見。梁傾向前者，袁亦樂於加以利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梁士詒奉袁之命，致電梁啓超，謂袁有意延攬，已託張謇向同盟會疏通。袁當選總統後，梁啓超來電祝賀，暢論政黨問題，謂革命黨中的感情用事者，斷不能與袁相合，對之既不可威壓，又不可阿順，惟有使立憲派與革命黨中的有政治思想者，成一大黨，收爲己用。袁大加稱道，謂「所策皆至確不易」，盼他早日歸來進行。立憲派謀以共和建設討論會爲中心，再合併非同盟會各黨，如共和黨、統一黨，黎元洪居其名，梁啓超居其實，爭取各省都督如蔡鍔、譚延闓、程德全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局不安，促梁返國運動益爲積極，甚至蔡鍔、程德全、黎元洪請袁破格錄用。湯化龍認爲時機已到，梁如歸國，可與黎元洪提携，或合併各黨，或別造一黨使同盟會不敢輕侮，再取代同盟會的內閣。

上海和議之時，唐紹儀的態度已引起袁的猜疑。其後唐爲促成袁

與革命黨的合作，不惟加入同盟會，且曾勸袁南來，袁愈以爲他與孫中山結納，別有所圖，楊士琦、楊度、趙秉鈞輩乘而媒孽。孫中山尙無意與袁爭一時長短，宋教仁則力主政黨內閣，人稱唐紹儀內閣爲唐、宋內閣。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將順。袁不習於民主政治，左右又盡爲舊日官僚及敵視同盟會的政客，袁、唐間的裂痕浸大。同盟會初欲假國會之力，以監督政府，使袁不得擅作威福。自共和黨出現，同盟會失去了對臨時參議院的控制。袁深知清室的迅速滅亡，由於外重內輕，進而謀收地方主權。此時他的勢力僅及於華北、東北，對於南方同盟會的都督固不能指揮自如，非同盟會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南京留守黃興，望高權重，有第二總統之稱，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因人成事的湖北黎元洪，形單影孤，革命黨人氣焰囂張，視黎蔑如，黎思結袁自保，袁復有意籠絡。袁以整頓軍務爲名，命各省裁兵，不得自爲風氣，阻撓侵越。黎承袁的意旨，主張軍務與民政分爲二途，同盟會的都督力言不可。

借款不成，爲清室被迫退位的另一原因。及袁當選總統後，軍費所需既鉅且急，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允於南北統一後供給，並應袁之請，先行墊付若干，附帶條件爲此後墊款及善後大借款，須由四國銀行團優先承擔。袁再請墊款，銀行團要求監督用途，並不得向他處另借。唐紹儀以條件過苛，改向比利時銀行訂借。英、美、德、法公使指爲失信，要求取消並道歉。唐不得已，允由銀行團承借。四國銀行團又要求借款開支須經其核准，遣散軍隊須由外國武官監督，唐不能接受。袁以唐將比國借款的大半付與南京政府，早已不滿，改命與唐不睦、籍隸共和黨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與銀行團交涉，借款雖仍未商就，墊款則已成交。黃興連電責熊，共和黨進行倒唐，唐不安於位。直隸都督問題發生，更感難堪，¹遂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辭職出京，同盟會閣員繼之求去。共和黨、統一黨紛電詆唐蔑視職守，結

¹直隸省議會請以王芝祥爲該省都督，唐商得袁的首肯，表示同意。未幾袁借口直隸軍人反對，背棄諾言，改命王芝祥赴南京辦理遣散軍隊，唐拒絕副署，袁置之不理。

黨把持，應組織超然內閣，袁即以外交總長陸徵祥為總理，以在臨時參議院發言不當，新提閣員悉被否決。北京軍警指參議院挾持私見，黎元洪責其違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為「奸府」，請袁便宜行事，盛傳將解散參議院。參議院迫於形勢，通過袁第二次提出的閣員，次日，即彈劾陸徵祥失職。陸稱病請假，由趙秉鈞代理，此為同盟會或國會與袁的第一次正面鬥爭，亦為袁第一次對同盟會或國會的脅迫。

孫中山將總統讓袁之後，決致力於國家建設，積極宣傳民生主義、實業發展、鐵路計劃。黃興亦請辭南京留守，示無割據之意。內閣問題發生，袁邀孫、黃入京，以期消弭政潮。同時從黎元洪之請，召武昌起義有功，而與黎積不相能的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將校團團長方維北來，加以殺害，罪名是「圖謀不軌」，臨時參議院及黃興嚴詞詰問。袁為製造同盟會對黎的惡感，將黎來電公布，使黎無以自解，死心相依。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八月下旬，毅然北上，黃興繼之而至。孫留京二十餘日，與袁會談十三次，希望袁作正式總統，十年內練陸軍百萬人，建築鐵路十萬里，袁即授以計劃全權。為使袁得以放手而為，孫、黃同意由趙秉鈞出任內閣總理。九月二十五日，袁發表八大政綱，謂係與孫、黃及黎元洪的共同協議，包括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產，建置鋼鐵工廠，提倡國民實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採地方分權主義，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早日獲得各國承認與借款。同日，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閣員多加入甫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算是國民黨內閣，國民黨願以全力贊助政府。

唐紹儀去職後，宋教仁認為同盟會的擴組與增強至為迫切。為爭取正式國會議員的多數，阻止梁啟超的大黨計劃，更有此必要。共和黨是同盟會勁敵，無法言歸於好，統一共和黨的幹部多為同盟會舊人，願於有條件之下與同盟會破鏡重圓。鑒於共和黨與袁世凱的勾結日急，同盟會接受了統一共和黨的要求，易名為國民黨，刪除政綱中的男女平權，改力謀國際平等為維持國際和平，改採用國家社會政策為注重民生政策，變總理制為理事制。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正式成立於

北京，除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外，並加入了三個小政黨，孫中山任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等為理事。另有參議，列名者有各省都督，如胡漢民（粵）、柏文蔚（皖）、李烈鈞（贛）、閻錫山（晉）、譚延闓（湘）、尹昌衡（川）等，黨員中熟悉西方政治的固有，官僚政客亦多。此事係宋教仁一手促成，孫中山就請他代理理事長。

約在同盟會擴大而成為國民黨的同時，共和討論會亦與共和統一黨等政團商定合為民主黨，梁啟超的大黨希望頗有實現可能。袁世凱與孫中山、黃興達成協議後，並想將梁啟超收入彀中。一九一二年十月，梁與袁獲致諒解，由日本返國，袁禮遇有加。梁自稱所受歡迎，幾倍於孫、黃，「上自總統府、國務院諸人，趨踴惟恐不及，下至全社會，舉國若狂，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反對黨屏息，而共和、民主兩黨，人人有哀鳴而思戰鬥之意。國民黨……手忙腳亂。」他以為前途氣象至佳，大有可為，會動組閣之念，不免視事太易，自命過高，不自覺的為袁所愚。國會選舉結果揭曉，民主黨當選者寥寥無幾，梁為爭取議會席位，不得不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加入共和黨。及宋教仁被刺（見433—434頁），國民黨指目於袁及梁。梁夢寐以求的大政黨，遲遲不成，袁更無意用他為國務總理，始知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但仍想結合各種力量，以「禍國最烈」的暴亂派（國民黨）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之抗，而以「腐敗社會」（袁系）為第二敵，暫時稍為假借。他詆國民黨為橫行驕蹇的新貴族，稱袁的政府在法律上為國家機關，應予維持。五月二十九日，在袁決心與國民黨干戈相見的前夕，共和、民主、統一三黨正式合為「進步黨」，黎元洪任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湯化龍、孫武、蒲殿俊等為理事，直隸都督馮國璋、熱河都統熊希齡、雲南都督蔡鍔、廣西都督陸榮廷等為名譽理事，梁啟超是實際的黨魁。在袁或北洋派與國民黨的對峙中，進步黨成為第三種勢力，而與袁或北洋派一氣，國民黨主張主權在人民，採議會政治，地方分權，進步黨主張主權在國家，中央政府應強而有力。這是兩黨政策的分野。

二、袁與國民黨的武力決鬥

袁世凱就任總統不久，即有第二次革命之說。唐紹儀內閣倒後，袁將行帝制的傳說復盛。張振武等被殺，若干國民黨人，確有舉兵之議。孫中山、黃興北京之行並不能使袁釋然。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俄國與外蒙古私訂協約，中國朝野憤慨。孫中山表示願親赴東京，促成中、日同盟，與俄一戰。宋教仁亦欲自行出使，與日本提携。日本對袁向不友善，而與國民黨素有交往，袁恐孫、宋將借對外以對內，結援日本，陷己於不利，擬命他的私人曹汝霖前往，別圖活動，為日本所拒，更增加他疑懼。

袁為削奪都督權力，於各省置民政長，作為省行政長官，籍隸國民黨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堅決反對。孫中山建議民選，袁定要由中央委派，特頒誥誡軍人訓條，統一察吏政權。新任江西民政長遭到拒絕，袁歸罪於李烈鈞，斥其反抗中央，派軍艦開往九江制止。共和黨亦稱國民黨向日本借款購械，謀割據東南。袁聲言對於不逞之徒，當竭力殄除。李烈鈞反唇相稽，責中央濫肆淫威，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賴各方調停，暫獲無事。

袁對國民黨的更大忌恨為國會選舉。國會有兩大任務，一為選舉正式總統，一為制定憲法。一九一二年八月，國會組織法與議員選舉法公布，競選活動展開。國民黨聲勢浩大，悉力以赴，倘一旦獲勝，不僅內閣將為所得，袁的正式總統亦大成問題，縱令當選，國會所制定的憲法，勢必仍於其不利。國民黨報紙倡言，將來國會應自行集會於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庶可盡立法之責，制定最堅固的憲法。否則若議員「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將皆成為木偶，」等於說北京不宜再作首都。孫中山為對俄問題亦謂，非速行遷都不可。袁亦借對俄問題，發表憲法意見，謂今日總統不負責任，無以自由執行，能否達到廢除俄蒙協約目的，須視將來憲法如何。「若為弱國、亡國憲法，雖勝余百倍，亦無能為役。此後當為全國制定憲法，不當為防閑人制定憲法；當為總統辦事地方制定憲法，不當為防制一人制定憲法。故制定憲法

必取消防禦主義。」對於國會集會地點，一九一三年一月，除明令定為北京外，直隸都督馮國璋通電斥國會自行召集、自行指定地點之說為動搖國本的謬論，「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惟有執國法以隨其後。」袁與國民黨之爭愈趨尖銳，暗中對付國民黨要人的陰謀已經決定。

是年二月中旬，孫中山自上海至東京，發表演說，盼中日輯睦，並曾與日本首相桂太郎兩度密談，共同發起「中日同盟會」。兩人論到今後的中國，桂太郎說，袁世凱終非忠實的政治家，終究為中國敵人，亦為孫的敵人。不過今日如和他相爭，反無益有損。應以全力造成鐵道幹線，再起執掌政權，日本必全力為助。不數日，桂太郎去職，孫續與新首相山本權兵衛相晤，仍望中日聯好，經濟合作。袁於孫之訪問日本，本存猜忌，共和黨人復張大其辭，謂國民黨有不軌之圖。

半年以來，宋教仁極不滿於袁，惟聲稱不爭目前得失，自有將來局面。又說，欲救此拖延政局，須俟國會成立，改組一負責任政府。孫中山遊日之時，國會選舉結果已經揭曉，國民黨居於優勢。宋教仁所說的將來局面已至，一再在武昌、上海演說，指責現政府苟且因循，罪無可逭，扶危濟傾，惟國民黨是賴。國民黨議員明謂非倒袁無以奠定共和。三月初，宋又在南京攻擊現政府的外交、內政、財政，謂「中華民國之基礎極為動搖，皆現在之惡政府所造成。」俟正式國會成立，內閣宜由政黨組織，憲法由國會自訂，地方與中央分權，取消腐敗官制，國務總理由國會推舉，不必由總統提出與任命，使政府成為國會政府。這些露骨的批評，在民主國家原為常事，在袁世凱及國務總理趙秉鈞則難以忍受。黃興惡袁恣肆，欲因正式國會改選總統，章炳麟主推黎元洪，宋教仁同此意見，與黎已有成言，事為袁、趙偵知，決除宋而後已。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袁已對國民黨發出警告，凡有倡言革命者，依法嚴辦。趙秉鈞出身小吏，一向主管警務，習於下級社會情事，蓄養私黨以為爪牙。上述命令發布後三天，趙的秘書洪述祖召上海幫會頭目應夔丞北來，給以巨資，命暗殺國民黨首領。一九一三年二、三月間，國會召開在即，倒袁傳說愈熾。三月十三日，應夔丞函洪述祖，

謂宋在上海運動軍隊，若不剪除，大局將亂，洪命妥速辦理。二十日，宋在上海車站遇刺，二日後不治而死，年三十二歲。

任何人都明白宋教仁是死於政治暗殺。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全案破獲，證明袁世凱、趙秉鈞確為主使者。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自日本趕回上海，主迅速出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黃興等認為力有不足，主法律解決。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幾佔半數，如能再聯合其他黨派，先之以質問彈劾，繼之以憲法運用，最後不舉袁為正式總統，倒之並非難事。因之議久不定，遷延蹉跎。袁處於中央有利地位，兵符在握，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復予以財政支持，遂決與國民黨見一高下，調兵遣將，着着領先。

一九一二年六月，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接受了俄、日的要求，允對華借款不妨礙俄國在北滿、外蒙、新疆及日本在南滿、內蒙的特殊權利，合組六國銀行團，續與袁政府談判。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國新總統威爾遜(W. Wilson)以借款條件有損於中國行政獨立及門戶開放政策，宣布退出，六國銀行團變為五國銀行團。四月二十七日，袁政府不經國會同意，逕與簽訂所謂「善後大借款合同」，總額二千五百萬鎊（二萬萬五千萬元），年息五釐，八四折交款，用途為清還外債，支付政費，三天內交兩百萬鎊。¹借款的擔保為鹽稅，設鹽務總署，內置稽核總所，產鹽地區設分所，由洋員稽核稅收。又設審計院，內設外債室，由洋員任外債長，審計開支。美國雖未參加借款，而五月二日的承認民國政府，無異於對袁的精神支持。

正式國會於四月八日開幕，國民黨議員或因得失心重，或被袁收買，對宋案迄無表示。孫中山、黃興請嚴究要犯，指趙秉鈞主謀，趙反誣黃興設暗殺機關。對於大借款案，黃興國民黨都督紛紛反對，責政府違法，國會亦不予承認。孫曾對銀行團警告，並勸各國政府人民阻止付款，俱歸無效。這是民國以來帝國主義者初次助長中國內戰。

善後大借款成立，黃興知戰事難免，始有意舉兵討袁。五月，章

¹八四折後，實際借款為二千一百萬鎊，以二百八十萬鎊清還各省借款，二百萬鎊賠償辛亥革命期間各國損失，再扣除已墊付款六百萬鎊，僅餘八百二十萬鎊。

炳麟、岑春煊相繼到武昌，游說黎元洪。黎以宋教仁死，懼禍及己，復以與國民黨宿怨甚深，懷疑黃興欲圖湖北，已決心附袁，袁軍遂至漢口。屬於進步黨的都督，均隨黎為袁張目，甚至國民黨的山西、陝西都督亦列名於攻訐黃興的通電。袁得銀行團墊款後，即以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有如戰時內閣，明令痛斥第二次革命密謀。嚴捕內亂黨徒，撤銷黃興的陸軍上將，拿問國民黨國會議員。馮國璋等八十二人通電，決以武力對待傾覆政府之人，袁公開談話，倘孫、黃另組政府，即以兵力征伐。國民黨仍然舉棋不定，意氣大非兩年前可比，持重不敢輕發。社會人心對袁尚未完全絕望，認為他有經驗能力，國民黨迹近好亂，反袁為一黨之私。上海總商會呼籲和平，如先啓兵端，即為與人民為敵，視為亂黨。蘇、浙士紳及國民黨名流汪兆銘、蔡元培同在奔走調停。進步黨領袖梁啓超謂秩序一破，定招列強瓜分，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暴民政治之禍，甚於洪水猛獸。」在此苟安的心理下，國民黨再想重演辛亥年之事，已無可能，袁亦非當時的清廷可比。

六月九日，袁斷然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李為反袁的急先鋒，竟卸職而去。於是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參預反袁運動的粵漢、川漢鐵路督辦岑春煊一一被黜。李烈鈞到上海後，經孫中山的激勵，再返江西，以九江已為袁軍所據，七月十二日，改於九江以東的湖口舉兵，稱江西討袁軍總司令，二次革命正式爆發。黃興欲擁岑春煊主江蘇軍事未果，乃投袂而起，親入南京，迫江蘇都督程德全獨立。接踵而起的有上海、安慶、福州、長沙、重慶。袁的主力軍分由京漢、津浦鐵路南下，海軍駛集長江。江西、南京為主要戰場，李烈鈞、黃興先後兵敗，兩個月內，勢及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七省的討袁軍煙消雲散，¹孫中山等分走日本、南洋。

¹七月二十五日，袁軍李純奪取湖口，八月十五日入南昌。七月二十九日，黃興離南京，九月一日，南京為袁軍張勳佔領。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屢攻製造局不下，八月十三日失敗。廣州由陳炯明領導，八月四日，兵變被逐。八月六日，安慶柏文蔚出走。福建孫道仁、湖南譚延闓的獨立，頗為勉強，分於八月九日及十三日取消。重慶的熊克武於九月十二日為助袁的川滇軍所敗。

三、變象的君主

辛亥革命的結果是袁世凱取代清廷。他雖控有中央、北洋軍的防區，然勢力只限於直隸、山東、河南等省。經過二次革命，戰敗了國民黨，他的勢力始大加擴張，以倪嗣冲、李純、張勳、湯薌銘、龍濟光、劉冠雄分任安徽、江西、江蘇、湖南、廣東、福建都督。張勳因在南京縱兵殺掠，日人三名被戕，引起日本的嚴重抗議，英、美一致指摘，袁調張為長江巡閱使，以馮國璋代督江蘇。馮與倪嗣冲、李純為北洋嫡系，湯薌銘、劉冠雄、龍濟光為袁的私黨。雲南都督蔡錫於討袁之役，態度中立，事後被召入京，黎元洪亦被迫離開湖北。¹袁世凱幾盡有東北、華北、華中及東南瀕海諸省。

二次革命前後，國民黨的國會議員，有的懼禍離京，有的但圖苟全，有的脫黨附袁，已成四分五裂之局。袁以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熊稱決組成一個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經驗的內閣，但是外交、內務、陸軍、海軍、交通五部俱為袁系人物。進步黨所得的只有教育（汪大燮）、工商兼農林（張謇）、司法（梁啟超）及熊自兼的財政總長，情形與唐紹儀的同盟會內閣無異。²

袁之以熊組閣，不過借以表示他並非不容政黨，不用新人，實際是以進步黨為過渡，幫助他取得正式總統。選舉正式總統須先有憲法，制定憲法需要相當時間。袁恐夜長夢多，再有變化，將來的憲法對他是否有利，正式總統是否能必然到手，俱是問題。早在五月，當他與國民黨破裂在即之時，已要求國會先選正式總統，說是非如此不易獲得各國的承認，民國的地位不算穩固。所謂民國的地位，就是他的地位。八月，袁的軍事勝利在握，黎元洪與各都督，聯名請國會提前制定憲法內的總統選舉法，進步黨和他們一唱一和。此時國民黨議員愈

¹陸軍總長段祺瑞親至武漢，強黎北去，湖北都督由袁系的段芝貴繼任。黎到京後，被置於瀛台，即十五年前慈禧幽禁光緒處。

²梁啟超欲自任財政，袁不同意，經熊力爭，改由其自兼。

不敢立異，參議院、衆議院議長均爲進步黨，¹且公開主張擁袁爲正式總統。十月六日，依照總統選舉法由參衆兩院合組總統選舉會，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公民團」，包圍會場，非將他們屬望的總統當天選出，不許議員離開一步。經三次投票，一直到了深夜，袁方如所願。翌日，黎元洪再當選爲副總統。英、俄、法、德、義等國立即承認中華民國，美總統威爾遜亦向袁祝賀。袁興高采烈，於十月十日就職。

袁根本不想要憲法，亦不喜臨時約法。就任正式總統後六天，向國會提出增修約法案，要求擴大總統權力。國會以憲法草案已經脫稿，無增修約法必要。袁逕行致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詆國民黨把持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擬草案，侵奪政府權力，形成國會專制，影響國家治亂興亡。十一月四日，發動政變，指國民黨議員構煽爲亂，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籍隸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從此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及憲法草案無形撤銷，時距袁當選總統不及一個月。殘餘的國會提出質問，熊希齡答稱，國會現已無權。翌年（一九一四）一月，再下令停止所有議員職務，國會正式解散，各省議會亦先後遭到同一命運。梁啓超曾勸袁對國民黨不可過事壓迫，方可携國會以號召天下，袁不之從，進步黨一樣殃及。輿論不滿於袁，對進步黨亦嚴加責難，多歸罪於梁，謂共和國之無國會，自中華民國始。解散國會出自總統，副署出自總理，以社會所最信仰之人，而又自負爲名流內閣者，竟出於此，實百口莫辯。對於現實的財政問題，熊更爲棘手。掌握鐵路收入與交通銀行，人稱「梁財神」的「交通系」首領梁士詒，有意與熊爲難，熊與梁啓超一籌莫展。有人勸他們從速自拔，勿再爲他人作工具，袁亦望其早去。一九一四年二月，熊、梁終於掛冠。戊戌變法，梁等曾爲袁所賣，現又重嚐苦果。

國會解散後，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袁命各省派員來京，會議地方行政。尋擴大爲「政治會議」，以前清雲貴總督李經羲爲會長，

¹參議院議長初爲國民黨的張繼，七月，張繼離北京，由進步黨的王家襄繼任，衆議院議長爲湯化龍。

各都督請袁諮詢以救國大計及增修約法程序。政治會議議決停止國會職務，另設造法機關，修改約法。此一造法機關，定名曰「約法會議」，一九一四年三月成立，議員名為選舉，實同指派，變節的國民黨人孫毓筠為會長。五月一日，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公布，即「新約法」。廢止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即「舊約法」。新約法規定總統總攬治權，對國民負責；舊約法規定以國會、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治權，內閣對國會負責。新約法規定立法機關為「立法院」，由總統召集，別設「參政院」為總統諮詢機關；舊約法規定國會自行召集。新約法規定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締約；舊約法規定以上各事須經國會同意。新約法規定總統得頒給爵位；舊約法無此規定。新約法規定總統為行政首長，置國務卿贊襄之；舊約法規定國務員輔佐總統，負行政責任。新約法規定遇有非常事變，總統得為財政緊急處分；舊約法無此規定。新約法規定憲法由參政院起草審定，再由國民會議決定；舊約法規定憲法由國會制定。新約法規定立法院未成立前，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易言之即不擬成立立法院。

新約法公布之日，廢除國務院，於總統府內設「政事堂」，以國務卿為首領，下置左丞、右丞，徐世昌為國務卿，袁的親信楊士琦為左丞，徐的親信錢能訓為右丞。總統為海陸軍大元帥，置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又置將軍府，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將軍名號，督理軍務，作為中央的臨時派遣官。地方行政採省、道、縣三級制，收民政長為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事。

袁的權力雖極度擴大，仍感不滿，尚欲永遠保持，以及於身後。供他指揮的參政院有七十三名參政，由袁任命，多為新舊官僚，院長為副總統黎元洪。一九一四年八月，參政院議決修正總統選舉法，交約法會議討論，十二月，通過頒布。總統任期，由五年延至十年，期滿參政院得議決由總統連任。如須改選，現任總統得推薦三人為候選人，現總統亦可繼續當選。總統選舉會由參政及立法院議員各五十名組成。袁不只是獨裁元首、終身總統，並可指定繼承人，與皇帝毫無二樣。他的外籍憲法顧問美人古德諾（Frank J. Goodnow），日人

有賀長雄，對於約法、總統選舉法的修改，均參與其事。

有了君主的實際，還要在形式上予以襯托。國務卿的「卿」字，係隱喻總統之同於皇帝。左丞、右丞及總統府的內史、承宣等官名，及文官官秩之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少士，無一非封建舊稱。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尊孔為鞏固君權的必要之舉。一九一四年二月，規復祭天、祀孔。祭天由總統主持，用古代冠服，行跪拜禮，祀孔的禮儀畧同。此外尚有覲見條例，軍人訓條命軍人「忠事元首」。

一九一四年為袁世凱大力復活帝制的一年，亦是清室遺老認為復辟在望的一年。他們對於在前清歷居要職的趙爾巽、錫良、李經羲、寶熙、勞乃宣等之被任為參政院參政，徐世昌以清室太傅之被任為國務卿，及清史館之設置（館長為趙爾巽），無不大感興奮，以為袁有意復辟。辛亥冬間，勞乃宣曾發表一篇《共和正解》，說是「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故曰共和，」希望保持宣統的名位。是年（一九一四）他又作了一篇《共和續解》，為袁代籌，勸袁暫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國」，俟總統十年任滿，將政權還之宣統。康有為乘袁倡行尊孔之時，大事宣傳，其意實在復辟。禮制館顧問官劉廷琛請返政清室，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及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分在北京、上海公開講演復辟。他們會錯了袁的意圖，變更國體的願望雖然彼此相同，但是復辟的主張與袁的帝制自為打算，則南轅北轍，無法兩行。袁加宋育仁以「邪說惑眾，紊亂國憲」的罪名，解送回籍，復辟派大為沮喪。

第二節 俄、英侵畧邊區，日本謀吞中國

一、俄、英割裂外蒙、西藏

俄國垂涎外蒙由來已久，日俄戰後，因在滿洲的擴張被阻，日本又承認了它在外蒙的特殊利益，窺伺愈力，清政府不得不變更以往的

消極政策，允漢人出邊開墾，漢蒙通婚。至一九〇九年，進入外蒙的漢人不下十萬人，同時興辦新政，添置了許多有名無實的機構，庫倫活佛王公的權利受到侵奪，蒙民的負荷爲之加重，俄人從中煽惑，活佛王公陰圖反抗。俄國指中國對外蒙的措置，有礙睦誼，應即停止，否則將籌對付之方。武昌革命發生，清政府無力北顧，俄國認爲是瓦解中國的機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八世實行獨立，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稱大蒙古帝國皇帝。俄國繼之要求中國不在外蒙駐兵、不殖民、不干涉內政，如有改革，須得俄國同意。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以民族平等，袁世凱就外蒙利害，分勸外蒙取消獨立，活佛請袁先與俄國相商。俄國並不欲於此時使外蒙與中國分離，但望排除中國的勢力。因爲外蒙力量薄弱，如果獨立，或將成爲俄國的負擔，如果坐視不問，中國對外蒙古的統治勢必加強，最好是使外蒙自治，由俄國獨佔經濟權益，顧慮的爲日本、英國的態度。一九一二年，分別與日、英成立密約及諒解，劃分俄、日在內蒙古的勢力範圍，而以西藏爲對英的交換條件。同年十一月三日，與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約」，俄助外蒙自治，代爲練兵，保持現有秩序，不准中國派兵移民。另訂一「商務專條」，俄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往來，免納出入口稅，開辦銀行、郵政，租購土地，經營工、商、林、礦，航行河流權。

經過長時間的交涉，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換文，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不駐兵、不設官、不殖民，僅可任命大員及專員，分駐庫倫等地，其他問題另行協商。一九一四年九月，中、俄、蒙三方代表會於恰克圖，俄國多方刁難，袁世凱不敢強爭。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蒙成立協約，俄蒙商務專條繼續有效，活佛受中國冊封，外蒙設立自治官府，得與他國訂立有關工商事宜條約，限定中國駐庫倫大員及各地專員衛隊，中國對外蒙僅存宗主權的虛名。

英國對西藏的侵畧，亦於辛亥革命之時，復行轉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駐拉薩的川軍譁變。達賴十三世得英國餉械之助，曠使西

藏僧番圍困川軍，擾及西康。一九一二年，袁世凱命四川、雲南派兵赴援，印度總督亦遣達賴自大吉嶺回藏。北京英國公使抗議中國進兵，要求不得干涉藏政，否則不承認民國政府，將以實力協助西藏獨立。袁的政權有賴英國支持，命西征軍停進，開復達賴名號，拉薩駐軍被迫繳械，第二年，達賴與庫倫活佛互認獨立。

英恐俄人利用蒙人插足西藏，勾結一向親俄的達賴，因之希望與中國早了藏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Simla）會議，依英國代表麥克馬洪（A. H. McMahon）的要求，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一暫時草約，分西藏為內外二部，以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為內藏，其以南及其以西為外藏，劃為自治區。中國不在西藏駐兵、設官、殖民，僅可於拉薩派一大員，英國派一商務委員，各置衛隊，達賴由中國授以封號，但未得北京承認。七月二日，英國逕與西藏簽訂正約並換文，劃分藏、印東界，即所謂「麥克馬洪線」。是後達賴東犯，西康幾盡為所陷，事實上西藏等於脫離中國。

二、日本力圖南滿、東蒙與進兵山東

一九〇七及一九一〇年，日俄兩度訂立密約，視滿洲為己有（見354—356頁）。武昌革命軍起，日本恐波及滿洲，一面由外務省命駐俄大使與俄國共商應付，一面由軍部命川島浪速輩勾結宗社黨肅親王善春，誘煽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謀建立滿、蒙政權。因美、英、德反對，中國南北統一，所圖未成。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日俄簽訂第三次密約，將兩國在南滿北滿的利益分界線展至外蒙邊境，劃內蒙為東西二部，東部包括熱河在內，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西部包括察哈爾以西，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從此日本將南滿、東蒙合稱為滿蒙，力謀擴張鐵路，壟斷經濟利益。一九一三年初，要求減低朝鮮滿洲陸路通商關稅未遂，及袁世凱決心與國民黨一戰，五月二十九日，終於接受，與日本訂立「滿鮮國境通商稅約」，關稅減輕三分之一，日本在南滿貿易居於絕對優越有利地位。二次革命期間，國民黨曾得日本之助，失敗後紛去日本，繼續倒袁活動。袁希望日本勿與交往，尤盼承認他

的政府，不惜再付出代價。日本乘機勒索，提出滿蒙鐵路問題，袁全部允諾。十月五日，中日訂立「滿蒙鐵路借款預約辦法大綱」，一稱「中日滿蒙五路換文」。五路爲奉天四平街經鄭家屯至洮南線、吉林長春至洮南線、奉天開原至吉林海龍線、海龍至吉林省城永吉線、洮南至熱河承德線，合計約一千六百公里，均與南滿、安奉鐵路連接，將南滿、東蒙、朝鮮打成一片，形成一個鐵路網，阻止中國建築南滿及北滿、奉天至吉林的鐵路計劃。一九一四年六月，復宣布他國若在南滿東蒙經營鐵路，須得日本的許可，儼然以南滿東蒙的主人自居。

經過中日、日俄戰爭，日本每十年一戰，每戰必有所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爲時會又臨，準備加入戰團，奪取德國在東亞及太平洋的權益，聲言於必要時履行英日同盟義務。中國自知處境之危，八月三日，通告各國不得在中國領土、領海及租借地交戰，又三天，宣布中立。日本已決定進軍山東，攻奪青島（膠州灣），責中國不先與相商，即限制戰區。英國恐日本勢力增長，危及自己的地位，英使朱爾典勸中國自取青島。中國亦有此議，擬一面與德國磋商，一面派兵圍守，將青島收攏，使日本失去對德國開戰口實。袁世凱畏首畏尾，不敢採行，反與日本密洽，如日本使國民黨人離境，可不反對日軍登陸山東。

八月十五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軍艦退出中國海面，將青島交付日本。同日，知照中國，盼信任日本，倘中國發生內亂，願協助平定。青島問題，中國不宜自行處置，否則將引起嚴重後果。北京德使館以事機急迫，有意將青島交還，曾與北京商談，立遭日本詰問。中國駐德公使亦在柏林試談，德政府以日本既發出最後通牒，不容再作其他考慮。再者，青島的命運決定於歐洲戰場，確信最後勝利，必屬於德國。北京轉詢英、美態度，英以日本參戰成爲定局，縱令德將青島交還中國，日本亦不承認，仍必出以戰爭。美以日本保證對華無領土企圖，將來青島可歸還中國，並聲明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表示滿意。中國建議將青島暫交美國接管，日後再歸還中國。美國不欲另生枝節，說是無能爲力。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對德宣戰，要求中國劃黃河以南地區，供日、德軍交戰。九月二日，日軍逕行登陸山東半島北部的龍口，佔領附近城池。中國無奈，允以龍口、萊州、與毗連膠州灣各地為日、英、德三交戰國軍隊行用之地。日本對德開戰，係以英、日同盟為借口，實不成為理由。日外相加藤高明亦說，根據盟約，日本並無參戰義務，但應利用這個機會，昇高日本的地位。首相大隈重信坦白表示，參戰是為伸張日本的權利。日俄戰爭是在中國境內進行，此次也是一樣。日軍登陸龍口之後，西南侵入不在戰區內的膠濟鐵路的濰縣車站，所至凌辱官民，掠取財物。中國責以破壞中立，日本指膠濟鐵路為膠州灣租借地的一部分，決全部佔有，中國須撤退沿路駐軍，否則如有衝突，即認為助德敵日。十月六日，濟南車站被佔。中國再三抗議，謂侵犯中立，已達極點。日本悍然覆稱，有此必要，英國亦謂日軍之佔據膠濟鐵路，乃正當防衛。各省當局請袁嚴切交涉，令日軍撤退，如再有意外行動，惟有最後對付，袁但命鎮靜以待。圍攻青島的日英陸海軍二萬餘人，德軍四千人抗拒四十日，至十一月七日，力屈而降。中國於戰爭結束後一個月，要求日本撤兵，又一月，取消山東特別行軍區域。日本指為未當，聲明日軍不受影響與約束。舉世震駭的二十一條，隨之提出。

三、二十一條要求

日本對德宣戰前後，日本報紙紛主照日、韓先例與中國締結協定，並刊載自製的「中日新議定書」。八月二十五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建議外相加藤高明，與袁世凱交涉，袁如承認旅順、大連租期延長為九十九年，允日人在南滿、東蒙有居住營業自由，借用日款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鐵路，日本可令中國革命黨人離境。

十月二十九日，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向內閣及元老提出「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更為銀毒週詳，說是對華行動，不當專注意於青島的攻佔，須重視更遠大的戰畧，採取主動外交政策，以果決態度，使中國投入日本懷抱，與之訂立防禦同盟。具體事項：一為中國內亂或

與他國交戰，日本給以兵力援助，負保全中國領土、維持治安之責。二爲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內蒙的特殊地位，將統治權讓與日本。三爲日本須取得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如鐵路、礦產。四爲中國將福建要港讓與日本，並給與該省全部礦權。五爲由日人訓練中國陸軍、海軍。六爲統一中國軍械，採用日制，由日本協助於各要地設兵工廠。七爲整頓中國財政，以日人任顧問。八爲延用日人爲中國教育顧問，各地設立日語學校。九爲中國與他國訂立借款租地讓地條約，須得日本同意。

意見書復就如何製造中國內亂，如何應付列強，加以論列。袁世凱表面上對日本表示善意，實欲依賴其他列強，以對抗日本。目前袁無從獲得列強借款，將不能維持秩序，結果是中國分裂。日本不可一唯助袁，因爲袁奸滑詭譎，今日可爲日本之友，一旦大戰終了，又將背棄日本而與他國相結。日本應誘致中國革命黨、宗社黨及其他不滿於袁的分子，製造紛亂，袁政府必隨之而覆，日本即可擇一有勢力、有聲望之人，組成一新政府，助其恢復秩序，中國人民將傾心歸順日本。不過中國如仍保持共和政體，將爲中、日同盟的一大障礙。所以必須使變爲君主立憲，這個原則極應堅持。至由何人爲君主，以後相機決定。對於列強，當首與俄國成立特殊諒解，確定日本在滿、蒙的地位。英國的勢力範圍在長江、西藏，如予認可，自不致反對日本的政策，且亦無此實力，法國更無足輕重，所當注意的爲美國。美國在遠東雖擁有海軍，如不侵及其既得權利，當可滿意，並不足懼。總之，日本應斷然決定對華政策，不受他人指揮，而指揮他人，以絕對信心，貫徹施行，一舉而獨霸遠東，控有中國。此外尚有陸軍省擬訂的「中日交涉事項覺書」，參謀本部的「中國問題處理大綱」。日本內閣根據以上計劃，於十一月十一日，作成決議二十一條，十二月三日，加藤以之交付奉召返國聽訓的日置益，命相機提出。十二月四日，日置益離東京經山東回任，與使館人員會議後，有所修正。加藤令仍照會原案，儘速向袁世凱交涉。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一日，發出最後訓令，同月十八日，日置益將二十一條面交袁世凱。

二十一條分爲五號。第一號爲關於山東者，中國允許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山東省內及其沿海土地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煙台或龍口至膠州鐵路，由日本建造；開山東省內主要城市爲商埠。第二號爲關於南滿、東蒙者，中國承認日本在該地的優越地位；旅順、大連租借期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展至九十九年；日本得在南滿、東蒙享有土地租借權、所有權，爲蓋造商工業房廠及耕作之用，自由居住往來，經營商工礦業；中國如允他國在南滿、東蒙建造鐵路或向他國借款建造鐵路，或將稅課作抵向他國貸款，或聘用政治、軍事、財政顧問、教習，皆須得日本同意，吉長鐵路歸日本管理。第三號爲漢冶萍公司作爲中日合辦，屬於該公司各礦的附近礦山，不准他人開採。第四號爲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號爲關於全部中國者，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充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聘用多數日人；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向日本採辦，或中日合辦軍械廠；中國允給內地所設醫院、寺院、學校以土地所有權；中國允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鐵路；日本對於福建籌辦鐵路、礦山、整頓海口（船廠在內），有優先投資權。

加藤謂第一至第四號的實行爲絕對必要，應竭盡手段，以求貫徹。第五爲勸告事項，但總期實現。日置益提出時，並未露示，迫袁全部接受，並嚴守秘密。

四、袁世凱對日屈服

袁世凱知道這幕交涉重大，他的初步對策，一爲故示強硬，使日本有所瞻顧，並希見諒於國人。一月十九日，他對他的日籍顧問阪西利八郎，斥日本竟以亡國奴對待中國，中國絕不作朝鮮第二。外交次長曹汝霖復告日置益，謂日本要求難以接受，接着各省將軍聯名反對。二爲將內容外洩，促起輿論與列強的注意，期對日本有所影響。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報紙刊出此項消息，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 S. Reinsch）亦獲悉要求的大概。三爲拖延時間，以觀變化。一月二十七

日，更易外交總長，以陸徵祥代孫寶琦爲手法之一。日本對於袁的權術及隱衷，一一窺破，絲毫不以他與各省將軍的表示爲意，但頗重視消息的漏出，招來列強的干涉，警告北京外交部勿施遠交近攻之計，應迅速談判。

日本深知袁急欲帝制，所顧慮的爲國人的反對，特別是國民黨。二十一條甫一提出，即對袁利誘威迫。日置益先表示願保障袁的地位及身家安全，取締在日本的革命黨、留日學生，糾正在華日本浪人商民行事。繼謂日本人民懷疑袁的態度，常抱反感，有援助革命黨倒袁之議。¹今次條件，須絕對同意，方可證明對日親善，以後日本可遇事相助。若遷延遲疑，將生不虞事態，至有更甚的要求。加藤面告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爲袁永久計，應與日本結合。中國秩序雖已漸次恢復，隨時仍有發生動亂可能。袁爲自身考慮，對共和政體將作何改變，殊值得三思，如因政體而引起革命，恐非袁本人所能防止。大隈開門見山的說，中國若行帝制與日本爲同一國體，當樂於贊同。日本報紙宣稱，中國苟能與鄰邦親善，不論政體如何，皆所歡迎，要親善就須答應日本的要求。袁於這些言論不能無動於中，袁克定亦殷望做到中、日唇齒相依。

美國爲唯一尙未捲入大戰漩渦的大國，芮恩施電告國務卿白萊安（W. J. Bryan），謂中國的獨立與門戶開放已受到威脅。中國如予拒絕，日本將製造中國變亂，作爲軍事行動的口實。中國應將二十一條通知美國，美國應與英國取得諒解。白萊安的看法有些兩樣，不若芮恩施的積極。威爾遜要白萊安注意日本目前在華地位和意向，命芮恩施對中日談判暫不干涉。

二月二日，中日正式談判終於在日方催促之下開始。中國代表爲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日本代表爲公使日置益、參贊小幡酉吉。陸不習日事，曹爲親日派。中國初僅允議第一、第二號，以日方

¹一九一五年五月，孫中山致函大隈，請贊助倒袁。八月，又屢與大隈毅、頭山滿商談。

堅持所有條款均須談判，數日後復允議第三、第四號。日方謂第五號亦須作大體的討論。關於第二號，雙方爭執不下，三月初，日方聲言如短期內無滿意的結果，將生不測。日內閣決定出兵，三萬日軍開往南滿、山東、天津，軍艦在渤海游弋。中國逐步屈服，惟仍拒商第五號，四月十七日，交涉停頓。

美國雖暫不干預，但對中日交涉並未忽視。日本否認有侵害中國領土完整及他國在華權利的要求，先將第一至第四號通知美、英等國。美國重視的為第五號，對其餘各號不全反對，日本始以第五號相告，說是僅係「請求」、「願望」而非「要索」。美國再對日本申明，美國的條約權利必須尊重，承認日本對山東、滿、蒙的特殊關係，不反對關於福建的要求。中國請美國勸日本斂戢，美國僅於四月中旬，指日本的要求違反中國行政獨立和門戶開放政策，美國決不拋棄在華利益。英國對日本未將第五號要求見告，表示遺憾，盼尊重英國在華既得權利及中國獨立，但仍同情日本擴張在滿洲的地位。

四月二十六日，中日又有一次會議，日方提出修正案，僵局仍未能打開。英、美為第五號要求，續對日本施以壓力，英國警告勿因此與中國決裂，以致違反英日同盟精神，倘訴諸武力，須先諮詢英國意見。美國謂不可強制中國屈服，應審慎寬容。日本內閣依元老建議，將第五號酌予刪削。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置益發出最後通牒，限於五月七日下午六時，應允第一、二、三、四號，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的事項，屆時如無滿足答覆，將採必要手段，是為「五七國耻」。這時日本已下戒嚴令，各報聲言專與袁世凱為敵，傳聞已與段祺瑞、馮國璋、張勳及袁的政敵岑春煊密洽。袁擬再事讓步，朱爾典亦勸他接受，以避危機。袁為自己解嘲，謂第五號中有五條已撤回不議，其餘較初案挽回不少，權衡利害，惟有接受。日置益定要中國於覆文內注明第五號「日後另行協商」字樣，袁亦照行。五月九日晚十一時，外交部將覆文送出。五月十一日，美國照會中國、日本，如中、日成立有損美國及其人民的在華條約權利、中國政治或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的協定，美國斷不承認，亦即所謂不承認主義。又稱，中、日所訂任何

條款，經中國承認，而對外人在華地位有變更者，美國將同樣享受其權益。這又等於承認，不過美國亦須分一杯羹。十三日，北京向各國宣布交涉始末，謂中國之接受日本要求，乃出於無奈。倘因此而令列強維持中國獨立、領土完整、保存現狀、及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所訂各約受到影響，則非中國所致。亦即是說，此次之事是由於日本的強迫，非中國所願，不能負責。

五月二十五日，中日簽訂了兩個條約，互換了十三件照會，總稱為「中日新約」。第一，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允借款建造煙台至濰縣鐵路，山東加開商埠，境內及沿海島嶼概不租借或讓與他國。第二，中國允將旅順、大連租借期，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均延長為九十九年。日人得在南滿商租土地，居住往來，經營商、工、農業，得在東蒙與華人合辦農工商業，允於東蒙開置商埠，允日本在南滿採礦，允借日款建造南滿、東蒙鐵路，允在南滿聘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警察顧問教官。第三，中國允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第四，中國不准他國在福建設造船所、軍用貯煤所、海軍基地及其他軍事設施。對於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之事，袁已先期以命令宣布。至是日本的侵畧範圍，正式擴及山東、福建、長江與中國沿海，並強化了南滿、東蒙的勢力。

第三節 洪憲帝制

一、偽造民意

三十年前，袁世凱年方二十餘歲，初預兵權，即動取代朝鮮國王之念，至於何時想做中國皇帝，雖不易斷言，但自任直隸總督之後，權位及野心，與日俱增，已有人說他意圖帝制。一九一一年十月再起，不臣之心愈甚。十一月四日，袁克定對英使朱爾典說，革命黨將來會擁戴他父親做皇帝，共和僅是過渡階段。楊度亦謂將來袁世凱可為拿破崙。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後，曾對段芝貴等說：「作事須看風行船，

今日民氣騷浮，不妨暫任總統，他日有機會不為總統時，則為皇帝，亦不為晚，如必拘在數日內，則身敗名裂矣。」經過二次革命，他以為人莫予毒，遂刻意經營。迨日本進兵山東，二十一條要求繼之而至，楊度、袁克定公然以變更國體之說，向梁啟超試探。

袁世凱何以於外交危急之際，加緊圖謀帝制，或自有看法。就國際而言，英國一向是他的支持者，可無須顧慮，目前亦無力和他為難。唯一未捲入世界戰爭的美國，總望中國能有一穩固政府，足以抗拒日本的壓力，維護美國的權益，認為袁世凱最有這種資格，所以始終不以國民黨反袁為然，既首先承認袁的政府，北京美使館對於二次革命復屢加指責，謂孫中山的行事不切實際。袁當選為正式總統時，威爾遜立即電賀。白萊安、芮恩施對於袁之取消國民黨國會議員資格，謂係保持統一的必要措置。威爾遜準備派人代袁練兵，同意防制國民黨在美國購置武器。對於日本的野心，袁雖非不知，不過日本一再旁敲側擊，露示贊助帝制之意，如許以相當條件，當不致阻撓。至於國內國民黨的勢力已一掃無餘，無地立足，意氣消沉，甚而說革命有罪。黃興、李烈鈞等為使袁全力應付日本，通電否認假借外力，再起革命，當謹守繩墨，決不危及國家，袁認定革命黨已不能有為。加之北洋軍遍駐南北，不屬袁系的僅有偏遠貧瘠的雲南、貴州、廣西，不足為患。

「中日新約」訂立後六天，帝制運動轉急，袁以素不喜共和的王士珍代替與袁有歧見的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同一天，頒予策劃帝制的楊度以「曠代逸才」匾額。六月，公布「懲辦國賊條例」，以壓制反對派。對於日本報紙所載袁將行帝制的消息，雖予否認，而進行不懈。兩月前梁啟超知袁已類騎虎，勸他懸崖勒馬，勿自陷絕境，動搖國本。至是復邀江蘇將軍馮國璋入京，由馮向袁面詢，袁仍指為謠言，說是總統的權力已無不足，何必為帝？若為子孫，更非所計。如果相迫，將避居海外。

袁不願逕自稱號，希望形式上出自民意推戴。第一步為製造輿論。八月三日，授意憲法顧問古德諾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論》，結論為如果不引起中國人民與外國的反對，繼統法圓滿確立，君主立憲制的發

展俱備，君主制較共和制於中國爲宜。古德諾素主集權，不論是否爲袁立言，袁正好引爲借口，謂號爲美國政治學家亦贊成君主。八月十四日，楊度與變節的國民黨人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學者嚴復、劉師培發起「籌安會」，宣稱共和國體常致爭亂，古德諾既主中國採君主國體，因組籌安會，以籌國家治安，據其所見，貢獻國民。反對者紛紛上書，請誅奸救國。袁宣稱帝王、總統皆非所願戀，不過永保國家安全問題，人人均當研究。籌安會爲積學之士所組成，從學理上討論君主民主制的優劣，不涉及實際政治，政府未便干涉，他本人決不背總統誓詞。於是籌安會大張旗鼓，通電各省長官商會，徵求會員，請派代表來京共商。袁的另一顧問日人有賀長雄發表《觀突閉評》、《共和憲法持久策》，與相呼應。¹楊度、劉師培各撰《君憲救國論》、《國情論》，袁的中外通訊社有《國體研究宣言書》，帝制的呼聲，響徹雲霄。

籌安會致各省的通電發出的第三日，湖南將軍湯薌銘即請袁「速正大位」，奉天將軍段芝貴約各省長官以公民名義向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北京軍人、官僚首先行動。袁的左右有粵派、皖派之別，分由楊士琦、梁士詒領導，彼此暗鬥。時粵派失寵，欲借促成帝制，博取袁的歡心。袁對外人態度，時在注意，上海《字林西報》云，國體應取決於國民，國民如贊成改變，外人自無異議。梁士詒勸袁採行，袁向參議院宣稱，改變國體之事不可急劇輕舉，「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並命籌安會只可討論國體，不得干涉及其他。梁士詒遂組織變更國體請願聯合會，專司其事。參政院建議召集國民會

¹古德諾原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兩年前應聘爲中國憲法顧問，有賀長雄爲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學校長時所推薦。兩人分於本年返國，七月中旬及八月下旬回至北京，可能是帝制派故布疑陣，使人以爲他們曾得美、日當局授意。八月十七日，古德諾對記者否認贊成中國採行君主制，指籌安會引徵所言有誤。二十八日，籌安會含糊聲明，只說古德諾對於君主、共和問題，除呈送袁的節畧外，無他意見。

議，¹或另籌徵求民意善法。梁士詒認為緩不濟急，參政院決改以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籌安會以君主國體即可見諸事實，易名為憲政協進會。

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選舉，於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辦竣，同時在當地投票。十一月十五日，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推戴袁為「中華帝國皇帝」。推戴書的措詞完全一樣，委託參政院為總代表，預為部署操縱的為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將所有推戴書上奏，另備總推戴書，說是「皇天景命，」「人心咸歸，」請袁「登大寶而司牧羣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袁答稱：「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餘地。」「本人總統既以救民為重，因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不過自己的功業不足稱述，道德上對清室不能無愧，信義上對國民無以自解，對推戴一事，「無任惶駭，」不敢接受。參政院於十五分鐘內，將長達二千六百餘字的第二次總推戴書發出，歷舉袁的經武（小站練兵）、匡國（庚子拳亂）、開化（北洋新政）、靖難（辛亥革命）、定亂（二次革命）、交鄰（二十一條）六大功烈。至於清室，已仁至義盡，「絕續亦不相蒙，」對於國民宣誓，乃循例之詞，國體已變，誓詞當然消滅，道德並無所慚，信義亦可自解，仍請他「正位登極。」第二天袁接受了推戴，俟籌備完竣，再行施行，帝制運動算是告一段落。是後十餘日，袁忙於百官朝賀，命起草君主立憲憲法，設大典籌備處，大事封爵，申令舊侶、耆老、碩故，均勿稱臣，²改太監為女官，定明年為「洪憲」元年。他之不立即登極，理由為事體繁重，未可遽速舉行，以踐外交宿諾。實際上是因為日本的壓力愈來愈亟，肆應維艱，不得不爾，他的命運非他自己所能決定。

¹根據袁的新約法，國民會議為復決憲法的機關。

²黎元洪被封為武義親王不受。重要軍人封公爵，段祺瑞不在其內，各省將軍、巡閱使封侯、伯、子、男爵。舊侶、耆碩為黎元洪、突勛、載灃、那桐等，耆碩為王闓運、馬良，故人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稱為「嵩山四友」。對於清室，申明優待條例永不變更，允列入憲法，清室聲明贊同袁的帝制，北京城內同時有兩個皇帝。

二、日本的一擒一縱

袁世凱接受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的最後通牒後，發出一道對全國官吏的密諭，歷述日本對中國的陰謀及此次要求的酷烈，應痛定思痛，力謀振作。倘「事過輒忘，恐大禍轉身即至，神州陸沈，不知死所。」大家須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他之愛國熱忱，不後於任何中國人，似乎有了大徹大悟。但是事過輒忘、無天良、懷私見的是他自己，不久即加速帝制運動。他以爲給日本的不爲不少，日本已相當滿意，一時不會再生枝節。何況日置益、加藤曾隱約表示贊同。大隈復告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關於君主立憲事，請袁總統放心做去，日本甚願幫助一切。」帝制派利令智昏，大爲放心。大隈則存心置袁於爐火之上，遂其所欲。

九月初，籌安會正在緊鑼密鼓，大力進行之時，大隈對報界談話，加以鼓煽，說是中國今日的共和政治，實難達成統一全國之實。中國國民政治思想貧乏，對於君主制或共和制，在所不問，只要國內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滿足，大多數人對於恢復帝制，必不反對。跟着電令駐華使領，如中國不因帝制而引起內亂，影響東亞和平，日本不擬干預。不過中、日關係密切，此事將來或許具有重大影響，此際不可表示態度，以免有束縛日本行爲之虞。同時面告陸宗輿，萬不可因帝制致亂，有妨鄰國商務。又說：袁如誠意聯日，日當盡力援助。日本報紙謂，中國改行帝制，必釀大亂，日本當援美國干涉墨西哥之例，要求中國政府給以保證。軍方主張在帝制將成之時，表示干涉態度。是月杪，大隈命駐華各地領事，調查是否將有暴亂。

袁世凱亦恐列強不承認他的帝制，尤慮日本勒索，希望得到英、美支持。十月初，晤英使朱爾典，朱爾典表示贊同帝制。袁又告訴美使芮恩施，國體已由國民投票決定，願聘用外國專門人才，協助各部行政事宜。英國雖憂慮因帝制而予日本以可乘之機，又恐袁世凱爲德國所誘，對英更爲不利，最好是不要在歐戰期間行帝制。但袁迫不及待，英國惟有順水推舟，以爭取袁的好感。美國認爲帝制爲中國內政問題，

袁爲中國的安定力量，應給以扶植。及袁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日本加急進行干涉。十月十四日，內閣通過對袁警告，請英、俄、美、法一致行動。英、俄爲保持與日本的協同關係，惟有追隨，倘勸告無效，仍應承認。袁得朱爾典通知，感事態嚴重，分別將帝制「實情」，密告俄、法、美，謂「各省異常平穩，民心異常擁戴，秩序不致擾亂。」但日本政策已定，不待美、法答覆，十月二十八日，由代辦小幡酉吉邀同英、俄公使向外交總長陸徵祥口頭勸告，說是各地反對帝制的情緒正在廣泛醞釀，不安的情勢到處瀰漫，應善顧大局，延緩變更國體計劃。十一月一日，陸徵祥照覆，國體係民意決定，各省皆可負治安之責，少數亂徒毫無實力，斷無可慮之事。接着法、義的勸告踵至。美國仍以事關中國內政，任何干涉，均屬侵犯中國主權，謝絕參加。芮恩施一再報告國務院，中國各階層人士對於變更國體極感欣慰，並無有組織的反對運動，不過革命黨不免有個人暴動。

袁世凱認爲各國勸告只是日本作祟，大隈會表示中國若相依賴，日本無事不可幫助，因命陸宗輿根究其真意所在。陸宗輿以爲不妥，怕要價必大，日本輿論主張將中日軍事、政治同盟等問題一併解決。小幡酉吉續施壓力，必須答應延期，陸徵祥答以本年內斷不實行。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亦告陸宗輿，如肯延期至適當時期，當予便宜援助，但必須在實行之前，與日本確實接洽。倘突然實行，將視爲對日本的侮辱。可見日本並非絕對反對帝制，惟須先與商妥條件。袁以列強步驟不盡一致，日本勢難一意孤行。美國既未參加勸告，朱爾典又說，「若中國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係內政，他人不能干涉。日本勸告或係照例文章。至於乘機取利，似亦難言。」十一月十一日，外交部知照日、英、俄、法公使，爲尊重各國勸告，且以籌備需時，變更國體一事，當擇適當時機，謹慎將事。十二月十三日，即袁接受帝位的次日，小幡酉吉單獨照會外交部，要求對改行帝制之事，於三天內有誠意滿足的答覆。十五日，再與英、俄、法、義公使第二次警告，謂中國政府屢云維持境內治安，保守秩序，五國對於今後形勢如何演變，持靜觀厥後態度。外交部仍說中國政府有力消弭隱患禍亂。

日本一面對袁警告，一面策動反帝制派舉兵。第二次警告前五天，反帝制的武裝行動，一度起於上海，警告後十天，雲南宣布獨立。石井菊次郎聲言此後袁的一切行事，非先與日相商不可。袁決以慶賀日皇加冕、贈送勳章的名義，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特使，赴日切商，日本允許接待。不料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忽又拒絕，袁大為狼狽。日本此舉據說是因為中外報紙紛載，認為日本之接待特使乃暗示承認帝制；其次因秘密條件外洩，¹日本認為係袁故弄權術；復因雲南的討袁軍業已發動，他處革命黨人繼之而起，內戰在即，日本決心倒袁。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主張不論他國態度如何，日本不應承認中國帝制，須準備自衛行動。一月二十一日，石井菊次郎通知陸宗輿，謂英、俄、法均希望日本維持東亞和平，再用嚴詞警告中國延緩帝制。如不之聽，則出自由行動，承認雲南為交戰團體，宣告中國政府妨害東亞和平。同日，陸徵祥通知各國公使，袁世凱暫緩登極。

辛亥革命期間，袁之攘奪清室政權，多賴英、美之助，共同約束日本的行動。如今情勢已非昔比，英國自顧不遑，美國雖仍對袁支持，國務院訓令芮恩施，如無強大而有組織的反對即承認帝制，²但袁已失去了控制力。

三、反袁的勢力

民國成立以來的四年間，不論內治外交，可說是每况愈下，處處是民不聊生。中國被稱為多匪多災之國，亦始於此時。匪亂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河南的白朗為最有名，眾至數萬，多為飢民、變兵，

¹據云朱爾典得知周自齊即將赴日，以巨款託上海所紹儀設法密探內幕。唐命袁的親信袁克寬之子袁英買通宮內尉勾克明、內史沈祖憲、機要局主事沈進善，盜出日、袁勾結文書，攝製複本，由朱爾典轉送芮恩施，內情外洩。大隈重信以為袁欲招致美、英干涉，遂拒絕周自齊。謠傳勾克明等謀暗殺袁世凱，據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外交部致駐美公使顧維鈞電，謂勾克明等係因洩漏秘密被拘，並無受賄行刺之事。

²一九一六年一月，顧維鈞曾訂購美國飛機二十架，並先後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

縱橫豫、皖、鄂、陝、甘五省。初以搶富濟貧爲號召，後以反袁爲名，斥「神奸主政，羣兇盈廷，」「盜竊民國，帝制自爲，」傳與國民黨聯絡。陸軍總長段祺瑞曾自行督剿，調兵十餘萬，歷時兩年餘始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東北、華北、長江地區，民變不斷，往往踞城戕官。兵變更爲民國初年的常事，最少有四十次左右，遍及十餘省。湘、鄂、皖、贛、魯、豫、蘇、浙、粵、桂、滇、奉、黑又有水災、旱災、蝗災，政府的搜括仍有加無已，外人對海關所入，控制愈嚴，¹鹽稅因善後大借款的規定，悉由外籍鹽務稽核掌握（見434頁），袁政府幾全恃小額借款、發行國內公債、加征苛捐雜稅，勉強度日，不惜悉索敵賦。公債強迫派購，多不給票券，購者本息俱無。印花稅擾民尤甚，以致商人罷市。官吏虐民，軍人暴戾，本爲常事，復假嚴禁革命、查緝亂黨之名，任意誣陷誅戮，特別是二次革命後湯壽潛、龍濟光之在湖南、廣東，湘人呼湯爲「屠戶」。

一九一五年初，梁啟超說到當時的危機，謂「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啓，」袁世凱將爲「衆矢之鵠」，斷非「僅恃威力而可以移國祚，」「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所謂「強鄰狡焉思啓，」指的是日本進攻山東與二十一條要求，激起全國反日情緒。一九一五年二月至七月，最爲壯烈，留日學生發之於前，上海各界繼之於後，舉行愛國大會，到者三萬餘人，抵制日貨，儲金救國，二十餘日之內，上海一處所收儲金達五十萬元。袁對日屈服後，人民的憤慨至於極點，漢口商民因排斥日貨而罷市，鎮江、瀋陽、北京等地散發愛國傳單，風潮波及全國。袁三令五申的禁止，社會的怨恨由對日而兼對袁，甚而仇袁過於仇日。以往對於袁的壓迫國民黨，摧殘國會，以爲尚可諒宥，今日對於袁的賣國，進而化國爲家，

¹關稅雖早由洋稅務司徵收，尚須移交海關監督，償付外債後，所餘供政府之用，名曰「關餘」。辛亥革命時，得稅務司扣留全部稅款，不使爲革命軍所有。事後外交團擅自指定上海滙豐、道勝等外國銀行組成委員會保營，中國政府不得自由支配「關餘」。

則絕不寬恕。日本是中國的第一號敵人，倒袁是第一要務。

有組織而堅決的反袁者自爲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元氣大喪，幾乎一蹶不振，孫中山重整旗鼓，加以徹底改造。一九一四年七月，易名爲「中華革命黨」，黨員須一律立具誓約，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中山，再舉革命。革命軍未起前入黨者，爲首義黨員，悉隸元勳公民，享有參政的優先權；革命政府成立前入黨者，爲協助黨員，得隸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革命政府成立後入黨者，爲普通黨員，得隸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這是以黨治國的先聲，中心目的爲推倒袁世凱，不斷在湖南、廣東、江蘇舉事。黃興、李烈鈞、陳炯明、李根源等，不贊成孫中山新訂辦法，未加入中華革命黨，以研究歐洲戰爭爲名，別立「歐事研究會」，¹亦以倒袁爲第一義，但在國內均乏實力。

遭袁遺棄的進步黨初雖未必有倒袁之意，但審度情勢及自身利害，則不以帝制爲然。梁啓超再三對袁懇勸，說是「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不可，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可也。」希望袁實行新的約法，以共和政體，行君主立憲。袁不僅不聽，且對梁施以恫嚇威迫。梁認爲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過去進步黨之所以與袁合作，目的爲維持現狀，然處處爲所劫持，時時爲所利用，失敗之蹟，歷歷可數。就目前情勢而論，現狀多維持一日，元氣多墜喪一分。瞻望將來演變，革命黨必乘普天同憤之時，煽用進步黨的滇、黔根據地，舉兵討伐，進步黨與袁將同歸於盡。縱令幸免於此，袁於獲逞之後，滇、黔亦必坐待割割，何若自求多福，奮起一決，不讓革命黨得志，進步黨方有前途，遂決心反袁。

北洋派爲袁的生命所寄托。袁於北洋派以外的反對尙不在意，最怕的是北洋派內部對他不忠。段祺瑞、馮國璋爲北洋派的兩大柱石，一綰軍符，長陸軍部，一領封疆，官江蘇將軍，均有震主之勢。袁早

¹中華革命黨與歐事研究會不易劃分，以下仍統稱國民黨。

懷猜忌，作防範部署。一九一四年置統率辦事處，以分陸軍部之權，又編練模範團，袁及其子克定先後任團長，準備成立模範軍，建立一支更親信的武力。二十一條交涉時，段通電主戰，袁認爲係有意爲難，借故將段的心腹陸軍次長徐樹錚免職，段繼之而去。對於馮國璋，先派兵分駐上海、蘇州、南京，復不以圖謀帝制實情相告。及決定帝制，又改上海鎮守使爲護軍使，直隸中央。不久授馮以虛名的參謀總長，擬相機奪去他的地盤。梁啓超與馮頗有交往，說馮反對帝制。最能使馮動聽的爲在共和政體之下他大有總統之望，袁若帝制，將終爲人下，甚至現有的權位難保。屯兵徐州的長江巡閱使張勳，桀驁跋扈，朝夕希望宣統復辟，並非袁的忠實擁護者。國務卿徐世昌雖無兵權，而爲北洋派大老，於袁的帝制亦心有不服，初稱病請假，終辭職而去，採消極不合作態度。

四、反袁派的聯合行動

反袁派首先發難的爲革命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刺殺袁的悍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十二月五日，一度奪取停泊上海的「肇和」巡洋艦、警察局，均爲陳其美所策動，日本人亦參預其事。雲南爲反袁派爭取的主要對象，國民黨的李烈鈞與雲南將軍唐繼堯，爲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私誼甚篤，又曾任教雲南講武堂，滇軍將校多出其門下。帝制運動開始，李烈鈞及另一與滇軍有淵源的李根源，分頭活動。最後促成唐繼堯的決心的爲前任雲南都督蔡鍔及進步黨。辛亥革命爲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初次聯合行動，此次倒袁，可說是再度攜手。

蔡鍔爲一有抱負的軍事政治家，二次革命後被袁調往北京，而他在雲南的潛勢力仍在。譚安會起，他與梁啓超共爲對策，梁要他深自韜晦，待時而動，由梁先從文字上反對。九月初，梁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蔡與袁虛與委蛇，佯示擁護帝制，暗事部署，與唐繼堯聯絡。十一月中旬，得日人協助，微服出京，經日本、越南入滇，十二月十九日抵昆明，李烈鈞已先期而至。蔡、李、唐商定調兵潛入四川，出袁不備，一舉而下全川。時梁啓超已由

天津到上海，爲配合五國警告，打擊袁的各省秩序確可維持的保證，十二月二十二日，促蔡從速發動，電報係由南京發出。蔡等以爲梁已入南京，倒袁計劃已獲馮國璋同意，可望響應。¹二十三日，四川師長劉存厚、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廣西將軍陸榮廷，均來電贊成，遂由唐繼堯及雲南巡按任可澄具名，請袁嚴懲帝制派首要，²限二十四小時答覆。二十五日，唐與蔡鍔、李烈鈞宣布獨立，組織中華民國護國軍，蔡任第一軍司令官，進向四川、貴州，李任第二軍司令官，進向廣西，唐以雲南都督兼任第三軍司令官留守。蔡慷慨誓師，謂「吾儕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爲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唐致書孫中山、馮國璋，盼一致行動。

護國軍以蔡鍔部爲主力，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左翼進入川南，先下叙州，川軍師長劉存厚來歸，右翼進抵貴陽，一月二十七日，貴州護軍使劉顯世響應，總計兵力約三萬餘人。袁軍分三路包圍雲南，一路入四川，一路向湖南，一路向廣西，約十萬人，³四川爲主要戰場。護國軍槍械窳劣，餉精彈藥不足，二、三月間，頻頻失利，蔡鍔艱苦支撐。袁軍士氣不振，內部不協，復受川人敵視，亦無進攻之力。此外廣東、湖南、湖北，到處不安，廣州時有暴動，長沙將軍署被襲，武昌發生兵變，廣西的獨立，尤使袁魂驚膽破。

廣西將軍陸榮廷爲岑春煊的舊屬，進步黨的名譽理事，反袁派自然力事爭取。一九一六年二月，陸邀梁啟超前來，並通殷勤於馮國璋。三月十二日，會同護國軍李烈鈞部殲滅進攻雲南的袁軍。十五日，宣布獨立，護國軍聲勢一振。接着廣東南路欽州、廣州，東路潮州、汕頭獨立，廣州兵艦響應，受袁策封的南海郡王廣東將軍龍濟光陷於四

¹據云該電係由馮國璋的秘書長胡嗣陵拍出。胡爲復辟派，深惡袁的帝制自爲。

²包括籌安會的楊度、孫毓筠等六人，及朱啓鈴、梁士詒、周自齊、段芝貴、雷震春、張鎮芳、袁乃寬，共十三人。

³袁軍以曹錕爲主帥，張敬堯、吳佩孚、馮玉祥等屬之。入川護國軍初僅三千餘人，支隊長（團長）朱德屬之。

面楚歌，四月六日，亦被迫獨立。同月十二日，浙江國民黨人驅逐將軍朱瑞。五月一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成立於肇慶。五月八日，擴大為護國軍軍務院，岑春煊為首領，¹ 宣言不分黨派，一致討袁，擁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軍務院代行國務院職權。孫中山亦稱願助獨立各省及反袁各派，共同推翻違反約法的袁世凱，反袁的聯合陣線形成。

五、袁的敗亡

雲南護國軍起，袁的變更國體斷不影響國內安定的對外保證破產，知道日本不會甘休。赴日特使被拒，尤使他意興大沮。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命停止貢獻。第二天日本決定嚴重警告，必須以真正平定雲南為實行帝制的先決條件，不然即實力干涉。二十一日，袁通知各國，暫緩登極。而貴州又繼雲南獨立，反袁軍連下川南、湘西諸城，襲擊廣州兵工廠。二十七日，各國公使質問平定內亂，是否有期，聲言各國對交戰雙方，一視同仁。二十三日，袁正式宣布綏正大位，不許呈遞此類文電，同時激勵各軍進攻。日本對反袁派多方支持，三月七日，內閣決定推翻袁的政權，承認南軍為交戰團，旋派領事駐雲南。² 廣西獨立後，北方將領受馮國璋、段祺瑞指使，逗留不進，索餉索械。袁以各省解款不至，向外借款不得，羅掘俱窮。徐世昌勸他及早轉圜，袁召梁士詒相商，擬將中央政事委之徐世昌、段祺瑞，地方軍務委之馮國璋，命四川將軍陳宦與蔡鈞言和。三月二十日，發現馮國璋等五將軍³ 謀聯合各省，請速取銷帝制的密電，袁與徐世昌、段祺瑞會議後，二十二日，下令撤銷承認帝制案，發還推戴書，停止籌備事宜，

¹軍務院由獨立各省重要軍事領袖組成。唐繼堯為撫軍長，由副撫軍長岑春煊攝行，梁啓超為政務委員長，李根源為聯合軍都參謀，章士釗、楊永泰等為主幹。

²日本領事到後，唐繼堯特為舉行歡迎會。不久日本又於桂林設領事館，並派員駐肇慶。

³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浙江將軍朱瑞均在內。

自云「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尙算有幾分敢作敢當的氣魄。

撤銷帝制後，袁復稱總統，重任徐世昌爲國務卿，以段祺瑞爲參謀總長。徐、段勸護國軍領袖取銷獨立，弭止兵戈。護國軍要求，袁即日引退出國，總統由黎元洪繼任，剝奪袁的子孫三世公權，誅戮附逆十三禍首，抄沒袁及十三人家產。袁一口不去，和議一日難以就範。袁捏造南方謀舉岑春煊爲總統，各省疆吏不保之說，以煽動北洋派，但不會收效。馮國璋勸他作根本解決，立即再進一步，即勿再貪戀總統之位。四川將軍陳宦，亦謂士氣不振，武力解決不易，請袁犧牲一身，以救危局。三月底，陳宦與蔡錫實行停戰。廣東、浙江獨立後，護國軍態度益爲強硬，說是袁不僅不得再以總統自居，且須受法律裁判。袁爲緩和空氣，維繫內部計，重訂政府組織法，恢復內閣制，改任段祺瑞爲國務卿，但不給以實權。

馮國璋爲長江各省將軍的領袖，力足左右全局，在袁與護國軍相持之下，各方視線咸集於南京。馮欲形成以自己爲中心的第三勢力，所採策畧，一如辛亥年袁之對待清室與革命軍。四月中旬，提出調停辦法，承認袁仍居總統之位，慎選議員，重開國會，懲辦奸人，尊重民國元年約法，各省軍政長官照舊，撤川、湘前敵各軍，大赦黨人。護國軍堅持袁必須去位，馮準備武力仲裁，電請未獨立諸省，互相聯絡，期對於護國軍及袁可以左右輕重。護國軍如違衆論，當視爲公敵，袁如有異議，亦當一致力爭。他知道護國軍對袁的去位不會讓步，武力強制極少可能，即使可能，對他亦無好處。擁護袁的不過三四省，¹要袁去位，並非難事。袁去馮大有總統之望，他曾明白告訴段祺瑞，袁再想保存地位，良非易易，「無寧敝履尊榮，亟籌自全之策。」五月一日，再宣布他所修改的調停辦法，謂民國已因帝制而中斷，總統的地位已經消滅，副總統的名義同歸於盡，袁可暫任總統，俟國會開

¹此時擁袁較力的有奉天、安徽、直隸、河南、陝西數省，但奉天將軍段芝貴已爲張作霖逼走，陝西將軍陸建章不久亦被驅逐。

幕後，另行選舉。國會議員的資格必須嚴定，民國元年的約法亦當修改，總之，不外另選總統與副總統。護國軍堅持黎元洪繼任總統。五月十七日，馮召集來自獨立各省代表會於南京，以對抗南方的軍務院。袁初頗引為欣慰，以為有了新的希望。殊料各省大都贊成袁退，惟有安徽的張勳、倪嗣冲反對。馮逕行電袁，謂留任終不可能，倘若預行宣布去位，或尚有手續可循。袁見南京會議於己不利，擬繼續用兵，而大勢絕不許可。加之軍費浩繁，惟賴增發鈔票，命中國、交通二大銀行停止兌現。上海中國銀行抗命不從，馮公開支持，長江各省軍政長官一致行動。至是，袁自己親嚐到四年多前他給清廷的苦果。

袁無力迫令護國軍屈服，護國軍亦不易強袁退位，滇、黔、廣西力量有限，陸榮廷雖進兵湖南，而未能控有廣東，軍務院虛有其名，難有作為，所幸反袁的勢力有了新的發展。中華革命黨居正得日人之助，以青島為基地，五月，舉兵膠東，連佔膠濟鐵路沿線要地，攻擊濟南省城。陝西反袁軍同時起事，進入西安，山西將軍閻錫山暗與孫中山通，袁以北抗南的計劃動搖。四川停戰後，各地紛紛獨立，前線將領亦準備倒袁，五月二十二日，陳宦宣告對袁斷絕關係。湘人乘桂軍北來，爭起以應。五月二十九日，湯壽銘獨立，不承認袁為總統。

袁自雲南事起，外交既萬分棘手，段祺瑞、馮國璋內外挾持，輿論明詬暗譏，衆叛親離，憂鬱羞憤交加，心神失常。三月初，日、美報紙說他中風，不久果然成疾。五月中旬，目眩頭暈，不能成寐，陳宦的獨立，等於他的催命符，一度昏厥，不克視事。六月三日病篤，飲食即嘔，小便癱閉。五日猝暈逾時，六日下午卒，年五十八歲。退位問題不了而了，但中國禍亂則並未就此而止。

第十三章 軍閥恣睢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袁世凱的後繼者

袁世凱之扶搖直上，蹶而再起，終於取得最高權力，私有武力是他的最大憑藉。他曾說：「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兵，祇須兵權在我，何畏之有？」戰勝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後，信之愈篤。於是上行下效，他的部屬亦認定武力萬能，各自為謀。帝制之前，已不盡唯袁之命是聽，此為袁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後變本加厲，大者盤據中央，小者把持一方，招兵買馬，爭城爭地，相互火併。

一、軍閥割據

袁世凱任總統時，以軍民分治為名，每省各置都督及民政長，後分別改稱督理某省軍務的將軍及掌管某省政事的巡按使，大權全在都督或將軍。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時，一九一六年七月，改將軍為督軍，巡按使為省長。顧名思義，省長應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其實不足輕重，依然有同督軍的隸屬。從此中國軍閥名聞於世，督軍成了軍閥的代表，出身北洋軍的獨多，人稱北洋軍閥，遍布於長江、黃河流域及東北地區。段祺瑞、馮國璋為北洋軍閥的巨魁，早已各立門戶。段雖非督軍，但久長陸軍部，復任內閣總理，山東、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甘肅為其勢力範圍。馮任江蘇督軍，直隸、江西、湖北督軍奉為首領，地盤不及段的廣濶，而富庶過之，彼此勢均力敵。段為安徽人，馮為直隸人，他們領導的集團，分被稱為皖系、直系。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據有軍事要地徐州，擁兵三萬，仍帶髮辮，表示不忘清室，號為「辮子軍」，自樹一幟。奉天督軍張作霖清末任巡防營統領，入民國官至師長。洪憲帝制時，一面佯示效忠袁世

凱，一面逐走奉天將軍，取而自代，進而控制黑龍江、吉林，是爲奉系，可算是北洋軍閥的別支。山西督軍閻錫山不屬於北洋派，但頗善肆應，初附袁世凱，繼結段祺瑞，以圖自固自保，在軍閥互鬥中，竟然屹立不動，十餘年來，山西無烽火之警，有模範省之稱，可徵人民之易於滿足。新疆督軍楊增新所採策畧與閻錫山同，以地處偏遠，不爲中原軍閥重視，且非力所能及，遂亦得長保既得權力。

南方諸省督軍不屬於北洋軍閥，其爲割據則一。唐繼堯控有雲南，視四川、貴州爲附庸，是爲滇系。陸榮廷於廣西之外兼有廣東，是爲桂系。¹

袁世凱時代，北洋軍閥幾囊括全國。帝制不成，失去了四川、廣東、湖南，得到了浙江，勢力仍然最大。反帝制的唐繼堯、陸榮廷各有所得，惟國民黨落空。每一大軍閥各有國際背景，支持皖系、奉系及張勳的是日本，支持直系的爲英國、美國，不過美國不似英國的昭著。與滇系、桂系爲近的是法國。

二、段祺瑞的專橫、參戰問題

護國軍堅執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約法、國會。孫中山於恢復約法、國會持之尤力。段祺瑞對黎一向輕視，又不喜國會。袁世凱死後，段爲情勢所迫，宣布依約法以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而不提國會。他所指的約法爲新約法，而非舊約法。國會議員首加駁斥，謂新約法爲袁世凱竄亂而成，無國法上的效力，黎係根據國會制定的總統選舉法繼任總統。南方領袖繼起反對，非但要確定黎爲繼任總統，恢復袁廢止的約法，解散的國會，並須依法組織內閣，不承認段的現在地位。黎就職誓詞亦明言「依據民國元年頒布之臨時約法，接任總統職權，」而非代行總統職權。對段來說，舊約法爲內閣制，於他應屬有利，他之所以不願恢復，是厭惡國民黨佔優勢的國會。儘管各方攻擊，倔強成性、剛愎自用的段，一概不顧。

¹ 一九一六年八月，四川督軍蔡鍔因病請假（十一月卒），由滇軍將領羅佩金繼。同年七月，龍濟光不容於廣東，陸榮廷任廣東督軍。

馮國璋懼段的權力過份膨脹，為聯交南方，贊同恢復舊約法與國會。駐上海的海軍第一艦隊宣布，非俟舊約法恢復，國會重開，正式內閣成立，不受北京命令。段始知事態嚴重，只好暫時忍耐。六月二十九日，黎元洪下令遵行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及民國二年的總統選舉法，續行召集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由段組正式內閣。依附實力派為進步黨的一貫政策，梁啟超一心擁段，護國軍軍務院經他勸說，七月十四日，宣布撤銷，國民黨至為不滿，集矢於梁。同日北京下令懲辦帝制禍首。¹

八月一日，國會重開，制定憲法仍為其最大任務。國民黨為便於團結各方力量，糾集三百六十名議員，組織「憲政商榷會」，其中有原屬進步黨者。後分而為三，激進派成為「民友社」，溫和派成為「益友社」及「政學會」，人稱「商榷系」，大致均支持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亦各立「憲法研究同志會」及「憲法討論會」，與相頡頏，後合為「憲法研究會」，人稱「研究系」，為段祺瑞的與黨，在國會中約佔一百五十席，進步黨不復存在。段的私黨成立「中和俱樂部」，即日後「安福俱樂部」。段之疑忌南方督軍及敵視國民黨，與袁世凱相同，不過尚無意推翻共和。

袁世凱死後，張勳在徐州召開七省會議，決尊重優待清室條件，要求獨立各省取銷獨立，抵制暴烈分子參與政權，中央如有敵政，共同力爭，固結團體，嚴整兵衛。目的在壓服異己，排斥國民黨，挾制中央政府，俟機復辟。段深惡新任外交總長唐紹儀及屬於國民黨的閣員。一九一六年九月，授意張勳聯合七省督軍，要求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再集十三省代表舉行二次徐州會議，反對唐紹儀。段提名的外交總長兩次遭國會否決。商榷系聯好馮國璋，擬推為副總統，加深馮、段間的裂痕。研究系為使馮、段各有所得，亦表贊同，馮遂順利當選，內務總長孫洪伊為馮的謀士，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為段的心腹，彼此積不相能。段強黎免孫不遂，孫、徐之爭變為黎、段之爭。商榷系議員提

¹ 被通緝的有楊度、孫毓筠、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等八人，段芝貴、張鈞芳、雷震春、袁乃寬、曹汝霖俱不在內。

案查辦徐樹錚，兼劾段祺瑞，結果孫洪伊、徐樹錚一併去職，國會又兩次否決段提名的內務總長。助段的研究系議員爲憲法問題與商榷系議員互訐。十二月，梁啓超運動馮國璋、張勳聯合二十二省督軍、省長，電勸黎、段，警告國會。一九一七年一月，張勳召集第三次徐州會議，段亦派代表參加，要求黎元洪取締國會，擁護段祺瑞，裁汰閣員，準備於必要時實行倒黎。

先是，一九一五年秋，德國擬以贊成袁世凱帝制爲餌，將中國引進同盟國。英、法、俄大感不安，欲誘中國加入協約國，願借款擴充中國兵工廠，以所製軍火供協約國。袁懼招日本之忌，均未之許。英、法、俄轉與日商，日首相大隈重信認爲中國如若參戰，將不利於日本的獨佔企圖，表示反對。大隈的對華政策，以政治侵畧爲主，壓迫現政權。一九一六年十月，寺內正毅組閣，改以經濟侵畧爲主，扶植現政權，其實是殊途同歸。歐戰以來，日本對外貿易出超大增，國內現金過剩，如對中國放款，游資有了出路，物價即可平衡。更大的用意，爲日本物資不豐，須求之於中國。倘能以借款途徑，不顧一時區區之利，而收大利於將來，即可以中國之有餘，補日本之不足，所謂「欲取先予」。是即大藏大臣勝田主計的「菊分根」政策。這時美國加入歐戰爲期在邇，如中國追隨，勢將受其控制，日本必須急起直追，竭力促成，再大舉對華貸款。段祺瑞爲鞏固權力，需財孔殷，正是求之不得，假對外戰爭借款，尤爲有詞。

一九一七年一月，段祺瑞已有參戰之意，德使辛慈（P. von Hintze）多方阻止。二月，美國對德絕交，勸中國採一致步驟，段祺瑞立表贊成。梁啓超同此主張，希望乘機使中國躋於國際之林，既可蒙均勢庇護，又可增加關稅，緩付庚子賠款，美國又是中國最信賴的國家，定可相助。段內閣即以德潛艇襲擊中立國船隻爲名，提出抗議，準備進而絕交，繼之以宣戰，黎元洪認爲絕交並非其時，段以辭職要挾，黎爲所屈，三月十四日，公布對德絕交。協約國公使勸段實行參戰，孫中山激烈反對，國會議員亦多不謂然。辛慈允給孫以財力支持。各省督軍應段召入京，號爲「督軍團」，要求國會同意對德宣戰。五

月十日，段重施袁世凱的故技，囑使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迫令當天通過。輿論益憤，請嚴懲主使。段置之不理，仍促國會速議，國會要求改組內閣，督軍團要求解散國會，二十三日，黎將段免職。

優柔寡斷的黎元洪之所以斷然出此舉動，一以不堪段的凌迫，無法再忍。二以段派督軍不過四五，馮國璋及西南各省均不贊成參戰，段決不敢反抗。三以事前曾向美公使芮恩施及美籍顧問韋洛貝（W. W. Willoughby）說明，可能已有諒解。事後芮恩施建議美國務院由列強強調停，以免黎為段派推翻。日本指美國助黎制段，似非無因。

三、張勳復辟

一九一七年三月，清末曾官廣西提督、現任廣東督軍的陸榮廷北上，路過徐州，與張勳會晤。到北京之後，特向宣統請安。復辟派興奮欣喜不置，說是「南陸北張」確是兩大忠臣，德國、日本亦有贊同之意，清朝的恢復大有可望。一九一二年，德國亨利親王訪宗社黨恭親王溥偉於青島，勞乃宣與德人過從尤頻。對德絕交後，德國鼓動張勳早日復辟。日本與大連的肅親王善善關係更密，同時聯絡張勳及天津、上海的前清遺老徐世昌等。

黎元洪、段祺瑞決裂後，張勳與督軍團又舉行徐州會議。段指更易內閣總理未經副署，將來地方與國家因此發生影響，概不負責，顯係鼓動督軍反抗中央。張勳責黎破壞法律，各省將自由行動。安徽省長倪嗣冲首先獨立，繼之為陝西、河南、浙江、奉天、黑龍江、山東、直隸、福建、山西、上海。梁啟超拒絕黎的調解請求，研究系要人紛紛離京，對黎實行拆台。段與研究系擬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張勳以與自己的企圖不合，表示反對，公使團恐損及外人利益，聲言不能承認，芮恩施阻撓特力。滇、川、粵、桂雖通電擁黎，討伐叛逆，但一紙空文，無補實際。馮國璋採中立態度，欲取黎自代。安徽、奉天、山東督軍準備進兵北京，以張勳為首的十三省區聯合會請黎退職。黎束手無策，坐困愁城，召張勳來京，共商國是。

六月八日，張勳率辦子兵到天津，限黎元洪於三日內解散國會。段祺瑞對張勳示意，俟黎倒後，復辟事可以商量，日本公使林權助亦從旁鼓煽，張勳認為事必可成。黎聲言「不怕死，不違法，不蓋印，」及張軍入京，卒於六月十三日下令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張勳擁宣統「御極聽政，收回大權，」以張勳及王士珍等為內閣議政大臣，梁敦彥等為各部尚書，徐世昌、康有為為弼德院正副院長，張勳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

黎對袁世凱帝制的態度是消極的不合作，這次對宣統復辟，則取積極的進攻行動，電令各省出師討伐張勳，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務。段原擬假張勳之手以去黎，張勳欲實行復辟，自握大權。復辟後的任官上諭，段的姓名獨不在內，前此脅迫清室退位之事（見422頁），將來可能重翻舊案，自身不保，目前張勳的地位未固，倒黎後繼以倒張，不僅唯我獨尊，且可建立再造共和的殊勳。梁啟超力說其舉兵，因帝制案獲罪的梁士詒為捲土重來計，代籌軍費。日本以段的實力在張勳之上，更可利用，亦給以資助。七月三日，段馳赴馬廠（天津南），誓師討伐張勳，稱討逆軍總司令。馮國璋以已取得代行總統職務的資格，如再將張勳芟除，自可順理成章的繼黎之位，因與段一致行動。

段祺瑞指揮的討逆軍約三萬人，盤據北京的張勳僅五千人，自非其敵，宣布辭職，徐世昌見風轉舵，通電反對復辟，宣統命會同王士珍與段祺瑞商辦善後交接事宜。討逆軍進迫不已，張勳斥徐、段、馮背信賣友。七月十二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第二天，宣統第二次退位。徐世昌竭力維持優待清室條件，段祺瑞亦謂復辟非清室本願，乃出於張勳矯挾，宣統照舊在宮中稱帝。

第二節 大混亂的開始

一、南北戰爭及北洋軍閥的內在矛盾

復辟亂平，段祺瑞絕不許黎元洪再任總統，黎亦知復職為不可能，宣布去位。段自行任命閣員，人選盡屬於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與段派，人稱段、梁內閣，¹馮國璋對於總統志在必得，於法於勢，亦非他莫屬。馮所兼的江蘇督軍由直系的李純繼任，皖系得了湖南。馮繼承的法統係以約法為根據，段與研究系的梁啟超、湯化龍拒絕恢復約法命脈所繫的國會，所持理由：一為民國已因復辟而亡，應照一九一二年的辦法，成立臨時參議院，重訂國會組織法與選舉法，召開新國會；二為督軍團既以全力打破國會，今再恢復，將生莫大反動；三為國會兩度試驗失敗，不盡職守，惟以查辦質詢為事，毫無成就，威信已喪，黨張惡習難改。真正原因是不願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存在，結果召來了南北正式對立。臨時參議院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集會，段派議員佔三分之二，研究系佔三分之一。

督軍團滋鬧之時，孫中山及雲南督軍唐繼堯等再三力爭維持約法國會。及國會二次解散，桂系的廣東、廣西督軍指為非法，不承認不依法定手續成立的政府，國會未恢復前暫行自立。復辟事起，孫中山斥段祺瑞召禍致亂，前往廣州，倡導護法，斥段為「以叛討叛，以賊討賊」，請國會議員南來行使職權。德國為牽制北京政府，資以巨款，策動第一艦隊響應，由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率領，與孫中山一致行動。唐繼堯憤段挑撥川軍攻擊滇軍，亦不承認段的國務總理。陸榮廷時任兩廣巡閱使，²只求保有已得利益，而以湖南為南北緩衝區，屢

¹ 梁啟超任財政總長，研究系及接近研究系的湯化龍、林長民、汪大燮、張國淦、范源濂分任內務、司法、外交、農商、教育總長。段祺瑞自兼陸軍總長，海軍總長為劉冠雄，交通總長為曹汝霖。先是交通系首領梁士詒因帝制遭受通緝，曹繼主交通銀行，自立門戶，人稱「新交通系」，最為段所信任。

² 以往革命黨譚人鳳及軍閥張勳所任的長江巡閱使只是名義，至陸榮廷任兩廣巡閱使，而以部將分任粵、桂督軍，始有固定轄區，此後巡閱使遂成為超級督軍，有似清代的總督，而權勢過之。

勸馮國璋恢復國會，馮不能自主。段決心武力對南，動員北軍，進向湘、川，以傅良佐代譚延闓為湖南督軍，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唐繼堯以段相欺太甚，自稱川、滇、黔靖國軍總司令，增兵入川。陸榮廷有唇亡齒寒之懼，請西南各省共同應付湘局，均以擁護約法為名。到達廣州的國會議員僅一百餘人，距法定人數甚遠，因稱非常會議，議決設立軍政府，推孫中山為大元帥，唐、陸為元帥。唐、陸並非真為護法而反段，陸更不願受孫的節制，拒不任職，反對另組政府，聲言廣東以後發生任何問題，概不負責。廣東督軍陳炳焜僅指段祺瑞的內閣為非法，仍認為馮國璋的代理總統為合法，反段而不反馮。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軍政府勉強成立，伍廷芳、唐紹儀、孫洪伊、程璧光、胡漢民等分長各部，實空有其名。不過中國從此分裂，除了南北兩個政府外，各軍閥各自為政，為期最少十年。

南北之戰初起於四川，滇系督軍羅佩金擬以省長畀川軍師長劉存厚，段祺瑞、梁啟超則以之授與研究系的黔軍戴戡。劉乘川人銜怨滇軍奪佔利權，聯合四川將領攻羅，北京以戴戡代羅。劉又轉攻黔軍，戴戡敗死。唐繼堯出兵討劉，段祺瑞出兵援劉，自是川戰不休，不過南北的主力戰則在湖南。

湖南督軍譚延闓被段免職後，乞援於廣西。陸榮廷與梁啟超、馮國璋近，桂軍徘徊不前。及北軍佔領長沙，兩廣受到威脅，陸始決定出兵，退至湘南的譚延闓宣布與西南各省一致。北軍進攻不已，廣州軍政府下令討伐段祺瑞、梁啟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南軍屢捷，北軍內部不和，紀律敗壞，到處遭受襲擊，南軍奪回長沙。四川滇軍雖為附段的川軍所敗，附南的川軍則合黔軍大破北軍，佔領重慶，北軍退出四川。

馮、段暗鬥，為北軍戰敗的原因之一。段要用武力征服南方，馮欲結南方，用備緩急。段主明令討伐南方，為馮所拒，僅令唐繼堯撤退入川的滇軍，對入湘的陸榮廷軍置之不問。在湖南的北軍主將為直系師長王汝賢，他主張停戰，對段隱事指摘，請馮與南方商議，召集國會。江蘇督軍李純等以反對日本軍械借款為名，對段詰責。十一月，段請

辭職，責王汝賢受南方離間，顯為對馮而發。馮佯稱此時不應言和，段打銷去意。第二天，馮下令將皖系的湖南督軍免職，授意直系各督軍要求撤兵。段又請辭，馮先准其解除兼陸軍總長，並免去徐樹錚的陸軍次長、吳光新的四川查辦使。再准段辭去國務總理，由王士珍代理，段、梁內閣告終。研究系自戴戡被殺，對段已生怨尤。¹復以對南用兵，主管財政的梁啓超窮於應付，新交通系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大借日款，手到錢來，梁相形見絀。梁有政治抱負，五年來兩度入閣，一見賣於袁世凱，再失歡於段祺瑞，國民黨惡之尤深，梁於政治雖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為。

皖系不甘罷休，徐樹錚煽動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糾集奉天督軍張作霖、山西督軍閻錫山等要求馮國璋等討伐南方。梁士詒代段向日本活動，寺內允一力為助。直系長江三督軍²再請馮停戰，召開時局會議，陸榮廷、唐繼堯與相唱和。皖系策動潮州、汕頭駐軍獨立，龍濟光侵擾南路，以牽制廣東，使不暇自顧。馮以皖系脅迫，湖北荊州、襄陽響應南軍，命曹錕、張懷芝出兵鄂、湘，以劉存厚為四川督軍，起段祺瑞督辦參戰（歐戰）事務。不數日，又布告弭戰（內戰），命各軍暫停止前進，以待協議。

馮對南方軍人，祇重視陸榮廷，忽畧了唐繼堯。劉存厚督川，尤為唐所不能容忍。一九一八年一月，南方因北軍進攻荊州、襄陽，湘桂軍、粵軍、滇黔軍亦分向岳州、福建、成都進攻。馮為擺脫皖系的壓力，前往南京，為安徽督軍倪嗣冲阻回。北軍雖在湖北得勝，岳州則為南軍佔領。徐樹錚引奉軍入關，在秦皇島劫奪北京政府購自日本的軍械，進向天津、北京。張作霖要求以段祺瑞組閣，與段通謀的徐世昌對馮警告，非如此將起兵變，幕後策劃的為日本公使林權助。三月二十三日，段重任國務院總理，直、皖系的鬥爭劇烈。

段再出前五天，北軍奪回岳州，繼佔長沙，曹錕部師長吳佩孚

¹ 研究系欲在西南奠立基地，段祺瑞欲自有西南。

² 江蘇李純、湖北王占元、江西陳光遠。

(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九)實爲首功，而湖南督軍反爲皖系的張敬堯所得，且欲奪去曹錕的直隸地盤，曹、吳因之離心。徐樹錚調奉軍南下，段祺瑞至漢口說曹錕再戰，徐樹錚親訪吳佩孚，許以巨款，南方對吳亦極力爭取。六月十五日，吳佩孚與南軍言和，張作霖與徐樹錚不睦，湖南奉軍北撤。¹自閩攻粵的浙軍叛變，陝西靖國軍蜂起，吳佩孚續請罷兵，通電詆段，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失敗。

二、日、段勾結

參戰問題爲引起內戰的近因。日本爲擴張在遠東的權利，尤其是在中國的利益，誘導最力。一九一七年二至三月，分與英、法、俄、義成立諒解，四國允日本繼承德國太平洋及東亞的權利，日本負責促成中國參戰。段祺瑞之力主參戰，意在提高關稅、延付庚子賠款、廢除辛丑條約對於中國的軍事限制。日本與協約國答應於中國參戰後，以善意商談，美國公使芮恩施復謂如中國參戰，可予以財政援助。張勳復辟不成，日本內閣決以段祺瑞爲唯一對手，供給金錢武器。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對德宣戰。原來反對參戰的南方領袖在廣州軍政府成立後，亦採同一行動，實際上雙方所參之戰爲內戰。

宣戰後，日本請協約國支持段的政府，勿予反對派任何鼓勵或援助。美國允贊助中國在國際上得享大國應有的地位與優待。對於中國希望的事項，協約國承認關稅得按貨物實價值百抽五的原則徵收，詳細辦法由委員會另訂，²庚子賠款緩付五年，中國軍隊得暫時駐紮天津附近二十里內。日本以近年對華貿易已躍居首位，堅決反對將關稅提高。對於切實值百抽五的詳細辦法，又多方阻撓，歷時一年，方議定進口貨照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的平均物價計算，一九一九年八月起

¹ 徐樹錚飛揚跋扈，對直系軍人威脅利誘並施，一面槍殺前陝西將軍陸建章，一面以曹錕爲川、粵、湘、贛四省經畧使，許以副總統。張作霖之助皖系，意在軍餉，疑徐樹錚從中舞弊，尤不滿其擅自調動奉軍。

² 由於物價上漲，各國不允修正海關貨價表，一九〇二年以來，中國所徵關稅，不足百分之二點五。

實施。庚子賠款的德、奧部分，因宣戰而自然取銷，緩付的只是其餘各國所得，每年約二千餘萬元。天津附近駐兵，以防範德、奧人民的行動爲限。美國恐日本控制中國，另與中國換文，中國保證軍備軍需自行支配管理，自行處理有關此次戰爭的軍事措置。但十一月二日，美國務卿藍辛（R. Lansing）與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的協議，則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利益，特別是中國與日本所屬的接壤地方。根據這個協議，日本認爲美國已承認它在華特殊地位，美國的解釋是只承認日本在華的商工業有某種便宜。不論如何，日本在中國的權益，又獲得了一項保證。

協約國因中國參戰的收穫：一爲中國的物資，以糧食爲主，農商部設置戰時糧食出口籌備處，以司其事；二爲中國的勞力，一九一六年五月，梁士詒已與法國訂有合同，組織惠民公司，招募華工，赴歐洲助戰，現在復設置華工事務局，先後送至法國及遠東的華工約二十萬人；三爲沒收德、奧在中國的船舶，中國並代協約國造建，德國在東亞的貿易全部消滅，於日本最爲有利。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政府的收入約七千餘萬元，必須的支出約一萬萬餘元，應付的外債爲二千四百餘萬元，不敷三千餘萬元。南北戰爭開始後，募集公債困難，各省軍隊增加，截留中央稅款，北京收入大減，不敷年達五千餘萬元，在如此情況下，若無其他財源，段祺瑞焉能對南方用兵？協約國答應的切實值百抽五的關稅，口惠而實不至，緩付的庚子賠款，仍是杯水車薪，芮恩施財政援助諾言，只是一句空話，日本既願借款（見466頁），段祺瑞一心投靠。十分之七的借款由寺內的親信西原龜三與段的親信曹汝霖經手，通稱西原借款。

一九一七年，曹汝霖以交通銀行總裁身份，兩次向日本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訂借二千五百萬日元，以日人爲交通銀行顧問，日本對該行內情，瞭如指掌，勝田主計謂，即此一端，已爲日本莫大之利。陸宗輿復以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的資格，與三銀行訂立合辦中華滙業銀行規約，資金二千萬日元，中日各半，負收受借款之責。

時段祺瑞決大事借款，武力對南。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歷任財政總長梁啓超、王克敏、曹汝霖向日本銀行團代表橫濱正金銀行共借三千萬日元，作為第二次善後借款的墊款。一九一八年一月及七月，陸軍部分與日本三井、高田、大倉洋行及泰平公司訂立軍械借款，約共四千萬日元。九月駐日公使章宗祥與興業、朝鮮、台灣銀行訂立參戰借款二千萬日元。

中日滿蒙五路換文已經四年（見 442 頁），迄未實行。一九一七年十月，曹汝霖先與南滿鐵路會社訂立永吉至長春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日元。一九一八年二月，再與正金銀行訂立四平街至鄭家屯鐵路借款二百六十萬日元。同年六月又與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訂立不在五路換文之內的永吉至會寧鐵路墊款一千萬日元。段祺瑞以北京政府將變，為獲得更多的日款，命章宗祥進行自開原經海龍至永吉、長春至洮南、洮南至熱河、熱河至海口四路借款。日本於慶幸之餘，並欲於世界大戰終了之前，伸展膠濟鐵路，擴張在黃河下游勢力，確定在山東地位。九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內一一換文。關於山東問題，訂明膠濟鐵路沿線日軍，除一部分留駐濟南外，均退集青島，膠濟鐵路歸中日合營，巡警隊本部及重要車站與巡警訓練所，應聘用日人。章宗祥去文內有「欣然同意」字樣。二十八日，成立滿蒙四路借款，先墊付二千萬日元。復允膠濟鐵路分兩線延長，一自濟南至順德（在直隸），一自高密至徐州，借款共二千萬日元。此四千萬日元悉歸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承擔。

此外尚有一九一八年二月成立的無線電借款六百萬日元，四月成立的電信借款二千萬日元，八月成立的電話借款一千萬日元，八月成立的吉林、黑龍江金礦森林借款三千萬日元，均出於曹汝霖之手。

綜計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所借日款約二億六千餘萬日元，半數用於贖還內外債，餘多用於內戰。

中日經濟提携之外，又有所謂軍事提携。俄國十月革命後，脫離了協約國，日本要求中國共同應付。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祺瑞決定第二次對南用兵，由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互換共同防敵（俄、

德、奧)照會。五月十六及十九日，分訂陸軍海軍「共同防敵協定」(即中日軍事協定)，日軍得在中國境內活動，訓練中國軍隊。九月，續訂「共同防敵協定實施辦法」，中日出兵西伯利亞，華軍受日軍司令指揮。十一月，世界大戰停止，日本謂協定的有效期限須至日本批准對德和約。直至一九二一年，方行作廢，段的政權已於半年前傾覆。

北京政府與日本勾結，廣州政府亦欲得日本支持。一九一七年八月及一九一八年三月，孫中山一再派人赴東京活動，日人勸他與北方妥協，多作讓步。孫在粵失勢後，親訪日本，日本的援段政策，更不會改變。

三、廣州、北京政府的蛻變與南北和議不成

北方直系、皖系軍閥對立，南方的情況亦無二致，桂系、滇系軍閥之外復有其他政治派系。桂系軍閥目無軍政府，廣東督軍莫榮新每每與孫中山為難。非常國會的政學會議員聯結桂系，謀擁岑春煊，排除孫中山，與北方議和。一九一八年初，陸榮廷、唐繼堯與海軍總長程璧光成立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孫中山的大元帥益同虛設。是年五月，國會議決廢除大元帥，改推孫中山、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林葆懌、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政務總裁，¹岑任主席總裁。孫離粵北去，斥南北武人亂法營私，如一丘之貉。

北方段祺瑞派包辦的新國會於一九一八年八月開幕。參議院議長屬交通系(舊交通系)，眾議院議長屬安福系，人稱為安福國會。²代理總統馮國璋任期瞬即屆滿，連任為不可能，段祺瑞當選雖輕而易舉，但為直系及輿論所不許。梁士詒、朱啓鈴等倡導改弦更轍，馮、段一

¹ 一九一八年二月，程璧光遇刺死，林葆懌代為海軍領袖。

² 安福系指徐樹錚、王揖唐的安福俱樂部，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新國會選舉，粵、桂、滇、黔、川五省均未參加。安福系議員約佔三百四十席，交通系約一百席，研究系二十餘席。參議院正副議長為交通系的梁士詒、朱啓鈴，眾議院正副議長為安福系的王揖唐、劉恩格。

同下野，推徐世昌爲總統，直系、皖系庶可暫時相安，南北亦可望統一，馮、段表示同意。陸榮廷、唐繼堯、孫中山經梁士詒的運動，均不反對。曹錕、張作霖等亦因梁士詒的運動，一致擁戴徐世昌。馮國璋宣布無恙戀棧。同時日本政局將變，段祺瑞的奧援寺內內閣將去，大戰已近尾聲，英、美的注意力東移，上海英國報紙謂段一天在位，時局解決一天無望。段繼馮之後，聲稱俟總統選定，即及時引退。九月四日，徐世昌當選，十月十日就職，以錢能訓代國務總理。段派曾以副總統餌張作霖，曹錕、徐世昌、梁士詒欲留之以待岑春煊，交通系及研究系議員拒不出席選舉會，副總統未能產生。

徐世昌當選總統之後，英公使朱爾典勸與南方講和，以免危及中國國際地位。美國國務卿蘭辛通知中國公使顧維鈞，準備組織國際銀行團，進行對華貸款。北京英、美人士組織英、美協會，請兩國政府向中國南北雙方調停，上海《字林西報》主由各國共同斡旋。徐世昌宣言以誠心謀統一，以毅力達和平。美總統威爾遜來電，勸息爭統一。總統府美顧問韋洛貝曾擬具南北調和意見書。日本建議英、美、法、義聯合向南北當局致送說帖，希望解決爭端，並決定緩付對華借款，停止財政援助。社會名流熊希齡、蔡元培發起和平期成會，此外尚有全國和平聯合會。總商會、教育會爲比較有影響力的民間團體，亦均爲和平呼籲。

北方當局的心目中只有軍人，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電請岑春煊及南方軍事領袖先就事實解決糾紛，並請江蘇督軍李純疏通。岑春煊主開南北對等會議。徐世昌得段祺瑞、督軍團同意，命前方罷戰退兵。廣州政府經美國勸說，亦通令休戰。督軍團要求由段祺瑞組閣，爲公使團所阻。十二月二日，英、美、法、義正式勸告南北政府速謀和平統一，在統一前不對中國作政治借款，段與督軍團不敢再持異議。李純與南方商定，召開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北京派朱啓鈴爲總代表，另有代表各派系的分代表。爲了會議地點之爭，廣州遲遲不派代表。先是各國爲迫令北方停戰，扣留關稅餘款（關餘），北京政府以庫空如洗，年關即屆，屢向公使團交涉。各國表示南北和議如能在定期內舉

行，南方對交款不持異議，即將關餘（一千二百萬元）交還。復對南方表示，如早派代表，可撥給部分關餘。¹廣州乃以唐紹儀為總代表，亦有各派的分代表。

另一爭執為陝西停戰問題。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北和會在上海租界開幕，南方力爭陝西應在停戰範圍之內，要求停募參戰軍，²取消中日軍事協定，為北方所拒，會議停頓。唐紹儀訴之各國，日本通知北京，停止應付軍火，英、法公使面請徐世昌緩提參戰借款，保證參戰軍不用於內戰，北京始下陝西停戰令。

四月，和會重開，主要爭執為國會問題，北方總代表朱啓鈴希望保持徐世昌的位置，為顧全南方的護法立場，主由舊國會追認徐的總統，完成憲法，由新國會通過後，新舊國會一律解散，另行選舉。安福系認為徐世昌與南方勾結，極力反對。章炳麟與國民黨的孫洪伊派以唐紹儀與徐為舊交，疑唐不忠於護法，想作統一後的國務總理，加以攻擊。適「五四」事件發生，人心痛惡北京政府，五月十日，唐要求北方恢復舊國會，不承認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辦法，宣布一切中日密約無效，裁廢參戰軍，撤換罪情顯著的督軍、省長，只認徐世昌為臨時總統。他明知北方無法接受，不過是借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於是和會破裂。

六月，英、美、日、法、義五國勸告南北政府重開和會。北京政府受制於安福系，不能作主，國務總理錢能訓去職，安福系當政。八月，以王揖唐為和議總代表，廣州與直系同聲反對。孫中山、唐紹儀不滿軍政府，段祺瑞欲與孫、唐携手。九月，徐世昌以段派的靳雲鵬組閣，但上海和會終未能恢復。

四、赤俄、白俄在滿、蒙、新疆的角逐

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忠於俄皇的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

¹ 南方所得為百分之十三，約九十萬元。

² 北京攻擊陝西于右任的靖國軍，謂為剿匪。參戰軍為段祺瑞、徐樹錚所募，共三師三混成旅，餉械由日本供給。

特(D. L. Horvath)在哈爾濱自稱全俄政府總裁。十月革命後，共產黨取得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哈爾濱的俄國共產黨人起而響應，秩序大亂。中國實行干涉，設置中東鐵路警備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要求中國勿再支持霍爾瓦特，准東北糧食出口，重派中東鐵路督辦，¹由中俄組成的混合委員會商討解決中東鐵路辦法，未獲中國同意。同年三月，俄、德媾和，西伯利亞紅黨勢張，白黨屢敗，戰事迫近東北邊境。霍爾瓦特聯合哥薩克謝米諾夫(G. M. Semenov)進兵西伯利亞。日本欲乘機向北滿及西伯利亞擴張，派兵登陸海參崴，誘脅北京政府訂定防敵協定。七月，蘇俄對華表示，願放棄在北滿特權，中國如清償俄人在中東鐵路投資，即可收回。英、美為牽制日本及打擊蘇俄，決以援助在西伯利亞的捷克軍為名，²由協約國共同出兵，中國亦在其內。

一九一八年八月，日軍自朝鮮、南滿進駐中東鐵路地區，聲言實施中日防敵協定，謀獲取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中、美一致反對。一九一九年一月，美、日達成協議，由出兵國共同監理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美國負責技術，中國負責警備中東鐵路。七、八月間，聯軍及白俄在西伯利亞失利，中東鐵路罷工，日本嗾使白俄、鬍匪侵擾，以暴露中國之無能。十一月，設立於西伯利亞鄂穆斯克(Omsk)的白俄政府東退，兩個月後為紅軍消滅，蘇俄的地位漸形穩固。時世界大戰已經終結，捷克軍及美、英、法軍先後撤離西伯利亞，惟日本獨留。中東路再度罷工，中國解除霍爾瓦特職務及紅、白兩黨武裝。蘇俄力避與日本直接衝突，並為示好美國，一九二〇年四月，另於東部西伯利亞建立遠東共和國，以為緩衝。七月，日軍自外貝加爾撤退，仍據有海濱省南部、黑龍江下游、庫頁島北部及堪察加一部。遠東共和國再三交涉，美國又施以壓力，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始全部退去。遠東

¹ 庚子拳亂後，中國迄未派中東鐵路督辦。

² 二月革命後，前為俄國俘虜的德奧軍中的捷克人獲釋，取道海參崴，準備轉往歐洲西線作戰。十月革命後，又自海參崴折回西伯利亞，對紅軍作戰。

共和國以任務達成，十一月，併入蘇俄。

俄國革命對於外蒙古的影響更爲嚴重。一九一八年，白黨謝米諾夫謀建一大蒙古帝國，紅黨亦不時進犯外蒙古邊境。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陳毅與外蒙官府及帝俄領事商定，由中國派兵協防。一九一九年，謝米諾夫與日人煽惑外蒙獨立，外蒙王公欲依附中國，活佛與喇嘛不願。時段祺瑞已由參戰督辦，改任邊防督辦，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參戰軍易名邊防軍。是年八月，謝米諾夫侵擾外蒙東部，外蒙王公從陳毅勸告，允取消自治，條件大體商妥。九月，邊防軍一團開抵庫倫，徐樹錚繼至，欲獨成其功，指陳毅措置不當，改訂取消自治善後辦法，迫令外蒙官府及活佛照行。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明令取消外蒙自治，與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協定。旋派徐樹錚督辦外蒙善後事宜，裁撤庫倫都護使。

徐樹錚對蒙古頗思有一番經營，但爲情勢所不許，紅軍已控有西伯利亞，白軍與日本窺伺外蒙不已，直系、皖系的決裂在即。一九二〇年七月，皖系失敗，邊防軍解散。十月以後，白軍恩琴（Baron von Ungern-Sternberg）兩次進犯。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庫倫不守。同月九日，活佛再度宣布獨立，外蒙淪陷。北京派張作霖爲蒙疆經略使，張志在囊括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區，與直系爭雄，聯絡氣味相投的謝米諾夫，有共謀再擁清室復辟之說，更不肯加矢白軍。

白軍初攻庫倫時，蘇俄已準備干涉，旋因情況緩和作罷。及恩琴攻陷庫倫，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恰克圖成立蒙古人民革命臨時政府，乞援於紅軍。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遠東共和國及蘇俄出兵，佔領庫倫。¹七月十二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改稱正式政府，仍奉活佛爲元首。司衛巴都（Suhe Bator）執政，紅軍繼續留駐。十一月五日，外蒙與蘇俄訂立友好條約，蘇俄承認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爲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在雙方領土內不准有反抗或顛覆對方政府爲目的之團體、個人或軍隊存在，俄人得在外蒙購置及租借土地，承辦郵電鐵路。

¹恩琴敗逃，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海拉爾爲紅軍俘虜處死，謝米諾夫走日本。

同一天，蘇俄承認在紅軍佔領下的唐奴烏梁海獨立，改稱唐奴拓跋（Tannu Tova）。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外蒙又訂立財產權協定，所有外蒙屬於帝俄的房產，一律交還蘇俄。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圓寂，七月一日，外蒙改名蒙古人民共和國，庫倫改名烏蘭巴都（Ulan Bator Hata，意為紅色英雄城），外蒙成爲第二個共產國家，亦爲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家。

紅黨、白黨在中國第三個角逐地區爲新疆。一九一九年六月，中亞阿年潤夫（Annenkov）的白軍爲紅軍所敗，逃入新疆塔城一帶，新疆督軍楊增新無力制止。一九二〇年五月，紅軍大敗阿年潤夫，但巴奇赤（Bakich）的白軍又至，多至二萬人。五月二十七日，楊增新與塔什干蘇維埃政府訂立伊犁臨時商約，允蘇俄在伊犁、迪化、塔城、喀什噶爾等處派駐領事。一九二一年一月，楊增新將阿年潤夫殘部解決。同年五月，紅軍進入新疆，巴奇赤敗走阿爾泰（阿山道）。九月，爲楊增新驅逐，巴奇赤逃往科布多，新疆紅、白兩黨之爭，終告結束。

五、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對德宣戰後，段祺瑞埋首內戰，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前去歐洲，人譏爲「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一九一八年十月，事實上大戰已告終了，協約國忽責中國參戰不力，緩付的庚子賠款與關稅餘款不用於生產以助協約的物資，徒供私爭，編練的軍隊不用於參戰，徒供內戰。是年一月，威爾遜會對未來和會宣布過十四項原則，主張外交公開，殖民地的處置須尊重居民公意。因之中國仍存萬一之想，希望收回德國在華所有權利，取消中日新約（二十一條），廢止外國在華特殊權利，即取消不平等條約。¹

¹包括廢止領事裁判權，經營鐵路、礦產、農、工、郵、電權，屯駐軍警權，庚子賠款，租借地，改專管租界爲公共居留地，許可關稅自主，先行提高港口貨物稅率。

一九一九年一月，和會在巴黎開幕，中國代表為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軍政府所派的王正廷。當討論到有關中國問題時，日本代表謂膠州灣、膠濟鐵路及德國前在山東的全部權利，皆應由日本繼承。顧維鈞加以駁斥，這是中國在外交上初次與強國對抗，國內人心為之大振。¹二月二日，北京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謂顧維鈞全失友誼，今後須改變態度，非得日本同意，不得有所主張，否則採取相當行動。中國代表不顧小幡的威脅，正式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及廢除中日新約節畧，謂後者係以恫嚇手段，強迫中國應允，違背參戰國上持正義的原則。三月，提出對德和約節畧，四月，提出取消外人在華特權節畧。不惟為日本所拒，英、法亦不願取消在華特權，說是此事不在和會權限之內，將來可請國際聯盟注意。

中國全力以爭的為德國在山東權利的歸還。日本認為此事涉及到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中日新約，與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中日換文，縱使中日新約可因中國參戰作廢，中日換文則在中國參戰之後，應屬有效。英、法對日本早有諒解，左袒日本，威爾遜態度軟化，建議將德國在華權利讓與參戰國處理，或交國際聯盟託管，日本均不同意。四月二十二日，威爾遜質問中國代表，謂中日新約的簽訂，係由於日本的最後通牒，但一九一八年九月，大戰停止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壓迫中國，何以中國對於換文仍「欣然同意」(見474頁)，在此不利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允將德在山東權利，暫由英、美、法、義、日接收，以備歸還中國，中國願償付日本用於青島的戰費，開放膠州灣為商埠，劃定外人居留地。日本仍然拒絕，而以退出和會相要挾。四月三十日，英、美、法為其所屈，竟然答應於對德和約內訂明德國前在山東租借地、鐵路、礦產等，悉讓與日本。

三十年來，中國的民族意識與日俱增，近年尤視日本為最大的敵人，反日的心理強烈。青年學生復因先進知識分子的鼓勵，愛國情緒

¹顧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時年三十。

高漲。無論中國對於大戰的貢獻如何，畢竟是戰勝國之一，爲了協約國的勝利，全國學校放假三天，教員學生狂熱的參加慶祝，以爲公理戰勝強權。等到和會的不幸消息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冷水澆背，一切落空，失望憤激達於極點。一是痛恨強國的暴橫如故，公理全爲欺人之談；一是遷怒以往辦理對日交涉，現任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輩的罪不可恕。北京大學教授首先嚴譏和會與政府當局，學生與社會領袖同起抗爭。北京外交協會定於五月七日國耻紀念日，舉行羣衆示威。北京大學學生以情勢危急，時不可待，號召北京十三個大專學校學生提前發動。¹五月四日，三千餘學生齊集天安門，人手一旗，上寫「保我主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高呼「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巴黎和約簽字」、「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口號。大隊先赴使館區，要求英、法勿助桀爲虐，爲中外軍警所阻，即按預定計劃，直趨曹汝霖住宅，人數已增至四千餘，羣情愈憤，搗破門窗，打毀器物，曹汝霖匿避，在場的章宗祥被毆，房屋起火，學生三十二人被捕。第二天，各校罷課。是後三十餘日，因北京當局採取高壓手段，風潮擴大，不僅各地學生罷課，商民工人，亦罷市罷工。²

中國代表得悉英、法、美對於山東問題處理辦法之後，要求將歸還德國在山東權利一層列入德國和約被拒。五月六日，和會宣讀和約草案，中國代表改請於中國代表簽名之下，證明對於有關山東條款保

¹ 國民外交協會領導人多屬研究系。梁啓超於大戰後遊歐洲，三月二十四日自巴黎致電該會，論青島問題，責一九一八年中日山東問題爲自縛，訂約人須負其責。四月二十四日，梁續電該會，請警告政府與國民，嚴飭中國代表萬勿簽字和約。五月一日，國民外交協會，分電陸徵祥等及美、英、法、義四國，全力抗抵。三日，又議決如中國要求不遂，即請政府撤回代表，並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親日派認研究系謀借外交作政爭，鼓動學生與政府爲難。按此時國民外交協會實際負責人爲林長民，態度最稱積極，與北京大學教授不時接觸。但亦有人詆梁啓超主張簽字，並有勾結法人之事，據云係王正廷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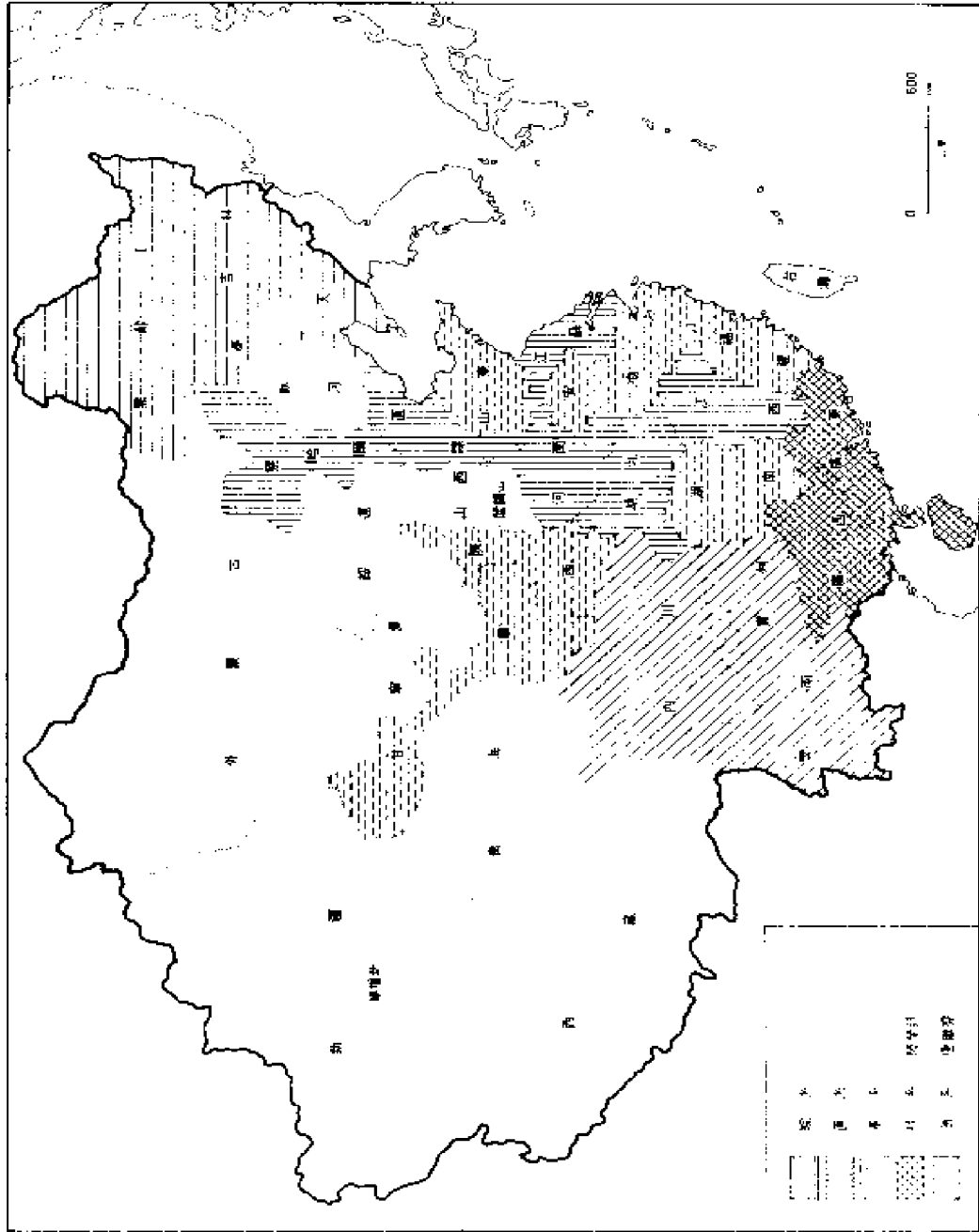
² 關於五四事件由來與以後演變，見第十四章第一節517—524頁。

留，仍遭拒絕。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惟恐失日本之歡，又以和約中若干規定，對中國尚屬有利，例如德國放棄辛丑條約所得權利，交還天津、漢口租界，倘不簽字，不僅不能獲得，且不能加入國際聯盟，大有礙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將來山東問題須與日本直接交涉，日本或有軼越範圍舉動，中國更蒙不利。但在舉國反對聲中，不敢明白表示，命代表相機辦理。六月二十四日，中國代表再行讓步，初請將保留事項，作為和約附件，繼請在簽字前由中國代表致書和會，聲明保留，復要求僅用聲明，不言保留，皆一一被拒。二十八日為和約簽字之日，中國代表作最後掙扎，再商英、法、美三國，如不妨礙日後中國提請重議山東問題之權，即可簽字，原函遭到退回。這時他們已無路可走，寓所又為中國學生工人包圍，和約遂未簽字。中國的委曲遷就雖終於失敗，總算步向自主外交，不甘任聽強國擺布。至於對奧國的和約，則於九月十日照簽，取消辛丑條約內奧國的權利，收回天津奧國租界，中國亦因之得為國際聯盟的一員。同月十五日，中國宣布對德戰爭終了。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德訂約，邦交恢復，一切平等。

第三節 循環的內戰

一、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

直皖兩系軍閥之爭，並未因徐世昌上台而緩和，反而愈趨尖銳。直系在中央的勢力不及皖系，但據有直隸及長江三省形勝財賦之區，外聯南方的桂系，復有聲譽雀起，能戰敢言的吳佩孚，其勢確不可侮。馮國璋未得蟬聯總統，直系公開向皖系進攻。所採策畧，第一為對內繼續主和，打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逕與南方協議停戰後，進而反對選舉總統，段斥其妄談政治，吳反唇相稽，不顧段的威嚴，並勸阻徐世昌勿就非法總統，作人傀儡。徐世昌以種種原因與南方議和，不能不謂為直系在政治上的勝利。議和無成，吳再三詆責安福系。第二為對外明白反日，反對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置，反對北京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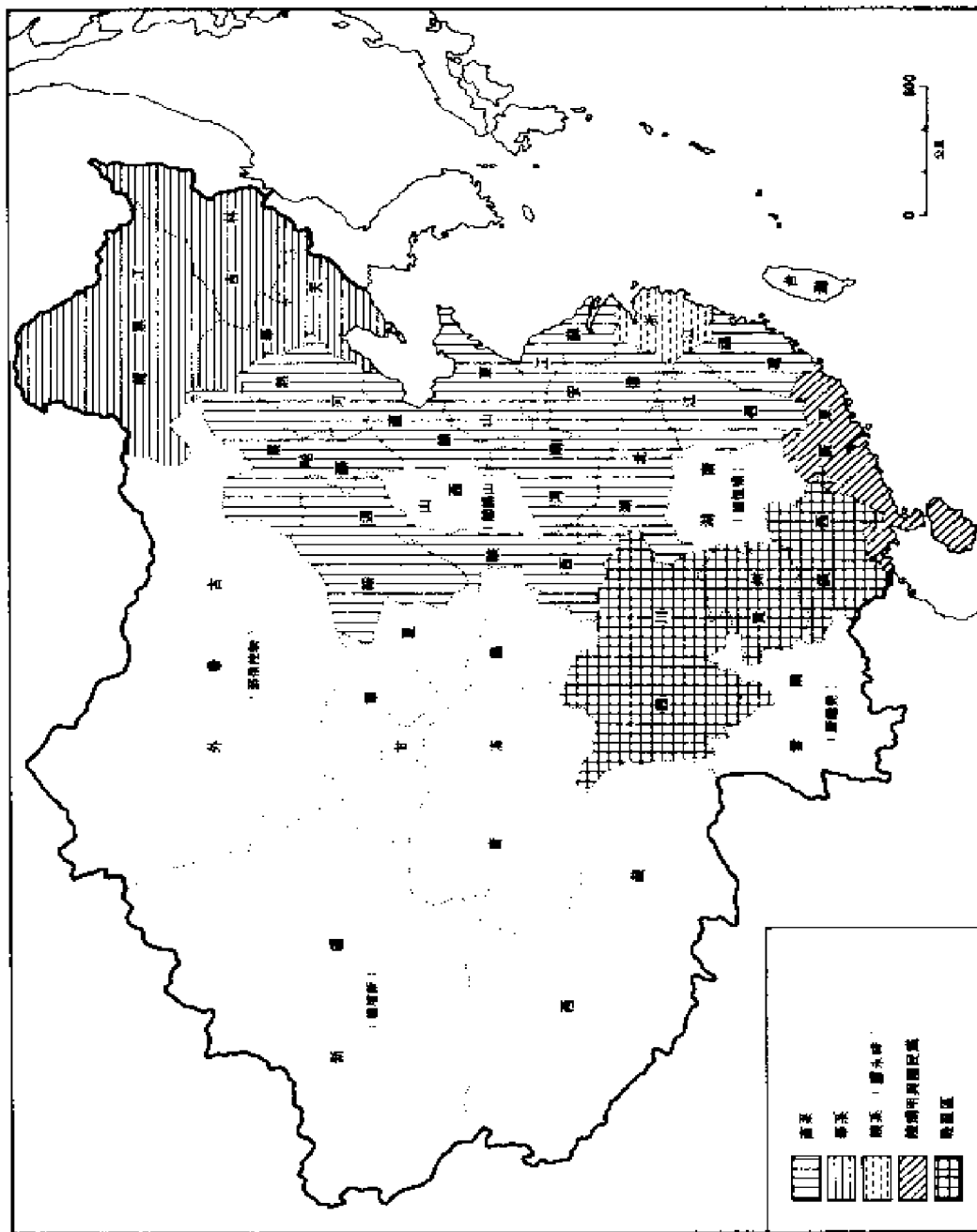
圖九 軍閥割據——直系、皖系對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

府逮捕學生，等於聲討段的親日賣國，摧殘愛國青年。一九二〇年一月，全國各界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吳亦連電力爭，立場與國民一致，大受贊揚，被視為愛國軍人。第三為聯絡其他與皖系利害矛盾的軍閥，特別是奉系。張作霖因惡徐樹錚而惡段，轉聯曹錕，¹支持與安福系不睦的新雲鵬組閣。吳佩孚要求自湖南撤軍，段擬罷免河南督軍趙倜，代之以吳光新，阻止吳佩孚的歸路，隔斷曹錕與長江三省的聯絡。曹錕、吳佩孚支持趙倜，盛傳直、蘇、鄂、贛、豫、奉、吉、黑八省同盟，皖系亦有魯、皖、浙、閩、湘、晉、陝、甘、熱、察、綏十一省同盟之說。

南方陸榮廷及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與直系結為一體。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暴戾為軍閥之尤，湘人恨之入骨，「驅張」運動，如火如荼。吳佩孚與陸、譚協議，由吳率軍北上，與皖係一決雌雄，一任南軍攻取湖南。一九二〇年三月，吳得廣州軍政府六十萬元之助，開始撤防，不理北京的制止令。五月，吳離衡州，順湘江而下，軍威甚壯，張敬堯目送其過長沙，不敢阻攔。譚延闓的湘軍跟蹤而進，連下長沙、岳州，張敬堯部奔潰，湘人到處截擊，幾成為南人仇殺北人之勢，是後湘境無北軍。此為直皖兩系戰爭的序幕。

吳佩孚抵漢口後，聲稱「順從民意，主張正義，消除奸惡，促成和平，力爭外交，一俟軍隊運輸完畢，即日揮戈北指，」無異對段祺瑞的宣戰書。張作霖應徐世昌召，入京佯事調停，實與直系共謀推倒皖系。段組織定國軍，討伐曹錕、吳佩孚，曹錕與張作霖、李純通電討伐安福系；段的兵力約七萬人，曹部約三萬人，奉軍約二萬人，主力集於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帶。日人助段軍，曹錕要求外交團制止。日本以英、美同情直系，有所顧慮。吳佩孚斥段「認賊作父，……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今日之戰，為救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激昂慷慨，人心無不殷望其掃蕩親日派，惟恐其不勝。此為直系戰勝的最大原因。

¹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馮國璋病卒，曹錕繼為直系首領。



圖十 軍閥割據——直系、奉系對抗（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

七月十四日，戰鬥開始，分東西兩線，三天後，西線皖軍敗於北京、保定之間，東線直軍得奉軍之助，亦獲勝利，兩年來段祺瑞在日本扶植下，編練的數萬邊防軍大半覆沒。段祺瑞罷職，徐樹錚等被通緝，¹安福俱樂部解散，新國會消滅。把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失勢，代之而興的為曹錕、張作霖。

兵與槍為軍閥的命脈，權利與地盤是他們爭奪的目標。段軍敗後，直軍、奉軍爭相收繳段軍的兵與槍。戰勝段軍以直軍之功為大，奉軍因利乘便，將段軍槍砲擄載而去，直軍至為不平，此為直奉交惡之始。對於整個時局，吳佩孚主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民大會由農會、工會、學生聯合會代表組成，制定憲法，審查中外條約、密約及政府所借外債與用途，決定總統、內閣問題，深得社會及內外稱頌。吳自以為汗馬功高，一言九鼎。張作霖悍然反對，斥吳不過是一師長，無資格妄言國事，吳愈為憤憤。內閣總理靳雲鵬在直皖戰前為安福系逼走，戰後得曹、張的擁護而復起。

至於地盤的分配與軍隊的擴張，以及戰勝者的加官進爵，為當然之事，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仍兼直隸督軍，吳佩孚任直魯豫巡閱副使，駐紮河南洛陽。李純任蘇皖贛巡閱使，仍兼江蘇督軍，曹、吳部新增五六萬人，合舊有之眾，約十餘萬人。張作霖先已是東三省巡閱使，現在又得到察哈爾、熱河兩區，所部號稱二十餘萬。不久李純暴卒，張作霖保張勳繼任，直系力爭，李部師長齊燮元以近水樓台，作了江蘇督軍，²北方成為直系、奉系兩大軍閥對峙之局，內閣全視他們的愛惡為去留。總統徐世昌全恃彌縫播弄，苟延殘喘。

二、南方的桂系、滇系、國民黨與聯省自治

北方軍閥火併，南方亦互訐不已，一方面為桂系及政學系(會)；

¹ 對於段派的處分，徐世昌、張作霖均主從寬，僅通緝徐樹錚、段芝貴、王揖唐等，均由日本公使館收容。計洪憲帝制、張勳復辟、及此次被懲要犯，無人真正受到罪罰，日後均免通緝，大都再出任官。

² 官方宣布李係自殺，或云遭人謀害。

一方面爲滇系及國民黨。孫中山離粵後，軍政府完全受桂系、政學系把持。一九二〇年二月，唐繼堯爲駐粵滇軍統率問題，聯合國民黨與桂系、政學系相爭。¹軍政府總裁伍廷芳及參眾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相繼而去。四川熊克武曾與唐繼堯合力驅走投靠段祺瑞的督軍劉存厚，後因不堪唐的凌迫，轉附政學系，爲唐及親國民黨的川、黔軍所敗。熊以川人治川爲口號，聯合附唐的川軍將領劉湘，並與劉存厚言和，轉敗爲勝，滇、黔軍退出四川。同一時期，廣州亦起重大變化，軍政府卒爲國民黨推翻。是後南方內爭，仍然不已，四川尤戰無虛日。

孫中山主持軍政府時，將粵軍二十營收歸直轄，由陳炯明率領，移駐粵東。及孫中山去職，陳炯明懼爲桂系所乘，積極進攻閩南，佔有漳州等地，實力漸增，成爲國民黨的唯一武力。²桂系與直系一氣，國民黨與皖系聯交。孫中山乘直、皖之戰，促陳炯明攻粵，由皖系的福建、浙江督軍濟以餉械。一九二〇年八月，陳炯明回師，粵人痛惡桂軍，其情形一如湘軍之驅逐北軍。十月，岑春煊、陸榮廷宣言解除軍政府職務，廣東督軍莫榮新於勒索商民巨款後出走，粵軍入廣州。孫中山宣布軍政府依舊存在，陳炯明任廣東省長。三個月前桂系助直系推翻皖系，現在皖系又助國民黨推倒桂系，南北繼續對立。

一九二一年初，舊國會在粵重開，孫中山擬改軍政府爲正式政府，以期內收統馭之效，外以對付列強。³陳炯明欲保境自守，獨有廣東，阻撓未成。五月，孫中山就任總統，轄區僅有廣東，而廣東的實權則在陳炯明之手。⁴北方軍閥及公使團對孫一致反對，廣西陸榮廷陳兵粵邊，準備東侵。六月，粵、桂之戰再起，粵軍先下廣西梧州，八月再

¹ 駐粵滇軍原由李烈鈞統率，經政學系運動，改歸李根源。唐繼堯命仍受李烈鈞節制。桂系助李根源，李烈鈞戰敗。

² 一九一九年十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中國國民黨。

³ 南北和議時，公使團以部分關稅歸廣東軍政府，孫中山回粵，公使團謂軍政府不能代表南方，停止撥付。孫擬強行接收海關，外國軍艦示威阻止，孫至爲憤慨。

⁴ 陳炯明除任廣東省長、粵軍司令外，孫中山又畀以內政、陸軍部長。

下南寧，李烈鈞所統滇、黔、贛聯軍亦佔領桂林。但西南其他各省仍不奉孫的號令。

辛亥革命期間，已有仿行美國聯邦政體之議，但民國政府仍然是中央集權制。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實行獨裁，地方分權之說又起。及南北分裂，主張聯邦制者漸多。爲避用「邦」及「分權」字樣，改稱「聯省自治」，先由各省制成省憲，組織省政府，實行自治，再由聯省會議，制定聯省憲法，組織中央政府。實際是爲了遷就軍閥割據，希望達成表面的統一。南方軍閥地狹力弱，但圖自保，殘餘皖系督軍恐被吞噬，均表贊同。直系軍閥地廣兵衆，吳佩孚踵行段祺瑞的政策，思席捲海內，反對最力。孫中山認爲中國之亂，由於軍閥之目無法紀，大軍閥自恃暴力，攘奪權利，固然須予以摧毀，聯省自治無異保護小軍閥，使各佔一省，說不上自治，徒只削弱中央，不能統一。

民國初年，倡導聯邦制的多爲湘人，如政論家章士釗、李劍農。其後湖南以受北洋軍閥及南北戰爭之禍獨甚，名流熊希齡正式提出聯省自治說。北軍被驅逐後，湘人謀置身南北之爭之外，保持中立，進行益亟，研究系力贊其成。直、皖之戰甫了，一九二〇年七月，湖南省長兼總司令譚延闓即宣布自治，創制省憲，「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采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梁啟超與熊希齡爲草自治根本法。各公團反對省議會包辦，軍人又相傾軋，變亂頻作。十一月，譚延闓去職，由師長趙恒惕繼任，剪除異己，一九二一年四月，完成湖南省憲法草案。

雲南唐繼堯對四川用兵失敗，宣布閉關自治。一九二〇年，率領黔軍自四川返貴州的盧濤，逐走督軍劉顯世，亦樹自治旗幟。同年熊克武、劉湘宣布四川自治，劉湘任總司令。一九二一年，自四川退回雲南的滇軍師長顧品珍驅走唐繼堯，仍以自治號召。北方各省議會及各團體同在作自治運動，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各省自定省憲，實現地方自治」通電，尤爲轟動，湘、黔、川、滇當局同聲以應，此爲聯省自治的高潮。

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王占元爲一庸材，而野心勃勃。一九二一

年初，召集湘、贛、川、滇、黔、桂代表會議，自居盟主。是年四月，北京內閣總理靳雲鵬邀曹錕、張作霖會於天津，王亦在內，商分配地盤及改組內閣問題。東三省外，劃蒙古、熱河、察哈爾、綏遠爲奉系的勢力範圍；直、魯、豫外，劃陝西、甘肅、新疆爲直系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及川、滇、黔爲王的勢力範圍。

王占元督鄂六年，專事聚斂，此次北上，所領軍費悉飽私囊，不發軍隊欠餉。六月，宜昌兵變，武昌、沙市繼之。¹鄂人請湖南出兵助成自治，湖南正苦兵多將驕，謀向外發展，消滅內憂，擴大聯省自治運動。四川軍閥互不相下，亦欲以湖北爲外府，奪據西南鴉片集散地的宜昌。七月二十九日，湘軍總司令趙恒惕獲皖系財力的支持及鄂籍國民黨人蔣作賓的合作，以援助鄂人自治的名義，進攻湖北。王占元屢戰屢敗，直系的蕭耀南代爲湖北督軍，吳佩孚代爲兩湖巡閱使。湘軍知非直系之敵，趙恒惕與吳有舊，希望吳贊成聯省自治，南北政府一併取消，另組統一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先制省憲，再制國憲。梁啓超爲解湖南之危，勸吳與湖南提携。吳均不之聽，水陸並進，大敗湘軍。以張作霖眈眈虎視，孫中山已定廣西，準備北伐，湘軍大有與之聯合可能。加之川軍已入鄂西，急須移師迎擊，因於攻下岳州後，未再續進。趙恒惕以兵敗力竭，九月一日，透過長沙英國領事的調停，與吳會於岳州英國兵艦，訂立和約。同月，進攻宜昌的川軍受到英、美、法、日領事的干涉，不久爲吳拒退。

吳佩孚雖然戰勝，但違背了希望自治的人心，聲望大損。他仍欲行其由國民大會改造政局主張，授意張紹曾發起國是會議，復因張作霖反對而不成。湘人恐湖南再成南北戰場，遂於倉卒之間完成省憲，一九二二年一月實施。省長仍是趙恒惕，省務院院長爲倡導聯省自治的李劍農，湖南算是惟一具有自治形式的省份，聯省固爲空談，自治亦徒有其名。

¹ 宜昌、武昌兵變，波及英、美僑民，漢口領事團要求駐偵，外人住所附近二十里不得駐軍，增加領事館衛隊。

三、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第一次大戰以來，日本獨步東亞，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對於山東問題不得不屈意將順。美國輿論至爲不滿，參議院拒不批准凡爾賽和約，不參加國際聯盟，美、日衝突益烈，國際情勢緊張。英國與日本有同盟條約，權捲入漩渦，日本在東亞的擴張，對英同樣不利。於是美、英協議，由美國總統哈定（W. G. Harding）邀請有關國家定期在華盛頓討論限制軍備及太平洋與遠東問題，期約束日本、補救巴黎和會的不當措置。與會的有美、英、日、法、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及中國九國。

中國朝野對於此次會議的興奮過於巴黎和會，以爲多年來所受的外來侵害有了陳訴的機會，尤其是日本給予的壓迫，希望加以制裁，民間紛組支援團體。北京政府派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大理院院長王寵惠、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爲代表。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樞未赴。全國商會聯合會、教育聯合會推余日章、蔣夢麟爲國民代表，有監視政府代表之意，留美中國學生亦積極活動。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會議揭幕，分限制軍備委員會、太平洋與遠東委員會，前者由英、美、法、日、義組成，後者由九國組成。十二月十三日，英、美、法、日簽訂四國公約，互相尊重太平洋區域主權，取消英、日同盟條約，¹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英、美、日、法、義簽訂海軍條約，規定主力艦比率。

國際氣氛對中國殊爲不利，有共管之說。日本主張討論的問題，不得涉及已成事實。英國謂滿洲不屬於中國，法國謂中國並無代表全國人民的政府。中國希望將有礙中國主權及無條約根據的外人在華行事分別廢止或修正，提出十項原則，要點爲：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行政獨立；中國贊成門戶開放主義，如無中國參與，各國不得訂立直

¹ 藍辛石井協定至一九二三年廢止。

接關於中國的條約，各國宣布有關在華特權的成約，由會議審查，未宣布者視為無效；對於中國政治、法權、行政自由的限制應予廢止；無限期的成約，須附以限期，如有戰爭，應尊重中國之中立權。美國代表羅脫（E. Root）改併為四條，簡稱羅脫原則，於十二月一日通過：一為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為給予中國完全無礙的機會，期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穩定的政府；三為施用各國權力，保障在華的商務、實業的機會均等；四為不得利用中國現狀，取得特別權利，致減少友邦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妨友邦安全的舉動。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九國訂立公約，允遵守此四項原則；為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得有效的實施，各國不在中國某區域謀取或協助其本國人民謀取商務或經濟發展的優越權利，不剝奪他國人民的合法經營，不贊助在中國設立勢力範圍，或獨享機會的任何民間協定。

關於具體事項的處置，一為關稅，中國要求逐步實行自主，結果是召開修改稅則委員會，切實值百抽五，再召開關稅特別會議，討論裁釐加稅，先征進口貨附加稅百分之二·五。二為領事裁判權，中國要求取消，結果是由各國組織委員，考察在華領事裁判權及中國司法現況，各國逐漸或以他種方法，放棄領事裁判權。三為外國在華軍警，中國要求撤退無法律根據的外國在華軍警，¹並不涉及辛丑條約各國的駐兵權與租界警察，結果是如中國能保護外人安全，其無條約或協定許可的外國軍警，經中外會同調察後，各國可自行決定撤與不撤。四為租借地，中國要求收回，日本謂膠州灣問題正與中國談判，旅順、大連斷不放棄。英國謂日本如放棄膠州灣，亦願放棄威海衛，但九龍仍須保有。法國對於廣州灣立示與他國一同行動。五為外國在華郵局與無線電台，中國要撤廢，各國以在華郵局無條約根據，雖知理屈，但中國應保證不變更外國郵務總辦的地位，雇用若干日本人為郵政官員。至於無線電台，有條約依據者，只准收發官電，無條約依據者，

¹ 指日本軍警而言。辛亥革命時，日本派兵駐漢口，一九一四年，日兵侵入山東。南滿鐵路地區日軍應與中東鐵路俄軍同撤。一九一七年後，俄軍已無，日軍仍留。南滿日本警察始於一九一七年。

由中國收購。租借地、南滿鐵路附屬地、上海法租界電台，可由中國與有關國家商討解決。六為各國不得擅訂有關條約，已訂者交會議審查，日本反對最力，結果是此類條約，應送會議秘書處存案，以後所訂，應通知各國。

總之，九國公約所訂原則，概不追溯已成事實，仍舊維持現狀，不過以後不得復有這類行爲。關稅切實值百抽五，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實施，關稅特別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召開，¹允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實行自主。在釐金廢除前徵收進口貨附加稅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釐金廢除後，一律為百分之十二·五。領事裁判權問題，一九二六年由各國所派考察代表草成報告，俟中國司法改善後，再商逐漸廢除。撤退外國軍警無一國肯志願照辦。交還租借地問題，膠州灣另案辦理，威海衛遲至一九三〇年始行交還，廣州灣、旅順、大連的收回則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之事，中國真正所得為一九二三年一月外國郵局的撤廢。

巴黎和會後，山東問題仍為懸案，中國不願與日本直接交涉，原因之一為此問題乃由於世界大戰而來，應由參戰國家處理。其次是怕難以抵抗日本的壓力，如通過國際會議，可望較為有利。日本原想在會議前與中國解決，中國上下反對。但英、美不願在會議中討論，建議中、日於會議外相商，由英、美從旁協助。中國希望完全收回膠州灣，願自行開為商埠；膠濟鐵路歸還中國，資產歸中、日均分，日本所佔半額，由中國贖回；日本對德國前在山東權益，不為何等要求，並拋棄濟順、高徐兩鐵路權利，交回租借地內官有財產及青島海關等。爭執最烈的為膠濟鐵路問題，日本要求借日款收回，中國主張用現款或分期收購。新任內閣總理梁士詒面告日公使小幡西吉，將以借款自辦，雖未明言向日本借貸，而語意含糊兩可，各方紛紛反對。經英、美調停，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中日山東懸案條約簽字，中國收回膠州灣

¹ 切實值百抽五係再度申明。關稅特別會議因法國對庚子賠款堅持用金佛郎支付，一九二五年七月始批准九國公約，故延至是時。

及海關權，膠濟鐵路於十五年內分期付款贖回，沿線日軍定期撤退，濟順、高徐鐵路借款權讓與國際銀行團。¹同年十二月，膠州灣實行收回，付日本公產償款一千六百萬日元。次年一月，收回膠濟鐵路，贖款為四千萬日元。

關於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與換文，中國要求全部廢止，日本拒絕討論。山東問題解決後，日本宣言願將其中有關南滿、東蒙鐵路借款權及稅課作抵的借款權讓與國際銀行團，放棄南滿財政、軍事、警察顧問權，撤回二十一條第一號的保留權。最後是將中國的要求、日本的宣言、美國的聲明，列入會議記錄。

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不無所得，山東問題總算有了解決辦法，關稅稍有改進，九國公約亦不失為均勢之下的一種保障。但是中國不惟毫無乘時振奮之象，軍閥反益埋頭內戰，列強繼續用為互爭工具。

四、吳佩孚的霸權

袁世凱為民國北洋軍閥的鼻祖，繼之者為段祺瑞。段倒後，吳佩孚崛起，漸成為北洋第三大軍閥，和他相抗的為張作霖。吳戰敗湘軍，身兼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黃河、長江流域諸軍閥唯其馬首是視，張作霖愈為妒嫉。地盤之外，復爭欲控制中央政府。交通系的財政、交通總長周自齊、葉恭綽與內閣總理靳雲鵬不睦去職，代之者為直系的高凌霨、張志潭，仍不能解決財政困難。借款不得，到期外債無法償付，國內公債超出三萬萬元，軍隊欠餉，官吏欠薪，以致停止辦公。交通系首領梁士詒運動張作霖聯合皖系國民黨，共倒靳雲鵬以制直系。

華盛頓會議准許中國關稅切實值百抽五，加徵進口貨附加稅百分

¹大戰期間，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變為英、法、日三國銀行團。一九一九年美與三國合組對華借款團，名曰新銀行團，並允許日本的要求，滿蒙地區不在新銀行團借款範圍之內。一九二〇年九月，美、英、法、日通知中國，俟中國統一，新銀行團即援助中國之開發計劃，終未成事實。此處及以下所謂國際銀行團，俱指新銀行團。

之二·五，直系奉系無不垂涎。張作霖推梁士詒組閣，徐世昌亦欲去靳雲鵬。傅張志潭爲吳佩孚獻策，可暫聽梁組閣，然後搾取大宗軍餉，不從則攻而去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梁代靳爲國務總理，吳要素欠餉，梁無以應。¹吳轉以山東問題，詆梁擅允借日款贖膠濟鐵路，「勾援結黨，賣國媚外。」以後類此的電報，雪片飛來，聲言「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爲是者，則其人即梁之謀主，即屬全國之公敵，」無異明斥張作霖，並限梁於七日內下野，有如直皖戰爭前夕討伐安福系的文電複本，而激烈堅決過之。直系督軍亦聯請罷梁，否則與內閣斷絕關係，此又如督軍團之要求對德宣戰、解散國會的重演，外交成爲軍閥攻擊對方的主要理由，親日賣國更是罪不容誅，愛國救國爲最動聽的口號。徐世昌知梁不能留，諷其引退。次年一月二十三日，梁只得出京，請假而不辭職，在位不足一個月。

張作霖初不作表示，先由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發言，謂「愛國必以其道。」再由張作霖要求徐世昌宣布梁士詒有無賣國行爲，並請整飭紀綱。二月，孫中山下令北伐，奉軍開始動員，向山海關內增兵。吳佩孚雖決心一戰，曹錕尙無意與張決裂。張態度強硬，要求吳佩孚自洛陽回兩湖巡閱使本任，聽梁士詒銷假視事，聲稱「以武力爲統一後盾，凡有干政亂紀者，視爲和平統一障礙，願執戈先驅，與衆共棄。」直系大憤，一致主戰，吳斥張把持中央，爲梁保鏢。時孫中山與陳炯明失和，北伐頓挫，情勢對奉系、皖系不利。盧永祥建議由曹錕、張作霖面晤，張允而曹拒。吳佩孚利在速戰，詆張爲「盜閥」，梁爲「財閥」，同惡相濟，布列張的十大罪狀。奉系將領亦惡聲相報。張聲言「簡率師旅」，與曹、吳週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奉之戰開始，直軍約八萬人，奉軍約十萬人，規模較直皖之戰爲大，戰場與直皖之戰畧同，主力戰仍在北京西南。五月四日，奉軍戰敗。河南督軍趙倜暗通奉系，誤信奉軍獲

¹ 梁士詒發行鹽餘公債九千六百萬元，名爲償還內外短期公債，百分之四十用以償還日本短期公債。因無切實擔保，債券慘跌，持券人多爲之破產。鹽餘係指擔保善後大借款的鹽稅收入的餘額。

勝，突襲鄭州，爲直系的馮玉祥所敗。盧永祥受制於江蘇督軍齊燮元，孫中山爲陳炯明所牽，均不能與奉軍配合行動。東京雖有「張作霖後援會」，以華盛頓會議甫畢，國際局勢不許日本政府公然給以支持。公使團組織海陸聯軍警備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不准中國於京奉鐵路線駐軍，對奉系亦屬不利。事後張作霖責英國援助吳佩孚。至於國內人心，對吳的觀感雖非昔比，對張尤爲憎惡。吳的反日愛國文電仍有其號召力。張的武力統一口號，徒召社會反感，梁士詒又爲十手所指的洪憲帝制犯，梁所引用的新交通系及取消通緝的安福系人物，均爲衆所不齒的親日派，決定直奉勝負的並不全在疆場。

勝負既定，北京政府照例懲處敗者，梁士詒再被通緝，張作霖免職查辦，梁避入租界，張宣布東三省獨立。吳佩孚以兵力財力疲竭，又恐進兵關外召來日本的干涉。南方問題亦待應付，由英人調停，奉軍退回東北，直軍不再追擊。六月，再經英、美教士斡旋，雙方在秦皇島英軍艦訂立和約，情形與上年九月湘、鄂的岳州和約同。經此一戰，奉系喪軍數萬，失去了熱河、察哈爾地盤及對北京的左右力，勢力暫局於東三省，秣馬厲兵準備再與直系一戰，吳佩孚的威勢如日中天，睥睨一世，準備一統宇內。

徐世昌憑其陰謀權術，利用馮國璋、段祺瑞的水火取得總統，標榜和平統一，但三年多來，內戰日烈，分裂如故。法統爲南北爭執的癥結，吳佩孚一向視徐的總統爲非法，戰勝皖系後曾主張開國民大會，決定總統問題。及戰勝湘軍，又擬開國是會議，雖皆未成，而去徐之心仍存。一九二一年冬，奉、皖、粵結爲反直系的聯合陣線，謀推孫中山、段祺瑞爲總統、副總統，梁士詒爲內閣總理，另行組織國會。¹吳佩孚授意滯留北方的舊國會議員，發表宣言，主張重開舊國會，完成憲法，不僅可打破奉、皖、粵三方面的企圖，徐世昌亦非去不可，同時又使孫中山失去護法借口，可謂一舉數得。直奉開戰前夕，吳再唆使張紹曾通電，由舊國會行使職權。奉系敗後，舊國會議員在天津

¹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孫中山派往奉天的代表伍朝樞告瀋陽美國副領事 Calvin Huston，謂已與張作霖商就。

商定了恢復法統計劃。五月十四日，吳佩孚通電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首先贊成，請黎元洪復職。¹

吳佩孚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的同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一個「好政府」。八天後，蔡又列名梁啟超等的通電，²贊成恢復舊國會，孫傳芳電請徐世昌、孫中山一同引退。六月初，徐世昌離北京，曹錕、吳佩孚及直系督軍請黎元洪復職，蔡元培及北京學界勸孫中山下野。黎以廢督裁軍為復職條件，無異與虎謀皮。

六月十一日，黎元洪重任總統，以顏惠慶為內閣總理，³召集舊國會。顏惠慶以無術應付財政問題，月餘後辭職，由王寵惠代理，意欲借王與國民黨的關係，與南方和解。孫中山因在廣東失勢，北來上海，發表宣言，主由合法國會行使職權，實施兵工計劃，發展實業，並告美國記者，如國際銀行團援助中國政府，從事建設，願前往北京，以謀統一。王寵惠與孫洪伊、李大釗以吳佩孚曾邀孫中山北來，於是從中撮合，⁴九月，王寵惠正式組閣。王為主張好人過問政治者，人稱他的內閣為「好人內閣」。與吳佩孚接近的某閣員，謂孫中山、吳佩孚均贊成裁兵，反對外國侵略，理應携手，中國共產黨亦說孫、吳合作為好現象。孫、吳曾派代表互訪，合作似頗有可能。以彼此立場距離仍遠，卒歸不成。

駐天津的直系省長王承斌惡吳專斷，時向駐保定的曹錕媒證，人稱為「津保派」，吳駐洛陽，人稱為「洛派」。津保派疑吳欲擁孫中

¹ 孫傳芳原為王占元部下的師長，湘、鄂戰時，受知於吳佩孚，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駐防宜昌。

² 列名蔡元培等宣言的有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李大釗、梁漱溟、丁文江、陶知行等十六人。李大釗致書中國共產黨，謂好政府主張為解決政治糾紛的唯一辦法。列名梁啟超等電報的，尚有熊希齡、汪大燮。按一九一七年，梁反對舊國會最力。

³ 顏惠慶曾長外交部，與顧維鈞等被稱為外交系。

⁴ 孫洪伊與直系及孫中山均有淵源，李大釗與孫洪伊關係甚密，吳佩孚的幕僚白堅武又為他的同學。

山爲總統，決先倒王寵惠，再及黎元洪，擁曹錕爲總統，唆使衆議院議長吳景濂發難，許以未來的內閣總理。十一月，吳景濂誣財政總長羅文幹受賄。黎元洪亦恐孫、吳合作，於己不利，下令逮捕羅文幹，吳佩孚指爲違法。曹錕詆羅納賄瀆職，王承斌斥吳佩孚爲王寵惠的「保鏢」，吳佩孚宣稱不再過問，王內閣遂倒。

張作霖於黎復職前夕，正式宣布東三省自治。盧永祥謂黎的任期已由馮國璋代理完畢，無職可復，宣布廢除浙江督軍，稱軍務善後督辦（簡稱督辦），不奉北京命令。江西督軍陳光遠爲北伐軍所敗，黎元洪改江西督軍爲督理軍務善後事宜（簡稱督理），與盧永祥的廢督均爲換湯不換藥。南方各省內部互相廝殺，予吳佩孚以入侵機會。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爲吳的極盛時期，控有十五省區。在他五十歲的生辰，到洛陽慶祝賀的顯要數百人，譽之者謂「八方風雲會中州」¹，其實他的霸權已是日薄崦嵫。

五、無休止的南方戰亂

一九二一年，粵軍平定廣西之時，湘、川軍正分向湖北，直系、奉系衝突方烈，孫中山急圖北伐，以推翻吳佩孚爲第一目標。陳炯明志在割據，不以北伐爲然。是年十二月，孫移駐桂林，準備北出湖南。一九二二年初，直奉之戰，如矢在弦，張作霖、段祺瑞約孫共同行動，雲南顧品珍亦實行出兵，唐繼堯爲奪回雲南，不服孫的制止，自廣西進攻，顧品珍敗死。黔軍袁祖銘受吳佩孚之命，自湘西攻佔貴州。川軍內訌，無暇外顧，湖南趙恒惕拒絕孫中山假道，陳炯明的離心尤令孫難行其志。不得不變更計劃，自桂林濟師回粵，罷黜陳炯明。陳以所部遠戍廣西，無力抵抗，東退惠州。孫爲及時配合直、奉之戰，即赴韶關督師，進攻江西。

¹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初七）爲吳的五十歲生日，康有爲賀聯云：「牧野鷹揚，百歲功名纔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雲會中州。」時直隸、河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督軍爲直系嫡派，附屬直系的有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湖南、熱河、察哈爾、綏遠。此外貴州、四川曾短期受吳支配。

陳炯明免職後，所部自廣西回粵，盤踞廣州，要求恢復陳的廣東省長及粵軍總司令，孫返廣州鎮撫。六月十六日，陳軍將領請孫與徐世昌一同下野，實行圍攻總統府，較北方軍閥之對待徐世昌更爲狠毒，孫避往軍艦，北伐軍許崇智部回師討伐無功，敗回江西。八月九日，孫去上海，廣東復爲陳炯明所有。

福建督軍李厚基於皖系失敗後，轉投直系。一九二二年十月，孫中山、徐樹錚策動閩北駐軍會合許崇智部將李逐走。爲了收復廣東，孫又聯絡在廣西的滇軍將領楊希閔、桂軍將領劉震寰及江西粵軍進攻廣州，陸榮廷的舊部沈鴻英共同行動。¹一九二三年一月，奪回廣州。許崇智軍離閩返粵，福建爲直系的孫傳芳所得。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重蒞廣州，改稱大元帥，不再言護法。四月，吳佩孚嗾使沈鴻英叛變，爲楊希閔、劉震寰及粵軍所敗。五月，東江陳炯明軍東佔潮州、汕頭，西犯廣州，而以十一月爲最猛烈，廣州幾乎不保。此後成相持之局，廣東半爲孫中山所有，半爲陳炯明所據。

川、滇、黔、湘、桂五省的內爭，從未停止，四川尤甚。一九二二年，劉湘系的楊森與熊克武系爭奪防地，劉存厚的舊部鄧錫侯等助熊，楊森敗走鄂西。一九二三年，熊又與鄧相戰，楊森得吳佩孚之助，回川援鄧。時唐繼堯又向外擴展，助劉顯世驅逐貴州的袁祖銘。吳佩孚爲先定四川，命袁入川援楊森、鄧錫侯。唐繼堯與國民黨助熊克武，四川復成爲南北角逐場。吳佩孚兵多械足，一九二四年，熊克武兵敗離川，滇軍退回雲南。吳佩孚以楊森爲四川督理。袁祖銘復返貴州，擊走劉顯世。

湖南、廣西的變化與以後的大局關係較大。湖南派系之爭未因自治而平息。國民黨支持譚延闓，吳佩孚支持趙恒惕。一九二三年，譚受孫中山命，自粵返湘，各將領紛起響應。趙得吳佩孚及外國軍艦之助，轉敗爲勝，譚軍退回廣州。

¹ 滇軍分兩支，一爲楊希閔統率，一由朱培德統率。楊爲顧品珍舊部，唐繼堯重有雲南後，楊部轉入廣西。朱爲李烈鈞舊部，北伐失敗，亦退廣西，實力遠不及楊。沈鴻英的桂軍受岑春煊指使，謀乘機奪取廣州。

一九二二年，廣西陸榮廷部乘孫中山、陳炯明之爭而再起，號稱自治軍，李宗仁爲其一，與奉孫中山號令的黃紹竑、白崇禧聯合，得西江粵軍李濟深之助，佔有梧州。¹據有桂林的沈鴻英，與據有南寧的陸榮廷互爭雄長。一九二四年，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先敗陸榮廷，再敗沈鴻英，成了廣西的新興勢力。

六、匪禍與曹錕賄選

內戰爲軍閥所造成，匪亂爲內戰的副產品。搜括、招兵是軍閥爭城爭地的并行手段，人民因搜括而無以爲生，當兵與爲匪成了兩大出路。軍閥搜括所得，大部分歸入私囊，兵因不得溫飽而譁變，亦成爲匪。其次內戰不論勝敗誰屬，搶掠皆所不免。敗兵携械逃散，以之轉售於匪。軍閥收匪成軍爲常事，既不煩征剿，復增添兵力，匪亦視撫爲升官捷徑。畧有資產之家，既困於兵，又苦於匪，狡桀者，賣田買械，與匪合流，一旦招安，小者營長、團長，大者旅長。多災而俗悍的黃河、淮河流域爲主要產兵區，亦以產匪著。最大軍閥袁世凱、段祺瑞來自淮河流域，馮國璋、曹錕、李純、王占元、吳佩孚輩俱爲黃河流域之人，張作霖則出自東北鬪匪。舉國皆知的巨匪，前有白朗，後有「老洋人」張慶、孫美瑤，均起於河南、山東。

白朗之前，河南的巨匪有嵩山的王大縱等，辛亥革命時由劉鎮華收編，劉官至省長、督軍，匪首多官至司令、師長。白朗死後，餘衆潛伏，由河南督軍趙倜收編。²一九二二年趙倜兵敗，所部大都重理舊業，連破豫東歸德、魯西曹州、豫西陝州、靈寶，吳佩孚駐在地的洛陽教員學生數十人曾爲所擄，公然張貼文告，向吳挑戰，首領爲張慶，號「老洋人」，因爲官怕洋人，他的威勢更大過洋人。是年十月，自豫西蜂擁竄向東南，衆二萬餘人，進入皖北，再返河南，兩越京漢鐵路，連破十餘城，擄擄外國教士，英、美、法等國嚴重抗議，最後

¹ 李宗仁出身陸軍小學，黃紹竑、白崇禧均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較有新知，白尤有才畧，李濟深爲廣西人。

² 劉鎮華收編之匪，號爲「鎮嵩軍」。趙倜的宏威軍大都來自土匪。

由吳佩孚招撫，並將亦軍亦匪、出沒豫、陝的樊鍾秀收編。¹老洋人因受張作霖運動而再叛，所至燒殺。民團奮起攻剿，老洋人爲部下所殺。

以招匪爲兵著的湖南督軍張敬堯失敗後，所部多返歸魯南故里，以據有抱犢崗的孫美瑤爲首，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在臨城截劫津浦鐵路北上客車，十一名外人被擄，內有上海《密勒氏評論報》(*Millar's Review* 即 *China Weekly Review*) 主筆美人鮑惠爾(J. B. Powell) 等八人，是爲震動中外的劫車案。公使團立即抗議，各國軍艦準備在大沽示威，美國倡議武力干涉，大有一九〇〇年八國出兵之勢。交通總長、山東督軍、省長，以及各國領事武官，羣集臨城。總統府顧問美人安特生(Roy Andersson)、徐州鎮守使、江蘇交涉使，親入匪區談判。六月二十四日，外人獲釋，匪衆編爲官軍。

這次被擄的旅客內如無外人，事態當不致如此嚴重。上海美僑主張暫停華盛頓會議給予中國的利益，強令中國裁兵、監督中國財政、外軍駐防各要地。英國提議中國鐵路警察由洋員統轄、增加華北外軍，如中國拒絕，列強應考慮駐兵條約口岸、佔領京津鐵路，大有實行共管之勢。八月十日，十六國發出通牒，要求賠償損失，編組鐵路警察，由洋員監督，山東督軍田中玉撤職。中國雖然接受，公使團以未說明切實護路辦法，十月四日，十六國二次通牒，責剿匪不力，要求確保外人生命、權利、財產，恢復中國法律、秩序。時總統爲曹錕，十五日，承認全部條件。近八年來，除非督軍戰敗，幾無被黜之事，如果不是外國的壓力，北京政府斷不敢出此。

在國際共管呼之欲出之時，正是曹錕篡奪政權之日。徐世昌被推翻後，直系的津保派即擬選擁曹錕爲總統，吳佩孚先恢復法統，以黎元洪過渡，俟全國統一，再由曹錕登台。黎復位後，津保派再三倒閣，使黎知難自退。曹錕欲早圓總統之夢，倒黎與收買國會議員並

¹ 樊鍾秀亦河南人，起於陝西，曾參加陝西靖國軍，歸吳佩孚後，被調往江西。一九二三年，投孫中山，明年復間道返豫。

進，主持人爲直隸省長王承斌等。黎以同一手段，借制憲名義，發給憲法出席費。津保派認爲黎意圖見好議員，延長自己任期，¹甚或欲繼續當選，決先倒張紹曾內閣，再逐黎元洪。六月六日，張紹曾以津保派議員百般爲難請辭，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借口內閣負責無人，向黎索餉，警察罷崗，撤去黎宅守衛，切斷電話、自來水。所謂「國民大會」、「市民請願團」鼓噪高呼「總統退位」。馮玉祥、王懷慶聲言辭職，盛傳兵變，曹錕、吳佩孚不聞不問。六月十三日，黎元洪離京，車抵天津，王承斌迫令向國會辭職。交出總統印璽，宣布由國務院攝政後，方允放行。計黎重任總統一年，所受凌辱十倍於徐世昌，軍閥的目無法紀，政客之寡廉鮮耻，爲前所未見。然尚不止此，津保派的閣員高凌霨對留京的議員，每人致送「端陽節敬」五百元，領取者四百餘人。全國輿論對這幕醜劇，痛心疾首，上海總商會不承認曹錕、高凌霨的對內對外行爲。反直系的實力派意見不一，未能有所行動。²十月五日，國會選舉曹錕爲總統，代價爲每票五千元至一萬元，包辦人爲衆議院議長吳景濂。³十月十日，曹錕就職，孫中山下令討伐，各地人民遊行反對。但是各國公使仍然晉見、祝賀，交換條件是曹錕接受他們對臨城案的要求。

曹錕在職一年，津保派與洛陽派爭奪國務總理不已，內閣四度易人，最後爲吳佩孚支持的顏惠慶。地盤爭奪亦烈，結果是直魯豫巡閱使歸吳佩孚，副使及直隸督理爲王承斌，兩湖巡閱使由湖北督軍蕭耀南兼任，江蘇督軍齊燮元兼蘇皖贛巡閱使。王承斌以未得直魯豫巡閱使，對吳更爲不滿。馮玉祥於直奉戰後，曾任河南督軍，不久即爲吳佩孚排去。對於驅逐黎元洪，馮極爲賣力，仍無所獲，怨望尤甚。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間，有與王承斌、齊燮元聯合制吳之說，直系軍閥內部的矛盾愈深。

¹ 津保派給議員夫馬費（炭敬）每人每月二百元，黎元洪給憲法會議出席費每日每次二十元。黎的任期應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屆滿。

² 浙江盧永祥贊成國會移地制憲，出京的議員二百餘人集於上海，黎元洪曾來商組政府，孫中山不理，盧永祥亦不支持。

³ 據云共用四百萬元，由直系督軍報効。

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

清季曾受西方啓導、嚮往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留學日本及國內學生實居中堅地位。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變革政治，首須變革社會，變革社會，首須變革人心。消極方面，必須滌蕩違背時代的、保守的舊觀念、舊信仰、舊人生觀，亦即舊文化。積極方面，必須建設適合時代的、進步的新觀念、新信仰、新人生觀，亦即新文化。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再革命運動於是開始。

一、思想解放

辛亥前，留日學生數目雖減，但素質漸為提高。同時留學歐、美的日增，除由教會派遣及自費前往者外，一九〇九年，單是由庚子賠款資助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四百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清末留學歐洲的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紀》週刊(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宣傳政治社會學說。民國初年，復有留法、留英儉學會的組織，一九一五年，改為「勤工儉學會」，¹再開辦「法

¹ 蔡元培，二十六歲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留學德國，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法國。吳敬恆即吳稚暉，二十七歲中舉，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留學日本，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一年居倫敦、巴黎，一九一三至一九

華教育會」、「華工學校」，希望將近代歐洲的科學真理及人道主義輸入中國，可見其傾慕西方文化之切，與見賢思齊之心之熾。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粗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羣起以應。

湘人章士釗曾留學日本、英國，宋教仁被刺時已知袁世凱行將帝制，繼之解散國會，修改約法，其事益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創刊《甲寅雜誌》，以闡揚民主憲政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認識。同年六月，留美學生發起「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以介紹科學技藝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學術的認識。¹這均是知識分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學術西化的最早活動。從思想上為掃除政治學術的障礙，奠立民主、科學的基礎而奮鬥的領導人物，應推陳獨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²陳為安徽懷寧（安慶）人，十八歲考取秀才，鄉試未中，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屬於維新派。戊戌變法後，傾向反滿，赴日本留學。一九〇二年，加入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變為革命黨。一九〇三年，因與鄒容等強剪湖北留學生監督的髮辮，被遣送回國，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出版《愛國新報》，與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愛國學社一氣。繼參加上海《國民日日報》，與蘇曼殊譯法人器俄

一六年再居歐洲。李煜瀛即李石曾，前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兩度留學法國。一九一二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開始出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派遣，以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盛，總數約二千人。一九一四年留美中國學生有「勤工學會」，一九一六年改名「中國學生工讀會」，影響不大。

¹ 《甲寅雜誌》的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劍農、高一涵、李大釗。一九一四年歲次甲寅，因以為名。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有任鴻楨、趙元任、胡明復、楊銓（杏佛）、秉志、鄒秉文、胡適等，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科學》雜誌。一九一八年，總社遷設南京。除胡適外，餘分習化學、物理、數學、工商、生物，大都為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

² 陳獨秀原名由己，字仲甫，獨秀是他的筆名。

(Victor Hugo)的《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約在一九〇四年，主編蕪湖《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他是會員之一。一九〇六年，執教蕪湖皖江中學，一九〇七年，任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長，及安徽師範學校校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編《甲寅雜誌》，列名歐事研究會。一九一五年，痛心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爲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凱積極進行帝制之時，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將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¹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甲寅雜誌》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青年雜誌》或《新青年》則爲主流或急先鋒。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爲陳獨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謂「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細胞之於人身，」須遵新陳代謝之道，否則社會必亡，人身必死。中國社會將亡，惟有青年自覺奮鬥，視腐朽者若仇敵，排而去之，發揮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的思想，方可適於競爭生存。他希望今後的青年，第一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切操行、權利、信仰，斷不盲從隸屬他人，必須人格自由。第二爲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進則退。「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族，方興未已，」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差遲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寧忍過去的國粹消亡，不忍現在、將來的民族歸於削滅。第三爲進取的而非退隱的，戰勝惡社會而不爲所征服，超出惡社會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橫厲無前爲上德，中國以閒逸恬淡爲美風，實爲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第四爲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國家存亡興廢半繫於內政，半受國外影響，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第五爲實制的而非虛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學技術，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途，中國崇尚虛文，尊儒重道，無不與現實生活背馳，皆狂人之事，

¹ 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陳獨秀始自日本回上海，參加討袁活動。

一文不值。第六爲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歐洲之優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權，一因尊重科學，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學法則定其得失從違。中國必須摒棄無常識的思想，無理由的信仰，以科學說明真理，求諸證實。「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學。

陳獨秀之所以歌頌西方文化，抨擊中國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勸勉青年爲此兩大目標奮鬥，趕上世界潮流。專制與迷信爲民主、科學之敵，必須首先排除。闢斥儒教是爲發展民主政治，闢斥鬼神是爲發展科學精神，而於前者尤不遺餘力。因爲專制思想已根深柢固，儒家學說爲其最大憑藉，所以反對孔子學說特別激烈。他說中國民族之任人魚肉，由於喪失了強梁敢進的精神與抵抗力，強梁精神與抵抗力的喪失，由於專制君主之流毒，由於孔子學說之爲害。自身幸福須以自力造成。國家爲人民公產，人民應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爲強有力者，「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憲政體的實現，全恃多數國民的自覺自動，不可寄望於他人的賜予。儒家所說的綱常名教，在維護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與以獨立、平等、自由爲原則的共和立憲政治，絕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既行共和立憲政治，而仍遵舊有的倫理，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的特權，則法律的平等，經濟的獨立，被毀無餘。中國的迫切需要爲尊重個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爲中心，各自奮鬥，脫離附屬的地位，從事國民運動，始能養成多數人的愛國心與積極的愛國行爲，實現唯民主義，國家方可得救。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爲請政府於憲法中定孔教爲國教。陳獨秀連加痛駁，謂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緣，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教爲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重視的爲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他的倫理學說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違，如倫理問題不解決，其他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變。孔子教忠、教孝、教從，均爲片面的義務，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設新國家、新社會，以求適今世生存，須先輸入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要鞏固共和，須先洗淨反對共和的舊思想。

獨尊孔子等於溷塞人智，違反信仰自由原則，將導致君主專制。民國祀孔，不啻專制國家之祀華盛頓、盧騷。支持陳獨秀最力的為李大釗、吳虞。¹李大釗鼓勵青年衝決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舊學說的囹圄，揚棄「白首中國」，特立獨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說「耶穌生而猶太滅，孔子生而中國亡。」吳虞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國即無新思想、新學術、新國民。」於是反孔教為前提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式揭幕。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學校長，認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不但要輸入歐洲文化，且必須於歐洲文化中為更進步的發明，不但要保存國粹，且必須以科學方法，揭示國粹的真相。對於各種學說，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收主義。無論任何學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一以學詣為主，講授以不背思想自由為界限。對於學生，破除其做官發財思想，及專己守殘陋風，擴大治學範圍，了解科學的重要，以祛偏狹之見。他對陳獨秀早表欽佩，近又讀過一年來的《新青年》，益覺陳的見解多和他相合，遂聘為文科學長，共商整頓大學辦法，羅致優良教師。一向以腐敗聞的北京大學，氣象大變，面目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二、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新式

¹ 李大釗（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直隸（河北）樂亭人，一九〇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一九一三年，得湯化龍、孫洪伊之助，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發起「神州學會」，反對日本侵畧，反對袁世凱帝制。一九一六年回國，任北京《晨鐘報》編輯，主持《民議雜誌》，與湯化龍意見不合，而與陳獨秀接近。吳虞（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一九〇六年遊日本，返蜀後常攻訐孔子，《甲寅雜誌》亦登載過他的文章。

學堂。一九一〇年，獲美國庚子賠款資助，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文學。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國文學之意，《新青年》發表過他和陳獨秀的通信及所譯小說。陳獨秀曾說，今後中國文學應趨向寫實主義。胡適加以發揮，撰成《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主張，以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謂不避俗字、俗語就是用白話，用現代人的話，使語言文字一致。十餘年前，陳獨秀已辦過俗話報，上海《警鐘日報》主張言文合一的社論，可能就是他的手筆，預言白話必將盛行。《青年雜誌》及《新青年》雖未用白話，已係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對於胡適的建議，他大體贊同，不過胡適所說的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胡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第二月，陳發表《文學革命論》，指出中國近年經過三次革命（辛亥革命與兩次討袁），均為單純的政治革命，未能滌淨舊污。「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以致社會不生變化，黑暗如故。必須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三大主義相號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當以宇宙、人生、社會為構想對象，「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胡贊成他的意見，惟仍主漸進，從容研究。陳謂白話為文學正宗，以國語為文，乃天經地義，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態度極為決絕。北京大學國文教授錢玄同（夏）、劉半農（復）是他們的擁護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使用標點符號。日後胡適說，他的歷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業，文學革命的急先鋒當推陳獨秀。又說陳有三大貢獻：一為使文體改良變為文學革命，高揭三大主義；二為將倫理、道德、政治革命與文學革命合為一大運動；三為由於他（陳）的一往直前的

精神，文學革命始有很大的收穫。一九二〇年，政府命將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逐步作廢，改用國語，接受了文學革命的形式，社會上則已將文學的內容一併接受。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適得陳獨秀的推介，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國語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過去中國的文學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用國語，做國語的文學。但他並不會說明活文學的內容。《新青年》登載的白話文學，以周作人翻譯的歐洲小說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魯迅¹（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記》，亦為他的第一篇創作成功的白話小說。這篇小說中說，中國歷史上每頁都寫着仁義、道德，仔細從字縫裏看，滿本還寫着「吃人」二字。此後他的小說或雜文，無一不是以深刻的觀察，勁利的文筆，譴責中國人的劣根性、惡習俗、舊傳統。吳虞的「吃人與禮教」，即由此引出。魯迅的作品自然是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場，同年出版的《易卜生專號》，則是配合它的尊重個人人格和寫實文學的主張。除了介紹易卜生的戲劇外，胡適寫了一篇《易卜生主義》，說是易卜生能將社會的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生活寫出來，他的人生觀是個人應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社會最大的罪惡是摧殘個人的個性，遂致社會沒有生氣，不能進步。人生的病根在於不去看世界的真實現象。周作人復撰《人的文學》，凡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是人的文學。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以為可以轟動一時，但是第一年，並不如所想像，銷行無多，每期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為數漸增，日後達一萬五六千份，大專學校及中學學生爭先購閱，才算真正轟動一時，此與其反孔教言論固然有關，文學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鮮的趣

¹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與周作人為兄弟，均留學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學，魯迅任職教育部，並在北京大學兼課。

味。過去的《新青年》，無異陳獨秀個人的雜誌，現在有如北京大學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傳外，錢玄同又虛構一「王敬軒」其人，詆譏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加以反駁，青年讀者大為快意。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的極盛時代，亦為知識青年最激動時期。

《新青年》出版伊始，聲言批評時政不是它的宗旨。陳獨秀所觸及的問題，雖幾乎處處牽涉到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問題，不過他所談的是政治理論，非實際政治。但是二者極難嚴格劃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陳獨秀不得不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認政治問題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須理會。如要中國政象清寧，一當排斥武力政治，反對軍閥；二當拋棄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由各黨平分政權，有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兩者斷不能併行。他當然主張革新，一切「採用西洋的新法子，」尊重民權、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戰終了，他以為中國的新機運將至，更須督責中國當局與人民及時自奮。一向對政治有興趣的李大釗，對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國十月革命已經一年，他的認識漸深，看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中與蔡元培分以「庶民的勝利」、「勞工神聖」為題，發表演說。他強調這次戰勝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陳、李共同創辦一個小型週刊，名為《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以短小精悍鋒利之筆，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的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斥上海南北和議是為分贓，不能代表人民，所有決議，須經國民大會通過，詆段祺瑞與日本結托，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要除三害，國民須有參與政權的覺悟，對軍閥、官僚、政客舉行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須挺身而出，組織以國民為後援的政黨，掃蕩依賴特殊勢力（日本）為後援的「狗黨」。一時影響力量之大，凌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五四」學生示威的先聲。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警察

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響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¹不久北京大學學生亦籌組「新潮社」、「國民雜誌社」。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指導贊助，分別出版《新潮》、《國民》月刊。《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旗鼓互應，強調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必須知道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想遼濶之度若何，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國民》的主幹。²前此的新文化運動是《新青年》孤軍奮鬥，現在有了友軍助戰。

三、經濟社會變化與商民工人婦女的覺醒

辛亥革命前數年，朝野為發展經濟所作的努力，雖遭遇到內外各種阻力與困擾，成效遠不及預期，而方針大致無可非議。民國初年，大家重視的問題，一為改進政治，一為富裕經濟。孫中山倡導建設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認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運會已至，力勸袁世凱振興實業。各方要求興辦實業的團體紛起，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經濟協會」、「實業協會」、「民生團」、「國貨維持會」。一九一

¹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有自日本歸來的曾琦與在北京的王光祈、李大釗等，陸續加入的有李璜、毛澤東、恽代英、鄧中夏、左舜生等，約八十餘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專學校學生為多。日後有的信仰國家主義，有的信仰共產主義。

² 新潮社社員，初為二十五人，幾全為北京大學學生，以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為知名，日後多成為史學家。國民雜誌社社員一百八十餘人，以北京大學學生段錫朋、周炳琳、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為知名，日後分別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

二年九月，孫、袁協議的大致政綱，列出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與資助國民實業。十二月，工商部頒布「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凡發明或改良的製造品，經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專賣權利或給予名譽獎。一九一三年，工商部、農林部併為農商部，由從事實業多年而有成績的張謇任總長，在職三年餘。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政府提倡保護，獎勵輔助，特別是對於棉業鐵業，曾制訂了各種法令。

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則為國際情勢的劇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國家英、法、德、俄一一捲入，忙於生死存亡之爭，無力外顧，一向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畧為之鬆弛，中國所受的壓力為之減輕，市場的空隙為之一廣，中國的工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機會。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輸入中國的外國商品各約五萬七千萬兩，入超額各約一萬六千六百餘萬及二萬一千二百餘萬兩。是後逐年減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驟然降到三千四百餘萬兩。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約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餘萬兩，一九一九年為一千六百餘萬兩，僅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國工商業大為活躍。其次，日本的加緊侵畧，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國的愛國潮，一致抵制日貨，高唱實業救國。在工商業的發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對於輕工業為最，紡織業與麵粉業居於首位。

辛亥前全國華商紗廠僅二十家，紗錠約五十萬枚，資金一千七百萬兩。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開始，但中國市場仍有大量進口洋紗存貨，尚無短少現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應求，紗價猛漲，有利可圖。是年至一九二二年，舊有的華商紗廠分別恢復或擴大，新設立的風起雲湧，為數約六十餘家，紗錠達一百五十餘萬枚，資金六千餘萬元，利潤極厚，¹投資者多為商人，大都與洋布業有關。這些紗廠

¹ 一九一六年，每包紗獲利七元餘，一九一七年，近三十七元，一九二〇年，高至七十元。

分布於江蘇、直隸、山東、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紗廠（上海）、¹裕元紡織公司（天津）、魯豐公司（濟南）、豫豐公司（鄭州）、漢口紗廠爲著。紗廠兼營織布業，大戰前全國織機約爲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餘台。同時縲絲、絲織、毛織、針織、染織各業皆有相當的發展。

辛亥前全國麵粉廠約四十家，每日夜產麵粉四萬餘袋，資本約爲六百萬元。一九一四年起，日有增加，首爲東三省、江蘇，次爲直隸、湖北、山東。一九二二年，華商開設的廠約爲一百二十家，每日夜產麵粉約爲十九萬袋，資本約爲四千五百萬元。規模最大的爲茂新及福新麵粉公司，²次爲阜豐麵粉公司、祥新麵粉公司、興華麵粉有限公司（均在上海）、大豐麵粉公司、民豐麵粉公司（均在天津）、豐年麵粉公司、民安麵粉公司（均在濟南）。一九一四年麵粉入超約爲七百四十萬兩，次年起，轉爲出超，直到一九二一年，以一九二二年爲高峯，達一千七百餘萬兩，英、法、俄、日及南洋均爲中國麵粉分銷地。

紡織業、麵粉業外，此一時期的水泥業仍以天津的啓新洋灰公司爲巨擘，資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千萬元。新設的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國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煙草業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獲利爲豐，資產由一百萬元增至一千五百萬元。不過終抵不了英美煙草公司（一九〇二年成立）的競爭。火柴業自三十廠增至九十廠上下，資本自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七百餘萬元。他如化學、造紙、印刷、玻璃、罐頭食品、榨油、搪瓷等工業均各有進展。

重工業的發展雖遠不及輕工業，然亦有若干進步。原有的華商煤礦，力事擴充，如山東的中興煤礦；外人經營的酌予收回，如河南的六河溝煤礦、直隸的井陘煤礦；新成立的煤礦公司約十餘家，除河南

¹ 申新紡織廠爲經營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創辦，共有六廠，四在上海，一在無錫，一在漢口。

² 茂新、福新均屬於榮宗敬、榮德生，共有十二廠，另有兩廠出租，分設於上海、無錫、漢口、濟南。一九一九年，合申新紡織廠的資產，共約一千二百萬元。

的中原公司外，多為小型。全國華資煤礦每年的產量約三百餘萬噸。鋼鐵業方面，一九一四年起，漢冶萍公司先後興辦了六個鐵廠，龍關（龍煙）鐵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北京），和興鋼公司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上海），揚子機械公司於一九一九年開始煉鐵（漢口），合計每年產鐵七十萬噸，鋼十一萬噸，鎢、錫等的開採亦有增加。

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以輪船航運為主。一九一二年華商輪船約近一千隻，運輸能力八萬噸。至一九二〇年，近一千六百隻，運輸能力約十八萬噸。新成立的較大輪船公司，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的中國郵船公司，一九一九年的中華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後二者為華僑投資，從事遠洋航行。一九一八年的戊通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專從事吉林、黑龍江的航運。

一九一一年，華資銀行約十五家，大戰期間，迅速增加，一九一九年，達六十餘家，一九一一年一年內設立的有二十三家。實力最厚的有一九一五年的鹽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一九一六年的中孚銀行，一九一七年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實業銀行，大致以上海、天津為中心，就中上海商業儲蓄、浙江地方實業、鹽業、金城、中國實業及舊有的中國、交通、浙江興業等銀行，各擁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的資金，及數千萬元以上的資產，漸取代了錢莊的地位。

世界大戰使中國工商業獲得向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同時日本在華企業亦獲得同樣侵畧機會，中國的民族經濟仍不易與之抗衡，以致歸於失敗。大戰以前，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以英國為第一，幾乎壟斷了一切。大戰開始之後，日本的勢力突飛猛進，幾年之間，對華輸入額的比率約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商行的數目增加五倍。復透過西原借款，攫得開採礦產、建築鐵路、合辦企業等權利。直接投資的各種工廠，分布於東北、山東、天津、漢口、上海，東北一處即近三萬萬七千萬元。紡織業以設在青島、上海的內外棉株式會社、上海紡紗公司、日華紡織會社為大，各擁數家至十餘家紗廠。一九一三年紗錠為十一萬枚，一九二二年達六十二萬枚，約增加五倍。布機有

八百餘台，約增加四倍半。日商麵粉廠分設於濟南、青島、漢口、上海，滿洲製粉廠獨佔了東北的麵粉業。凡此均為對於新興的中國紡織、麵粉兩種輕工業的嚴重威脅。至於微弱的中國重工業，更無從與之相競。日本投資的鋼鐵生產量，佔有中國全國的百分之九十四，煤炭生產量，日本和英國合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大戰告終，西方國家的經濟壓力，捲土重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復趨上增，甚而以往數年出超的麵粉，至一九二二年後，再變為入超。英國的對華貿易額，與日本互為伯仲，其次為美國。

中國民族經濟之不能前進，以致漸趨衰退，不當盡歸咎於外來壓力。國內情況之日益惡化，亦為重大因素。政府之無扶植誠意，自然有關，戰亂不止，兵額激增，尤為致命打擊。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數得出的內戰，至少十次，¹兵額由五十萬人擴大到一百五十萬人。軍費來自稅捐，工商業首當其衝。平時貨物須納釐金、落地稅，以及各種所謂捐，合計達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運輸工具每為軍隊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礙成品的銷路，亦妨礙工業原料的供應。進口貨物及外人採購的物資，僅繳納定額關稅與子口稅，即可暢行無阻。地方軍閥復任意鑄造劣質硬幣（銅元），濫發不兌現的紙幣，使幣值為之下跌。通貨單位不能劃一，有銀元、有銀兩，銀元的成份不同，銀兩有海關兩、庫平兩、上海兩、天津兩之分，「出省一步，如履異邦，旅行不勝其難，營業更為棘手。」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量公債，工商界為攤派的主要對象。銀行於工商投資缺乏信心，為貪圖公債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時亦願承購。一旦公債慘跌，銀行常至倒閉。到了戰時，軍閥愈無法無天，逕自向銀行、商會強借、強派，扣車扣船，破壞橋樑路軌，視為當然。至於農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賦、鹽稅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價不斷上漲，再加上水火旱災、兵災、匪災，可謂走投無路，求死不得。

¹ 反帝制之戰，復辟之戰，川、滇之戰，南北之戰，直、皖之戰，兩次粵、桂之戰，湘鄂、川鄂之戰，直奉之戰。

工商界的利害既與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關心時事，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將起時，上海總商會會呼籲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一九一五年爲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要求停止內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個商業團體組成的商業公團，發表告友邦書，要求和平，否則將與支持軍閥的國家斷絕商業關係，不向政府繳納租稅，不運貨物。同年四月，上海總商會爲山東問題，向巴黎和會及威爾遜抗議。凡此均爲商人的愛國表示。

工人大都來自農村，雖知識不足，但亦有了覺悟。十九世紀末期以還，通商口岸工商業日益繁榮，各地鐵路、礦務漸興，而農村經濟適得其反。工商路礦需要人力，於是農民趨之若鶩，而以進入通商口岸傭工的爲衆。勞作時間每天多過十二小時，而所得菲薄，不足養家糊口，且遭凌虐。及聞見漸廣，不滿情緒遂生，以致罷工抗爭。一九一一年左右，全國工人約六十萬。一九一二年，開始團結，如津浦鐵路南段職工同志會，上海製造工人同盟會、縲絲女工同仁會，廣東機器總會，漢口車夫同益會。袁世凱公布的「民國新刑律」，有處罰同盟罷工規定，但一九一三年，漢陽兵工廠仍有罷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治安警察條例」，又有取締工人行動的條款，不久上海漆業工人即舉行罷工。商務印書館青年工人有勵志會的組織，香港海員有聯誼社的組織。一九一五年，廣州工團總會成立，漢口碼頭工人罷工，搗毀日本洋行。隨着工業發展，全國工人的數目增至二百萬人，工會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罷工事件驟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爲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爲三十次，大多是爲了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亦有幾次是爲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爲反對二十一條而抵制日貨，罷工遊行，日本工廠的華工踴躍參加救國儲金運動。一九一六年爲反對法國擴張天津租界，法租界的華工罷工，成立工團。一九一八年，廣州工人舉行「五一」勞動節紀念會，漢口工人組織反日會。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紗廠又四次罷工。

民國初年，除了女子師範學校外，各省各縣幾均設立女子中學、小學。一九一五年，全國女生約十八萬人。是年美國教會開辦金陵女

子大學，一九一七年，政府開辦北京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二年後，改爲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新青年》宣傳的對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陳獨秀勸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應各自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恢復自主的人格，特別指出「夫爲妻綱」之不當。他抨擊孔教的原因之一，即爲反對婦女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他主張婦女參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際自由、生活獨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闢女子專欄，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的文字，希望順應世界潮流。對於貞操問題，一九一八年再三討論，說是貞操不是道德，只是興趣，是一種信仰，一種潔癖。又編譯戲劇，指摘舊式家庭的罪惡，女子應有反抗的勇氣。胡適強調女子須有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發展自主的精神，作一個堂堂的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作的事業。

四、五四運動的擴大

世界大戰告終，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分子尤爲興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歛，重見青天，」拆除爲德國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爲「公理戰勝」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舉行演說會，臚舉慶祝的四大意義：一爲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爲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爲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爲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未及三月，巴黎的惡耗連續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爲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運動（見482頁）。在發表的宣言中，斥責把持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我如「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在散布的傳單中，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三週後示威領導人之一的羅家倫，稱這次事件爲「五四運動」，遂成爲通用名詞，

涵義則擴大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

事件發生的近因爲山東問題。既發之後，在未獲滿意解決之前，熱血沸騰的學生自不甘罷休，政府的高壓手段與頑固的態度，愈增加了他們的憤怒。五月五日，爲援救被捕學生，繼續要求懲辦賣國官員，拒絕巴黎和約，實行罷課。第二天，大學、專門、中等學校學生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女生同樣參加，這是第一個學生組織。上海、天津與留學日本的學生，以及南北名流、社會團體，一致支持。總統徐世昌爲所震懾，將被捕學生釋放，各校復課，學生得到初步的勝利。因段祺瑞派的挾制，徐世昌禁止學生再行糾衆擾亂秩序，將滋事學生送法庭辦理，慰留請求辭職的曹汝霖等。當權的親日派與厭惡新思想的保守派認爲此次事件實爲主張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所致成，蔡元培被迫辭職，教授學生請求挽留，爲內閣拒絕，北京各專門學校校長全體請辭。徐世昌續下不准學生干政集會令，罷免同情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五月十九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宣傳反日，抨擊政府。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詰問，要求禁止學生活動，日本軍艦集中天津、上海、南京、漢口，無異火上加油，包括北京、天津、濟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慶、開封、武昌、長沙在內的全國大小二百餘城的學生一致罷課，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同時成立，以爲後援。段祺瑞悍然不顧，仍主簽字和約。徐世昌再制止集衆遊行演講，取締學生組織，並爲曹汝霖等辯護。六月二日，北京二次逮捕學生，學生毫不畏懼，次日大隊出動，被捕者約四百人，北京大學成了臨時監獄。六月四日，宣傳講演的學生倍增，被捕七百餘人，有五千餘人自請入獄。一千餘女生向總統府抗議，教職員慰問在獄學生。政府始感高壓手段無效，撤退包圍北京大學軍警，徐世昌派人慰問學生，學生得了第二步勝利。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之時，曾籲請全國工商界一致奮起。兩天後，即得到北京商會、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江蘇省教育會的響應。上海國民大會不僅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及段祺瑞、徐樹錚；不僅要求收回青島，並要求廢除一切有損國權的條約。五月中

旬以後，北京、天津學生代表陸續到達上海，會同當地學生向商人勸說，作實際抗爭。及北京大捕學生，六月五日，上海實行罷市，聲稱此舉純係愛國熱誠，並非排外。繼之而起的有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揚州、蕪湖、安慶、九江、杭州、漢口、濟南、天津、開封各大城市。

工人方面，初有濟南、北京的集會，參加者以千萬計。上海罷市的同一天，大規模的罷工爆發，紡織、印刷、機器、煙草、郵政、電話、電車、輪船、碼頭、建築各業，一一捲入，總計約六、七萬人，交通癱瘓。京漢鐵路北段，京奉鐵路西段的部分工人，相繼參加。¹上海國民大會聲言推倒北京政府，趕走徐世昌、段祺瑞。在舉國洶洶之下，政府不得不於六月十日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甚至安福俱樂部亦通電反對巴黎和約，願順從民意，徐世昌向國會請辭，可說是學生第三步勝利，亦是民衆運動的勝利。

六月十二日，上海罷市終止，工人大都復工，惟仍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以不簽巴黎和約的要求尚未貫徹，不肯復課。六月十六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山東及各地人士廣續力爭，直至和約不簽字後，始於七月二十二日，由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停止罷課，學生獲得了最後勝利。²

五、新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爲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幾乎是傾全力於思想解放；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爲第二期，幾乎是傾全力於宣揚西方思想，凡是中國所無，前未之聞的學說主義，無不視爲救世良藥，儘量輸入，一律歡迎，尤喜愛新鮮而有刺激性的各種社會主義，近於一種宗教熱。新的出版物風起雲湧，可說是百家爭鳴，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瀾。

¹ 罷課、罷市、罷工，合稱「三罷」。

² 是年十一月，福州日人槍傷檢查日貨學生，北京、天津、濟南等地學生及各省代表向政府請願抗爭，遭軍警毆打，至一九二〇年二月，方告平息。

「五四」示威事件之前，鼓吹新文化的報刊僅有《新青年》及發行甫數月的《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五四」示威事件之後，自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年餘之間，新出的週刊、旬刊、半月刊、季刊，多達四百種左右，大都為大學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學生所創辦。他們的學養有限，而熱情勇氣信心至強，白話文已經流行，又給以寫作的便利。一向領導革新運動的孫中山、梁啟超兩派，亦積極參加。一九一八年，孫中山自粵到滬後，致力革心工作，專意著述。在「五四」事件的同月，所著《孫文學說》，一名《心理建設》出版。上海罷工、罷市後三天（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他指導下的《星期評論》及《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出版。又月餘，《建設》雜誌（月刊）出版。¹十二月，陳炯明在福建漳州發刊《閩星》（半月刊）。梁啟超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自上海赴歐洲，行前深悔過去之不當從事政治，今後決為思想界盡力。「五四」事件後四月，他所發起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上海《時事新報》為梁派的機關報，發刊《學燈》副刊，和梁派有關係的北京《晨報》特闢《晨報副鐫》。²成立一年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政治性兼學術性的團體，會員的知識水準高過一般青年學生，至是積極展開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及次年一月，分別在北京、南京出版《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均月刊）；³成都分會有《星期日》（週刊）。湖南長沙的新報刊獨多，不到半年，單是週刊就有十種以上。此外重要的刊物，在北京有《新生活》、《新社會》（均週刊）、《曙光》（月刊），在南京

¹《星期評論》的性質與《每週評論》畧同，主持人為戴季陶（傳賢）、沈玄慮（定一），《建設》雜誌編者為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兆銘）、戴季陶，《覺悟》的主編為邵力子。

²《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為張東蓀、張君勱（嘉森），一九二〇年九月，改名《改造》。《學燈》初為週刊，一九一九年一月，改為日刊，亦歸張東蓀主持。《晨報副鐫》，始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釗曾參與其事，後《學燈》為急進。

³《少年中國》的文章以關於哲學的理論者為多。《少年世界》專載實際調查及應用科學的文章。

有《少年社會》¹（週刊），在上海有《太平洋》、《新教育》（均月刊）。²商務印書館以往出版的各種刊物，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素來保守，現在一一更新。《小說月報》改變更大，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文學家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編輯。同年夏天，另一文學團體創造社成立，次年五月，出版《創造季刊》。³

新的專門著作，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為早，一九一八年出版，用新方法、新觀點，整理中國學術，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繼之有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時代叢書、尚志學會叢書。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新書多於上年的一倍多。尚志學會與梁啟超有關，一九二〇年梁又成立「共學社」與「講學社」，共學社致力編譯，講學社延聘西方學者講演。「五四」前三天，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等教育改進社等團體之邀抵上海，在中國停留二年（第二年由講學社續聘）。講學社請來的第一位學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〇年十月到華，停留一年。第二位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前來的德國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停留數月。第三位為印度文學家泰戈爾（R. Tagore），時在一九二四年，約留兩月餘。對於法國哲學家

¹《新生活》為一通俗週刊，一九一九年八月創刊，為北京大學教授職員所辦。《新社會》、《曙光》均創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撰稿人多為匯文（燕京）大學、俄文專門學校、中國大學學生，如瞿秋白、鄭振鐸、耿匡、許地山、王統照、瞿世英等。《少年社會》創刊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稿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生。

²《太平洋》創刊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主編人為李劍農，撰稿者多為歐洲、日本留學生。「五四」後轉趨積極，偏重政治學理，議論較為持重。《新教育》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團體合組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初名新教育共進社）的刊物，留學美國的蔣夢麟、陶知行（行知）先後任主編，倡自動主義、民主主義教育。

³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小說月報》外尚有《文學旬刊》。創造社為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所組成，《創造季刊》外，續出《創造週報》。文學研究會倡寫實主義的人生文學，創造社倡浪漫寫實主義的個性文學。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亦有意邀請，未成事實，但他的著作已有翻譯。杜威、羅素到過的地方較多，以在北京為久，對於新文化運動極為注意，並有建議。他們的講演記錄由報刊登載，有的印為專書，他們的學說有專文介紹，他們的重要著作亦有翻譯。胡適和南京的幾位教授為杜威的學生，宣傳他的實驗主義。羅素在某一方面的影響似大於杜威，這非由於他的數理哲學，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到自由之路》書中，曾說馬克思主義可望造成一個比較完善的世界。他來中國之前，訪問過蘇俄，見過列寧、托洛茨基。《解放與改造》雜誌倡言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已經茁壯起來。羅素初抵上海，曾說一國的政治，應由下而上，教育應注重社會，不應專重個人，鼓勵創造，減少佔有。約在十天後，在長沙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謂十月革命對於人類的新生存上，很有些意味，對於將來一定很有影響。布爾什維克行，人人工作，不致再有勞逸不均的事，人的生活不致相差太遠。他雖不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尚專制，但行動有效力，忠於國家。改革中國政治，最好是採用蘇俄方法，不宜用西洋民主政治。對於正在籌組的中國共產黨，不啻給以精神上的鼓舞。

陳獨秀與胡適為第一期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但是態度有急緩之別，陳主革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政治社會，胡主改良，一切逐步變革，他們頗似辛亥前孫中山與梁啟超。與陳為近而急進過之的為李大釗，對於俄國十月革命，萬分興奮。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已發起社會主義研究會，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革命主義，代表愛人的精神，顯示和平的曙光，將來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以後，宣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愈多愈力。《每週評論》謂十月革命為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有如洪水，將洗出一個新紀元，全世界的勞工階級聯合，將打倒資本階級。《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晨報》、《民國日報》和它們的副刊，不斷刊載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的報導和論文。胡適是懷疑主義、實驗主義、進化論的信奉者，勸大家不可將主義視為信條

或宗教，要研究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少談抽象的籠統主義，改造須一點一滴的去作，並無根本解決的說法。李大釗加以反駁，說是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的，須先有理想的主義，方能將一切問題根本解決，俄國革命就是證明。和孫中山、梁啟超有關的報刊亦時時介紹到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九一九年六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八月，《每週評論》被封，陳被監禁八十餘日，獲釋後前去上海。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發生於陳在獄時。十二月，《新青年宣言》與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同時由《新青年》刊出。胡謂新思潮是一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實際的表現，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內涵，對政治為拋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環境。新社會是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社會改造須由民衆運動。政治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權屬於人民全體，不論有無財產。對學術思想，要創造生活所需的文學道德，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不取虛無的、不着邊際的、沒有信仰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這篇宣言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是胡適、李大釗主張的折衷。一九二〇年一月，李又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陳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和他之被捕及《每週評論》被禁或「無關係。到上海後他常與喜談馬克思學說及社會主義的戴傳賢、張東蓀過往，不久即與共產國際接觸，遂決定了他的態度。七月《新青年》再發宣言，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承認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梁啟超、張東蓀等贊成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提出中國應發展實業，增進財富，調協勞資的主張。《新青年》加以駁斥，堅主走俄國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亦因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捲入論戰。原為愛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此時起了分化，國家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勢不兩立。胡適與陳獨秀之實行分手，亦

在一九二〇年之末。此後胡對於整理國故雖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學，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啓超的意見頗有與胡適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梁啓超之整理國故在發揚中國遺產，胡適是用近代科學方法，懷疑評判的態度，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別樹一幟的爲梁激溟，他與梁啓超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文化。不過梁啓超之擁護中國文化是有條件的，梁激溟是無保留的。對於東西文化，梁激溟與胡適更是背道而馳，胡適主張西化，梁激溟認爲西化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自「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爲了反軍閥、反侵略，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潮、學說與主義，毫不選擇的向國內輸入，逐漸分爲兩個壁壘。一個認爲應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學之路，循序而進；一個認爲應取法蘇俄，採行共產黨的有效辦法、遠大理想，作根本解決。前者聲勢雖盛，而議論紛紛，始終不會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後者堅定勇猛，步驟齊一，已有共同組織。不過一般社會人士，傾向自由、民主、科學的仍居絕大多數。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準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爲二：一爲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爲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羣衆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準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 V. Chicherin），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顛預，而是怕

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傳過激主義。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頌揚俄國革命。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¹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此文書遲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始遞至北京，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認為是國際間亙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教育聯合會覆稱，願依所說的條件，恢復邦交，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義人道前驅。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感謝，亦主張恢復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共同戮力於芟除國際的、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工人團體尤盼蘇俄給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導。報刊言論盛稱蘇俄公正、和平，所廢除的條約、拋棄的利權，皆為中國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時機切不可放過。北京政府則謂宣言果否可憑，尚屬疑問，斥主張承受者為謬妄。這種顧慮，不能說全無是處，蘇俄所放棄的是它無法享有的帝俄在華特權，以此為餌，再出以仗義執言的姿態，誘致中國建交，以便在華活動，打擊帝國主義國家。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樹錚正在進行收復外蒙，西伯利亞的白黨則謀製造外蒙獨立。加拉罕發布宣言的第二個月(八月)，北京軍事代表張斯譽抵達白黨軍政中心鄂穆斯克，當與外蒙問題有關。²不久，鄂穆斯克為紅軍佔領，第二年(一九二〇)，設立遠東共和國，蘇俄

¹ 加拉罕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〇五年曾來哈爾濱，一九一〇年被捕，釋放後去海參崴，又二年返聖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參加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員。

² 張斯譽曾在日本學習陸軍，供職督辦邊防處，屬於段祺瑞派。

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增強。六月，遠東共和國的代表優林 (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邊境，要求來北京談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張斯馨及總統府外籍顧問辛博森 (Lenox Simpson)、福開森 (John C. Ferguson) 前往遠東共和國，並於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賠款，皆為對蘇俄的友好表示。遠東共和國對於張斯馨等之來，極表歡迎，謂願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過去的條約。八月，優林抵北京時，段祺瑞業已失勢。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約 (見 480 頁)，不再承認帝俄公使，均為優林的收穫。優林進而要求發展兩國商務，建立邦交，但拒絕中國所提的通商先決條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復乘白黨佔領庫倫，益多要挾。北京雖反對其出兵外蒙古，外交總長顏惠慶已正式予以接待，此為他的又一收穫。七月，紅軍進入庫倫，優林意氣愈盛。北京堅持撤退紅軍，爭執不下。復以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遠東情勢將有變化，北京持觀望態度，優林的建交企圖，一時難成，於十月返國，下一幕由蘇俄接演。

吳佩孚推倒段祺瑞後，成為中外注目的人物。蘇俄對他尤感興趣，以為和中國建立新關係有望，吳不惟反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一九二〇年八月，俄共駐海參崴的情報員維蘭斯基 (Vladimir D. Vilensky) 謂吳的勝利為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即將開始。九月，張斯馨到莫斯科深受重視，被看作吳的青年部屬，以為吳有意與蘇俄聯好，其實張和吳無關。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拋棄帝俄在華的全部掠奪物，更非慷慨的交還中東鐵路。十月，莫斯科《消息報》再刊出維蘭斯基稱頌吳佩孚的文章，蘇俄予張以自由通行及領事權。去年九月，張曾將第一次宣言報告北京，至是更為興奮，認為蘇俄基礎日固，海陸軍甚為整備，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復力反秘密與利用政策，完全以誠相待，事事公開。十年後勞農主義將風行世界，他願將蘇俄的真像介紹給中國。翟趣林在歡宴張斯馨席上致詞，盼中俄携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寧親自接見，謂中俄將團結一致，促使帝國主義敗亡。

十一月底，張斯馨携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見對於政府

當局應有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機與蘇俄代表商談。十二月，蘇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 K. Paikes）到京，聲稱一俟中俄維持外蒙秩序的協定成立，紅軍即可撤退，並準備承認中國在中東鐵路地區的主權，蘇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經濟出口，中東鐵路可歸中國管理。中國急於解決的為外蒙問題，蘇俄所望的為中國對蘇聯的承認，而以外蒙問題相要挾。在爭辯最烈之時，「俄蒙友好條約」（見 479 頁）的真相外洩，中國責蘇俄食言，行為與帝俄並無二致，巴伊克至為尷尬。中東鐵路問題，因張作霖宣布東北自主，亦無從作深入談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改派的幹練而有經驗的外交家越飛（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對手為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仍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紅軍。越飛責中國縱容白俄，不允單談外蒙問題。顧稱中國對赤、白兩黨無所偏袒。越飛謂中國不應以均等手段對待，如不與蘇俄密切聯合，即不歸還外蒙。又說中東鐵路為俄人產業，須訂定經營辦法，加拉罕宣言並不影響蘇俄對該路的權益，亦非無償的歸還。中國不要以為宣言永久有效，除非中國不再漠視蘇俄的利益，蘇俄無履行宣言的義務。談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無眉目。越飛譏誦中國對赤、白兩黨的中立態度，應擇一為友。數日後前赴上海晤孫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飛的外交雖無所成，社交則頗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聞界展開宣傳，斥詆西方國家，¹倡導中俄合作。此後的談話、演說，無一不是擁護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稱道中國民族的自覺。教育界開會歡迎，學術團體設宴招待，他亦邀宴國會議員、各界領袖，蔡元培致詞答謝。到上海後，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公告，旋去東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開。蘇俄要求改在莫斯科舉行，北京不允。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國際共管中國聲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蘇俄代表加拉罕到來，宣傳伎倆不弱於越飛，他的名字又

¹ 越飛未提日本，因為他正準備赴長春與日本會議。

具有魔力，聲言仍遵守兩次對華宣言列舉的原則，盼中國日趨富強，能自衛利益、主權，各黨派應一致抵抗各國對臨城事件的無理要求。對於北京大專學校教授，他贊成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充作學校經費；對於廣州，他派有代表，但對於北京政府，則是另一態度。

負責和加拉罕談判的為中國全權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認蘇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張先解決兩國懸案，然後建交。北京大學教授全體支持加拉罕，王復恐加拉罕赴粵，答應了他的條件，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將中俄協定大綱議就草簽。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為不妥，¹加拉罕嚴拒修改，限期正式簽字。內閣命顧接辦，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訂明恢復邦交，兩國懸案另行會議解決，廢除帝俄所訂各約，帝俄與他國所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條約，概行無效，嗣後兩國均不得訂立有損對方主權利益條約，蘇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關於撤退外蒙紅軍問題及贖回中東鐵路條件，將來商定；蘇俄放棄在華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兩國互相保證在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的機關團體的存在與行動，並互相承諾不作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的宣傳。

協定成立後，北京各團體連日慶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亦均支持。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復與「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關於中東鐵路的瀋陽協定（一稱奉俄協定），等於承認張作霖的政權。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與日本簽訂建交協定，承認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和約，仍然有效。對於為解決外蒙、中東鐵路問題召開的中俄會議，原定一個月內舉行，六個月內完成，拖至一九二五年八月方勉強開幕，第二天，加拉罕離開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開，終於一事無成。

¹ 巴黎和會時，王正廷與顧維鈞已有意見。

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摧毀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以蘇俄為中心的共產世界，為列寧的終極目的。歐洲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巨擘，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階段，必須一面號召它們國內的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鬥爭，一面號召國外的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鬥爭，裏外交擊，方易收效。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曾說，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就無最終勝利的希望。史達林復高呼鼓起東方工人農民的革命精神，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分鐘也不可忘記東方。尤重視土廣民衆的中國。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雖非全為中國而設，策動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為其使命之一。與中國建交的任務，由蘇俄政府負責，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由共產國際主持。誠如毛澤東所說，經過俄國人的介紹，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共產國際成立前兩個月，莫斯科的「僑俄華工會」已派共產黨人回中國宣傳。¹ 一九二〇年三月，即中國收到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前後，曾在西伯利亞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現任職於共產國際東方局的吳廷康（G. N. Voitinsky）奉命來至北京，尋覓民族民主資本階級革命同盟。他首先會見李大釗及幾位社會主義者。四月，由李介紹，前去上海晤陳獨秀及戴傳賢、張東蓀等。他的主要說詞是中國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過於龐雜混亂，缺少主流，復無組織與實際行動，決不能推動革命，必須成立一中國共產黨。擬以《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為基礎。陳獨秀、戴傳賢表示贊同，張東蓀不願參加。是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出版。五月，《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出版，馬克思研究會成立，中國共產黨有了雛型。不久戴傳賢退出。七月，李大釗派張國燾前來，吳廷康通知陳獨秀，共產國際決定支持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陳認為中國

¹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八日，僑俄華工會舉行第三次大會，翟趣林演說，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蘇維埃合作，同月二十三日，議決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似已設有機構，但均無下文。

工人無多，知識落後，階級覺悟不夠，一時無奪取政權可能，應先集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本共產黨立場，仍從事新文化、反軍閥、反日、愛國活動，入黨者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中共臨時中央於是成立，經費由共產國際供給。

中共臨時中央一經成立，即於杭州、南京、蕪湖、安徽、重慶、成都、天津、濟南、青島、太原展開活動，而以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為重心，分設中共臨時支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之外，並在上海發刊《勞動界》、《夥友》週刊、《共產黨》月刊，譯印《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機械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及工人補習學校，一一組成，設立外國語學校，招收學生學習俄文，準備送往莫斯科受訓。¹北京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出版《勞動音》週刊，設立長辛店京漢鐵路職工會、補習學校，任事者大都為北京大學學生，如張國燾、鄧中夏。廣州為中國革命策源地，尤受重視，共產國際先設通信社，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等出版《勞動聲》週刊。十二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特設宣講所。武漢負責人為曾留學日本的董必武(用威)。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成立，五月，上海、北京、廣州舉行勞動節紀念會。

新文化運動期間，湖南學生十分活躍，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蔡和森為領導者。毛為湘潭人，來自農家，辛亥革命時一度從軍。一九一三年入長沙師範學堂。因受陳獨秀的影響，²一九一七年，發起「新民學會」，又顯然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一九一八年九月，毛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因李大釗的啓導，對於馬克思學說有了興

¹一九二一年春，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等八人赴俄。與陳獨秀有私交的孫毓筠亦於此時資助數人前往。

²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曾刊載毛澤東的《體育研究》，署名「二十八畫生」。

趣。一九一九年三月，取道上海返湘。「五四」事件發生，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主編《湘江評論》週刊，鼓吹民衆大聯合，對抗官僚、軍閥、資本家。¹一九二〇年二月，再至北京，運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同時再讀有關俄國革命書刊。四月，復去上海，訪陳獨秀，大概是奉李大釗之命，或曾預聞籌組中國共產黨之事。七月，回長沙，擔任師範學堂附屬小學主事，先後創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支部。湖南無政府主義者有勞工會，毛亦發起各種工會，組織工團聯合會。羅素在長沙講演時（見521頁），他可能是聽衆之一。

共產國際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建立關係的同年，又與留法勤工儉學會接觸，其中有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曾留學日本的周恩來（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² 陳獨秀之子延年、喬年，來自湖南的蔡和森、蔡暢、李立三、李富春、李維漢，來自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來自貴州的王若飛。他們的組織，初爲中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再改爲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委員荷蘭人馬林（G. Maring 即 J.F.M. Sneevliet）、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Nikorsky）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商定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後，再赴上海。七月二十日，大會在法租界秘密舉行。時黨員僅五十餘人，出席代表十三人，陳獨秀、李大釗未到，張國燾任主席，馬林、李克諾斯基列席指導。³經過五晚會議，被法租界包探發覺，巡捕掩至。最後

¹ 《湘江評論》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行五期即被禁，毛改任《新湖南》月刊編輯。

² 周恩來原籍浙江紹興，長於江蘇淮安，一九一〇年去瀋陽，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赴日本京都，一九一九年回天津，參加五四運動，九月組織覺悟社，一九二〇年一月被捕，五月獲釋，十月赴法國。

³ 十三名代表爲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北京大學學生），廣東陳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漢俊、李達（二李曾留學日本），湖南毛澤東、何叔衡（秀才，小學教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北師範教員），山東王盡美、鄧恩銘（均中學生），

一次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船上舉行，通過黨綱，選舉陳獨秀爲中央局書記，即黨魁，張國燾、李達分任組織、宣傳部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出席的十三位代表，幾均爲學識有限、經驗欠缺的書生，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共產黨的策畧所知無多。陳獨秀、李大釗又不在場，一切取決於馬林。重要決議，爲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一切生產的資本歸社會共有。採不妥協政策，斷絕一切非共產主義者的關係。組織工會，灌輸階級鬥爭思想，成立研究勞工組織的學術團體，編印雜誌、報紙、專書、小冊、傳單。對於現有政黨取獨立、攻擊、排斥態度，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不與建立任何關係。中央組織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呈送報告，必要時得派代表向共產國際東方局報告。既對其他政黨取排斥態度，會議決禁止黨員參加政治，因馬林反對而取消。大會通過的宣言，將孫中山、徐世昌一併斥詆，引起爭論，改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公布與否，結果擱置未發，原因爲共產國際有意聯好孫中山。

今後十個月，中共的重要活動爲北京等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公開徵求黨員、舉行講演會、馬克思誕生紀念會、三八婦女節紀念會，召開非宗教同盟會議，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共旅歐總部，派人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大

日本周佛海。其後陳公博、李漢俊、李達、周佛海相繼開除黨籍或脫黨，陳獨秀、劉仁靜亦因與史達林意見不合，開除黨籍。馬林之外，另一共產國際代表，有謂係吳廷康。中共現以七月一日爲建黨日，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而於七月二十日爲可信。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所舉證據外（見陳公博著*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頁一五至二一），其他旁證，一爲六月始決定召開大會，須通知各地推派代表，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舉行。二爲在大會爲馬林任通譯的張太雷，六月二十二日尙在莫斯科，亦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趕返上海。

會，¹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加多，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亦頗引起社會注意。

中共對於工人運動特別重視，設置勞動組合書記部，推廣工人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不足，工人數目無多，成份複雜，缺少無產階級的鬥爭意識，能左右工人行動的，在上海為幫會，在廣東則以國民黨的影響力為大，中共尚不能領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上海罷工的次數較多，均歸失敗。香港海員六萬餘人罷工，因得廣州政府支援，為時約一月。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參加的百餘團體，以屬於國民黨的為多。大致而言，中共的成就應在宣傳，知識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漸漸增加，其他實際收穫甚少。

三、蘇俄、中共與孫中山、吳佩孚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俄國革命黨人曾有過接觸。辛亥革命時，列寧對於孫的思想亦頗稱許。十月革命後，孫去電祝賀，翟趣林覆電，盼中國人民與蘇俄共同反抗帝國主義，未能遞到。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向廣州軍政府提議合作，並無反應。五四事件發生不久，國民黨報刊開始介紹社會主義。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亦於是時發出。一九二〇年六月，僑俄華工會邀孫訪俄，當係共產國際授意。七月，電請孫與中國各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蘇俄。共產國際大會議決與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勢力聯合，使其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時吳廷康正在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曾與孫在上海相見。十月，孫準備回粵，重建政府，翟趣林來書，商談貿易。一九二一年八月，孫覆以地理隔阻，尚不能建立商務關係，惟盼有私人接觸。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表示，願以

¹ 出席共產國際的為張太雷，出席少年共產國際的為何夢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一稱遠東勞工大會，意在對抗華盛頓會議，中共代表為張國燾、蔡和森、鄧秋白（《北京晨報》記者），及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團體亦派人參加，共計三十餘人。

共產主義立場，贊助國民黨的革命，但不得與共產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馬林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首與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商議。十二月，經廣州至桂林訪孫中山，勸容納共產黨員，與共產國際聯盟，建立革命武力。孫對俄國革命雖表重視，不過列寧的主張不盡和他相同。此時他志在北伐，如果聯俄，英國必然不喜，勢將阻撓他進軍長江，但他對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則頗感興趣，因允予在道義上聯絡。

蘇俄以見擯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自行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孫中山亦以美國拒絕他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為明瞭蘇俄實況，在與馬林會晤之前，已派張秋白出席莫斯科的會議。共產國際書記齊諾維夫（Zinoviev）在大會報告，主張中共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聯合，對抗資本帝國主義者，警告國民黨對美國的妄想。列寧接見張秋白及中共代表張國燾，討論國民黨、中共合作的可能。二月，翟趣林致書孫中山，重申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友誼與願望。四月，少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 A. Dalin）到粵與孫續商，仍無結果，但孫對香港海員罷工的援助、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全國社會青年團代表大會之在廣州舉行，足證孫對中共態度的友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是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動運動等事，都是擁護民主政治的證明。中共的主張共有十項，其中之一即是與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社會主義各團體建立聯合陣線反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顯然是追隨共產國際的步調，放棄了對其他政黨的排斥態度，實為策畧上的大轉變。七月十六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時黨員一百二十二人，出席代表十二人，討論的中心，為與國民黨合作問題。決議是號召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參加民族革命，與國民黨暫時聯合，但並不放棄共產黨的組織，仍獨立的為無產階級奮鬥。宣言中明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高尙德為中央委員，陳續任總書記。不久馬林又自莫斯科來上海，在他的要求下，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員舉行會議。馬

林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作有組織的結合，不贊成聯合陣線。陳等一致反對，馬林謂此係共產國際所決定，必須尊重。陳等唯有服從，惟國民黨須依民主原則改組。

掌握國民黨兵權的陳炯明是屬於無政府派，據說一九二〇年四月，蘇俄代表前來漳州與晤，是否果有其事，雖不敢必，不過就日後陳獨秀之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看來，中共與陳炯明實有相當關係。一九二二年四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失和，決裂在即，陳獨秀於孫、陳之間，何去何從，猶疑不定。及陳炯明對孫實行叛變，中共始決定與陳炯明斷絕關係。請孫中山召開革命團體會議，原因是陳炯明的聲望無法與孫同日而語。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不成，在赴滬船中，考慮今後動向，認為必須改弦更張，爭取外援。聯德尙無眉目，惟有聯俄。八月中旬，孫到上海，陳獨秀、馬林及越飛的代表先後來見，所談當不外聯俄、容共，容共則為聯俄的第一步。五四以來，孫對於青年動態極為注意，他之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目的即在擴大基礎，現在愈感有此必要。八月下旬，首准陳獨秀、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九月，設置國民黨改進委員會，及改進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及到過蘇俄的張秋白均為委員。

蘇俄於聯好孫中山外，對於新近崛起的直系強人吳佩孚亦至為重視(見526頁)。李大釗及直系政客孫洪伊與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均有交誼，透過他們的運用，吳允由李推介得力之人，組織鐵路工人，排除交通系梁士詒的勢力，免為奉系所用。¹直奉戰爭時，中共領導下的京漢鐵路工人助吳運兵，頗稱得力。戰後有六名中共重要黨員，分任京漢、京奉、京綏、津浦、正大、隴海鐵路密查，吳復通令保護工人，更給中共以不少方便。中共稱道他是反日者，「倒張(作霖)，去徐(世昌)是差強人意的舉，」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並推動吳與孫中山的合作(見497頁)。一九二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已與吳

¹ 時交通總長為直系的張志潭。

會晤，此人或者就是吳廷康，介紹人爲李大釗。一九二二年八月，又有蘇俄記者到過洛陽，受到吳的歡迎，李本人亦數至洛陽。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率代表參加，會中曾討論聯吳、聯孫問題。共產國際要人拉狄克（K. Radek）的報告，提及中共對吳的支持，謂吳係中國聯合陣線必需的人物，似乎認爲他的重要性在孫之上。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與越飛代表的會談，有欠順利，使他感到「麻煩」。此後一面着手改進黨務，一面部署收復廣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說明今後政策，一爲本民族自決之義，對內增進全國文化，對外謀求世界民族平等，改正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二爲廢除以資產爲標準的選舉，確定人民自由權；三爲力謀社會經濟的均等發展，限定私人土地所有權，制定工人保護法，徐謀勞資的地位平等，改良農村組織，徐謀地主佃戶間的平等。雖與共產黨的主張仍有距離，然已具有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意義。是後各級黨部工作均有中共黨員參加。¹

國民黨作風丕變，同時滇、桂軍在孫中山策動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自廣西長驅東下，國民黨的聲勢重振。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軍佔領廣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謂國民黨爲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應與實行合作。同月，越飛至上海面晤孫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孫、越發出如下公報：共認蘇維埃制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越飛重認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對華宣言原則，蘇俄準備拋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中東鐵路管理辦法由中、俄協商；蘇俄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爲防制白俄，俄軍不必立時撤退。

共同公報發表後，越飛赴日本，孫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時聯俄容共尚未收實效，軍事財政紊亂不堪，粵人痛恨滇、桂客軍，怨毒轉

¹ 如中央黨部總務部林祖涵，北京支部總幹事李大釗，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籌備主任夏曦、劉少奇。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八十餘人亦均成了國民黨員，周恩來任國民黨駐歐支部總務主任，李富春任宣傳科主任，聶榮臻任巴黎通訊處長。

集國民黨。但中共在各地的活動則大有開展。宣傳刊物上海有《嚮導》、《前鋒》、《中國青年》，廣州有《新青年》、《新學生》，北京有《政治生活》，長沙有《新時代》，上海大學無異其訓練機關。¹羣衆運動多由中共領導，如民國裁兵運動大同盟，女權運動大同盟，收回旅順大連、取消二十一條示威，反對北京教育總長請願，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漸成青年的口號，工人罷工風潮亦日益增加。

孫中山越飛的公報爲國民黨公開聯俄的表示，六日後發生的京漢鐵路工潮爲吳佩孚實行與中共分手的表示。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吳轄區內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及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北京、唐山學潮洶洶，吳認爲是中共和他爲難。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被吳武力解散，下令逮捕李大釗。京漢鐵路總工會移往漢口，二月四日，全路罷工，拒絕吳的復工命令。二月七日，漢口、長辛店工人三十餘名，被軍警殺害，中共稱之爲「二七」慘案，斥吳爲國民公敵，共產國際亦痛加詆責，蘇俄的聯吳努力失敗，中共與吳的關係破裂。是後蘇俄與吳雖偶有接觸，然合作已無可能。加拉罕與北京政府談判時，吳之贊成中俄復交，是爲了想取得俄國部分的庚子賠款，同時仍欲以蘇俄牽制張作霖。

四、國民黨與蘇俄、中共實行聯合

孫中山雖已決定聯俄容共，但他的政治運用，尙無顯著的變化。在與越飛發表公報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在統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諸省暫時劃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機關及債權人、農工商各團體代表監督，實行化兵爲工。裁兵首須得直系贊同，孫回粵後，命胡漢民、汪兆銘、孫洪伊爲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借款最好由英國承擔，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

¹上海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名爲國民黨創設，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長，教授多爲中共黨員，如瞿秋白、蔡和森、鄧中夏、沈雁冰（茅盾）。一九二五年六月，被租界工部局封閉。

應香港總督之宴，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廣州英國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築路，並發表演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孫的秘書陳友仁宣布孫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給以財政援助，用英、美專家致力建設，¹可見尚不欲專聯蘇俄。

蘇俄對於孫的以上舉動自感不安。五月一日來電，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兩週後馬林再至廣州，勸孫徹底改組國民黨。共產國際訓令中共，務使國民黨成爲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運動陣線的領導者，注意工農，阻止國民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妥協。其實直系和英國對孫中山的表示，不僅毫不爲動，且敵視愈甚，不惜以種種手段顛覆他的政權。蘇俄的援助則愈具體化，開始派遣軍事顧問前來，²並給以二百萬元的貸款。孫爲保持現有據點，以圖將來發展，不能不認真考慮容共問題。與越飛在日本相處的廖仲愷一力贊成，說是國民黨的歷次失敗，由於專恃軍隊，爲兵所制而不能制兵。制服軍隊須靠黨員，國民黨僅有少數幹部，黨員無多，急當改組以救其弊。何況國民黨在國際上缺少朋友，蘇俄既來聯絡，便不應拒絕它的黨徒中共。五月二十一日，孫請馬林協助計劃黨的改組。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由於馬林的堅持，通過今後活動集中於國民黨的發展，改組國民黨爲真正的政黨，加強其在工人農民中的影響力，使與蘇俄接近。大會宣言承認國民黨爲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處於領導地位，惟須拋棄依賴外力，專力軍事，及忽視對於民衆宣傳的觀念，所說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完全相符。³

¹ 時香港總督爲 Sir Edward R. Stubbs，廣州總領事爲傑彌孫（Sir J. J. Jamieson）。三月，梁士詒曾在香港代孫活動借款，建築鐵路。

² 蘇俄顧問於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北京，十月到廣州。

³ 共產國際訓令係五月二十四日發出，遲至七月十八日中共始收到。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六月十日開始，十九日終了。但共產國際的此項意旨，仍可先由馬林轉達。時中共黨員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會代表三十人，陳獨秀、瞿秋白主張服從共產國際決策，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反對。卒依馬林主張，通過中共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當選中央委員卽在此時。

馬林與孫中山商定派遣代表團赴俄，由孫的參謀長蔣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率領。十月六日，蘇俄駐北京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三）抵廣州，作為蘇俄駐廣州的代表，¹最大的任務為促使國民黨早日徹底改組。當他初見孫中山時，首先應允孫的軍事物資援助要求，強調中俄革命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蘇俄的成功，實得力於黨。國民黨的使命為完成中國統一與獨立，如假以半年時間，可使廣州成為國民黨的鞏固基地，一、二年內革命精神將普及全國，但必須注重宣傳，動員民衆，推行軍中政治工作。孫大為所動，十月十日，設置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由鮑羅廷擬定改組方案。鮑羅廷一面告訴中共領袖，謂穩定國民黨為穩定共產黨的基礎，一面公開談話，謂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獨立奮鬥的引導者，倘再濟以軍事精神及民衆組織，勢力將益增強，必能統一中國，使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的奴役。十月二十五日，孫派定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與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均在內，鮑羅廷為顧問，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十一月，陳炯明軍逼攻廣州，鮑羅廷勸孫採行新農工政策，動員農工，共同抵抗，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訓練義勇軍，成立農工及中產階級調查委員會與黨員訓練所，後者由鮑羅廷負責，使黨員學習蘇俄革命方法。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加拉罕來電祝賀，表示蘇俄對於中國人民自由獨立的敬愛和同情；中共發表宣言，號召人民集結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開會期間，列寧去世，大會去電弔唁，休會三日，各機關下半旗，全體代表向鮑羅廷鞠躬，以示哀忱。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國民黨，並擔任要職。²最足以表現此次大會意義的為所發布的宣言，這篇宣言

¹ 鮑羅廷即 Gruzenberg，為猶太人，幼年受教育於立陶宛，參加革命運動。一九〇六年在倫敦活動，一九〇七年來美國，居波斯頓、芝加哥。一九一八年返俄，受知於列寧。一九一九年派往西班牙、墨西哥、荷蘭。一九二一年赴土耳其，助凱木耳（Kemal）抗英。一九二二年被英國拘禁六個月。一九二三年七月來華，先至奉天晤張作霖，繼到北京見加拉罕。

² 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居四分之一，組織、工人、農民各部及上海、北京、漢口執行部的實權，均操於中共黨員之手。

是廖仲愷、胡漢民、汪兆銘及中共黨員瞿秋白與鮑羅廷起草，指出中國禍亂皆為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以致政治、經濟生命皆為所制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包括中國民族自救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惟有國民黨與多數民衆結合，反對帝國主義，中國民族方能獲得真正自由獨立。民權主義包括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與團體，均得享有。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黨正從事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民工人的特殊階級，為農民工人而奮鬥，亦即農民工人為自身而奮鬥。國民革命運動必待農民工人參加，然後方能決勝。新的政綱，對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要；對內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權，增進農民工人生活為要。以上措置和表示，與共產國際的主張大致吻合，亦即日後中共所指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而以反抗帝國主義為中心。根據這些原則，國民黨聲明維持中俄北京協定，發動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廢約同盟，舉行收回教育權運動，反文化侵畧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週。¹工人運動繼續推進，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在北京成立，廣州工會組織工團，勞動節開會慶祝，孫中山講演反抗外國經濟壓迫。農民運動更為積極，特設農民運動講習所，²孫中山講演農民大聯合，耕者有其田。各縣有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力圖擴張，國民黨的部分高級幹部深恐喧賓奪主，一再檢舉，指為志在借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中共黨員對國民黨亦暗事打擊，公開譏評。於是有政治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及聯合部（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設置，以便調處。政治會議有如共產黨的政治局，以鮑羅廷為高等顧問，聯絡部由政治會議、共產國際及中共三方代表組成。

這時廣東大半仍為陳炯明所有，不時蠢動。盤踞廣州的滇、桂軍驕

¹ 九月七日，為辛丑條約簽字之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號召民衆與國民黨合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

² 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先後由中共黨員彭湃、毛澤東擔任。學生三百餘人，為以後農民運動的幹部。

橫抗命，商團尤為心腹之患。商團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原為商民對抗滇、桂軍的武裝自衛組織，後以恐懼實行共產，轉而敵視國民黨，香港政府從而構煽，與陳炯明勾結。一九二四年八月，商團團長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蒙蔽手段，自海外購運槍械，被廣州政府扣留。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實行罷市，強求發還。廣州政府準備武力制止，英國代理總領事發出警告，聲言如攻擊廣州市區，英國海軍即實行干涉。孫中山急欲北伐，策應北方反直系戰爭，別尋出路，初時多方遷就，商團態度更為強硬。適蘇俄軍火到粵，孫中山決採斷然處置。十月十五日，商團一萬二千人全部為蔣中正指揮的粵軍、滇軍、各軍事學校學生、工團軍、農民自衛軍所擊潰，¹西關商業區被燬三分之一。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一、直系的崩潰

吳佩孚之能一躍而起，並非全憑他的武力，輿論的同情，實有至大的影響。從此以後，他自以為所向無敵，不惟兵戈不休，而且行事乖方，聲望日趨沒落。黎元洪被逐，曹錕竊位，直系愈為人所不齒，失敗已成必然。奉系、皖系與孫中山的反直系聯合陣線，直系軍人的携貳，更加速了直系的崩潰，導火線為江浙戰爭。

據有浙江的盧永祥，為碩果僅存的皖系軍閥，事事與直系作對，曹錕、吳佩孚視為眼中釘。在直系軍閥中地位僅次於吳佩孚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對於盧永祥之把持上海，有芒刺在背之痛，所爭的是上海兵工廠、稅捐與鴉片。一九二三年七月，盛傳直系將對浙、滬用兵，因江浙士紳奔走呼籲，英、美、法、日公使抗議警告，得以暫告無事。十一月，暗通直系的淞滬警察廳長被刺而死，齊燮元所派的繼任者不

¹ 粵軍、滇軍約一萬五千人，黃埔軍校學生八百人，滇軍講武堂學生五百人，湘軍講武堂學生二百人，工團軍、農民自衛軍三百餘人，另有鐵甲車隊、航空隊、兵工廠衛隊。

能到任，又成劍拔弩張之勢。福州督理孫傳芳不甚得志，謀向浙江發展，與齊相結。一九二四年初，有一支皖系軍隊爲孫所敗，北走浙江，爲盧永祥收編，吳佩孚要他解散被拒，命齊、孫進兵。盧處於直系包圍之中，自以實力足與齊、孫相抗，又與張作霖、孫中山同盟，不甘示弱。九月三日，齊、盧之戰爆發於上海、蘇州之間，兵力各約五、六萬人。孫中山立即宣布北伐，張作霖動員奉軍西進，段祺瑞通電討伐曹錕。齊雖有吳佩孚及安徽、江西之援，仍戰盧不下。孫傳芳得浙江地方軍內應，長驅而前，直指杭州，¹盧軍退集上海，浙江入於孫傳芳之手。十月十三日，盧永祥終不能抗拒齊、孫的夾擊，東走日本，齊盧戰爭結束，北方直奉的大戰則正在進行。

兩年以來，奉軍積極整頓，兵工廠大事擴充，並成立空軍，日本是最大的支持者。九月中旬，奉軍約十五萬人，分向山海關、熱河進攻。吳佩孚昧於大勢，初以爲張作霖不敢輕舉，至是自洛陽入京，調兵遣將，倉促應戰，仍然驕妄自大，氣焰灼天，目無餘子，以爲必勝。吳自當山海關，而以熱河一路付之馮玉祥、王懷慶，²合後續部隊，總計二十萬人，復有海軍助戰。但軍費不足，武器陳劣，士氣不揚，能戰者不足十萬人。吳曾與蘇俄大使加拉罕密談，希望蘇俄給奉軍以壓力。又商請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准其由南滿鐵路運兵，事實上皆不可能。英、美對吳同情，希望直軍獲勝。日本惟恐直軍之不敗，輿論爲奉軍聲援，內閣的決策是予張作霖以善意的支持，適當的指導，維護滿、蒙利益。必要時採機宜措施，並派松室孝良少佐³伺察吳的動靜。

馮玉祥與吳積不相能，對曹錕復懷怨望（見502頁），結合不滿曹、吳的直系將領胡景翼、孫岳，聯交國民黨與蘇俄，黃郛是運籌人

¹ 吳佩孚所派援軍約一萬餘，安徽、江西軍一萬餘，孫傳芳軍二萬餘。

² 王懷慶部並無作戰能力，馮玉祥軍約三萬餘人，素稱精練。

³ 松室後任馮玉祥顧問。

之一。¹直奉戰爭甫起時，據說日本住友會社諮議寺西秀武大佐即策動馮玉祥反吳，陸軍大臣宇垣一成、駐華公使及武官均預其謀，曾以一百萬日元，由三井銀行經天津日本駐軍司令交段祺瑞再轉付與馮。馮軍沿途逗留，十月十九日，乘山海關戰事方酣，自熱河還軍，二十三日，突入北京，迫曹錕下令停戰，所部改稱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及孫岳分任第二軍、第三軍軍長。吳佩孚聞警趕回天津，奉軍乘機猛攻，日軍不准直軍使用秦皇島(山海關西南的海口)，直軍大潰。吳浮海而南，擬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不成，北去河南，為陝軍師長憨玉琨及胡景翼所迫，退回湖北，一敗塗地，寄身於長江兵艦，度其水上飄泊生涯，時為一九二五年一月。馮玉祥稱是役為首都革命。

馮玉祥佔有北京，曹錕去職，由黃郛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職務。第一件事，亦是最為人注意的事，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強制溥儀(宣統)出宮，北京不再有所謂皇帝。次為請孫中山北上指導，最後與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在北京就任，黃郛的攝政內閣辭職，不再置國務總理，新任各部首長大半屬皖系，曹錕的憲法與臨時約法被廢。

直系督軍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初欲出兵援助吳佩孚，以大勢已去，宣布擁戴段祺瑞，藉圖苟全。段亦思保存直系的殘餘，以維持均勢。張作霖、馮玉祥各謀擴張地盤，張的野心尤大。國民軍孫岳佔領保定，胡景翼任河南督辦，沿京漢鐵路南下。奉軍李景林佔領天津，任直隸督辦。段以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率奉軍為前鋒，沿津浦路南下，山東督軍附段，安徽督理被逐，齊燮元退往上海，盧

¹ 胡景翼為陝軍師長，孫岳為直軍旅長。胡屬國民黨，參加過陝西靖國軍，馮玉祥任陝西督軍時來歸。孫為舊革命黨人，為駐軍北京時，和他交結。馮為基督教徒，外人稱為「基督將軍」，與國民黨中的基督教徒徐謙、馬伯援有交。馮與蘇俄的關係，始於越飛在華之時，與加拉罕尤近。黃郛留學日本，屬同盟會，曾參與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遊歷歐、美，為一軍事政治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歷任北京政府要職，講學北京大學，與馮過往頗頻。

永祥入駐南京，兩人又成了三個月前對抗之勢，不過交換了東西的位置。¹孫傳芳恐奉軍進取浙江，一九二五年一月，助齊舉兵。奉軍擊敗齊軍，進抵上海，與孫傳芳對峙。經段祺瑞調停，孫軍奉軍各自後撤，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由總商會接管，有如中立區。

驅逐吳佩孚出洛陽，鄭州的憨玉琨以爲河南應爲己有，但爲胡景翼所不許。一九二五年二月，胡對憨攻擊，陝西督軍劉鎮華助憨，孫岳助胡，三月，憨戰敗自盡，劉喪失了陝西。

反直系戰爭爆發，孫中山擬全力北伐，破釜沈舟，不作返粵之計。以各軍多不奉命令，復爲商團所牽，遲遲不能行動。待商團事變救平，馮玉祥佔領北京，孫決定北上，命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主持北伐軍務，進兵江西。十一月初，贛軍方本仁來附，北伐軍始得前進。方本仁志在地盤，反戈攻擊北伐軍。譚延闓湘軍僅一萬餘人，均飢疲之衆，一九二五年一月，敗回廣東。所以此次反直系戰爭，孫中山在軍事上一無所得。直系盛時據有十餘省，戰後僅餘浙江、福建、湖北。

二、國民黨的時局主張，張作霖、馮玉祥的對立

恢復中國在國際的自由平等，爲國民黨的一貫主張，改組之後，更強調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罪惡。反直系戰爭一起，孫中山發表宣言，揭示「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承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中國方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接着發表北上宣言，申明國民革命在消滅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爲帝國主義所利用的現象，使之與國民結合，擁護國民利益。對於時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統一與建設，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現民治。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預備會議，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

¹ 《上海新聞報》諷之爲足球比賽的換邊或換球門。

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代表組成。¹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由粵抵滬，招待記者，說明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召集國民會議為對待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對待帝國主義。此後反覆闡述中國不統一的真正原因，不在內而在外，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中國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所以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

列強、軍閥對於孫中山的主張，極力反對，多方和他為難。公使團擬阻止他在上海登岸，上海英、美報紙主張禁止他入住租界，不許他在上海過冬，不理他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十二月，孫經日本抵天津，法國領事不准在法租界舉行歡迎會。公使團因對孫敵視，亦不喜和他接近的馮玉祥及馮所支持的黃郛內閣，拒不赴黃郛的宴會。段祺瑞答應了遵守過去的條約，公使團始承認他的臨時執政。孫至為憤怒，對段嚴詞指責。

廢除不平等條約非一蹴可就，召開國民會議為刻不容緩之事，段祺瑞為敷衍計，宣布先召開由各省區代表組成的善後會議，再產生國民會議。孫要求善後會議兼納人民代表，段只允限於各軍首領、各省區長官、及有勳勞和特殊資望地位的人。國民黨、中共激烈反對，不參加一九二五年二月開幕的善後會議，希望人民自行制定國民會議組織法，各地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²結果善後會議一無所成，國民會議亦未能召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孫中山扶病到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遺囑國民黨員，繼續為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共同奮鬥，於最短期間促使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現。所指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主要是蘇俄。另有致蘇俄遺書，說是已囑咐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

¹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曾要求國民黨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團體代表開國民會議。

²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反對善後會議為重要決議之一。時黨員一千餘，青年團員四千餘。

的工作中，與蘇俄合力工作，深信蘇俄亦必繼續予中國援助，達成中國革命的目的，兩國攜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取得勝利。共產國際主席齊諾維夫及俄國共產黨書記史達林來電致悼，支持國民黨為反帝國主義而奮鬥，中共亦有同樣表示。中國各大都市紛紛公祭追悼，移柩時執紼民衆十餘萬人，國民革命運動在華北及全國得到空前進展。

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政府的生命寄託於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集團。張的武力本在馮之上，復乘馮倒戈，直軍收潰之際，繳得大批槍砲。馮軍先入天津，因奉軍的壓迫而撤退。直隸督理王承斌曾參與馮的倒吳佩孚計劃，所部亦被奉軍繳械。段祺瑞偏近張作霖，¹執政政府的各部總長，無馮系人物。國際背景不同與地盤競爭，尤為張、馮衝突的大原因。張、段的支持者為日本，馮的支持者為蘇俄。馮於北方軍閥中為一有心人，生活樸實，所部以紀律嚴明見稱。越飛對他備致好評，加拉罕更譽為「中國解放運動的柱石」。一九二三年底，他已在研究俄國情事，室內懸有列寧像，由基督教而轉慕社會主義。他之推倒吳佩孚，不必與蘇俄直接有關，但佔領北京後的第四天，即與加拉罕會晤，黃郛內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又和加拉罕有過一段因緣（見528頁）。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國代辦梅葉（Mayers）報告國務院，謂蘇俄對北京現政府的影響力至鉅。十五日，張作霖與美國總領事高思（Gauss）談話，對黃郛、王正廷深表不滿，二十九日，又向梅葉抨擊蘇俄在華活動。馮玉祥的轄區毗鄰蘇俄，全無海口，外來接濟有賴蘇俄。一九二五年二月，馮訂購蘇俄槍械，四月，蘇俄軍事顧問加入馮軍工作，此後蘇俄軍火源源向馮的基地張家口輸送。對於奉系張宗昌的招募白俄，加拉罕一再抗議，要求解散，中東鐵路的蘇俄局長與張作霖時有爭執。

馮玉祥為倒直系的首功，事後並不得意，段祺瑞就任執政的當日，曾請求辭職。張作霖步步進迫，率奉軍入京，國民軍胡景翼、孫岳密謀

¹ 段、張對於馮玉祥之驅逐宣統出宮，均極為不滿。

予以拘捕，張倉惶而去，雙方火併，有一觸即發之勢。馮因基地未固，不敢輕發，張極力擴張。段於張、馮，總望能使各得其所，自己亦有所獲。先就已成之局，以河南歸國民軍，將直隸、熱河歸奉軍，自取安徽，而與張共有江蘇，再以察哈爾、綏遠畀馮部，命馮督辦西北邊防，張督辦東北邊防，張返瀋陽，馮赴張家口，國民軍孫岳任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奉系張宗昌任蘇、皖、魯剿匪總司令。處處使張、馮平分秋色。一九二五年四月，河南督辦胡景翼卒，段即以胡的部將岳維峻繼任，同時授奉系的張宗昌為山東督辦。張作霖得寸進尺，奉軍定要駐紮北京附近，馮軍後撤。蘇俄加緊援馮，促成馮、張衝突，加拉罕與馮訂立密約，馮、張的決裂，成為旦夕之事。

三、壯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各國對於中國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缺乏正確認識，總以為是少數知識分子及國民黨與中共受蘇俄煽動所造成的一時現象，不難鎮壓。¹罷工是反帝國主義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年餘來大致無事。一九二四年後，情勢大變，國民黨與中共合力推動反帝國主義與民衆運動，直系崩潰，與孫中山的聲望，復給以活動便利。一九二五年二月，全國鐵路總工會在長辛店舉行代表大會；三月，全國各省工會聯合會成立於北京（國民黨領導）；五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組織全國總工會（中共領導），決定第一步與資產階級及其國家作經濟鬥爭，第二步為政治鬥爭。

在華的外資紗廠以日本為多，工人待遇最苛，每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所得工資僅一角五分，且動輒遭受毒打或開除。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抗議開除及毆打工人而罷工，四月，青島日本大康、內外棉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反對虐待而罷工，歷時各二十餘日。五月，兩地工潮復起，青島方面被軍警制止，工人死傷二十餘人，未再擴大。上海的情形完全兩樣，一因上海學生工人

¹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報》刊出倫敦通訊，尙有武力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戰爭計劃。

廣集，二因國民黨、中共在上海活動最力，三因殺害工人的為日本人。內外棉紗廠再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十五日，工人二名被革，顧正紅被日人槍殺。十八日，學生舉行追悼會，先後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十人。二十五日，國民黨電責日人無理殺害華人。二十八日，中共決定舉行示威。三十日，學生二千餘人分在公共租界講演，援助罷工工人，羣集南京路巡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巡捕暴力干涉，開槍射擊，死者十一人，重傷二十餘人，是為五卅慘案，即「五卅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華人結隊行走，總商會、總工會決定六月一日起罷市、罷工，援助學生，租界中國巡捕亦多停止服務。工部局宣布戒嚴，召集外國義勇隊、陸戰隊巡邏佈防，佔領各大學，華人續有死傷。六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成立，召開市民大會，對英、日經濟絕交，全國各大都市工人、商人、教員、名流紛紛奮起，學生相繼罷課，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日，長沙學生工人示威，參加者數萬人。十日，北京舉行的國民大會，參加者十餘萬人。十一日，漢口工人遊行，被英水兵、商團槍殺八人，傷四十餘人，是為「漢口慘案」。十三日，九江中外衝突，英領事館遭受搗毀，日本銀行被焚。二十五日，全國哀悼「五卅慘案」，一片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呼聲。英國更是大家反對的目標，學生高唱對英宣戰，自動接受軍事訓練。

廣州為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這時國民黨正忙於對付滇、桂軍，初未有積極行動。討平滇、桂軍後，各界成立對外協會。六月十九及二十一日，香港及廣州沙面租界華工為援助「五卅慘案」罷工，參加者二十餘萬人，是為省港大罷工。對外協會決定舉行大示威，聲稱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戰。惟廣州局勢依然不穩，示威的先一日，當局告誡有關單位，不可有意外舉動。二十三日，示威大隊行經沙面對岸的沙基，在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聲中，槍聲突起，¹英兵發排槍及機關槍掃射，法國軍艦開砲轟擊，死工人民眾六十人、陸軍學

¹據云示威大隊中有蘇俄顧問，命陸軍學生開槍。

生二十三人，傷者五百餘人，法人死一，英人傷五，是為「沙基慘案」。廣州政府嚴重抗議，國民黨決定斷絕英、法利益關係，並作防禦佈置。英法拒絕抗議，增兵廣州，請美、日採共同強制行動，未得同意。新任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亦策劃對英軍事計劃。

五卅慘案初起，中共號召全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野蠻屠殺，沙基慘案發生，國民黨決定對歐、美帝國主義概行反對。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發表告各國人民書，說明中國所受帝國主義的痛苦，非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能剷除帝國主義的禍根。北京五十餘團體組成的反帝國主義大聯盟，通電內外，呼籲撲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團結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力量，共圖解放與自由。七月中旬，廣州英、法軍艦加緊戒備，英人多遷往香港。國民黨全力維持並擴大罷工，香港工人十餘萬（一說六萬人）陸續返回廣州，不准英國商船進口，設立省港罷工委員會。香港進口船隻減少百分之八十五，居民減少百分之四十，商店倒閉，地價跌落。廣州的經濟同受影響，罷工工人的每日近萬元的救濟金，更是一大負擔，但仍能堅持有十六個月。

上海商人罷市，本有幾分勉強，對於中共領導工、商、學聯合會，並不積極支持。六月十三日，奉軍抵達，二十二日，宣布戒嚴，禁止人民活動。二十六日，公共租界罷市、罷工停止，但華界仍抵制英、日貨物，繼續對英、日罷工。七月六日，工部局斷絕中國工廠電源，使不能開工，陷中國工廠於絕境。日本希望早日復工，經日本總領事與上海當局商定，允撫恤顧正紅，酌付罷工期間工人工資，不無故開除工人。工人以罷工日久，漸感厭倦。九月七日，中共發動的辛丑條約紀念會，參加者亦不熱烈。九日，日本紗廠罷工終止，十八日，上海戒嚴司令解散總工會，通緝該會委員長李立三。二十二日，工、商、學聯合會宣告解散，三十日，對英罷工終止。

北京政府為滬案屢向外交團抗議，公使團不承認租界當局應負責任，僅允派員調查。英、日態度最為強硬，蘇俄獨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英、美、法、日、義、比六國合組調查團，與中國代表意見不協，

租界工部局復拒絕懲處有關人員。公使團採納英國建議，由英、美、日代表重行調查，中國拒不參加。十二月，工部局准總巡捕辭職，以七萬五千元作為死傷華人恤金，惟拒絕道歉及其他條件。北京雖不同意，而無如之何，滬案不了了之。但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仍繼續發展，國民黨與中共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尤其是中共，鮑羅廷曾說：「我未曾造成五卅慘案，而五卅慘案乃為我而造成。」

滬案發生後，北京政府為輿論所迫，要求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國家修正條約。所得答覆是必須切實履行現有條約義務，保障外人特權與利益，禁止反抗運動，始可考慮。美國為緩和中國民氣，穩定北京政局，建議召開中國關稅會議，派員調查司法，作為實行關稅自主及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準備，英、日亦欲借此遏阻蘇俄影響力的廣續發展。一九二五年十月，關稅會議開始，司法調查於一九二六年一月舉行，均無真正結果（見493頁）。這時大規模內戰復起，北京近乎無政府狀態，一切均談不到。

四、北方軍閥的離合與混戰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招致了北方軍閥的大混戰。在大混戰中反帝國主義運動猛進不已。一九二五年二月，奉軍及孫傳芳軍自上海撤退後（見544頁），仍欲待機再來。孫傳芳暗中提取上海兵工廠封存的軍械；張作霖欲先置北京政府於控制之下，再攫取長江下游。五卅慘案發生之日，張作霖要求更易江蘇、安徽軍事長官。六月十三日，以維持治安為名，奉軍開抵上海，孫傳芳即調兵佈防。孫與馮玉祥已有默契，直系的湖北督軍蕭耀南亦聯好國民軍系的河南督辦岳維峻及不堪奉軍凌迫的皖系軍人，成立聯防公約。八月，段祺瑞以奉系的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同時以馮玉祥為甘肅督辦，孫岳為陝西督辦。

第一個發動反奉戰爭的為孫傳芳。七月，他得悉張作霖訂購大批軍械，將於來春奪取浙江，決先發制人。十月十日，借名秋操，所部五、六萬人，分路進向江蘇，斥北京政府壓迫上海罷工工人復工，聽

任各國實行滬案司法調查，允開關稅會議，儼然是反帝國主義者的口吻。奉軍以防線過長，舊蘇軍與孫軍相通，北方有國民軍的牽制，不戰而退，孫傳芳唾手而下上海、南京。十一月，佔領徐州，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司令，不及匝月，掩有江蘇、安徽。蟄伏十個月的吳佩孚，乘時自岳州崛起，設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於漢口。¹此時的張作霖有如一年前的吳佩孚，成爲各方打倒的對象。

孫傳芳攻下徐州後，按兵不前，作持盈保泰之計。第二幕由國民軍接演。馮玉祥倒奉戰畧，大致是先由孫傳芳發難，奪取蘇、皖，再由國民第二軍岳維峻及第三軍孫岳奪取直、魯，最後策動奉軍內變，一舉而置張作霖於死地，而由國民第一軍控制全局。²國民第二軍一路東入山東，一路合第三軍北入直隸，十一月中旬後，佔領直隸保定，迫近山東濟南。奉軍第三軍團副團長郭松齡，以功高賞薄，心懷怨望，暗結馮玉祥，³十一月二十四日，舉兵灤州，要求張作霖下野，所部六萬之衆，東出山海關。張準備出走，因得日本之助，決計抵抗。日軍警告雙方，不得侵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帶與日軍警備區域。進至營口、新民的郭軍被迫後撤，部分將領因新民日本領事吉田茂的聯絡，與張學良通，不肯再戰。蘇俄大使加拉罕請莫斯科出兵北滿，蘇俄恐與日本衝突，改由中東路的蘇俄局長宣布，中國使用該路運兵須照付運費，以困奉軍。十二月二十三日，郭松齡遭黑龍江騎兵襲擊，日本砲兵猛

¹ 十四省爲鄂、湘、蘇、皖、贛、浙、閩、川、黔、桂、豫、晉、陝、甘，吳實際能控制的限於湖北。

² 奉軍約三十萬人，國民第一軍約十二萬人，第二軍約十萬人，第三軍二萬餘人，以第一軍訓練爲佳。一九二四年五月，國民軍已有蘇俄顧問，馮玉祥在張家口設立軍事學校，以俄人爲教官，庫倫駐有馮的代表。十一月，第一軍獲得蘇俄步槍五萬枝、機關槍三百四十挺、大砲一百六十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二軍獲得步槍六千五百枝、機關槍九十二挺、大砲十二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三軍獲得步槍三千枝、機關槍五十二挺、大砲十二門。

³ 第三軍團長爲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實權由郭掌握。是年十月，郭在日本參觀秋操，與馮玉祥派來的韓復榘密議共倒張作霖。

轟，兵敗身死。張作霖渡過了生死關頭。¹

直隸督辦李景林與郭松齡曾有諒解，宣布與張作霖脫離關係，馮玉祥為獲得海口，強令讓出天津。李經日人運動轉與山東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共戰國民軍，指為「赤化」。²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第一軍力戰而有天津，圍攻濟南的國民第二軍，則為張宗昌所敗。

吳佩孚再起後，大非當年可比，所謂十四省討賊總司令，只是一個空名。初欲揮軍北上，河南國民第二軍，不許假道，坐困漢口，一籌莫展。吳所討之賊原指張作霖，然仍不忘對馮的深仇，英、日勸與張作霖言歸於好。十二月三十一日，吳宣布結束討奉戰爭，張作霖表示諒解。馮玉祥以勢處孤立，聲言下野。³一九二六年初，吳佩孚部自湖北、山東分道進攻河南。河南人民以不堪國民第二軍的蹂躪，紛組紅槍會反抗，⁴國民第二軍幾盡被殲滅。同時奉軍、魯軍沿京奉、津浦鐵路進攻天津，並由海道襲擊大沽，國民軍封鎖海口。三月十二日，日本兩驅逐艦強行通過，與國民軍互轟。倫敦早有出兵天津，與國民軍一戰之說。十六日，英、美、法、日、義、荷、西、比八國公使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大沽至天津所有戰爭，准外國船隻自由航行，限四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採必要手段。

國民黨與國民軍立於同一戰線，一九二五年七月，已指張作霖為英、日帝國主義的工具，段祺瑞為張作霖的工具。反奉戰起，復與中共分別宣言，鼓勵人民打倒軍閥及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勢力，建立統一國民政府。北京教授、學生、工人連續示威，要求段祺瑞辭職，至是愈

¹ 郭敗死後，張作霖逮捕中東鐵路蘇俄局長，蘇俄限於三日內釋放，張為所屈。

² 徐樹錚亦多方活動，說日本援助張作霖，勸孫傳芳共討馮玉祥，十二月三十日，被馮殺於北京天津道中。

³ 國民軍攻下天津後，第一、二、三軍爭奪直隸地盤，馮玉祥苦於應付，亦為其下野原因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取道庫倫赴莫斯科。

⁴ 進攻山東的國民第二軍多為吳佩孚舊部，吳派靳雲鶚收回，率之折回河南。紅槍會為河南農民組織，多以槍矛為武器，槍頭繫以紅纓。

爲激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舉行國民大會，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宣布辛丑條約無效，勉國民軍爲反帝國主義而戰，繼向國務院請願，男女學生及市民被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五人，是爲「三一八慘案」。¹

蘇俄爲救國民軍之危，命加拉罕謀求吳佩孚諒解，馮玉祥的蘇俄顧問說馮倒段祺瑞。一九二六年三月，馮軍因張作霖、吳佩孚的壓迫，退集北京。加拉罕致書吳佩孚，謂張作霖不可信賴，如與馮玉祥合作，蘇俄將予援助，中國可不受帝國主義侵畧。馮部亦向吳求和，並於四月九日驅逐段祺瑞。加拉罕再勸吳與馮携手，吳始終堅拒。英、美、日更不欲馮軍存在。四月十五日，馮軍由北京向西北後撤，扼守南口，四個月後退往綏遠。時廣東的北伐軍已佔有湖南，進入湖北，吳佩孚倉皇南去，北京成了張作霖的天下。

¹ 段祺瑞指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孟諒）爲鼓動者，下令通緝，徐等避入蘇俄大使館。

第十五章 再革命(下)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

第一節 蔣中正的領導

一、早期軍事成就

國民黨改組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黃埔軍官學校的設立，又為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不及一年，這個學校所培植的新武力，即有驚人的表現，雖得力於蘇俄的協助，而蔣中正實為關鍵人物。蔣為浙江奉化人，九歲喪父，由母撫育督教，初在私塾讀經史，十七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因受日俄戰爭影響，一九〇六年春，東渡日本，擬習陸軍，未果，獲交陳其美。同年冬回國，一九〇七年夏，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識張羣，次年以公費生再赴日本，與張羣入振武學校，因陳其美的介紹，加入同盟會，並參加黃郛領導的「丈夫團」，創辦《武學雜誌》。一九一〇年，成為士官學校候補生。是年六月，首次會見孫中山。十二月，入野砲兵聯隊。辛亥革命軍起，返上海助陳其美，參加光復杭州之役，再回上海，任團長，隸屬於師長黃郛。¹一九一三年，參加二次革命。一九一四年，受孫中山、陳其美命，在上海、哈爾濱活動。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參加上海、山東反帝制之戰。一九一八年，應孫中山之召赴粵，助陳炯明經營福建，任作戰課長及支隊長。對於新文化運動亦深感興趣，時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與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²一九二〇年，粵軍回師廣東，參贊戎機，指揮作戰，孫中山盛稱其勇敢誠篤而知兵事。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蔣與孫在

¹ 日後陳其美、黃郛與蔣成為結義兄弟。

² 蔣曾投稿《星期評論》，捐款北京大學工讀團。

廣州省河軍艦共患難者四十日。事後益得孫的倚重，遇事每與相商，對於整頓黨務，力主收容有為青年，注重宣傳。

孫中山初晤越飛，即要求派遣軍事人員相助，廖仲愷進而與越飛論及創辦軍事學校問題。一九二三年八月，蔣奉孫之命，率領代表團訪問蘇俄，考察黨務、軍事、政治、工廠、農村，參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各級蘇維埃會議，對於紅軍的組織、訓練、設備，尤為留意，先後會見托洛斯基、陸軍次長司克亮斯基（Sklianski）、及參謀總長、訓練總監，商及軍事合作。除不以軍隊直接參加外，托洛斯基允在道義、武器、經濟上援助中國革命，司克亮斯基勸先準備民衆組織及政治宣傳工作，俟有基礎，再採軍事行動。協助國民黨在蒙古練兵，為蔣的另一要求，蘇俄外交委員長翟趣林借口蒙古對中國疑懼，婉詞謝絕，蔣殊感失望。蘇俄復對代表團施行分化，使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對立。¹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訾詆，更令他憤慨，認為蘇俄的方針在造成中共為正統，決不信與國民黨可始終合作。一旦蘇俄政權強固，勢必復活帝俄時代的野心，不只要使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成為蘇維埃，且將染指中國本部。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易名，與英、日無別。這是他訪俄的重要觀感，對於聯俄、容共政策遂少信心。十二月，蔣自俄回國，遲遲不去廣州。孫中山、廖仲愷函電交促，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夕前往，孫中山任為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堅辭不就。²戴傳賢勸以「暫時忍耐，先謀掌握實力，以觀其變，」或為他終於受命的原因。

一九二四年五月，孫中山正式派蔣為軍官學校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校址位於黃埔，通稱黃埔軍校。開辦費六萬元。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人，來自各省，六個月畢業，以政治訓練為主，主講者有胡漢

¹ 代表團團員張太雷為中共黨員，沈立庸（定一）為國民黨兼中共黨員。

² 蔣之不就軍校職務，自云：一係不信蘇俄誠意援助國民黨，孫中山為了現實需要，堅主聯俄；二係遭受疑忌。按蔣未獲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孫復有自任軍校校長之憾，蔣或有不快之感。

民、汪兆銘、中共黨員周恩來、惲代英、高語罕、陳毅、聶榮臻等，¹均曾任政治教官。負責軍事教育訓練者，大都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及保定軍官學校，如何應欽、王伯齡、鄧演達、陳誠等。七月，蔣兼任各軍訓練委員長，黃埔軍校教導團繼之成立，蘇俄顧問給予不少幫助。顧問團成立於是年一月，高和羅夫（Govoroff 即 P. A. Pavlov）為主任。他的後任即加倫將軍（Galen）。²

討平商團之變，為蔣中正領導黃埔軍校學生作戰的首次表現。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陳炯明乘孫中山北去，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準備西攻廣州。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與廖仲愷等決三路東征，除為保衛廣州外，並欲借以加強孫中山在北方的地位。北路滇軍及中路桂軍逗留不進，南路許崇智所統粵軍一萬人，蔣中正所統教導團三千人，奮戰而前。³教導團因黨代表、政工人員的宣傳，精神旺盛，民衆合作，月餘之內，屢戰屢勝，直抵潮州、汕頭、嘉應，陳炯明部四萬之衆，敗走閩南，教導團善戰之名大著，是為第一次東征。

孫中山在粵之時，霸佔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多少尚有幾分忌憚。孫北上後，楊與段祺瑞暗通，謀獨有廣東，劉與雲南唐繼堯勾結，欲攻佔廣西。及粵軍教導團東征，孫又逝世，楊、劉認為是推翻廣州政府的良機。一九二五年四月，楊佔領廣州兵工廠，劉公然指責國民黨。胡漢民、廖仲愷、加倫會商討伐，一向受楊、劉

¹ 周恩來曾任政治部副主任。

² 最早的俄國顧問為 V. Poliak, A. Z. Cherepanov, N. Tereshatov。加倫原名白魯傑（V. K. Blucher），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負傷退役後，加入共產黨。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率游擊隊敗白軍，升師長。一九二〇年晉軍團司令，平定兩俄。一九二一年，協助遠東共和國建軍，不久任總司令、國防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屢立戰功。高和羅夫溺斃，一九二四年十月，加倫繼為顧問團主任，一九二五年夏返俄。一九二六年春，因蔣之請復來，隨同北伐，一九二七年七月回國。一九二九年在遠東紅軍總司令，一九三五年升元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史達林處死，年四十九歲。

³ 原定計劃，以粵軍任北路，滇軍任南路。加倫以與北路軍相抗的陳軍實力較強，將粵軍改為南路，教導團隨同參加。

壓迫的譚延闓的湘軍、朱培德的滇軍，一致行動，推蔣中正為總指揮。五月初，蔣率黨軍（教導團改稱）及粵軍西返，許崇智留守潮州、汕頭，作戰計劃仍為加倫所訂。鮑羅廷力言不可與楊、劉決裂，胡漢民不為所動，六月五日，毅然將楊、劉免職。廣州附近鐵路、船舶、兵工廠工人罷工，滇、桂軍勢成坐困。六月十二日，黨軍、粵軍猛攻，河南、北江、西江各軍與海軍分道進迫，¹粵人紛起助戰，滇桂軍三萬餘人陷於四面包圍，全部潰敗。亂平，蔣中正被任為廣州衛戍司令，不僅成為革命軍的英雄，亦為廣州的實際統治者。

二、權力的集中

孫中山病危之時，北京國民黨要人商討今後領導問題，有人主行委員制，可能是加拉罕的建議。孫中山逝世之後，胡漢民等宣言，秉承孫的遺志，繼續努力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鮑羅廷、汪兆銘回粵，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與蘇俄携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軍閥，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執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²

關於政府組織，各方均贊成合議制，以軍務方急，未及施行。孫中山先曾任唐繼堯為副元帥，唐未接受，至是忽而就職，國民黨不予承認。六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七月一日成立，委員十六人，³汪兆銘為主席，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任外交、軍事、財政部長，另設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汪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許崇智。

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資望僅次於孫中山，又為現任的代理大元帥，

¹ 河南為李福林軍（福軍，即粵軍），北江為譚延闓軍（湘軍），西江為梁鴻楷、李濟深軍（粵軍）。粵民痛恨滇軍、桂軍，非粵籍外省人亦遭殃及，外省籍的軍校學生間有遇害者。

² 為了紀念孫中山，九月，制定總理紀念週條例，十一月開始實施，直至一九四八年。

³ 包括汪兆銘、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伍朝樞、古應芬、孫科（以上粵籍）、戴傳賢、張人傑（浙籍）、譚延闓（鄂籍）、程潛（湘籍）、于右任（陝籍）、張繼（直隸）、徐謙（皖籍）、林森（閩籍）、朱培德（滇籍），許、譚、程、朱握有兵權，蔣中正未列名，據云係自行辭謝。

但國民政府主席竟為從未擔任過行政要職的汪兆銘所得，關鍵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加拉罕、鮑羅廷對於孫中山的繼承人，早在物色之中。胡個性耿介，難與人相與，汪富於感情，夙少主張，易於操縱，鮑羅廷屢稱其為國民黨領袖。五月初，汪過汕頭，與蔣中正密商行止，請為代決，蔣感其親誠，表示擁護。許崇智素與胡漢民不睦，親俄的廖仲愷對於加拉罕、鮑羅廷的安排，自無異議，譚延闓、朱培德與國民黨的關係尚淺，無所可否，汪代胡之局遂定。

國民政府成立不久，發生了震撼廣州的暗殺廖仲愷案，及連帶而來的政治變動。孫中山卒後，國民黨內的反共派與親共派的衝突愈烈。反共派對於胡漢民之遭受排擠，更為不平，粵籍軍人對於勢力日漲的蔣，同懷嫉視，認為皆鮑羅廷一手製造，汪兆銘、廖仲愷甘為所用，必去之而後已。失意政客與因省港罷工而蒙受損失的商人與之合而為一，暗結香港當局及英國商人，謀顛覆廣州政府，剷除蘇俄勢力。七月二十七日，香港總督 E. R. Stubbs 請倫敦撥港幣一百萬元，用以支持反廣州政府的軍人，撲滅共產黨，恢復省港正常關係，未獲批准，而廖仲愷已於八月二十日遇刺殞命。¹

事件發生的當天，廣州當局依鮑羅廷之議，由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總攬軍政各權，宣布戒嚴，這是蔣第一次參與決策大計，聲言廖案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反共乃帝國主義者的口號。胡漢民的從弟胡毅生反共最力，涉有重大嫌疑，事發在逃，鮑羅廷指胡漢民預謀，胡遂失去自由。八月二十五日，特別委員會下令，拘捕粵軍高級將領十餘人，解散所部軍隊，胡漢民正式被禁於黃埔，可說是廣州的一次政變。

討平滇、桂軍後，廣東各軍依然是各自為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整理軍民財政，設立參謀團，以俄人羅茄覺夫 (Victor Rogachev) 為主任。七月，各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派定蘇俄顧問，置黨代表及政治訓練部。八月一日，所有總司令一律解職。許崇智為粵軍首

¹ 廖的現職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工人部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同時遇害的有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兼宣傳員講習所所長陳秋霖。

領，所部衆而不整，加倫勸蔣加以制裁。八月二十五日，粵軍將領又有多人被捕。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任命蔣與譚延闓、朱培德爲第一、第二、第三軍軍長，繼以許崇智、李福林、李濟深爲第四、第五、第六軍軍長。第一軍約一萬人，月餉四十五萬元，第二、第三軍合計二萬二千人，月餉共四十二萬元，第四、第五、第六軍合計三萬人（均粵軍），月餉共九十三萬元，實際爲許崇智的第四軍獨有。九月一日，特別委員會議決統一財政，各處稅收均解財政部。次日，組織財政委員會，以許崇智爲監督。許欲限制第一軍的發展，與蔣齟齬，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對許的把持，同感不平。九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通過蔣的提議，將粵軍縮編爲兩軍，由蔣全權處理。二十日，許被迫離粵，可說是廣州的又一次政變，胡漢民以赴俄代表的名義往莫斯科。孫中山時代倚爲左右手的一文一武，相繼放逐，廣州變爲汪、蔣共治之局。汪主黨政，蔣主軍事，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俄人爲預算委員會顧問。

第一次東征回師不久，粵東復爲陳炯明所有。廣州局勢大定之後，九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決再度東征，派蔣爲總指揮，以第一及第四軍爲主力，於十月初出動，一舉而破二年餘來久攻不下的惠州堅城，進而重克嘉應、潮州、汕頭，爲時約三十日。南路鄧本殷部爲策應陳軍，自高州、雷州東犯，勢頗猖獗，十一至十二月，爲朱培德及廣西軍所敗，翌年一月，收復瓊州（海南島），廣東全境底定。

一九二五年，蘇俄對廣州的援助，更爲積極。所可知者，顧問人員約達一百名。三月，以一百萬盧布作爲黃埔軍官學校的兩個月經費，四百萬盧布供新編黨軍之需，四五兩月，俄船不斷前來，所運多爲油料。七月，設航空局。同月，到俄船三隻，一隻所載爲贈與的軍械，一隻所載爲煤炭。八月初，一週之內，到俄船六隻，海軍局成立。鮑羅廷再請加拉罕購飛機六架，派駕駛員十名，並接濟軍火。十一月，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成立，廣州先後共派學生約三百人。¹蔣一再強調中俄

¹ 蔣中正長子蔣經國亦在內。

團結，世界革命須統一指揮，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廣西底定亦爲一九二五年的事。一九二四年，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已有廣西的大半（見 499 頁）。一九二五年初，粵軍復助其擊敗沈鴻英，佔有桂林。六七月間，拒退入侵的雲南唐繼堯軍，全省統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李宗仁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黃紹竑爲廣西省政府主席。至是國民黨有了廣東、廣西，兵力近十萬人。

三、制裁中共

國民黨之容共實爲孫中山所獨斷，不少高級幹部自始即表示反對（見 540 頁）。正式改組之後，中共黨員利用合法身份，逐步加強其在國民黨內的權力。所採策略，爲將國民黨分爲左右兩派，使相互傾軋，謂左派爲革命派，右派爲妥協派。一九二四年六月，主張容共最力，首先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的張繼與謝持、鄧澤如，對中共提出彈劾，他們均是改組後的中央監察委員。孫中山卒後四個月，曾預聞中共創建的戴傳賢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小冊，闡明孫中山與馬克思思想之不同，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絕不可以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指摘中共在國民黨內作破壞活動，以擴張中共的組織。及胡漢民、許崇智遭受放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亦被迫離粵。中共加緊聯結親共的左派汪兆銘，攻擊反共的右派，戴傳賢等被列爲中派。張繼、林森等獲戴傳賢、孫科、吳敬恆的支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即通稱之西山會議，議決取消中共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懲戒汪兆銘。因廣州不予承認，斥爲非法，乃自設中央黨部於上海，國民黨正式分裂。

蔣中正訪俄歸來，已洞悉蘇俄對中國之不懷好意，因孫中山堅持與之合作，惟有虛與委蛇，先求自立。鮑羅廷對他雖力事爭取，然終不信任，尤不願其獨握兵權。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教導團成立

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指使者為鮑羅廷，加入者均共產黨員。第一次東征後，國民黨籍的軍人，為對抗計，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彼此互訐，予蔣以極大痛苦。

汪兆銘之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為黨政軍首領，實出於鮑羅廷的支持。及滇桂軍消滅，第二次東征勝利完成，蔣的地位如日東昇，威望愈隆，鮑羅廷的忌刻愈甚，汪同感不安。西山會議集矢於汪而不及蔣，無異火上加油。一九二六年一月，鮑羅廷與汪操縱的廣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目的為打擊西山會議派，倒蔣運動亦於是開始。蔣為維護團結，希望大會暫勿討論西山會議案，汪更以為蔣與西山會議派相通。大會不理蔣的勸告，通過懲處與西山會議派有關的黨員。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計六十人，汪派佔二十人、中共佔十四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汪派與中共各佔三人，中央黨部各單位負責人亦多為汪派與中共份子，¹汪與鮑羅廷之合謀制蔣，昭然若揭，彼此裂痕漸深。²

二次東征後，蔣即計劃北伐。鮑羅廷以中共尚不夠強大，在國民黨及革命軍的地位未臻穩固，恐蔣的勢力再行擴展，謂北伐時機未到。蘇俄顧問團主任季山嘉（Kissanga，即 V. V. Kuybyshev）、參謀團主任羅茄覺夫反對尤力。語多諷刺，且擬命蔣赴北方覓地練兵，汪兆銘曾預聞其謀。蔣以環境險惡，呈請辭職，尋又決心衝破難關。汪對蔣之辭職，既不批准，亦不挽留。一九二六年二月杪，蔣扣留受季山嘉等利用、陰圖不軌的第一軍某師長。三月初，汪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准蔣解除廣州衛戍司令之職，反蔣傳單繼之出現。

蔣向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外人之手，與共產國際聯絡，應定限度，不可失自主地位，汪盡以告之季山嘉。中共詆蔣為新軍閥，為革命團體中的段祺瑞。三月十四日，汪諷蔣離粵。蔣感「四面皆敵，

¹ 中央常務委員為汪兆銘、譚延闓、蔣中正、胡漢民，及汪派的陳公博、甘乃光，中共的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中央秘書處秘書為譚平山、林祖涵、甘乃光，秘書長為劉芬（中共）。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中共），農民部長林祖涵，青年部、婦女部秘書均為中共黨員，財務審查委員四人，三人為中共黨員。

² 大會閉幕之日，蔣未出席，可知其當時心情。

肘腋生患，陷於重圍，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

中山艦爲蔣往返廣州黃埔的坐艦。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爲中共黨員，三月十九日，蔣發覺該艦行動可疑，¹決斷然處置。二十日，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武器，監視蘇俄顧問住宅，是爲中山艦事變，亦爲蔣對中共的第一次制裁。汪以蔣目無政府，擅自行動，大爲震怒，其他軍長對蔣之所爲亦多不諒。爲了統一內部意見，繼續獲得蘇俄援助，蔣的態度轉趨緩和，先向蘇俄參議索洛維也夫(Solovyev)說明此舉爲對人，而非對俄。繼與正在廣州視察的蘇俄代表伊萬諾夫斯基(Ivanovsky，即 A. S. Bubnov)商定，令季山嘉、羅茄覺夫回國，請加倫再來。但汪亦無法再留，稱病請假，國民政府主席由譚延闓代理，中共黨員退出第一軍及黃埔軍官學校，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學會一律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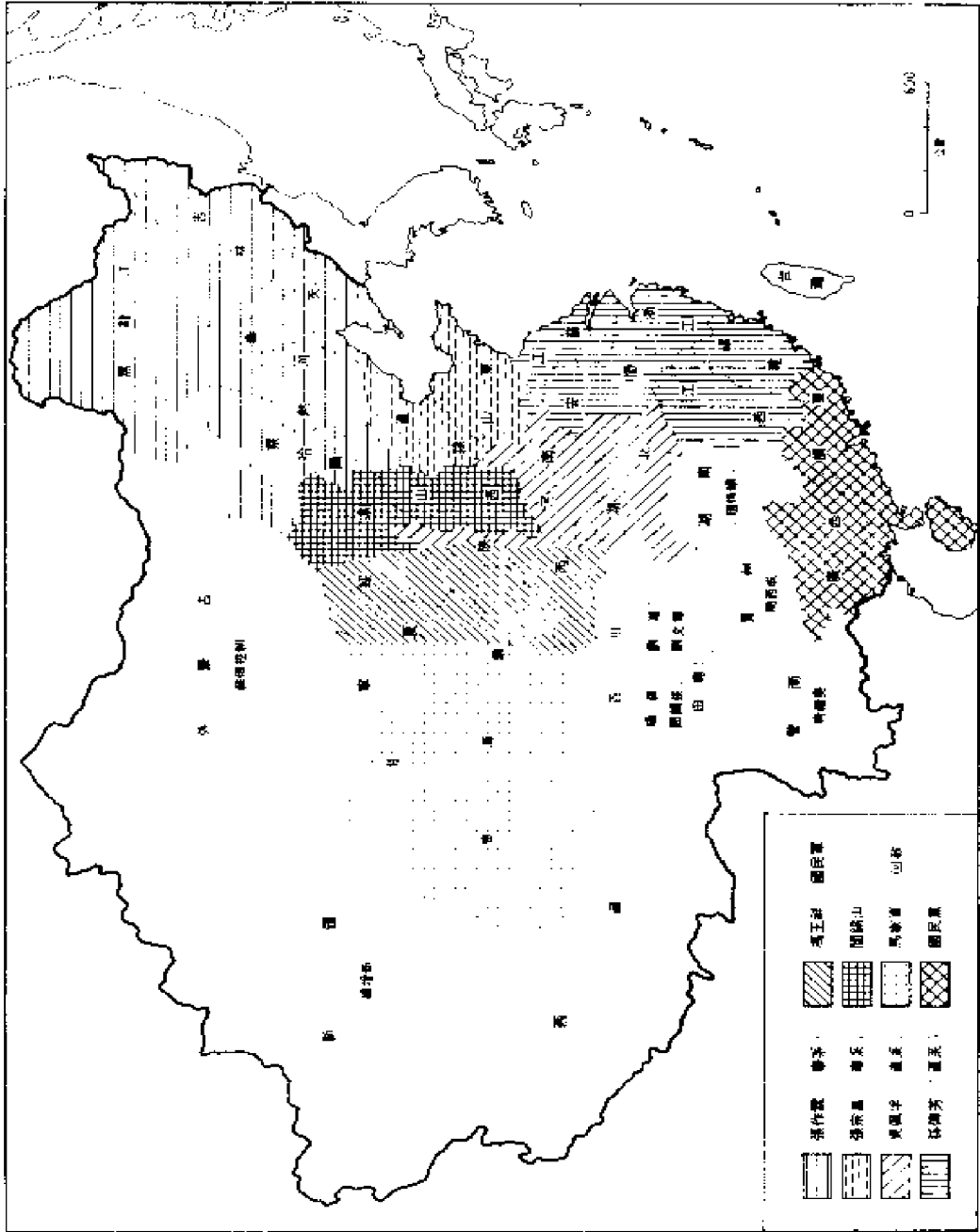
大概由於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蔣與蘇顧問的不睦，史達林頗欲拉攏在莫斯科的胡漢民。胡與史達林會晤後，起程東歸，行至中途，中山艦變作，史達林以爲胡若到粵，可望發生緩衝作用，並命請假返俄的鮑羅廷折回廣州。四月二十九日，胡與鮑羅廷自海參崴抵粵，²受到盛大歡迎，胡被推爲政治委員會委員。卒以與鮑羅廷積不相能，再度離去，³蔣成爲廣州的中心領袖。

陳獨秀初主中共就此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爲黨外聯盟，共產國際力持不可，派遠東局長吳廷康東來指導。陳獨秀對於今後中共與國民黨的態度，提出「辦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政策。鮑羅廷亦主暫時退縮，與蔣商定一國民黨整理黨務方案。五月十七日，由國民黨第

¹ 傳說李之龍擬於蔣乘中山艦自廣州赴黃埔途中，加以劫持，直駛海參崴。

² 鮑羅廷於是年二月請假北上，晤馮玉祥。得知中山艦事變消息，取道庫倫赴海參崴，與胡漢民相會。

³ 鮑羅廷到後，與蔣過從甚頻。五月六日，俄軍械續到一批，蔣至爲欣慰。八日，與鮑羅廷密談三小時，拒再與胡晤。十二日，胡遂往上海，同日，汪兆銘赴法國，其他與胡接近的要人如伍朝樞等均相繼引去，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受到拘禁。



圖十一：軍閥割據——北伐前夕（一九二六）

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要點為組織國共聯席會議，審定兩黨黨員言論行動，中共對於中共黨員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的委員人數不得佔三分之一以上，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中共。蔣自謂此後中共必不能取代國民黨，事實證明，並不若他之所說。陳獨秀對於此一方案甚為不滿，鮑羅廷、吳廷康則說「現在是中共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即是暫退出國民黨上層機構，集中全力於下層工作。

第二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一、進軍華中

廣東畧定，廣西來歸之時，正是直奉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之秋。蔣中正預測軍閥無三年命運，短期內即可完成統一。經過中山艦事變，蔣全局在握，蘇俄仍繼續支援，正可借此向外發展，消弭內部矛盾，湖南內變復有可乘之機。駐湘南的師長唐生智思取湖南省長趙恆惕自代，分向廣東、廣西請兵。¹蔣所定初期戰畧，一為聯絡馮玉祥的國民軍及山西閻錫山，以牽制張作霖的奉軍；二為聯絡川黔軍，以牽制湖北的吳佩孚、雲南的唐繼堯；三為中立江、浙的孫傳芳，使不為敵用；四為在國民軍未被消滅，吳佩孚的勢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時，動員兵力八萬人，籌足兩個月軍餉五百萬元，於三個月內佔領武漢。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後四天（五月二十一日），復通過北伐案。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²七月一日，頒布北伐動員令。九日，蔣正式誓師，聲言三事：第一，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使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革命軍與

¹ 廣西白崇禧、黃紹竑與唐生智為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廣西地瘠兵多，久經兵燹，需別謀出路。

² 蔣的兼職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國民結合，以爲人民的軍隊，使全國人民共負革命的責任。氣勢的雄壯，與意義的新穎，皆非辛亥革命可比。

北伐軍計分三路，第一、第四及第七軍各約半數，共三萬人，首先分由廣東、廣西進向湖南，會同新編的唐生智第八軍二萬人，採取主攻。第二、第三及第六軍約三萬人，進向江西，擔任助攻。¹第一軍的另一半由何應欽統率，警備粵東，伺機攻取福建。李濟深統第四軍餘部及第五軍留守廣州。²攻取湖南、湖北爲北伐軍的第一步目標。唐生智得第七、第四軍之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復長沙，暫停前進，以待後續部隊。七月二十七日，蔣偕參謀長白崇禧、俄國顧問加倫離廣州北上。³湘粵交界山路崎嶇，溽暑行軍尤爲艱辛。香港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隨軍服務，沿途農民踴躍協助。蔣曾謂，進入湖南後，「一路民衆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爲整齊，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八月十一日行抵長沙，「惟感民氣之盛，革命精神之濃厚與緊張而已。未到其地，以爲諸多困難，一臨其境，其難盡失。」這種現象，固以中共近年活動及政治部宣傳之功爲多，亦由於人民久爲

¹ 第二、第六軍官兵大都爲湖南人，唐生智欲獨有湖南，不願此兩軍入湘。

² 各軍軍長及蘇俄顧問如下：

第一軍（黃埔教導團擴編而成，轄四個師，每師三團，約四五千，下同）軍長初爲蔣中正，繼爲何應欽，顧問爲 A. Z. Cherapanov (Zebrovsky), V. A. Stepanov。

第二軍（湘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譚延闓，顧問 Z. Y. Zenck。

第三軍（滇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朱培德，顧問 F. G. Matseylik。

第四軍（粵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李濟深，顧問 V. Gorev, M. G. Yefremov (Abna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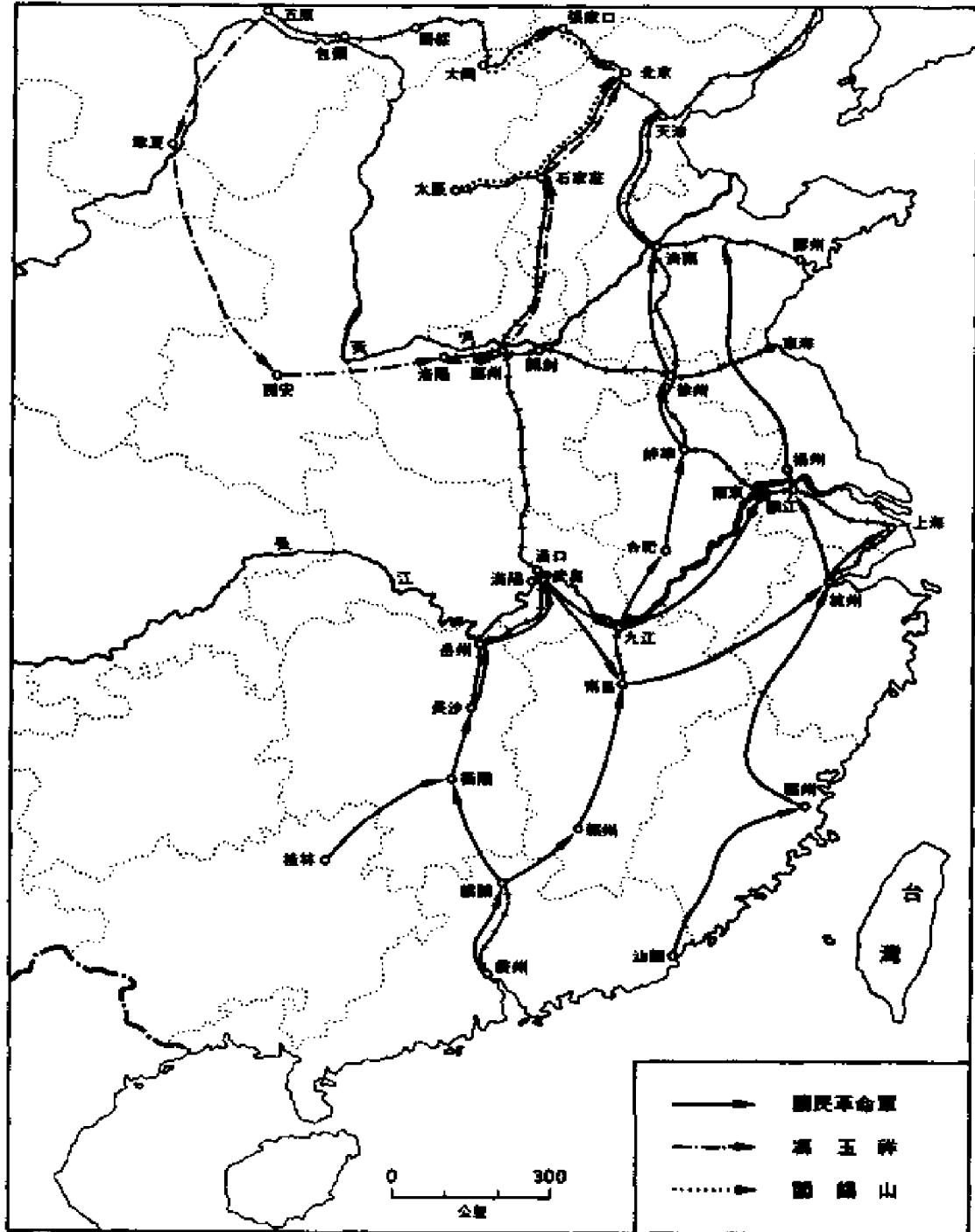
第五軍（福軍即粵軍編成，轄兩個師）軍長李福林，顧問 Lunev。

第六軍（以湘軍爲主，轄三個師）軍長程潛，顧問 N. Z. Konchits。

第七軍（桂軍編成，轄六個旅，每旅兩團）軍長李宗仁，顧問 Z. K. Mamaiv（馬邁也夫，一九二〇年曾隨吳廷康來華）。

第八軍（北伐前由湘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唐生智，顧問 F. I. Olshevsky, V. Gorev。

³ 七月初，蘇俄軍械至少兩批續到廣州，其中一批有步槍八千枝。



圖十三 北伐（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

軍閥所苦，對於革命軍如大旱之望雲霓，實為革命軍戰勝的重大因素。湖南如是，他省亦然。

八月初，貴州、四川將領紛紛來歸。八月十九日，湖南境內的北伐軍開始總攻，三天後克復岳州，水陸兩路前進。吳佩孚部不下十餘萬人，惟戰鬥力大遜於往昔，復忙於北方之戰，至南口攻下後，始趕回漢口。時北伐軍已入鄂南，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破吳軍主力於汀泗橋、賀勝橋，直趨武漢。九月六日，佔領漢陽，七日佔領漢口，圍攻武昌，十月十日克復，¹吳佩孚一敗塗地，北走河南。

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直系中為後起，實力則大過吳佩孚。湖南問題初起，孫傳芳採蔣方震之策，²將革命軍與唐生智分開，俟唐有湖南，再與聯和，另開局面，曾派人赴粵，主南北兩方均不干涉湘事。蔣中正虛與委蛇，以便全力對吳佩孚。孫宣布保境安民，期坐收其利，及革命軍攻下長沙，孫始增兵江西，斥革命軍為「赤孽」，如侵犯所轄五省之一，當全力抵禦。八月二十三日，孫致書蔣中正，要求排去俄人及共產黨，否則將以討赤、禦外相週旋，所部八萬人，分集贛西、贛北。蔣於擊破吳佩孚後，決進攻江西，兵力約五萬人。九月十九日，革命軍襲據南昌，為孫軍擊退，損失頗重。蔣加調援軍二萬人，十月二十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為孫軍奪回。³十一月二日，革命軍第三次進攻，四日，克九江，七日克南昌，孫軍大潰，精銳盡喪，為北伐以來規模最大的戰役。

湘、鄂、贛為革命軍與北軍的重要戰場。十月上旬，福建總司令周蔭人進攻粵東，為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所敗。十二月，何部進

¹ 汀泗橋、賀勝橋之捷，以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陳銘欄二師、葉挺獨立團戰功為著。葉挺為中共黨員，中共為第四軍大事宜傳，號為「鐵軍」。守武昌者為吳佩孚的師長劉玉春。

² 蔣方震曾留學日本、德國，一度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與留學英國的史哲學家丁文江，留學日、德的政治學家張嘉森（君勳），屬梁啟超派，皆為孫傳芳的謀士，指國民黨赤化。章炳麟等反共亦力，有「討赤救國會」的組織。

³ 孫傳芳以苦戰力竭，知革命軍不可輕視。復以後方不穩，浙江省長夏超獨立，南京駐軍抗命，雖均失敗，孫已窮於應付，向蔣中正謀和未成。

入福州。

計自北伐出師，半年內，擊潰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由兩廣擴大至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名義上及於四川、貴州。

二、鮑羅廷的倒蔣反英活動與蔣之攻取華東

經過中山艦事變，蔣中正與中共的分手，為遲早的問題。蔣之急於北伐不無爭取時間之意。中共以新遭挫折，指北伐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的權位慾，不能代表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縱令勝利，亦非革命的勝利，應先鞏固革命根據地廣東，不令反赤軍攻入湖南。及北伐順利推進，中共又說，這不是革命羣衆的行動，而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今後黨的權威，必須在軍事領袖之上，支配一切。現在國民政府有名無實，應請汪兆銘銷假視事，使政治有領導中心，民衆亦應發展自身的力量，儘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的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

列寧卒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相爭，中國問題為其一。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行其是，自建蘇維埃政權。史達林堅持中共與國民黨聯合。一九二八年十一至十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次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包涵兩個要義：一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運動將是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領導權將落到無產階級身上，中國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的國家。中共不僅要留在國民黨內，且應加入國民政府，以全力實現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與左派親密合作，徹底批評搖動的中派，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訓練及軍中政治工作，並武裝農工。二為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不只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尚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

左派黨人之外，尚須利用軍人。第八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唐生智野心甚大，不甘居蔣下。武漢克復後，欲假蘇俄之力以排蔣，獨據兩湖，

再東結孫傳芳，分有長江上下。蔣於唐亦不放心，當進兵江西之時，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武漢，以便就近監督。十二月九日，鮑羅廷抵武漢，十三日，糾合部分中央人員，成立中央聯席會議，行使最高權力，以馮玉祥的代表、甫自莫斯科歸來的徐謙爲主席，用以制蔣。

馮玉祥係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自綏遠經蒙古前往莫斯科，停留約三月餘，獲得蘇俄軍火援助後返國。¹九月十六日，在綏遠五原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兵力約五萬人。十月，取道寧夏、甘肅南進，十二月擊走圍攻西安七閱月的吳佩孚系的劉鎮華軍，奄有西北，鮑羅廷增加了一枝新力量。

香港罷工爲對英國的政治鬥爭，廣州、香港在經濟上同蒙損失。北伐前夕，蔣中正謀緩和對英關係，香港當局亦欲與廣州政府言好。七月，雙方開始談判。八月蔣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申明無論何國，凡不妨害國民革命者，一切生命財產，皆負責保護。九月，廣州停止排英，十月，協議達成，長達一年四個月的省港罷工結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革命軍在長江地位穩固，英國不得不與直接接觸。十二月，新任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Lampson）訪問武漢，與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會談。陳友仁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承認國民政府。藍浦生允俟中國統一後再議。同月十八日，英國發表對華新政策十六條，同情中國的民族運動，準備修訂條約。在中國統一政府尚未成立期間，各國應採取與華盛頓會議精神相符，而適合於現勢的積極政策，立即施行法權調查書的部分建議，批准海關附加稅。國民政府對於此項表示，並不感興趣，海關附加稅如果實施，有利於北方者多於南方。

蘇俄最忌國民黨與英國妥協。藍浦生與陳友仁會晤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武漢反英運動開始。英國新政策發表第二天，鮑羅廷

¹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馮玉祥與蘇俄成立軍械借款協定，總額一千零九十萬盧布，先給予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枝，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七十二挺，大砲六十尊，砲彈五萬八千發，飛機十架。

講演反英。又二日，中央聯席會議正式議決發動。¹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民衆在漢口英租界附近宣傳，與英水兵衝突，第二天，強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國接管。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收回，²時稱爲革命外交。藍浦生主以武力重佔漢口租界，英政府以在華海軍力量不足，決一面增兵上海，一面與陳友仁談判。

武漢中央聯席會議成立之後，鮑羅廷跋扈囂張，獨斷獨行。蔣中正擬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要求停止中央聯席會議，等待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解決。武漢拒絕，高呼「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公開反蔣。一九二七年二月，經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停，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終於遷鄂，反蔣運動益爲激烈，革命軍總政治部主席鄧演達爲主要領導人。三月，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重要決議，一爲統一黨的領導機構，廢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更換組織部長，奪去了蔣在黨內的職務，並削減革命軍總司令的權力。二爲統一革命勢力，由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共同指導民衆運動，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國民黨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推翻了去年整理黨務案，正式承認中共的對等地位與共產國際的領導。從此黨政要津悉爲左派與中共人士所據，³一切聽命於鮑羅廷。

¹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輪船在四川境內撞沉中國船隻，中國官兵溺斃數十人，萬縣駐軍將另二隻英船扣留。九月五日，英砲艦轟擊萬縣，軍民死傷慘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英租界當局將國民黨員移交張作霖，鮑羅廷據以爲反英口實。

²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英國使館參贊歐瑪利（Owen O'Malley）與陳友仁商談漢口、九江租界事件，原則上允許交還。陳友仁以英軍正向上海集中，在威脅情勢之下拒絕交涉。英國外相允命英軍改開香港。二月十九及二十日，收回漢口及九江租界協定簽字。

³ 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九人，包括左派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徐謙，中共譚平山、吳玉章。吳玉章兼代組織部長，顧孟餘兼宣傳部長，陳公博兼工人部長，鄧演達兼農民部長。政治委員會委員十五人，左派佔八人，中共佔三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七人，左派佔五人。國民政府主席團爲汪兆銘、譚延闓、徐謙等，中共譚平山長農政部，蘇兆徵長勞工部。

蔣在這幕鬥爭中，處於劣勢，原因是武漢有蘇俄為奧援，因而蔣亦不得不覓尋外力支持，日本為其主要目標。一九二七年一月，由通曉日本情形，與蔣私誼至篤的黃郛、戴傳賢分別進行。黃郛代蔣向漢口日本總領事致意，盼彼此避免衝突，戴傳賢在東京盤桓月餘，屢晤外務省官員，使命似尤重要。日本首相若槻、外相幣原表示對華貫徹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促進中日邦交鞏固與經濟合作，同情並協助中國人民達到正大願望，對於中國現局，抱忍耐態度。

財政更是成敗所繫。出師之時，軍餉至為艱難，曾發行公債一千萬元，而認購者寥寥。克復江西後，得上海中國銀行張嘉璈之助，借得五十萬元，始克進兵長江下游，白崇禧、何應欽分自江西、福建攻取浙江、上海，程潛、李宗仁沿江東下，攻取南京。

時北方實力最強的軍閥為據有北京，號稱安國軍總司令的張作霖，附之者為盤據山東、直隸的張宗昌及兵敗來歸的孫傳芳。吳佩孚雖不肯低頭，然已不足輕重。張作霖命張宗昌軍防守安徽、江蘇，孫傳芳軍防守浙江。二月十八日，革命軍佔領杭州，直趨上海，工人起而響應，¹張宗昌軍敗走。三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佔領上海，二十三日，程潛佔領南京。

漢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發生後，駛集長江及中國沿海的外國軍艦多達一百七十餘艘，半數屬於英國。沿江各地外僑紛向上海撤退，集中上海的英國陸軍約一萬餘人，形勢十分緊張。革命軍佔有南京的次日（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教堂、學校、醫院、商店、住宅被劫，金陵大學副校長美人文懷恩(John E. Williams)，及英人二名，法、義傳教士各一人被殺，英國領事受傷，長江英、美軍艦向城內發砲，中國兵民死傷三十餘人，是為南京事件。據云，發縱指使者為鮑

¹ 四個月來，上海工人有過三次暴動，第一次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即浙江省長夏超對孫傳芳獨立之時。第二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革命軍佔領杭州之時。第三次在三月二十一日，即革命軍進至上海近郊之時。工人奪取警察武器，襲擊張宗昌軍。國民黨鈕永建、中共周恩來、李立三、趙世炎、陳延年等為策劃人。

羅廷及首先進入南京的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林祖涵，目的在擴大各國與革命軍的衝突，破壞蔣中正的聲譽，使其窮於應付。證以莫斯科事前對蘇俄駐北京武官的訓令，似屬可能。訓令說：「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的民族性質……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的態度，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羣衆排斥外人。……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又說：「實行此種之排外運動時，保持各國間的不調協，頗爲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量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爲特別重要。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所以南京的日本人受害最輕。

三、清黨與南京、武漢的對立

爭奪上海的控制權，爲蔣與鮑羅廷、中共決裂的近因。蔣於三月二十六日抵上海，以白崇禧爲衛戍司令。中共自行組織上海市民政府，武漢不准蔣過問上海外交財政。盛傳工人糾察隊準備強行進入租界，第一軍復有不穩消息，武漢聲言如有任意解散工人糾察隊者，以反革命論。蔣向新聞記者聲明，對於南京事件，願負責任，徹查處理，保證不以任何武力或羣衆暴動改變租界地位。國民政府將以和平協商方法，獲致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凡以友好對中國的國家，皆願與之合作。國際間對於蔣的表示，反應頗爲良好，日本外相幣原面告美國駐日大使，相信蔣堅決反對排外行動，南京事件爲激烈分子煽動所致。上海金融界的協助，關係尤大，先後借款及發行國庫券、公債一億三千餘萬元，中心人物爲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輝德、四行聯合儲備庫的錢永銘、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張、陳均江蘇籍，錢、李均浙江籍，人稱爲江浙財閥。

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四月二日，正式議決對中共首要採取

非常緊急處理，實行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去年九月起，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已展開了「迎汪（兆銘）復職」運動。四月一日，汪由法國經莫斯科抵滬，三日，與蔣會晤，五日，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告國共黨員書，勸立即拋棄相互懷疑，事事開誠協商進行。復與蔣商定，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會議。先由汪通知陳獨秀，停止中共活動，暫不承認武漢命令，上海工人糾察隊須服從蔣的指揮。武漢則命蔣尅日前往南京，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汪欲乘機制蔣，當日秘密前往武漢。四月九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電斥詆武漢中央聯席會議的種種謬舉，蔣亦責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破壞革命陣線，即日入駐南京，開始逮捕江蘇省黨部的中共委員。

四月十二日，上海駐軍強制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工人死傷三百餘，幫會出力不少。¹其他各地亦採相同行動，而以廣州最為嚴厲。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通緝鮑羅廷及中共首要一百九十餘人，但始終未處分武漢的國民黨人，對於蘇俄仍然表示友好，對於西山會議派仍然抵制，處處留有餘地。蘇俄及武漢的態度，至為決絕，共產國際詆蔣為叛徒、帝國主義匪幫的同盟、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武漢開除蔣的黨籍，免去本兼各職，下令討伐。

就轄區言，南京有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四川、貴州、雲南亦奉號令。武漢僅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為南京勢力所包圍。以兵力言，擁護南京的有長江下游的第一、第七軍，及廣東的第四（半數）、第五軍，廣西的第十五軍，合新附各軍，約十五萬人，川、黔、滇軍尚不在內。擁護武漢的為第二、第三、第四（半數）、第六、第八軍，合擴編各軍，約十二萬人。物力方面，武漢亦

¹ 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在上海下級社會勢力頗大，組織工人聯合會與中共領導的總工會對抗。四月十一日，杜月笙誘殺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十二日凌晨，反共工人先向糾察隊進攻，軍隊繼之。此後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及陳羣之逮捕中共首要，多得黃等之力。

不及南京，江、浙、廣東爲富庶之區，上海、廣州爲國際商埠，武漢位於內地，易受封鎖。加以蔣的聲望已著，有其號召力量，一般心理認爲蔣之所在，即國民政府所在，多視南京政府爲正統。

國際形勢於武漢亦殊爲不利。陳友仁對日本雖加意聯絡，四月三日，漢口日本水兵忽與華人衝突，華人死十名，傷八十名，日人死二名，日本水兵登陸，僑民撤退，情勢險惡。十一日，英、美、日、法、義五國爲南京事件，要求處罰負責指揮官及所有關係人，由總司令書面道歉，賠償損失，如無滿意答覆，將採適當手段。¹汪兆銘大感恐慌，說是反帝國運動太過，列強已結爲聯合陣線。十四日，陳友仁照覆，允共同調查，並盼日本勿參加各國行動。二十二日，日本新首相田中義一聲明，對中共引起的影響不能不問。五月九日，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演說，謂造成南京事件的共產黨已受到中國自己的處罰(指清黨)，武漢政府已失去統治地位，英國對南京政府決採取緩和政策。十七日，英國駐武漢代表責武漢政府未能實踐緩和反英運動諾言，離漢口返北京。二十日，田中令駐華日使對南京政府的反共行動予以道義支持，相信蔣中正爲收拾中國的唯一人物。

自西山會議以來，國民黨已分爲二，清黨後再分爲三。同時中國全局亦成鼎立之勢，南京、武漢之外，有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九二七年三月，張爲阻止革命軍北進，乘吳佩孚之危，派兵入豫，佔領開封、鄭州，吳落荒南走，遁入四川。對於蘇俄，張作霖恨之入骨，一九二六年九月，已將蘇俄大使加拉罕逼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得公使團默許，搜查蘇俄大使館，獲得蘇俄與國民軍、國民黨、中共有關的大批文書，拘捕匿避於蘇俄大使館內的中共國民黨黨員李大釗等六十餘人。²蘇俄指英國爲主要教唆者，北京政府爲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武漢亦同聲斥責。

¹ 四月十四日，陳友仁分別駁覆，並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日、美不贊成聯合行動，英國一時無能爲力，惟有觀望等待。

² 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等男女二十人被處絞刑，十四人判徒刑。

武漢爲衝破包圍，防禦張作霖進攻，及與西北的馮玉祥取得聯繫，以便接近蘇俄，進而攻奪北京，對南京施以反包圍，決繼續北伐，進兵河南。¹南京似窺悉武漢方面的意圖，爲對抗防範，並肅清長江北岸之敵，亦分路北進。五月，武漢北伐軍唐生智、張發奎部屢破奉軍。奉軍因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退往黃河以北。六月初，武漢北伐軍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同時南京北伐軍擊敗張宗昌、孫傳芳，佔領徐州。

第三節 國共全面決裂

一、武漢政府的危機

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衆運動的結合。武力握於國民黨之手，民衆運動大都由中共領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強調工人農民的重要，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共在湘、鄂的活動已有六年的歷史，革命軍到達之後，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尤爲迅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有農民協會的縣份超過五十，會員一百三十二萬人。十二月，全省農民協會議決減租、減押，禁止高利貸，反對苛捐雜稅。一九二七年一月，會員增至二百萬人。這年一二月間，毛澤東考察五縣農民運動的報告，謂農民已將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特權徹底打倒，農民協會成立了唯一的權力機關，「順之者存，違之者亡。」富室大家，無不被目爲土豪劣紳。²

工人運動以武漢爲激烈，一九二六年底，湖北總工會有會員三十萬人，動輒開會、遊行、罷工，有的是爲改善待遇或其他權利，有的是爲政治外交問題，不少中外工廠、商店因而閉歇，造成工人大量失業。一九二七年三月，單是漢口即達二十萬人，四月，增至三十萬人。

¹ 共產國際加派的駐武漢代表魯易（M. N. Roy）主張南下，奪回黃河，鮑羅廷主張北上，以聯馮玉祥。史達林批准了鮑羅廷的意見。

² 湖南士紳葉德輝以醜詆農民協會被殺，曾國藩的後人住宅，遭受搗毀。

復以長江下游被南京封鎖，貨運阻塞，日用必需品短缺，工廠原料不給，物價高漲。政府又集中現金，凡完納國稅，流通市面，均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鈔票為限，禁止現洋現銀出口。於是紙幣慘跌，物價猛漲，商業幾同停頓，日用必需品無從購買。財源枯竭更是致命傷。湖北每月稅收僅為過去的四分之一，湖南為五分之一，江西為二分之一。¹ 鮑羅廷不得不採行「戰畧退卻」，保護外人財產、商業及小資產階級，力戒中共的幼稚病，以期維護市場，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然而未能收效，各方依然惶惶。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² 共產國際代表魯易主張立即施行土地革命，使革命「深入」，使湘、鄂、贛基地趨於鞏固；鮑羅廷主張從緩，先完成北伐，使革命「擴大」，將華北收入勢力範圍。鮑羅廷雖有陳獨秀的支持，魯易終獲勝利。大會認為中國現時的革命，仍建築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上，工人為領導者，農民要有軍事、政治力量，全力向封建勢力鬥爭，變國民革命為土地革命，沒收所有公田及地主土地，取消地主士紳的所有權利，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組織農民自衛軍。湖南農民協會會員約四百五十萬人，湖北二百五十萬人，勢焰之熾，如火如荼。軍官大都擁有田產，家屬同受擾害，遂激起了他們的直接行動。

首先發難的為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師長夏斗寅。夏為鄂籍國民黨將領中之有實力者，北伐克復湖北有功，而無所獲。經南京策動，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乘武漢軍北入河南，率部東下，欲一舉而顛覆武漢政府。十九日，進至武昌附近，武漢大震，動員所有力量，始予擊

¹ 湖北每月稅收僅一百八十萬元，支出需一千萬元，湖南每月稅收僅七十萬元，支出需二百五十萬元，江西每月稅收僅九十萬元，支出需一百七十萬元。

² 中共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黨員約一千人，此時黨員多達五萬七千九百人。陳獨秀續任總書記兼政治局主席，周恩來、彭述之、瞿秋白、蘇兆徵為常務委員，張國燾長組織部，彭述之兼宣傳部，周恩來兼軍事部，瞿秋白兼農民部，蘇兆徵兼職工部。

退。不料另一軒然大波，起於長沙。唐生智除了權位慾外，並無政治立場。北伐之前，他以佛教的護法者自居，所部軍長何鍵則為舊傳統的擁護者。五月十九日，何的父親被長沙工人逮捕，二十一日，何部團長許克祥等解散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封閉湖南總工會、農民協會，捕殺共產黨人。是為「馬日（二十一日）事變」。二十三日，何鍵自河南要求武漢政府拿辦擾亂後方軍人之人。二十四日，唐生智命湖南省政府緩和農工與軍人衝突。鮑羅廷與中共，深感事態嚴重，以為唐生智全軍叛變，主用法律手續解決，保護工廠、商店，禁止工會逮捕脅迫工人以外之人，不許擾及軍人家屬及剝奪軍人財產土地。武漢政府初派鮑羅廷等赴長沙查辦，為許克祥所拒，改命唐生智全權處理，結果許克祥記過了事，等於對軍人低頭。同月二十九日，第三軍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勒令中共黨員離贛，停止工會、農民協會的活動。

二、武漢分共

蔣中正清黨為史達林對華政策的重大挫敗，但他仍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變武漢政權為工農革命的獨裁政權，國民黨居其名，共產黨居其實，方不致再發生類似清黨之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至三十日，正當共產國際召開第八次執行委員會之時，夏斗寅進軍武漢，「馬日事變」連續而至，於是又有「中國問題決議案」，訓令中共執行，使國民黨左派純粹的成為中共的傀儡。一為堅決的進行土地革命，由農民協會實際奪取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為國民黨的老領袖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農工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改組國民黨的現存機構，由新領袖補充。三為根除對不可靠的將領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農工，編組新軍。四為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組成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的軍官。最後是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掌握無產階級革命之權，俟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接近勝利時，即建立蘇維埃。

在軍人反共的情勢下，鮑羅廷認為目前必須遷就國民黨左派，承

認民衆運動「過火」，不僅要保護工人農民利益，亦須保護中等階級的工商業利益。魯易主張改造國民黨中央，成爲工農獨裁制。中共初時意見不一，終以魯易奉有共產國際的命令，六月四日，決定對國民黨左派表示強硬態度，要求立即討伐少數叛徒，削平湖南的反革命，宣布農工組織及中共得在湖南享完全自由，並發表告農民書，打倒許克祥，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紳。六月五日，魯易將共產國際訓令送交汪兆銘，希望會商。汪以爲這是消滅國民黨的陰謀，當天由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第二天，汪與唐生智等赴鄭州會晤馮玉祥。

在武漢與南京勢不並存的情況下，雙方皆欲爭取馮玉祥的合作。中共欲使馮爲己用，一箭雙鵰，將南京、武漢的政權一併消滅。汪兆銘於六月十日至十一日的鄭州會議中，說馮共攻南京，爲馮所拒。馮主張武漢、南京合一，共同北伐。魯易函馮，勸摧毀南京，奪回廣州，肅清兩湖、江西的反共勢力。此事不僅非馮心之所願，亦非其力之所能。¹汪爲保全武漢的地位，決定回師，自行東征，將新得的河南讓之於馮，用作北方屏障。唐生智懼兩湖地盤爲中共所奪，一力贊成。六月十三日，汪等返至武漢，唐生智、張發奎軍相繼南撤。

魯易以馮玉祥態度動搖，主張公開反馮，並發動武漢總罷工，抗議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鮑羅廷、陳獨秀一致反對。六月十五日，中共電覆共產國際，謂命令無法執行，沒收土地應暫從緩，工農民主獨裁，短期內不能完成，改組國民黨左派及拋去汪兆銘至爲不易，目前仍須與國民黨及軍事領袖維持良好關係，糾正農民過火行動，以平息軍官與左派國民黨的恐慌。鮑羅廷與魯易亦均欲拉住汪兆銘、唐生智，允給以借款，贊成東征。汪、唐知道共產國際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萬難與中共繼續合作。

鄭州會議後九天，馮玉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會議。蔣主先定武漢，馮不同意，結果是由馮致電武漢，指責中共行爲，促鮑羅廷回

¹ 馮玉祥與南京亦有接觸，馮志在華北，重返北京，雖有蘇俄的軍械援助，而軍費困難萬狀。武漢不逞自願，南京則允予接濟。

國。另與蔣聯名聲明，繼續北伐。大致說來，仍為蔣的勝利，馮亦獲得南京每月二百萬元軍餉的實惠。¹

北伐軍克復南京、上海後，統治山西的閻錫山，與蔣已有聯絡，對武漢雖亦週旋，惟不准中共在山西活動。六月六日，閻接受南京任命的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名義，不就武漢給予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勸張作霖與蔣携手。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稱大元帥，自云為孫中山的老友，對於不違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一律友視，對於甘心赤化者問罪興討，前者係指南京，後者係指武漢。

六月二十五日，何鍵在武漢對所部官兵發出反共文告。二十六日，唐生智禁止湖南民衆活動。二十七日，中共號召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為革命聯盟，對新軍閥作戰。二十八日，湖北總工會糾察隊被唐生智解散。共產國際命中共對馮玉祥宣戰，勿再信任軍人，應組織自己的武力。但認為汪兆銘較其他背叛革命者為堅定。就在此時，汪示意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兆徵辭職，親共的鄧演達首先離開武漢。中共中央連日集會，仍謀與汪、唐聯合東征，魯易則主張南征。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決定遣走魯易。七月六日，武漢政治會議通過汪的討伐南京提案，張發奎部向長江下游移動。共產國際不滿中共中央，召回鮑羅廷，命改組中共中央，退出武漢政府，暫不退出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建立戰鬥機關。鮑羅廷指派張國燾、周恩來等五人為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陳獨秀不再任事。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詆斥武漢國民黨縱容反革命軍官，決定撤回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仍根據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為中國革命而奮鬥。共產國際亦宣告武漢政府已為反革命勢力所控制，它的革命任務終了。

汪兆銘為實行東征，尚無意與中共立即決裂。但是唐生智的部將揚言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為中共東征。汪始稱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訓令為對國民黨的根本危害。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取締共

¹ 與蔣、馮有淵源的黃郛、孔祥熙為促成蔣、馮接近的有力人。

產黨案，制裁違背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派代表赴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個人身體自由。此即武漢所謂「和平分共」，以別於南京的武力清黨，時間相去僅三個月。同一天，汪得知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十六日再發通令，說是取締共產黨案係根據革命利益，執行紀律。十九日，中共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對國民黨與汪續行攻擊。二十六日，國民黨採嚴厲措置，免去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二十七日，鮑羅廷離漢口，取道河南、陝西、甘肅、蒙古，錄羽返國。¹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暴動（見583頁），武漢政府下令討伐，和平分共，終亦成了武力反共。從此國共兩黨全面破裂，水火不能容歷時四十餘年。

三、國民黨內訌不已

武漢將北伐軍自鄭州撤回湖北，準備東征，南京亦將精銳之師由徐州移往長江上游，作抵禦之計。七月二十四日，張宗昌、孫傳芳奪回徐州，蔣中正反攻無功，長江以北要地盡失。武漢恃為東征主將的張發奎，因南昌暴動，實力損折，率部回粵，東征已不可能。汪兆銘主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為南京軍事的柱石，李、白主和，何亦無意於戰，皆表贊同。唐生智陳兵鄂、皖之間，仍聲稱討蔣。李、白、何為使武漢與南京順利合一，脅蔣下野，南京政府主席胡漢民斥為「新督軍團」。八月十二日，蔣辭職出京，胡漢民等繼之而去。十九日，武昌政府宣布遷設南京。此一局面致成，一由於徐州不守，李、白對蔣離心；一由於南昌暴動，張發奎揮軍南下，唐生智別有企圖，縱令東征得成，徒授唐以擴張機會。

正當武漢政府東遷之時，孫傳芳軍約五萬餘人，自八月二十五日起，陸續渡過長江，佔領南京、鎮江間的龍潭一帶，直逼南京東北近郊。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全力抵抗，血戰六日夜，孫軍大敗，實為革命軍繼鄂南汀泗橋及南昌之役的又一次劇戰。

¹ 陳友仁同行，鮑羅廷回俄後極不得意，一度任英文報編輯，一九五三年，潦倒而死。

西山會議派並無軍隊與地盤，但在黨的方面仍有其力量。清黨後，南京與西山派雖漸趨接近，仍受抵制。武漢分共後，西山派與汪兆銘商定將武漢、南京、上海三中央黨部合而為一。九月十一日，三方代表會於上海，議決共同組織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¹蔣與胡漢民對汪不諒，拒不預會，南京、上海代表復反對四中全會，汪拂袖而去。不過中央特別委員會及新國民政府終於組成。

唐生智乘蔣中正下野，有聯合孫傳芳共取南京之說。十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命李宗仁、程潛討伐，武漢的東征一變而為南京的西征，亦為國民黨內部的第一次相互殘殺。十一月十四日，西征軍佔領武漢，唐生智逃亡。

中央特別委員會與新國民政府的基礎自始即欠穩固，汪兆銘斥為非法，蔣中正、胡漢民均不參加。汪、蔣經宋子文、孔祥熙的調停，歸於和好。²支持特別委員會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的前嫌未釋，擁汪的張發奎回粵後，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又生齟齬。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均廣西人，有桂系之稱。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發動政變，佔有廣州，桂系謂係出於汪的陰謀。二十二日，擁蔣派在南京公開反對特別委員會，與軍警衝突，發生慘案。汪謂係西山派與桂系所造成，蔣雖未明指桂系，但於西山派則嚴詞斥責。³

¹ 武漢方面的代表為汪兆銘、譚延闓、孫科、丁右任、程潛，南京為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李宗仁、伍朝樞、李烈鈞，上海為張繼、許崇智、謝持、居正、鄒魯。南京代表不承認在武漢舉行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海代表根本不承認在廣州選舉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

² 十二月一日，蔣在上海與宋子文之妹，留學美國魏斯理大學（Wellsley College）的宋美齡結婚。孔祥熙之妻為宋美齡的長姊。

³ 十一月十六日，汪邀李濟深自粵赴上海，與蔣商開四中會事。次日，張發奎驅逐代李主持廣州軍政的桂系黃紹竑，是為廣州事變。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舉行慶祝西征勝利大會，會中有人演說，打倒中央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召開四中全會，請蔣復職。繼之遊行請願，被軍警制止，死三人，傷數十人，是為「一二二」慘案。

十二月三日，蔣、汪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桂系爲廣州事變，要求查辦汪派的中央委員，吳敬恆亦提出檢舉。汪知暫難再出，提議請蔣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請其籌備四中全會。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又有中共暴動，汪更成衆矢之的，離滬出洋。張發奎雖將中共暴動平定，終不容於桂系，所部北入江西，歸蔣節制。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正式復職。二月，四中全會推爲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汪一無所獲，又逐漸走向反蔣之途。西山派亦因遭受排斥，與汪合流，國民黨合而未合，依然是分裂狀態。

四、中共武裝鬥爭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魯易已有意令中共暴動，共產國際的新代表羅明納茲（B. Lominadze）、紐曼（H. Neumann）與鮑羅廷、陳獨秀反對。及魯易、鮑羅廷回俄，中共準備利用張發奎部在九江、南昌舉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等組織前敵委員會。加倫主張俟張軍回至廣州再探行動，周恩來等堅持照原計劃執行。八月一日，張部師長葉挺、軍長賀龍及朱培德部教導團長朱德約二萬人發難，佔領南昌，¹仍張國民黨旗幟，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²日後中共定這一天爲建軍節。因張發奎、朱培德部的包圍，八月五日，葉、賀軍進

¹ 葉挺爲廣東人，初任職粵軍。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北伐時任第四軍獨立團長，後升師長。賀龍爲湖南人，來自草澤，出沒川、鄂、湘間，曾受湖南、四川軍閥招撫。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朱德（一八八六至一九七六）四川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隨蔡鍔的護國軍入川，官至旅長。一九二一年，助滇軍師長顧品珍回滇，任雲南憲兵司令、警察廳長。一九二二年，顧品珍敗死，朱走上海，曾晤孫中山、陳獨秀，旋往德國，加入中共。一九二六年返國，在川軍楊森部任職。一九二七年，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委爲南昌公安局長、教導團長，所部僅數百人。

² 革命委員會委員爲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郭沫若等，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孫中山夫人）、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陳友仁等均列名。

向廣東，沿途逃亡病死，行抵贛南，復爲國軍阻擊，僅餘八千餘人，改道閩西，進入粵東。九月二十四日，佔領潮州、汕頭，希望自海上獲得接濟，再會海豐、陸豐的農民軍進攻廣州。六天之後，爲粵、桂軍所破，全軍潰散，葉、賀及周恩來等逃往香港，朱德率留守後方的一千餘人經贛南、粵北投歸駐韶關的滇軍。

羅明納茲及紐曼爲替史達林推却在華失敗之責，消滅托洛斯基攻擊的口實，計劃根本改組中共中央，命中共於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將所有過去錯誤歸之於陳獨秀，加以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今後決以羣衆力量，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定於秋收時期在湘、鄂、贛、粵領導農民暴動。瞿秋白主持中央局，開始「布爾什維克化」，後被稱爲左傾冒險主義，是爲「八七會議」。中共說：這次會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羣衆繼續革命的戰鬥。」九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對共產國際宣布由中共領導中國蘇維埃，不再與國民黨聯合。

「八七會議」後，跟着是秋收暴動，對於湖南寄望最大。九月八日，毛澤東糾合湖南東北、江西西北地區農民、工人及來自武昌的警衛團，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約二千人，分路進攻，均告失敗。毛被捕逃脫，將殘部在江西永新三灣改編爲一團，不足千人，嚴密組織，確立黨的領導權。十月初，進入寧岡井岡山。廣東的暴動以海豐、陸豐爲重要。葉挺、賀龍在汕頭戰敗的餘衆加入後，十一月十七日成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由彭湃領導，三個月後，爲粵軍消滅。湖北、江西、江蘇各地的暴動，規模不大，爲時亦暫。

最值得重視的爲廣州暴動，其重要性不亞於南昌暴動。張發奎在廣州舉事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張太雷決相機暴動。張發奎部爲抵禦李濟深的粵軍、黃紹竑的桂軍，將主力調往西江、東江。十二月十一日，留守廣州的葉劍英教導團及警備團二千餘人，與工農聯合軍數千發動，全城爲其所有，設立廣東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代理主席。十二日，張發奎部反攻，英、法、日軍艦向市區發砲，反共的機器工

人助戰，張太雷戰死。十三日，張發奎軍奪回廣州。計三天之內，人民死者千餘，中共黨人及被脅迫參加而遇害者近五千人，工農紅軍殘部二千餘人東走海豐。史達林稱這次暴動為英勇退兵時的一戰。

廣州暴動實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及愛斯拉（Gerhart Eisler）在蘇俄領事館策動，俄國共產黨供給美金二百餘萬元。張發奎軍奪回廣州之日，紐曼等逃逸，蘇俄副領事郝史（A. I. Hassis）及五名職員被殺。十二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對蘇俄絕交，撤銷各地蘇俄領事館的承認，關閉蘇俄國營事業機構，遣去蘇俄僑民。蘇俄聲稱從不曾承認國民政府，蘇俄領事館係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撤銷承認。但是上海、漢口、長沙的蘇俄領事終不得不下旗回國，四年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已隨清黨、分共而結束，一般關係至是亦完全終止。北京的蘇俄代辦在張作霖搜查大使館後已經離去，實際上北京與蘇俄亦等於無外交關係。

第四節 繼續北伐

一、華北之戰

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革命軍的主要敵人為張作霖。張以形勢孤單，聲稱倘蔣中正能驅逐俄人，願與言好。五月，奉軍及張宗昌部分在河南及江北敗後，側面復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張作霖與蔣、閻進行妥協，如果不成，即退回東北。孫傳芳謂革命軍內訌方急，前途仍有可為。張遂自稱大元帥，孫傳芳、張宗昌大舉南侵。張作霖準備進攻河南的馮玉祥，迫閻錫山撤退石家莊駐軍。閻恐馮若戰敗，己身亦將不保，決先發制人。九月杪，閻軍分由京綏、京漢鐵路出動，旋為奉軍所敗，退回山西。¹

¹ 十月二日，閻部師長傅作義佔北京西南的涿州，堅守兩個月餘。

張作霖與閻錫山相戰之時，張宗昌軍沿隴海鐵路西進，深入豫東，十一月初，爲馮玉祥所敗。沿京漢鐵路南下的奉軍於擊退閻錫山後，進佔豫北彰德。十一月下旬，馮玉祥再敗張宗昌。十二月中旬，南京北伐軍重克徐州。馮玉祥亦於二十天後奪回彰德。

蔣中正復職後，積極部署，繼續北伐，改編長江下游各軍爲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部分編爲第二、第三集團軍，兩湖駐軍編爲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爲總司令。第一與第二集團軍的一部合攻山東，第二、第三集團軍合攻直隸。張作霖以奉軍對山西、河南，張宗昌、孫傳芳防守山東。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三集團軍失利，第二集團軍獲勝。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佔領山東省城濟南。

二、日本的阻撓與北伐結束

北伐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英國爲第一對象，日本初持靜觀態度，蔣中正亦曲意聯好。一九二七年四月，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組閣，自兼外務大臣，聲言不反對中國以合理方法，達成願望，惟不許共產黨活動。五月，北伐軍指向山東，蔣再派員赴東京謀求諒解，¹田中希望北伐軍止於徐州。不久循津浦鐵路北進的北伐軍越過蚌埠，田中以保護日僑爲名，出兵山東。北伐軍克復徐州後，暫停前進，避免日軍干涉爲原因之一。六、七月田中召開東方會議商對華政策，決定日本權益，倘有受害之處，即採斷然處置。動亂如波及滿、蒙，不問來自何方，均將加以防護，以保既得權益及解決滿蒙懸案。東三省有力者如認真講求安定該地區辦法，日本當予協助。八月，蔣中正下野，山東日軍撤退。十月蔣親訪日本，張學良同行。十一月五日，說田中以改善對華政策，與中國合作。田中反勸蔣但以統一長江流域爲宗旨，不必急於繼續北伐，彼此格格不入。

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復起，以年來預聞對日外交大計的黃郛任

¹ 北伐前夕，蔣中正欲羅致蔣方震未成。江浙底定後，蔣方震來歸，一九二七年五月，奉蔣中正之命赴東京晤田中，黃郛亦遣袁良前往。

外交部長，命暗示田中，如張作霖退回東北，革命軍將不追擊，並派諳習日情的殷汝耕爲駐東京代表。四月，北伐再度展開，蔣布告保護戰地外國僑民，特別知照上海日本領事，田中悍然不顧，同月二十日，第二次出兵山東，逕入濟南。五月一日，北伐軍佔領濟南。次日蔣與黃郛到達，就近應付對日問題，日本師團長福田彥助亦至。五月三日，日軍實行啓釁，射擊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凌辱黃郛，是爲「濟南事變」。五日，蔣離濟南，一再遣人磋商，福田要求懲辦高級將領，解除與日軍對抗部隊武裝，濟南及膠濟鐵路二十里內不准駐兵。蔣雖大致允許，日軍仍進攻不已，繼續增兵山東，軍艦紛駛長江及中國東南海口。十日，濟南不守，中國軍民死者約三千人。時張羣已到東京，田中告以不左袒張作霖，不妨害北伐進行。蔣留兵扼守濟南以南地區，命主力繞道渡過黃河。¹

日本最重視的爲滿、蒙問題與張作霖的最後態度。東方會議後，奉天日本總領事吉田茂要求東北當局解決中日懸案。傳說七月二十五日，田中曾有「大陸政策奏摺」，說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八月，北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迫張作霖允日本增修東北鐵路，張命楊宇霆與之談判。十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面晤張作霖，提出敦化至圖們江（即吉林省城至朝鮮會寧線的東段）、長春至大賚、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倫五路。十一月十二日，協議成立。田中爲使其正式化，命芳澤與北京政府談判，並勸張退回關外，意在使東北與中國分離。濟南事變發生，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張通電停戰，日方進迫益急。五月十三及十五日，除永吉至五常線外，其他四路合同均行簽訂。十七日，芳澤說張早日東歸，如戰敗始退，革命軍繼續前進，日軍即於山海關附近將雙方軍隊一併繳械。十八日，日本分向北京、南京致送覺書，聲言戰事一旦及於滿洲，日本即採適

¹ 蔣退至泰安、兗州後，除致書福田，請停止軍事行動外，先後命王正廷、熊式輝、羅家倫、何成濬往商。福田堅持道歉，懲辦三個軍團的總指揮，所部解散。六月初，蔣返南京，神情至爲痛苦。

宜而有效措置。美國宣稱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日本如有行動，須先通知美國。田中以張作霖已大致接受了他的條件，復顧慮美國的態度，決保留張的地位，五月三十一日，取消原定截擊奉軍計劃。但是關東軍已集結瀋陽，決置張於死地，使滿洲陷於混亂，一舉奪佔。六月三日，張乘火車離北京東去。次日，行抵瀋陽附近的京奉、南滿鐵路的交叉點皇姑屯橋下，炸彈突發，張與來迎的黑龍江督辦吳俊陞死之。奉天省長劉尚清密而不宣，關東軍不悉實情，未即時行動。兩週後，張學良秘密回至瀋陽，二十一日，為乃父發喪，七月四日，就任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局勢轉穩，關東軍計未得逞。

北伐軍渡河後，北趨天津，閻錫山、馮玉祥部進向北京。五月二十九日，蔣命各軍停止待命，俾與公使團商議和平接收北京、天津辦法。三十日，奉軍總退却。六月八日，閻錫山軍入北京，又四日入天津，北京政府消滅。國民政府改直隸省為河北省，北京易名北平，不再是中國的首都。

年方二十八歲的張學良在奉系將領中屬於主和的新派，與日本又有殺父之仇，欲與革命軍議和，日本總領事林久治出而阻止。張學良仍一再聲明，不妨礙國家統一，派代表見蔣，商談易幟。林久治繼續干涉，說是如南京以武力壓迫，日本可盡力相助。八月，日本特使林權助至瀋陽，大事威嚇，不許與南京妥協，否則將生重大事變，即干涉內政，亦所不辭，張學良允延期三個月。

奉軍出關後，孫傳芳部將輸誠革命軍，張宗昌軍仍盤踞天津、山海關之間，九月，為革命軍及奉軍聯合解決，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又進一步。同時英、美聲明，滿洲為中國領土，美國並否認日本在滿洲的特別權利。蔣中正再命張學良訪田中，允維持東北現狀。十一月，張學良以賀天皇加冕為名，派莫德惠赴日，續商易幟，田中不再反對。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正式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發表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政府主席，¹

¹ 熱河已於九月與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改省。

改奉天省爲遼寧省，全國統一。

西南、西北各省之歸附國民政府在東北之先。一九二五年，四川內戰又起，軍閥依舊各據一方，川東屬楊森，重慶屬劉湘，成都及川西、川北屬鄧錫侯、劉文輝。北伐軍進入湘、鄂，川軍各將領雖均受蔣的委任，惟迄不相下，而以劉湘、劉文輝的勢力爲大。雲南唐繼堯於一九二七年爲部將龍雲、胡若愚推倒，繼而龍又敗胡，國民政府即以龍爲省政府主席。部分黔軍參加北伐頗早，貴州爲周西成所有，一九二七年，名義上亦奉南京號令。據有新疆的楊增新對中央政府採「認廟不認神」主義，北伐軍克復北京後，楊宣布服從南京，不數日爲部下所戕，政權爲金樹仁所得。¹

¹ 楊增新統治新疆十七年，嘗於酒宴席上誅除異己。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樊巖南以同一方式殺楊，當日樊又爲民政廳長金樹仁所殺。

第十六章 兩種內戰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

第一節 內戰再起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爲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爲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爲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不論是何種名義，要皆爲國民黨的內部之戰，其由來並非一朝一夕。

一、動亂的醞釀

國民黨的武力，以黃埔軍校學生爲基幹的第一軍爲主，由蔣中正統率。次爲粵軍組成的第四軍，由李濟深統率。北伐前夕，增編廣西李宗仁部爲第七軍，湖南唐生智部爲第八軍，實力均與第一、第四軍相若。北伐軍進至長江流域，爭相擴充，少者一、二倍，多者三、四倍。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各樹一幟，而以馮的兵力爲大。唐生智首先携貳而失敗，李宗仁、李濟深與蔣中正又成爲兩個壁壘。一九二八年，北伐再度展開，李宗仁部趨退不前，迨奉軍敗退，白崇禧率軍由武漢兼程北進。

華北之戰以馮玉祥之功爲多，犧牲亦大，結果僅得到一個不完整的山東，直隸（河北）、北京（北平）、天津均爲閻錫山所有。一因馮的一向桀傲反覆，不易控馭，蔣不欲其勢力再行擴張。二因英、美、日惡馮接近蘇俄，不願北京、天津入於其手，蔣於外交上亦有顧慮。三因閻、馮之間早有矛盾，閻既欲向外發展，尤畏馮的威脅，因力爭聯蔣。於是馮被壓制，而生缺望，稱病請假，盛傳與閻將起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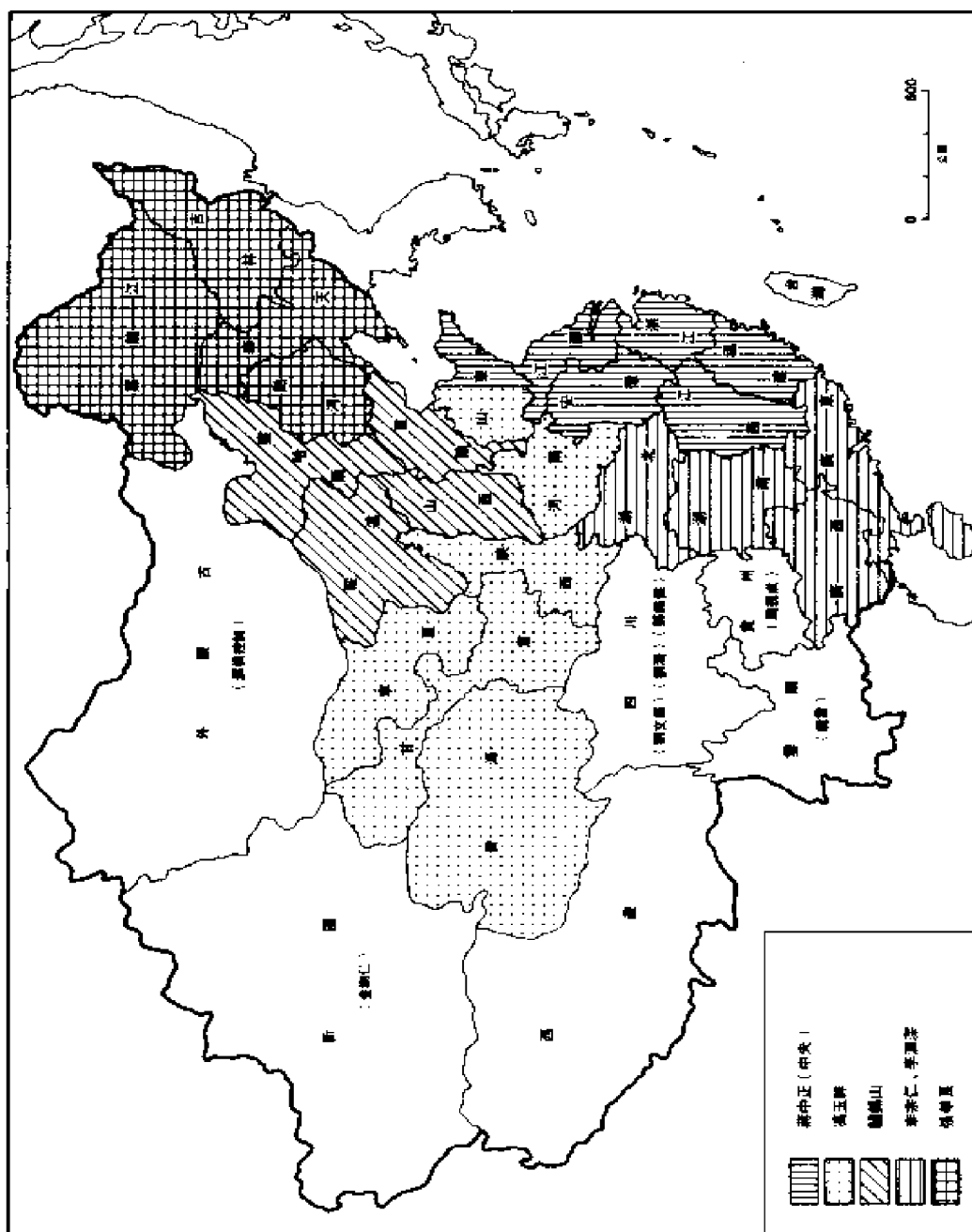
北伐前全國兵額約一百四十萬人，北伐後多達二百三十萬人，軍

餉超過國家的全部收入。北京克復後，蔣中正倡議裁軍，親赴武漢、鄭州，邀李宗仁、馮玉祥北上，與閻錫山會於北平，商整理軍事方案，決定召開編遣會議，先將四個集團軍縮減為六十個師，另編憲兵二十萬人，直隸中央政府，東北、西南、兩廣各軍，另行辦理。蔣的第一集團軍約五十萬人，馮的第二集團軍約四十萬人，閻的第三集團軍及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各近二十萬人。不久第一期改編令發表，第一集團軍編十三師，第二、第三集團軍各為十二師，第四集團軍八師。近年北方收編北方雜軍，不在其內，閻雖滿意，馮、李則大為不平。

第一集團軍駐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亦即中央直轄區。第二集團軍駐河南、山東、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第三集團軍駐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第四集團軍駐湖北、湖南及冀東，廣東、廣西與之一體。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屬於張學良，四川、雲南、貴州、新疆屬於地方軍閥。此為北伐後新的割據大勢。

國民黨初設中央政治會議，北伐後相繼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置分會，由當地軍事領袖主持，指導監督各自轄區的政治，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不僅握有地方軍權，而且名正言順的握有地方政權。一九二七年底，有人倡議「分治合作」。所謂「分治」，是為遷就割據軍人，「合作」為對中央而言，實際上是與中央對立，自非蔣所樂許。何況這時的南京政府已非往日的北京政府可比，有其較任何地方軍人強大的兵力與豐厚的財力。

軍權、政權多元，國民黨本身復四分五裂，西山會議派外，號稱正統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有汪兆銘、胡漢民、蔣中正派之別。北伐完成，準備實行訓政，由國民黨訓練人民，代表人民，行施政權。一九二八年八月，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議決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限期撤銷各地政治分會，不得再以分會名義對外發表命令，及任免該特定地區內官員。國民政府設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統一軍政、軍令、軍事教育及財政。十月頒布訓政綱領，成立新國民政府，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五院院長，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事部長，閻



圖十四 北伐後軍人統轄區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

錫山任內政部長，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長，李濟深任參謀部長，國民黨右派及軍事巨頭各予位置，惟汪兆銘的左派落空。

訓政以領導人民致力於政治、經濟建設相標榜，要實施此項計劃，須先做到真正的統一，欲做到真正統一，須先裁兵。蔣強調編遣為革命的生死關頭，希望各軍事領袖犧牲自己的權利、個人的地位，使編遣成功，軍隊有一定的編制，軍餉有一定的數目，一定的支出機關。能如是，經濟方可穩定，政治方可上軌。各軍事領袖認為蔣借統一及編遣以行削藩集權。¹一九二九年一月，編遣會議在南京舉行，劃全國分置七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為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另設一中央區，以處理雜軍，每一編遣區編留二十萬人。看來似尚公允，但中央編遣區實亦屬於蔣，加上憲兵二十萬人，蔣的全部兵額等於馮、閻、李的總和。依此規定，馮部最少裁減半數，閻部有增無減。馮主先裁將，再裁兵，裁無功，留有功，中央新收各軍尤應先裁，²李宗仁、李濟深一同附和。閻錫山時恐馮不利於己，從中挑撥。會議勉強結束，馮即逃返河南，於是又有馮將與蔣決裂之說。

編遣會議加深了軍人的相互疑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了黨人的相互敵視。汪兆銘因見損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新國民政府，³十一月，汪派在上海成立「國民黨黨務改組同志會」，以恢復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為旗幟，人稱為「改組派」。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代表多為指派，改組派

¹ 有人說此議出於楊永泰，其實削藩為中國歷代開國者常行之策。又說楊的計劃為以經濟方法解決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東北，尚有幾分近似處。楊為舊國會議員，屬政學會，曾在廣東反對孫中山。北伐後期，資緣入蔣幕，日後深得依畀，權傾一時。

² 馮一面解散非己系的豫、陝軍，一面收編民團。據說馮又要求自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委派南京衛戍司令，保薦若干部長。

³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中央委員舉行會議時，蔣中正主張准許汪派委員出席，親赴上海邀約，桂系及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等堅持不可。

嚴詞攻訐，汪派的陳公博、顧孟餘等被開除黨籍，汪亦受到警告，改組派與南京完全破裂。蔣為南京的領袖，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的親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握黨的實權，人稱CC系，最為改組派所痛惡。¹

二、討伐桂系

桂系的勢力分布南北要衝，廣州為李濟深，加上廣西黃紹竑，武漢為李宗仁，輔以胡宗鐸、陶鈞，白崇禧屯兵天津、唐山一帶。蔣中正與桂系久有意見，彼此有難兩立之勢，胡、陶尤為驕悍。²一九二八年秋，李宗仁大事擴軍，白崇禧統率的部分軍隊亦調回武漢，並有聯結奉軍總參議楊宇霆之說。³蔣亦作部署，準備派兵西上。編遣會議召開之時，白託病不至，八次呈請辭職。

湖南位於武漢、廣州之間，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譚延闓舊屬。桂系欲將兩廣、湖北聯為一片，暗結湖南師長何鍵，謀去魯滌平。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胡宗鐸假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將魯免職，派兵佔領長沙。李宗仁時在南京，當天秘密走上海，命武漢備戰。⁴蔣知

¹ 陳果夫、陳立夫為陳其美之姪。陳果夫初習軍事，後在上海經商。陳立夫習礦冶，曾留學美國匹茨堡大學。一九二五年，陳果夫始參與黨務工作，陳立夫擔任蔣的機要秘書。CC系據說為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或二陳姓氏的縮寫，日後正式組織「青白同盟」。

² 胡宗鐸、陶鈞為李宗仁部軍長，分兼湖北清鄉督辦、會辦。一九二八年六月，蔣過武漢赴北平，胡、陶拒不與見。蔣閱兵時，胡公然指摘中央。

³ 楊宇霆頗有智畧，深得張作霖倚重，對張學良心存藐視。一九二八年九月，楊兩次與白崇禧會於冀東，謠傳楊助白抗蔣，白助楊取代張學良，復有聯交日本之說。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前張作霖顧問日人町野武馬與楊談東北鐵路問題，第二天，張學良殺楊及與楊接近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常蔭槐。

⁴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胡宗鐸、何鍵到北平晤白崇禧，二十八日，桂軍自湖北入湖南岳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何鍵撤回圍攻井岡山的湘軍，二月二十五日，李濟深、黃紹竑會於梧州，皆與湖南事變有關。

非和平可了，令中央軍出動，號為「討逆軍」，¹吳敬恆等約同自廣州北來的李濟深調解。胡宗鐸等責中央軍西進，聲言將「迎頭痛擊。」三月二十日，蔣發表演說，斥其「擅自調兵，違背編遣會議決議，破壞統一，不得不加以制裁。中央對地方只有命令，不容所謂調停。」又說：「地方高級軍事領袖多屬中央政府人員，當羣聚首都，共謀國事，乃自放棄責任，逃返地方，反誣中央負責者為把持、為獨裁。近日各將領通電，多曰服從中央，又曰和平，事實則違抗中央，所謂服從皆為虛名，反抗乃其事實，所謂和平只是橫行武力。革命險象已至於極，必須以全力維持中央威信，保障國家統一，為適當處置。」不僅為對桂系而發，且兼指所有地方領袖。「適當處置，」就是軍事制裁，無異是一篇武力統一宣言。地方以武力對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三月二十一日，李濟深被禁，二十五日，戰爭開始，二十六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令，時距全國統一尚不到三個月。蔣親行督師，中央軍約十六萬人，桂系約十萬人。

瓦解桂系內部為蔣的主要策畧。屯駐天津、唐山一帶的白崇禧部五萬人，原屬唐生智，白擬率之由津浦鐵路經山東進攻徐州、南京。唐生智受蔣之命，以一百五十萬元的餉銀及「打倒桂系，返回湖南」口號，收回了舊部。三月初，白狼狽出走。白的另一計劃為放棄武漢，全部退入湖南，再合自廣東、廣西北來的粵、桂軍，與蔣決戰。胡宗鐸、陶鈞戀棧不從，李宗仁無法西歸。李濟深被扣後，粵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經胡漢民勸說，逼走黃紹竑，武漢桂軍失去了南北策應，陷於單獨作戰。不料內變又生，桂系自有湖北之後，胡宗鐸、陶鈞以鄂人掌握軍政財政，私囊充盈，桂籍將領大為不平，說是「廣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發財。」蔣以對白崇禧、李濟深的同一策畧，施以分化。俞作柏，初與李宗仁同起廣西，後遭排斥，至是蔣用以運動桂軍師長李明瑞等歸附中央。四月四日，胡宗鐸、陶鈞下野，中央軍佔領武漢。這次戰爭，政治運用實多於軍事行動。

¹ 此後中央軍均冠以討逆名號，以示討伐反抗中央政府者的決心。

桂系在華北、華中、廣州失敗後，僅剩下黃紹竑的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據以與蔣繼續對抗。蔣命粵軍、湘軍分道進攻，李、白先發，東入廣東。五月，粵、桂軍激戰於廣州附近，桂軍大挫。六月，李明瑞會同粵軍續進，桂軍紛紛投降，李、白及黃紹竑出亡，廣西為俞作柏所有。

三、護黨救國軍的起伏

經過編遣會議，蔣與馮玉祥的關係已到不易維持的地步。蔣與桂系行將決裂之時，雙方均欲爭馮的支持。馮命韓復榘、石友三兩軍進駐豫、鄂邊境，謀坐收漁利，以桂系尋即戰敗，毫無所獲。山東問題使蔣、馮的關係更為緊張。是年一月，中日開始談判濟南事件，爭執不下。南京以準備對桂系用兵，對日本大事讓步，三月十八日解決，中國放棄賠償、道歉要求，日本允於兩個月內退兵，由馮系的山東主席孫良誠負責接收。蔣平定武漢後，變更辦法，不許孫良誠接收膠濟鐵路及青島，顯係不願馮有海口。馮以閻錫山助蔣，恐陷於夾擊，為集中兵力，令孫良誠部星夜撤回河南，韓復榘、石友三兩軍同時北退，中央軍亦向山東、河南出動。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汪兆銘的改組派以「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李宗仁首在廣西稱護黨討賊軍南路總司令。十五日，馮部將領宋哲元等推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外交用人不當，馮亦責中央違背編遣會議，要求蔣一同去國。二十日，蔣列舉馮的罪行，馮斥蔣破壞黨章，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國。出乎他的意外，他的主將韓復榘、石友三採取四年前他對吳佩孚的行事，竟然背叛，宣布服從中央，¹馮的武力討蔣，遂成不可能的事。

¹ 馮為立威，對於部將動輒責罰，或言語諷刺，韓復榘貴為河南省政府主席，亦所不免。馮為集中兵力，命韓西退，韓不願放棄河南，自請與孫良誠、石友三進攻武漢、南京。馮認為近於孤注一擲，嚴詞申斥不准。是年四月，韓曾到漢口見蔣，受到渥遇厚贈，於是遂合石友三叛離。

閻錫山時恐馮玉祥不利於己，與蔣深相結納，蔣亦多方籠絡。及蔣與馮反目，命閻節制華北各軍。閻爲促成馮的反蔣決心，使與蔣兩敗俱傷，反以蔣的軍事計劃洩之於馮。韓復榘叛變，馮已不能有爲，閻計未得售，轉而勸馮忍耐，解除兵權，前來山西，偕同出洋，用意則在挾以操縱馮的餘部，不令盡爲蔣得。馮以衆叛親離，祇好勉從。六月，自陝西至太原，遂失去自由。

第四師師長張發奎、新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爲助蔣討伐桂系的有功人物。張發奎原與汪兆銘近，俞作柏與改組派交往亦密，兩人均參加了護黨運動。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張通電主張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率領所部二萬餘人，自湖北宜昌南去。二十七日，俞作柏獨立，稱護黨救國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¹汪兆銘正式宣布討蔣，主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職權，不承認本年二月後南京的一切命令及決議案。俞作柏並不能掌握廣西各軍，復受粵軍攻擊，迅告失敗，廣西復爲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得，聯合張發奎共圖廣東。

退集陝西的馮玉祥軍由宋哲元、孫良誠統率，仍有二十萬之衆，惟給養無着，經蔣派人商洽，願接受改編。閻錫山大爲恐惶，九月十七日，與馮面商，決聯合張發奎共同倒蔣，馮求之不得。十月十日，以宋哲元的名義自太原發出通電，擁閻、馮爲總副司令。閻仍採兩面政策，對馮不許他返回軍中，挾以要脅南京，對蔣允出兵相助，借以勒索軍餉。十月二十六日，宋哲元等與政府軍戰於豫西。十一月一日，馮告外國記者，此次戰事責任，自負十分之六，閻任十分之四。四天後，閻接受南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的任命。當天路透社又發表馮的談話，謂與閻完全合作，一致討蔣。閻極爲尷尬，再三否認，稱病不出，將馮實行幽禁，扣留馮部彈藥。十一月中旬，宋哲元戰政府軍不下，退回陝西。蔣以東北有對蘇俄之戰，南有對桂系之戰，不旋踵又有出乎意料的大變，無暇追擊馮軍。

唐生智於豫西之戰，頗爲出力，蔣倚畀不疑，命在豫各軍悉歸指

¹ 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準備響應，事敗被拘。

揮，並代行總司令職權。唐野心不死，與汪兆銘既有淵源，與閻錫山亦有聯絡，但深惡馮玉祥。宋哲元退兵後五天，十二月一日，唐在鄭州通電反蔣，擁汪、擁閻、聯張(發奎)，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第二天，背馮投蔣的石友三在南京對岸的浦口響應，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¹河南韓復榘及部分政府軍將領的態度爲之動搖。石友三舉兵後，率部北去。唐生智欲重有鄂、湘，自鄭州南下，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爲政府軍大敗於豫南，二次出亡。

張發奎與桂軍聯絡後，直趨廣州。十二月中旬，爲粵軍及中央軍所敗，退向廣西，粵軍追蹤而來，雙方勝負相當，護黨救國軍已近尾聲。此後南北反蔣運動雖進入最後高潮，然已不再張護黨救國旗幟。

第二節 聯合反蔣

一、反蔣派的大聯合

閻錫山於馮玉祥的反蔣戰爭中，縱橫捭闔，大有所獲。唐生智的叛變，縱非出於閻的教唆，最少又授以操縱的機會。閻主張黨事由黨員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武力應居於服從多數地位。此時蔣的處境至危，更不得不屈意相就。等到閻遂了他的初步慾望，對蔣表示唯命是從，出兵豫北，²實則與唐生智暗通。報紙傳說，閻的此舉，意在對蔣。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閻親到鄭州，準備採取進一步行動，但是唐生智的大勢已去。閻自知年來所作所爲，遲早必爲蔣所不容，乃積極招

¹ 唐爲中央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石爲十三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蔣命石率部援粵，集中浦口待命。石擬乘蔣前來檢閱時予以劫持。蔣以故未至，石知事洩，遂叛。唐叛變後，致蔣電報仍稱「職」，石叛變後，以爲南京已有準備，不敢渡江。胡漢民戲爲一詩，有「造反猶稱職，退兵不渡江」句。

² 蔣先後派吳敬恆、李煜瀛、何成濬赴太原，由何成濬經手付給閻的軍餉，約在千萬元以上。

納反覆的軍人，結好反蔣的黨人。¹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蔣電閻論當前局勢。第二天，閻異想天開，約蔣「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說是武力統一不易成功，應以「禮讓爲國，」揭開了由閻領導的倒蔣第一幕。蔣答以革命救國爲義務，不容諉謝，對於憑藉武力，謀危黨國者，惟有武力制裁。閻說戡亂不如止亂，下野後可使攻擊者無目標，無藉口。蔣發表談話，謂出處進退，一以黨國命令爲依歸，在目前困難萬狀之下，決心不顧成敗利鈍，爲黨戡亂，爲國除奸。行政院長譚延闓、立法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長王寵惠亦責閻出爾反爾。此後雙方的電報戰，歷時月餘。蔣斥閻以禮讓爲名，爭奪爲實。閻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爲蔣個人的大會，編遣、討伐皆蔣一人的命令。二月二十六日，蔣對閻作最後忠告，結束無益的辯論，閻說「只好各行其心安。」

閻素稱老謀深算，此次弄巧成拙，再無迴旋餘地，不得不挺身而出。李宗仁、張發奎請他武裝迫蔣引退，汪兆銘勸他以武力對蔣制裁。二月二十三日，閻率領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福建、察哈爾十一省，四十五將領通電，主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組織臨時幹部會議，成立第四屆中央或由全體黨員總投票，完成整個的黨。二十五日，閻親迎三個月來被軟禁於晉北五台縣（閻的故鄉）的馮玉祥至太原，派兵進向山東，東北的張學良、河南的韓復榘，因蔣的運用，均倡導和平，使閻大爲驚愕。尤令他恐懼的爲馮部將領的態度。宋哲元等痛憤去年反蔣之戰，中途爲閻出賣，重謀與蔣言好，他們之不參加唐生智的叛變，原因即在於此。唐生智失敗，宋哲元等請蔣接濟餉械，全力攻取山西。蔣亦調兵遣將，準備摧毀閻的根本。閻爲緩兵之計，電蔣辭職，急撤已入河南、山東的晉軍，先圖自固。三月七日，與馮玉祥最後商定，誓言一致倒蔣，不再

¹ 閻到鄭州後，委任韓復榘等爲中華民國軍各路總指揮、司令，並縱唐生智出走。返太原後，派代表赴上海與西山會議派、改組派聯絡。西山派反蔣最力的爲鄒魯、謝持、許崇智、居正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居正在上海以煽動軍隊被捕。

返顧，並予馮現款八十萬元。三月十日，馮由太原馳抵潼關，收回軍權，不顧部下的反對，定要與閻聯合舉兵。¹一年以來變幻莫測的反蔣行動，現在算是步調一致。

二、罕有的內戰

這次反蔣運動，聲勢空前浩大。以領導人論，軍事方面，包括前國民革命軍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黨務方面，包括國民黨左派（改組派）、右派（西山派）。以兵力論，閻、馮各約二十萬人，李宗仁、張發奎約七萬人，加上附從的石友三等的二十萬人，總計不下八十萬之衆。以地區論，有河北、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察哈爾、廣西九省，北平、天津兩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

南京方面可說是蔣獨力奮鬥，胡漢民、譚延闓在軍事政治上亦各有相當的影響力，可用之兵約六十餘萬人，統轄的範圍爲江蘇、浙江、江西、湖北、山東、福建等八省，上海、廣州、漢口三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三省，近乎中立，名義上仍奉南京爲中央。蔣直接所統各軍，比較精銳，裝備武器在反蔣軍之上，復有空軍、海軍助戰。長江各省及廣東的財力，更非華北、西北所及。²至於人心，十餘年來人民飽嚙戰禍，北伐期間，蔣的威望已經建立，克復北京之後，立時倡導裁兵，即令別有居心，要爲名正言順，事所當行。閻、馮以往的歷史，衆所共知，無論如何措詞，究難令人置信，認爲不脫軍閥行徑。一朝獲逞，勢必互不相下，又回到割據局面。如果能保全一個中心力量，有一個較爲強固的中央政府，國家社會可望安定，終勝於無休止的廝殺。具有此項資格，可能實現人民的最低願望的，不得不推蔣所領導南京政府。江浙財團對蔣的一力支持，實有其故。

¹ 馮到潼關時，宋哲元等正會議進攻山西，馮堅決反對。

² 時北平、天津英文時報刊出一幅頗有意義的漫畫，蔣一手握機關槍，一手捧銀元；馮一手執大刀，一手捧窩窩頭；閻一手執手榴彈，一手托算盤。雙方的勝負可以想知。

閻的「禮讓爲國」，好像是想使堯舜之事重見於今日，他亦明知絕無可能。蔣得閻的來電後，立將主力部隊集結於津浦、平漢兩線南段及隴海線東段。二三月間，先進攻與閻勾結的魯南、皖北、豫東駐軍，以固徐州外圍。閻舉棋不定，忽進忽退，軍事部署落後一着。三月中旬之後，馮軍由陝西進向豫西與豫、鄂之交，閻軍再入魯北。四月初，閻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海陸軍總司令，指蔣專橫獨裁，挾黨部以作威福，決陳師中原，以救黨國，馮與李宗仁分就副司令。南京正式宣布閻的罪狀，通令緝拿。五月一日，蔣誓師討伐。馮駐鄭州主持前方軍事，蔣奔跑於徐州、漢口、豫南、山東之間，席不暇暖，躬自調度。

此一罕見的大規模內戰，通稱「中原大戰」，可分爲河南、山東、湖南三個戰場，而以河南爲中心，次爲山東，再次爲湖南。河南又分爲隴海鐵路東段，平漢鐵路南段，而以隴海線爲決戰之區。反蔣軍以馮部爲主力，輔以閻軍及石友三軍，謀一舉而奪取徐州，再下南京，對平漢線採守勢。政府軍（討逆軍）的精銳，亦悉萃於隴海線，謀直搗開封、鄭州。平漢線政府軍成分龐雜，¹擔任助攻，阻馮、閻軍南窺武漢。五月十二日，隴海線政府軍，開始攻擊，佔領歸德，進與馮、閻軍劇戰於開封東南地區。馮、閻軍堅守陣地，相持不決。平漢線政府軍觀望徘徊，不肯力戰。

閻軍爲策應隴海線之戰，循津浦線北段南攻山東，分自濟南以東、以西渡過黃河。山東政府軍總指揮韓復榘但圖自保實力，六月二十五日，放棄濟南，退往膠東。閻軍續佔泰安，深入魯南。隴海線馮、閻軍乘機進攻，政府軍一再後撤，改取守勢。七月初，馮軍夜襲，直逼蔣的總部所在地（歸德沂河），另支沿平漢線前進，政府軍兩路不利。

南方反蔣軍圍粵失敗，粵軍西入廣西，湖南、雲南出兵會攻。河南戰起，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改變戰畧，以主力北入湖南，與馮、閻呼應。五月，張軍與桂軍乘虛疾進，六月五日，下長沙，十日，下

¹ 大都爲孫傳芳、張宗昌舊部，由何成濬指揮，何係政治軍人，長於撫綏羈縻。

岳州，武漢震動。政府軍分由廣東、江西、武漢赴援，張、桂軍不過數萬人，急劇南撤，岳州、長沙復為政府軍所有。七月，粵軍大捷於衡州，張、桂軍損失慘重，敗回廣西。

濟南失守後，蔣移隴海線軍於津浦線，加調在湖南獲勝的粵軍北來，合力反攻。八月初，大破閻軍於山東泰安附近的大汶口，閻軍損折三萬，十五日，退出濟南，此為政府軍的一大勝利。¹隴海線馮軍再度進攻，劇戰七日，以山東閻軍潰敗，無功而退。加以豫東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戰事暫為停頓。九月初，政府軍轉返隴海線，準備總攻。

以往雙方為陣地戰，馮軍深溝為壘，不易突破，這時政府軍改編為縱隊，避堅不攻，乘隙向開封、洛陽挺進。未幾，張學良出兵，直趨天津、北平，戰局全部改觀。

三、擴大會議

反蔣派與南京唯一的一致點是擁護國民黨黨治，不同處是一方否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方堅持其為合法。反蔣派領袖在國民黨中，以汪兆銘的資歷最深，倡導護黨最先。一九二九年九月，汪派宣言，主由廣州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行使職權，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此次舉兵以反對第三次代表大會為名，但為聯合西山派，並不完全支持改組派的主張，因為西山派亦有在上海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向不承認改組派所說的第二屆中央委員。一九三〇年三月，閻的代表邀集改組派陳公博、王法勤，西山派謝持、鄒魯，會於北平，建議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共組中央擴大會議，雖說是調解兩派的爭執，亦是為自己設想。閻、馮與改組派均指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但是閻、馮的中央委員資格則是由這次大會取得的。中央擴大會議如不包括第三屆中央委員，他們就無從參加此一最高權力機關。改組派雖不反對，惟以正統自居，西山派主彼此平等。閻左祖西山派，

¹ 閻軍多嗜毒品，將海洛英置於紙煙一端吸食，時陰雨連綿，紙煙火柴潮濕，不能點燃，官兵癱疲疲倦，遂至大敗。

對改組派初頗冷落，終以急於組織政府，轉勸西山派讓步。七月十三日，妥協達成，改組派以廣州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提議召開中央擴大會議，西山派以上海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宣言贊成。當日由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謝持、鄒魯等三十人另發宣言，將改組派、西山派與閻的主張溶而為一。宣言中先責蔣背叛黨義，篡竊政權，託名訓政，以行獨裁專制，剝奪人民公私權利；次為於短期內依法召集國民會議，以「整個的黨返之同志，統一之國返之國民。」

七月二十五日，擴大會議通過以黨建國的基礎條件，大都出於汪的手筆。一為籌開國民會議，以職業團體為構成分子。二為制定基本大法，確定政府之組織，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三為民衆運動與組織，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階級混鬥禍端。四為各級黨部對政府及政治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五為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六為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應集中人才，以收羣策羣力之效。七為採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汪又發表聲明，國民黨不限制其他政黨。此乃由於近年南京高唱「黨(國民黨)外無黨」，不容異己，自由人權復備受壓迫束縛，社會人心憤怨，時有指摘，¹汪乃標榜民主、法治，以博時譽，雖未必具有誠意，亦鮮實現可能，要不失為開明之舉。

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平成立。第二天，閻軍大敗於山東，擴

¹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後，對於反共的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繼續取締，梁啟超一派仍備受壓迫。一九二八年八月，青年黨領袖曾琦致書國民黨，責一黨專政。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啟超病卒，蔡元培以梁生前對於中國學術頗有貢獻，請政府下令褒獎撫卹，胡漢民謂與黨的立場衝突，指梁反革命、反國民黨，事遂不行。是年三月，與梁有淵源的中國憲政黨，函勸國民黨取消黨治，速開國民會議。五月，國民黨禁止紀念「五四運動」，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七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九月，教育部去文警告，被胡退回。國民政府又通令各機關職員，先儘黨員任用，裁員先裁非黨員。一九三〇年一月，胡適等出版《人權論集》。二月，上海有「自由大同盟」，三月魯迅等有「左翼作家大同盟」。

大會議仍積極進行組織政府。九月一日，推閻爲國民政府主席，九日就職。不到十天，閻離平返晉，北平的國民政府即告結束。

四、反蔣軍的瓦解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爲反蔣派與南京政府共同爭取的目標。張因中俄中東鐵路之戰，對南京至爲不快，但無意加入反蔣陣線，依違兩可，坐觀其變，比較上則傾向南京。一因中東鐵路問題未了，日本圖謀東北方急，有賴南京代爲應付。二因張對蔣頗爲欽慕，而與閻、馮則有宿怨，特別是對馮。三因南京的兵力財力均較反蔣派爲雄厚，所許給的報酬復較反蔣派爲優，反蔣派如敗，他尤易於向關內擴張。一九三〇年三月，張通電主張息爭，勸蔣、閻領袖羣倫。看來似不作左右袒，但同時增兵山海關、熱河，予反蔣派一大威脅。反蔣派推張爲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始終不受。南京與反蔣派代表龐集瀋陽，游說活動。¹六月，張屢電閻、馮，願事調停，雙方撤兵，以鄭州爲緩衝區，公開政見，以備中央採行。同月，南京授張爲陸海空軍副司令，彼此顯已有了諒解。閻軍佔有濟南後，南京促張出兵，張表示俟政府軍奪回濟南，允爲考慮。七月，張自瀋陽去葫蘆島，接見蔣的代表而拒晤閻、馮的代表。

八月，政府軍大破閻軍，張學良自葫蘆島進駐山海關內的北戴河。²不數日政府軍克復濟南，張回至瀋陽。九月五日，對山海關駐軍下準備動員令。閻知情形不佳，允以北平政府部長半數歸張支配，作爲贊助的交換條件，否則請張出任調停。如俱不能辦到，自願率部歸晉，以河北委諸馮玉祥，隱示張不一定就能得到北平、天津。九月十八日，

¹ 蔣的代表有張羣、吳鐵城、方本仁、李煜瀛，閻的代表有賈景德、孔繁蔚，馮的代表有薛篤弼、鄧哲熙，汪的代表有郭泰祺、陳公博。張羣、吳鐵城手腕靈活，據云吳携款二百萬元，廣交張的左右。閻、馮的代表困於資斧，難以施展，據孔繁蔚云，閻僅予五千元。

² 北戴河駐軍部分將領受南京運用，準備行動不成，北平、天津盛傳張學良死訊。

張電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南京中央措置。閻以大勢已去，宣稱政府軍使用毒氣，「惟有退避三舍，以全民命。」十九日，張軍沿北寧鐵路西進。二十日，北平反蔣派人士倉皇出奔。張出兵之前，負責指揮的軍長于學忠建議兩個方案：一為由熱河直趨張家口、大同，根本解決閻軍；一為預先通告閻軍，命和平讓出北平、天津。張為留有餘地，採取後者。二十一日，張軍入天津，二十二日入北平，閻軍退回山西。南京以五百萬元匯往濟陽，作為張軍的開拔費，並以張部將領分任北平、天津衛戍司令及河北省政府主席，張亦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地位僅次於蔣，這是張在反蔣內戰中的收穫。

東北軍入關的前夕，政府軍在河南大舉反攻，閻錫山令所部後撤。馮玉祥集結兵力於開封、鄭州，作困獸之鬥。但軍心搖動，各謀出路，有的向政府投誠，有的向豫北、陝西退却。十月初，政府軍佔領開封、鄭州，續佔洛陽，十一月一日，佔西安，馮與殘餘之衆入山西。

閻於退出平、津後，對蔣舊事重提，又有共同下野要求，跡近兒戲。所部後撤之時，既有馮軍為之掩護，張學良復不為已甚，故得安全退歸山西、綏遠，只是失去了兩年前所得的河北、察哈爾。犧牲最大的是馮，所部僅餘十分之一二，從此一蹶不振，閻則終又再起。汪兆銘到太原後，加緊完成約法草案，擴大會議總算有一交代，於十月二十七日，宣告解散。汪取道平、津，復去香港。閻揚言釋權歸田，仍不肯離開山西。南京再三逼迫，張學良允保證他個人和晉軍的安全，始於十二月底，東往大連。晉軍十萬人，馮軍三萬人，由張學良收編。

桂軍及張發奎部自湖南收回廣西後，粵軍、滇軍分自東西夾擊。滇軍雖被拒退，全局亦不可為，由黃紹竑出面與政府接洽。十二月，李宗仁、白崇禧離桂，反蔣軍全部瓦解。

這次內戰，雙方動員一百四十餘萬人，為時八個月，傷亡二十五萬人。身與其事的人曾說：「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人民身家生命財產的損失，無從得詳，據當時報紙的報導，可窺一斑，而以河南為烈。戰爭初起之

時，河南全省一百十二縣，受旱災者一百零四縣，被匪患者七十六縣，罹兵災者二十八縣，災民一千五百五十萬人，每日餓死一千人。是後數月，有加無減。豫東「戰溝縱橫，屍骨遍野，禾稼未收，房屋倒塌，十室十空，疾疫流行，滿目悽涼。」至於政府財政，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央軍政費已負債一萬三千八百餘萬元。戰爭時期，每月軍用約一千五百萬元，全恃發行公債爲挹注。所可知者，有編遣公債五千萬元，捲煙公債二千四百萬元，善後庫券五千萬元，稍後有鹽稅短期庫券八千萬元，合計二萬萬餘元，大多由上海銀行界認銷。閻、馮的軍用，雖不若南京之巨，爲數亦甚可觀，除發行公債外，並有戰時通用票，及向銀行強迫的抵押借款。

五、廣州獨立

反獨裁爲反蔣派的最大口實，擴大會議特別強調民主、法治，立即着手起草約法。十月三日，蔣爲順應時勢，自河南軍次電請中央黨部，於三個月內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召開國民會議案，頒布憲法日期，並決定在憲法頒布以前，制定訓政時期通用之約法，準備以國家政權奉還國民，謀副全國人民的期望。另電請國民政府於軍事大定後，大赦政治犯，共產黨人自新者，於三年後赦免。跟着又宣布在不違背三民主義原則的範圍內，儘量容納國民意見。

擴大會議轉移至太原後，明知一切絕望，汪兆銘仍加急趕成一部約法草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存心與蔣競賽，頗獲輿論佳評。十一月十二日，擴大會議發表最後宣言，就兩點說明約法的重要，迫南京採行。一是訓政以來，忽畧促進民權的基本條件，人民生命、財產、自由，失其保障，中央與地方制度亦未劃分，一任互相攘奪。二是政府未依法產生，不依法遞嬗，復不肯頒布約法，人民無依法監督政府之途，失望憤激，而致橫決，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要想永息內戰，必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一切設施，以法律規定爲範圍。『倘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除異己爲得計，以窮兵黷武爲能事，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所論

雖一面之詞，要不可以人廢言，確能道出不少人的心聲，引起共鳴，蔣不能完全置諸不顧。

胡漢民與蔣為中央政府的二大柱石。胡為國民黨元老，言行嚴正，對於主義、政綱、法紀持之至堅。蔣的早年資歷不能與胡比擬，但已成中心力量。蔣的約法主張，事前未謀之於胡，且未待中央黨部討論逕自公布，胡大不謂然。加之五年以來，胡對汪兆銘深惡痛絕，制定約法出於汪的號召，更不願拾其牙慧。秉性冲和的譚延闓為胡、蔣之外的第三首領，是年（一九三〇）九月去世，胡、蔣之間失了緩衝疏導。十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由於胡堅決反對，只通過召開國民會議，不言制定約法。蔣百戰元戎，以政府主席之尊，竟為胡所扼，而不能施行自己公開宣布的主張，聲譽不免有損。胡亦自視甚高，固執己見，以往與蔣的見解又往往相左，不滿於胡者，從中構陷，兩人衝突，卒不克免。¹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蔣、胡再商約法問題。胡謂約法無裨實際，仍主從緩制定，詞鋒至為嚴刻，蔣難再容忍。二十八日，責胡反對政府，勾結蔣的政敵，運動軍隊，破壞行政，阻撓約法。²胡不稍讓，逐一駁斥，情緒激昂，遂被幽禁於南京東郊湯山，無異一次政變。三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准胡辭職，國民會議得制定憲法，即日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時距聯合反蔣的大戰的結束僅四個月。

孫中山卒後，蔣的權勢逐漸升高，許崇智、汪兆銘相繼遭到排擠，一向在國民黨居優越地位的粵人，早有不平之感，至胡漢民被禁而決裂。三月五日，廣州軍事當局陳濟棠請蔣對胡愛護，以免內憂。時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連電請辭，司法院長王寵惠、鐵道部長

¹ 蔣擬以國民政府委員、陸海空軍副司令昇張學良，胡反對無效。十一月，張來南京，以非中央執行委員列席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並被推為政治會議委員，內政部長亦由張薦舉，並以東北要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政治會議委員，胡皆以為不可，蔣以去就爭。胡最惡蔣所倚重的楊永泰、張羣，亦不喜參與蔣的大計的吳敬恆、李煜瀛，自不免影響其與蔣的關係。

² 時傳國民會議將制定總統選舉法，胡與粵軍相結，欲與蔣爭總統。

孫科留滬不歸，均為對蔣的抗議。李宗仁、白崇禧乘機復返廣西與廣東聯合。四月三十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通電劾蔣，汪兆銘與粵軍將領分別響應。南京方面的大老和將領紛起辯駁，照例又是電報戰。五月二十七日，反蔣的中央委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有似北平的擴大會議，自立政府。十七名國民政府委員中的十一名為粵人，唐紹儀、汪兆銘、孫科、鄒魯、陳友仁等均在其內，餘為李宗仁、唐生智等，可視為反蔣派的又一次聯合，不過聲勢不及去歲，廣東、廣西之外，應者寥寥。

當廣州、南京相互攻訐之時，五月，國民會議在南京舉行，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勸告廣東軍民擁護和平統一等案。時江西等地共產黨勢張，政府軍不利，蔣一面勸全國將士戒除內戰，一面剿滅「共匪」。六月，南京復推胡漢民、李濟深為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借以安撫廣州，有化戾氣為祥和的可能，孰料華北又起廝殺。

石友三擁兵數萬，朝秦暮楚，一變再變。此時盤踞河北石家莊以南，與廣州相通，並受日本關東軍策動，七月，揮軍北進，謀奪北平。廣州政府下令討蔣，八月，日本飛機送閻錫山回晉，但石友三已被東北軍解決。粵、桂軍仍進向湖南、江西，蔣亦決定迎擊。眼看又是一場戰爭，因瀋陽為日本襲據，不得不進行和解。

第三節 中共武力的發展

如將北伐後的內戰，與辛亥革命後的內戰作一比較，頗多相似之處。辛亥革命是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領導，實際上與之對抗的為北洋派，結果歸於妥協，政權為北洋派所得。不久雙方決裂，而有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繼之而起的為北洋派內部之戰，最後仍為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即北伐。國民黨勝利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北洋派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北伐初由國民黨與中共携手進行，因中途乖離，而有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國民黨取得政權，內部循環之戰不休，最後又成為中共對國民黨之戰，即中共所指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共崛起的最大原

因之一為國民黨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國民黨初視中共的反抗為癬疥之疾，星星之火，不及二年，竟成膏肓之病，燎原之勢，中共的紅軍遍布大江南北、華中腹地。南京政府能戰敗閻錫山、馮玉祥等的數十萬聯合軍，對於數萬紅軍，反無如之何，窮於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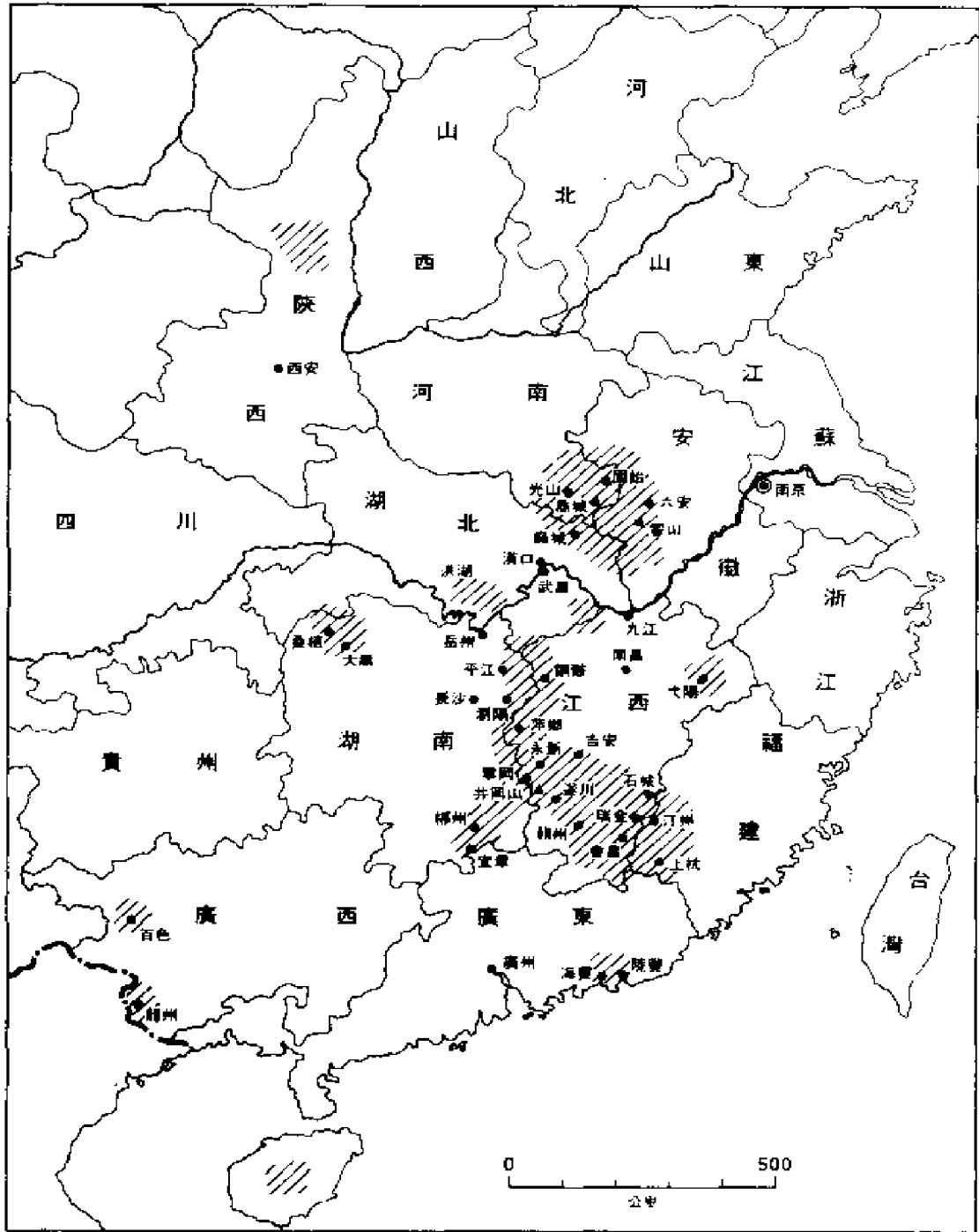
一、紅軍與蘇維埃區的創建

江西寧岡縣井岡山，是紅軍建立的第一個根據地。此山介於江西、湖南兩省之間，為羅霄山脈的中段，峯高崖陡，樹密林深，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十里，上為平地。洪江會首領王佐駐山上，袁文才駐山下，有衆四五百人。湖南秋收暴動失敗，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率所部約七百人前來（見584頁），和他們會合，消滅了附近團隊，成立工農紅軍一團，這是毛的「統一戰線」。建立軍中黨的組織，整飭軍紀，推行農民協會、赤衛隊，發動土地革命，按人口分田，使農民為保衛自身利益、鞏固紅軍基地而戰，這是毛的「人民戰爭」。一九二八年二月，江西四縣，湖南兩縣，悉入於紅軍活動的範圍。三月成立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¹五月成立湘贛邊界共產黨特別委員會。

葉挺、賀龍部，在廣東潮州、汕頭戰敗後，朱德率領一千餘人西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駐防粵北韶關的國民革命軍（滇軍）軍長范石生收編。一九二八年一月，因不容於廣州當局，復率所部北走湖南，稱紅軍第四軍，連佔三縣，兵力大增。毛澤東得到消息，前來會合。五月，朱德為政府軍擊敗，隨毛同上井岡山，紅軍第四軍擴大至五千人，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政治委員），²訂定游擊戰術，及

¹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澤東曾在湖南茶陵組織蘇維埃政府。

² 朱部多於毛部兩倍。當時並無紅軍第一、二、三軍，其所以稱第四軍，似為襲用與中共關係頗深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番號。隨朱同上井岡山的有黃埔軍校畢業生林彪及陳毅。



圖十五 紅軍分布區（蘇維埃區）（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¹他們的戰畧與政策為堅決作戰，造成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該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的黨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創建新的割據，採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毛認為中國的廣大人力物力在農村而不在城市，所以必須在農村中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到井岡山不久，南京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與武漢唐生智之戰發生，毛的勢力尚小，未受到注意。朱德初入湖南時，唐生智已經戰敗，白崇禧正向湖南進兵，朱德的活動漸引起重視。湖南戰事結束，朱德已至井岡山，湖南約江西圍剿。江西派出的部隊為紀律不整的滇軍兩師，²約九千人，擔任主攻。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紅軍所敗，損失一千餘人，湘軍不戰而退，這是紅軍第一次的勝利。七月，兩省第二次進攻，雖收復江西永新，反為紅軍包圍封鎖，江西軍又起內訌，損失較前次更巨，湖南軍後撤。朱德再入湖南而敗，復返井岡山。九月，紅軍擊退第三次來攻的江西軍。此時毛澤東任紅軍前敵委員會總書記，獨掌大權。

一九二八年七月，駐湖南平江第五師團長彭德懷、營長黃公畧叛變，成立紅軍第五軍，東入江西修水、銅鼓、萬載。十一月，來至井岡山。十二月，湘、贛軍第四次進攻，兵力約三萬人，採圍困戰畧。紅軍以供給困難，以彭德懷、黃公畧的第五軍留守，朱德、毛澤東率第

¹ 游擊戰術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放住我擾，敵疲我打。」續增「化整為零，集零為整，旋磨打圈，脫離敵人，猛打猛追，飄忽無常」等項。三大紀律，初為一絕對服從命令（行動聽指揮），二不准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不取人民一針一線），三籌款要歸公（一切繳獲要歸公），其後又有修正。八項紀律初為六項，續增為八項：一、說話要和氣，二、買賣要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不罵人，六、不損壞青苗，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不搜索俘虜腰包。

² 此兩師滇軍原屬廣州楊希閔，後投降北伐軍，北伐後歸朱培德，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金漢鼎部，朱、金均滇人。

四軍突圍，開闢新的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湖南師長何鍵，與武漢桂系合謀奪取湖南，暗將湘軍撤走，朱德、毛澤東乘機自井岡山進向贛南，大敗追擊軍於瑞金大柏地，出沒於江西東南地區，兵力增至一萬餘人。三月，東入福建，攻破汀州，消滅駐軍一旅。汀州為閩西大城，紅軍獲得步槍二千枝，機關槍數十挺，及大量物資、機器，然後西返贛南。留守井岡山的紅五軍彭德懷，因政府軍的壓迫，於二月間突圍，東與紅四軍相會。毛澤東以國民黨內爭方酣，命紅五軍再去贛西，紅四軍於五月復入福建，連下龍巖等城，奠定了紅軍在閩西的根據地。朱德主繼續進攻，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十月，朱德入粵東失利，又回江西，吉安綏靖大隊長羅炳輝響應。十二月，紅四軍第三次入福建。毛澤東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批評朱德的行動錯誤，今後仍當加緊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政權，以羣衆的人民戰爭，實行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一九三〇年初，閩西、贛南十餘縣盡入於紅軍的勢力範圍。三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並增編紅軍第三軍，黃公畧為軍長。

紅五軍彭德懷折返贛西後，奪回井岡山，¹分向贛西南、贛西北、鄂東南地區活動，開闢湘鄂贛邊及湘贛邊蘇維埃區，增編紅軍第八軍及十六軍。一九二七年九月，曾參加南昌暴動的方志敏起於贛東北，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勢力漸及於皖浙閩邊區。一九三〇年，成立紅軍第十軍，及贛浙皖邊區蘇維埃區。

聲勢次於江西的為鄂豫皖邊區的紅軍。一九二七年十月，起於湖北東北境的黃安、麻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進入豫南地區，以大別山為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乘武漢與南京之戰，紅軍大為活躍。中共中央派徐向前前來，以黃安七里坪及豫南光山新集為中心。另一支起於豫、皖之間，以六安金家寨為中心。一九三〇年，合併為鄂豫皖邊區及紅軍第一軍，許繼慎為軍長，徐向前、蔡申熙任師長。²

¹ 一九二九年八月，殺王佐、袁文才。

² 許、徐、蔡均為黃埔軍校畢業生，曾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

紅軍另一個重要根據地爲湘、鄂兩區。賀龍在潮州、汕頭戰敗後，返回他的湘西舊地，與周逸羣組織紅軍第二軍。一九二九年，北入鄂西，會同叛變的川軍旅長鄺繼助向湖北洪湖一帶發展，成立紅軍第六軍，建立湘鄂邊蘇維埃區。

一九二九年，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引用不少中共黨員。俞反蔣不成，餘部由中共領導，¹分集右江百色、左江龍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成立紅軍第七、第八軍及蘇維埃政府。不久第八軍失敗，第七軍北入湖南、江西，左右江蘇維埃區隨之消滅。

此外陝西北部、中部，廣東東江、海南島均有紅軍，但力量有限。陝西紅軍之漸成局面爲以後之事，領導人爲劉志丹、高崗。

截至一九三〇年初，紅軍約爲六萬餘人，有槍者三分之二，活動區域達一百二十餘縣，蘇維埃區已初步建立。紅軍與蘇維埃區之得以發展存在，第一個重要原因爲中共的土地政策。中國農民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而有田可耕者不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爲地主、富農、中農所有，以南方各省爲甚。蘇維埃政府成立，實行沒收土地，重新分配。滿足了農民畢生所願，對紅軍自大爲感戴，惟恐其敗。另一重要原因，爲國民黨的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爲內戰最劇烈時期，亦爲紅軍迅速發展時期。毛澤東曾說：紅軍處於四面包圍之中，紅色政權之能存在和發展，有其獨特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國民黨不斷的戰爭和長期分裂。只要繼續戰爭和分裂，紅軍就可日益發展。復以進攻紅軍的政府軍，觀望推諉，且非精銳之師。圍攻井岡山之功敗垂成，可爲明證，所以紅軍多擇邊區爲據點。如果不是內戰，政府軍又能協同一致，紅軍恐不能長期立足，更說不上發展。紅軍如不能存在，中共的前途必加倍困難。槍桿子出政權之說，畢竟不能完全否認。

二、紅軍攻勢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一一失敗，中共中央的領導人

¹ 鄧小平、張雲逸、龔楚等。

瞿秋白失勢。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莫斯科舉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或冒險主義，決定繼續為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及軍閥國民黨的政府而奮鬥，通過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革命軍，立即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土地及少土地的農民，先求一省或數省的勝利，所採仍為左傾路線。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為向忠發，但僅有其名，實權操於宣傳部長李立三，組織部兼軍事部長周恩來，毛澤東遭受排斥。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中俄有中東鐵路之爭，中共中央號召反對進攻蘇俄，反對軍閥戰爭，並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陳獨秀責其不當，被開除黨籍，斥為「革命取消派」。陳亦正式反擊史達林與中共中央，擁護托洛斯基，所以又被稱為「托派」。一九三一年五月，陳自立中央，¹完全喪失了他在中共的地位和權力。

一九二九年十月，護黨救國戰爭爆發，中俄中東鐵路之爭未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準備羣衆，實行革命，建立蘇維埃式的工農獨裁，開展階級鬥爭。一九三〇年二月，復以南京與閻錫山決裂在即，已達成革命新的浪潮。紅軍應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獲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大有可能，特別是武漢及其鄰近省區。這時南京已將可用之兵，悉行調往北方，不少江西、湖北縣城為紅軍佔領，南昌、武漢震動。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命江西紅軍向贛江下游發展，攻奪九江，與進向武漢的紅軍配合。五月二十日，李立三在上海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制定蘇維埃政府根本法令，設立蘇維埃大會準備會，定期舉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創造蘇維埃的中國，並通過擴大紅軍、武裝農民，奪取南昌、長沙、武漢中心都市。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認為全世界資本主義已至嚴重的恐慌時期，共產黨在羣衆中的威信日益增長，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革命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軍閥戰爭的擴大，農村暴動的

¹ 陳派召開中央統一大會，反對武裝暴動及建立蘇維埃，主採合法活動。

廣泛發展，兵士羣衆的動搖與譁變的增加，只要在產業區域政治中心爆發一個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一個革命高潮，應即組織一個同盟罷工，地方暴動，與紅軍的有力進攻相配合，向主要城市及交通道路發展，變游擊戰爲正規戰，這就是所謂李立三路線。

紅軍既決心攻取中心城市，從事正規戰，於是編贛南、閩西第三、第四、第十二軍約二萬人爲第一軍團，以朱德爲總指揮，毛澤東爲政治委員，會同贛東北的第十軍五千人進攻南昌、九江；編湘、鄂、贛區及湘、贛區第五、第八、第十六軍約二萬人爲第三軍團，以彭德懷爲總指揮，滕代遠爲政治委員，進攻長沙，並調廣西的第七軍約九八千人北來相助；編湘、鄂西區第二、第六軍約一萬人爲第二軍團，以賀龍爲總指揮，鄧中夏爲政治委員，會同鄂、豫、皖的第一軍許繼慎部二萬人進攻武漢，等於出動了全部紅軍。¹

一九三〇年七月起，紅軍第一軍進攻武漢以北地區，截斷平漢鐵路，第二軍團進攻武漢以西地區，漢口戒嚴。第一軍團連下贛江下游城鎮，八月十日，攻南昌不下，退往贛西北，進向九江的第十軍亦失利而退。長沙之役爲紅軍進攻的高潮，第三軍團乘湘軍與桂軍及張發奎部相戰，七月三日佔岳州，破湘軍於湘東北的平江、瀏陽，七月二十七日，佔領長沙，八月五日退出。這是紅軍成立以來佔領過的第一座省城，雖爲時甚暫，然已震撼了中外。第一軍團自江西赴援，與第三軍團合編爲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爲總政治委員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大舉反攻。自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三日，劇戰二十餘日，兩度迫近長沙，皆被拒退，復回江西，攻佔袁州、吉安等城。第一軍亦攻佔鄂東、豫南、皖西數縣。第二軍團幾盡有洪湖流域及洞庭湖以北地區，但是南昌、九江、武漢終未能奪得。

中共內部不盡贊成李立三路線，說是不合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李悍然不顧，謂「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

¹ 第一軍團第三軍長黃公畧，第四軍長林彪，第十二軍長羅炳輝，第十軍長方志敏；第三軍團第五軍長彭德懷兼，第八軍長何長工，第十六軍長孔荷鵬，第七軍長張雲逸；第二軍團第二軍長賀龍兼，第六軍長段德昌。

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俟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同了。」又說：「共產國際不知道當地情形，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的趨勢。」等到李立三的軍事冒進失敗，¹反對派攻擊愈力。九月，中共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三中全会），新自莫斯科歸來的周恩來（周於五月去莫斯科），採調和政策，謂李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路線是一致的，不過對於當前中國革命發展情形，在程度上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以致造成個別的策畧錯誤。共產國際召李立三赴莫斯科，²派米夫（Pavel Mif）來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又召集中央會議（四中全会），清算李立三路線，改組中共中央，以陳紹禹（一九〇五至一九七四）為首的國際派當權，³派項英、張國燾、夏曦分別主持江西、鄂豫皖、湘鄂蘇維埃區中央局，加強蘇維埃區及紅軍的領導。

三、江西前期圍剿

中原大戰期間，留駐江西的軍隊約三萬人，留駐鄂東、豫南、皖西的約二萬人，留駐湘、鄂之交的約二萬人，留駐福建的約二萬人，均所謂「雜牌軍」，戰鬥力甚弱，防禦紅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留駐湖南的約六萬人，防禦廣西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結果長沙一陷於桂軍及張發奎軍，再陷於紅軍，南昌同受紅軍威脅，岌岌不保，政府始知紅軍之不可小視。中原大戰終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蔣中正宣布今後五項政治方針，第一項即為「肅清匪共」，大軍絡繹而南。黃

¹ 除進攻各大城市無功外，北來的紅軍第七軍亦損失大半，並失去廣西的根據地。

² 李立三到莫斯科後，雖向共產國際悔過，仍被留十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始回國。

³ 陳紹禹（王明）及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沈澤民、陳昌浩、楊尚昆、王稼祥、夏曦等均曾留學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受知於校長米夫，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稱。此次中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米夫代表共產國際出席，一力支持陳紹禹等，陳任中央常務委員，沈澤民任宣傳部長，張聞天任農民部長，向忠發續任中央總書記，周恩來續任軍事部長，秦邦憲任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書記。遭國際派排斥的何孟雄、羅章龍另立中央，不久何被捕，由羅領導，終於失敗。

河流域的戰爭方畢，長江流域的戰爭又起，江西及鄂豫皖邊區為主要戰場。

江西戰場統帥為南昌行營主任兼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兵力約十萬人。十月初，分東西中三路推進，既不認識紅軍的性質，更不了解紅軍的戰畧戰術。十一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剿共、剿共為最要急務，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完成。時紅軍甫經內變，¹情勢甚危，處於內線作戰，迅速撤至有利地區，再迅速集中，對進剿軍分別包圍猛攻，予以各個擊破。進剿軍以中路湘軍為主，實際參加戰鬥的亦為此路，兵力約三萬人，連克吉安等城。十二月九日，蔣中正在南昌召集軍事會議，懸賞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限三個月肅清匪區。十二月十九日，中路軍輕易的佔領紅軍基地吉安東固，紅軍彭德懷、林彪、黃公畧、羅炳輝四個軍約四萬人，集於吉安、興國間的龍岡。十二月三十日，圍殲中路進剿軍八千餘人，俘總指揮張輝瓚。三天後再破另一師於寧都、吉安間，共得槍約一萬枝。東路進剿軍急劇後撤，西路未參加戰鬥，第一次圍剿結束。

紅軍之勝，一由於政治訓練有素，官兵一體；二由於民衆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三由於國軍進剿為紅軍存亡所繫，必須死中求生；四由於戰畧戰術靈活，處處主動，集中兵力，以衆擊寡；五由於戰場地形複雜，易於掩蔽，進剿軍遂一敗塗地。

第一次進剿失敗，蔣續行增兵，為爭取民心，嚴禁土豪劣紳活動。紅軍亦積極搜集食糧，動員羣衆，再將兵力集中，以逸待勞，俟機迎擊戰鬥力較弱的國軍。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二次圍剿開始，軍政部長何應欽任總司令，兵力約二十萬人，參加戰鬥者約半數，突破紅軍陣線兩道。五月十六及十九日，紅軍六萬，兩敗西路國軍各約一萬人，然後折而東趨，二十日又敗中路國軍二萬人，二十七日及三十日，連

¹十二月七日，紅軍第二十軍衝入吉安富田，驅逐江西蘇維埃政府，發言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畧，十餘日始平。毛澤東大殺反對派，指為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團。

敗東路國軍三萬人，五戰五捷，國軍損失約二萬人，第二次圍剿結束。

紅軍再勝的原因，與第一次畧同。國軍的挫敗，則尚有特殊之故。一為增調南來部隊，官兵多為北人，既不習於江南生活，復鑒於前次進剿覆轍，心存畏慮。二為西路中路以北軍為主，不願為人作嫁，甚至認為政府係以毒攻毒，使其兩敗俱傷，所以紅軍首向此兩路進攻。三為指揮未能統一，¹行動未能協同，一軍遇挫，他軍即行後撤，敗不相救。四為廣州對南京的反抗已經發動，西路軍右翼為防北來粵軍，未積極參戰，紅軍亦避而不與接觸。²但是紅軍東西奔馳，缺乏休息，雖然獲勝，而無力追擊。

二次圍剿結束之日，即廣州政府成立，準備與南京一戰之時。蔣重申剿滅「赤匪」決心，親至南昌部署，改討逆軍為「剿赤軍」，以示全力以赴。六月二十五日，任命何應欽為剿赤軍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另有各軍團總指揮，各路追擊軍總指揮官。設南昌行營黨務政治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鼓勵江西民衆赴鄉里之難，縣長棄城者處死，重申連坐法。七月，第三次圍剿開始，兵力約三十二萬人，參加戰鬥的約十三萬人，半數為中央軍，並出動空軍。蔣躬自督戰，十餘日間，以雷霆萬鈞之力，急進猛攻，連克要城，深入蘇維埃區，宣稱十天之內可盡復失地，肅清散匪。紅軍的戰畧與以往相同，集結於興國、寧都之間，「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八月八日及九日紅軍五萬人，分別擊敗西線國軍各一師，³十一日，又擊敗東線一個師，共獲槍一萬餘枝。時粵、桂軍北侵湖南，蔣轉赴武漢。九月九日，國軍主力自江西西調，紅軍跟縱攻擊，為蔡廷鍇軍所敗，損失頗巨，此為圍剿以來的一大勝利，可見紅軍

¹ 西路軍總指揮為王金鈺，統六個師，兩師主力為孫傳芳舊部，另兩師為收編的北方軍隊。中路軍指揮為孫連仲，統三個師，均馮玉祥舊部。東路軍指揮為朱紹良統六個師，能戰者不過兩師。何應欽於戰爭開始後，返回南京，出席國民會議，全局主持無人。

² 西路軍右翼指揮為蔡廷鍇，所統兩師最稱善戰。

³ 均為北方軍隊。

並非特強。時蔣的注意力集於粵、桂軍，放鬆了紅軍。九月十八日，日軍之突襲瀋陽，更無法再對紅軍進攻，第三次圍剿完全停止。否則紅軍侷促於南北東西不及二百里的山區，久戰力疲，不僅不能乘勝追擊，以其有限的物力人力，如果戰事持續，最後勝負正不易言，所以中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不特別強調。

當國軍對江西圍剿之時，對鄂豫皖邊區亦一再進攻，主力為新改編的馮玉祥部與雜牌軍，屢次挫敗。一九三一年初，紅軍成立第四軍團，西斷豫鄂交界的平漢鐵路，俘國軍師長以下數千人，東敗國軍於皖西。六月，召開豫鄂皖邊區黨員及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成立軍事委員會及黨務委員會，張國燾與沈澤民分任主席及書記，徐向前任紅軍第四軍團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¹八月以後，攻下皖、鄂之交四縣，大敗國軍於豫南商城。十一月七日，舉行鄂豫皖邊區第二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第四軍團擴大為第四方面軍，兵力約三萬人，赤衛軍約二十萬人。

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

蘇維埃區以江西為大，紅軍亦以江西為強，毛澤東的貢獻自不可否認。不過毛的措施，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不盡謂然，紅軍將領復不滿毛的專斷。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會要他和朱德離開江西，將紅軍化整為零，以減輕國軍攻擊的目標，免召被消滅的危險，毛抗不聽命。一九三〇年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召開之前，中共中央兩次召他出席，並命將紅軍合編，統一行動，歸中共中央節制，毛又拒絕。對於李立三路線，他雖然執行，然有幾分勉強。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決定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因李立三路線失敗，國軍開始大舉圍剿，未克如期舉行。陳紹禹取代李立三後，採行所謂國際路線，

¹ 張國燾與陳昌浩於一九三一年四月，自上海經漢口進入鄂豫皖邊境，沈澤民亦經安徽蚌埠，進入皖西，陳、沈均屬國際派。一九三二年沈病死。

依然是左傾路線。派往江西的項英到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以代理中央蘇維埃區中央局書記身份，發出第一號通告，明定今後路線和主要工作：一為堅決執行土地改革；二為建立各級蘇維埃機關，使真正成為農工的政權；三為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立即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四為發展廣大羣衆組織；五為加強武裝工作與反對富農鬥爭；六為蘇維埃區應向南昌、長沙、武漢發展，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要勝利；最後為發動一百萬工農羣衆與紅軍，擊敗敵人進攻後，即舉行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

同月二十一日，上海中共中央為準備對抗第二次圍剿，作了幾項決議，迅速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其一。及紅軍擊退第二次圍剿後，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指示目前緊急任務，仍為實現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對抗南京的國民會議。六月，復訂定至遲必須於八月一日前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七月，共產國際亦有同樣指示。由於第三次圍剿正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無法如期舉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書蘇維埃區中央局及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前敵委員會（總前委），除嘉獎紅軍戰績外，並指出不少錯誤缺點，總不外蘇維埃區的工農羣衆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進攻的鬥爭，尚缺乏更寬度的發動，未能使之達到極高度的尖銳化。為進行階級戰爭：第一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不可僅着眼於紅軍問題，必須組織羣衆力量，衝破第三次圍剿向外發展，佔領一兩個較大城市；第二徹底消滅地主殘餘；第三更着力於改造和擴大紅軍的任務，打破游擊主義傳統與小團體觀念，使紅軍編制適應於大規模作戰；第四堅決執行發展黨、鞏固黨的任務，以極大力量加強地方黨部工作；第五建立蘇維埃區中央政府，定於十月革命節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凡此可見中共中央希望成立中華全國蘇維埃政府是如何殷切，同時又可知國際派對於毛澤東領導的不滿。

反第三次圍剿之戰結束，中共中央說是革命情勢的急劇發展，與反革命統治的日益崩潰，明白顯出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勝利的前途。

又說，在衝破第三次圍剿與瀟湘事變運動高漲的基礎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實為工農民主專政在國內勝利先聲。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到江西，接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在瑞金開幕，歷時約二十餘日，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土地法、勞工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等案。全國蘇維埃大會為最高政權機關，其下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下為人民委員會，即中央行政機關，主席均為毛澤東，副主席為項英、張國燾，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的同盟者，號召全國勞苦羣眾，繼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聯合世界被壓迫民眾，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驅逐日本出中國。大會曾嚴厲批評蘇維埃區的錯誤，說是土地問題不曾根本解決，中央蘇維埃區仍是流動的，紅軍不會完全脫離游擊主義、小團體主義，黨內存有狹義的經驗論與農民的落後意識，均為對毛澤東而發。毛雖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主席，但一切須聽命於國際派控制的中共中央。¹至是中國計有南京、廣州、瑞金三個政府，日本已奪據東北兩個多月。

¹ 近年中共編印的黨史，幾皆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中央政府成立之事，亦不強調瑞金時代。

第十七章 安內與攘外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

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為國民革命的兩大使命。結果前一工作固未完成，內戰愈演愈烈，後一任務更為艱劇，外患空前險惡。在內外交攻之下，國民黨的政策為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即先安內，後攘外。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何。

第一節 北伐後的對外舉措

一、廢止舊約交涉

北伐告終後，國民政府決遵循外交途徑，取消不平等條約，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對外宣言，以正當手續，本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宗旨，改立條約。七月七日，復宣言已滿期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另訂新約，未滿期者應行重訂，舊約滿期、新約未訂者，依臨時辦法處理。外人受中國法律保護並守中國法律，關稅照現行章程辦理。當時已屆期的，有義大利、法國、日本、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丹麥等國的商約。

此事的成敗，繫於各大國的態度。首先有比較良好反應的為美國，七月二十五日，中美簽訂整理關稅條約，美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惟必須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換言之，必須待其他國家一律承認，方能實行。至於法權問題，目前尚不能商談。是年德國、挪威、比利時、丹麥、荷蘭、葡萄牙、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相繼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同時承認國民政府。

七月三十一日，日本照會中國，如撤回廢約主張，願與中國商訂新約，倘中國實行臨時辦法，日本將出以斷然處置。外交部長王正廷

與上海日本總領事洽商未協，蔣中正派張羣赴東京與首相田中面談。田中以美、英、法不允與採協同政策，態度畧為緩和。一九二九年六月，日本承認國民政府。七月，民政黨濱口雄幸繼田中組閣，幣原喜重郎復任外相，宣布對華無侵畧之意，惟須保護合法正當權利。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中日訂立關稅協定，實行互惠稅率，中國承認無擔保債款，亦即承認西原借款，此為中國為獲得關稅自主，對日本付出的特別代價。

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困難更大。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國要求有關國家進行交涉，義大利、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葡萄牙雖於原則上同意，但須九國公約簽字國一律照辦。一九二九年四月，王正廷致文英、美、法等國，請同情考慮，其所以未及日本，乃因中日條約已屆期滿，應訂新約。遲至八月，英、美、法均不允立時放棄。王正廷再請商談。此時外有中俄中東路之爭，內有對馮玉祥之戰，時機十分不利，各國仍然拒絕。十二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公布外交政策大綱，除取消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外，並擬收回內河航權、租界，所有外國駐軍均須撤退，各國置諸不理。一九三〇年，國民政府忙於應付反抗中央的大戰，益無暇及此。內戰告終，一九三一年二月，王正廷宣稱，決定在最短期間，達到撤廢領事裁判權目的。接着胡漢民被迫去職，江西剿共軍事不利，大局動盪，中國與英、日的談判，迄無結果，允許放棄領事裁判權的只是荷蘭、挪威、丹麥、比利時諸小國。五月，國民政府頒布管轄在華外人條例，定期施行，實同空文。三年來的取消不平等條約成就，除收回關稅自主權外，實際做到的為一九二九年收回的天津租界，一九三〇年收回英國威海衛租借地及英國庚子賠款餘額的退還。¹

二、中俄中東鐵路之爭

自一九二五年冬，蘇俄不准張作霖使用中東鐵路運兵事件發生，

¹ 鎮江英租界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收回。英國庚子賠款返回後，充作教育事業與建築及整理鐵路之用。

繼之以一九二七年，北京蘇俄大使館的被搜查，雙方交惡愈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接管中東鐵路非法經營的電報、電話，蘇俄雖不承認，而無如之何。一九二九年二月，張學良擬由談判途徑，限制蘇俄對中東鐵路的權力，俄籍局長不理，進而反不准華籍副局長會簽命令。據說張學良採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之議，決收回該路。五月二十七日，得悉共產國際在哈爾濱蘇俄總領事館召開會議，陰謀不軌，中國警察掩至，逮捕俄人三十餘名。蘇俄亦搗毀中國領事館，大捕華僑。張學良與蔣中正、王正廷會商後，七月十日，強制接管中東鐵路，封閉附屬機關，拘捕俄人二百餘名，解除俄籍局長、副局長職務。十三日，蘇俄發出最後通牒，限於三日內取消對該路的片面行爲。中國責蘇俄煽動中國內亂，不得已始出以此種措置，惟仍望商洽合理辦法。十七日，蘇俄斷絕中俄鐵路交通，扣留黑龍江中國船隻，勒令中國駐俄代表離境。¹

國民政府對蘇俄之所以獨出以斷然處置，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一爲史達林正事內部整肅，對外又處於孤立，兩年前搜查蘇俄大使館既然無事，這次搜查哈爾濱總領事館已經月餘，蘇俄並無強烈反應。二爲日本不喜蘇俄在東北得勢，中國如加以排除，當爲日本之所願，中日關係即令不因而好轉，日本諒不致與中國爲難。三爲蘇俄向以援助被壓迫民族相標榜，如爲中東鐵路而對中國用兵，將無以自解，何況最近國際間又有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eace Pact）。四爲討伐桂系勝利，收回了中東鐵路，國民政府的聲威將益提高。但是情勢變化未若所料，各國多不直中國所爲，日本關東軍禁止南滿鐵路爲中國運兵、運械，不准中國軍隊通過鐵路附近地區。美國提議由中立國仲裁中俄爭端，日本拒絕參加，勸張學良與蘇俄直接交涉。蘇俄要求恢復中東鐵路原狀，並共同警備。八月初，以白魯傑（加倫）爲特別遠東紅軍總司令，屢侵東北邊境，張學良亦調兵防禦。中國請德國斡旋無

¹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雖與蘇俄絕交，北京政府時代派往蘇俄人員，照常留駐。

成，俄軍分東西兩路向吉林、黑龍江前進。十月，東路陷同江、富錦，十一月，西路陷札蘭諾爾、滿洲里，東北軍旅長韓光第以下二千人戰死。南京忙於對馮玉祥之戰，無力援助東北。俄軍爲免刺激日本，未再續進。

張學良兵敗之後，十二月三日，由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與蘇俄代表希曼諾斯基在雙城子（Nikolski-Ussuri）議就草約，二十二日，在伯力（Khabarovsk）簽字，恢復中東鐵路原狀，蘇俄在東三省領事館及商業機關，釋被捕俄人。解散中國境內之白俄軍隊。關於通商問題及保障協定之履行，將來由正式會議解決。南京指蔡運升越權，僅允談判中東鐵路問題。一九三〇年二月，派新任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爲會議代表。五月，莫德惠抵莫斯科，提議先商中國贖回中東鐵路問題，蘇俄要求先議通商及黑龍江、松花江航權，相持不下。時反蔣戰爭方酣，蘇俄有意觀望。十一月，中俄正式會議開始，蘇俄堅持伯力協定有效，並將討論範圍擴大至通商、復交，會議因之終止。一九三一年四月起，會議續開，多至二十五次，未得任何結果，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節 日本侵佔東北

一、九一八事變

日本之炸死張作霖，阻撓張學良易幟，雖均未得遂其宰割東北的願望，但既定方針，絲毫不會改變，繼續對張學良誘脅，先求實現鐵路政策，張始終推之於中央政府。關東軍準備倒張，另立政權。中俄中東鐵路問題發生，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大佐、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主乘機佔領滿蒙，濱口內閣不許。外相幣原以素主中日提携的佐分利貞男爲駐華公使，致力外交解決，爲軍人所不喜。數月後，佐分利暴卒，傳說係被謀殺。幣原擬以小幡西吉繼任，未獲中國同意，軍人指幣原外交軟弱。一九三〇年五月，坂垣表示滿蒙問題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訴諸武力，驅逐張學良，石原擬有「攻瀋要領」。

中國經過八個月的中原大戰，元氣大損。東北軍入關後，東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長期留住北平，注意力轉向關內，日本軍人認為此時奪取東北，可不費吹灰之力。一九三一年三月，陰謀國內政變不成，石原準備先在國外行動，然後改造內政，製訂一「解決滿蒙之戰計劃大綱」。所謂「全滿日人自由同盟」，鼓吹滿蒙獨立，「日本對外同志會」主張對滿蒙鐵路問題採強硬態度。五月以來，日本軍人復認為外在的形勢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張，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恐慌，確為對東北行動的少有機會。再者，蘇俄國力日長，控有外蒙，為了遏制其續行擴張，亦有此必要。六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擬成一「解決滿洲問題方案」，關東軍加緊製造中國內亂。七月，煽動河北的石友三叛亂，以飛機送流亡大連的閻錫山重返山西，命與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張學良無暇顧及東北。同月，長春萬寶山韓僑與當地農民衝突，朝鮮發生排華暴動。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遼寧洮南被殺的消息，亦於是時傳出，石原主張自行處理。陸軍大臣南次郎召開師團長會議，謂滿洲事態重大，軍人當善盡職責，必要時迫中國屈服。

一九三一年五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內田康哉曾警告遼寧省主席臧士毅，東北鐵路懸案必須作相當解決，否則日本少壯軍人將有行動。六月初，臧士毅派員赴北平向張學良請示，張未加重視。¹及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發生，七月六日，命瀋陽東北政務委員會，力避與日本衝突。蔣中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及應付兩廣軍事，十二日，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攘外應先安內。」八月中旬，得知關東軍有意啓釁，尚不了解其最後企圖。九月六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十一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事變之日，蔣赴江西督

¹ 臧士毅派財政廳長張振鷺去北平，張學良因病未見，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高紀毅亦稱病不回瀋陽。

師剿共，兼防粵、桂。此爲不抵抗政策的由來。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幣原命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與臧士毅交涉中村案，張學良亦派人往東京商談。南次郎宣稱，對中村案除武力報復外，別無他策，關東軍即積極部署。九月十日，瀋陽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返東京與軍部計議。十一日，昭和天皇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風紀。十四日，陸軍省、外務省均接瀋陽密電，知事機緊迫，關東軍行動在即。第二天，南次郎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宣達天皇的誥誡，坂垣、石原獲悉後，決照預定計劃執行。九月十八日下午，建川抵瀋陽，當晚十時三十分，關東軍南滿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溝鐵軌，「九一八事變」爆發。

東北軍共約二十萬人，半數駐於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及黑龍江省府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遼西錦州，在瀋陽的僅爲遼寧省主席臧士毅，事先皆無警覺，絲毫未作準備。關東軍一萬餘人於八小時內，佔領瀋陽城、軍營、兵工廠、飛機場。第二天，長春、營口、安東等地一一失陷，朝鮮日軍分向遼陽、吉林出動。若槻禮次郎內閣不准擴大事變。¹關東軍不理，九月二十日佔長春，二十一日佔吉林省城。若槻再命退集南滿鐵路附近地區，不得進入北滿，並請天皇制止。關東軍聲稱如天皇約束其行動，將於滿洲獨立，終以恐刺激蘇俄，暫不進佔哈爾濱。

十月，關東軍嗾使遼源鎮守使張海鵬北侵黑龍江，爲黑龍江軍拒退。十一月，關東軍以蘇俄表示無意干預，實行參加，進攻洮南昂綏鐵路的嫩江橋，又被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擊敗，馬占山成了抗日英雄。關東軍再度來犯，馬占山力戰七日不敵，齊齊哈爾省城不守。

瀋陽失陷後，東北邊防公署及遼寧省政府移設錦州。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宣稱不許錦州政權存在，日機一再轟炸。關東軍佔領齊齊哈爾後，移兵西犯，十二月十九日，限錦州政府機關於十五天內退入山

¹ 一九三一年四月，若槻繼濱口爲首相，幣原續任外相。

海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日軍入錦州，整個東北在一百天內全部淪陷。

二、國民黨團結不成、國際聯盟決議無效、日本進攻上海

一九三一年的中國仍是分裂之局，明張旗鼓反抗南京的，中共之外，尚有廣州的國民政府。是年七月，下令討伐蔣中正，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東京謀求援助。九月初，粵、桂軍進向湖南，中央軍亦向湖南出動，國民黨的又一內戰已在眉睫。瀋陽變起，南京勸廣州即息內爭，共赴國難。廣州雖然贊成，惟不放棄反蔣。蔣原準備移駐北平指揮，至是為促成合作，自願引退，並恢復胡漢民的自由。十一月，南京代表蔡元培、張繼、陳銘樞等與廣州代表汪兆銘、孫科、鄒魯等會於上海，議定雙方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政府，採內閣制，蔣可不下野。

南京代表大會通過請蔣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廣州代表大會中的胡漢民派不只堅持蔣必須下野，且須解除兵權、開除黨籍。汪兆銘、孫科因違背上海協議，不以為然。汪派復不滿於中央委員的選舉，自行在上海集會。十二月十五日，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二十八日，由京、滬(汪派)、粵三方選出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推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汪、胡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兼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但均未到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廣州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撤銷，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會，事實上照舊獨立。

孫科內閣未獲蔣、汪、胡的支持，財政問題更為棘手，江、浙駐軍，紛紛索款，孫科一籌莫展。不久蔣、汪有了諒解，各方多認為非蔣再出不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汪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復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旋升為委員長，此後成了他的專稱。惟胡漢民終不肯入京，孫科亦拒就立法院長之職。

瀋陽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政策為對日本武力可以退讓，交涉決不放鬆。所謂交涉，一係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本行動，恢復東三省原狀，

一係由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與日本公使重光葵洽商，組織共同委員會，尋找解決方案。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通告中、日，勿擴大事態，協議撤兵。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亦對日本表示，事變已涉及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希望避免再有軍事行動。出席國聯理事會的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謂日軍可陸續撤退，由中、日直接交涉，勿須國聯干預。中國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請國聯派員輔助，商定撤兵日期，為芳澤所拒。美國因日本轟炸錦州，態度漸趨強硬。十月十六日，國聯理事會通過邀美國派代表列席，並擬一決議草案，日軍於十一月十六日前，退集鐵路區域以內後，中、日即開始談判，因日本反對，未能成立。

十月十九日，日本外相幣原提出五項原則：一為中、日放棄侵略政策及行爲；二為尊重領土完整；三為取締妨害相互貿易自由及煽動國際仇恨的有組織運動；四為保護日人在滿洲的和平業務；五為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益。國民政府以輿情激昂，遲迴瞻顧，以為國聯正盡力消除日本宰制滿洲計劃的實行，日本如悍然不顧，可能受到制裁。其次，如英、法、美等國斡旋無效，雖不致對日作戰，必將運用九國公約，可能對日作有力抵制。中國應團結民心，保持人民對政府信任，但決不對日宣戰，盡力維持各國對華好感，至萬不得已時，不卹在軍事上為民意而犧牲，目前應採取「不撤兵、不交涉」方針。有人責國民政府失去與日本談判機會，其實縱令中國願依幣原五原則談判，日本軍部亦斷不容許。若槻內閣聲言，即使滿洲日僑權益獲得保障，亦不立即撤兵。

中國曾商請國聯派遣代表團調查東北事變，美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復擬請國聯於必要時對日施行經濟制裁，其他國家亦有此意。日本為緩和情勢，十一月下旬，正式建議派遣調查團，惟不得干預軍事行動，中國軍隊須退出錦州。中國堅持日本定期撤兵，同時提議設立錦州中立區，為日本所拒。十二月十日，國聯通過調查團，不干涉軍事行動，不參與中日談判，日本不因調查而稽延撤兵。日軍立即佔領錦州（見 628—629 頁）。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通知日本及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任何違反門戶開放政策與非戰公

約而訂立的條約協定，及造成的事實上的情勢，有損美國人民條約權利者，包括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完整與行政完整，美國概不承認，此即不承認主義。

瀋陽事變發生後，日本軍艦紛駛中國口岸，而以上海及長江一帶為多。上海人民愛國情緒極熾，組織抗日救國會，抵制日貨。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質問市長吳鐵城，有無保護日僑能力，否則將取自衛手段。十月，日本陸戰隊登陸，屢與華人衝突。關東軍既輕易的佔領錦州，上海日本海軍亦躍躍欲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前後，日本僧人與中國工人毆鬥，焚毀工廠。村井要求吳鐵城取締抗日團體，日本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迫吳立即執行。二十六日，村井發出最後通牒。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吳鐵城全部接受。十一時三十分，日本陸戰隊突攻北市，同時進攻吳淞。駐防上海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起而應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以示不屈。¹日本加派陸軍，蔣中正亦決與日本死戰，訂立全國防衛計劃，先令裝備最佳的第五軍增援，再調江西剿共軍東來。日軍正面猛攻未逞，改由左側進襲。三月二日，中國軍隊被迫後撤。是役參戰日軍約六萬人，華軍約七萬人，武器雖遠遜於日本，仍能力戰月餘，士氣民心之旺，博得各界的贊佩與同情。這是繼馬占山嫩江之戰對日本的又一次悲壯抵抗，是為「一二八之役」。

英國初欲借日本以對蘇俄，不肯與美國通力合作。迨上海戰起，英國利益直接受到影響，美國亦鑒於日本野心之無止境，一致對日譴責，英國拒絕美國援引九國公約的建議，但國聯態度已較前積極，要求中日停戰。日本全力正注意東北，無暇兼及上海，經英、美諸國調解，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訂立停戰協定，日軍返回戰前原駐地位，華軍暫留現駐地位，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²

國聯調查團由英、美、法、德、義代表組成，英國代表李頓（Lord

¹ 二月一日，日本軍艦砲擊南京。四月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十二月政府正式遷還。

² 協定簽字前六天，日軍司令白川義則被朝鮮獨立黨人炸死，日本公使重光葵等受傷。

Lytton)任團長,一九三二年三月,經東京至上海、南京、北平、瀋陽、長春、哈爾濱。時「滿洲國」已成立,調查團勸日本勿予承認,無異與虎謀皮。十月一日,調查報告書發表,認為恢復事變前的滿洲狀態,或承認滿洲國皆非辦法,主張在不抵觸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下,使東三省自治(autonomy),由中日政府及東三省代表、中立國觀察員合組顧問委員會,擬訂建立自治政體方案,南滿鐵路改為商營,與中、日鐵路合而為一,實際為給日本以特殊利益,使得實惠,中國僅保留一個名義。中國允改善東三省行政制度,但不同意設置顧問會議,¹日本根本拒絕接受。國聯先曾成立一個十九國委員會,監督國聯決議案的實行。十九國委員會的建議,與李頓報告書大體相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召開特別大會,四十二國贊成,惟日本反對。三月二十七日,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希望於國聯的一無所得,國聯的威信亦因之大損。

三、日製「滿洲國」與義勇軍奮戰

一九一七年溥儀復辟失敗,一般清室遺老終不死心,勾結軍閥之外,尤望外力支持,特別是日本的支持。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宮,不久逃入日本使館。第二年,走天津日本租界,既不能享有民國政府的優待,復無從盜賣宮中珍寶,生活安全均是問題。國民革命軍北伐,使他愈為惶懼。一九二八年,乾隆、慈禧陵墓被盜,復辟復仇之心愈熾,勾結日人愈力。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溥儀已知東北行將發生事故,以為大有可為。事變發生後,關東軍決利用溥儀建立政權。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天津日本屯駐軍司令官香椎浩平邀溥儀與坂垣征四郎會晤,商議前往東北。經過土肥原的安排,十一月十日,溥儀乘日船去旅順,鄭孝胥同行,欲先在東北復辟,然後重建大清帝國,作整個中國的皇帝。日本參謀本部及關東軍計劃是在東北建一新國,對於恢復大清帝國尚

¹ 李頓在北平密告調查團襄理顧維鈞,中國應接濟義勇軍,抵制日貨,加強國際宣傳,勿與日本宣戰,勿對國聯表示失望。

有顧忌。一九三二年二月，乘上海戰爭方酣，一面製造東北政權，一面攻佔哈爾濱。此一新政權定名為「滿洲國」，由漢、滿、蒙、日、韓五族組成。溥儀力爭「復位以正統系，」坂垣允於一年後實行帝制。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儀在改名「新京」的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鄭孝胥為國務總理，掌握實權的為日籍國務院總務廳長。八月十八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與鄭孝胥訂立密約，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均委託日本負責，鐵路、港灣由日本管理、建築，礦產資源由日本開發，日本有權向滿洲國移民，日本人得充任滿洲國官吏。九月十五日，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再與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內容與密約同。一九三三年，日軍佔領熱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儀改稱滿洲國皇帝，年號「康德」，這是他第三次稱帝。次年四月，溥儀到東京答謝，說是「要盡全力為日、滿的和平而努力，」「如果滿洲人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東北徹底日本殖民地化。

東北正規軍雖奉命對日不加抵抗，自動抵抗的仍舊不少。馬占山之外，有吉邊鎮守使李杜、代理中東鐵路護路司令丁超、吉林民政廳長誠允、團長馮占海，及起自民間的王德林、唐聚五、黃宇宙，分稱自衛軍，或救國軍，風起雲湧，衆約二十餘萬人。¹初以為在國際壓力與東北人民反抗之下，日本將知難而退。滿洲國出現後，證明日本要永遠霸踞。去冬嫩江橋之戰，今春上海之戰，增強了他們的信心，日軍並非絕對不能抗拒。關內民衆與張學良的支援，亦為有力鼓勵。²四月至七月，黑龍江、吉林為主要戰場，八月至九月，義勇軍分攻瀋陽、遼陽、撫順、營口、長春、永吉各大城市，截斷南滿鐵路，瀋榆（瀋陽至山海關）鐵路、錦朝（錦州至朝陽）鐵路、瀋海（瀋陽至海龍）鐵路、吉敦（永吉至敦化）鐵路，可說是義勇軍抗日的高潮。九月，黑龍江

¹ 馬占山兵敗後，一度投降，後又宣布抗日。義勇軍著名領袖尚有鄧鐵梅、項青山、鄭桂林、檀自新、鄧文、劉振東、趙桐、苗可秀、李海青等，身殉者不少。

² 上海義勇軍後援會籌款接濟，領導人為曾任黑龍江督軍的朱慶瀾。北平抗日救國會有東北義勇軍指導總部及訓練游擊幹部機構，中國青年黨亦積極活動。

旅長蘇炳文起義於滿洲里，聯合馬占山進向齊齊哈爾。十一月擊敗日軍，吉林李杜克復佳木斯，王德林亦獲勝利，可說另一高潮。一九三三年一月，蘇、馬、李、王戰敗，分退俄境及遼寧、熱河邊地。熱河失陷後，東北義勇軍難得關內接濟，在極端艱苦之下，繼續奮鬥不懈。¹

四、熱河續陷、塘沽協定、抗日反蔣

日本奪據東北之時，已定下攻取熱河計劃。中日上海協定成立，日本軍部即準備進兵。關東軍因受義勇軍的牽制，尚無力大舉，為斷絕東北與關內的聯絡，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先佔領山海關。

二月十八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張學良到承德，發表演說，斷不放棄東北與熱河，縱令敵人佔領南京，亦不作城下之盟。三日後，日軍二萬人來犯，駐軍八萬人，大都不戰而潰，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攜帶大批財寶、鴉片，棄城而逃。三月三日，一百二十八名日軍進入承德。蔣中正自江西趕至河北保定，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張學良主持軍事。日軍續向長城南進。華軍先於古北口、冷口阻擊，繼在其以南地帶奮戰，日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東線由山海關西侵的一支，佔領灤河以東，北線南天門陣地經血戰後失守。²

行政院長汪兆銘屢稱對日政策為抵抗與交涉並進，蔣中正強調「共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日本吞有滿洲、熱河後，以尚未站穩，如立即攻奪華北，力量尚有不逮，國際上亦有顧慮。關東軍之續行進犯，實欲以戰迫和，一時縱不能強制中國承認滿洲國，至少可使中國軍隊後撤，暫時劃出一緩衝地區。國民政府急切希望日軍停止前進，外交部長羅文幹、次長劉崇傑親去北平，商請美、英、法公使斡旋，不得要領。蔣中正、汪兆銘改命黃郛直接與日方接觸。五月三日，

¹ 一九三五年與中共有關的「東北抗日聯軍」成立，領導人為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周保中、李延祿。

² 古北口方面的守軍為徐廷瑤（中央軍），喜峯口、冷口方面的為馮福麟（東北軍）、宋哲元（馮玉祥舊部）、商震（閻錫山舊部），灤河以東為何柱國、王以哲（東北軍）。宋部作戰極勇，徐部關麟徵、黃杰、劉戡三師抵抗尤力。

設置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為委員長。黃一再與日本軍部代表密洽，獲悉日軍真意所在。十五日，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聲明，華軍如不採挑戰態度，日軍不進佔北平、天津。同日，黃離上海北上。十六日，美總統羅斯福呼籲和平，十九日，又與最近抵達華盛頓的宋子文發表公報，謂遠東局勢足以擾及世界和平，相信此次中日戰爭不久將可息止。此一表示，自有若干影響。時日軍已逼近北平，汪兆銘致電黃郛，除承認滿洲國，割讓東北四省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二十三日，黃與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等，徹夜會談。二十六日，協議達成。汪請黃堅決進行，倘招國人不諒，願身當其衝。蔣勉以艱苦共嚐，諸事自必負責。五月三十一日，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代表何應欽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中國軍隊撤至自延慶（北平西北）起，經過通州（北平東）至蘆台（天津東北）線以西以南，日軍還至長城線。取締華北國民黨部的排日活動，列為日方的希望條件。從此冀東二十餘縣實同淪陷，日本的侵畧由東北而及於河北。

上海戰後，民氣昂揚，國際上刮目相視。一九三二年夏間，關東軍初犯熱河，輿論力勸張學良堅守。戰爭形將爆發之時，張激昂慷慨，調兵遣將。殊料不到十天，承德不戰而棄，各方痛責當局未盡到責任，熱河淪陷在精神方面的損失，過於東三省的不抵抗而失。

蟄伏年餘的馮玉祥於瀋陽事變發生、蔣中正下野後，到了南京，欲有所施展而未遂，北去張家口，託庇於舊部察哈爾省府主席宋哲元，並與中共聯絡。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正當日本兵臨北平城下之時，馮自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實為反蔣。廣東亦揭「援熱抗日軍」旗幟，否認塘沽協定，其實均為反蔣。七月，馮一度收復偽蒙軍佔領的多倫，日方指為違反塘沽協定，馮恐日軍出動，勢難抗拒，離張家口南去。

繼馮玉祥而起的為福州人民政府。陳銘樞為運動南京、廣州和好的重要人物之一，第十九路軍是他的最大憑藉，蔣、汪主政，陳銘樞失意。第十九路軍因上海之戰，聲譽揚溢，戰後調入福建。陳聯結失意政客軍人及自命前進人士，組織「生產民主黨」（一稱社會民主黨）。

馮玉祥在張家口舉事時，陳謀自立政府，以打倒獨裁、取消黨治、反對外交、聯絡共軍爲口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李濟深任主席，廢除國民黨。南京下令討伐，廣州以其背叛三民主義，拒與合作。李濟深、陳銘樞欲謀求日本諒解，日本惡其聯共，反蔣全爲權位之爭，不加理睬。在中央大軍猛攻之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福州人民政府消滅，爲時僅五十三天。七個月內兩次抗日反蔣事變，俱歸煙消雲散。

五、中樞阢隍、各省戰亂

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後，廣州宣言反對，監察院彈劾汪兆銘。滿洲國成立，對日問題愈爲棘手，汪表示消極。是年八月，借口張學良不對日抵抗，反要索巨款，自請辭職，並勸張同去。蔣中正准張解除北平綏靖主任之職，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挽留汪兆銘。華北將領不平，蔣命張代理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一場風波暫息。一九三三年三月，張學良因熱河失陷，下野赴歐洲，汪兆銘復出。宋子文爲軍費問題，與蔣失和，孔祥熙代爲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從此孔在財政經濟上成爲另一大勢力。

中樞阢隍，地方軍人之爭，並不因國難當前而稍減。一九三二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軍閥割據的四川，一九二九年，曾有一次爭奪。一九三一年，劉文輝聯合據有重慶的劉湘共抗據有川北的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取得了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劉文輝再與鄧錫侯、田頌堯相戰，劉湘轉與川東的楊森援助鄧、田，一九三三年，劉文輝敗走西康。總計民國以來，四川大小戰爭多達四百八十餘次。據有貴州的周西成，一九二九年因滇軍進攻，兵敗身死。其後滇軍雖被逐退，黔軍又自相殘殺，直至一九三四年。

西北地區亦迄無寧日。一九二八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者二十萬人。一九三〇年，馮玉祥

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爲回教軍人的天下。一九三四年，擁兵三萬人，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山西、綏遠軍擊之於後，孫戰敗離軍。

一九三〇年，新疆哈密維吾爾人以不堪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的高壓，羣起反抗。金樹仁派兵攻剿，維吾爾人乞援於河西肅州的回軍將領馬仲英。馬年僅二十，而雄心萬丈，以不得志於甘肅，欲別圖發展，日人大西忠（Tadashi Onishi）從而鼓煽。七月，馬大破金樹仁軍，擬囊括新疆，不料遇到了有同樣野心的盛世才。

盛世才爲遼寧人，曾在上海、廣東、日本習政治軍事。一九三〇年任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金樹仁與馬仲英作戰失利，派盛爲剿匪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三一年十月，會同白俄「歸化軍」擊敗馬仲英。馬退回甘肅，一面擴充兵力，廣招東干回青年，一面聯絡新疆維吾爾人。一九三三年初，二次前來。金樹仁以盛世才爲總指揮進剿，馬部分擾天山南北，迪化被圍。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等與白俄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Papengout）發動政變，驅逐金樹仁，擁教育廳長劉文龍爲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爲邊防督辦，馬仲英仍進攻不已。

六、蘇俄動向、入侵新疆

瀋陽事變後不久，日軍進攻北滿。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弘毅警告蘇俄，勿助黑龍江當局，勿派兵至中東鐵路。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表示對滿洲衝突堅持不干涉主義。日軍佔領齊齊哈爾後，廣田再要求李維諾夫發表聲明，不援助馬占山，不以中東鐵路供中國運兵。李維諾夫重申不干涉政策，並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擱置不覆。一九三二年三月，滿洲國成立，蘇俄承認滿洲國對中東鐵路主權。八月，日俄簽訂新漁業協定，接着談判出售中東鐵路問題。

蘇俄對日本讓步，對中國的態度則完全不同。國民政府感於國際聯盟之無能爲力，謀改進對俄關係，願恢復兩國邦交。蘇俄雖亦以爲有此必要，惟久久不作決定，似乎仍想與日本妥協。一九三二年十二

月十二日，亦即兩次向日本重提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未獲要領之後，始與中國復交。第二天，日本正式拒絕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聲稱，對一國改善邦交，對他國並無不良影響，續請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終未如願。

中國所望於中俄復交的，消極方面為制止日本干預中東鐵路，蘇俄勿承認滿洲國，積極方面為給予中國物資援助。蘇俄惟恐刺激日本。日本定要獨有滿洲，根本排除蘇俄的勢力。一九三三年三月，扣留開往西伯利亞的中東路車輛，罷免俄籍路局局長。五月，蘇俄允將中東鐵路讓售與日本或滿洲國。中國提出抗議，蘇俄反謂中國已失去對該路權利。又說中國與蘇俄已無法保護該路，惟有將其出售，將來中國收回滿洲，可不費分文將該路收回。

日俄關於中東鐵路的談判，並不順利，討價還價，爭持不決。一九三四年三月，蘇俄恐中日妥協，外交副委員長索科林科夫(Sokolnikov)及軍事委員長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告訴中國軍官考察團，蘇俄對日戰爭有勝利把握，擊敗日本之後，必將滿洲交還中國，中國態度應當堅定，排除侵略敵人，中俄應當合作。一九三五年二月，滿洲國與外蒙古在貝加爾湖附近發生戰爭，三月二十三日，蘇俄即與滿洲國簽訂中東鐵路買賣協定，但並未因此而使日俄關係緩和。十月，兩國又在伯力衝突。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助滿洲國擊退貝加爾湖附近的蒙古軍。三月，蘇俄與外蒙訂立互助協定，日、滿軍續向外蒙邊境進攻。十一月，日德防共協定成立，對象自為蘇俄。

蘇俄在東亞退縮，在中亞前進，期與日本分有中國的西北、東北。一九三三年四月，新疆迪化政變後，國民政府為防止蘇俄乘機而入，派參謀部次長黃慕松前往處理。盛世才以未正式取得新疆邊防督辦，懷疑南京左袒馬仲英。於是聯合新由東北經西伯利亞退至新疆的義勇軍，擊敗馬仲英，誅除異己，幽禁黃慕松，南京承認他的已得權位，盛世才愈為榮耀。九月，南京續命司法部長羅文幹前來，調解盛與馬仲英之爭不成，戰事再起，迪化又為馬仲英所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金樹仁曾與蘇俄成立協定，蘇俄得在新疆貿

易，設置商務機構(蘇新貿易公司)，經營電氣、交通、畜牧、金融，新疆得向蘇俄購買軍火、飛機，聘用技術人員，未待實行，金樹仁被逐。迪化二次被圍，盛世才向蘇俄乞援。史達林以馬仲英有親日之嫌，盛世才傾向於共產主義，決予支持，合新疆、外蒙以對抗日本在滿洲、內蒙的勢力，派阿布林梭夫(G. A. Apresov)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的軍械相助。盛允新疆對外事務及重要人員任用，先與俄國相商，清除白俄歸化軍軍官，改由蘇俄派人統率，並給蘇俄以開礦築路權。反對聯俄的省政府主席被囚，東北義勇軍首領被捕，歸化軍指揮被殺。

伊犁屯墾使兼師長張培元為新疆另一有實力之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舉兵討盛世才，遭紅軍襲擊，兵敗身死。紅軍續攻馬仲英，馬敗走南疆，西退喀什噶爾。被誘入俄，一九三九年，死於莫斯科。

盛世才統有新疆後，一九三四年四月，宣布反帝、親蘇、民主(民族平等)等六大政策。七月，蘇俄派秘密警察來迪化，成立全省政治總管理局。¹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盛世才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五百萬盧布，新疆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交通、教育，悉歸俄人控制，有同蘇俄的殖民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盛世才又以「新疆政府」名義與蘇俄訂立另一協定，蘇俄負責維持新疆秩序、安全，不令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新疆如遭受外來攻擊，蘇俄即給以援助，新疆如決定獨立，蘇俄亦予援助。此一協定，一如日本與滿洲國「議定書」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仲英的舊部馬虎山起於南疆，進攻喀什噶爾。十一月，為蘇俄紅軍擊敗。一九三八年，紅軍第八團移駐哈密，扼新疆東道門戶，隔阻其與國民政府的往來。是年九月，盛世才到莫斯科，加入「聯共」，並請在新疆施行蘇維埃制度，未獲同意。

¹ 後改稱保安局，再改警務處。

第三節 國共全力搏鬥

一、九一八後的中共

內爭是國民黨的致命傷，日本明目張膽的武力侵畧，更是至大打擊。但對中共而言，則均屬有利。江西圍剿因粵、桂軍北進而頓挫，瀋陽事變突起，國民黨愈無力專對中共。中共中央以抗日之名，大事鼓動。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電組織羣衆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畧，推翻國民黨政府，驅逐國民黨軍隊。同日，通令黨員，謂此次事變，爲帝國主義者反蘇聯戰爭的序幕，無產階級者任務爲武裝保衛蘇聯，加緊組織，領導羣衆走到直接革命鬥爭，反對日本的暴力政策，消滅國民黨政府。三十日宣言，仍將繼續反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否認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之說。十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十二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國民黨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衆，聯合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同月，中共策動江西前線國軍孫連仲部約二萬人在寧都叛變，加入紅軍。¹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發布關於上海事件戰鬥綱領，仍不外同盟罷工，士兵與武裝民衆聯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並特別發布告第十九路軍及工人農人書。是後政畧戰畧均取攻勢，號召全國工人聯合抗日，組織「抗日救國會」，擴大紅軍與蘇維埃區，先將贛江以東、以西的蘇維埃區，連成一片。三月，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圍攻贛州未下。四月，朱德的第一軍團東入福建，佔領漳州。同月二十六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再強調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府，組織民衆抗日義勇軍及農工紅軍。這時中央蘇維埃區的面積約

¹ 中原戰後，孫連仲及所部三萬人投歸中央，調江西剿共。以官兵均北人，不習南方生活，遂生嗟怨。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爲中共黨員。乘孫不在軍中，聯合旅長季振同叛變，編爲紅軍第五軍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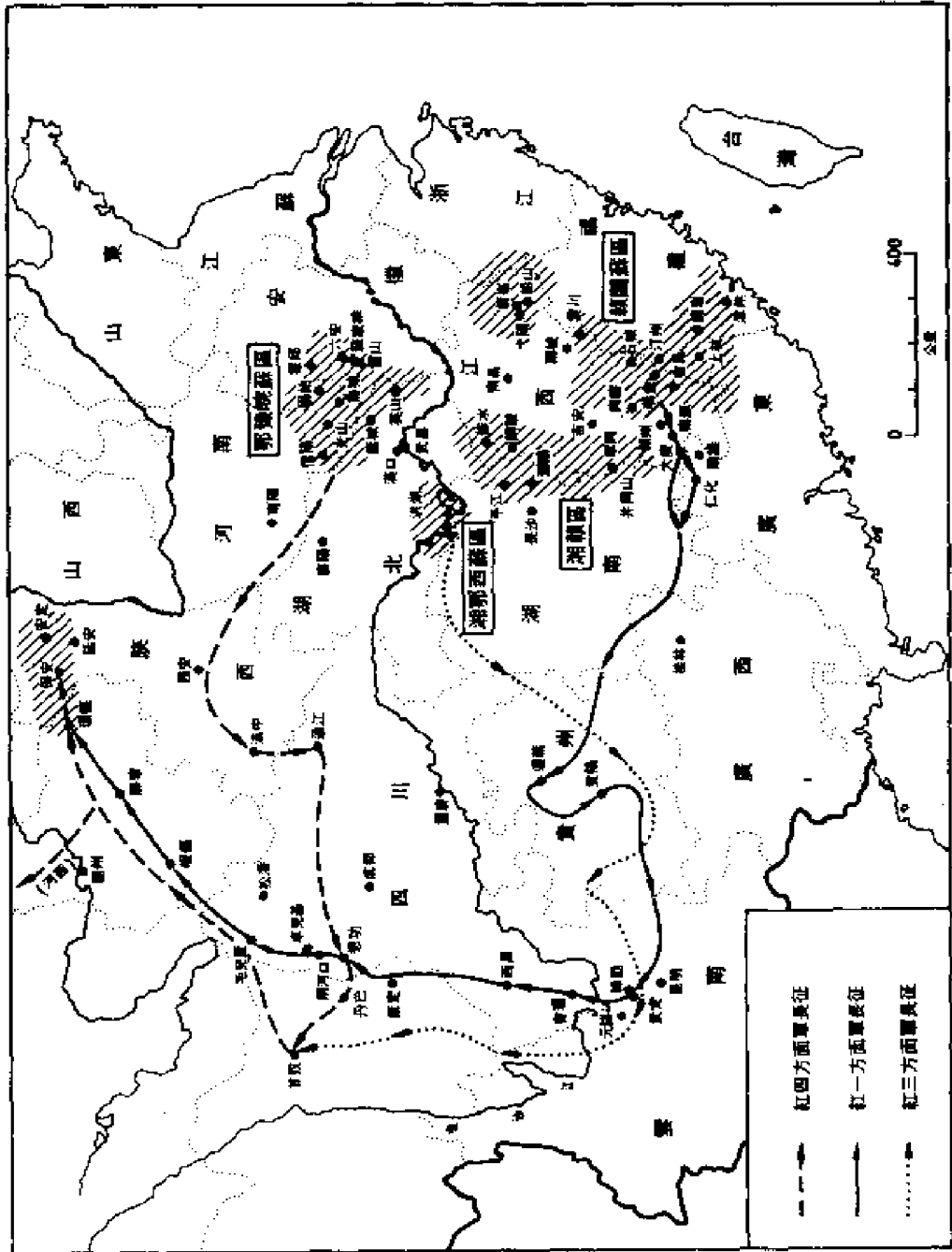
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萬，第一方面紅軍約七八萬人，鄂、豫、皖邊區的第四方面紅軍先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佔領湖北黃安，消滅國軍一個師。一九三二年二月，佔領豫南商城，四月，佔領瀕臨長江的鄂東蕪春，圍攻皖西六安蘇家埠，五月及六月，連破國軍，俘官兵一萬五六千人，鄂、豫、皖蘇維埃區面積擴大至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二百餘萬，紅軍四萬餘人。同時湘、鄂、贛區紅軍四出攻擊，湘、鄂西區紅軍重返洪湖，武漢外圍到處皆是紅軍。

二、鄂、豫、皖攻剿與第一支紅軍西走

中共謂「抗日必先反蔣」，決加緊推翻國民黨；國民黨謂「攘外必先安內」，決先剿滅「共匪」。平漢、津浦兩鐵路及長江航線為南北、東西交通命脈，武漢為中國心臟地區，均受到紅軍的嚴重威脅。蔣改變戰畧，先定鄂、豫、皖，再平江西。上海戰事結束，一九三二年五月，蔣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以政治治本，軍事治標，動員二十餘萬，半數為能戰的中央軍。

國軍大舉進剿，出乎鄂、豫、皖邊區蘇維埃領導人張國燾的意外。七月，東線紅軍鄭繼勛大敗於皖北霍邱，損失三千餘人，無異斷其一臂。八月，西線紅軍徐向前與國軍戰於鄂東黃安七里坪，傷亡二千餘人。九月，國軍攻破鄂、豫、皖區的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豫南新集，再合東路國軍攻破皖西紅軍基地金家寨。張國燾、徐向前及政治委員陳昌浩決定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留徐海東於鄂、豫、皖邊區。是月，紅四方面軍一萬六千人自豫南出動，經皖西、鄂東西走。十月，越過平漢鐵路。鄂中的賀龍亦於七八月間為西路國軍所敗，放棄洪湖地區，先走鄂北、豫西南，復退湘、鄂、川、黔之交，豫、鄂、皖三省攻剿告一段落，為紅軍的一大挫敗。

紅四方面軍，初欲在鄂北立足，因國軍的攔阻追擊，傷亡慘重，竭力避戰，繼續西行。十一月，經河南西南境，進向陝西，逼近西安，以輜重盡失，冬令尚着夏衣，乃翻越秦嶺，南入陝南，準備據為基地，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國軍窮追不捨，紅軍進向四川。四川軍閥之戰方



圖十六 國剿與紅軍長征（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

酣，川北爲田頌堯的防地，惟恐國軍以「剿匪」爲名，奪佔他的地盤，拒絕國軍入境。十二月，紅軍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里，所餘不足一萬人。翌年一月，佔領通江，這是第一支紅軍的長征。

紅軍入川之後，宣布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田頌堯對紅軍心存輕視，進攻挫敗。一九三三年三月至六月，紅軍盡有嘉陵江以東之地，兵力增至三萬人。八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南京派劉湘爲四川「剿匪」總司令，大舉進兵，迄未得手。一九三四年八月，紅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十二月，北入陝南，謀打通川陝，未遂，再返川北。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六月，與自江西前來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於岷江以西。

三、江西後期圍剿

江西紅軍及蘇區爲毛澤東一手創造，以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與總政治委員的地位，總攬黨政軍大權。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前敵委員會撤銷，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復代爲總政治委員。周與國際派對毛久有指責。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擴大會議，商討對抗第四次圍剿戰畧。會中批評過去毛澤東的措置不當，採取防禦主義，將紅軍帶至偏僻地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今後必須執行進攻路線，發展蘇區，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毛譏諷國際派只會背誦馬列教條，不根據實際情況及革命鬥爭經驗來決定政策。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爲第三次左傾路線，¹是後每一提及，猶有餘恨。事過四十年，尚斥陳紹禹等借國際力量，在全黨奪權，自己在中央毫無發言權。

寧都會議後，江西紅軍爲策應鄂、豫、皖紅軍作戰，並與贛東北紅軍聯絡，與政府軍在贛東、贛中連戰四個月，互有勝負。一九三三年一月，蔣委員長親來督師。二月，紅軍繼續攻勢，陳誠指揮的政府

¹ 瞿秋白時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爲第一次左傾路線，李立三時代（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爲第二次左傾路線。

軍遇伏受挫，折損約二萬人。三月，又有一個師失利。蔣因熱河不守，日軍南犯長城，離南昌北上，第四次圍剿停止。約在此時，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以環境困難，二為加強對中共蘇區的領導，總書記秦邦憲等前往江西瑞金。¹

中共的戰勝，政治的原因不亞於軍事。政府軍經過三次失利，亦有此認識。第四次圍剿之前，蔣已訂定政治重於軍事的策畧，尙未實施，中共已行先發。一九三三年四月，蔣復至南昌，準備第五次圍剿，「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推行政畧，改進戰畧，安撫組織民衆，嚴密對蘇區執行軍事經濟封鎖。軍隊所到之地，立即修築碉堡，開建公路，層層鞏固，節節進逼，步步爲營，緊縮包圍，以困長於游擊戰、運動戰的紅軍，使其誘敵深入、集中擊破一方之技無從施展，然後尋其主力所在猛攻。對於蘇區的對外交通，徹底阻斷，使一切物資，不能進入，蘇區特產（如烏砂、樟腦）不能輸出。真正所謂「圍剿」，可說是自此開始。一九三三年底，贛中、贛南一帶構成碉堡二千九百座，碉堡與碉堡之間，組成一條火線。此一政策，實際就嘉慶年間官軍對白蓮教、同治年間曾國藩對捻亂的措施畧加變通，不必是出於德國顧問的建議。

一九三三年二月，紅軍之所以採進攻政策，固由於過去的一再勝利，自信力倍增，謀突破國軍包圍，尤爲重要原因。中共福建省書記羅明，認爲敵人勢強，仍主採毛澤東的機動行動，必要時放棄若干城市，誘敵深入，加以殲滅。中共中央指爲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發動反羅明路線，亦即反毛澤東路線。擊破第四次圍剿後，中共中央爲對抗第五次圍剿，亦即對國軍的決戰，動員一切力量，不惜犧牲，「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以蘇區寸土讓敵人蹂躪。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分兵出擊，「兩個拳頭打敵人，」實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人李德（Otto Braun）的「全線禦敵」、「短促突擊」，打破敵人的「堡

¹ 一九三一年六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由陳紹禹繼任。一九三二年初，陳赴莫斯科，秦邦憲代之。

壘主義」。¹九月，國軍攻佔贛南黎川。十月，紅軍反攻，終不能攻下國軍的堡壘，被迫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的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一週後，莫斯科《消息報》指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毫無關聯，《真理報》謂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的鬥爭。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亦說，事變為國民黨的內爭，無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實際行動。仍是不革命的中間派，必然失敗。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朱德要求李濟深、陳銘樞採斷然行動，展開反日、反蔣的羣衆鬥爭，與紅軍訂立作戰協定，李、陳無此決心。福建人民政府崩潰的一天，毛、朱尚勸陳、李與紅軍合作到底，然已絕無可能，這應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錯誤。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推秦邦憲、陳紹禹、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為政治局委員，秦續任總書記。二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仍推毛澤東為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為張聞天，毛的權力益為削減。

國軍平定福州事變後，繼續以全力圍剿紅軍。過去福建一路為較弱的一環，現在大為加強。一九三四年三月，陳誠指揮的北路軍十萬人捷於江西南豐，紅軍傷亡數千人。四月，與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展開了十天的大規模陣地戰，攻下廣昌，突破中共蘇區的北面門戶，蔣鼎文的東路軍亦自福建西進。毛澤東主張以主力紅軍北進，縱橫馳騁於杭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迫使國軍回援，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和拼命主義。中共中央不予採行，決在廣昌之南構築工

¹ 李德於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一九三三年秋進入江西蘇區。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尚有一九三三年初抵上海之傅利德（Manfred Stern）、艾維特（Arthur Ewert），亦均為德人，另有一俄人，二美人。

事，同時作突圍準備，命贛東北區紅軍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向閩、浙、贛邊，再入皖、浙、蘇腹地，湘、贛邊區紅軍進向湘東、廣西，分散國軍兵力，並加緊擴軍，至不得已時，實行突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蘇區僅有九縣。七月，北路國軍續進，紅軍力拒不敵。八月，激戰於廣昌、石城之間，國軍以大砲飛機猛攻猛炸，紅軍由周恩來親行督戰，為第五次圍剿陣地戰的高潮，瑞金的北方屏障驛前為國軍所得。九月，東路國軍攻下瑞金的東方屏障長汀、洋嶺。¹十月六日，北路國軍左翼攻下石城，右翼逼近興國，紅軍完全陷於包圍，國軍第五次圍剿獲勝，亦為紅軍反包圍的失敗。是役國軍出動五十萬人，飛機二百架，參戰的紅軍十五萬餘人。國軍裝備優良，補給便利，紅軍遠非其比。贛南、閩西的人力物力有限，國軍的堡壘封鎖政策，更使紅軍倍感困難。

四、第二支紅軍西走——長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蕭克、任弼時率湘、贛邊區紅軍第六軍團約六千人，向湖南挺進，謀先合湘、黔間的賀龍，再合四川的張國燾、徐向前，此與一八六四年南京不守後進向江西的太平軍的企圖有相似之處。九月，蕭克、任弼時抵達黔東。十二月，與第二軍團賀龍會合，成立第二方面軍，共約一萬五千人，賀龍任總指揮。留於鄂、豫、皖邊區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由徐海東率領亦於十月西去。一九三五年六月，進入陝西，穿過甘肅東部，九月，與陝北紅軍劉志丹會於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徐海東任總指揮。

近四個月以來，江西中共中央積極補充兵力，征集糧秣、民伕，趕製彈藥、服裝。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自瑞金、雩都西趨，第一、第三軍團（林彪、彭德懷）當前敵，第五軍團（董振堂）為後衛，第八、第九軍團（周昆、羅炳輝）任掩護，各機關人員編為中央縱隊，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均在其內。周恩來、朱德任最高指揮，此又與一

¹ 有謂國軍原擬壓迫紅軍東退福建，於贛海地區加以消滅，以東路軍猛力推進，紅軍不得不挺而西走。其實西走為紅軍既定的計劃，東退無異絕路。

八五一年太平軍由廣西金田突圍的情形相似。以項英爲中央蘇維埃軍區司令員，陳毅爲政治部主任，龔楚爲參謀長，統三萬人，分留於贛南、閩南。¹蔣委員長爲阻止紅軍突圍，九月初，命西路湘軍、南路粵軍堅密戒備，但此兩方的堡壘未全部構成。十月杪，紅軍突破贛、粵間的第一道封鎖線，渡過贛江，進入湖南。十一月，突破粵、湘間的第二道及粵漢鐵路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向廣西。蔣先命薛岳率中央軍八個師自江西追剿，再命何鍵率湘軍七個師自湖南追剿。紅軍攜帶大批機器、電台，行動滯緩，軍心驚恐，且行且戰，處於被動。抵達廣西、湖南邊境，遭白崇禧的桂軍五個師與湘軍夾擊，雖衝過第四道防線，損失已經過半。十二月，經湘南入黔東，全部僅存三萬餘人，謀合賀龍不成，決先在貴州建立根據地。黔軍聞風而逃，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搶渡烏江，佔領黔北遵義。此爲紅軍長征的第一階段。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紛責中央領導不當，戰畧謬誤，周恩來一同附和，決改組中央，張聞天代秦邦憲爲總書記，毛澤東補爲政治局委員，代周恩來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及朱德任副主席，重整紅軍，拋棄笨重器物，伺機北渡長江，通知川北的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從此毛澤東掌握了中共中央。此爲紅軍長征的第二階段。

一月至三月，紅軍往返黔北，謀入四川，與川軍相戰不勝，又受追剿軍的威脅，折而南走，經貴陽之東，西趨黔西，行動飄忽，如入無人之境，追剿軍落後。四月下旬，紅軍入雲南，兩路佯作進攻昆明之勢，實爲趨向金沙江，另一路則一直抵金沙江（長江上游）右岸。此爲長征的第三階段。五月初，紅軍開始北渡。西康劉文輝既未設防，

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以顧祝同、蔣鼎文分任江西、福建綏靖主任，委派十三個綏靖司令，另有一個綏靖隊司令，由陳誠任總指揮，清剿殘餘紅軍。一九三五年一月，贛東紅軍，即北上抗日先遣隊方志敏在浙、贛之交被消滅。贛南紅軍以國軍不斷攻擊，三月，大都潰散。項英、陳毅匿避大庾山區，閩南紅軍張鼎丞、鄧子恢匿避武夷山區。五月，擬向湘、粵、桂邊區發展的龔楚，自湘南逃亡。中共首要瞿秋白自贛南出走，三月在閩南被捕，六月十八日在汀州處死。

雲南龍雲但望紅軍早日離境，不告以紅軍行動實情，紅軍遂於七日七夜之間，渡過了金沙江，進入西康，參謀長劉伯承爲前隊，循七十年前太平軍石達開走過의故道，兼程前進。五月下旬，奪佔大渡河、瀘定橋，北入四川。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川邊懋功。此爲長征的第四階段。

紅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軍容鼎盛，紅一方面軍九個月來疲於奔命，彈藥缺乏，服裝不整，僅餘一萬人，相形之下，紅四方面軍不免驕矜高傲，張國燾在中共的資歷又高於毛澤東，不滿毛之獨操大權。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撫邊（兩河口）召開軍事會議，毛主席主張北上寧夏，靠近外蒙古，希望獲得蘇俄的援助。張建議三個方案：一爲以川康邊境爲根據地，向川、陝、甘邊區發展，以西康爲後方。二爲進向陝、甘北部，奪取寧夏，與毛的北進計劃相同。三爲進向甘肅河西，以新疆爲後方，即西進計劃。毛反對一、三兩計劃，其實他們均欲靠近蘇俄。最後決定加派張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及第四方面軍歸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繼續北進。一方面軍爲左路，由彭德懷、林彪率領；四方面軍爲右路，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負責抗拒東面國軍，掩護左路軍北上。

撫邊會議後，毛澤東、張國燾的隔閡益深，四方面軍對毛亦感不快，甚至認爲受到歧視。朱德從旁調解，以張任紅軍總政治委員，與朱指揮全軍。但毛仍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獨斷獨行。七月中旬，中央政治局與軍事委員會在卓克基（撫邊西北）舉行聯席會議，毛批評四方面軍以往犯了錯誤，陳昌浩則提出遵義會議是否合法及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問題，主張改組中央，由張國燾任總書記。一方面軍斥張國燾爲老機會主義者，欲摧毀中央。這時薛岳的進剿軍已入四川南境，來自甘肅的國軍胡宗南已控制北方的松潘，川軍又逐步進逼，因決定先行北進，日後重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卓克基西北）舉行會議，毛澤東、張國燾又起爭執。由於當地糧食不足，不能久留，決定先進

向甘肅南部，張國燾、朱德、及徐向前、陳昌浩分統四方面軍爲左路、右路，彭德懷、林彪統一方面軍爲中路，護衛中央人員，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羅炳輝殿後。

八月二十三日，紅軍三路出動，進入沮洳草地，艱辛萬狀，朱、張的左路軍爲大雨所阻。九月初，徐向前、陳昌浩的右路軍擊敗國軍於松潘西北的包座，毛與中路軍彭德懷、林彪乘機挺進，改稱「北上先遣支隊」（一稱甘肅游擊支隊）。此爲長征的第五階段。張國燾以爲被毛所賣，左路軍傷亡復重，國軍已有準備，跟續北進，可能全軍毀滅，遂命左右兩路軍折而南下，奪佔成都西北地區，朱德同行。張斥毛失掉了革命勇氣，置他軍於不顧，只想逃往蘇俄。毛斥張動搖，反黨反中央，害怕國軍的飛機大砲，只想在川康苟安。九月中間，毛率北上先遣支隊約七千人進至隴南，未遇重大抵抗，再越岷山及隴東六盤山，到達陝北。十月二十二日，與徐海東、劉志丹的紅軍第十五軍團相會。此爲長征的第六階段。計自江西突圍以來，爲時一年，軍行二萬五千里，九萬之衆僅存三千人，加上陝北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上下。

張國燾、朱德沿大金川而南，約於九月中旬，再至卓克基，與徐向前、陳昌浩會議，不承認原有的中央，另立臨時中央，張任總書記，繼續南下。十一月，佔領西康天全、蘆山等縣，氣候暖和，食糧無虞。十二月，因國軍薛岳部猛攻，飛機轟炸，紅軍損失五千餘人，川軍十餘萬分路合圍，藏番又仇恨漢人，漸感不易立足。一九三六年二月，再爲薛岳所敗，被迫西北走，戰死餓死者不少。四月西南退至瞻化、甘孜一帶，存者約三萬人。

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軍第二方面軍因未能與第一方面軍相會，仍留湘黔之交。一九三五年八月，向西轉移，十一月，經黔東、黔西入雲南。一九三六年四月，渡金沙江入西康，六月，與紅四方面軍合流，原有一萬餘人，僅餘三千。

五、轉移西北後的紅軍

一九三二年以後，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日漸擴大。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勢力益張。原駐河北的東北軍十四個師因日本的壓迫，調赴陝、甘，于學忠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主要任務為防止自四川北來的紅軍，對劉志丹尚不十分重視。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合後（見646頁），十月，連破東北軍於延安以南，俘虜五千餘人。毛澤東到後，十一月，再度獲勝，又殲滅東北軍一個師，陝北盡為所有。中共雖失去了長江南北的蘇維埃區，陝北的根據地反趨穩固，中共中央設於安定瓦窯堡。¹

陝北貧寒，南路又被封鎖，紅軍衣食無着。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以「抗日先鋒隊」旗幟，東渡黃河，分趨晉中、晉南，蔓延十餘縣。蔣委員長派兵赴援，晉軍竭力抵抗，紅軍於掠得物資後，五月初復返陝北。²六月，兩廣亦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中央軍自西北南調，紅軍以與張學良已有諒解，主力轉往寧夏、甘肅。

留於西康的張國燾，經共產國際調解，改臨時中央局為中央西南局。以西康糧食缺乏，難以生存，是年七月，與朱德、賀龍、徐向前取道川邊草地，北入甘肅。張國燾仍不忘西進，組織西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統二萬人當前路，張自統一萬餘人繼進。十月，徐、陳由寧夏趨河西，張被阻於黃河以東，不得已東去陝北。³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陳昌浩屢為回軍騎兵所敗，一九三七年一月，高台（甘肅東南）之役，傷亡尤重。三月，再敗於肅州，殘部七百餘人，西走新疆。⁴

¹ 總書記仍為張聞天，毛澤東仍為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秦邦憲代張聞天任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六年六月，瓦窯堡為國軍攻佔，中共中央退保安。

² 是後，劉志丹戰死，所部歸高崗統率。

³ 張國燾到後，受到毛澤東的鬥爭，極不得意。

⁴ 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戰死高台。徐向前、陳昌浩及李先念在肅州敗後，共產國際派人迎至迪化，再轉陝北。

第四節 日本進圖華北

一、緩和中日關係的嘗試

對日本來說，塘沽協定不過是割裂華北的初步，尚未能使其與中國完全脫離。對中國來說，總算暫時滯延了日本的侵畧，得以繼續進行安內工作，並力圖爭取外援。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僕僕風塵，歷訪美、英、法、義、德及國際聯盟，出席世界經濟會議，顯著的收穫為中美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的成立。英國允以庚子賠款四百七十萬鎊用於完成粵漢鐵路，義、德與中國的關係，漸臻密切，國際聯盟設置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派專人駐紮中國。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一再指摘國際聯盟對華合作及中美棉麥借款，助長歐、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義，勢將釀成類似瀋陽或上海事變。列強對華援助為破壞東亞和平，如不改變態度，日本將講求適當的應付手段。

國民政府為緩和對日關係，七月二十八日，蔣中正、汪兆銘聯名宣布，將以全力謀國內和平，國際安定，消除「匪」(共)患，充實國力，不簽訂割讓或承認條約，需求國際同情與協助，但不縱橫捭闔。八月，汪自兼外交部長，以熟悉日情的唐有壬為次長。日本外務省發表談話，中國如誠意容納日本主張，確謀與日本親善，日本可考慮一切。此時日本所要求的為華北與東北通車(北寧鐵路)、通商、通郵、通航(航空聯絡)，長城各口由日本警備，造成中國承認滿洲國、以長城為界的事實。九月初，蔣、汪再度決定，絕不承認滿洲國割據東北四省，其他次要問題，仍可與日本周旋，並避免刺激日方的行為言論。終以對長城各口日軍無可如何，十一月，予以承認。但日本定欲置中國與滿洲國於其領導之下，使華北脫離南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美國蘇俄復交，一九三四年一月，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為文論遠東情勢，謂美俄諒解為對日本警告，遠東文

明前途大半視中國在本世紀之行動如何。二月，莫斯科發表遠東特別紅軍總司令白魯傑演說詞，謂遠東如有軍事衝突，紅軍必予以重大打擊。同月，英俄商約簽字。三月，中國軍官考察團到莫斯科，中俄大有軍事合作可能（見638頁）。德國前國防部長薩克德（H. von Seeckt）於是年來華，任軍事顧問團長，¹義大利海空軍顧問亦先後而至。於是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Eiyi Amau）的聲明，謂日本對中國關係特殊，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乃日本的使命，中國如利用他國勢力以排斥日本之任何企圖與行動，均必加以排擊。各國如對中國採共同行動，縱令為財政或技術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對。最近對中國售賣飛機，建築機場，教練飛行技術，派遣軍事顧問，供給政治借款，日本定必反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復稱，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訂立任何契約，須先與日本相商，中國購買飛機必須制止。

天羽聲明為對中國的警告，亦為對列強的警告，率直的揭示獨佔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公開反應為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不承認某一國家在任何地方獨負維持和平責任。中國有提倡國際合作的義務，無中傷他國及擾亂東亞和平意念。他國對中國苟無野心，對於中國與他國合作、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不必過慮。中日間之真正永久和平，須建立於善意與互相諒解之基礎上，並應糾正現有之不平事態。數日後，二次聲明，中國主權與獨立國格，不容任何國家稍予損害，中國與他國關係，不容任何國家稍予干涉。對內努力肅清「匪患」及生產建設，對外致力於國際安全保障，維護國聯盟約、九國公約。

英、美、法、德、義、俄輿論對日本紛紛譴責，英國正式照會，聲明維護九國公約，不容任何國家破壞，美國亦稱中美關係有條約規定，非經合法手續不得修正或廢止。任何一國未經關係國同意，不得一意獨斷而涉及他國的正當權利義務，盼日本尊重美國權益。

蔣中正對天羽聲明的反應，為當時未曾發表的兩篇演講，一為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撫州對前線將士的講演，十年後必將日本逐出東北，

¹ 關於德國顧問團事，見667頁。

收復台灣、朝鮮；一爲七月二十四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演，必須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但根本方針則爲先求國內和平、安定、統一、集中。不久江西軍事告一段落，紅軍雖仍待肅清，但政府處境已大改善。十一月二十七日，蔣對日本記者談話，主中日以道德、信義爲基礎，解決糾紛。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汪兆銘在國府紀念週演說，希望日本打開僵局。二十二日，日外相廣田對國會演說，中日懸案（通車、通郵）已漸解決，¹仍期中國覺悟，共同促進此種傾向。二十九日，蔣接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三十日，接見有吉明，二月一日，發表談話，中日須開誠相見，中國應改正反日情緒，日本應改正對華優越態度。同日發表《敵乎？友乎？》盼中、日從大處着想，相互提携。中國應盡力消滅戰機，不應聽僵局延長，日本要認清事實，知道控制或消滅中國皆不可能。以往中國誤於虛驕，今後不計較一時榮辱，只要日本歸還東北四省，謀過去懸案的互利解決，彼此可直接談判。如中、日鬥爭，結果必將同歸於盡。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國民黨之後者爲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明令敦睦中日邦交。次日，蔣告日本記者，要打破中日難局，首須恢復兩國正常關係。黃郛亦告土肥原，在滿洲國問題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不再侵害中國領土及主權。二月二十日，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願以誠意及和平方法，循正當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一天，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開始與廣田及其他日本軍政要員會談，建議促進中日經濟提携與互相融和。蔣再與汪兆銘通令，嚴禁反日。三月一日，廣田在國會宣布，將一反以前地方當局交涉的政策，而與中央政府談判。五日，國民政府重下保護人民自由人權令，也就是不准抵制日貨，日方表示滿意。五月七日，中日公使升格爲大使，此爲中日嘗試和解的具體表現，亦爲唯一成就。

¹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北平、瀋陽通車，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關內外通郵。

二、加緊分割華北——河北、察哈爾事件

滿洲國出現後五個月，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政府製訂的今後對華政策，為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蔣、親日。攻奪熱河後一個月，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決定將中國與滿洲國並列，同歸日本領導，使華北成為日、俄作戰時的緩衝區。塘沽協定所劃的非武裝地帶，為此一計劃實行的開始，是後圖謀愈急，期消滅中國政府在華北權力。十月，華北部分將領，因日人構煽，倡議聯省自保，黃郛詳切懇勸，曉以對日、對共難題，事乃解息。十二月，日本內閣再議定對華分治方法，務令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脫離國民政府。一年多來，黃郛以內外煎迫，心力交瘁，日本的侵凌迄無止境，久欲引退。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又向察哈爾尋釁，黃感難再為力，南去不返，駐平政務委員會名存實亡，日本認為消滅南京在華北的權力已至，於是有所謂河北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借口最近天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人暗殺，與中國官廳有關，¹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抗議，並發表談話，說是此係蔣對日二重外交的鐵證。二十一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曠使日軍滋鬧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黨部，指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市長張廷諤為暗殺主使人。二十九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高橋面見何應欽，謂兩報社長之被暗殺、河北遵化縣長之庇護熱河義勇軍，皆為對日、滿的挑戰騷亂行為，破壞塘沽協定。又說蔣對日佯示親善、暗中準備抗日的政策，必須改變，要求罷免于學忠、張廷諤，撤退北平憲兵團、河北省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藍衣社、²及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否則即出以

¹ 兩報社長為《振報》的白逾樞，《國權報》的胡恩溥，均親日而反國民黨，於五月三日被暗殺。

² 一九三二年初，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三民主義力行社」，擁蔣反共反日，賀衷寒、桂永清、鄧文儀、曾廣情、戴笠及非黃埔軍校出身的劉健羣為中堅，人稱藍衣社。旋於力行社之下，成立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及軍事情報處。軍事情報處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主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另有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任務與「軍統」同，陳力夫、徐恩曾主之。一九三四年，力行社擴大為復興社。

斷然處置。

截至六月十日，中國一一接受，于學忠部（東北軍）一併調離河北，由何應欽口頭答覆，即所謂「何梅協定」。高橋迫令書面承諾，南京不許，何離北平南下，終於七月八日照辦，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了對河北省的統馭力。繼之而來的是察哈爾事件。

塘沽協定簽訂後，關東軍決進圖察哈爾，錫林果勒盟副盟長德王（德穆楚克棟普）暗與相通。一九三三年八月，蒙軍自熱河佔領多倫，設察東特別自治區。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政府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於綏遠百靈廟，以德王任秘書長。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指察東某地屬於熱河，強察省主席宋哲元撤回駐軍。六月，又借口日本特務人員在張北受阻，提出抗議。南京將宋哲元免職，關東軍續向代理察省主席秦德純壓迫。六月二十七日，秦德純接受了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條件，撤退張家口駐軍及國民黨黨部，解散排日機關，協助日人在內蒙活動，允許不向察省移民。是為「秦土協定」。十二月，蒙軍進入察東六縣，察哈爾大半淪陷。德王氣焰益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成立內蒙軍政府於察哈爾嘉卜寺，自稱總裁。

三、加緊分割華北——廣田三原則、河北自治運動

何應欽離北平後，華北羣龍無首，惶惶不安。「秦土協定」簽字的第二天，漢奸白堅武糾合中日匪徒三百餘人，奪據北平附近豐台的鐵甲車，欲一舉佔有北平，組織所謂「華北國」，被駐軍擊潰。

國民政府仍不放棄改進中日關係的嘗試，命駐日大使蔣作賓依下列原則與日本談判：一、中國對東北問題暫置不問；二、兩國關係應立於平等基礎之上，以互惠原則，促進經濟提携；三、在經濟提携基礎上，締結軍事協定。這可說是重大讓步。廣田與軍部所定的新政策為：一、中國須先徹底取締排日，拋棄依賴歐、美政策，採親日政策；二、中國對滿洲國暫作事實的默認；三、為排除未來自外蒙的赤化威脅，中國應在與外蒙接壤地帶，依日方希望，作各種協力設施。俟中國對

以上三點誠意實行時，再與中國建立親善提携關係。此即所謂「廣田三原則」¹。簡單的說，不外中日親善，尊重滿洲國的存在，共同防共。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作賓與廣田開始會談，希望取消日本在華一切特權，兩國維持真正友誼，廢除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及關於華北的一切約定，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狀態，中國願設法停止排日，不談滿洲問題，凡對中日有利之事固當爲之，對日本有利而對中國無利之事亦可商量。十月，廣田要求同意三原則，蔣作賓答以中國處理與其他國關係事件時，斷不使中、日關係受到不良影響，尤無排除或妨害日本之意，日本亦須如此。中國對於滿洲現狀，決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引起變端，且將設法保持關內外人民的經濟聯絡。在不妨害中國主權獨立原則下，中國擬與日本協議防範中國北邊之有效方法，廣田指爲空洞。

日本軍人始終不放鬆分割華北活動。宋哲元爲華北非中央系統之有力將領，早已聘有日本顧問。「秦土協定」後，宋軍撤離察哈爾東北境，移駐張家口以南，繼調防北平。八月，國民政府正式裁撤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爲平津衛戍司令，²同時日本武官分向山西閻錫山及河北、山東、綏遠省主席商震、韓復榘、傅作義誘煽。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公然發出文書，聲言與國民黨現當局決不兩立，³盼華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日本內閣正式通過陸軍大臣的鼓勵華北自治案。十月，冀東停戰區香河縣「國民自救會」出現，號召「反蔣倒黨」(國民黨)。天津請願團召開市民大會。十一月初，土肥原、多田分促宋哲元、韓復榘組織自治政府，宋、韓請中央開放政權，亦即准許自治。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限宋於十天之內表示態度，否則日軍即攻取河北、山東。十七日盛傳宋將宣布自治。

¹ 曾任馮玉祥顧問的日人松室孝良，此時正在華北活動。宋被免去察哈爾省主席後，難免不平，松室可能乘機而入。其後松室之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即爲便於與宋勾結。

² 文中有「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服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語。

蔣中正對於廣田與軍方之相互爲用，十分明瞭。時四川剿共已近尾聲，中央政府在西南三省的權威已經樹立，決定對日強硬，準備一戰，使其知難而退。十月初，分於豫、魯、蘇之交及南京、上海之間，集結重兵，並親赴太原、泰山邀閻錫山、馮玉祥入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與全國代表大會，復派考試院長戴傳賢赴粵與陳濟棠、李宗仁商談團結，陳、李推過去反蔣最力的鄒魯偕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北來。十一月八日，蔣命參謀本部次長熊斌飛北平，向宋哲元傳達中央計劃，戒以勿自作主張。日本有所忌憚，決定不在此時迫令華北自治。十一月十九日，蔣對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講述外交方針，「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換言之，中國願對日本和平，惟不再退讓，和或戰任日本自擇。

日本大使有吉明請蔣對華北自治運動勿用武力壓制，否則關東軍不能默視。對於中央軍之集結河南、山東，應予注意，並詢對於廣田三原則看法。蔣謂凡違反中國完全主權，妨害中國統一的制度，絕不容忍。華北無人希望自治或獨立，絕不至發生事故。縱或人心有所動搖，地方軍人必能服從命令，施以鎮壓，無庸中央用兵。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將予撤銷，另派大員坐鎮，與日方就地商討。至於廣田三原則，他全然同意。盼及早商討具體實施辦法。但廣田三原則與華北問題關係密切，如華北發生事故，三原則之一二兩項，皆無由商談及實行。日人策動的華北自治，實與三原則相矛盾。

日本並無定要用兵的決心，蔣的表示雖然十分堅定，亦留有餘地。於是東京改變策略，命土肥原、有吉明先促成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輕度自治，再依廣田三原則談判。土肥原一面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一面命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平以東的通州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尋改稱自治政府），轄二十五縣。這是日本在華北製造的一個小型傀儡政權。同日，天津奸徒要求河北保境自治。北平、天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夢麟、胡適等宣言反對一切脫離中央自治機構的舉動。

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對華北的新措置，裁撤軍事委員會北

平分會，派何應欽爲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爲冀察綏靖主任，拿辦殷汝耕，但未獲日方諒解。次日，日軍佔領豐台，扣留車輛，土肥原迫宋哲元於本月內表示態度。宋請辭新職，並向蔣說明形勢，謂有主自決、有主自治，請因時利導。蔣不顧日方反對，命何應欽北上。天津《大公報》忠告宋哲元勿自肇分裂，勿譏責民意，捏造自治，希望他與何應欽爲和平折衝，保國家最後立場，盡睦鄰最大努力。十二月五日，何與宋的代表蕭振瀛、秦德純商定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

十餘日前英、美已在交換關於華北問題意見，十二月五日，英外相賀爾（Hoare）在國會演說，謂日本使用力量支配中國內政發展及行政系統，英國將認爲不幸。美國務卿赫爾（Hull）的聲明，使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聲明說：華北現正發生非常重要並有遠大影響的政治紛爭。此事不僅關係中國人民，且關係全世界。美國正在密切注意此一反常發展，深望各國政府與人民信守諾言，尊重條約規定。東京感於英、美壓力加重，中國態度堅決，乃接受冀察政務委員會方案，先實現河北、察哈爾兩省輕度自治。委員人選，由中日雙方擬定，以宋哲元爲委員長，¹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何應欽返回南京。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係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爲華北自治行政機構。至於殷汝耕的通州政權，照舊存在。

四、南京北平談判

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同時，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以張羣爲外交部長，蔣作賓、吳鼎昌、張嘉璈分任內政、實業、鐵道部長，何應欽仍任軍政部長，均爲了解日情的所謂和平派。張羣發表外交方針，以不侵害主權爲限度，以互惠平等爲原則，謀中日政治協調、經濟合作，以合法途徑解決不平等條約。廣田認爲情況已漸好轉，中國已了解三原則大綱，今後願交涉細目。

¹ 委員十六人，包括宋哲元系、東北系、舊皖系、舊直系人物及平津士紳，大都爲與日本接近的軍人、官僚政客，宋與蕭振瀛、秦德純爲核心，蕭兼天津市長，秦兼北平市長，宋部師長張自忠任察哈爾省府主席。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少壯軍人暴動，戕殺藏相高橋是清等，襲擊首相岡田啓介官邸，軍部控制了中央政權。三月，廣田繼任首相，等於傀儡。新任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八郎與張羣會談四次，要求以廣田三原則為調整中日關係基礎，張羣主先談東北問題。未幾有田回國，擔任外相，與關東軍商定，將來外交，除南京外，更以北平、廣州為對象，助其發展，而以共同防共為中心，並確立中國與滿洲國的正常關係。

一九三六年初，陝北紅軍東入山西，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與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屢與宋哲元談及防共之事，松室在北平設立駐屯軍司令部部附辦公處，任務是從速使華北局勢明朗化。五月，日本開始增兵，有逼走宋哲元代之以親日派、使華北成南京、廣州以外的第三勢力之說。廣東借口抗日，出兵湖南。

七月，蔣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明對日外交的最低限度為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九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與張羣舉行過三次談判，除了共同防共、華北五省自治，國民政府尚須儘量聘用日本顧問，在中國全境實行經濟提携，減低關稅，徹底取締排日，其嚴重性超過以往的二十一條及中日軍事協定。張羣拒談防共問題，要求廢除塘沽協定及上海協定，中國有權在察哈爾、綏遠剿匪，取消冀東自治政府，取締華北走私，華北日軍及日本飛機不得任意行動。時兩廣問題已了，九月二十五日，蔣通知何應欽等，謂日本決心與中國一戰，應速籌具體方案。廣田命川越與蔣直接交涉，試探蔣的真意所在。十月八日，蔣告川越，一切問題須以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為原則，從容協商。張羣、川越又續談三次，癥結所在仍為防共與華北特殊化二事。蔣發表談話，謂恢復河北行政完整，取締察哈爾北部匪軍為必要限度，至於中國剿共方針，決定貫徹。是後張羣、川越續行談判，僵持如故。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來，日本對宋哲元步步進迫，增兵之外，浪人

走私猖獗，飛機任意飛行。宋部將領無可再忍，準備強硬對付，宋亦表示主權必須保全，北京學生向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請願，勿離開北平。七月，大沽口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東京聲言，中國如忽視日本的特殊地位，對華北將益嚴厲。接着日本在北平、天津附近連續演習。九月二十三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發出最後通牒，華北自治外，並要求中日經濟提携，南京堅持不可。十月至十一月，日軍又大舉演習，甚至穿過北平市區，各大學學生停課，以示哀悼，宋哲元亦命第二十九軍演習，學生贈送大批慰勞品。宋公開聲明，決不甘為亡國奴，中日經濟合作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

德王自組織內蒙古軍政府後，蒙軍一再侵畧綏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得關東軍支持，復行來犯。中國宣稱決不稍予姑息，必盡力剿滅。十一月二十六日，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部克復蒙軍盤踞的百靈廟，這是五年來中國的首次攻勢。關東軍聲言蒙軍進攻綏遠，在防共自衛，萬一累及滿洲國，或發生中國全土瀕於赤化之危殆事態，關東軍即採取適當處置。中國再度聲明，蒙偽匪軍犯綏，不問背景作用若何，決予痛剿，中國領土主權不容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干涉。蔣委員長間接表示，如匪軍繼續侵擾，中國定以全力出擊，不惜任何犧牲，不受任何方面威脅。率軍赴援的軍政部次長陳誠稱：「人所待我者為不戰而屈，今後我決戰而不屈。」日本外務省聲明如在華日人生命財產受危害之時，將採必要措置。中國外交部亦發表談話，任何外國在中國領土內採取非法行動，斷不容許，必設法排除。

第五節 聯合抗日運動

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一九三〇年起，「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藝作家聯盟」、「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會」、

「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社會科學家聯盟」、「反帝大同盟」，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¹

瀋陽事變發生，舉國憤慨，紛責政府之不抵抗，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請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學生毆打外交部長，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絕交宣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一萬人包圍國民政府。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示威團，高呼「全國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打倒賣國政府」，佔據火車站，堅持進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學生搗毀國民黨市黨部，圍困市政府，杭州、武漢等地，有相同舉動。十九日，宋慶齡宣言，謂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惟有爲民衆而奮鬥的革命勢力，可以剷除帝國主義。國民黨內之反南京政府者，從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應集南京的學生總示威，有「打倒國民黨」，「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農工兵聯合起來」口號。十二月十五日，再鬧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毆辱。同一天，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十七日，學生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西安、太原國民黨省黨部亦被搗毀，此爲九一八後，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一階段。

這時學生尚乏嚴密組織，在政府壓制之下，漸歸消沉。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北平學生竟有「愛國有心，救亡無術」之語，借故逃課、罷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動則轉趨積極。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會」要求全國抗日。四月，西安學生組織抗日會，再搗毀國民黨部。五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毆傷與日本談判停戰的代表郭泰祺，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六月，上海「救國團體聯合會」抗議政府封鎖言論。十二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

¹ 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藝作家二十四人處死，魯迅匿避。

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馬良（相伯）、章炳麟等爲熱河棄守，痛詆政府。九月，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組織「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馬良等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及基本綱領，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全體人民總動員，由農工兵學商代表組織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成立。於是學生運動再起，直接的刺激爲日本加緊侵畧華北。

一九三五年，學生對河北、察哈爾事件無何表示，繼起的華北「自治運動」激起了洶湧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個學校學生自治會向國民黨致送請願書，猛烈攻擊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恢復。十二月三日，因「冀東自治防共委員會」出現，學生決定遊行，美國記者斯諾（E. Snow）夫婦曾預聞其事。十二月九日，學生一千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運動，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是爲「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六日，復因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置，學生指爲變相的自治，二次遊行，參加者近一萬人，三百七十餘人被毆傷，十四人被捕，風潮延及廣州、上海、濟南、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開封，又有強行進京請願之舉，京、滬、漢戒嚴。中共一再宣稱支持，鼓勵農工學兵共組國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中正約各地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及大學生代表談話，謂決不簽訂任何有損領土主權條約，如至最後關頭，不惜一戰。北京、天津左派學生仍然不滿，教育部宣稱必要時將採取斷然處置。三月，北平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數十人被捕，四月，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解散。五月，平、津、滬學生爲反對日本出兵華北及日人走私，罷課遊行。這是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二階段。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雖一再宣布反對日本侵畧，仍不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立場，否認與之共同抗日，並號召武裝保衛蘇聯（見 640

頁)。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戰敗西走，政府軍行將以全力圍剿（第四次）江西紅一方面軍，日軍奪佔山海關，準備進犯熱河之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及團體，結為共同抗日聯盟。於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張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障羣衆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鬥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國民黨並不包括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軍，削弱其對紅軍的壓力。不久馮玉祥的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及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繼而來（見635—636頁）。但未能撼動政府軍對蘇區的圍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第五次圍剿劇烈展開，紅軍處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民衆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共同聯合，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縱令政治意見不同，亦願與聯合。國民黨亦在其內，所反對的為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進攻蘇區。首起響應的為宋慶齡等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繼之為「各界救國會」。

六個月後，紅軍自江西向西南轉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被困於川邊，大有不易生存之勢。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通過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案》，指明中國必須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與反法西斯的鬥爭相連結，吸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擴大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線。八月一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

會的名義發出《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實際是向國民黨呼籲，即《八一宣言》。畧云：「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願意與之携手共同救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再〕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以便具體討論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及蔣雖仍然詆毀，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陳紹禹再闡明統一戰線的意義，指摘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派林育英（張浩）前往陝北宣達。中共的國際派自然是奉命唯謹，當權的毛澤東似尙疑慮，一面命潘漢年赴莫斯科請示，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林育英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窯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爲發動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蔣；二爲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只要是反日、反蔣，都應聯合成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爲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爲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紅軍、白軍聯合起來；」四爲使工、農、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爲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澤東再論對日策略，說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及人民共和國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將反革命的隊伍拉入革命的隊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通電（東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對日絕

交宣戰，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電文內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蔣。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國民黨共赴國難，創立抗日人民陣線。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通電（回師宣言），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希望南京政府誠意幡然改悔，先在陝、甘、晉停戰，互派代表磋商具體辦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雖由中共領導，尚看不出與統一戰線的顯明關係，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則已提出建立抗敵統一政權主張。七月十三日，向國民黨請願，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八月十日，毛澤東函請救國聯合會領袖，斡旋各黨派進行合作談判。二十五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稱國民黨為「貴黨」，蔣為「委員長」，說是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的外交報告與解釋（見 659 頁），非常需要，有了若干進步，中共誠懇歡迎。願贊助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擁護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及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黨與中共重新合作。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書蔡元培，請勸南京當局停止內戰，並致候宋慶齡、汪兆銘、胡適等。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聯名函蔣，勸當機立斷，接納他們的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三、蔣的統一成就

九一八事變後，蔣的安內政策，在先求國民黨自身的一致。他之辭職，主要原因為促成廣州、南京的團結。一九三一年二月，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隊胡宗南師移駐甘肅，趕築公路，準備於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勝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遂及於西南三省。此為近二十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為將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復蒞成都、昆明、貴陽，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認為四川為天然的根據地。

對於兩粵當局，蔣繼續勸導合作，懇請胡漢民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漢民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中正任兩會副主席。表面上看來，國民黨三巨頭似已團結。汪因遇刺受傷，¹胡雖允入京，惟遲遲其行，中央仍由蔣一人主持。

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終未冰釋，日人從而播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故，廣州情況突生變化，陳濟棠等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必須以整個國力，一致步驟，切不可輕啓內爭，一面迅調大軍入湘警備，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聲明貫徹和平統一政策，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極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擁護中央，七月，陳被迫出走。²

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尋又予調職，李、白抗命不受。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派陳誠向李、白說明抗日決心與計劃，允其仍留廣西。九月，和平了結，充分表現了相忍為國的精神。

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分為紅軍所據。³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穫。至是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

¹ 汪兆銘於十一月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開幕之日遇刺，不久出國。

² 陳濟棠素來迷信，寓樓設有神龕，遇大事決之於神。乃兄陳維周通星相堪輿之術，是年三月，曾去奉化覬窺蔣母之墓，謂風水不佳，又於南京見蔣，認為今年內蔣將有大難，機不可失。陳濟棠遂決心舉兵。余漢謀為粵軍第一軍長，李漢魂為第二軍副軍長。廣東空軍之歸附中央，對陳尤為一大打擊，此之謂「機不可失」。

³ 半自主的十四省為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廣西、廣東；部分為共軍所有的七省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陝西。

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四、國防建設的推進

北伐後的六年，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雖多為人所詬病，但並非無心於國家建設。一九三四年，長江下游剿共之戰告一段落，更是悉力以赴，在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學術方面各有相當成就。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不再用蘇俄顧問，轉向德國物色。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的舊部鮑樺爾(Max Bauer)上校應邀到華，一九二八年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四十餘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中央對桂軍之戰。鮑樺爾不久病卒，由佛采爾(Georg Wetzell)將軍繼之，曾參預中央對閩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一九三三年一月，前任德國國防部長薩克德應聘前來，停留兩月，勸蔣建立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先設一訓練團，調訓全國軍官，並建立兵工業。¹是年廬山訓練團開辦，受訓軍官先後七千五百人，顧問增至一百餘名，剿共戰畧戰術大為改進。一九三四年三月，薩克德再度前來，正式任顧問團長，半年後返國，繼任的顧問團長先為法勃爾(Fabul)，後為福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福根豪森在職四年，有一個整備中國國防的五年計劃，統一陸軍編制，施行精兵主義，加強空軍，海軍暫為從緩，修築長江以南鐵路，聯通南京與西南各省，興建沿江沿海要塞。一九三五年三月，設陸軍整理處於武昌，陳誠任處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三年內調整六十個師，並定於一九三八年完成各特種部隊、機械化部隊。兵器製造同在改良擴充中，如步槍、機關槍、迫擊砲、炸彈。國防工事，分別在華北、華東、華南構築，尤着重於南京附近及蘇州、無錫、江陰等地。

空軍創始於一九二八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附設的航空隊。一九三一年成立航空學校。一九三三年置航空委員會總司其事，積極發展，以義大利人為顧問，派遣學生分赴義大利及美國受訓。一九三四年，

¹ 關於德國顧問的接洽，曾留學德國的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為一主要人物。

開辦飛機製造廠，一九三六年，設空軍機械學校。至一九三七年，空軍共有飛機六百餘架，大都購自義大利與美國，全國分爲六個軍區。

一九二八年七月，全國財政委員會劃定關稅、統稅（棉花稅、麵粉稅、捲煙稅等）、煙酒稅、印花稅歸中央，田賦、營業稅、執照稅歸各省，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實行廢除釐金，提高海關稅則。海關稅款原存外國銀行，一九三二年起，集中於中央銀行。海關行政人員改用華人，鹽務人員中洋員亦逐漸裁減。中央每年總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三億三千餘萬銀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億七千餘萬銀元。不過收支仍不能平衡。一九二九年的赤字約爲一億元，一九三七年約爲三億八千元，全賴公債、庫券、貸款、透支抵補。軍費係大宗支出，常在總收入的半數或半數以上。

公私銀行多自發通貨，外匯常爲外國銀行壟斷，銀兩與銀元照舊並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實行廢兩改元，所有交易改用新鑄造的銀元計算，半年之內，完成了幣制統一。復以美國收購白銀，國際白銀漲價，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行因人民紛以鈔票兌現，大感困窘，物價爲之跌落，工業與對外貿易遭到嚴重困難。政府採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Leith-Ross）的建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實行改革幣制，變銀本位爲匯兌本位，與英鎊、美金聯繫，禁止銀元流通，統一通貨發行，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鈔票爲「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發行，¹由三銀行無限制的售賣外匯。法幣一元折合英鎊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釐，打破了外國銀行的獨佔外匯。中央銀行作爲準備銀行，商股多於官股。此一措施頗獲人民的擁護及英國支持，日本雖多方破壞，仍得順利施行，政府約握有八億銀元。

一九二九年政府制訂經濟建設方案，側重工業，自一九三二年始積極施行。原則上重工業、基本化學工業、基礎礦業歸中央政府舉辦，若干部門歸地方政府與人民合營，輕工業由人民經營，政府予以扶植

¹一九三三年，農民銀行成立後，發行的鈔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亦被認爲法幣。農民銀行與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合稱爲四行。

獎勵。此後對外貿易，入超漸減。一九三六年，棉紗進口下降至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八，棉布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麵粉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五。此與外商在華設廠的產量增加，固然有關，華商工廠的產量增加亦為因素。同年鋼鐵機器進口各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方面證明中國的重工業仍然落後，另一方面又證明中國工業之在發展，需要的鋼鐵機器加多。使用機器開採的煤炭產量，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三年升高百分之十。同年份鐵礦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二，機器冶煉的生鐵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

農業的改進，亦以一九三三年以後為積極。政府特設農村復興委員會及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一九三四年制訂合作社法，推行農民貸款貯蓄，發展生產。一九三三年，全國有農村合作社約五千三百餘。農本局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以便利農業資金流通，調劑農業生產，促進運銷。數年之間。農產增加，小麥棉花差可自給自足，進口稻米為之銳減。一九三七年，小麥進口下降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六強，同年份棉花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三，稻米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有心之士，努力於改良鄉村運動，期解除農民痛苦，以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為最早，次為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自治建設運動，彭錫田等領導的河南鎮平、內鄉自治、自衛運動，教會中人亦曾致力於類似工作，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運動。

一九三一年前，中國鐵路共長約一萬三千公里，百分之九十二為外人經營，中國自造的僅一千公里左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佔領的東北外，新建鐵路約三千三百公里，均為中國所有。連接滬杭線與粵漢線的浙贛鐵路完成於一九三六年，為江南的東西陸上運輸幹線，自南京經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可直達廣州，並計劃再自湖南分向西南展至貴州、廣西。同年，縱貫南北的粵漢鐵路（湖南株州至廣東韶關段）全部通車。橫貫東西的隴海鐵路向西越過潼關、西安，一九三七年通至陝西寶鷄。此外尚有山西境內的同蒲（大同至蒲州）鐵路，皖北的淮南鐵路，蘇皖間的江南鐵路。公路進度更速，

一九三七年，完成十一萬公里，大都在黃河以南，西南自南京至雲南，西北自漢口至新疆，汽車均可直達。中國自製輪船的噸位，一九二八年為二十九萬噸，一九三五年增至六十七萬噸。民用航空業務，首為一九三〇年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次為一九三一年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再次為一九三三年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線遍及上海、南京、漢口、廣州、西安、蘭州、重慶、成都、福州及雲南、新疆。

一九二八年後，小學、中學學生人數均有增加，學齡兒童入小學者，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十七，一九三六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中學生增百分之六十，師資均符合規定。除邊遠地區外，各省均有公立私立或教會辦理的大學或專門學校，在校學生自一九二九年的三萬餘人，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六萬人，教授以曾在美國受教育者為多。一九三二年後，教育經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為二十年來所未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對於各大學的設備費不斷補助，研究風氣日盛，學術水準提高。公立大學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改稱）為著，私立大學以天津南開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為著。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對於學術的提倡與貢獻之功亦值得稱許。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

五、西安事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朱德停止內戰的宣言發出六週，二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的《告共產黨幹部人員書》，勸放棄迷夢，一致抗日，或係對他們的答覆。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的中共宣言，未再有表示。六個月後，第五次圍剿結束，認為中共不足為患，如中共肯放棄紅軍，可望作政治解決，命陳立夫負責進行。約在《八一宣言》發出不久，陳立夫的代表與中共的代表會於香港。九月一日，周恩來致書陳果夫、陳立夫，說明中共的停戰抗日立場。九月十八日，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宣言，主張亦同。跟着東京報紙刊出國民黨容共及蔣與紅軍諒解的消息。曾留學蘇俄的張冲旋自南京往陝北共區商

洽，史達林直接請蔣派人來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四日，陳立夫偕張冲赴柏林，但未到莫斯科，原因不悉。可能是史達林以爲紅軍在西北已站住脚步，不妨再看情形。

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連發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約在是年秋，周恩來及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與張冲會於上海，旋去南京，晤陳立夫。¹陳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取消紅軍，改爲國軍，取消蘇維埃，改爲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獲相當諒解，談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陝北。

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首先獲得以上海爲中心的左派人士擁護，繼之影響到西安爲中心的軍人。五年以來，張學良受盡日本的構辱，中外的譏詆，內心苦痛可知。一九三三年，不得已而引去，戒絕不良嗜好，遊歷歐洲八個月，對於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爲，頗爲傾倒。一九三四年歸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集合中央與東北幹部，組織「四維學會」期加強團結，擁蔣復興。

一九三五年十月，剿共中心移於西北。時東北軍已調往陝、甘，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仍以張學良爲副，負實際之責。東北軍甫與紅軍接觸，連遭敗績（見650頁），中共將被俘官兵施以訓練後，全部釋放，謂蔣藉剿共之名，使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惟有聯合抗日，東北軍方有重返故鄉之望。東北軍如不進攻，紅軍決不相犯，願共同抗日，周恩來並親函張學良，措詞畧同。張學良爲了國仇家恨，中共的說詞，自易入耳。九年來中央軍以獅子搏兔之力，終未將紅軍撲滅，東北軍又焉能有爲？以往的內戰，事過多言歸於好，他亦飽有這樣的經驗。共產黨同爲中國人，又何嘗不可如此。加之東北軍與中央軍待遇有別，貧瘠的西北既無從自行設法，返回東北或華北無期，剿共軍事頻頻失利，戰死的將領得不到撫卹，於是氣餒心憤，意志動搖，認爲與其爲剿共犧牲，何如爲抗戰犧牲？爲了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與中共合作不失爲出路。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宣言（見664

¹ 陳立夫於是年五月自歐洲回國。

頁)，或使他更信中共問題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約在十二月間，張去上海，會晤救國會及中共人士，他的部屬之與救國會、中共有關係者，¹責他不應再走剿共而不抗日的死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將領，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二十六日，張去南京，擬說蔣准中共投誠，雖未敢出之於口，其內心可以想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指揮楊虎城起自綠林，後歸于右任的陝西靖國軍，胡景翼、馮玉祥的國民軍，再轉附中央。中原戰後，曾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以左傾自命。省政府主席解除後愈不滿於蔣，左右復有中共分子，自易與張合流。²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東入山西，張學良不僅未乘機向陝西進攻，東北軍軍長王以哲反於四月四日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會於洛川，張亦至自西安。二十一日，張又到上海晤潘漢年，對於陳立夫之赴歐洲及年來中共與南京的接觸，已有所聞。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北延川賈家坪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與張合作。三十日，上海學生救國會發表宣言，已有「擁護張學良停止剿共主張」字樣。六月，中共代表鄧發到西安，同月，張與周恩來會於延安。周謂中共願擁張領導反蔣抗日，可獲蘇俄援助。張主擁蔣抗日，要求取消紅軍名稱，編為國軍，中共不得在軍中宣傳，停止一切鬥爭，不再反對政府，攻擊領袖（蔣），政府予中共以活動自由，待抗日勝利後，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周同意聯蔣抗日，紅軍即向後撤，張給以接濟。楊虎城主張聯共更力，如蔣不同意，俟其來西安時，即實行「兵諫」。中共派葉劍英、李克農等駐西安，訓練東北軍幹部。張派代表赴太原，閻錫山亦謂「剿共為非計，對內將無以對外」，張的聯共信念益堅。³

¹ 如東北救亡會領導人高崇民，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劉瀾波。

² 楊虎城任省政府主席時，暗中接濟鄧演達的中國農工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鄧被捕處死，章伯鈞代之）。中共黨員南漢宸、王炳南曾任楊的秘書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張、楊曾飛陝北上空視察共區。

³ 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國記者斯諾前去陝北共區訪問，即由西安中共人員與張學良的安排。斯諾在共區約留四個月，十月離保安，仍經西安返北平。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議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民主共和國，外人盛傳西北四省（陝、甘、晉、綏）聯俄獨立。十月三日，張學良向英國記者否認，惟望紅軍投誠，同時再派代表赴太原，繼又自行前往，與閻錫山商談。蔣於張學良的動態已有所聞，十月二十二日，親至西安，對東北將領說明抗日方針，勉以徹底肅清共黨，痛責少數人意志不堅。三十日，閻錫山邀張學良去洛陽，請蔣停止剿共，蔣嚴詞拒絕。閻對張說，「看來不便再行進言，惟有相機徐圖。」張通知中共，一時難望全面停戰，中共表示仍願合作。張連電告蔣，所部不穩，陝西情勢奇急。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十九人函蔣，請當機立斷，允許中共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同月三日，張學良復來洛陽，懇蔣再去西安。蔣不顧左右勸阻，於次日抵達，對張提出兩個方案，一為東北軍及楊虎城軍全部開往前線剿共，一為分別調赴福建、安徽，俱非張、楊所願。七日，張續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之必要，蔣嚴詞申飭。是晚張、楊密商「兵諫」。九日，蔣再勉張部將領，謂剿共已至最後五分鐘階段。當天，西安學生遊行請願，張保證一星期內必有事實答覆，事後又被蔣斥責，彼此言語衝突。十日，蔣召中央將領會議，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謠傳張將罷職，東北軍將改編，張、楊決定行動。十二月十二日拂曉，張部圍攻蔣的駐在地臨潼，槍殺侍衛人員約三十名，蔣險遭不測，遂被劫持，西安中央高級文武官員十餘人，悉遭幽禁。張、楊宣布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愛國領袖，¹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第二天，成立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

事變當天，張學良致電蔣夫人宋美齡、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說是暫請蔣留駐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加危害。南京的處理方針為討伐與疏導並進，主張討伐的以戴傳賢為力，謂紀綱必須維持，不可示弱，

¹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國聯合會首要沈鈞儒、鄒韜奮（恩潤）、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史良七人，以鼓動罷市、罷課被捕。

主張疏導的有孔祥熙、宋子文、陳果夫、陳立夫，謂首須顧及蔣的安全，根據張學良來電，顯有協商餘地。於是一面將張褫職嚴辦，作軍事部署，一面由張的前任顧問澳洲人端納（W. H. Donald）飛西安勸說。對於蘇俄的動向，尤為重視，以為事變必與中共有關，蘇俄則為策劃者。為了釜底抽薪，十二月十三日，陳立夫請潘漢年轉告共產國際，如蔣有不幸，中國失去領導，日本將進攻蘇俄。孔祥熙召見蘇俄代辦，促蘇俄及共產國際注意事變的嚴重性，如蔣有危險，中國或被迫與日本共同對俄。另電駐俄大使蔣廷黻，命提抗議。十四日及十五日，陳立夫再晤潘漢年，希望周恩來調解，設法救蔣。

事變前，中共一無所知，及消息證實，驚喜交集，認為是對蔣報復的機會。中共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公審，給以應得制裁，命紅軍南下，助張學良作戰，派周恩來往西安，同時報告莫斯科。

老謀深算的史達林自有打算，在得到南京的請求、中共的報告之前，十二月十二日，已致電中共，指事變出於日本陰謀，蘇俄決不予張學良任何支援，且明確反對。中國急需一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如同心轉意，則是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中共對蔣不可取報復主義與內戰方針，否則正符合日本軍閥與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俄均屬不利。應立即爭取和平解決事變政策，利用此一時機對蔣表示友善，在有利的基礎上，自動恢復蔣的自由。十四日，莫斯科《消息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的團結，實為人民陣線的打擊。第二天，《真理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叛變，在阻遏南京政府團結抗日的進行，促成國家的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的犧牲品，希望中國人民勿為日本挑撥者及漢奸所欺。十六日，蔣廷黻訪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請對事變予中國以協助。李維諾夫答稱，蘇俄近年與張學良毫無關係，對中國愛莫能助，惟盼事變早日了結。同日，共產國際覆潘漢年，同意周恩來調解。十七日，李維諾夫向蔣廷黻抗議中國政府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報》、《真理報》社論，表示蘇俄與張學良有關，實不友誼。蘇俄唯一協助中國政府辦法，在使中共知道蘇俄政府的態度。

史達林的電報是十四日由宋慶齡自上海轉到保安，中共的態度隨之而變，立即通知前去西安的周恩來。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的急切希望，除了中共、蘇俄，即為國內反應。數日以來，情況至為不佳。和他原有諒解、贊成停止剿共的閻錫山，質以「何以善後？是否將減少抗戰力量？是否將移對外戰爭為內戰？能否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其他素與蔣有意見的地方軍人亦多對張討責。楊虎城軍之毫無紀律，東北軍將領之不盡以張為然，駐洛陽的東北軍之拒不一致行動，河南中央軍之迅速進據潼關，甘肅中央軍之進向陝西，中央空軍之飛臨西安上空監視，輿論之紛紛詆斥，無一不令張失望焦慮，如定要抵抗，縱令不被消滅，內戰勢所不免，收其利的為日本。他又在蔣的日記中發覺蔣確有抗日決心，對他至為愛護。十五日，蔣自楊虎城的勢力範圍內迎至自己的住宅附近，蔣詳為說明抗日計劃，責張魯莽。十六日，張對西安市民大會演講，主張在蔣領導下，各黨派從事救國運動。

是日傍晚，周恩來抵西安，張學良完全明瞭中共、蘇俄的主張。十七日，周隨張見蔣，態度謙恭誠懇，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的意圖，希望大家化除成見，團結禦侮，擁蔣為全國領袖。蔣靜心細聽，認為和自己的希望符合，即親函新任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說是兩日內可回南京，令停止軍事行動。十九日，張電告上海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蔣已同意他的意見，俟南京有人到來，蔣即可歸去。大概蔣所同意的為原則，對於具體事項，則拒絕商談，所以張要第三者居間。張提出的條件，大致為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武力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畧，改組政府，排去親日分子，容納各黨各派，積極與英、美、俄聯合，釋放政治犯，予人民以更大政治自由。中共通電，建議南京、西安軍隊以潼關為界，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提出抗日救亡草案，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再在南京召開和平會議。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要求先實行一二事，蔣仍不允。宋子文停留一宿，復返南京。二十二日，偕蔣夫人再至，勸蔣先設法離開西安，再言其他。二十三日，她對張說，她願代蔣承擔一切，蔣亦答應改組政府，停止剿共，張與

周恩來甚為滿意。二十四日，周向蔣夫人詳述中國革命問題及中共懷抱的煩悶。最後說：「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導者。」「我等並非不信委員長救國之真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蔣夫人稱道他頗明大體。不意張、楊之間忽有歧見，張主立即送蔣回京，楊堅決反對，幾至決裂，周恩來竭力勸解。二十五日上午，蔣與夫人一同接見周恩來，周再表示希望內戰停止。蔣夫人謂：「中共果有為民服務誠意，必須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斷不應自相殘殺。內政問題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此為委員長一貫之主張。」下午，蔣離西安飛洛陽，次日抵南京，張學良隨行，表示一切由自己身當。

張學良之突然隨蔣而去，西安至為驚愕。數日後，張被判處徒刑，雖即特赦，但仍須管束，中央軍又準備西進，楊虎城與東北將領指為背違蔣的諾言。中共恐南京、西安為此破裂，功敗垂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通電號召和平，停止內戰。東北少壯派軍人，以張學良不能回陝，遷怒於東北高級將領及中共營救不力。二月二日，戕殺軍長王以哲，旋即救平，中央軍入駐西安，東北軍調出陝西，楊虎城去職，張、楊集團解體。¹真正得利的為中共，不僅轉危為安，陝北蘇區亦隨之擴大，中共中央自保安遷設延安。更大的收穫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成為事實，延安或毛澤東時代自此開始。

六、國共二度合作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接到史達林來電後，對於恢復蔣的自由已無異議，惟仍欲多有所得，主張召集和平會議，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尚不願讓他立時離開西安。但是何時釋放，則取決於張學良。二十六日，毛澤東得悉張隨蔣飛往南京，驚愕不減於楊虎城與東北少壯軍人，以為張已對蔣投降，將事變責任完全委之中共，蔣或將報復，命周恩來竭力爭取蔣的好感，說明蔣之得安全脫險，實為中共之力。繼知蔣回南

¹ 張學良被看管二十餘年，至一九六一年始有相當自由，寓居台灣。楊虎城一度出國，歸來後亦遭幽禁，一九四九年死於重慶。

京後，發表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說是張、楊因受他（蔣）的感召，深為悔悟，毛澤東更生疑慮，二十八日，亦發表聲明，指其措詞含糊。值得贊揚的「即他（蔣）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一段，意思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未簽字而不守信用。」又說：「他（蔣）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今後的問題是蔣是否真正實踐他的諾言。中共北方局亦發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宣言》，先說事變與中共無關，次請全國人民要求南京立即停止剿共政策，這均是出於唯恐蔣繼續剿共的心理。

近三年來，蔣的聲望之隆，較之北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向對國民黨及蔣不滿，並常有批評的胡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曾說蔣確有做領袖的資格。「近年氣度大了，態度更和平了。……全國人民心目中都覺到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裏埋頭苦幹，……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還能容納異己的要求，尊重異己的看法。蔣先生成爲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爲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西安事變發生，舉國惶惶，及蔣脫險的消息傳出，歡聲雷動。以蔣當時的聲望及人民的愛戴，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於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對日戰爭終不能免，必須團結內部，獲得外援。經此次事變，他相信蘇俄具有支持中國抗日的誠意，必須與之聯交，不再對日本退讓。聯好蘇俄必須與中共和解，此與國民黨第一次聯俄、容共情形相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首先裁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致電國民黨，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及國內行將統一，希望將以下五事定爲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最後說：「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共產黨人輸誠受命，」通過「根絕赤禍案」：一、徹底取消紅軍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統一軍令、編制；二、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統一政權；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答覆。二月十二日，蔣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這是對中共五項希望的局部答覆，並命張冲去西安與周恩來續商。三月三日，王寵惠代張羣任外交部長，這是排去親日分子，以便與英、美、俄聯絡的表示。

中共中央以黨員多認為二月十日的電報，等於向國民黨投降，甚感迷惘憤慨，因於二月十五日詳加解釋，說是：此一決策，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以便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實現對日抗戰；蘇維埃制度雖然取消，並不放棄工人、農民已得政治權利；紅軍雖然改名，並不放棄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停止沒收土地，並不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對於所謂「中共輸誠」、「根絕赤禍案」，在情面上頗使中共難堪。毛澤東亦認為國民黨依然自大，盛氣相凌。但是為了先求紅軍生存，必須使剿共軍事停止，尤其是在東北軍及楊虎城不再反抗，中央軍進入西安之後，惟有忍耐承認，不計其名，而取其實，以待時機，一如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蘇俄、中共所採策略。¹三月十二日，中共正式接受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決議。四月十五日，發布《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力，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告全黨同志書》，謂四項保證不能解釋為中共對國民黨投降，只是一種讓步和妥協。如此方可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擴大共產黨

¹ 據張國燾云：「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毛認為蔣和國民黨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又說：「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

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不等於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也不等於放棄革命力量的領導。中共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祕密工作原則和鐵的紀律，努力擴大、鞏固自己的隊伍，建立嚴肅與堅固堡壘，取得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這裏可以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和解的真正動機和今後的策畧。

毛澤東對於蔣的真正打算，仍捉摸不定，他(蔣)可能實行抗日，亦可能再壓迫中共。如果對日戰爭一時不起，蔣或將紅軍他調，取消紅軍及陝北蘇維埃區，所以必須堅持紅軍續留特區，特區人員須由中共保薦，拖延至抗日戰爭發生，則一切於中共有利。五月三日，中共召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通過了毛澤東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報告，及對國民黨所提四項保證，由周恩來與國民黨詳議紅軍改編問題。議尚未就，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

第十八章 八年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

第一節 中日全面戰爭

一、日本求戰與中國應戰——七七事變

倘若不是中國百般忍讓，中日全面戰爭早就發生；倘若不是日本得隴望蜀定要在華北製造另一滿洲國，中日全面戰爭或將再延遲相當時日。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年，中國爲了保衛華北，兩度不惜一戰。日本總想不勞而獲，以待中國內變。但是情形不若其所希望，兩廣問題不但未引起內戰，反使團結加強。接着是西安事變，日本又幸災樂禍，以爲中國的大亂一定不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事變和平結束的跡象已露，日本首相廣田在樞密院報告，如果國民政府以容共爲條件，與張學良妥協，日本即斷然排擊。兩天後，蔣委員長脫險，日本自然明白此與蘇俄有關。十二月二十八日，關東軍聲稱，倘中國政府接受共產主義與抗日政策，關東軍將採任何必要方法，以防衛滿洲國及維持東亞和平。日本之將有行動，人所共見，目標仍是華北。

一九三七年初，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再與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談判華北經濟問題，以南京不同意日方的要求，仍無結果。不久國民黨與中共和解明朗化。四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會議，決使華北成爲防共、親日、親滿地區。報紙聲言擴大塘沽協定及冀東防共政府，不令華北「中央化」、「中央集權化」，甚至有驅逐第二十九軍之說。五月，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在熱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別召開會議，加緊壓迫綏遠、華北。六月初，近衛文麿組閣，廣田改任外相，一意將就軍人。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揚言，爲了對俄作戰，應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擊，清除後

方威脅。六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談話，謂中國須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及滿洲國生存與華北的必然聯繫。朝鮮總督與關東軍司令、天津駐屯軍司令、南滿鐵道會社總裁會於大連，仍是爲了華北問題。

河北事件發生以來，日軍益肆行無忌，任意作非法演習。宋哲元與田代皖談判之時，川越茂亦進見蔣委員長有所表示。一九三七年三月，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談話，謂國家主權必須完整，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爲原則。蔣招待日本經濟考察團，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望日本停止在華活動。四月，華北日軍開始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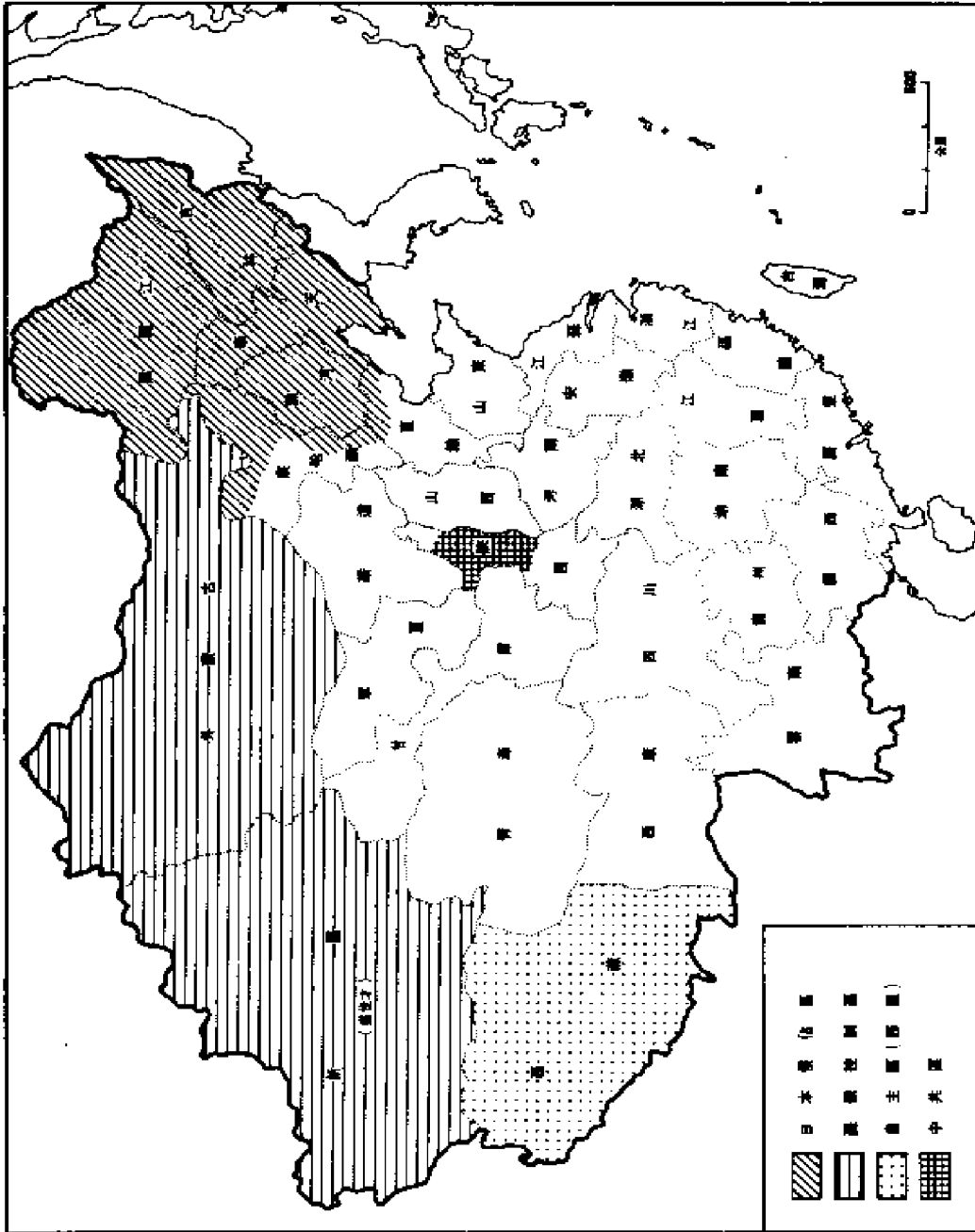
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西南十五公里的交通要道蘆溝橋演習夜戰。¹下午十一時，借口日兵一名失蹤，要求入宛平縣搜查，繼稱失蹤日兵雖然歸隊，仍須明瞭經過情形。中國答應共同調查，日軍竟突然進攻，爲駐軍團長吉星文拒退，「七七事變」於是爆發。八日，雙方協議，軍隊各返原防。次日，日軍又攻。十一日，中國允撤退蘆溝橋及其附近駐軍，懲罰負責官員，而日方表示遺憾。²

同一天，日本政府命朝鮮、滿洲駐軍開往華北，第二天，參謀本部擬就作戰計劃，決擊潰北平、天津附近的宋哲元軍。十四日，新任華北司令香月司要求撤退北平駐軍、冀察中央機構及藍衣社、CC團，罷黜排日要人，徹底鎮壓共產黨活動，取締排日言論機關、學生運動、及學校與軍中的排日教育。十九日，宋一一接受。二十日，日軍砲轟宛平縣城及長辛店。宋下令撤除北平市內的防禦設施，請北來中央軍停止前進。

蔣委員長時在廬山，正要與社會領袖舉行國是談話會。七月八日，得知事變消息，即命國民黨宣傳部盡量發布新聞，令宋哲元積極準備，就地抵抗，如果談判，須不喪失絲毫主權。七月九日，派四個師向河

¹蘆溝橋跨永定河上，完工於一一九〇年，長二百餘米，寬八米，高十餘米，兩旁欄柱有四百八十五個石獅，雕琢精工，形態各殊，經馬可孛羅推崇，西人稱爲馬可孛羅橋。

²近年日人的撰述，說是先開槍的爲共產分子，不惟無任何證據，實亦無關宏旨。試問九一八拆毀柳條溝鐵路又係何人所爲？



圖十七 抗戰前夕 (一九三七)

北石家莊、保定集中，命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速返南京，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可知他已下了決心。外交部於抗議之外，並於十二日聲明，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核准者，概屬無效。再電宋哲元，全力抗戰，勿為敵人所欺，七月十一日的協議絕不能了事。十四日，設行營於石家莊。中共毛澤東及紅軍將領於事變的次日，亦請蔣嚴令第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動員全國海陸空軍，驅逐日寇出中國，紅軍願在其領導之下為國効命。三天後，周恩來、秦邦憲、林祖涵到廬山，會商陝、甘、寧邊區地位及紅軍改編問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試圖斡旋，提議中日停止調兵，為日本所拒。十七日，蔣對廬山談話會鄭重宣布：「蘆溝橋事變的推演，關係整個中國。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頭，全繫於日本軍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接着申明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政府的反應為通過《動員計劃》，要求中國撤退進入河北部隊。宋哲元以日軍大舉向關內輸送，同時知道了蔣的抗戰決策，補給已經到達，亦決定發動攻勢。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奪佔平、津間的廊坊，但進攻北平的日軍則被擊退。香月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第二十九軍退往永定河以西。二十七日，日軍進逼北平四郊。二十八日，猛攻南苑，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陣亡。二十九日，宋哲元離北平，天津經激戰後，於三十日陷落，華北兩大名城均入日本之手。

七月二十日，蔣返抵南京。北平不守的當晚，再發表談話，說是這不能算是戰爭了結，惟有一致奮鬥，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與妥協屈服之理。又二日，發表告全軍將士書，只有抗戰到底，與倭寇死拼。八月初，復宣示抗戰方針，隨時隨地抵抗，使日人戰而不取。各

方重要軍事領袖，如廣西的白崇禧、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中共的朱德，不論以往與蔣有何意見，均會集南京。八月十二日，中央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推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總司令，以軍事委員會為統帥部。十六日，改以蔣委員長為大元帥，組織大本營。¹

日本之所以於此時發動戰爭，一以中共再與國民黨合作，容共、聯俄之局復成，必須及時遏制，先控有華北；二以中國國力尚待充實，必須早予以挫折，不信蔣真有作戰決心；三以德、日防共協定及日、義協定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日本已不孤立，英、美不致斷然行動。至於中國之決計應戰，一以勢迫出此，日本野心並無止境，如再忍讓，不惟華北將為東北之續，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憤激已至極點，中共主戰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內戰勢將重起；三以中國雖非日本之敵，然以土地之廣，斷非日軍所能全部據有；四以英、美深忌日本勢力的擴張，假以時日，國際情勢定有變化，彼時如與日本談判，為害亦較目前為輕，何況中、俄正在談判互不侵犯條約，短期內可望獲得援助。²

二、初期陣地戰與游擊戰

日本初志在奪取河北，以為攻佔北平、天津後，中國勢必屈服。八月八日，曾擬有《停戰條件》及《國交調整案綱要》，準備談判。不知中國已決定另闢戰場，全面抗戰。華北平原利於日本機械化部隊馳驅，江南河流縱橫，湖沼星羅，地形複雜，復築有國防工事，對中國比較有利。上海為通商巨埠，日軍無多，決定先於此地一挫日本的驕氣，促起國際注目。七八月之交，部分軍隊已開抵上海附近，並計劃封鎖江陰要塞，使長江日本船艦無法脫逃。³七月中旬，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亦躍躍欲試，建議東京，不宜將戰場局限於華北，應

¹南京失守後，大本營撤銷，仍由軍事委員會總攬軍事。

²傅張早有「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說。「戰必敗」為人所共見，「和必亂」確為至言，不過「敗而後和，和而後安」則未必。

³行政院秘書黃濬受日本收買，洩漏消息，漢口一帶日艦、日橋先期退出。

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國兵力，制其死命。七月下旬，長谷川清師蘆溝橋事變故技，借口陸戰隊一名失蹤，布防上海關北。八月九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機場衝突，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大戰揭幕。

上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宣布自衛抗戰。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下動員令，編組上海及華北派遣軍。二十日，中國劃分南北各戰區。上海日軍初僅陸戰隊一萬人，中國陸軍四萬人，猛勇進攻，空軍轟炸日本軍艦。此後雙方陸續增兵，華軍雖不惜犧牲，終不抵日本的砲火。九月中旬，退守第一預備陣地。時日軍約十萬人，華軍約三十餘萬，制空權則在日本之手。¹九月下旬，華軍退守第二預備陣地。十月初，日軍增至二十餘萬，華軍約五十萬，中央軍外，桂軍、粵軍、湘軍、川軍先後加入戰鬥，傷亡極為慘重。十月二十六日，主要陣地失陷，退向滬西。續來日軍兩師，登陸杭州灣。十一月九日，華軍全線西撤。

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宣言，決不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對於將近三個月之上海戰爭，備致嘉許，「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所說毫不誇張。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亦再三贊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裝備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能抵抗十週。不只軍隊甘於犧牲，視死如歸，一般老幼男女，無不爭為軍隊服務。但是苦戰之後，實力喪失十之六七，無法遏止日軍前進，預設的長江至蘇州、嘉興及江陰至無錫國防線不守。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二十四日，杭州繼之。日軍進入南京後，大肆劫掠、姦淫、屠殺，被擄的官兵、赤手空拳的平民婦孺，或遭集體掃射或被砍死，

¹ 中國可供作戰的飛機僅二百二十餘架。八月十四日，日機十三架轟炸杭州，被擊落六架。是後連續來襲，並及南京等城，又被擊落多架。高志航戰功特著。中國飛機亦屢炸上海日軍陣地、軍艦，飛行員壯烈殉國。

爲時一週，男女慘死者，最少十餘萬人，甚或更多。

華北日軍佔領北平後，沿平綏鐵路北攻南口，察哈爾境內日軍南攻張家口，激戰十六天，八月下旬，南口失守，張家口亦陷。日軍進陷山西大同。九月二十五日，甫經編爲第八路軍的紅軍林彪師會同晉軍、陝軍重創四千日軍於晉北平型關，爲中國在北戰場的首次勝利。¹十月，日軍一支西陷綏遠省城歸綏，一支南犯太原。中央軍及晉軍破之於忻口，軍長、師長戰歿，而陣地不爲之動。日軍改自河北攻晉東，十一月九日，佔領太原。

南口之戰告一段落後，日軍循平漢路南下。九月，陷河北保定。十月，陷石家莊。十一月，陷河南安陽。另一路由津浦路南下，陷魯北德州。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戰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放棄濟南。青島以陷於海陸夾攻，守軍於炸燬紗廠後西撤。蔣委員長拿辦韓復榘，處以死刑，這是抗戰期間，受到最嚴厲懲治的一個高級將領。

一九三八年二月，津浦路北段日軍深入魯南，南段日軍越過淮河，謀合犯徐州。三月，南來日軍進攻臨沂，爲時八日，傷亡頗大。徐州東北台兒莊的攻守尤爲激烈，爲時四週。中國以四倍的兵力，截斷日軍補給，日軍被殲一萬六千人，四月七日後撤，證明其並非無敵。南京失守後的士氣爲之重振，人心尤爲興奮。日軍改向魯、豫之交與皖北進攻。五月，華軍放棄徐州，戰場移於豫東。六月五日，開封不守，華軍掘毀鄭州以東的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濫，人民損失慘重。²但日軍進攻鄭州、南窺武漢的企圖則爲之滯延。

武漢爲南京撤退後最高統率部所在地，亦爲日本次一攻擊目標。

¹八月二十二日，陝北紅軍正式改編爲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任總、副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轄三個師，計三萬人，師長爲林彪、賀龍、劉伯承，副師長爲聶榮臻、蕭克、徐向前。政治委員一由聶榮臻兼，餘二人爲關向應、鄧小平。九月二十二日，江南零星紅軍合組爲新編第四軍，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轄四個支隊，計一萬餘人，支隊長爲陳毅、張雲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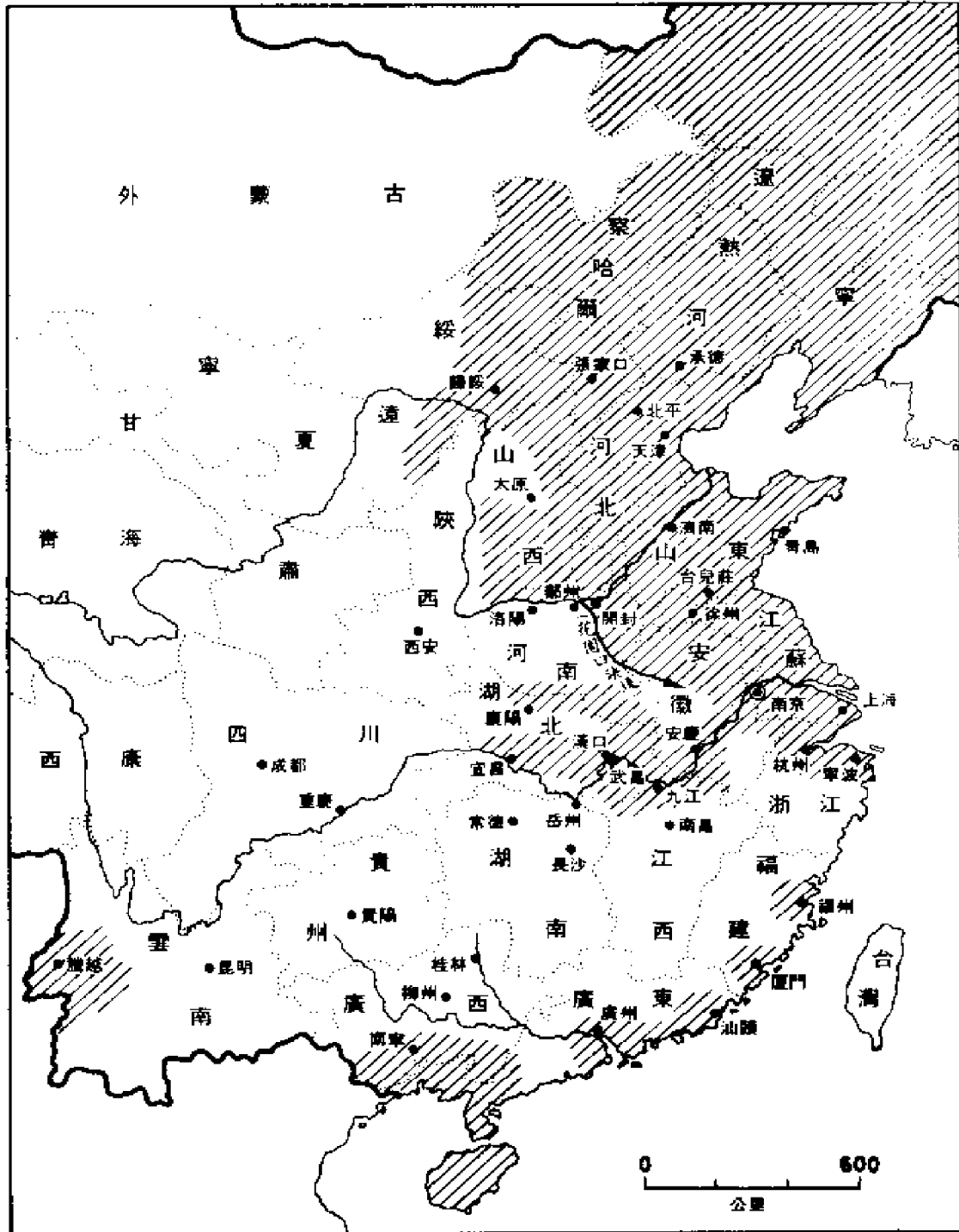
²總計淹沒四十餘縣，河南民宅沖毀一百四十餘萬家，陸沉八百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一千一百餘萬畝，傾家蕩產者四百八十餘萬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以來，日本空軍不斷轟炸，遭到堅強抵抗。¹六月十五日，溯江西上的日本海軍陷安慶，會同陸軍突破江西馬當要塞。七月二十五日，九江失守，武漢外圍會戰開始。日軍分三路前進。長江南岸取道贛北，激戰於南昌以北，十月中旬，攻鄂南。長江北岸一路激戰於河南潢川等地，迂迴漢口以北，兵力共約十二師以上，三面包圍武漢。

廣州爲上海戰爭發生後的唯一海口，中國以爲日本對英國有所顧慮，不致冒然侵犯，將粵軍北調。日本爲截斷武漢的對外交通，濫肆轟炸。十月十二日，日軍四萬人，登陸大亞灣，二十一日，佔領廣州。這時長江兩岸及豫南日軍已迫近武漢。中國早已準備於武漢外圍打擊日軍後即行放棄，十月二十五日，全軍退出，計武漢會戰約三個月，爲上海、徐州戰後，中日的第三次大戰。

中國的戰畧爲「持久戰」與「消耗戰」，不在沿海、沿江地帶決戰，但事節節抵抗，消耗並吸引日本兵力，同時保持自己的有生力，即所謂「以空間換時間」的「磁鐵戰」，使日本欲罷不能。日本的戰畧爲「速戰速決」，驕狂的軍閥揚言三個月內即可使中國屈膝，現在已過了十五個月，戰爭尙無了期，被日本侵擾的地區，北起察哈爾、綏遠，南至廣東，東至上海，西抵武漢，包括長城內外，東南各省及長江下游，俱屬中國精華地區。但是它所能勉強控制的僅限於城鎮及水陸交通線，而不能及於鄉村。中國政府不只仍統有廣大而完整的西北、西南，及華北、華中、華南的大部。中國主力軍撤退後，一部分留於敵後，與守土官領導人民，從事游擊戰。燕趙自古多慷慨之士，齊魯素爲豪傑所自出，攘臂而起的所在皆是。山西閻錫山組織軍民「犧牲救國大同盟」，成立新軍及工人武裝自衛隊。河北民軍深入冀中，山東游擊隊遍於全省，第八路軍在華北尤爲活躍。蘇、皖、浙邊區游擊隊及新編第四軍亦不斷威脅長江交通。

¹ 二月十八日，日機被中國空軍及蘇俄義勇軍擊落十四架，中國大隊長李桂丹戰歿。四月二十九日，日機又被擊落二十一架，中國損失九架，蘇俄損失兩架。



圖十八 日本侵佔區（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

三、列強反應

蘆溝橋變起，中國通牒英、美、俄、法、德、義，指日本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及國際聯盟憲章，中國將以全力保衛疆土與國家尊嚴，但亦願依國際條約規定的和平方法，解決中日事件。英、美勸日本勿擴大華北糾紛，美國並向各國表示對於國際局勢態度，主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內政，遵守條約，對於可行的和平途徑，願共同努力，不過美國不欲受到拖累。蔣委員長分別接見英、美、德、法、義大使，請主持公道，特別指出只有英、美從中設法，情勢或可緩和，美國為九國公約發起者，對此次事件有法律上的義務。英、美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然各有顧慮。英國以希特勒當政，歐洲情勢緊張，只望透過國際聯盟予日本以壓力。美國孤立主義勢盛，不願捲入國際爭執。中國亦請國際聯盟制止日本侵畧，國際聯盟僅譴責日本飛機濫炸不設防城市。美總統羅斯福為喚醒國內輿論，十月五日，發表演說，謂現在世界不法行爲的蔓延已成爲一種疾疫，須共同努力採取積極方法，予以隔離，免造成國際混亂。國務院宣稱，日本在華行爲不合國際原則，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規律。國際聯盟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處理中日衝突，對中國應表示道義支持，避免足以妨礙中國抵抗的行動。但是羅斯福的演說在國內不會收到正面的效果，反召致責難，反對美國與國際聯盟共同行動。

遲至十一月三日，包括十九國的九國公約會議始於布魯塞爾開幕。日本與德國拒絕參加，美國不肯挺身領導，英國態度消極。義大利前爲進攻阿比西尼亞會受國際聯盟制裁，最近又與德、日簽訂反共協定，在會中遇事阻撓，成爲日本的代言人。中國之於上海之戰，不惜重大犧牲，即爲爭取九國公約會議的有利情勢，至不得已始行後撤，外交上既無所得，原定及時退守的戰畧，亦未能實行。日軍長驅而前，九國公約會議瞠目而視，僅於十一月十五日通過一篇宣言，謂中日衝突影響各國權益，舉世惶慮不寧。日本施用武力，絕不能達成公正而垂久的解決。中國照九國公約與各國從事坦誠的討論，日本則拒不參與，

因之會議認為應考慮各國共同態度。二十四日，重行申明九國公約維持世界和平原則。中日爭執的解決，須以該原則為基礎。可謂不關痛癢，無裨於事。南京陷落的前日，日本的飛機炸沉長江美國砲艦巴納（*Panay*）號，美國亦止於抗議。蔣委員長直接請羅斯福援助，羅斯福的答覆是願就力之所及，以謀和平。直至戰爭進行了十七個月，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國方得到美國的一千五百萬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

中俄復交後，曾商訂互不侵犯協定，迄無成議。一九三六年一月，廣田三原則發表後，中俄又屢次商談共同維持和平辦法，亦無結果。一九三七年四月，國共和解已成，蘇俄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駐俄大使蔣廷黻請求調停，蘇俄外長莫洛托夫謂如蘇俄單獨行動，顯不可能。上海戰起，中國希望於互不侵犯條約外，再訂互助協定，為蘇俄所拒。八月二十一日，互不侵犯條約簽字，締約國一方受第三國侵畧時，彼此不得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援助，並不得有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侵畧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畧之締約國。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俄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俄允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實行參戰。九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Georgi K. Zhukov*）率蘇俄顧問團來華。十一月，給予中國以五千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俄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中國希望蘇俄早日參戰，蘇俄國防部長伏希洛夫表示，中國對日戰爭如到生死關頭，蘇俄必定出兵，決不坐視。十二月二十日，蔣委員長以日本逼和不已，促史達林履行諾言。史達林覆稱，時機未至，不便立即出兵，且出兵須經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該會議當在兩個月內召開，在此時間，決予中國技術援助。對於德國的調解，應以撤回日軍，恢復蘆溝橋事變前狀態為條件。其實中國已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俄同盟不成，蘇俄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六月，蘇俄續予中國五千萬美元軍火貸款，中國以錫、鎳、水銀、桐油、羊毛、生皮、茶、絲償還。

七月，日、俄在圖們江下游發生武裝衝突，中國又提議訂立同盟或互助協定，蘇俄依舊不許。

德國並不鼓勵日本與中國作戰，以免削弱對蘇俄的牽制力量。日本原望「速戰速決」，上海戰爭進行了兩個多月，尚無結束象徵。及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日本又欲「速和速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示意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 von Dirckson），準備和中國直接談判，歡迎德國、義大利勸說中國政府尋覓解決途徑，柏林命駐華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n）轉達。十一月二日，日本提出如下條件：內蒙古自治，擴大華北及上海非武裝區域，停止排日，共同防共，減低關稅。如中國拒絕，日本決繼續作戰，至中國完全崩潰時，將提更嚴厲要求。蔣委員長表示，如能恢復戰前狀態，可以商談。如接受日方所提條件，將不為輿論所容，而發生革命。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亦斷不投降，如中國崩潰，得勢的將為共產黨。陶德曼指陳戰局嚴重，蔣重申華北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必須保持，日本須立即停戰，中國斷不接受最後通牒。

南京陷落後，日本氣焰萬丈，十二月二十二日，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一、中國拋棄親共、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反共；二、劃中國必要地帶為非武裝區域，成立特殊組織；三、日、滿、中經濟密切合作；四、中國賠款。在談判期間，不停止戰爭。蔣斷然拒絕。¹德國提醒日本，中國正力謀爭取蘇俄援助，一旦中國赤化，將引起危險。日本悍然不顧，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限中國於三天內決定態度。外交部長王寵惠告訴陶德曼，在未悉日本新條件的詳細內容時，不能有所表示。十六日，廣田通知狄克遜，責中國採拖延政策，乏謀和誠意，日本決放棄由德國協助進行的談判。

四、擴大抗戰基礎

蔣委員長決定抗戰之時，即網羅各方領袖，組成國防參議會。為

¹德國軍事顧問福根豪森告陶德曼，如中國軍事部署正確，士氣恢復，彈藥充足，可再進行六個月戰爭。陶德曼不以為然，勸勿對中國估計過高，有礙和談。

統一意志，尚須有共同信守的遠大原則。八月十五，中共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一、確定三民主義為一般抗戰行爲及建國最高準繩，全國應在國民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下，奮勵邁進。二、聯合世界上同情於中國之國家民族，及一切反對日本侵畧之勢力，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三、加緊軍隊政治訓練，充實民衆武力，優待抗戰人員家屬。四、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的決定與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改善政治機構。五、以軍事建設為中心，同時注意人民生活，擴大戰時生產，發展農林經濟，樹立重工業基礎，鼓勵輕工業及手工業經營，嚴禁奸商壟斷居奇。六、發動全國民衆為抗戰而動員，凡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及法令範圍內之自由，予以充分保障。嚴行懲辦漢奸，並沒收其財產。七、改定教育制度，推行戰時教程。中共的抗日救國綱領，大致包涵在內，只是強調以三民主義為準繩，及國民黨與蔣委員長的領導，但中共的國防政府主張則不會明確列入。

¹十大綱領的要旨如下：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絕交，血戰到底，反對任何動搖妥協。二、全國軍事總動員：採取獨立自主的作戰方針，武裝人民，發展游擊戰爭，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一切抗戰軍隊平等待遇。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全國人民武裝參加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動員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四、改革政治機構：召集國民大會，通過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須吸收各黨各派和人民團體中的革命分子，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五、抗日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畧主義的國家訂立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線。六、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取締奸商。七、改良農民生活，改良工人、職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調濟食糧。八、抗日教育政策：改良教育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九、肅清漢奸、親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

大會宣言說：抗戰目的在於抵禦日本的侵畧，同時完成建國任務，集合全國人力物力，同赴此一目的。非抗戰則民族生存不可保，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以民族主義充實抗戰力量，以抗戰力量獲得勝利。抗戰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揚與民權之增進，互為因果，組織及訓練民衆，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為適應戰時需要，應設置國民參政機構，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而民權之基礎，亦於此建立。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獎進。至於新興工業，必須合政府與人民之力，謀其復興。第一，舉國當節約刻苦，從事於生產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振興。第二，一切產業復興計劃，當集中於求抗戰之勝利。第三，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分別國營私營。最後說：「吾人本於三民主義，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倘能一其心志，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非團結無以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無以得真正之團結。」希望有志之士，相與集合於國民黨，同心戮力，以完成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

大會之前，蔣曾計劃化多黨為一黨，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中國青年黨表示可以接受，國家社會黨允許考慮。¹中共贊成合作，不同意合併，主張建立一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由國民黨或蔣的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宣言擁護。不然亦可恢復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的方式，各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仍自保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前者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後者未被接受。蔣於大會閉幕時致詞，再呼籲各黨各派團結一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國民黨願推誠接納，特別希望中共履行對國民黨的諾言。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嘉森、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先後答覆，說是他們的主張與三民主義並無二致，願擁護國民政府。中共由總書記張聞天

¹國家社會黨以梁啓超的舊進步黨為骨幹，成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首領為張嘉森。

間接聲明，贊成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基本原則，作為各黨派奮鬥的綱領。毛澤東復補充說，應將抗戰建國綱領普及於軍隊與人民，並使之實行。是則，各主要政黨對團結抗戰已作出了正面承諾。

《抗戰建國綱領》中所說的國民參政機構，就是國民參政會，亦是最高的民意機關，取代了顧問性質的國防參議會。參政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地方公私機關團體中選任九十四名，文化經濟團體中選任五十名，華僑中選任六名，雖非人民直接選舉，然已包括了各黨、各派、各民族、各地域、各團體的人士，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議會權力。¹第一屆參政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在武漢開幕，通過政府長期抗戰，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設立省縣參議會。中共籍的參政員宣布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懇的態度，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奮鬥。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不再設總理，採行委員制。現在為了抗戰，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恢復領袖制，推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此時蔣的聲望之隆，似在當年孫中山之上。大會的另一重要決議為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多少有仿行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德國希特勒青年團之意，目的為訓練青年在一個主義、一個方向之下，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兼為國民黨培植幹部，蔣兼任團長，黃埔軍官學校學生為中堅。²

¹屬於中共的參政員有毛澤東(未到會)、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周恩來之妻)，屬於國家社會黨的有張嘉森、胡汝麟(石青)、羅文幹、張東蓀等，屬於中國青年黨的有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啓天、余家菊等。第二屆參政員之屬於各省市者，由各省市臨時參議會選出。

²據何廉云：一九三七年五月，蔣已有組織青年團的消息。八月，召見何應欽、陳立夫、吳鼎昌、康澤、何廉等徵詢意見。吳鼎昌說：可稱之為「蔣介石青年團」，方名符其實，蔣笑而不言。至是正式成立，青年團應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國民黨應扶植青年團的發展。但結果並不如此，形同對立。抗戰後青年團取消，併入國民黨。

五、大遷徙

長江、黃河下游及瀕海各省爲中國人口、工業、學校的集中地區，亦爲中日的主要戰場。上海擁有全國半數以上的製造工業，首當其衝。「七七事變」後，政府立即籌備遷移該處工廠。未幾「八一三」戰起，長江、鐵路交通阻滯，敵機不斷轟炸，工廠員工冒生命危險，拆卸機器，搬運材料，多賴木船經內河輾轉向上游輸送，先至武漢，再西移鄂西、四川，南移湖南，北移陝西。小部分經鐵路、水道、公路，尚可使用有限的火車、小輪船及卡車，大部分仍須使用木船，由人力挽拉，或灘險流急，或水淺難航。如自華北運往四川，須翻越崎嶇的山嶺，艱苦可知。戰前上海工廠，除公營者外，大小約有五千餘家，戰時連同江南其他各地，遷往後方者不過二百餘家，武漢地區遷往後方者，約一百五十家，廣州工廠全未遷出。截至一九四〇年，全國內遷工廠僅四百五十餘家，器材物資約十萬噸上下，百分之五十五轉至四川，其餘分設於湘西、廣西、陝西，以屬於輕工業的紡織、化學工業爲多，電器、食品工業次之，重工業約佔百分之二，員工約十萬人。生活困難，固不待言，且常遭空襲，不得不挖掘窑洞作廠房。動力更爲大問題，生產量自然大減。

一九三五年，高等教育界均知中日戰爭之無可避免，北平、天津、南京若干大學開始向華中及西南一帶覓地籌建校舍，作必要時遷移準備，如北平清華大學之在長沙，天津南開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之在重慶。清華大學先運部分圖書儀器，中央大學着手製造木箱，南開大學預設南渝中學。一九三七年八月，南開大學被日本飛機炸毀，中央大學亦遭空襲。九月，清華、南開與北京大學在長沙合設臨時大學。次年二月，再遷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不少教授學生徒步前往，歷時七十餘日。中央大學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實行西遷，以早有準備，又有長江輪船之便，損失不大，重慶新校舍於四十二天內完成，十一月初，照常上課。北方其他大學合組的西北臨時大學，設於漢中、城固，後分爲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浙江大學一遷再遷，最後至貴州遵義。

武漢大學遷設四川嘉定，廣州中山大學分遷於粵北、雲南，上海各大學多遷於四川。此外尙有新設的大專學校。戰前全國在校大專學生約六萬人，戰時約八萬人，以中央大學的規模爲大，設備亦較完善。至於國民教育，大事推廣，受教的兒童，約佔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政府又在後方開辦了不少中等學校。來自淪陷區的大專及中學學生，大都給以貸金，後改爲公費，一爲安定他們的生活，一爲不使其前去共區。中共所設的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仍吸收不少青年。

交通建設以公路爲主，最重要的爲一九三八年底通車的滇緬公路，次爲越桂公路。通往蘇俄的西北公路較以往改善。國內公路以川陝、川滇、湘黔諸線爲要。新築鐵路有一九三八年自湘南衡陽至廣西桂林的湘桂線，一九四〇年自桂林通至柳州，柳州至南寧一段未能全部完成。一九四三年黔桂路自柳州通至貴州獨山，再至都勻。四川至雲南昆明之線，一九四一年由昆明通至霑益。

華北、華東、華南的知識青年，不顧日本的砲火，偷過日本封鎖線，長途飢寒跋涉，向政府區逃亡。一般人民同樣不甘受敵人統治，千辛萬苦，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絡繹向後方轉移，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受政府救濟者，單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五省，爲數已達四百餘萬人。家計稍裕，自行設法者，及得親友之助，或隨公私機關而遷者，約在一千萬人以上。到達後方之後，分別從事小本經營、墾闢荒地、加入工廠、軍隊、開築道路、河渠。海外華僑的愛國心尤強，不惟踴躍捐輸，且歸國從軍，擔任駕駛、醫療。總之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分男女，均願爲國家民族貢獻力量，固然是爲了抵抗日本的侵畧，消雪多年的耻辱，同時亦促進了西南、西北的開發，打破了以往的地域之見。

第二節 內外危機

一、汪兆銘背叛

日本佔領北平、天津、太原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製造

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王克敏爲傀儡，名義上統轄華北，以維持佔領區的秩序，消滅國民政府的勢力，搜刮物資，「以戰養戰」並施行親日教育。

德國的調解不成，日本的「速戰速和」的戰畧失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聲稱將不以蔣中正爲國民政府代表，而與各省政府主席簽訂和約。一月十六日，除再宣言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外，並希望真能與日本提携的新政府成立與發展。爲擴大「以戰養戰」的戰畧，三月，又在南京製造一「維新政府」，以梁鴻志爲傀儡，名義上統轄華東。近衛以戰爭結束無期，前途困難，五月，改組內閣，準備再向國民政府謀和。軍部認爲與蔣已不能兩立，王克敏、梁鴻志爲過時的腐敗官僚，人所不齒，¹決另覓較有份量的人物，如唐紹儀或汪兆銘。九月，唐在上海被刺而死，乃力圖與汪勾結。

一九三二年，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時，贊成對日抵抗。經過一九三三年長城之役，認爲中國的武力不能與日本相戰，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人多指其親日，甚至詆爲秦檜。汪對蔣的芥蒂始終未泯，更恨中共。西安事變發生，一九三七年一月，汪自歐洲趕回，傳說曾與德、義有所接觸。時國、共和解之局已定，中日戰爭，早晚不免。汪一再發表演說，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携手，對內不許有兩種政府及軍隊，不可爲共產黨共同禦侮的表示所動搖，仍應先安內，後攘外。迨蔣決定抗戰，表面上汪亦呼籲國人「一齊犧牲，不留傀儡種子，使人與地俱成灰燼」，即所謂「焦土抗戰」，他的內心則是能和即和。同此意見的，不只是汪。七月三十日，胡適告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對日外交路線不可斷絕，應積極打通，由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第二天，復對蔣申述他的主張，並力薦高宗武。²八月四

¹王克敏屬舊直系，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梁鴻志屬舊安福系，曾任段祺瑞的執政政府秘書長。

²胡適說，中國爲一中世紀的國家，斷不能抵抗近代國家的日本，必須認清戰爭後果。

日，汪廣播謂「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不掩飾，不推諉，不作高調，」大有當仁不讓的氣概，附和者有「低調俱樂部」之稱。

八月六日，蔣又晤胡適。胡謂在中日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趁此尚可一戰之時，先謀恢復「七七」以前的疆土狀況，再謀調整中日關係，建立五十年的和平。上海戰爭爆發的次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兩原則，一為對日不宣戰、不絕交，二為政府不遷移。汪目視傷病官兵缺乏醫藥，說是「此仗如何能打下去！」胡要他勿太性急，勿太悲觀。九月初，蔣命胡適赴美國，蔣方震赴歐洲，旋又命陳公博赴義大利，高宗武則密去香港。陳公博與墨索里尼之婿、曾任駐華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的齊亞諾（G. Ciano）為舊識，齊亞諾提出中日和平建議，義大利駐華大使亦向汪游說。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承認滿洲國，四月，對中國禁運軍火，六月，召回駐中國大使，七月，撤退軍事顧問團，汪益感前途無望，與其待完全戰敗後言和，不若及早以圖。日本既聲言不以蔣為對手，他自是代替蔣的最有資格者。¹

高宗武在香港與日方暗洽，開始於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間。新任日本陸軍大臣坂垣征四郎決心樹立一中國新中央政府，七月，約高宗武來東京會商。未幾倫敦傳出日本與汪進行和談消息。十月八日，蔣請羅斯福發起會議，謀致遠東的公正和平。羅斯福表示，盼基於真正平等標準，轉移衝突因素。胡適時已任駐美大使，認為美國不能以實力主持公正和平。廣州、武漢淪陷，汪更認為非和不可。否則日本如進攻重慶，政府惟有退往西北，將受中共、蘇俄控制。外電續傳汪與日本已談判到和平條件，華僑參政員陳嘉庚一再對汪警告。十月二十三日，汪說：「抵抗侵略與不拒和平，並非矛盾，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又說：「侵略國家破壞和平，被侵略國家保障和平。」陳嘉庚斥其謬誤，參政會議決，敵人未出國土前，言和

¹一九三八年一月，孔祥熙繼蔣為行政院長，三月，蔣任國民黨總裁，汪任副總裁，汪難免有不快之處。

即爲漢奸。蔣亦發表文告，堅定抗戰信念。十一月三日，近衛聲明繼續作戰，最終目的在建設能保東亞久安長治的新秩序。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從事更生的建樹，秩序的維持，日本亦不拒絕。十八日，答覆美國照會，歡迎正在中國形成的政權，參與重建東亞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畧課長影佐 禎昭簽訂《中日協議記錄》。¹十二月六日，汪發表《積極建設淪陷區域》談話。在重慶言和爲絕不許可的事，汪決定出走，先由其妻陳璧君洽得雲南主席龍雲的諒解。十六日，汪訪蔣，蔣未待他開口，即手指茶杯說：「假使和談成功，我們連喝口開水的自由都沒有了。」汪知無法再談，十八日，飛昆明，與龍雲會晤後，二十一日，轉河內。二十二日，近衛宣布「更生中國」的國交方針：一、徹底擊滅抗日的國民政府，而與新生政權提攜；二、日、滿、中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日本在華北、內蒙駐兵；四、中國應予日人在其領土內以居住、營業自由權；五、日本不索取領土、賠償，惟要求中國執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任務；六、日本願考慮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二十六日，蔣痛加駁斥，申明汪的行動與國民政府毫無關係。二十九日，汪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請依近衛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點，與日本恢復和平。國民黨開除汪的黨籍，撤革所有職務，國民政府下令嚴緝民族叛徒。近衛初以汪爲奇貨，可用以瓦解國民政府，結果汪的「和平運動」被視爲賣國運動，始知作戰難，媾和亦難，日本前途可慮，不得不辭職而去。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在河內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國獨立生存的要道，急於自立政府，坂垣定要使中國全部變爲滿洲國。八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眼看他的政權就要出現。日本政

¹影佐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爲日本陸軍大學同學，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間，曾在南京與熊式輝及外交次長唐有壬會晤。

府以汪倡導和平以來，迄未得國內有力者的響應，和戰關鍵仍操之於蔣，汪如組織政府，反而斷了與蔣和談之路。坂垣一意孤行，以為中國有了新中央政府，不只可脅蔣言和，且可確定日本的特殊權益，切實控有佔領區。十二月三十日，日、汪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參與其事的高宗武及陶希聖竟逃往香港，將全文披露，證明汪的賣國確據，日、汪大感狼狽。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權成立於南京，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陳公博、周佛海等分據要津，「維新政府」取消，北平「臨時政府」改名「華北政務委員會」，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的權力所及。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汪正式訂立《中日關係基本條約》。汪希望重慶和他一致謀和，共同反共，縱令不克做到，至少可設法約束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壓榨。日本亦望與重慶議和，但不放鬆對佔領區人民的奴役、物資的搜刮。一九四四年汪病死，南京殘局由陳公博、周佛海維持。¹

二、國共的明爭暗鬥

國、共兩黨爲了相互爲用，而有爲期三年餘的第一次合作。終以立場不同，齟齬時生，雖曾共同北伐，未待完成，即全面破裂，成爲死敵。經過十年斷殺，而有西安事變，雙方和解，中共雖然渡過了存亡關鍵，倘若不是七個月後蘆溝橋事變發生，或再遲相當時日，彼此能否長期相安，仍是疑問。抗戰軍興，國民黨以爲大敵當前，中共力量有限，可望從此就範；中共則認爲良機已至，不惟不再憂懼國民黨的壓迫，且可於戰爭中組織農民，大事發展，國民黨自難容忍。第二期的合作不及二年，衝突復表面化，有如第一期合作的重演。

毛澤東篤信政權得之於馬上，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武力。史達林曾說，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優點，離開了武裝鬥爭，中國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國共和解之初，中共僅允將紅軍

¹周佛海久與重慶情報人員暗通，他們亦樂於利用。陳公博代汪後，仍欲與重慶聯合防共、剿共，重慶不理。

名義上改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指導，實際是獨立自主。中日戰爭爆發，毛澤東指示共軍，相機建立敵後根據地，取得地方武力的指導地位，並在政府軍中取得領導地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抵延安，力主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政府及軍中的領導權，自是史達林的指示。毛澤東不以爲然，要在抗戰中儘量擴充黨的武裝力量。上海失守，國民政府處境至爲艱危。十一月十二日，毛指國民黨的抗戰爲不要人民羣衆參加的抗戰，希望國民黨改造，作爲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基礎。八路軍應在改造軍隊過程中起模範作用，本身應該擴大。他雖說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但必須實踐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由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中共絕對領導八路軍，不受國民黨的任何限制和阻礙，放手發展。史達林爲不令蔣爲德國調停所動，陳紹禹在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重申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爲着抗日統一戰線。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擁護蔣委員長貫徹抗戰到底主張。陳駐武漢與國民黨聯絡，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¹

一九三八年六月，史達林希望中國繼續拖住日本，致書蔣委員長，表示對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念。九月，武漢保衛戰益急，陳紹禹、周恩來返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委員第六次會議。會議未畢周恩來趕回武漢，向蔣面遞毛澤東的親筆信，謂在蔣領導之下，深信國、共兩黨的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抗戰。周重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請求。蔣對於毛之所說，頗有疑慮，對於周的建議，鑒於過去容共的不利經驗，仍未之許。毛於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中發表《論新階段》，強調統一戰線及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共同抗戰，共同建國。但他十月及十一月的報告及所作結論，仍說各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相對的自由權。如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是片面的服從，是投降。中共的方針是「既統一，又獨立，」反覆指出「中國的

¹與毛澤東意見日深、遭受鬥爭的張國燾亦支持陳紹禹。一九三八年四月，張秘密離延安，前往武漢，脫離中共，此事類似汪兆銘的自重慶出走。

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有軍就有權，戰爭解決一切，」「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有了槍確實可以改造黨，」「槍桿子裡出政權，」「槍桿子裡出一切東西，」「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取得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有強大的軍隊，」「整個的世界只有槍桿子才能改造。」毛澤東是中共中央主席，陳紹禹雖挾共產國際或史達林以自重，權力則在毛之下。

抗戰開始之時，中共的兵力約為三萬人，僅有陝、甘、寧邊區十五縣。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改蘇維埃政府為邊區政府。蔣命西安行營嚴防，但邊區已擴大至二十縣，各縣有自衛軍。此後三年之間，八路軍與中共開闢的根據地大致如下：一為一九三七年底建立的晉、冀、察邊區，以河北西北部為中心，兵力五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四十縣。二為一九三八年建立的冀中區，兵力約二萬人，活動的地區約二十縣。三為冀東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約十縣。四為冀南及冀、魯、豫平原區，兵力約三萬人，活動地域約五十縣。五為晉、綏邊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七縣。六為山東區，始於一九三九年，不久兵力約七萬人，活動地域幾及全省。合計華北八路軍控有二百餘縣，兵力約三十萬人。以一九四〇年的發展為最速，主要領導人為聶榮臻（晉、冀、察邊區）、賀龍（冀中）、劉伯承（冀南）、徐向前（山東）。長江下游的新編第四軍初約一萬人，一九三八年，分別建立淮南、淮北、蘇南、蘇北區。長江以北的兵力約為二萬餘人，長江以南約為三萬餘人。另有蘇、皖、豫、魯邊區，鄂、豫、皖邊區，兵力各約一萬餘人；湖南、浙江、廣東境內共約二萬餘人。合計兵力十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五十餘縣，主要領導人為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李先念。

大致而言，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八路軍，江蘇、安徽的新四軍為大。國民政府在此五省仍設有省縣政府，留有相當軍隊，並有地方民軍。中共既大力擴張，雙方衝突在所難免。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一萬人，屢遭八路軍襲擊，全部消滅，正規軍數萬亦被擊潰，省政府不能立足。一九三九至一九

四〇年，山東保安隊被繳械者至少四五萬人。山西閻錫山的新軍，一稱「抗敵決死隊」，約二萬人，大半由中共幹部統率，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相繼與閻脫離關係。一九四〇年蘇北的新四軍合南來的八路軍攻佔興化黃橋，政府軍死者數千人。湘北、豫南國共軍亦起衝突，新四軍蒙受不利。

一九三九年六月，周恩來要求承認擴大的陝、甘、寧邊區及八路軍現有兵力，並解決河北問題。蔣命中共服從命令，否則決不遷就。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及《異黨問題處理方案》，政府軍實行封鎖陝北。毛澤東態度強硬，九月，對記者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共的武裝衝突連續而來，中共稱之謂「反磨擦鬥爭」，為抗戰期間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毛指示中共幹部，「對於頑固派鬥爭，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團結並不是停止一切鬥爭。復特別命新四軍放手擴大，堅決建立根據地，大批培養幹部，事事與國民黨作對。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爆發，蘇俄忙於西進，不欲國、共衝突擴大。一九四〇年四月，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A. S. Panutyaskkin)向蔣調解。七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周恩來提議，劃河北、察哈爾及山東黃河以北為八路軍作戰地區，擴編八路軍為三軍六師，新四軍為兩師。因中共別有要求，未獲協議。八月及十月，魯南、蘇北的山東省政府的所在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攻佔後，政府再命八路軍、新四軍開往黃河以北，中共僅允將江南的新四軍移防江北。十二月九日，蔣令新四軍立即開往江北，再開往黃河以北，八路軍須一律開往黃河以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新四軍九千人在皖南涇縣遭政府軍包圍，軍長葉挺以下五千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中共稱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並要求恢復該軍番號，懲辦與事變有關人員，撤退華中政府軍，平毀陝、甘、寧邊區封鎖線，廢除一黨專政，再要求承認中共的抗日

政權，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現狀，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六個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國、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政府當然不會同意，申明對於違令的部隊不得不加制裁，中共不能有特殊地位，切望共守抗戰建國綱領，八路軍服從命令。輿論對於新四軍事變至為痛心，說是一個國家不應有兩個政治軍事系統，軍隊必須國家化。政府設置國、共關係調整特別委員會，並對陝北防務作必要準備。

事變發生後同日，在華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Vassily I. Chui-kov）、大使潘友新勸蔣勿起內戰。蔣答稱這次事變全為整頓軍紀，絕無其他問題。美國亦甚為關切，羅斯福派他的行政助理居里（L. Currie）前來，盼國共密切合作。居里於二月抵重慶，蔣告以中國抗戰，一為抵制日本侵略，一為阻止中國赤化。他對兩方的措詞，頗有斟酌。

三、國際情勢的變幻

中日戰爭發生以來，蘇俄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難以捉摸。一面以志願空軍援助中國，一面謀緩和對日關係。一九三九年三月，史達林在俄國共產黨大會演說，指中日戰爭為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蘇俄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中國深感不安，四月，孫科携蔣委員長致史達林的親筆信，第二次赴莫斯科，希望他與英、法商談歐洲問題時，特別注意遠東的集體安全。七月，史達林覆稱，不久可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此外又予中國一億五千萬美元貸款。所謂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及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竟然是德、俄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德軍的進攻波蘭。¹九月七日，潘友新向蔣面陳史達林來電，謂蘇俄未與日本商談妥協，但十五日則與日本訂立諾門坎停戰協定，²二十八日，與德國瓜分波蘭東西邊境，繼而控

¹德國進攻波蘭的第五天，九月六日，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刊出毛澤東的談話，謂德、俄互不侵犯協定，鞏固了德、俄和平，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

²諾門坎位於滿、蒙邊境，一九三九年五月，日、俄軍在該地互轟，連續四個月。

制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進攻芬蘭，退出國際聯盟。一九四〇年一月，責中國對國際聯盟取消蘇俄會員國案未投反對票，不理中國的請援要求，同時與日本談判商約。九月，不准美國軍火經海參崴運往中國，後又要求中國以美國借款購買蘇俄軍火。

爲了孤立中國，日本準備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希望與日、德、義共同簽訂公約，劃分勢力範圍，雖不會如其所願，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本提交汪兆銘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除以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歸日本控制外，並承認外蒙、新疆、西藏爲蘇俄勢力範圍，對俄似有相當諒解。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俄中立條約成立，訂明如締約國之一方與他國發生戰爭，另一方須嚴守中立。蘇俄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但是蘇俄仍對中國說不犧牲友邦利益。

史達林既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德國放心與英、法相戰。現在又和日本訂立中立條約，使日本放心南進，以對英、美，自以爲左右逢源，操縱自如。未料希特勒在西歐得手，擊敗法國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轉而大舉東攻蘇俄。一年多來，中、俄關係已入低潮，¹十月二十四日，蘇俄宣布停止對華援助。蔣仍竭力週旋，曾召見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對蘇俄被侵面致關懷，復親赴蘇俄大使館祝賀俄國革命的紀念日。一個月後，珍珠港事變發生，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兼及德、義，希望蘇俄亦對日本宣戰。蘇俄答稱，須待中、美、英、俄有了周密計劃，充分準備。

英國初欲借條約約束日本而未果，始以經濟支持中國。一九三九年先後給以貨幣貸款一千萬鎊，信用貸款三千萬鎊，後因希特勒橫行無忌，又謀對日撫綏。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是年七月，決定南進，爲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

¹蔣在日記中說：「俄政府自去年（一九四〇）以來，對我侮辱蔑視，干涉我內政，明白掩護共黨，而且在新疆設飛機場，侵犯我領土，不一而足。」

停止滇越鐵路爲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的交通線全斷。¹七月十七日，英國亦接受日本要求，封鎖滇緬公路。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三個月後，始行重開。九月二十三日，日軍入駐越南北部，廣西、雲南遭受威脅。二十七日，日、德、義正式同盟。一九四一年七月，乘德蘇戰爭，日本佔有越南南部，想從南方地域加強壓力，迫中國屈服。

美國對日本施以實際壓力，始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之禁運飛機零件附屬設備及炸彈。二月，給予中國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七月，宣布廢止美日商約。一九四〇年四月再貸予中國二千萬美元，以滇錫抵償。八月，美對日禁運汽油、廢鐵、機器及軍用物資。一九四一年一月，羅斯福致文國會，將以全力援助抵抗侵略的民族，使美國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三月，軍火租借法案成立，中國亦享有此項權利。四月，中美訂立貨幣協定，美國以五千萬美元購買中國貨幣。

中國的迫切需要爲飛機，一九四〇年十月，曾與航空委員會顧問美人陳納德（C. L. Chennault）商組空軍志願隊。一九四一年四月，羅斯福准美國公民來華服務。八月一日，美空軍志願隊（飛虎隊）成立於雲南昆明，²十月，中國飛行員在美開始訓練。但是四月以來的美日談判，並未停止，仍有妥協可能。

四、戰局持續

武漢會戰結束，戰爭高潮已過。中國的主力部隊撤至平漢、粵漢鐵路以西，統帥部移設重慶。黃河上游的陝西、綏遠、山西，下游的河南、河北、山東，長江以北的漢水、淮河流域，以南的洞庭湖、鄱陽湖流域，長江下游的蘇、浙、皖、贛之交，配置相當兵力，分頁阻止及牽制敵人之責，以拱衛四川。日本兵力不敷分配，鑒於繼續進攻收效不易，改以政治進攻爲主，切實控制佔領地區，採長期圍困政策。

¹法國在華亦有軍事顧問，一九三九年九月撤退。

²志願隊員月薪七百五十美元，擊落日機一架，給獎金五百美元。美日戰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初次參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改組爲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三驅逐隊，陳納德任美國駐華空軍司令。

復乘德國在歐洲戰無不勝之日，加緊與之相結，壓迫英、法，妥協美、俄，俟機南進，實現「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中國於久戰之後，元氣已傷，財力物力日艱，外援微不足道，浩大軍費均須自籌，通貨開始膨脹，士氣不似以前旺盛，國、共兩黨猜忌日甚，惟有暫圖保持現狀，以待世界大勢的演變。

四川表裡山河，地勢險固，民阜物豐，理應為長期抗戰的最佳根據地。軍興之後，劉湘率部出川參戰，一九三八年一月，病卒漢口，川局既隕。初為軍人反對新任省政府主席，繼為內部互爭。蔣以整頓四川，統一西南，鞏固後方，乃當前唯一要務，憂心如焚，「食時寢時，甚至夢中，終不能暫時釋懷，此乃一切問題之根本。……外交無論如何吃緊，仍以此為念。」一九三九年九月，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增調軍隊前來，局勢始趨穩定。此後於餉糈兵源，貢獻至大。雲南的重要性僅次於四川，省政府主席龍雲的驕橫，不讓於四川將領。一九四〇年，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停閉，日軍進駐越南，龍雲態度動搖，亦因中央軍的進駐而獲無事。

日軍為鞏固已有據點，維護水陸運輸線，擴大佔領區，嚴密封鎖中國對外交通，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一再發動攻勢。比較重要的戰役，就地區言，一為兩次贛北之役，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約五萬人，進犯南昌，華軍約二十萬迎擊，一週後南昌陷落。第二次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軍約四萬，華軍倍之，激戰於南昌以西地區，為時二週，日軍頗有損失。二為兩次鄂北、豫南之役。一九三九年四月，華軍在各戰區反攻，五月，武漢日軍五萬分路進犯，為十餘萬華軍所遏阻，成相持之勢。一九四〇年五月，日軍再度進犯，兵力約增加一倍，中國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六月，日軍佔領宜昌，截斷了四川、湖南間的水運，對重慶的壓力至巨。三為兩次湘北之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軍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驚惶失措，下令縱火，長沙全市幾化為灰燼，打擊抗戰精神極大。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十萬來犯，十天後為華軍二十餘萬拒退，此為第一次長沙大捷。一九四一年九月，日軍第二次來犯，四天後退却，此為第二

次長沙之捷。四爲桂南之役。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佔領海南島，十一月，登陸欽州灣。兵力約五萬人，西趨廣西，襲陷省城南寧，完全斷絕中國與越南間的交通。十二月，華軍十六萬大舉反攻，劇戰於南寧東北的崑崙關，歷時兩月。一九四一年四月，東南沿海的寧波、溫州、福州，亦相繼失陷。五爲冀晉之役。一九四〇年八月，河北、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十萬人出擊，連續三十餘日，中共稱之爲「百團大戰」。六爲晉東南之役，中條山爲華軍在黃河北岸的重要據點，一九四一年五月，日軍五萬來犯，華軍十萬力戰十餘日，軍長二人陣亡，一部分退至河南，一部分轉往太行山。

日本空軍對於後方的轟炸，初以南京、武漢、廣州受禍最烈。一九三九年後，遠及於西北的蘭州、西安、西南的昆明，而以重慶爲主要目標。是年五月三日，重慶市區被炸大火，精華付之一炬，死者四千四百餘人，傷者三千餘，市民二十餘萬緊急向鄉間疏散，報紙一度停刊。此一年之內，總計各地被空襲二千六百餘次，人民死者二萬八千餘，傷三萬一千餘，房屋被毀十三萬八千餘間。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二十日，重慶再次被炸，大火兩日夜。中國空軍因飛機損耗，無從補給，蘇俄空軍志願隊亦於是年撤退，中國全失抵抗之力。日本以空襲代陸上進攻，狂炸濫燒，以動搖中國戰志，破壞經濟建設，擾亂後方秩序。但是中國人民雖血肉糜爛，室家爲墟，對抗戰終無怨言，反加深了對日本的痛恨。重慶爲一座山城，加緊開鑿防空洞或隧道，生命傷亡大減。不幸一九四一年六月，發生大隧道窒息事件，死者二萬人。八月，日本又採行所謂「疲勞轟炸」，無間晝夜，連續七日，公私工作俱停，食眠皆斷，蔣委員長官邸亦毀。成都、昆明居民，所受苦痛大致相似。太平洋戰起，日本改「政畧轟炸」爲「戰畧轟炸」，以前方軍事要地爲目標，後方的空襲始不似前此之兇殘而頻繁。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

一、中國成爲同盟國之一、平等條約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準備南進，除了爲阻斷中國與越南交通外（見706頁），最後是囊括印度以東、澳洲以北地區。一九四〇年九月，日軍佔領北越前後，美國一再抗議，並於一九四一年二月，與英國重申反對日本南進之意。三月，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國務卿赫爾提出一諒解方案，包括日軍自中國撤退，不索賠償，協議門戶開放方針，重慶政府與南京政府合併，承認滿洲國。俟中國接受，日本願依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直接與中國新政府商談具體和平事項。如重慶政府拒絕，美國應不再予以援助。美國要求先確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維護機會平等，不擾動太平洋現狀爲原則。

德、俄戰起，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先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強化南進態勢，解決中國問題，不惜對英、美開戰，暫不加入德、義戰爭，而以外交手段，防止美國參戰。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登陸西貢，羅斯福以情勢嚴重，八月十七日，面交野村聲明兩件，日本如再有侵害鄰邦行動，美將採必要步驟，日本必須停止擴張，同意維護太平洋和平。十月二日，赫爾建議中、日休戰三個月，日本不再南進，不攻雲南，然後自越南撤兵，美國即放鬆對日經濟封鎖。日本因軍部反對，近衛去職，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任首相。十一月一日，大本營與內閣聯席會議，決定只與美國談判南方問題，至於中國問題，應由日本自行解決。如十二月初仍無結果，即對美、英發動武力。十一月五日，經御前會議裁定，並加派前駐德大使來栖三郎爲赴美特使。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來栖分向羅斯福、赫爾表示，拒絕即自中國撤退全部日軍。二十日，提出最後方案，除越南外，日、美均不向東南亞及太平洋作軍事擴張；在對華和平恢復後，日軍自越南撤退。

美國停止其偏袒態度與行動，日、美合作向荷屬東印度取得必需物資，恢復日、美通商，美國給日本所需汽油。二十二日，美方會擬一臨時協定草案，日、美均不在太平洋地區使用武力，日本減少在越南北部駐軍，不進攻雲南，美國可放鬆對日制裁。蔣委員長以美國不提撤退在華日軍，仍有犧牲中國對日妥協之意，命駐美大使胡適，堅決反對，英國亦不同意日軍留駐越南。¹二十六日，美國放棄草案，另提九原則及十點，要旨為不侵犯太平洋一切國家的領土主權，通商機會及待遇平等，日軍自中國、越南撤退，除重慶國民政府外，日、美均不援助任何政權，並放棄在華各種特權。二十七日，東京接到野村的報告，認為不能容忍美國提案，已無討論餘地，特別是撤兵及支持重慶政府兩點，惟有開戰。二十九日，東條在重臣會議演說，必須對美、英報復。三十日，又在內閣會議強調對美、英之戰，不能遷延時機，否則日本經濟將陷於絕境。十二月一日，御前會議，決與英、美、荷開戰。六日，羅斯福親電日本天皇，要求日本退出越南。蔣委員長亦通知羅斯福，決不放棄東北。

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艦隊已向夏威夷進發。十二月八日，突襲太平洋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區日軍亦四出攻擊，美、英與日本互相宣戰。四年多來，中國苦撐待變的希望成為事實，興奮可知，亦正式對日本宣戰並及德、義。蔣建議成立中、美、英、荷、澳聯合作戰委員會，共同保衛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荷屬東印度，並請蘇俄參加。因蘇俄婉辭，僅由中、美、英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重慶召開一次軍事會議，無重要決定。英首相邱吉爾以美國特別重視對日戰爭，親訪華盛頓，力主先進攻德國，對日暫取守勢。美國軍方亦認為德國為主要敵人，遂決定先歐後亞戰畧。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英、俄、中等二十六個同盟國發布聯合國宣言，全力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中國開始列入四強。羅斯福為鼓舞中國士氣，提高蔣的聲望，推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包括越南、泰國，對於中國

¹胡適任駐美大使，始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美談判時，赫爾不時將內情告知胡適及英、荷、澳大使。

來說，並無裨實際。

日軍突襲珍珠港以來，在太平洋地區所向披靡，月餘之間，連佔關島、香港、馬尼刺，橫掃南洋，直迫緬甸，惟在中國戰場遭受挫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自湖南岳州南侵長沙，中國軍隊俟其深入，加以包圍、側擊，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被逐回原地，是為第三次長沙之捷，亦為同盟國的第一次勝利，英、美一致表示歡欣稱道。

中國為衛護滇緬交通，願協防緬甸。英國以情勢緊急，勉強同意。一九四二年二月，蔣委員長訪問印度，勸英國宣布印度為自治領，印度暫放棄獨立要求，合力以抗日本。邱吉爾成見不變，印度領袖甘地反應冷淡。緬境英軍為保存實力，以保印度，對日軍毫無戰意。蔣派兩軍入緬助戰，歸新任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指揮。以仰光已為日軍佔領，命史迪威堅守緬北。史迪威主反攻緬南，雖救出仁安羌（Yenangyaung）被圍英軍，洞吾（Toungoo）則為日軍所陷。五月，緬北滿德勒（Mandalay）、密芝那（Myitkyina）、臘戍（Lashio）、及滇邊畹町、龍陵、騰衝續失，日軍直抵怒江西岸，史迪威走印度。總計中國官兵戰歿一萬三千人，物資損失八百萬噸。

四月，美國飛機自航空母艦起飛，初次轟炸東京，事後飛浙江降落，以未經聯絡，飛機全毀。日本恐美空軍使用中國基地，出動陸軍十萬，進攻浙西、贛東。蔣委員長正注全神於滇緬之戰，為保全兵力，屏蔽湖南，不與在浙、贛決戰，日軍破壞浙西機場後，亦未續進。此後年餘，中日重要戰役，一為一九四三年四月，華北日軍之進攻冀、晉、豫間的太行山，中國損失頗大。二為五月，湖北日軍為牽制雲南華軍反攻緬甸，自宜昌西侵未逞。三為十一、十二月間，日軍之進攻常德，戰況異常激烈，華軍得美空軍支援，常德失而復得。

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國惟望中國無條件追隨，英國對中國的輕蔑與妒忌，兼而有之。中國的急切需要為美國實際援助的加強，美國對於中國的請求，除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

千萬美元借款，餘皆斬而不予，反促中國力戰。緬甸之役，中國損兵折將，蔣委員長認為失敗的主因，是作戰方針為人轉移，不能自主，痛感所謂同盟與互助皆虛妄之言，美國並不例外。四月二十一日，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外交部長宋子文要求美英參謀團會議及軍火分配機構，加入中國代表，未得要領。熊式輝與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面談，亦無結果。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演說，不提中國為四強之一，五月十日演說，對中國軍隊在緬甸的奮鬥犧牲，亦隻字不提。五月二十五日，蔣電羅斯福，謂對同盟國信心完全動搖，自云從未經過如此嚴重局面，今後當審慎機勢，把握現實。

中國沿海沿江條約口岸及要城，為日本佔領後，美英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實際多已不能享受，復以日本聲言願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英美亦宣布，戰後將與中國商談取消在華特權，尚不肯立時廢止。中國要求改善在同盟國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輝主張中國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宋子文反對，胡適不甚熱心。六月，熊改向白宮行政助理居里獻策，謂美國對華援助物資有限，正應取消不平等條約，給以精神鼓勵。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惠而不費之舉，經與英國交換意見後，十月九日，國務卿赫爾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¹ 準備與中國談判放棄在華特權及有關問題的條約，另訂新約。同日，英國亦有此表示，繼之為加拿大、荷蘭、巴西等國。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約簽字，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正式終止。治外法權、租界、內河航行權、軍艦駛入中國領海權、洋員管理海關行政權、北平使館區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線外國駐兵權，一一取消。但是英國仍不肯放棄九龍租借地，中國聲明保留。美國為再表示對中國友好姿態，國會議員倡議，廢除限制中國移民法案，即排華案，准許華人入境、入籍，使日本不能以聯合東方民族對抗西方民族為藉口。羅斯福說，排華案為一歷史上的錯誤，撤廢中國移民法案，

¹宋子文與胡適不睦，九月八日，魏道明代胡適為駐美大使。

不僅可證明美人認爲中國爲作戰盟友，亦爲和平時期的夥伴。十二月十七日，撤廢排華案正式成立。羅斯福再聲明，「此舉足可代表美國人民的感情與敬意，同盟國間各種不幸障礙業已除去，今後遠東方面的作戰努力，當更形加緊，並對於共同目標有更大的諒解。」但是移民的數目，每年僅限一百零五人。

平等新約訂立，一時舉國歡騰，蔣委員長亦說，是平生唯一幸事。當前危機與現實困厄，並未解除，同盟國依然爾詐我虞，各自爲謀，中國的艱險且甚於獨力作戰之時。

二、中俄新疆之爭、中美英對反攻緬甸之歧見、開羅會議

蘇俄控制新疆的政治、軍事後，進謀攫奪經濟，特別是礦產。一九三九年，實行開採獨山子油礦。但是史達林並不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乘瓜分波蘭、囊括波羅的海東岸各國的餘威，決東併新疆。一九四〇年初，除製造阿爾泰山叛亂外，並陰謀迪化暴動，結果俱告失敗。十一月，蘇俄代表巴庫林（Bakulin）、卡爾潑夫（Karpov）以一秘密文件交盛世才，聲言「一個字都不能動，你係『聯共』黨員，應服從黨的命令，更應爲蘇俄的利益作鬥爭！」同月二十六日，盛以「新疆政府」代表名義將密約簽字，訂明今後五十年內，許蘇俄以新疆錫礦及副產礦物，新疆一切自然資源、公路、鐵路、電話、森林等亦盡歸蘇俄所有。蘇俄特設新疆錫礦公司，置備武裝。

盛世才開始對史達林不滿，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已允他入黨而爲史達林所拒之時。一九四〇年的迪化暴動陰謀及脅訂錫礦條約，更使他難與蘇俄共處。史達林計劃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發動政變，因新疆機械化旅長盛世騏被殺，復歸失敗。¹ 時蘇俄對德戰爭好轉，史達林決心與盛世才攤牌。七月初，蘇俄外交次長德卡諾索夫（Dek-

¹盛世騏爲盛世才之弟，畢業於莫斯科紅軍大學，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殺。被殺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受史達林收買，爲盛世才處死；一說他不肯服從史達林的命令，爲其妻共產黨員陳秀英刺死，盛世才又殺陳秀英。

anozov) 向盛面交一函，歷數其近年背叛中國政府行事。¹ 重慶蘇俄大使潘友新將副本送蔣委員長，盛世才亦將以往對俄關係向蔣和盤托出。蔣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敷衍蘇俄。八月，親至甘肅，派蔣夫人及第八戰區(西北)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去迪化。九月，盛通知迪化蘇俄總領事，命新疆蘇俄顧問、專家撤退，殺中共要員毛澤民、陳潭秋等。²

中俄關係惡化，中美關係亦仍欠佳，援緬之役，尤令蔣委員長憤慨，此與史迪威個人實有關係。一九一九年以來，史迪威歷任北京美軍語言教官、駐天津美軍營長、美國大使館武官，先後十年，性情孤傲，輕視中國人的才能，對於近年中國的變化缺少了解。此次之來，出於馬歇爾的推薦，具有雙重身份，他是美國的軍事代表，有權管理租借物資，又是中國戰區參謀長，為蔣的部屬，但不聽命令。馬歇爾知道史迪威與蔣不協，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對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說，必要時可將史迪威召回，另派人接替。蔣未作表示，反准其在印度訓練新軍，任為駐印軍司令。據他六月十九日致熊式輝、宋子文書，原因之一是史迪威近病黃疸甚劇，二是「為中、美國交與保全友邦榮譽，」三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不願暴露人短。」又說「緬戰失敗，咎在戰畧，中〔蔣〕電令〔史〕到密芝那布置防務，……而彼竟自赴印度，並調我軍入印，……未對我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從未會見推諉罪過，逃避責任，以圖自保，有如此之甚者也。照我國慣例，此次緬戰失敗之總因與責任，應有一軍事審判，方能明白功過之究竟，然此非今日國際處境之所宜也。」「史在華久，仍以十五年前之目光，視我國家與軍人，故事多格格不入。以後美國如再派人，請其勿再派前駐華武官。」可見他對史迪威之如何憎惡。

¹函中列舉一九三四年盛世才建議先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依次及於陝、甘。對於西安事變，主張護張學良。一九四一年，又主在新疆成立蘇維埃政府，均為蘇俄拒絕。

²毛澤民為毛澤東之弟，時任新疆民政廳長。陳潭秋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美國曾承諾在中國維持飛機五百架，每月供給物資五千噸，不僅不會做到，復將原定在中國戰區使用的駐印空軍調往埃及。蔣命史迪威轉告美國政府，自八月起，踐履上述諾言，派兵打通滇緬交通。史迪威拒不遵行，蔣對他即不理睬，史迪威請馬歇爾施用壓力。七月，羅斯福再派居里前來，蔣同意反攻緬甸，惟須英國海陸軍配合，美國給中國以充分空軍支援。羅斯福允加強空軍及空運，十月，中國運兵赴印度受訓，三十師新軍的訓練旋亦在雲南開始。英國恐中國與印度聯合，不願由中國收復緬甸，表示海軍不能出動。

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邱吉爾決定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暫緩反攻緬甸，繼建議由中國先反攻北緬甸，俟有成效，再由英、美海陸軍進攻南緬甸，蔣主同時實施。史迪威暗與中共接觸，擬使用八路軍，蔣大為不滿，擬使離去，以開羅會議在即，暫行擱置。

十月，美、英、俄外長會於莫斯科，發表戰後共同建立國際機構宣言，中國因美國的支持，亦得列名。美、英、俄會商定三國領袖會議，羅斯福邀蔣委員長參加。史達林藉口蘇俄未對日本宣戰，未便與蔣相見，於是改分兩地舉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於開羅，這是中國參加的僅有的一次同盟國首領會議。十二月一日，發布開羅會議宣言，聲言此次戰爭目的，在制止、懲罰日本的侵畧，剝奪一九四一年以來日本奪佔的太平洋島嶼，東北四省、台灣、澎湖，歸還中國，並使朝鮮獨立，日本須無條件投降。

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徵求蔣對廢除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見。蔣謂戰爭的禍首為日本軍閥，日本國體問題，可俟戰後由日人自行決定。朝鮮獨立亦為他的主張，並希望協助越南獨立。對於反攻緬甸問題，蔣仍主張陸海軍聯合行動，羅斯福保證於來年春季開始。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會於德黑蘭，史達林力爭開闢歐洲戰場，待擊敗德國後，蘇俄即對日本作戰。邱吉爾勸羅斯福收回對蔣的諾言。羅斯福以為如獲蘇俄的合作，不惟可早日結束戰爭，戰後一切計劃，亦可順利實現，中國地位無足輕重。十二月五日，致電蔣委員長，謂英國海軍須先用於對德、義戰爭，不克夾擊緬甸日

軍，詢以願否單獨反攻，或待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盟國有在海上大舉能力之時。蔣離開羅後，已預料「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羅斯福雖保證海軍在緬甸登岸，必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然而緬甸反攻時期，吾可斷定非至明年（一九四四）秋季，決無實施之望。」及接羅斯福來電，至為不懌，覆以中國的軍事、經濟情況，不可能支持六個月，希望借款十億美元，另請增加陳納德及中國空軍實力，每週空運二萬噸物資。美國認為貸款無裨於中國經濟。

三、國共關係的緊張

中共爲了種種原因，對於新四軍事件不得不暫時忍耐。一以實力尚不夠強大，各方仍認國民黨爲領導抗戰的中心。二以是年（一九四一）六月，蘇俄突遭德國閃電攻擊，如日本與德國共同行動，蘇俄處境將不堪設想，斷無力爲中共之助。七月，中共宣言，謂蘇俄對德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性質相同，必須鞏固抗日陣營，使日本無法抽調兵力西進、北進或南進。《解放日報》聲稱蔣委員長的對日主張與中共的意見一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繼起，中共再強調鞏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三以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尚未十分確定，準備乘蘇俄無暇干預中共內部之事的機會，打擊以陳紹禹爲首的國際派。一九四二年二月，實行「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主義以整頓文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毛的一元領導，這可說是中共的安內。四以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之間，華北日軍一再向共軍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所謂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冀中區、晉、冀、察邊區，受禍特烈，解放區人口，由一萬萬降至五千萬，八路軍由四十萬降至三十萬，新四軍由十三萬降至十一萬。同時華北災荒嚴重，政府軍對陝、甘、寧邊區封鎖加緊，中共自認是極端困難的時期。新疆盛世才輸誠中央，對中共亦屬不利。

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派黃埔軍校出身的林彪到西安見蔣，

說是「毛澤東一再告學生(林)，今後兩黨應當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中共雖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行之於中國。……目前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綱領努力，……盼於委座(蔣)領導之下，奠立鞏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一九四三年一月底，林彪又在重慶兩次見蔣，要求撤除對陝北邊區的封鎖，接濟中共軍餉、彈藥、藥品，均無結果。¹三月，又與周恩來同晤參謀總長何應欽，提出四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共軍編為四軍十二師，陝、甘、寧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俟對日戰後，黃河以南共軍開入中央指定地。何應欽重申一九四〇年命令(見704頁)，八路軍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編為二師，一個月內開往黃河以北，改陝、甘、寧邊區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新四軍事件發生後，政府對中共之未採進一步行動的另一原因為顧慮美國的反應。是年二月，居里帶來的羅斯福致蔣委員長函中，對中共頗加稱道，希望國共能消泯歧見，密切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居里之晤周恩來與蘇俄大使潘友新，均與此事有關。六月，羅斯福介紹給蔣的政治顧問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與居里對中共皆抱好感。美國大使館秘書兼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s)、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周恩來不時往來。居里到後，周對他表示，歡迎美國派員去中共區域視察。一九四三年初，又向戴維斯說明美國派員訪問延安的必要，並盼建築飛機場。戴維斯建議國務院在陝北設總領事館及軍事觀察團。復屢與謝偉思在發回的報告中，謂不可忽視中共力量，國軍士氣低落，長官貪污，政治派系紛爭，無

¹蔣謂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在西安接見林彪。按蔣於九月三日自甘肅抵西安，十四日返重慶，接見林彪應在此期間，十月十三日或係九月十三日之誤。林彪告美國大使館秘書莊萊德，渠係一九四二年十月初離延安，三星期後抵重慶，恐亦誤。毛澤東云：林留重慶十個月，一九四三年六月底離去，是林之到重慶當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

意抗日。惟有由美國干涉，要求國民政府解除共區封鎖，分配租借物資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勢。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民族意識甚強，受到人民擁戴。美國代辦艾哲遜（G. Atcheson）對於蔣所著《中國之命運》，亦多訾詆，指有排外偏見。美國太平洋學會人士甚至說兩個中國定必實現，一為國民黨統治區的封建中國，一為中共統治區的民主中國，中國不滿現狀者，多傾向中共。美國政府當局之所望為國共合力對日，責於國民黨者嚴，認為國民黨欲坐待美國擊敗日本，而不肯寬容中共。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解散，中共深感不安，宣稱近年共產國際僅予以精神支持，中共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抗戰。毛澤東說，共產國際解散是要加強各國共產黨的力量，使其更為民族化，中共更成為民族性的黨。他所憂慮的是國民黨以為中共已遭蘇俄遺棄，乘機壓迫。六月六日，蔣委員長果然告訴在重慶的林彪、周恩來，如中共放棄邊區政府與軍隊，即予以合法地位，希望八月前答覆。跟着包圍陝北的國軍由十四師增至二十一師，林彪、周恩來以九個月來，談判迄無結果，六月底，離重慶返延安。七月，西安文化團體要求毛澤東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另一方面，朱德兩次電質西安軍事當局胡宗南，¹毛澤東要求胡部撤退，延安民衆大會亦聲稱保衛邊區。莫斯科指中國政府破壞國、共合作，企圖消滅共軍，內戰將起。重慶蘇俄大使館一再向美大使館表示關懷，謂政府軍砲擊陝北共軍陣地。

蔣對外既有顧慮，內部亦復多事。河南旱災、蝗災嚴重，飢民數百萬，餓死者數十萬人。甘肅、四川農民反抗徵糧、徵兵，²地方軍人乘機與政府為難，重慶謠言紛紛。加之物價不斷猛漲，苦於應付，對於中共

¹胡宗南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統轄十二個軍，負責監視陝北共軍，警備山西日軍。

²甘肅南部回民、番人暴動，衆至五六萬，遍及二十餘縣，稱「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國軍」、「西北農民義勇抗日救國軍」，歷時數月，一九四三年七月始平。同月，四川、西康又有民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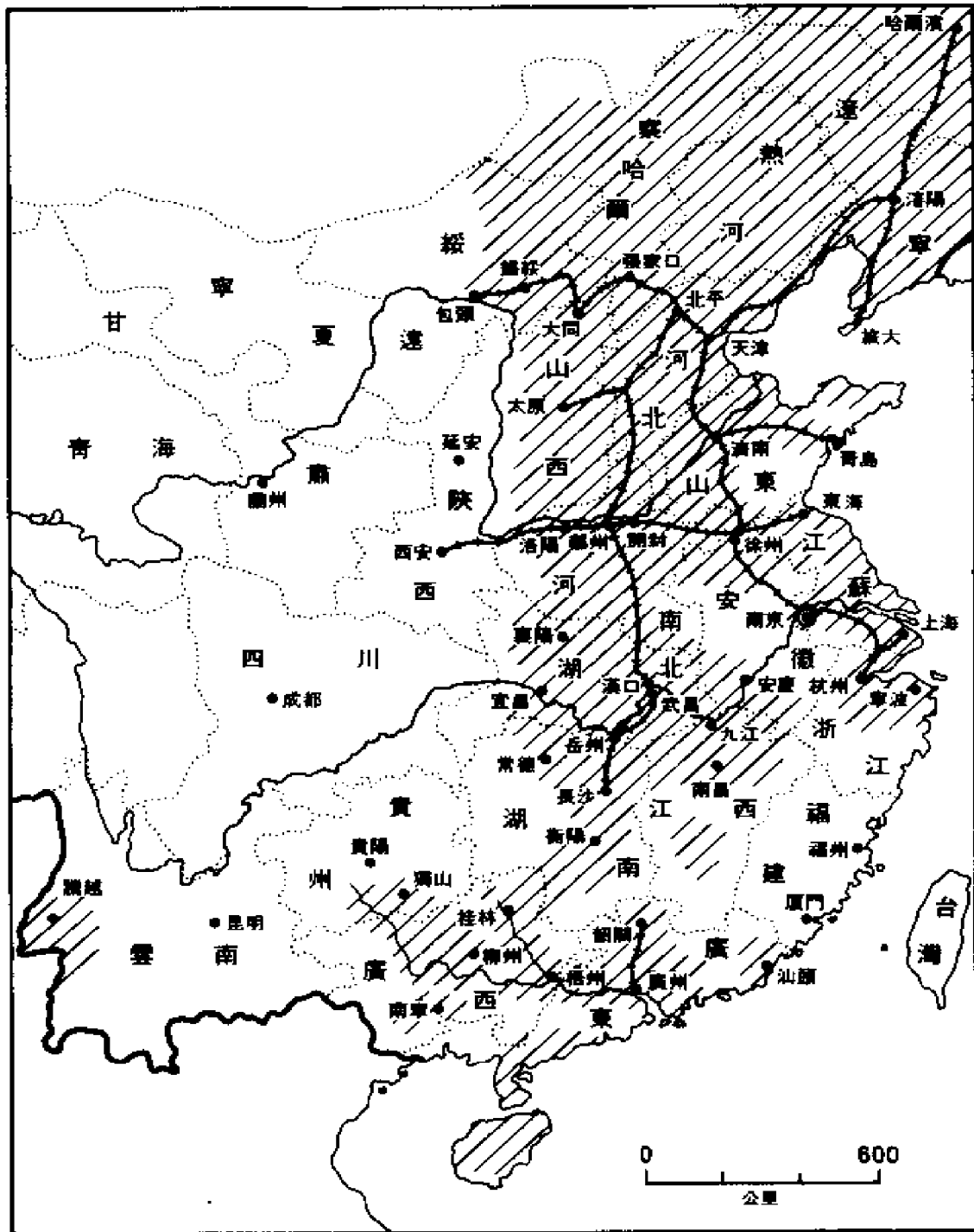
問題，自須慎重將事。一九四三年八月，重慶某要人告美報記者，政府決不用武力解決國共糾紛。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華盛頓告國務院，國民政府無意與中共決裂。九月，蔣宣稱中共問題純屬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法解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議，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希望中共切實遵守諾言。十月五日，毛澤東亦要求國民黨與蔣實踐諾言，實現民主政治，國、共繼續合作，承認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恢復新四軍，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教育。彼此條件雖相去極遠，然一觸即發的內戰，總算又暫為弛緩。

四、艱險的一九四四年

自表面上看，經過開羅會議，中國前途似頗光明，實際上今後一年是最暗淡的一年，為抗戰以來中國處境最艱危險惡的一年，亦為蔣最痛苦的一年。中、俄關係繼續惡化，中共的要求不斷擴大，日本大舉進攻，國民黨內部動盪，美國的壓力愈增，物價上漲更速。

一九四三年初，因羅斯福、邱吉爾聲稱日、德、義須無條件投降，日本首相東條演說，今年為決定戰爭之期，史達林恐其進攻蘇俄，決撤退在新疆之飛機製造廠、礦廠，以免到時被中國沒收，錫礦考察團及駐哈密紅軍亦一併撤退。六月，蘇俄大使潘友新致文中國外交部，指摘盛世才對蘇俄之非法措施及仇視行爲。九月，中央軍開入新疆，阿爾泰哈薩克人變亂再作，由外蒙供給武器。一九四四年三月，蘇俄空軍助其內犯，反誣華軍侵入外蒙；有意對蘇俄挑釁。五月，潘友新回國，蘇俄軍事顧問團亦全部離去。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重慶，勸蔣委員長對蘇俄退讓，蔣允將盛世才調離新疆。¹蘇俄並未因此住手，十一月又策動伊寧事變，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助亂黨攻佔伊犁全境，中國官兵四千餘人戰歿，迪化震動。

¹華萊士往返均取道迪化，將內情洩漏。八月，盛世才欲重行投靠蘇俄，逮捕攻剿哈薩克的師長及迪化中央人員，未得史達林諒恕，終於去職。



圖十九 日本侵佔區（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

中、美意見齟齬，主要為反攻緬甸問題。日本為防止中國駐印軍東進，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緬北增兵，駐印軍被阻。史迪威要求遠征軍自雲南夾擊，蔣以無勝利把握未允。旋以英國陸軍出動，始命史迪威由緬北雷多（Ledo）前進。十二月下旬，羅斯福因史迪威及英方之請，連促雲南遠征軍前進，但對中國借款靳而不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竟以斷絕物資供應相脅迫。蔣怒其藐視，決強硬對付。十六日，函覆，指美國對於借款，有如商業行爲，有背同盟國交往之道，中國對於在華美軍費用，將不再負擔。華盛頓異常激動，中、美關係幾瀕破裂。二十日，羅斯福勉允以每月二千五百萬美元供在華美軍之需，並將美元與法幣比率提高。

二月，雲南龍雲部冒充土匪，搶劫美國軍械，美國一度不發中國武器。同月，美陸軍抵緬北，中、美初次並肩作戰。三月，美國將援華物資運往歐洲，蔣告訴史迪威，在英軍未進之前，暫停攻擊。羅斯福再促進兵，四月來電，謂美國裝備遠征軍，正為今日作戰之用，否則失其意義。馬歇爾且以停發遠征軍物資相迫。五月十一日，遠征軍西渡怒江，六月，攻下滇西龍陵，尋為日軍拒退。蔣召見史迪威，命增發飛機與油料。馬歇爾以同盟軍已入羅馬，諾門第登陸成功，全神注於歐洲戰場。加之太平洋反攻得手，塞班島（Saipan）已經佔領，不必使用中國空軍基地，即可轟炸日本本土，中國的重要性愈為減低。

一九四三年，中共軍拒退華北日軍的掃蕩，復以美國對中共具有善意，而與國民政府齟齬，時機於中共有利。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提議重開國共談判。二月，羅斯福正式向蔣要求，由美國派員赴陝北，聯合政府運動亦漸揭開。¹蔣明知這是中共的攻勢，美國欲與中共接洽，使中共取得與政府平等地位，但他認為問題雖然嚴重，只要時間延長，實力在握，仍可自由運用。他的高級幕僚勸他趁戰時解決中共問題，不宜拖至戰後。五月，政府代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杰，與中共代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開

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戴維斯曾向羅斯福建議。

始相會，雙方立場與過去無大出入(見718頁)。六月初，中共提出新的條件，除了去年十月五日毛澤東列舉的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承認中共領導的地方政府及共軍防地外，並要求編共軍爲十六個師，分給同盟國援助中國的武器、藥品。政府允編共軍爲十個師，陝、甘、寧邊區須實行中央法令，中共可與其他政黨享受同等待遇。

當國共再度談判之日，正爲雲南遠征軍在美國壓制之下向滇、緬邊境進攻，河南軍事失利之時。日本爲打通中國南北鐵路，加強在中國大陸地位，確保南洋與陸上交通，隔斷重慶與長江下游聯絡，消滅美國空軍在湘、桂基地，牽制遠征軍反攻緬北，摧毀中國抗戰意志，決在河南、湖南境內發動攻勢。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豫北日軍南渡黃河，豫南日軍由平漢鐵路北犯，兵力十五萬。近年中國政腐敗，強征貧民爲兵，素質惡劣，訓練不施，薪餉不足溫飽，再加剝削虐待，軍官走私營商，毫無戰鬥意志。河南駐軍三十萬，主力爲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部，紀律廢弛，苛擾地方。日軍所至，湯部望風奔潰，到處遭受人民截擊，三十多天之內，鄭州、許昌、洛陽大小三十餘城盡失，潼關震動，以陝西胡宗南部力戰，日軍未再西進。五月二十四日，鄂、湘間日軍二十萬，沿粵漢鐵路南侵，中國陸軍四十萬及美國空軍不能遏阻。六月十八日，長沙陷落，衡陽堅守月餘，終亦不守。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的重要任務，一爲勸蔣委員長對蘇俄讓步，二爲對中共讓步。他說史達林雖不滿於中國政府，但亦認中共爲無理論無背景的黨，共產國際取消，蘇俄不再予支持。美國如願意斡旋國共問題，他(史達林)贊成用中共武力以對付日本。蔣委員長表示歡迎。允美國人員以考察名義進入共區。就在華萊士離開重慶之日(六月二十四日)，謝偉思報告國務院，謂國民黨已失去人心，蔣固執偏狹，美國應停止支持蔣的政府，而與自由進步分子保持友誼，裝備地方部隊抗日。華萊士因受他的隨員范宣德(J. C. Vincent)及拉提摩爾的影響，致書羅斯福，謂蔣無統治戰後中國的知識，中國應成立聯合政府。另致書於蔣，勸採取新活力與新行動。七月，謝偉思隨巴雷

德 (David D. Barrett) 到延安，設立觀察團，會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認為國民黨已死亡，中共為一新生政權，共軍遠較政府軍精壯，再建議國務院，主聯合國民黨內的自由派及共產黨改組政府。是後一再稱道中共的成就和民主精神，中共並不反對美國在華利益。美國不必顧慮國民黨的態度，可直接裝備訓練共軍。國民黨需要美國方能生存，只有追隨美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注意共產黨、自由分子、地方人物。

一九四三年起，國民黨內的高級人員，暗中論及時事亦多感慨。有的說文武負責者庸懦無所作爲，但事擴張勢力。有的說政府用人不重職責，機關不重制度，缺少組織效力。有的說蔣的主觀太重，厭聽直言，上下隔阻，社會人心浮動，青年煩悶。有的說時勢之危不在外而在內，黨政腐敗，由於自私。持此論調者，大都被目為政學系；為衆矢之的者是控制教育人事的CC系、掌握財政經濟的孔祥熙、主管軍事的何應欽。¹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蔣於日記中指孫科與中共勾結，美人從而助長，謀推翻政府。十四日，孫科在憲政座談會演講民族、政治、經濟三種自由，對時政多所指摘。蔣斥其誣蔑政府，與中共合作，以俄人為後盾，意圖奪取國民政府主席。二十七日，警告國民黨幹部，謂今後半年內最為艱苦，須作最後準備。七月二十六日，復於整軍會議中痛斥軍政敗壞，國際對中國印象惡劣。此時山西閻錫山已與日本簽訂協定，前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暗通史迪威，乘湖南戰局危急，準備設

¹國民黨內可分為三大派系：一為以黨起家的CC系，陳果夫主管黨政人事，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在黨政方面勢力極大。二為出身黃埔軍官學校的復興社（力行社），除了軍隊之外，並控制三民主義青年團，與CC控制黨部頗頗。三為非黨軍的政客、企業家、教授集團，人稱為政學系。任要職者有張羣（四川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中央黨部秘書長）、熊式輝（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杰（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宣傳部長）、吳鼎昌（貴州省政府主席）、張嘉璈（前交通部長）、何廉（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等，但並無正式組織。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積極聯絡，孫科、白崇禧、陳誠、張治中、翁文灝、朱家驊等均與之近。

立政府，迫蔣下野。

中共之外，其他小黨派與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同具反感。知識分子之不滿，固與生活艱苦有關，學術不能自由亦為原因之一。各小黨派之不滿，近因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若干參政員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之被除名。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軍事件發生後，國、共兩黨磨擦日烈，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農工黨、鄉村自治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形成一種緩衝力量，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要求國民黨公開政權。稍後救國會加入，漸與中共接近。一九四四年九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以個人資格參加，不再以政團為單位，與中共共同唱結束一黨專政，在昆明各大學最為活躍。

美國的主要希望是中國對日戰力的增強。蔣以湖南戰局危急，擬調回雲南遠征軍。史迪威急欲收復緬甸，七月三日，建議華盛頓，如蔣授以統率包括共軍在內的所有中國軍隊的全權，他願自陝西進攻洛陽、鄭州，萬不可調回遠征軍。同日，孫科告美國大使館職員，監視中共之政府軍及共軍均應用於抗日，美國如出以高壓，蔣的意見可以改變。七月七日，羅斯福向蔣提出史迪威的建議，並主以軍援物資，接濟共軍。蔣對史迪威久不信任，對於羅斯福的要求，尤所不許，但不便斷然拒絕，乃出以緩和態度，表示原則贊成，請先派一有遠大政見的代表前來面商。羅斯福雖然接受，惟仍請立時授史迪威以統率全部中國軍隊的絕對權力。七月二十二日，蔣允將前線作戰部隊交史迪威指揮。至於共軍是否在內，須視其能否服從軍令而定。租借物資應由中國分配，史迪威的統率職權應先商定。八月二十三日，羅斯福電覆，謂對史迪威職權，不當加以限制，命令須從速發表，如有稽延，將失去挽救中國的時機，中共並非大的危險。至租借物資如何管理，容後通知。蔣萬分憤怒，準備辭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拒美國的壓力。他預料羅斯福不會同意，否則美國須派百萬部隊來亞洲犧牲。

華萊士離去之後，七月初，國、共繼續談判，雙方往返駁辯。及史迪威統率權問題發生，中共態度更加强硬。八月三十日，中共代表林祖涵責政府始終不願實行民主制度。蔣召見美國大使高思，謂美國政

府不了解中共問題，中共缺乏信義，美國勸中國政府與中共妥協，適足以加強中共的頑抗，中共所提條件，不啻要求政府投降。高思建議由各黨派參加政府，共同決定並實施對日作戰計劃。九月十日，政府代表張治中答覆林祖涵，謂彼此意見距離之遠，實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十五日，林向參政會報告談判經過，結論是必須將政府機構的人事政策，迅速改弦更張，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組織聯合政府。二十一日，延安聲明，中共不能服從國民黨專制的政令，要談軍令、政令統一，必須改變現在國民黨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徹底改造統帥部，由代表人民的人去掌握政令、軍令。十月三日，林祖涵致書張治中，堅持組織聯合政府，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為時四月餘的國、共談判，又告停頓。

羅斯福派遣的代表，為一九四三年到過重慶的赫爾利 (Patrick J. Hurley)，所負任務為協調蔣與史迪威的關係。羅斯福告以美國的政策仍為支持蔣的領導，除非中共承認國民政府和蔣的領導，不能以租借物資武裝中共。九月六日，赫爾利偕美國生產局長納爾孫 (Donald Nelson) 經印度到重慶，史迪威和他同行。這時日軍正自湖南進向廣西，史迪威統率的中國駐印軍已攻下緬北密芝那，蔣命進攻滇緬邊境的八莫，期減輕日軍對滇西及廣西的壓力。史迪威拒絕執行，中共又步步進逼。蔣的心情至為惡劣，尤憤美國之落井下石。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何應欽，與赫爾利商定兩事：一為以史迪威任前敵總司令，如使用中共部隊，必先經蔣核准；一為在重慶設置美國委員會，管理租借物資，中國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自攻克密芝那後，氣焰益盛，中共又邀請他訪問延安，更認為是迫蔣完全屈服的機會。十五日，再拒進攻八莫，主調陝西胡宗南部南來，與蔣激烈爭論，並堅持仍由他控制租借物資，有任命調度中國軍官的全權，蔣不再過問戰事，否則他不接受新職，將建議美國政府退出中國，另電馬歇爾，謂蔣之欲撤回滇西遠征軍，意在保全實力，坐待美國擊敗日本。就在此時，遠征軍攻佔騰衝，再克龍陵。可證調回遠征軍之說並非事實。

九月十六日，羅斯福不顧蔣的身份，嚴電指斥，限史迪威於兩天內親遞。電文畧云：如滇西遠征軍不進，或竟撤回，打通滇緬公路的機會將完全喪失，蔣須負其全責。近月來屢請蔣採斷然行動，迄未照辦，致面臨危急，可能造成為悲慘的後果。唯一破壞日軍在華計劃的方法，即加強滇西軍的進攻，立授史迪威以指揮中國軍隊的全權。倘再延擱，將一切落空。史迪威以為定可償其所願，九月十八日，將電報面交。蔣以羅斯福態度惡劣，來電措詞荒謬，閱後置之不答。次日赫爾利請見，亦被拒絕。二十日，饒別納爾孫，¹赫爾利在座，蔣謂羅斯福此舉與美國民主立國歷史相違，為美國傳統精神的污點，請納爾孫轉告，「以下三事絕不接受商量：一、凡與三民主義不合之事，二、有損害中國主權之事，三、有損害中國國格及我個人之人格之事。中國軍民願為美國之朋友，亦願虛心學習，但絕不能為美國之奴隸。」

先一年十月，蔣已擬請美國調回史迪威。至今年七月，羅斯福要求授史迪威以統率中國軍隊權時，史迪威曾對蔣說，中共問題，只要他一去延安，即可解決，裝備軍隊五六師，撥給新武器。蔣正色說「君若如此，余將撤銷君之參謀長職務。」至是決心請羅斯福撤換。九月二十四日，他告訴赫爾利，對史迪威已失去最後希望與信心，不能使其擔負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率之任。第二天，交以備忘錄，謂美國如遴派一任何富有友誼合作精神的美國將領，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擔任改組及主持後方勤務部，以接替史迪威，必竭誠歡迎。他準備如羅斯福不從，即公開其來電，使天下及美國人民知其政治作風，勢將影響其政治生命。另電在美國的孔祥熙，勿要求任何接濟，從速返國。九月二十七日，約見國民黨幹部，聲明「絕不為任何壓力動搖，絕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論自擾者，罪浮於漢奸。」

史迪威電告馬歇爾，蔣無意對戰爭推進再作努力，繼續運用不對他支持則將拆夥的故技，以榨取美國金錢與軍火。蔣亦無意建立民主政體或與共黨組成聯合陣線，已成為中國統一及抗日合作的主要障

¹九月二十四日，納爾孫離重慶返華盛頓。

礙。羅斯福考慮之後，十月五日，擬解除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及管理租借物資之權，仍保留統率中國在緬甸軍隊及雲南遠征軍之權。九日，蔣去電歷數史迪威的不當，緬北的勝利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的損失，實不堪再肩重任。史迪威亦電馬歇爾，倘容蔣遂行其罷免主張，中國作戰潛力將一併消失。赫爾利不以爲然，謂史迪威的基本錯誤，是想壓服領導一個革命國家與優勢的敵人作戰七年的領袖，蔣並非不肯合作，中國問題可望解決。如支持史迪威，將失去蔣與中國，戰爭勢必延長，增加美國的人力物力的損失。應照蔣的提議，派一美國軍官在蔣的領導下指揮中國軍隊。十月十八日，羅斯福決定召回史迪威，劃分中、緬、印戰區爲二，以魏德邁(A. C. Wedemeyer)爲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參謀長，索爾登(D. Z. Sultan)爲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統在緬華軍。當中美關係千鈞一髮之秋，軍事失利，中共要脅，美國強制，國內譏笑，黨內侮辱，甚至高級幹部爲之動搖，謂蔣如此倔強，將導致危亡，¹可說是四面楚歌，自云爲他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境。

史迪威事件是中美關係的最低潮，幾乎走到最後一步。蔣有其個性，更有其立場，最大原因爲決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尤不願共軍受史迪威節制，否則史迪威必以租借物資供應共軍，中共如虎添翼，愈不可制。美國之所以讓步，怕的是如果與蔣決裂，中國戰局可能瓦解，美軍縱攻佔日本本土，中國境內日軍或將繼續抵抗，另一可能爲中共得利，整個中國將成爲蘇俄的附庸。

美國在華記者久對蔣不滿，史迪威去後而益甚，百般蔑侮詆毀，《紐約時報》的愛金生(B. Atkinson)謂史迪威之被召回，代表垂危的反民主政權的勝利。《生活雜誌》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報導更於蔣不利，其他報刊廣播，多同聲中傷。戴維斯推波助瀾，力稱中共必然勝利，蔣於抗日毫無可資利用之處。高思亦持悲觀論調，羅斯福雖不必爲所左右，對蔣終難免耿耿於懷。

¹張治中謂蔣應大膽放手，命史迪威統率華軍，美不致扶持中共。王世杰認爲蔣之處置不妥。

日軍佔領湖南衡陽後，經過休息補充，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沿湘桂鐵路南侵，續陷廣西全州。另路由廣東西犯，佔領廣西梧州。十一月十日，桂林、柳州未經大戰，均告不守，繼之為南寧等處，湘、桂境內，空軍基地盡失，¹軍民死傷，公私財物損失，不可數計。日軍長驅而前，進入貴州，十二月二日，佔領離貴陽六十公里的獨山，西南大後方人心惶惑，為抗戰以來未有的險惡局面。蔣一面調陝西駐軍馳援貴州，滇緬駐軍回師昆明，一面與魏德邁商討最後部署。魏德邁建議，倘貴陽陷落，應作遷都準備，英、俄大使館已計劃撤僑。蔣不允考慮，決於黔北布防，堅守重慶。日本原有進攻四川之意，以海空軍在太平洋一敗再敗，國內受到猛烈空襲，粵漢、湘桂鐵路遭美空軍轟炸，運輸補給困難，復恐美軍登陸閩、粵，於是開始後退。十二月，中國援軍收復獨山，進向廣西，局勢轉穩。

五、嚴重的物價問題

戰時物價波動，事屬必然。抗日戰爭開始時，尚不十分顯著。一以前此積存貨物尚有相當數量，一時未感短缺；二以上海、天津、青島雖然淪陷，西南、東南海口，多少仍有輸入；三以日本為在上海、香港吸收法幣，套取中國外匯，交換中國內地農產物及工業原料，與軍事無關的日本剩餘商品，仍可向後方走私。一九三九年之後，情況大變，積存貨物銷售已盡，廣州、武漢不守，粵漢與滇越鐵路不通，國外貨物愈難內流。一九四二年起，日本全力進行太平洋戰爭，剩餘商品已屬無幾，上海租界及香港均為日本佔領，無從再套取外匯，走私日貨大減。

戰前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九十來自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重要工業區均為日本佔領，關稅統稅隨之而去。稍後產鹽區又大半淪陷，鹽稅亦為之銳減。一九三八年，國庫所入僅為支出的四分之一，軍費反有加無減，雖增稅募債，終不能抵補。自改革幣制後，實際上通貨已經

¹計為湖南境內的衡陽、資慶、零陵，廣西境內的桂林、柳州、丹竹（平南）、南寧等處，共三十六個機場。

膨脹，至是更甚。一九三七年，法幣發行額為十六億元，一九三八年約增加一倍，物價上漲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三九年的發行額約為三倍半，物價上漲畧同。一九四〇年的發行額約為五倍半，物價上漲十二倍。一九四一年的發行額約為十倍，物價上漲二十七倍。一九四二年的發行額約為二十一倍，物價上漲約七十七倍。一九四三年的發行額為四十七倍，物價上漲約二百倍。一九四四年的發行額約為一百八十四倍，物價上漲約二千一百倍。物價上漲，政府支出增大，通貨跟着膨脹；物價上漲常高過通貨二倍、三倍。商店囤積貨物，工廠囤積原料，不惟可以保值，且可穩獲厚利，以致商品不能流通，生產陷於停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政府復不給工業貸款，以為可管制通貨膨脹，結果窒息了生產。國家金融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與合作金庫等，一樣以囤積為事，不但直接投資於商業組織，並自設商號、公司。掌握政治、財政、經濟的官員，亦各有企業，最為人所指目。前方部分軍人，甚而明目張膽的走私，運入非必需的商品，而以內地產物資敵，以豫、皖及浙、皖、贛交界地為甚。

農產品的上漲，以糧食為最，而以一九四〇年後，人口龐集的戰時首都重慶，糧荒特別嚴重。是年四川歉收，宜昌失守後，湘米濟川不易，米價愈漲，一九四一年的米價為一九三七年的七倍，成都有搶米暴動，一九四二年且高達三十倍到四十倍。政府對於物價，初採評價政策，繼採平價，俱歸無效，重慶市場上食米幾絕跡。一九四三年，改行限價政策，米價約為戰前的一百倍，一般物價已上漲至二百倍。一九四四年初，米價約為戰前的四百餘倍，每石超出四千元。河南、湖南的軍事挫敗，加速米價的上揚。一九四一年，政府已將原歸地方的田賦收歸中央，實行徵實，將田賦折合稻米、小麥或雜糧計算，再加徵相當數量，分徵購、徵借，期掌有更多的實物，「以糧控價。」因執行不盡公平，弊端百出，中飽不少，中農、小農不堪其苦。政府的另一經濟措施為外匯黃金政策，用意仍為抑止通貨膨脹，平抑物價。一九四二年發行一億元美金公債，每元定為法幣二十元，不久黑市高至

法幣四百五十元。與財政金融當局有關人士，仍可按官價購進，大獲暴利。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政府拋售黃金，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舉辦黃金存款，亦多入大戶之手，收回的法幣不及發行額的四分之一。

物價不停的上漲，通貨無止境的膨脹，獲利的為極少數，受害的為大多數，而以受薪階級為最甚。薪津雖已提高，距離物價上漲的比例極遠，實際所得不及物價數十分之一。以一九四四年為例，下級軍官月餉約當戰前貨幣一元二角至三元，士兵月餉約當戰前貨幣數角，連同實物計算，只合戰前所得的五十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大學教授月薪不及戰前法幣十七八元，連同實物計算，約合戰前所得二十分之一。學生有公費或貸金及糧食，不敷一日三餐之需。返視當權有勢者的所作所為，及政治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官兵與知識分子的抗戰意志縱仍不移，而怨尤之情，究不能免。中共的詆毀，美國的抨擊，自亦有影響。一九四四年，戰場上一再敗潰的原因，大可於此求之。

第四節 戰爭結束

一、太平洋日軍大敗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五個月，在太平洋的攻勢即被美國海空軍所遏止。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所羅門羣島之戰，日本海軍失利。一九四三年初，美國反攻愈猛。六月，日本自認艦艇、飛機沉毀不少，戰局緊急。軸心國亦在歐洲西線挫敗，九月，義大利投降。一九四四年初，太平洋美軍連捷，六月，登陸塞班島，自成都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同月，美海空軍大破日艦隊於馬里亞納（Mariana）羣島，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海空軍主力喪失殆盡。九月，美軍攻下帛琉島，轟炸馬尼刺。十月，登陸雷伊泰（Leyte）島，轟炸台灣。菲律賓的海空戰，至為慘烈，日本損失極重。十一月起，

美空軍以塞班島爲基地，大舉轟炸東京工業區及其他大城。十二月，雷伊泰島之戰結束，十一萬日軍被殲。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軍進入馬尼刺，登陸硫磺島，三月，島上日軍全部消滅。四月，美軍登陸琉球。日本部署本土防禦，並以「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隊）攻擊美艦，未能挽回頹勢。六月，沖繩六萬餘日軍被殲。七月，美軍飛機無休止的遍炸日本工業城市，每次五六百架以至一千架，投彈三四千噸以至六千噸，日本已喪失作戰能力。

中國於湘、桂戰事危急之時，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提高軍隊素質。是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入伍者十二萬人，編爲青年軍。復採行魏德邁的整軍計劃，編組三十六個攻擊師，九個防禦師，分在雲南、貴州、廣西、湘西訓練，美國負責裝備給養，美軍官擔任教練。緬北美軍亦調入中國，準備先攻廣西柳州、南寧、桂林及廣東雷州半島，再攻廣州、九龍。一九四五年一月，雷多公路自印度通至雲南，駐印軍與遠征軍會師。四五月間，日軍進攻湘西芷江，爲中國新軍擊退。日本大本營以琉球戰局吃緊，命華南日軍調往上海、魯南，防美軍登陸。廣西、貴州新軍乘機推進，六月收復柳州，七月收復桂林。

二、雅爾達協定與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由於蘇俄在歐洲戰場獲勝，美國殷望其早日對日本作戰，中國分量爲之減低，至德黑蘭會議而益顯著。一九四四年，湘、桂的軍事敗挫，中國更被輕視。美國軍方預計歐洲戰事結束已爲期不遠，擊敗日本尚須相當時間，爲減少美國的生命犧牲，必須蘇俄參戰。如要蘇俄參戰，則須予以報酬，亦即給一部分中國權利，如此又可望穩定中俄關係，避免美國捲入中俄糾紛。否則蘇俄於擊敗德國後，轉而對日，可能將佔領地區移交中共，蘇俄在遠東將取代日本的地位，對於美國而言，無異拒虎引狼。

德黑蘭會議時，羅斯福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史達林希望在太平洋獲得不凍港。至是美俄繼續談判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問題，史達林謂在對德戰爭終了後三個月，俄軍方克東調，要求美國先將軍用物資

運儲西伯利亞，以備使用，並須先成立政治協定，訂明戰後給予蘇俄的報酬。蔣主席得知消息，擬命外長宋子文訪俄。史達林主張從緩，以待他與羅斯福會議，並於十二月向哈里曼說明參加對日戰爭條件，包括租借旅順、大連、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外蒙古獨立。哈里曼電告羅斯福，如不與蘇俄預作協議，蘇俄將支持中共在華北、東北建立政權，如有協議，蘇俄即可支持蔣的領導與美國政策。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會於黑海雅爾達，一為討論戰後歐洲問題，一為討論蘇俄對日作戰條件。關於波蘭問題的處理，史達林與羅斯福發生爭執，竟謂美、俄是否將要一戰，並正式提出對日作戰的全部要求。羅斯福的心力集中於早日擊敗日本，他的軍事顧問認為日本的海軍主力雖已喪失，陸軍尚屬完整，數十萬關東軍尤稱能戰，蘇俄參戰為擊敗關東軍的有效途徑。二月十日，羅斯福讓步，次日發布公告，定期召開聯合國會議，規定管制德國辦法。至於蘇俄參加亞洲戰爭的協定，則密而不宣，內容為蘇俄於德國投降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依下列條件對日本宣戰：

-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 二、恢復蘇俄一九〇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權利：甲、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乙、開大連為國際商港，保障蘇俄在該港的優越利益，另以旅順為蘇俄租借的海軍基地；丙、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俄合營，保障蘇俄的優越權利；維持中國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 三、千島羣島應歸蘇俄。

關於外蒙古、滿洲事項，俟羅斯福徵得蔣主席的同意後，史達林準備與中國締結一友好同盟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私自成立諒解，將中國出賣，雅爾達協定，中國再被出賣，羅斯福忘記了四年前他與邱吉爾宣布的「大西洋憲章」中的未得有關人民同意，不得改變領土的原則。史達林更不願一九一九年蘇俄對華宣言中的放棄帝俄在滿洲及其他地方掠奪的利

權與租借地的諾言，且將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中的蘇俄承認外蒙古爲中國的一部分，中東鐵路主權概由中國處理的條款置諸腦後。中國雖爲同盟國之一，命運依然由強國決定。約在三月十八日，蔣主席接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報告與羅斯福晤談內情。羅斯福說史達林要求三事：一爲蒙古主權應屬中國，二爲中東鐵路由中、俄、美共管，三爲旅順由蘇俄租借。他之所以未以實情相告，意在試探中國的反應。

羅斯福對於史達林將來在華的行動，並不完全放心。一九四五年四月，命赫爾利再訪莫斯科。羅斯福卒後三日（四月十五日），史達林、莫洛托夫重申無條件的贊同美國對華政策，尊重蔣主席的領導，使中國軍隊統一。美國新總統杜魯門派霍布金斯(H. Hopkins)赴俄，希望史達林對中國在滿洲主權的地位及對美國調解國、共問題的態度，加以肯定。五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強調本年八月對日宣戰，但中國須先接受雅爾達協定，他將盡力促進中國在蔣主席領導下的統一，承認滿洲屬於中國，希望宋子文於七月以前來俄談判。

五月二十二日，赫爾利將雅爾達協定內容密告蔣主席。六月三日，蔣召見蘇俄大使彼得羅夫(Petrov)，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協助中國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並論租借旅順、大連之不宜。八日及十日，電命在美國出席聯合國成立會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向美國表明，旅順軍港最少應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須不損及中國主權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獨佔均不可行。九日，杜魯門將雅爾達協定全文交宋，十三日告以史達林願助中國復興。霍布金斯亦說史達林允支持蔣主席及其政府，中共與蘇俄無關。八月十五日，赫爾利請蔣主席依照協定與蘇俄訂約。蔣詢以美國願否與中俄使用旅順軍港，並參加中俄條約，美國表示無意。蔣以蘇俄對日作戰已成定局，一旦佔有滿洲，斷不肯輕易交還，要挾或將更多。現在既有美國居間，史達林復信誓旦旦，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承認蔣的領導，當不致反汗食言，不僅東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將聽命。蔣的左右亦謂如能因此換得國內的真正統一及中俄間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滿足，新疆問題應與中共問題一併解決。

六月三十日，宋子文偕蔣經國等，¹抵莫斯科。七月二日，談判開始，史達林態度傲慢，謂一切須以羅斯福簽字的雅爾達協定為根據，劃旅順、大連為軍事區，中東、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歸蘇俄所有，特別強調中國須承認外蒙古獨立，否則如為他國利用，蘇俄將失去遠東。宋子文表示願給外蒙以高度自治，有權許蘇俄駐兵。史達林堅持外蒙獨立，如不獲解決，即不談中俄條約。七月六日，蔣主席電宋子文，外蒙獨立問題須在中國真正統一、領土主權真正無缺時，方能考慮。蘇俄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據，不鼓勵新疆之叛亂，中國願於抗日勝利後，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這是中國最後的期望，如無切實保障，即相機中止交涉。同時命蔣經國以私人資格向史達林說明不同意外蒙獨立理由。史達林謂：「今天不是我要你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站在軍事的戰畧觀點。……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俄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斷，我們就完了。」蔣經國說：「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種力量。」史達林說：「日本這個民族還是會起來的，條約是靠不住的，只要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進步都快。……你說日本、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不能說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蔣經國問他是不是美國，史達林答稱「當然。」

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告宋，如談判停頓，蘇俄仍將對日作戰，進兵滿、蒙，伸入關內，無所約束，對中國更為不利。蘇俄某要員亦對蔣經國說，如中俄談判有成，史達林將助國民政府統一。七月九日，宋向史達林提出三款：一、蘇俄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二、中國對新疆叛亂以政治方式處理，蘇俄勿以軍械接濟；三、蘇俄對中國之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中國願於擊敗日本及蘇俄接受三款後，

¹一九三七年四月，蔣經國自蘇俄回國，次年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一九四四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學校教育長。

允許外蒙獨立。中國既對外蒙問題讓步，史達林自感滿意。又經兩度談判，宋須返國報告，史達林須於十七日在柏林波茨坦與杜魯門、邱吉爾會議，中俄第一階段談判暫告一段落。

波茨坦會議時，史達林堅持必須中俄條約簽訂後，蘇俄始對日本宣戰。時美國原子彈已試驗成功，可不必定要蘇俄參戰，但無法阻止蘇俄進兵中國東北。七月二十六日，美、英與中國對日本發出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無條件投降。宋子文不欲自己簽訂中俄條約，回重慶後辭去外交部長兼職，繼任人爲王世杰。八月七日，宋偕王及蔣經國、熊式輝、沈鴻烈、錢昌照等再到莫斯科談判，仍有爭執。¹史達林以日本已遭原子彈轟炸，投降在即，深恐失去參戰機會，即於八月九日對日宣戰。同時加速對中國談判，謂再不定議，中共軍隊將進入滿洲。

八月十日，以日本投降，宋子文召集代表團會議，商有無改變前案必要，多主原則不變，但望早日簽字。哈里曼勸宋，勿作超過雅爾達協定範圍之讓步。是晚宋與王世杰再晤史達林，堅持不討論外蒙古境界問題，以宋會有此允諾。十二日，蔣主席一再電囑，如對方不肯以中國地圖爲根據劃定外蒙界線，則決裂亦所不惜。代表團爲求迅速解決，不必拘拘於確定一界線地圖，決由宋、王致電重慶，請授以全權。同時由蔣經國去電，謂如堅持，必破裂。十三日夜，得覆電，命宋、王全權處理。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王世杰與莫洛托夫正式簽字，外蒙以現在境界爲準。宋說條約爲中蘇帶來三十年和平合作，史達林舉杯對熊式輝說：「祝中國軍隊永遠強大。日本、德國之失敗，爲野心太大，貪人土地者，其後必敗。」

條約要點如下：

一、兩國協同對日作戰。

¹熊式輝內定爲東北軍政負責人，此時係以軍事代表隨行。沈鴻烈爲設計局東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爲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子文對熊式輝說：「此行頗爲痛苦，我爲有期徒刑，君實無期徒刑。若今我仍在此當折衝之事，必致胃病加劇。」

- 二、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
- 三、戰後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的援助。
- 四、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以上為正文）
- 五、蘇俄同意予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以道義、軍需品及其他物資援助。
- 六、蘇俄承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並尊重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 七、蘇俄對於最近新疆事變，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 八、如外蒙古依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中國當予承認。蘇俄聲明尊重其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以上為換文）
- 九、中東、南滿鐵路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歸中俄共有共管，中國擔任保護；其支線與附屬事業及土地為中國所有。
- 十、大連開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碼頭倉庫之一半由蘇俄租用。
- 十一、旅順作為中俄共用的海軍基地。設立中俄軍事委員會，蘇俄負擔保護之責，民事行政屬於中國。
- 十二、俄軍入滿洲後，中國國民政府派員在已收復之領土設立行政機構。（以上為協定）
- 十三、蘇俄聲明，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蘇俄軍隊開始撤退，三個月完成。（以上為記錄）

中國雖失去了外蒙，未能收回中東、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總算換得了蘇俄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及新疆事變、援助國民政府、定期撤兵的諾言。不過蘇俄是否信守不貳，則繫於史達林的一念。

三、日本投降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已有求和之意，惟不願無條件投降。一九四四年七月，小磯國昭繼東條英機為首相，改向中國試探，擬取消南京政府，未獲結果。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佔領硫磺島，日本又欲透

過蘇俄，結束戰爭。四月，蘇俄廢棄日俄中立條約，小磯辭職。鈴木貫太郎組閣，對蘇俄仍抱萬一之想。五月七日，德國投降，第二天，杜魯門聲明無意毀滅或奴役日本人民，但日本陸海軍須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六月四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密晤東京蘇俄大使馬里克（Yakov Malik）。琉球被佔後，二十二日，昭和天皇命鈴木速與蘇俄商洽。七月二日，命近衛文麿為赴莫斯科特使。此時宋子文與史達林的談判已大致告一段落，波茨坦會議正在進行，蘇俄決定對日作戰，拒近衛前來。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國對日本公告發出。日本始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日本的毀滅。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據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的政府的字句，然未提及日本最關心的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倘使同盟國不堅持無條件投降，戰爭可能提前結束，不致予史達林以操縱機會，作出最少的代價，收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有人說，這是美國政策的重大錯誤，似不無理由。

史達林洞悉日本望和心切，七月二十九日向杜魯門建議，由美、英正式邀請蘇俄參戰。八月六日，美國以原子彈炸廣島，八日，美國再以原子彈炸長崎。次日，蘇俄對日本宣戰。十日，日本知照美、英、俄、中，接受波茨坦公告，惟須不損及天皇的皇權。十一日，四國覆允。惟天皇應聽同盟軍統帥的命令。十四日，天皇勅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條件。十五日，蔣主席廣播「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祇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企圖報復，即所謂「以德報怨。」八月二十一日，關東軍向蘇俄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九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¹八年中日戰爭告終。中國先後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四千八百八十億美元。

¹八月十七日，偽南京政府解散，陳公博、周佛海被逮，一處死刑，一死於獄。

第十九章 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

第一節 戰後國共之爭、中俄東北交涉

一、赫爾利斡旋國共問題

促成國共和解，統一中國武力，一致對日作戰，為美國的主要願望。一九四四年九月，赫爾利到重慶之前，特取道莫斯科，以期明瞭蘇俄的態度。史達林知道中共尚無法取代國民黨，應先成立聯合政府，確定中共的地位，繼續控有華北，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仍讓國民黨居統治之名，以安美國之心。莫洛托夫告訴赫爾利，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蘇俄和它並無聯繫，更不願中國分裂。美國若能助成中國團結，軍事經濟的改善，蘇俄將至感欣慰。赫爾利信以為真，據以轉告蔣主席。蔣一向認定中共為蘇俄的工具，莫洛托夫既有此表示，倘能透過美國，與中共達成協議，自為所願，希望赫爾利斡旋。赫爾利與中共代表林祖涵數度會晤後，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飛延安，與毛澤東議定了五項原則，包括：國民政府改組為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聯合政府一本三民主義，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提倡進步與民主，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權；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一切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服從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命令；所有中國得自友邦的供應品，應公平分配；聯合政府承認國民黨、中共與一切抗日政黨的合法地位。十一月十一日，赫爾利返重慶，周恩來同行。

是年九月，國共談判不成，中美關係緊張，蘇俄大使館武官羅申（N. V. Roschin）訪蔣經國，告以史達林欲與蔣主席相見。蔣主席稱「史如有意，余亦樂從。」史達林將消息透漏給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

謂蔣要求和他會晤。十一月十八日，赫爾利詢蔣，「究爲何事，擬與史達林相見。」蔣將經過說明，遂作罷論，免招誤會。

對於赫爾利、毛澤東的協議，蔣拒不同意，說是不能將政權交與聯合政府，應還之於民，另提三項對案：整編共軍，列爲正規國軍；承認中共爲合法政黨，中共應全力擁護國民政府抗戰及戰後建國，將一切軍隊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中共將領得參加軍事委員會；國民政府之目標爲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國家，除爲對日作戰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對於人民自由均加保障。

中共大爲不滿，十二月七日，周恩來離重慶返延安。政府另擬三項具體辦法，作爲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一爲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委員會，容納中共及其他政黨代表，構成戰時內閣，爲決策機關。二爲在軍事委員會內容納中共人員，由政府、中共、與美方代表組成三人委員會，商討共軍改組及補給問題。三爲對日作戰期間，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派一美國軍官爲總司令，政府及中共各一人爲共軍指揮官。赫爾利時已任美國駐華大使，一再勸周恩來、毛澤東來重慶續談。毛要求改在延安舉行，周要求先釋放政治犯、撤退包圍共軍之國民黨軍隊、取消壓迫人民的法令、停止特務活動，以示政府對於統一民主的誠意。

一九四五年元旦，蔣主席宣布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赫爾利致電毛、周，願與行政院長宋子文等去延安面談，將原則商妥後，毛、周同來重慶完成協定。毛婉辭謝絕，主由國民黨、中共、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國是籌備會議。周因赫爾利的電促，一月二十四日，復至重慶，要求舉行黨派會議，討論改組政府及施政綱領，俟聯合政府成立，中共即將軍隊交出，與其他所有軍隊由新的軍事委員會整編，不接受政府提議的中共參加政府的辦法。政府表示應待國民大會召開，憲法制定，方可改組政府，結束訓政。赫爾利勸蔣在政治方面再作讓步，求取對共軍的控制。同時告周，美國物資只予國民政府，關於中共的援助，必須經過國民政府。二月三日，政府允邀各政黨代表及無黨派之社會領袖，組織政治協商會議，考慮結束訓政，

實行憲政步驟及施政綱領與軍隊統一問題。中共仍不同意，二月十五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說明半個月來中共之拒絕政府提議的原因，一為共軍移交政府，等於移交國民黨；二為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結束，所謂讓步無何意義。並指摘政府拒絕建立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次日，周回延安。赫爾利旋亦返美，期明雅爾達會議的實情。

毛澤東堅持聯合政府主張，蔣認為中共仍欲推翻國民黨政權，如不將軍隊交出，一旦蘇俄對日作戰，必支持中共，情況更不堪設想。三月一日，蔣發表演說，定於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一俟中共同意改編共軍，交還地方政權，即予以合法地位。這時中共對於雅爾達會議的內情已有所聞，知道不久蘇俄即可參加對日戰爭。三月九日，周恩來分函政府代表及赫爾利，反對召開國民黨控制的國民大會，必須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赫爾利離重慶後，三月二十八日，代辦艾哲森致電國務院，主給中共以租借物資，迫蔣對中共讓步，使中共參加政府，達成國共軍事合作，以免中共尋求蘇俄的支持。謝偉思復去延安晤毛澤東，其後強調惟有實現聯合政府，中國方克由和平途徑進入憲政，並盛讚中共的成就。

赫爾利為再判定蘇俄的態度，自華盛頓返重慶時，又過莫斯科。四月十七日，會晤史達林，說明美國對華政策為支持蔣的領導，建立一統一、自由與民主的政府，統一所有武力，擊敗日本。史達林表示同意，稱道蔣為愛國志士。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懷疑史達林的誠意，認為他不會與蔣永久合作，蘇俄參加遠東戰爭後，必儘量利用中共、支持中共。美國國務院因訓令赫爾利，謂史達林對華政策，將依其利益而修改，應切實告蔣在蘇俄參加遠東戰爭前，及早從事軍事政治的統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發表長達四萬餘字的《論聯合政府》，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團結的破壞者，是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內戰的禍胎，必須立即廢止，及由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聯合組成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然後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聯合政府；如此方算

是真正的統一，方算是民主的統一，方能建立一新民主的國家，一切軍隊都屬於這個國家，成爲人民的軍隊。

五月，國民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議決於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並通過政綱，及促進憲政的必要措施，限期取消軍隊黨部、學校黨部，制定政治結社法，給予政黨以合法地位，中共問題由談判解決。又通過保全領土，及行政權的完整，與蘇俄友好合作。凡此均視爲對中共要求的部分反應。

國民黨既然表示中共問題仍願由談判解決，六月二日，不屬於國共兩黨的若干參政員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盼繼續相商。遲至十八日，毛、周電覆，拒絕前來重慶。七月一日，褚輔成、左舜生、傅斯年、黃炎培、冷遹、章伯鈞六參政員飛往延安，停留三日，中共要求取消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之議，先行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復對左舜生、章伯鈞說：「蔣先生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他不僅定要與蔣一較高下，對於赫爾利的美國不以武器給中共，只支持國民政府的談話，尤爲憤激，說是「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爾利趕走再說。」不僅可見其意氣之盛，亦可見其恨惡赫爾利之深。赫爾利以爲他是在等待中俄莫斯科會議的結果。

二、重慶會談紀要

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的迫切問題爲迅速派兵接收淪陷區，收繳日軍武器。但是政府軍的主力大都遠在西南、西北，調動需時。中共爲與政府競爭，正要乘此大好時機，放手擴大解放區，增強實力。華北、華東爲日軍的主要佔領區，亦爲共軍的輻集地，距北平、天津、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開封、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均較政府軍爲近，廣州附近亦有少數共軍。政府恐共軍捷足先至，八月十一日，蔣委員長發布命令：一要各戰區司令長官依照計劃推進；二要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就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三要各地偽軍維持治安，不得擅自遷移駐地，或受任何部隊改編。同日，朱德以延安總部總司

令名義令山西、河北、山東、綏遠共軍進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配合蘇俄及外蒙軍作戰，亦即搶先進入東北。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對幹部演說，指蔣謀發動內戰，「寸權必奪，寸利必爭，」中共已進行了充分準備，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蔣雙手執刀，我們也要拿起刀來。蔣與美國勾結，在華東佔有優勢，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城將為所得，中共對華北必須力爭。」另由朱德正式拒絕蔣的命令。

八月十日，美國陸軍部命在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協助國民政府受降。十四日，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定中國戰區（東三省除外）及台灣、越南北部日軍向蔣委員長投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與南京偽政府均表示服從。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的歧見，八月十四日，電請毛澤東前來重慶，共商國是。十五日，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美、英、俄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接受日、偽軍投降與受降後之協定條約，延安總部有權根據盟國規定辦法接受日、偽軍投降，有權派代表參加盟國受降工作，並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請美國停止對國民政府之援助。另電岡村寧次，令日軍分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廣東）中共將領投降。十六日，復向蔣委員長提出六項要求，包括：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協定條約時，須先得解放區之同意；共軍所包圍之敵軍由共軍受降；國軍所包圍之敵軍，由國軍受降；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餘與昨日對美、英、俄大使的聲明相同，措詞則極強硬。同日，毛澤東覆蔣，俟對朱德的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二十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便接受。二十二日，毛允先派周恩來赴渝。二十三日，蔣三次去電敦促。二十四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

毛的態度之所以一變，一是鑒於國際情勢。美國始終希望國、共合作，使中國的統一實現，成為東亞的安定力量，絕不願重起內戰。毛如堅拒蔣的邀請，必不為美國所諒，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可能益為積極。蘇俄縱令支持中共，終有其限度，因其尚無原子彈，決不敢冒大戰危險。何況中俄友好同盟條約已訂，如國共關係全面破裂，蘇

俄所得的極大權益，將難順利享受。如國共能達成協議，不僅一切安然無恙，甚至可能再有其他收穫，特別是有關東北的經濟事項。據說史達林會對中共暗示，今後仍將予以支持。二是鑒於國內情勢。近年國民黨雖常受人指摘，對中共亦不盡抱好感。戰後舉國殷望和平，中共同以此標榜，蔣既採取主動，中共若閉門不納，必失去人心；毛若接受邀請，苟談判不成，可將責任推於國民黨，最少為雙方共負，中共不致完全輸理。若談判獲成，中共有了合法地位，不僅現有的轄區可保無虞，且可擴張，並名正言順的在全國展開政治活動。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目前時局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凡此均為其後國共談判的中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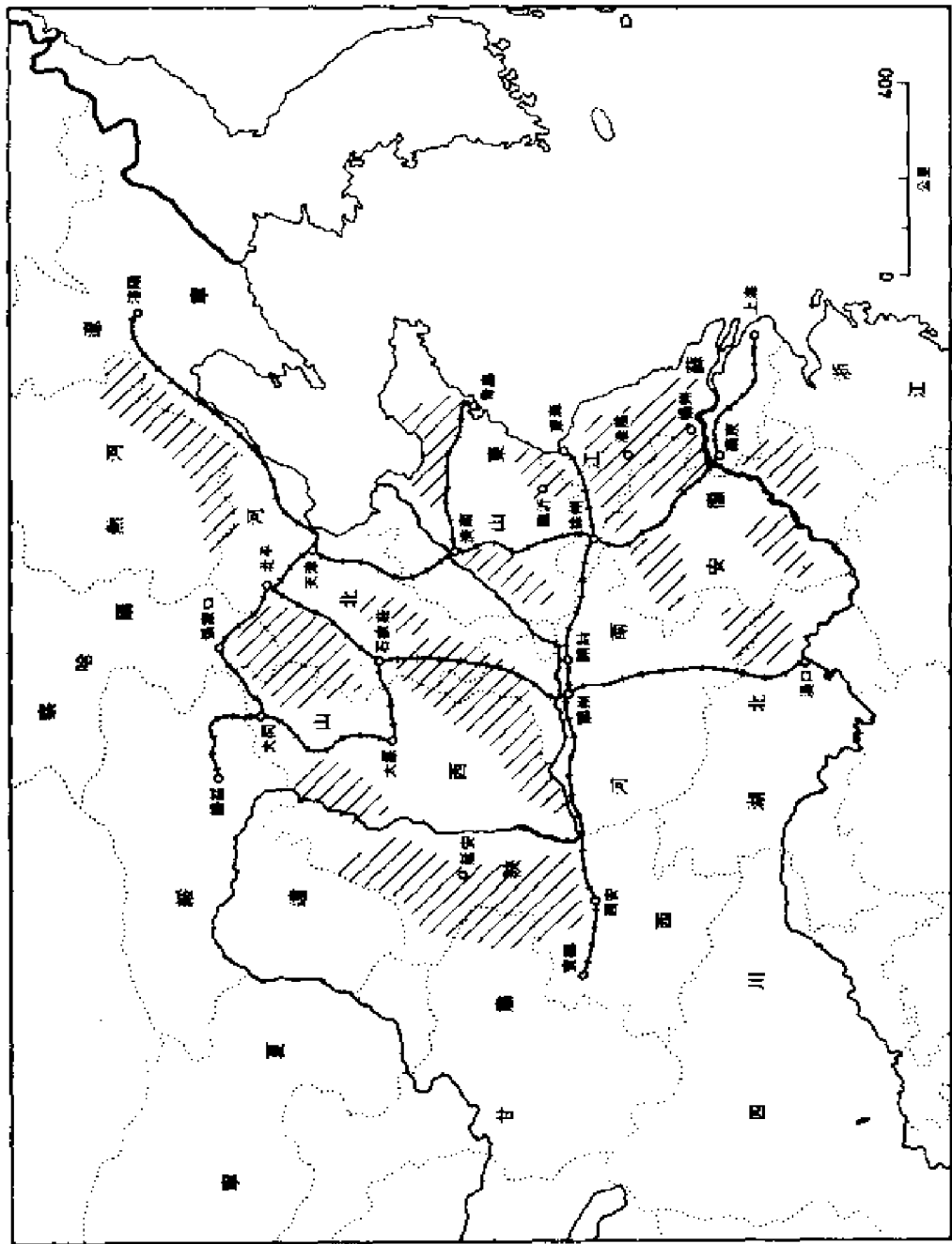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與政府代表張治中飛延安，次日，陪同毛澤東抵重慶，周恩來同行。二十九日，蔣主席正式接見。當晚政府代表張羣、張治中、王世杰、邵力子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開始會談。初為交換意見階段，即第一階段。九月四日起，商談實際問題，即軍隊比例與地方政權問題。五日，毛告《大公報》記者，內戰決可避免，國是以政治會議解決。會談期間，中共採攻勢，政府處於守勢，相持不決。九月十三日，毛發表談話，盼談判有良好結果；十八日，在參政會茶會致詞，謂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時代，必須團結統一，杜絕內爭，各黨派在國家一定方針與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並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二十一日，會談第二階段結束，一無眉目，原擬的公報不克發布，已面臨僵局。二十七日，會談第三階段開始。十月一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致電蔣、毛，謂國共兩黨不當只談地區、軍額，一黨專政，固須中止，兩黨分割，亦難為訓，應速成立立憲政府。十月三日，會談第三階段結束。十月十日，簽訂三個《會談紀要》，中共稱之為《雙十協定》。一為關於建國基本方針，雙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

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由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主張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展緩召開日期，修改組織法、選舉法和憲法草案。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名額可以增加。結果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又同意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為原則，分別廢止或修改。政府承認各黨派平等合法地位，準備釋放政治犯。雙方又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的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二十四個師至二十個師，並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將應編部隊逐步撤至離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解放區。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議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領導之抗日軍隊可縮編至二十個師，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為整編後部隊的各級官佐。政府方面表示願商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具體計劃上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由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現已成為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提出第一方案，主按現有十八個解放區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即以原有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政府方面表示，在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以後，可考慮中共所薦之行政人選，收



圖二十 一九四五年中共統治及軍事活動區

復區內原任行政人員，可依其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為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省府副主席及委員，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允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經討論後，中共方面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為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請委為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為晉、綏兩省，請委為副市長者，改為北平、天津、青島三市。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對於其抗戰卓著勳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於是中共改提出第三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政府方面表示，縣級民選可以考慮，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後實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中共方面提出第四方案，各解放區維持現狀，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此項問題，可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謂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仍盼商得具體方案。中共方面同意繼續商談。

關於受降問題，中共主張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共軍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共對於此次談判，表面上似甚滿意。十月九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詞，「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建立一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富強的中國。我們的合作是長期的合作。」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他對國家前途樂觀。《解放日報》一再說國共會談已獲重要成果，必須使其實現。但是雙十協定不會解決關鍵的具體問題。政府的一貫立場為軍事、政令的徹底統一，其他均可對中共寬容；中樞可讓，地方不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讓。中共的方針是中樞要爭，地方及軍事更要爭。毛之允許放棄南方若干地區，是由於力有不足，難以抵抗政府的

壓力。至於北方根據地，不僅必須確保，且要大事擴張。毛回至延安後，十月十七日，對幹部報告，說是「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軍隊問題實際上也沒解決，已達成的協議，只是紙上的東西，要使其成爲現實的，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百萬軍隊，兩百萬民兵，任何人不敢小視，以往尚未被人消滅，何況現在？人家打來，我們就打。」一九三七年對國民黨讓步，實現了全國抗戰，這次雖讓出了南方若干地區，在北方則絕對不讓。軍隊縮編須與國民黨保持六與一或七與一比率，人數雖然縮減，但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

三、受降之戰

國共會談紀要中關於受降問題，等於懸案，毛澤東所說的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即指此而言。此一問題，關於今後勢力消長極大。因爲有權受降，自可派兵接收日軍佔領區，而日軍佔領區與中共的解放區甚難劃分清楚。中共亦要爭取受降之權，接收日軍佔領區，提議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隊暫留原地，即是不許政府軍進入日軍佔領區。政府方面表示衝突自須停止，祇要共軍不阻止政府行動，即無問題。因中共拒絕，未列入會談紀要，遂成爲國共衝突的最大原因。

日軍投降後，華北、華東的大城，仍由日僞軍駐守，等待政府軍到達。距離共軍較近、日僞軍較少的大小百餘城鎮，如威海衛、烟台、張家口等，兩週之內，均爲共軍佔領。華北鐵路多由共軍控制或在共軍包圍之中，爲阻止政府軍前進，遭受破壞的，長達一千四百餘里。毛澤東去重慶的前二日，命令共軍繼續攻勢，儘可能奪取或切斷鐵路，廣佔鄉村城市，不久控有蘇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分及察哈爾全省、遼寧一部。毛澤東到重慶後，戰鬥仍未停止。政府軍得美國空運、海運的協助，運抵南北各大城，美國海軍陸戰隊亦分駐華北軍事要地。政府軍傳作義部收復歸綏等城後，續向綏東，爲共軍拒退。閻錫山軍在晉東南地區失利。華東、華中政府軍雖比較得手，山西、河南、蘇北的近百座城鎮則爲共軍所佔。平漢鐵路北段、隴海

鐵路東段及同蒲鐵路均被切斷，太原、開封、安陽被圍。毛離重慶後，周恩來與政府代表續行談判。政府要求恢復鐵路交通，中共要求停止進兵、進佔，政府如向平、津運兵，須經協商。十月底，政府軍孫連仲部自河南沿平漢線北上，行抵河北磁縣、邯鄲遭共軍劉伯承部襲擊，一個軍叛變，兩個軍覆沒。政府代表主張雙方部隊暫各駐守原地，中共在鐵路線之上部隊移駐十公里以外，政府不派兵進駐，如在華北各鐵路運兵，允共同商定。中共要求政府軍自進佔區及鐵路線撤退，保證不再進攻解放區。毛澤東在延安告訴記者，謂不許政府在鐵路上運兵，為有效的制止內戰的武器之一。要恢復交通，必須先解決受降、處置偽軍、實行解放區自治三問題。已進入各解放區及其附近的政府軍應立即撤回原防，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敵人投降和駐防各城市與交通線，全部偽軍繳械遣散，承認解放區的人民民主自治。政府主將恢復交通、避免衝突事件，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共軍猛攻綏遠包頭、歸綏，鄂、豫交界，蘇北、山東、河北、山西境內激戰不已。

十一月，中共中央命解放區動員一切力量，保衛解放區，使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工人取得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並發展生產，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改善人民生活，救濟飢民、難民，發動羣衆革命熱情，供給軍隊需要。蔣亦召集各地軍事長官，舉行復員整軍會議。毛所爭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蔣所重視的以軍隊為主。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離重慶返延安，國共會議停頓。民主同盟號召反對內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學生罷課響應，被迫離職的雲南省主席龍雲舊部從中煽動，¹學生與軍隊衝突，造成死傷二十餘人，加重了政府的困擾。東北的對俄交涉，尤令政府棘手。

四、中、俄東北接收與經濟合作談判

蘇俄對日本宣戰後，立即進兵東三省，並與外蒙軍南入熱河、察哈爾，七十八萬關東軍不戰而降。中國早知會有今日，為了順利的能

¹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中央軍入駐昆明，龍雲去職。

自俄軍手中接收東北，是不得不簽訂中俄友好同盟條約的原因之一。蔣主席與赫爾利以爲史達林的慾望既已滿足，不致不予履踐，似乎忽略了牠對外蒙的堅決要求。他曾一再表示，不許中美的勢力進入外蒙，東北地位的重要遠過外蒙，他雖未便公開拒絕中國再有東北，但必然排斥美國的勢力。爲扶持中共，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先將張家口讓交。九月初，林彪率領共軍取道熱河，疾趨遼寧；自山東烟台渡海，經旅順、大連北上的共軍尤多。

中國政府爲處理東北接收善後事宜，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劃東北爲九省，先後任命熊式輝爲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爲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爲外交特派員，杜聿明爲保安司令長官，擬先接收行政，不必等待軍隊到達。十月一日，蘇俄大使彼得羅夫照會中國外交部，謂大部分俄軍可於十月中旬撤退，十月底撤畢，遠東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Rodin Y. Molinovsky）準備於十月十日及十五日與中國全權代表在長春會晤。¹外交部告以中國軍隊將由美船運至大連上岸。五天後，彼得羅夫稱，大連爲運輸商品港口而非運輸軍隊港口。

十月十二日，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抵長春，翌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會談，詢問蘇俄撤兵程序，說明中國接防計劃，部隊將在大連、營口、葫蘆島、安東港上岸，要求恢復鐵路交通，設立哈爾濱、瀋陽、大連航空站，撥借軍火、輪船、飛機，接收行政，開設銀行。馬林諾夫斯基態度傲慢，說是南滿駐軍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北撤，三十日，撤至俄境。大連爲自由港，中國軍隊不能使用，營口、葫蘆島、安東港情況不明，中國軍隊應由陸路運入。設立航空站、撥借輪船、飛機、接收行政、開設銀行須請示莫斯科，經濟問題可派人商洽。中國在東北的秘密組織必須停止活動，否則將採嚴厲措置。他不僅將南滿撤兵延遲一個月，且不許中國軍隊由海口登陸，明知鐵路交通被共軍阻斷，反勸中國軍隊由陸路運入，目的在阻撓接收，迫令承認其經濟要

¹馬林諾夫斯基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時任白俄羅斯軍司令，參加史達林格勒戰役，並在中歐擊敗德軍。

求，並予共軍以發展便利。十月十五日，馬林諾夫斯基對蔣經國說，對以往幫助日本、現在投効國民政府的東北人，須加注意，意即不可錄用，結果使其對國民政府失望，轉投中共。又說日本雖然戰敗，不難死灰復燃，須預為防範，意即中國須與蘇俄合作，防止日本再起。

十月十七日，第二次會談，中國提出的主要事項：一為海運兩軍在大連登陸，希望協助；陸運兩軍由山海關進入，希望早日修復山海關至瀋陽間之北寧鐵路；二為先空運憲兵、警察至各大城市，並收編保安團隊；三為派員至主要城市視察；四為接收交通事業及滿洲國日本經營之工業。馬林諾夫斯基答稱，中國應俟俄軍撤退後，再行接防。軍隊可由營口、葫蘆島登陸，惟蘇俄在此兩地無強大兵力。山海關至瀋陽鐵路可早日修復，俄軍撤退前四五日，中國可空運少數憲兵。至於改編保安團隊、派員視察，須請示莫斯科，鐵路電訊及其他電業尚不能交，日人所辦工廠應視為俄軍戰利品。他雖擔保交通線內不容有非正式軍隊，但未擔保交通線以外。蔣主席命熊式輝等堅持大連登陸，積極恢復北寧鐵路交通，復親告彼得羅夫，願借俄船運兵，不用美船，請轉告史達林。

十九日，第三次會談，熊式輝重提大連登陸要求，馬林諾夫斯基謂可轉達莫斯科，同時勸熊返重慶面陳。二十一日，俄方仍不允華軍登陸大連，亦不得設立航空站，營口、葫蘆島可在俄軍撤退前開始登陸，中國派員往遼寧、吉林視察，惟錦州以西不能負責，亦不同意改編保安團隊。中國之力爭大連登陸，是因為該港為由海上進入東北的捷徑，蘇俄為滯延華軍的行動，始終不許，而予自山東前來的共軍以便利。

熊式輝去重慶報告後，飛返長春，決改在營口、葫蘆島登陸。二十七日，運兵船抵葫蘆島港口，遭共軍射擊。二十九日，第四次會談，馬林諾夫斯基保證營口登陸安全，但不能保證葫蘆島，錦州以南共軍為數不少，¹俄方無力左右，亦不能在營口、錦州供給鐵路車輛。空運

¹按林彪於十月二十八日自山海關去瀋陽，山海關、錦州之間，共軍約八千人，由羅榮桓指揮。

先遣部隊至長春、瀋陽，須在俄軍撤退前三天開始，收編北方保安團隊，須在俄軍撤退之後。

十一月四日，第五次會談，馬林諾夫斯基謂營口、葫蘆島俄軍已爲八路軍逼走，俄軍若採取行動，必須調回軍隊，勢將延緩撤兵期限。鐵路尚在蘇俄統一軍運組織之下，不能交收，中國軍隊儘可空運前來，即借用美國飛機亦不反對，但美方人員不能在地面工作。

十一月六日，蘇俄聽任中共在長春公開活動，熊式輝深懼發生變故。蔣主席以蘇俄狡詐，東北問題非單獨中國的問題，召熊返重慶。十一月十五日，自秦皇島上岸的中國軍隊進佔山海關。同日，蔣下令撤退東北行營並致電杜魯門，責蘇俄違約背信造成的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重大威脅，惟有中、美積極的與協調的行動，方能制止繼續惡化。此一舉措爲對蘇俄阻撓中國接收的反擊，試探蘇俄的真實態度，希望獲得美國聲援。

蘇俄之阻撓中國接收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俄軍撤退前，合法的取得經濟特權，實現一九〇一年帝俄未克完成之願（見 352 頁）。第二次長春會談時，馬林諾夫斯基明言東北日本工廠爲蘇俄的戰利品。中國代表已知蘇俄對東北的資源不會輕易放手，十月二十七日，張嘉璈往晤俄軍總部經濟顧問斯拉特科夫斯基（Sladkovsky），說明中國願與蘇俄在滿洲經濟合作，使成爲兩國共同市場。斯拉特科夫斯基詢以對日人在東北工業如何處理，張答應以之賠償中國損失。斯謂照此辦法，蘇俄的戰爭損失將無可分潤。張答既談合作，極望使俄方的希望得以滿足，俄方對華方可能爲之事，亦予諒解。十一月七日，馬林諾夫斯基告張：「此後工作爲閣下之工作，……閣下爲有思想之人，必能解決一切。但望勿爲金元所左右。」意即經濟問題須先解決，勿爲美國所惑，並表示以戰利品作爲經濟合作的俄方財產。

行營撤退之日，蔣指示張嘉璈，如尚有轉圜之望，可與蘇俄經濟合作，張遂暫留長春。斯拉特科夫斯基要求中俄共同經營前歸日人所有工廠。張謂一部分重工業可歸中俄合辦，輕工業移交民營，斯氏表示，可以此爲合作基礎。十月十七日，俄大使彼得羅夫照會外交部，中

國軍隊得無限制的空運部隊至長春、瀋陽，俄軍可緩一二月撤退，以便協助中國政府在東北建立政權，目的仍在先解決經濟問題。蔣決先運部隊至長春，蘇俄果有誠意，可許其延緩一個月撤兵。三天後，斯氏正式提議組織一中俄合辦股份公司，經營前屬於滿洲國重工業株式會社及電業株式會社之事業。二十三日，張告馬林諾夫斯基，希望鐵路早日恢復，共軍撤離北寧鐵路線，中國運兵五萬來東北，政治問題早日解決，經濟工作可早日開始。馬謂蘇俄絕對遵守中俄條約，俟國軍到達，瀋陽以南俄軍再行引退，中國可先空運軍隊前來，工業合作資本俄方不超過半數。至是雙方距離接近，交涉有了轉機。張飛往重慶，請速定經濟合作方案，手訂中俄友好條約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以蘇俄難再信任，深恐其獲得經濟權利，仍不許中國順利接收，則政府負責太大。宋反對俄方以所謂戰利品作為合作投資，王謂須待政治問題解決後，始可討論經濟問題。張認為如經濟問題解決，接收問題可望大部分解決，主政治與經濟並進，未得宋、王同意。

張返長春後，十二月初，與蔣經國同晤馬林諾夫斯基，要求空運一師來長春，陸運二師至瀋陽，並接收瀋陽、長春、哈爾濱。馬未表示異議，惟謂經濟合作問題須早日解決。張畧述中國意見，謂俟接收完竣，俄軍撤退，方可商談。斯拉特科夫斯基謂中國一面請俄方協助接收政治機構，一面又拒絕參加已在俄掌握中之各項工業，實際上經濟合作更可有助於中國政治機構的鞏固，經濟問題如在撤兵前解決，政治問題亦隨之解決。十二月九日，張據蔣主席來電，通知馬林諾夫斯基，允將撤兵日期展至明年二月一日。對於經濟問題，謂不動產與權利不能視為戰利品。馬謂過去東北為反俄基地，俄方要求經濟合作，係為獲得本身安全，並不佔有土地，且可以部分工礦歸中國獨辦。第三國若為和平開發而有所經營，亦不反對，但對於破壞中俄友好的企圖，不能不有所警惕。斯拉特科夫斯基復稱，中俄合辦事業，除屬於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及滿洲電業會社之工業外，須加入屬於關東軍經營之工業。總計煤礦、鐵礦、鋼鐵廠、機器製造廠、非金屬工業、化學工業、磚廠、洋灰廠、鹽場，共七十三單位，又民用機場八處，公

司董事長、總經理由俄方任之，華方副之。十二月中旬，張飛南京與蔣主席、王世杰商定本月內接收長春、瀋陽、哈爾濱、大連，下月初接收各省政府，戰利品問題改爲由中國酌予俄方酬勞，作爲補償延期撤兵費，合辦事業應分成若干單位，電力不在其內，待撤兵完畢，再公開談判。張返長春後，以之告知斯拉特科夫斯基。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對於史達林、莫洛托夫的保證(見 739 頁)，初頗抱信心，以爲中共可望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到重慶後，赫爾利返國報告。不料雙十協定雖已簽字，國共衝突依然不停。十一月十四日，赫爾利發表聲明，責中共武裝部隊違背波茨坦宣言及遠東盟軍統帥的日軍向國民政府投降的規定。東北接收被阻，使他愈感難以有爲，十一月二十七日，再發表聲明，抨擊國務院、重慶美國大使館、東京遠東盟軍總部的職業外交家對於他的努力從中作梗，蓄意破壞，致不能行其所志，憤而辭職。杜魯門改以資深望重的馬歇爾元帥爲駐華特使，決定緩撤在華陸戰隊，加運華軍赴華北、東北，設置駐華軍事代表團，協助中國整軍。留在中國的美軍陸戰隊共九萬人，陸戰隊三師，分駐青島、天津及北寧鐵路西段，支援國軍接收東北，並防衛華北。史達林對於美軍單獨佔領日本已有芒刺在背之感，更忌其插足東北。十二月十六日，美、蘇、英三國外長會於莫斯科，莫洛托夫提出華北美軍問題，主張在華美軍、俄軍同時撤退。《真理報》說俄軍留駐滿洲，較任何外國軍隊留駐華北更有理由。二十八日，三國外長公報，滿洲俄軍延至二月一日撤退，華北美軍俟在華日軍解除武裝並遣送後撤退。

十月杪，史達林準備與蔣主席直接商談，先邀蔣經國前往。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以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與史達林兩次相晤，一在三外長公報發表的前三天，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離去之前。史達林表示如下：一、關於東北經濟問題，戰利品字樣不能取消，合辦企業不能分爲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談，撤兵後發表。二、希望中俄和平共處，贊成中、俄、美合作，但反對門戶開放政策，因爲門戶開放爲帝國主義的侵畧手段。三、堅決反對第三者的勢力進

入東北，中國應採取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如將美國勢力排出，由中俄合辦東北工業三十年，可命中共服從蔣主席的領導。四、美國如在中國有一兵一卒，東北問題即不能解決，美國如不在東北取得利益，蘇俄亦可作必要讓步。五、國民黨可與共產黨共存，無共產黨則國民黨將日趨腐化，有兩黨競賽，終必有一黨獲勝。六、中國佯與俄親善，暗實反俄，如此無法永久。最後是希望蔣主席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相會。蔣主席徵詢馬歇爾的意見，馬歇爾說：如有助於中俄邦交，無不贊成。蔣以史達林一向反覆，如接受邀請，不僅難有所得，反影響中美關係，況中國正欲借美國之助以解決東北問題，史達林的要求又斷斷不能接受。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半月，長春、瀋陽、哈爾濱市長就職，保安隊開始空運長春，國軍二千餘人入駐瀋陽，接收有了曙光。外交當局對於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尤感欣慰，認為美俄僵局打開，今後蘇俄不易自由行動，東北撤兵在望。不意形勢忽而逆轉，共軍進攻營口、鞍山，吉林保安隊被俄方繳械，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一行七人遇害，馬林諾夫斯基警告張嘉璈，如經濟問題不獲解決，將不能預測撤兵日期。對於蔣主席夫人來長春慰勞俄軍，授勳蘇俄將領，避不與見。一月二十五日，張提出經濟合作方案，部分重要工礦，由兩國合辦，有關國家資源者，中國佔百分之五十一，其他各佔半數。斯拉特科夫斯基表示，為消除滿洲對蘇俄威脅，重要工礦電力均須合辦，否則無法接受中國辦法。

張以撤兵日期即屆俄軍尚無撤離長春跡象，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將告結束，中俄交涉如再拖延，勢必摻入國共問題。共軍日長月大，一旦決裂，國共勝負難以預料。馬林諾夫斯基仍欲於撤兵前解決經濟問題，二月一日，與張會談，各自提出最後方案，張並再詢撤兵計劃。馬稱如照中國辦法，剔出供給軍用的煤礦、鐵廠、電廠，則根本不必談合作。中俄決不至作戰，但懼有狼披羊皮的外國勢力進入滿洲。俄軍留此為幫助中國完成接收工作。空運長春，及開入瀋陽的軍隊，決不能鞏固中國在滿洲之勢力，因第八路軍及其他武力號稱五十萬人，中國

須自行解決。總之如經濟問題拖延不決，東北秩序將始終不能恢復，而中國的方案斷不能使此問題解決。張以其此次聲明，有如最後通牒，決返重慶請示。

第二節 馬歇爾使華

一、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軍隊整編與統編方案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馬歇爾離華盛頓來華，杜魯門發表聲明，闡述對華政策。第一，希望國民政府與中共軍隊停止衝突，由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參加之全國性會議，促成統一（即國共停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如其基礎擴大，容納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一黨訓政，似須修改（即改組國民黨政府為聯合政府）。第三，共產黨自主軍隊的存在，實與中國政治團結，背道而馳，在廣泛代議制的政府建立之際，所有武裝部隊，應歸編國軍（即共軍改編為國軍）。第四，中國按照上述途徑向和平之道邁進之際，美國即協助國民政府從事建設，改善經濟，建立軍事體制（即美國給中國以經濟援助）。第五，重申有關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中俄同盟條約，將東北歸還中國，清除日本在華勢力。在華北之美國陸戰隊為協助國民政府解除收復區內之日軍武裝，並促使其撤退（即東北應交還中國）。第二項非國民黨所願，第三項非中共所能無條件同意，第四、第五兩項，最為蘇俄所忌。

十二月二十五日，馬歇爾抵重慶，兩天後，政府與中共會談恢復。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決定由政府代表張羣，中共代表周恩來與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商討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辦法。一月十日，議定如下：

一、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部隊，立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一月

十三日起生效)。

- 二、除另外規定者外，軍事調動一律停止。
- 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交通線之障礙物應即拆除。
-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由政府、中共、美國代表各一人在北平組成一軍事調處執行部。所有訓令及命令應由三方一致同意，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布之。
- 五、下開規定……亦經政府與中共代表同意：第一節對於政府軍隊之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惟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

以上辦法當日分由國民政府蔣主席、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下令所屬遵行。

政府與中共先已同意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停戰令發布的同一天開幕，參加的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三十八人。¹蔣主席致詞，希望會議樹立民主楷模，宣布政府決定實施人民享有各種自由，各政黨一律平等，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周恩來致詞，謂應痛下決心，永遠使中國不再發生內戰，歡迎蔣主席關於保證人民權利的四項公布，青年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代表亦有相同表示。實際上所謂政治協商會議不過是有第三者參預的國、共談判。第三者的立場亦不盡同，青年黨及三分之二的無黨無派代表大致站在國民黨方面，民主同盟(國家社會黨、救國會等)及三分一的無黨無派代表與中共一致。一月十日至十九日，經過九次會議，重大議案討論完畢，未了之事，分組續商，憲法草案及軍事兩組首先達成協議，繼為施政綱領、政府組織、國民大會三組。二十七日，周恩來飛返延安報告，三十日復來重慶。三十

¹一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告召開政治會議辦法，蔣主席聘請之代表計國民黨八人，中共七人，中國青年黨五人，村治派一人，第三黨一人，無黨無派(即社會賢達)九人。按青年黨時已與民主同盟分離，村治派與第三黨仍各自保持其組織，故屬民主同盟者共七人。

一日，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第十次會議，通過下列決議後，即行閉幕。

- 一、政府改組：（1）國民政府委員爲四十人，半數由國民黨員充任，餘由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涉及變更施政綱領之議案，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2）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中之七至八人（即兩者總額之半數），請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用人，不得有黨派歧見。
- 二、和平施政綱領：（1）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之最高原則。（2）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3）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之途徑。（4）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
- 三、軍事問題：（1）軍隊屬於國家。（2）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爲政爭工具。（3）改組軍事委員會爲國防部，內設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4）軍事三人小組應即商定軍隊整編及共軍編入國軍辦法。
- 四、國民大會：定於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制定憲法，舊代表外，增選台灣、東北代表，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若干名。¹
- 五、憲法草案：組織審議委員會，於六個月內修正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公布之憲法草案。

二月九日，軍事三人小組開始集會，政府代表改爲張治中，中共及美方代表仍爲周恩來及馬歇爾。三月五日，議定「軍隊整編及中共部隊爲國軍之基本方案」：

- 一、根據方案決定具體辦法，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限十八個月完成。
- 二、最高統帥撤免中共軍官，應由中共代表提名之軍官補缺。

¹台灣、東北等新增區域及職業代表一百五十名，國民黨二百二十名，中共一百九十名，青年黨一百名，民主同盟一百二十名，社會賢達七十名，舊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五名，大半爲國民黨員，新舊合計爲二千零五十名。

- 三、使用陸軍鎮壓國內騷亂，須經國民政府委員會同意。
- 四、在第一期十二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九十個師，中共軍整編為十八個師，在第二期六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五十個師，中共軍編為十個師。¹
- 五、第一期統編四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由政府軍與中共軍各一軍編成，第二期統編六個軍，每軍由政府軍與中共軍編成。
- 六、各省保安部隊以一萬五千人為限。

二、國共及中俄關係的惡化

政治協商會議有了結果，各方大都感到欣慰，甚至莫斯科亦說停戰令及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中共尤為滿意，會議閉幕之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向馬歇爾致謝，稱道他態度公正，面遞毛的書信。他（周）說，中共準備對地方性及全國性事務與美國合作，美國式的民主將在中國開始。目前中國尚未具備社會主義的必需條件，中共並不欲在最近的將來使之實現。中國應走美國的道路，致力於民主、科學，特別是農業改革，工業化，自由企業，發展個性，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的中國。並暗示毛澤東希望有機會訪問美國。二月一日，延安權威人士盛贊政治協商會議已獲得重大成果，一切決定於如何實施，各解放區舉行慶祝大會。

國民黨的表示似頗審慎。政治會議閉幕，蔣主席致詞，除盼望大家守信負責，遵行協議外，說是軍隊編整為最大需要，軍令、軍制必須統一。復告中外記者，甚願各黨派永遠合作，全國人民相信中共必能切實作到軍隊國家化。「中共若不能放棄私有軍隊，則政治協商會議之努力均歸無效。」可見他的重視點之所在，懷疑中共是否肯交出軍隊。

¹第一期共編一百零八師，駐地分配，計東北政府軍十五個師，中共三個師，華北政府軍二十一個師，中共十二個師；華中政府軍二十七個師，中共軍三個師；西北十五個師，華南十二個師均為政府軍。第二期共縮編為六十個師。東北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北政府軍十一個師，中共七個師；華中政府軍十個師，中共二個師；西北九個師，華南六個師，均為政府軍。國軍、共軍始終保持五與一的比例。

十餘年來，國民黨內派系之爭頗烈，而以CC系與政學系之間爲甚。政學系原居政府要職者不少，勝利後收復的東北、台灣亦爲所得，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民黨代表，有的爲政學系，有的爲CC系，負責對俄交涉的幾盡爲政學系。¹政學系對中共問題傾向妥協，對俄不惜遷就，CC系則不願中共參加政權。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張嘉璈自長春抵重慶。蔣主席聽到他的報告，至爲憤怒，謂「俄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進，亦不談經濟合作，任其擱置再說。」張謂今後俄美對峙，已爲不易之事實，俄必利用中共在東北建立政權，東北全赤，華北亦赤。應重加考慮，決定方針。一爲絕對不再與蘇俄討論經濟合作，一爲再提答案，同時提出希望蘇俄履行條件。蔣允予考慮。次日得悉俄方擬借故解除中國軍隊武裝，決定在瀋陽俄軍未盡撤前，不派兵赴長春。七日，最後讓步方案商就，一面由外交部通知俄大使，一面由張回長春交涉。

二月九日，美國分別照會中俄，聲稱有關滿洲經濟問題的協商，不得妨礙門戶開放及各國機會均等原則。國務卿貝納斯復謂，日人在滿洲財產的處置，應由同盟國遠東委員會決定。於是主張對俄強硬者愈爲有詞，重慶東北人士遊行請願，要求俄軍立即撤退，歸還奪去物資。蔣主席仍主與俄方談判，惟經濟合作辦法須俟撤兵完竣，政權接收後方可實行。十九日，俄大使彼得羅夫面告王世杰，如戰利品問題不能解決，則一切不能解決，並抗議反俄遊行。原定明日返長春的張嘉璈奉命從緩。

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學生約二萬人大舉示威，手舉刀刺史達林像，高呼「俄軍必須立即撤退」、「反對蘇俄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國主義」，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其他各大城市學生紛紛響應。中共指爲排外，國民黨陰謀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莫斯科責中國政府獎勵反蘇宣傳，馬林諾夫斯基謂中國受第三國挑撥。蔣主席爲了大局，宣稱

¹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均被視爲政學系。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有政學系的張羣、吳鐵城、王世杰，CC系的陳立夫、張厲生、陳布雷，無所屬的孫科、邵力子與政學系近。

東北問題必能合理解決，中俄友誼必須保持，希望人民行動勿逾越範圍，並對陳立夫痛責學生示威。二十七日，彼得羅夫抗議，指示威為有組織的舉動，且侮辱蘇俄最高領導人，中國政府須負其責。

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務卿演說，不許用強迫或壓力侵畧，亦反對用政治滲入，施行侵畧。強國無權擅自駐兵於獨立國家，無權自解放區取走財物。此種行為違犯聯合國憲章，必要時美國將使用武力以衛護此憲章。三月四日，蘇俄答覆美國二月九日的照會，說是中俄曾討論合組公司，開發前被日本關東軍利用的部分企業，此種企業，蘇俄認為戰利品，並非排斥他國，無害於門戶開放。中國則指蘇俄的要求越出國際公法、國際慣例及中俄友好條約。美國不同意蘇俄的觀點，雖不反對中俄商談，惟應在中國管理滿洲行政之後。但美國政府終因人民深懼為中國問題捲入戰爭，未再有堅定表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國民黨舉行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二中之全會），對於財政、經濟、外交問題，猛烈攻擊負責人員，主張廢除中俄友好同盟條約；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要求懲辦國民黨代表，發言者大都為CC系。蔣一再說明國民黨對其他黨派不能不讓步。國際合作為世界趨勢，今後一切問題須用政治方法解決。會議通過下列各案，一、力謀中俄真正親善，遵守兩國友好同盟條約，迅速撤退東北俄軍，由國民政府派兵接防。二、信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盼中共切實履行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方案。三、依照孫中山之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擬訂憲法草案。四、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大會宣言復申明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貫徹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貫徹軍隊國家化。所謂還政於民，亦即不能交與各黨各派；軍隊國家化，亦即中共不能擁有軍隊；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黨選任，亦即暫不放棄黨治。

依照停戰令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政府軍不得進入共區，中共得參加聯合政府。對於軍隊整編、統編方案，中共或更滿意。毛澤東原望共軍與國軍保持一對六或七的比例（見748頁），結果反而是一對五。不久他就生疑慮，特別是對政府組織案的實施。國民政府委員有決策

權，涉及施政綱領的議案，須有委員三分二贊成。全體委員為四十名，國民黨答應予中共八名，民主同盟四名。中共為保有否決權，要求與民主同盟合佔十三名，國民黨不允。二中全會開幕前夕，延安已責國民黨欲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會議期間，《新華日報》再三抨擊，謂國民黨的反動頑固派勢力的猖獗行動必須立即停止。會議結束，周恩來指其決議違反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莫斯科亦說國民黨反動派分子囂張，反對中俄友好條約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受外國支持，作反俄運動。三月二十日，蔣主席在參政會說明政府今後工作，其中包括軍令、政令，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四月一日，復在參政會報告，政治協商會議並非制憲，訓政約法為國家大法，在憲法未頒行前不能廢止，擴充國民政府組織在集中力量，並非推翻國民政府基礎。東北主權行政必須完整，決不承認所謂中共之「民主聯軍」及民選政府。接收完成前，無內政可言，希望中共部隊接受統編。四月四日，周恩來再責國民黨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及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軍隊整編，統編協定。並謂停戰協定及政治會議的一切決議，應施用於東北。六日，《解放日報》發表《駁蔣介石》社論，毫不留情的抨詆，說他「喪失東北有罪，收復東北無功，」「通敵賣國，」大有不惜關閉談判之門之勢。

三、關外戰爭擴大

日本投降後，十四年來備受蹂躪的東北人民，無不渴望早日重觀漢家旌旗。政府軍遲遲不克到達，共軍捷足先至，各方爭先迎迓，滿洲國軍隊紛紛來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自長城內外的第八路軍，來自山東的新四軍及舊有的東北抗日聯軍、民主自衛軍、自治軍合組「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設總部於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毛澤東自云：初來共軍約十萬人，十二月，擴大至二十餘萬人，一九四六年二月，已近五十萬人。雖得力於蘇俄的協助，而中共的政治運用關係尤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命中共中央東北局，積極建立政治根據地，以羣衆工作為中心，發動清算漢奸鬥爭、減租和增加工資運動，組織團體，建立黨核心和羣衆武裝、人民政權。次

年初，又命展開生產運動，以農運爲主，同時恢復工業生產，再展開民主選舉，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

重慶會談時，中共曾要求參加東北行政(見 747 頁)，及中俄交涉僵持，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報》再表示對於東北問題的意見，主張成立地方性聯合政府，由東北人民及各黨派組成東北政務委員會，撤銷行營及其所屬機構，籌備人民普選各級民意機構及各級政府首長。二月八日，周恩來、董必武向張嘉璈建議，東北問題，應由政治方法解決，各黨派加入東北政治委員會，行營內由國共代表組織小組，就地解決軍事問題。十四日，延安發言人要求改組行營及各省政府，容納各黨派，承認抗日民主部隊及各省自治政府，限制國軍開入東北數量。國民黨如固執武力解決方針，衝突將繼續發生。這是東北戰爭行將擴大的先聲。

國軍整編及共軍統編方案製訂後，三月一日，軍事三人小組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飛華北巡視停戰，及恢復交通狀況，分晤各地共軍高級將領。三月五日至六日，訪延安，毛澤東謂中共必用全力貫徹停戰、政治協商、整軍協定。馬歇爾深感欣慰，十一日返美，商對華經濟協助。十六日告華盛頓記者，中國正努力和平團結，美國應給以積極援助，建立一穩定政府。

中國不肯全部接受蘇俄的經濟合作要求，俄軍亦不能永久霸佔東北不去，馬林諾夫斯基一面加緊扶植共軍，一面聲言定期撤兵，但不能等待中國接防，只有交付現有的武力。中國如仍不同意經濟合作條件，即任共軍佔領俄軍撤退地區。三月八日，王世杰告訴彼得羅夫，目前國內情形，無法再談經濟合作。三月十四日，瀋陽俄軍全撤，事前並未通知，瀋陽南北共軍到處攻擊，十七日，佔領四平街。二十一日，長春俄軍亦開始後撤，不准中國軍隊跟進。

蘇俄始終欲於撤兵前達成經濟目的，希望繼續商談，中國決定由中央主持。三月二十七日，彼得羅夫將張嘉璈在長春時與俄方所談經濟合作企業種類，通知外交部，大旨係根據王世杰要求先協助中國軍隊進入瀋陽以北地區。四月三日，長春俄軍宣布自各地撤退日期，對

於中國接防之事，彼得羅夫謂於可能範圍之內予以協助。蔣主席主早日談判經濟合作問題。十三日，王世杰始向彼得羅夫說明合作原則與內容，所有日人財產均應賠償中國損失，蘇俄在合辦事業所佔股份，係中國所讓給，為彼得羅夫所拒。十四日，長春俄軍撤離，共軍立即進攻。十六日，中俄又有一次談判，依然不協，和平接收已絕無可能。

四月十八日，共軍佔領長春，重慶《大公報》發表《可耻的長春之戰》社論，《新華日報》選以《慶長春》。一週後，哈爾濱亦為共軍所佔。馬歇爾離重慶前，曾向國共建議，政府為恢復東北主權，得派兵佔領必要地區，有權管轄南滿、中東鐵路兩旁三十公里地區，俄軍撤出地區，中共軍不得開入，為延安所拒。共軍攻佔長春之日，馬歇爾回至重慶，勸告政府停戰，共軍退出長春，國共均不接受。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責國民黨堅持訓政約法，一黨統治，始終不同意中共在國民政府委員中佔十名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佔四名的提議，否決權發生動搖。加以東北內戰嚴重，有牽入關內之勢。只有以上問題全部解決，中共方能考慮參加政府及國民大會。國民政府允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對於周恩來的東北停戰要求，則予拒絕。

五月五日，國民政府自重慶遷回南京。大概由於東北共軍已經得手，六日，蘇俄大使館武官羅申奉莫斯科之命，復邀蔣主席往訪，又遭婉辭。據蔣事後自述，他如果接受，「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對華一貫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向蘇俄一面倒。……自中蘇同盟條約訂立之後，我們在這樣重大犧牲之下，尚不能鬻足其希望。……在蘇俄未能履行此約……之前，我實無與史達林會晤必要。……為了他獨佔東北，必須先破壞中、美的關係，使中國完全孤立。如果……我與他會晤，無異於提供共產國際以離間中、美關係的一基本資料。」除了上述顧慮外，另一原因為國軍二十八萬人已開至東北，不難擊破共軍之主力。

五月十六日，國軍在杜聿明指揮下，總攻四平街，與林彪統率的共軍，即東北民主聯軍激戰，兵力各約十五萬人。十九日，國軍獲勝，共軍向東北地區退卻。二十三日，國軍入長春，未再積極北進，主要

原因爲補給困難，戰志不揚，力有不逮。四月初，國軍曾失利於本溪湖，此次四平街勝利，得來亦殊艱辛。共軍南佔鞍山、海城，¹國軍後路受到威脅，縱令越過中長鐵路及松花江，直搗北滿，蘇俄可能別生弊端，如想根本摧毀共軍，甚少把握，不若爲留餘地，作爲贖脫。蔣主席接納馬歇爾的勸告，宣布自六月六日起，東北停戰十五天，撤回進向哈爾濱的部隊。此爲第二次停戰令，滿期又延八天。

政府的條件爲東北共軍編爲三師，移駐興安嶺以北，關內共軍退出熱河、察哈爾及山東烟台、威海衛，並縮減兩師。中共要求東北長期停戰，重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改組等事，東北共軍編爲五師，退出地區不再駐兵，國軍撤離熱河、山東。政府改要求共軍於十天內退出蘇北、膠濟鐵路及熱河承德、東北安東、哈爾濱，可承認黑龍江、哈爾濱之中共地方官員。中共僅允減少蘇北、膠濟線兵力，或全部撤出，惟國軍不得進入。政府爲了南京、上海的安全，定要共軍於一個月內撤至隴海鐵路以北，中共堅持保留地方政權及保安隊。六月三十日，東北停戰期滿，一無所成。

四、且戰且談、美國調處失敗

關外衝突激化，關內戰火亦未因停戰令而止息，不過最初四個多月規模尚不爲大。六月起，戰鬥轉烈，山東陳毅的新四軍佔領棗莊、膠州、泰安、德州，繼攻青島、濟南外圍及濰縣，山西亦到處激戰。鄂、豫邊區的李先念共軍，因政府軍進迫，突圍西走。七月，蘇北新四軍迫近長江北岸的揚州、南通，以及蘇皖之交。毛澤東指示中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約在此時，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再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及新編第四軍番號。²政府軍約出動九十餘萬人，共軍數目大致相當。政府軍的武器優於共軍，三分之一爲美式配備，多取攻勢，側重於城市佔領，即重點進攻，損失較大。毛澤東的戰畧爲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配合地方

¹海城國軍爲滇軍，師長投共。滇軍爲龍雲舊部，因龍雲免職，對政府不滿，日後其他在東北的滇軍，相繼易幟。

²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起，共軍一律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武力，選擇適當機會，包圍較弱或少援助的政府軍，以殲滅其個別力量為目標，不重城池的一時得失。對於土地問題，由減租減息，復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並組織民兵、游擊隊，使農民與共軍站在一邊，採行長期的人民戰爭。

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中共漸不信任馬歇爾，認為他的態度不公。共軍退出長春，雖由於四平街之敗，亦由於馬歇爾的勸告。及為國軍進佔，中共對他愈為不滿。六月五日及七日，《解放日報》一再發表《美國應立即停止助長中國內戰》及《反對美國幫助屠殺東北人民》社論。十九日，美國繼續軍事援華，助編軍隊六十師，其中共軍十師，須統編後始能裝備。二十二日，毛澤東公開指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為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立即停止，並撤退在華美軍。七月七日，中共宣言，主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拒絕美國援助，抨擊美國對華政策。莫斯科《真理報》指美國武裝援助國民黨為中國內戰原因之一。但國民黨同樣不滿於美國，認為偏袒中共。美國雖以支持國民政府，使其統治權力及於全國為政策，惟不出以直接武力援助，所希望的為國民黨對中共讓步，中共遵守約束，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為了史迪威事件，馬歇爾對蔣早有成見，政治協商會議後，重慶不斷發生反對派與擁護派的打鬥事件，他認為是國民黨頑固派有意破壞協議。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及六月上海各界和平請願代表在南京之被毆辱，七月，民主同盟首領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之遭暗殺，無一不加深他的反感。

是年五月以來，政府在軍事上居於優勢，七月三日，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準備施行憲政，以抵制聯合政府。不久蘇北之戰爆發，蔣主席自南京去廬山，似有意避開與馬歇爾接觸。馬歇爾對於調處雖已悲觀，尚不欲放棄，七月十八日，偕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前往廬山。此後兩個月內，八次飛行於南京、廬山之間，續作努力。¹蔣主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以蘇北共軍不利，要求先行

¹ 華盛頓從馬歇爾之請，已內定魏德邁為駐華大使，以中共反對，馬歇爾改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繼任。馬歇爾八上廬山的日期為七月十八至二十日，二十七至三十日，八月三至八日，十五至二十日，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八月三十至九月三日，九月六至十日，十三至十七日。二十六日蔣回南京。

停戰，再商政府改組。蔣以軍事得手，自然不允，延安及莫斯科對美繼續抨擊。七月二十九日，美國陸戰隊在天津、北平間的安平遭共軍襲擊，死傷十餘人，馬歇爾爲之震動。

馬歇爾以蔣不肯停戰，八月五日，建議由政府代表二人，中共代表二人，美國代表一人，先組成五人會議，商談改組政府問題。蔣雖同意，惟要求中共須於六星期內將蘇北、山東、熱河、東北、山西共軍後撤，恢復交通，整編軍隊，實施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周恩來仍堅持停止衝突，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政府，承認共區行政權。馬歇爾以雙方條件相去甚遠，八月十日，與司徒雷登聯合聲明，謂戰事已有不能控制之虞，國、共軍隊之重行部署，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性質爲基本爭點，無法達成停戰協議。杜魯門函蔣，希望中國在一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完成永久和平及穩定之經濟，否則將重定美國對華政策。十四日，蔣發表文告，說明今後政府方針，爲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遵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擴大政治基礎，共軍撤出若干地區，遵守調處，實施統編。最後謂國軍以外不能有對立的軍隊，化武裝政黨爲和平政黨。《解放日報》開始指名斥責馬歇爾不能保持公平不偏態度，中國內戰不能停止，馬氏不能辭咎。延安總動員的號召，亦於此時播出，毛澤東指美國準備反蘇俄戰爭，美國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司徒責中共肆意攻擊美國政府，且涉及馬歇爾私人。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來表示願參加五人會議，蔣允先商改組政府，不談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暫擱置共軍後撤的要求，周表示同意。復因中美簽訂收售太平洋美軍剩餘物資合同，及國軍進佔熱河承德，中共詆美助蔣作戰。周告馬歇爾，必須獲得實行停戰，及撤回共軍後撤等要求的保證，始參加五人會議。蔣主先談政治問題。九月十四日，司徒建議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商談，周仍要先談軍事問題，因爲這時共軍雖在魯西南獲勝，但綏遠、山西及蘇北的政府軍則連戰連捷，中共希望停戰，而政府拒絕，周恩來赴上海。毛澤東命共軍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九月十七日，政府軍攻下蘇北共軍基地淮陰。十九日，周聲稱暫時退出南京談判，譴責美國政策，並謂中共決繼續作戰。

九月二十七日，蔣主席同意軍事政治商談。時政府軍正向張家口前進，周恩來分函蔣與馬歇爾，謂如不停止對張家口的攻勢，即認為政府公開表示全面破裂。十月一日，馬歇爾以備忘錄致蔣主席，如停戰不能獲致協議，將終止調解工作。蔣允許中共及民主同盟可共推國民政府委員十三名，如中共參加國民大會，實施整軍方案，共軍限期進入規定駐地，即停止軍事行動。周恩來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及六月七日，即第一次停戰令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共軍位置，無條件停止對張家口的攻勢，其他問題可經商談解決。十月四日，馬歇爾向蔣表示不能再參加談判，準備回國，並向雙方建議，政府停止進攻張家口十天，續行談判。十月一日，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青年黨代表出面調解，建議停攻張家口，緩開國民大會，召開協商綜合小組。同日，政府軍佔領張家口。十六日，蔣提出恢復交通，華北、華中國、共軍暫駐現地，關內地方政權，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解決等八點，俟中共同意，即下停止衝突令，召開五人會議，協議改組政府，召開三人會議，協議軍隊駐地及整編事宜。中共中央聲明必須承認停戰、政治協商兩協定的效力。但未提軍隊整編及統編協定，這時因為共軍已大量擴充，不願照原協定統編。

十月二十一日，周與第三方面代表自上海回南京，同日，蔣飛台北，一週後始歸，對於十六日的要求加以修改，主要為現地停戰，關內外政權均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處理，國民大會開會後即改組行政院。中共主張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須同時改組，關內外地方政權依地方自治原則處理，國民大會由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十一月八日，蔣頒布第三次停戰令，另聲明國民大會不再延期，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大會的應有名額，根據十月十六日所提八點，商談停止衝突等辦法。中共謂政府單方面宣布停止軍事行動，事前未與中共協商，政治方面所提辦法與政協決議違背，要求停開國民大會，恢復一月間軍事位置。政府宣布國民大會延期三天舉行，中共堅持停開。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出席的為舊有代表及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的改名）代表，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會中對憲法草案、定都北平等問題

爭論頗烈，終以蔣的影響，國都仍為南京，憲法草案仍照政府所提，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大會閉幕。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來離南京，抵延安後，對記者談話，如重開和談，須重新成立各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召開新國民大會。行前馬歇爾詢以中共是否願由美國繼續斡旋，十二月三日，周復稱，如立即解散國民大會，恢復一月十三日之駐軍位置，和談可望再開，對於是否願由美國繼續調處，避而不答。

中共以國民黨的經濟困難日增，人心惶惶，士氣萎靡，中共在軍事上雖未佔優勢，然亦屢挫政府軍，假以時日，最後必勝。周恩來謂六個月內可破壞政府軍攻勢，一年之內，政治與經濟機構將有重大變化。十二月一日，馬歇爾向蔣主席痛陳經濟軍事危機，共產力量非軍事行動可以消滅，必須使之納入政府。蔣謂共軍可望於八個月至十個月內全部殲滅，中國經濟以農村為基礎，無崩潰危險。參謀總長陳誠稱，一年內肅清共軍。

中共自六月以來，再三指責政府，同時民主同盟發動反美運動。九月二十三日起，上海等地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十二月十八日，杜魯門宣布繼續協助中國實現民主團結，俟和平恢復，將加緊援助中國復興，在華美軍已減至一萬二千人。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美兵姦污女生案，數千學生罷課示威，部分教授提出抗議，要求美軍撤退。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成都、重慶、武漢、昆明、廣州學生繼起響應，組織「全國學生抗暴聯合會」，由是而有「為敦促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全國學生簽名運動」、「抵制美貨運動」、「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

國民大會閉幕後，馬歇爾應蔣之請，發表談話，指中共對政府之極端懷疑，政府軍人對剿共之樂觀估計，均犯錯誤。政府改組，應仍予中共及民主同盟以參加機會，新憲法須真正實行，少數黨應參加政府，仍盼政府與中共談判。一九四七年一月，馬歇爾於學生反美聲中，離華回國。先一日，復發表報告，謂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為國、共兩黨的猜疑，最有力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於促成聯合政府的一切努力，

無不加以反對，極端的共產黨人不惜任何手段以達其顛覆國民政府的目的。挽救目前局勢，有賴於政府與少數黨中的自由及優秀分子組成一良好政府。國民大會已制定一民主憲法。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蔣主席宣布，維護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政府人士向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表示，¹願與中共竭誠商談停止衝突，改組政府等問題，準備派張治中赴延安接洽恢復和談，立即公布停戰令，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憲法，恢復一年前停戰時的軍事位置，如政府接受，和談可在南京恢復。政府不允，惟仍望商談，下令現地停戰，整編軍隊，恢復交通，對於地方政權，願商合理解決辦法。中共猛烈抨擊，各地共軍大舉進攻。一月二十九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

第三節 國民政府險象環生

一、戰局轉變與共軍進攻

一九四七年一月，陳毅的華東人民解放軍，劉伯承的中原人民解放軍分向魯南、魯西南猛攻，政府軍損失約六萬人，徐州吃緊。二月，陳毅又大敗政府軍於魯中萊蕪，俘總指揮李仙洲以下官兵約五萬人。三四月間，劉伯承與政府軍爭奪津浦鐵路。五月，政府軍進攻魯南沂蒙山區，最精銳的張靈甫師被陳毅困於蒙陰孟良崗，全軍約二萬人盡覆。在此期間聶榮臻的華北人民解放軍，連下平漢鐵路兩側各城，威脅保定、北平。至是戰鬥力較強的政府軍已犧牲二十五個師，約三十萬人，山西的大部分亦入於解放軍徐向前、賀龍之手，綏靖主任閻錫山坐困太原。

陝西之戰，最爲中外矚目，經過五天戰鬥，三月十九日，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攻下十年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毛澤東北退。但胡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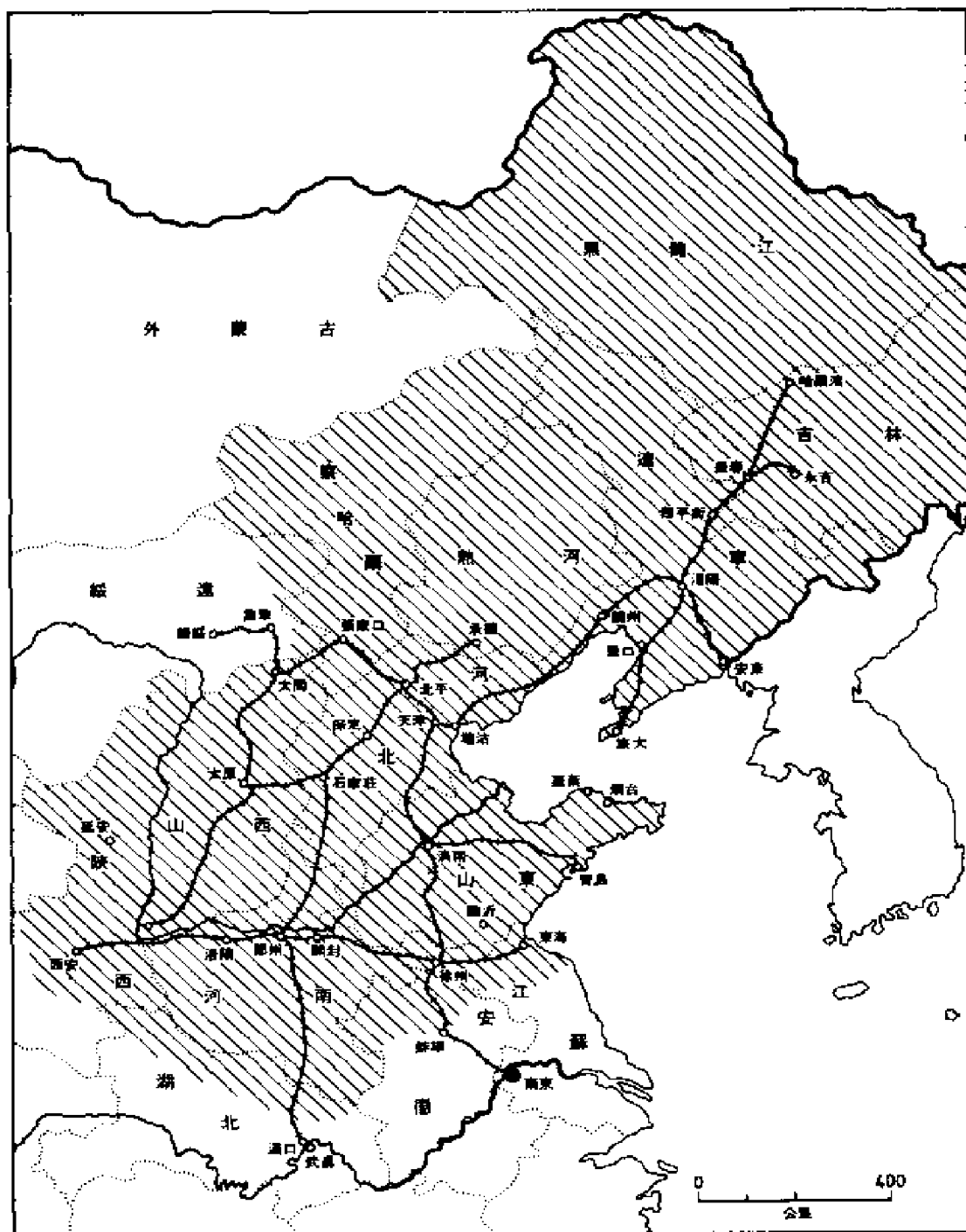
¹民主社會黨已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出民主同盟。

以不明解放軍主力所在，月餘之間，三次挫敗。六月，胡軍在延安西北獲勝，解放軍轉往延安東北，八月復在榆林附近獲勝，然以補給困難，疲耗日增，且須分兵東援山西、徐州，兼防黃河，愈感左支右絀。

東北戰局，政府軍亦處於不利地位。四平街收復後，參謀總長陳誠不准再增新軍，兵力漸感不足。林彪的民主聯軍經過補充整訓，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一再渡過松花江，向長春一帶進擊。五月，發動第五次攻勢（夏季攻勢），政府軍但能固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與軍長孫立人不睦，地方人士對熊式輝不滿，士氣降落，人心動搖。六月十一日，共軍圍攻四平街。熊式輝報告國防部，謂「迭次會戰，軍力消耗，損失甚重，既無增援，而補充武器亦不足數，且屬太遲，……匪（共）力增加甚速，相去懸殊。……反攻力量不足，分點固守亦屬不易，……前途有不堪設想者。」「遼東、遼南門戶洞開，……四平街圍攻甚烈，……火力反較我軍為強。」十四日，共軍攻入四平街市區，與守軍陳明仁部發生惡戰，遼南本溪不守，營口被圍。三十日，共軍退去，而主力無損。七月七日，熊式輝說，共軍在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補充十七萬人，政府軍人馬器材損失超過七個師，大半落於共軍手中。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說：「若無生力軍增加，未來之危險，將甚於前者，……兵源糧源俱竭。……四平解圍近一月，新兵只到二千四百人。……匪方已訓練之新兵，陸續西來，……着着爭先。」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宣布全國總動員，戡平共黨叛亂。同月，共軍亦全面進攻，劉伯承部自冀南、魯西渡過黃河，¹進向魯、豫間的政府區，政府軍則攻佔華東解放軍的根據地魯中南麻。八月，劉伯承部穿過豫東、豫南，直抵豫、鄂間的大別山，武漢戒嚴。自晉南渡河的解放軍陳慶部，進入豫西，深入豫西南。魯南陳毅部進入豫、皖間的淮河，再迫徐州。九月以後，另支向魯東進攻。十月，河北聶榮臻部大破政府軍於保定以南，十一月，佔領石家莊。十二月，劉伯承、陳毅、陳慶部佔領河南許昌等城。陝西彭德懷攻下延安以南各城，晉

¹黃河已於一九四六年因故道。



圖二二 中共統治區（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

南賀龍部攻下運城。就全盤戰局而論，國、共兩軍已攻守易勢。政府爲統一華北指揮，兼支援東北，以傅作義爲華北「剿匪」總司令，設總部於北平。

熊式輝在東北窮於應付，一再求去。九月，陳誠代之，並裁撤保安司令長官部。陳誠意氣至豪，聲言不許共軍有第六次攻勢。政府軍共十四個軍，五十五萬人，以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軍心民心。¹十月，林彪對長春地區及遼西發動秋季攻勢，截斷鐵路交通，政府軍損失頗巨。十二月，又發動冬季攻勢，直逼瀋陽近郊，敗政府軍於白旗堡。政府召回陳誠，以衛立煌爲東北「剿匪」總司令。

是年（一九四七）十月，毛澤東以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名義，發表政治宣言，號召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華僑，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的獨裁政府，逮捕懲辦內戰罪犯。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希望他們立功起義。同月，重行頒布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另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綱，鼓勵人民參政、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十二月，毛指出，目前形勢是革命戰爭的轉折點，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是一個偉大的事變。十五個月前，他預計打倒政府軍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現在認爲勝利已經在握，爲期不在遠。意氣之豪，有如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底定湖南時的蔣總司令。

一九四八年一月，政府改採分區防禦戰畧，黃河以南分爲二十個綏靖區，聲稱一年內可消滅共軍有形力量，一年或二年內可予肅清。共軍的攻勢愈爲凌厲。是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大破政府軍於遼西，二月，佔遼陽、鞍山，三月，佔四平街、永吉。華北政府軍傅作義部於一月敗於北平西南的涞水，西北胡宗南軍於三月敗於陝西宜川。²四月二十二日，延安又爲解放軍所有，彭德懷進至涇

¹堅守四平街的陳明仁去職亦爲原因之一。

²傅作義部軍長魯英慶、胡部軍長劉勳均戰歿。

水、渭水之間，五月，爲胡宗南拒退。七月，閻錫山軍敗於晉中，太原完全被圍。山東除了濟南、青島、煙台等城，東北除了長春、瀋陽、錦州，幾盡爲解放軍佔領。

三月以後，劉伯承、陳賡、陳毅部，縱橫豫中及豫、鄂之間。四月五日，陳賡佔洛陽，六月十八日，劉伯承、陳毅攻入開封，與政府軍主力劇戰於開封東南，歷時十日，是一次大規模的陣地戰，勝負相當。七月，陳毅攻佔山東兗州，陳賡攻佔湖北襄陽。

總計二年以來，政府軍損折近百萬人，解放軍則增加一倍，政府軍由四百三十萬人減至三百六十五萬人，解放軍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百八十萬人。解放區的面積約爲二百三十萬方公里，包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大部及陝西、江蘇的一部，人口約一億六千八百萬，中共黨員爲三百萬。

二、內政外交的煎迫

一年以來，內戰蔓延，物價波動不已。一九四七年二月，黃金、美鈔猛漲，人心極端浮動。參政員傅斯年痛斥豪門資本，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這個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參政會要求處分宋子文。三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中正宣布，中共問題政治解決途徑絕望。會中以對俄外交失敗，台灣事變嚴重（見 781 頁），抨擊外交部長王世杰、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四月，政府改組，蔣續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爲副主席，張羣爲行政院長。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內包含有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及無黨派人士，¹算是一個聯合政府，不過他們所代表的力量有限。

時軍事經濟更爲危急，學潮洶湧，部分參政員、立法委員主張恢復國共和談，參政會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討論被拒。六月，孫科發表談話，譴責蘇俄支持中共在東北的活動及外蒙古對新疆的侵擾。²謂國

¹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亦各增若干青年黨、無黨派的委員。民社黨爲是否參加政府及位置分配問題，引起內閥，以致分裂。

²指五月外蒙侵入新疆北塔山言。

共談判失敗，由於美、蘇之不調協，美國應表示堅決態度。

先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爲使國民政府對中共讓步，開始施行對華禁運軍火令十個月，削弱了政府軍的戰力。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商約，美國享有的經濟權利獨厚，違背了平等互惠原則，影響了政府的聲譽。美國務院復宣布在中國大局改善之前，不貸款與中國。莫斯科與延安仍詆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指國民政府爲美國利益出賣中國。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八月，魏德邁以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身分來中國考察。離去之前，對國民政府首長演說，並發表談話，嚴厲指責政府軍事措施與軍官腐敗貪婪。中國復興有待於振奮人心的領導者，徹底的、廣泛的實施政治經濟改革，武力斷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他向杜魯門提出兩項建議：一是置東北於中、美、俄、英、法五國監護之下，或受聯合國託管；二是以五年爲期，由美國給中國以經濟援助，切實改革，而不捲入內戰。杜魯門、馬歇爾均不接受。

國民政府於魏德邁此行，初寄以厚望，終不免反感。蔣懷疑美國有意迫他引退，九月，他告訴全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不再希望美國援助，當設法改善對俄關係。孫科亦對合衆社記者說，中國不能長期傍徨，若被迫傾向蘇俄，政府必能與中共獲致和解。十一月，馬歇爾宣布自一九四八年起，以三億美元貸予中國，每月二千萬元，自有安撫之意。但是國民政府希望的緊急與長期救濟則未獲同意。司徒雷登屢說，中國政府有解體的象徵，不能望蔣充任領袖，號召民衆，恢復軍隊作戰意志。國民政府要求十五億美元借款，遲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僅得到經濟援助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特別贈予（軍事援助）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就目前所知，中共似未得到蘇俄顯著物質援助。即以共軍在東北從蘇俄手中取得的武器而言，亦不及政府軍在關內受降所得者多。共軍在戰爭中之所以常佔上風，軍民一體，士飽馬騰，爲重大原因。政府文武官吏營私爲己，傾軋妒忌，社會動蕩，秩序幾不能保持。計劃作戰的機構與負責軍官，復於有意無意之中受中共利用，共軍對政府

軍的一舉一動，大都明瞭，故無往而不利。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府辦理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絕大多數的當選者屬於國民黨的CC系，落選的青年黨、民社黨人，有絕食抗議，以死相爭者。政府強國民黨人退讓，又引起內部滋鬧。一九四八年三月，國民大會開幕，四月，蔣當選總統。覬覦副總統者多至六人，蔣屬意於孫科，坐鎮北平的李宗仁則志在必得，相爭不下。反李者謂李「加官」後將繼之以「逼宮」，攘奪總統。李憤而退出競選，指有人壓迫統制。經四次投票，李宗仁償其所願，蔣極為不懌。國民黨提名孫科、陳立夫為立法院正、副院長，反對CC系的立法委員聯合抵制陳立夫未成。行政院長由前任經濟部長翁文灝擔任，但不得各方支持。時人民解放軍正馳騁中原。

三、經濟的加速崩潰

日本投降後，大家以為戰爭已了，封鎖解除，今後物資供應無虞，於是囤積的貨物湧入市場，物價突然回跌，黃金美鈔下瀉。¹不意兩個月後，又復回漲，私營銀行錢莊為之倒閉，工商業為之停歇。一因內戰轉烈，中共以種種手段困擾政府，阻斷鐵路，攻奪礦區、鄉村，煤炭及農產品供給與消費中心隔絕。二因軍用浩繁，逃入政府區的難民，又須救濟，開支增大。三因重工業重心所在的東北為蘇俄佔據，華北大半為中共控制，向該地區推進的政府軍給養，悉賴後方。四因接收混亂舞弊，日本的企業或被肢解，或陷停滯，復有不少民營工廠被軍政及特務人員指為偽產，擅行封閉，以致工人失業，坐吃山空，原料被盜，機器鏽蝕。加之輪船、火車、工廠缺乏燃料，無法照常行駛、生產。特務機關間有借口肅清漢奸，搜刮勒索，其他擅作威福者亦多。人民怨憤莫名。²尤令社會痛心的為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之不合理。日本佔

¹時有「門前放炮，後門上吊」之謠，意即大家方在慶祝勝利，轉眼已家敗人亡。

²收復區有「五子登科」之說，指接收者，但重金子、銀子、房子、車子、料子；又有「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及「三陽開泰」之說，即「罵東洋（陽）、捧西洋（陽）、抓現洋（陽）」。

領區的紙幣，在華中、華南有中央準備銀行的「中儲券」，華北有聯合銀行的「聯儲券」。政府規定法幣與「中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二百，¹法幣與「聯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五，均以四個月為期。收復區的人民爭以偽幣購實物，後方法幣又大量流入收復區，物價上漲，法幣發行額增加，收復了土地，失去了人心。一九四六年，另發行東北流通券，亦可流入關內，兌換法幣，強有力者，以之運販黃金。

抗戰時期，淪陷區備受日本的榨取蹂躪，未淪陷區苦於軍糧、兵役、差徭，物力、勞力、畜力大減，農村殘破。²戰後元氣未復，內戰又起。一九四六年，河南、湖南荒地約佔耕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山東、山西、甘肅、湖北、江西、廣東亦復不少，而徵兵徵糧仍急如星火。戰前產米地區每畝年徵約一元四角，為一斗五升至二斗的米價，戰後每畝徵實、徵購、徵借，常為六斗至九斗。產麥地區的全部收入，且有不足以供繳納者。

農村凋弊，無力供給工業原料，亦不能作工業成品的市場。以紡織業為例，或因缺乏棉花，或因紗布難以暢銷，或停工、或減產。一九四六年，四川工廠大半停工，上海工廠開工者不及戰前的三分之一。出口與進口的比率為一與三·七，美國居進口第一位。

政府稅收僅當支出的百分之三七，不足之數，小部分賴出售黃金、美鈔及敵偽產彌補，絕大部分仍靠增發法幣。一九四五年發行額約為一萬三百二十億元，一九四六年，幾增至四倍。一九四七年，增加三十三倍；一九四八年，增加三百七十倍。戰後政府握有九億美元外匯，價值四億美元的黃金，十億美元的敵偽產。行政院長宋子文認為進口外國貨物與出口黃金，即可改變供應缺乏現象，並使法幣回籠，遏止通貨膨脹。非必需品亦准進口，外匯由政府供給，奢侈品加徵關稅百分之五十。於是外貨充斥市場，民營工業購買原料機器零件所需的外匯，反難獲准，以致無法生產。宋子文、孔祥熙控制的企業，則可照官價折合。一九四六年初，政府外匯漸感短絀，始禁止奢侈品進口，

¹經濟部次長何廉曾建議以三年來重慶、上海物價指數為準，定為一對六十。

²未淪陷區以四川的負荷最重，次為湖南、河南。

將美鈔與法幣的比率由一對二〇元，提高至一對二〇四元，再提高至一對三〇〇〇元，美鈔仍然上漲。是年十一月，存儲的外匯已耗去一半。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美鈔一元由法幣一萬元漲至一萬八千元，黃金一兩由五十萬元漲至九十三萬元，國庫存儲的九億美元外匯僅餘一億，大部入於有權有勢者之手。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經濟緊急措置方案，禁止黃金、美鈔買賣，重施物價管制，凍結薪水、工資。一個月後，黃金、美鈔黑市出現，商品亦流入黑市，物價如脫韁之馬，特別是糧食紗布。五月，浙江、四川發生搶糧風潮，限價撤銷，管制政策失敗。八月，美鈔一元漲至法幣四、五萬元，黃金一兩漲至二百五十萬元。十二月，發行二萬、四萬、十萬元大額法幣，米每石由四十萬元躍至一百餘萬元，一般物價高過去年十五倍。

政府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以為短期內即可以軍事解決，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戡亂只是一時的事。未料戰爭延長擴大，欲罷不能，惟有一切不顧，悉力以赴。當局亦承認經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然為時已晚。在兵戈不休之秋，事實上亦不可能，十五億美援貸款又成一夢。一九四八年一月，物價再度飛漲。二月，米每石突破三百萬元，三月，至四百四十萬元，六月，達一千萬元，七月，突破三千萬元。黃金每兩在二月為二千二百萬元，七月，約為一億一千萬元，八月超出六億元。小民不得一飽，公職人員三餐不繼。軍中高級軍官領得軍餉後，多先購黃金，再行出售，等到法幣到了士兵之手，已不及原值的十分之二、三。

政府為挽救經濟財政危機，一九四六年以來，屢有改革幣制之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正式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即日起，以金元為貨幣本位，發行金圓券，限於九月三十日，收兌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金元一元折合法幣三百萬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金元二元折合銀幣一元，金元四元折合美鈔一元。人民不得持有黃金、白銀、銀幣、外幣，均須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兌換金圓券，並限期登記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所有物價以八月十九日為準。金圓券總額為二十億，估計二億金圓券可收回全部法幣及東北流通券（二十億金圓

券等於通貨膨脹十倍)。但是不改革財政經濟，僅以一種新幣制代替舊幣制，斷難有成。內戰不停，又焉能談到經濟改革。

爲貫徹執行上項法令，分於上海、天津、廣州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上海爲蔣經國，雷厲風行，檢舉投機商人，控制市場，扣押豪門大戶，孔祥熙的揚子公司以囤積鋼鐵、棉紗、汽車亦被涉及。不到一個月，物價又起波動，工廠因限價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減工。糧食因限價而不運入市場，人心愈爲惶惶，上海、南京搶米、搶購之風愈熾。十月三十一日，政府放棄限價政策，糧食照市價交易，自由運銷紗布、煤、鹽及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本定價。但都市內仍難買到米糧。十一月十一日，准人民持有金銀外幣，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兌換金、銀，黃金每兩兌換金圓券一千元，白銀每兩兌換十五元，美鈔一元兌換三十元。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爲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¹

中共的基本經濟政策，爲發展農工生產，注意商貨流通。農業由減租減息而復實行分配土地，同時提倡開荒，整修水利。工業側重輕工業、手工業，低利貸款，減免稅收，工資的一半爲實物。商業爲集中與分散並行。對外管理，對內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運進必需的物資，一切在求自籌自足，保障供給，軍民兼顧。一九四七年後，財政金融日漸統一。一九四八年成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人民幣，物價頗稱穩定。

四、民變與層出不窮的學潮

抗戰後期，甘肅、四川爲徵兵徵糧，均曾發生過民變，以甘肅爲嚴重。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九月，四川亂事又起，衆至十餘萬，不久平定。十二月，西康以不堪省府主席劉文輝的橫徵暴斂，大規模的暴動繼之而來，衆至五十餘萬，組織「政治革新委員會」，歷時三個月。一九四七年二月，新疆維吾爾人受蘇俄煽動，要求中央軍及中央機

¹政府退至廣州後，一九四九年七月，又發行銀圓券，以人民完全失去信心，不久亦成爲廢紙。

關退出，與哈薩克人、東干回、漢人衝突，迪化閉市。七月，所謂「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游擊隊在各地滋擾，省府主席因之去職。

受日本壓迫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光復後，歡欣若狂。新任行政長官陳儀，剛愎自用，壟斷經濟利益，居要職者多為外省人，台人大為不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事變起於台北，不三日，及於全省，襲擊官署，搶奪武器，毆打非台籍之人。政府調兵彈壓，登陸後肆行報復，台人死傷，以千百計。國防部長白崇禧前來宣慰，允改革經濟制度，調整人事，始行無事，是為台灣「二二八事變」。

民變以邊遠地區為劇，學潮均起自通都大邑。大學教授學生久已對政府不滿，一九四一起，情緒日益高漲，至戰後而更甚，中共與民主同盟從而鼓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民主同盟號召反對內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首先響應，學生隨之罷課，要求制止內戰，撤退在華美軍，成立聯合政府。十二月一日，與軍人衝突，八人死亡，十餘人受傷。政府雖懲處負責當局與有關人員，仍不能止息各方的攻擊。

一九四六年一月，為東北問題，重慶學生舉行反俄示威，與各大城市的反內戰、反美運動形成兩個壁壘。蘇俄、中共指為排外，破壞國、共和談，係出於國民黨的指使，增加了政府的困難。不過中共對蘇俄在東北的行動，亦苦於無以自解。國、共戰爭擴大後，上海有「爭取和平聯合會」組織。六月，學生舉行反內戰遊行，要求統一與建設，與反內亂的學生衝突。七月，民主同盟要人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之被暗殺，更激起知識分子的憤怒。九月起，中共公開攻擊美國援蔣內戰。學生反美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見770頁），軍警實行壓制，不斷捕人，教授要求保障人權，學生罷課抗議，這是學生運動的一次高潮，以反美為主題。

勝利後，大學教授的薪津、學生的公費，不斷調整，雖仍追不上物價，然生活已較戰時稍優。一九四七年五月，因米價飛漲，學潮如排山倒海而來，名之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罷課請願，領導的是南

¹又名「吃光運動」，即是將公費在短期內化盡吃光。

京中央大學學生。政府允將公費提高，風潮反愈洶湧，遍於南北。政府宣布維持治安臨時辦法，不准團體請願。五月二十日，南京、北平學生與警察衝突，數十人受傷，學生更爲激動，定六月二日爲「反飢餓、反內戰、反暴行日」，要求取銷維持治安臨時辦法，懲辦「五二〇事件」負責人，四出宣傳，軍警大舉逮捕。學生知難而退，中止六月二日的總罷課大遊行。軍警仍繼續高壓，武漢大學學生三人喪命。重慶、廣州等地數百人被捕。蔣主席慰問教授、學生，革懲武漢警備司令，震撼中央政府的學潮告一段落。這是學生運動的又一高潮，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爲主題。

一九四七年七月，政府宣布動員戡亂後，學生不敢再倡言反內戰。十月，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被捕自殺，學潮又起，然已不似五月的嚴重。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爲反對開除學生，毆打市長。四月，北平一部分學生爲抗議解散學生聯合會，罷課遊行，另一部分舉行反罷課遊行。

一九四六年來，工潮亦時常發生。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工人舉行抵制美貨大會，五月，反對政府凍結工資，加入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九月，電車工人爲爭取待遇，電力公司工人爲抗議逮捕工會職員罷工。一九四八年一、二月，舞女及舞廳職工爲反對禁舞，搗毀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三百餘人被捕，申新紗廠工人爲工資問題佔據工廠，二百餘人被捕。

學生運動的第三次高潮，以「反美扶日」(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爲主題。一九四八年五月，起於上海、南京、北平，張貼污辱蔣總統漫畫，親共與反共派互毆。六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警告，倘繼續進行反美運動，可能導致不幸結果，受到教授學生的駁斥。七月，在北平的東北流亡學生，搗毀市參議會，學生死九人，軍警死二人，北平戒嚴。八月，河南、山東流亡學生滋鬧教育部、行政院。此後戰局急轉直下，中共勝利成爲定局，學潮方告緩和。

第四節 中共的勝利

一、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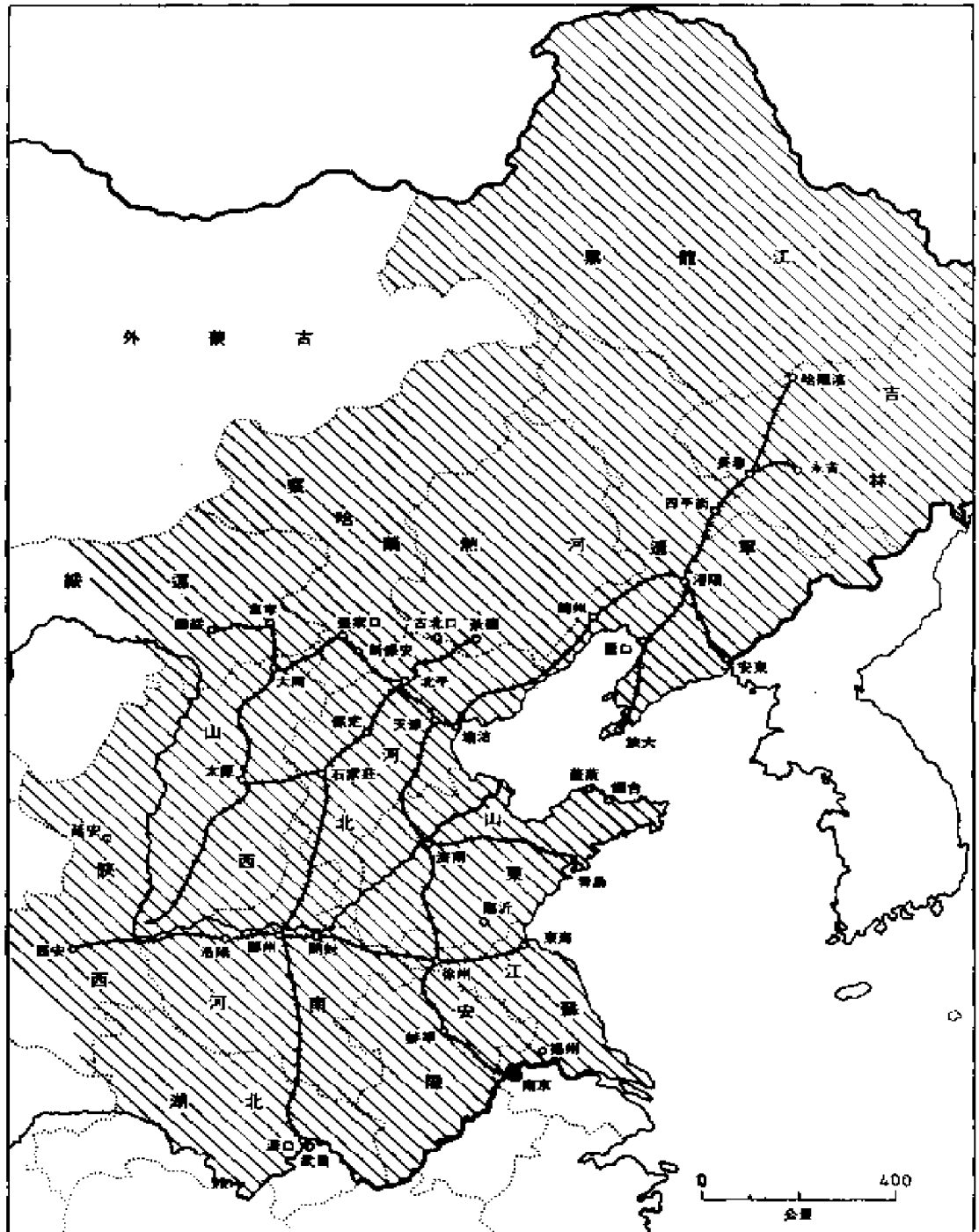
自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間各地人民解放軍轉取攻勢後，一年之間，政府軍處處不利，士氣愈為低落，中共決心進行決戰，奪取大城。一九四八年九月，陳毅統率的人民解放軍進攻濟南，守軍吳化文師二萬餘人不戰而降。¹九月二十四日，陳毅佔領濟南，俘山東省府主席王耀武以下六萬餘人，為政府軍的一次重大挫敗。

林彪統率的東北人民解放軍五十餘萬，約於陳毅進攻濟南的同時，進向遼西，謀斷關內關外交通。十月十六日，佔領錦州，守軍（滇軍）兩師叛變，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下七萬人被俘。被圍半年的長春，援斷糧絕，錦州失守之前，蔣親至瀋陽，命長春守軍南撤瀋陽，駐軍西援錦州。錦州失守之後，又兩來瀋陽，嚴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反攻。十月十九日，長春守軍一個軍（滇軍）叛變，解放軍進入市區。二十一日，另一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六萬餘人被俘。十月二十七日，自瀋陽西進的廖耀湘兵團被圍，十萬餘人覆沒。解放軍直趨瀋陽，衛立煌出走。十一月二日，瀋陽不守，政府軍十餘萬人，由海道撤出者不過三萬。東北全部為解放軍所有，政府軍被殲共約四十餘萬，中共稱之為遼瀋戰役，自政府軍奪得大批美國武器，如虎添翼，對解放軍而言，可說是決定了全局的勝利。

毛澤東先以為一九五一年可打倒國民黨，一九四八年九月，他以為再有一年左右即可做到。佔領濟南後，即部署攻取徐州，進畧淮河流域。十一月初，編組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野戰軍，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林彪分任司令員，²全部兵力超出三

¹吳化文為韓復榘舊部，曾投降偽軍，戰後編入政府軍，頗受歧視。

²野戰軍之下為縱隊，每一縱隊為三萬人，另有地方部隊、游擊部隊。一九四八年底，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改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各轄二十四個兵團。



圖二三 中共統治區（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

百萬人，政府軍則不足三百萬。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陳毅、劉伯承的華東、中原兩野戰軍分向徐州東西前進，兵力約六十萬人，民兵民工二百餘萬人，取攻勢。政府軍約五十餘萬人，由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副司令杜聿明指揮，以邱清泉、黃伯韜、黃維三兵團爲主力，取守勢。十一月六日，戰鬥開始，美大使館通令蘇、皖美國僑民撤退。南京、上海到處搶米，秩序大亂。徐州東路政府軍甫與解放軍接觸，兩萬餘人叛變，西路、南路各數千人投降。解放軍採一貫的「圍點打援」戰術，先圍東路黃伯韜兵團，阻擊來援的邱清泉兵團。十一月二十二日，黃伯韜自戕，全軍十二萬人盡覆。南路黃維兵團被圍於皖境宿縣，十一月三十日，政府軍放棄徐州，劉峙南退蚌埠，邱清泉、杜聿明西南退蘇、豫之間，謀解黃維之圍不果。十二月十五日，黃維部九萬人大都被殲。杜聿明、邱清泉部爲解放軍及民工所掘濠溝圍困，機械化部隊寸步難行，天寒糧絕。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殺，所部七萬餘人消滅。蚌埠不戰而下。歷時兩月餘，規模最大的另一決戰結束，政府軍又損失四十餘萬人，中共稱之爲淮海戰役，政府稱之爲徐蚌會戰。

當華東、中原野戰軍猛攻徐州之時，東北野戰軍林彪部一路進入熱河承德，一路進入冀東，華北野戰軍聶榮臻部佔領河北保定。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收縮戰線，所部六十萬人，分別集結於北平、塘沽、張家口、新保安。十二月初，林彪部入古北口，聶榮臻部佔南口，十二月中旬，北平、天津近郊發生激戰。十二月二十二日，傅部放棄新保安，二十四日，放棄張家口，損失五萬餘人。林彪部圍攻天津，經二十餘日慘烈攻守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爲解放軍佔領，政府軍十三萬人被俘。一月二十二日，傅作義與林彪訂立和平協議，所部二十五萬人由解放軍改編。一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北平，中共稱之爲平津戰役，與遼瀋、淮海戰役，合稱爲三大戰役，政府軍折損共約一百五十萬人。

二、國民黨求和與中共全國進軍

美國之不滿於蔣，已非一日，馬歇爾認為他固執倔強，難期再有作為。年來李宗仁以行營主任資格坐鎮北平，與教育文化界結納，受到司徒雷登的青睞。李之競選副總統，部分原因為司徒雷登之鼓勵。李當選後雄心愈大，司徒雷登對他希望愈高。一九四八年八月，司徒曾建議國務院設法使國、共停戰，分割中國為若干地區，採行聯邦制，儘可能使無中共參加的各邦保有最大部分的領域，由美國給以援助。又說，蔣不能引進才能之士，實行改革。但時馬歇爾任國務卿，已無再作調人之意。十二月二十三日，司徒續向國務院明白請示，可否勸蔣退休，讓位於李宗仁，或其他政治領袖，俾與共軍繼續作戰，或停戰言和。馬歇爾仍主暫不過問。

兩個月前，即十月底，蔣告美國記者，美國應重視中國局勢。十一月初，外交部商請馬歇爾派遣特別軍事代表團，由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蔣致書杜魯門，亦請派一高級將領為顧問。十二月一日，蔣又向美國記者表示，將長期守有長江以南，歡迎麥克阿瑟為最高軍事顧問。

十二月下旬，孫科繼任行政院長，宣稱政府用兵的最後目的，為爭取和平。二十四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電張羣、何應欽轉蔣，謂人心、士氣、物力已不能再戰，主邀美、英、俄、法大使斡旋，與中共謀和。跟着河南省府主席、參議會請蔣下野，湖南、廣西應之，司徒暗中支持。一九四九年元旦，蔣發布文告，願與中共商談恢復和平方法，不計個人進退出處。

中共携戰勝威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自蔣以下四十三人為戰犯。三十日，毛澤東聲言將革命進行到底。對於蔣的元旦文告，說是「戰犯求和」，決心完全消滅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將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逐出中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時局聲明，願根據八項條件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國民地方政府進行和談，懲辦戰犯，廢除舊憲法，廢除舊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

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權力。最後指示人民解放軍在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絲毫不可鬆懈戰鬥努力，對於任何反抗的反對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

一月八日，南京外交部長照會美、英、俄、法大使盼協助和談。同時蔣命各將領勿因和平運動而放鬆抵抗。白崇禧亦謂應備戰以求和，勿求和而忘戰。一月十九日，因四國謝絕斡旋，行政院請中共先無條件停戰，再進行和談。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正式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解放軍時已進至長江北岸，南京官民紛作逃亡之計。外交部通知各國使館，自二月五日起，政府改於廣州辦公。

中共堅拒先行無條件停戰，李宗仁允以中共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在廣州的行政院長孫科則說決不接受懲辦戰犯與投降的和平。二月十三日，李宗仁請顏惠慶、章士釗等以民間和平使者的名義飛往北平，再至石家莊見毛澤東。¹ 三月，何應欽代孫科為行政院長，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等為和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議決，集中力量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遷至北平，第二天，派周恩來等為中共和談代表。四月初，雙方代表開始在北平交換意見。中共的新華社再三聲明，解放軍定要解放全國，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蔣與國民黨的主張為軍隊各守原防，就防區整編，如共軍渡江，和談即停，李宗仁尤望能與中共「隔江分治」。北平廣播，解放軍正積極準備過江，依照八項條件實現和平。四月十三日，國共代表舉行正式會議，周恩來提出和平協議草案，計八項二十四條。要點為南京政府之一切武裝力量，實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向南京政府所轄區開進和接收。十五日，畧予修正，限四月二十日簽字。政府拒絕接受，白崇禧反對更力，李宗仁請中共重新考慮。

政府求和目的在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重整軍備。中共定要

¹顏惠慶為老外交家，章士釗為舊文人政客，與毛澤東有私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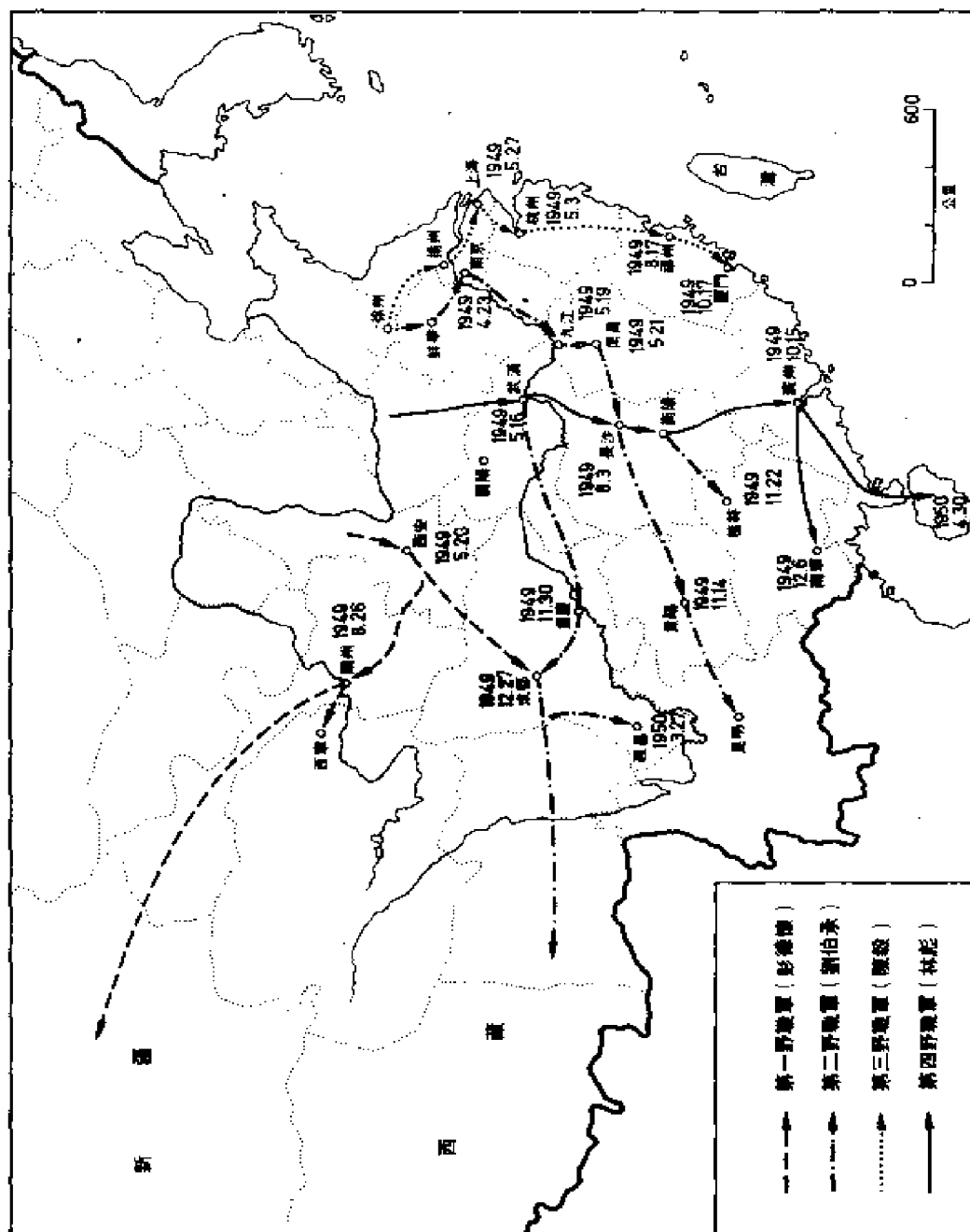
摧毀國民黨，不令死灰復燃。在和談期間，劉伯承、陳毅的第二、第三野戰軍陳兵長江，準備南渡，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自平津南下，直趨武漢，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及賀龍部進向西安，徐向前部加緊圍攻太原。

四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命令各野戰軍前進。當天第二、第三野戰軍分在安徽荻港、江蘇江陰渡越長江。二十三日，第二野戰軍入南京，蘇、皖、浙間十餘萬政府軍潰滅。五月三日，第三野戰軍入杭州，二十七日，佔上海，政府軍損失十萬。八月十七日佔福州，十月十七日佔廈門，二十六日攻金門島，為政府軍拒退。第二野戰軍於五月十九日佔九江，二十一日佔南昌，西趨湖南。沿平漢鐵路南下的第四野戰軍於五月十六日佔武漢，白崇禧軍退往湖南衡州。八月三日，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與林彪成立和平協議。

被圍數月的太原，四月二十五日失守，代理山西省府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自殺，官兵七萬餘人被俘。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戰軍會同賀龍部佔領西安。六月，政府軍反攻不勝，損失四萬餘人。七月，第一野戰軍入甘肅，八月二十六日，佔蘭州，九月四日佔西寧，二十四日佔寧夏，數十年來據有甘、寧、青三省的回軍消滅。同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分入綏遠、迪化，整個華北與西北為解放軍所有。

蔣引退後返浙江故里，仍握有實權。李宗仁才本平庸，益難施展，勸蔣出國，交出權力，不再問事，為蔣所拒。四月以後，蔣巡視東南沿海，部署軍事。六月，閻錫山代何應欽為行政院長。七至十月，蔣往來廣州、重慶、成都、昆明，¹策劃保衛西南，調陝南胡宗南軍入川，命湘南白崇禧部入黔，拒共軍於四川境外。白欲保廣西，率部南退。第四野戰軍遂長驅入粵，十月十五日，佔廣州，國民政府遷重慶。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野戰軍佔桂林，第四野戰軍破白崇禧部十萬人於桂、粵之交，十二月六日，佔有南寧。

¹七月及八月，曾訪菲列濱、南韓，謀組東亞反共聯盟未成。



圖二四 中共繼續進軍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

十一月十四日，第二野戰軍佔貴陽，同日蔣到重慶。先六日，第二野戰軍的另一路已入四川東南境，政府軍不戰而潰。十一月三十日，重慶不守，蔣去成都。第二野戰軍續進，與自陝西前來的賀龍夾擊成都。十二月九日，四川綏靖主任鄧錫侯、西康省府主席劉文輝、雲南省府主席盧漢投降，蔣赴台北，留胡宗南守成都。李宗仁以一切絕望，先去廣西再走香港，最後，飛往美國。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軍攻佔成都。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攻佔政府軍在大陸的最後據點西康西昌。¹總計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十一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

三、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中華民國

自一九三七年中共取銷中華蘇維埃政府後，名義上並無自己的中央政府。國、共戰爭兩年後，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提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等黨派通電擁護。²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³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希望於四、五月佔領南京後成爲事實。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毛澤東宣稱「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七月一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是中共的武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必須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國需要國際援助，但不屬於美、英方面，而屬於蘇俄。中國需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本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

¹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入拉薩。

²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成立，領導人爲李濟深。民主同盟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被政府宣布爲非法團體，十一月，自行解散，一九四八年一月，又自行恢復。此外列名通電的有中國民主建國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³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石家莊西北平山縣舉行。

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由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九月，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正式舉行會議。二十七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國都定為北平，易名北京。紀年採用公元，國旗為五星紅旗。¹二十九日，通過共同綱領。三十日，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等為委員。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當中國大陸砲火連天，政府軍失利之時，台灣算是較為安定的省份。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國防部在台灣設陸軍訓練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構，由美國顧問協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陳誠任台灣省府主席，將中央銀行黃金移存台灣。一九四九年前期，台灣有不少興革，如實行減租，²改革幣制。和談不成，國民黨人多主蔣復職。十二月七日，政府宣布遷設台灣。李宗仁赴美不歸，蔣再起的呼聲愈高。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終復任總統，以陳誠為行政院長。嗣後台北成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淮海戰役爆發，司徒雷登認為局勢已無可救藥。勝負決定後，美國撤回軍事顧問團。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司徒雷登未隨行。解放軍進入南京後，他準備前去北平，承認中共政權，國務院不許。同時有美國或聯合國暫管台灣之說，蔣表示反對，勸美國協助中國的反共力量，確保台灣，使成一新政治希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內附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致杜魯門函，為美國政策辯護。謂中國反共政策失敗，由於中國政府無能，中共効忠蘇俄，致使中國民族慘遭一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為前提的政黨所壓制。中國的悠久文化與民主、個人主義，終將發揮其力量，擺脫外

¹一顆大星代表中共，四顆小星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

²地主所得以37.5%為限，名為三七五減租。

國桎梏。美國對於以此爲目標的發展，應予鼓勵。但在採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待亞洲塵埃落定。此一表示，對於朝不保夕的國民政府固爲一重大精神打擊，毛澤東亦一連發表五篇駁斥文章，指美國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要仇視它、鄙視它、蔑視它，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蘇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的次日，即予承認。美國雖繼續承認國民政府，惟不再積極援助。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艾奇遜再度聲明，美國無意以軍事援助台灣的國民政府，台灣屬於中國，只可儘力於經濟援助。這時毛澤東已到莫斯科，二月十四日，周恩來與蘇俄外長維辛斯基（Vyshinsky）簽訂了三個外交文書，¹一個是爲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個是蘇俄給中國三億美元貸款協定，一個是蘇俄允將長春鐵路移交中國，撤退旅順軍隊，大連行政歸中國管轄協定。

毛在莫斯科時期，艾奇遜發表演說，謂蘇俄的目的在併有外蒙、華北，美國的基本信念爲中國如由一外國控制，實違反中國人民利益。蔣介石失去人民擁護，已非中國領袖，美國將支持自由民主力量領導中國，並保衛日本、菲列濱、台灣，朝鮮不在其內。蔣復職不到八十天，與台灣相犄角的海南島、舟山羣島均爲解放軍攻佔，²蔣經國說，今後一百天內將爲台灣最嚴重的時期。孰料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受蘇俄唆使突然進攻南韓。美國認爲南韓如失，不只日本難保，其他接近蘇俄的國家，亦將爲所囊括。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對台灣政策一變，杜魯門一面命麥克阿瑟支持南韓作戰，一面命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並要台灣國民政府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行動。於是台灣的安全無憂，國民黨亦得以在台灣繼續保持它的政權。³

¹毛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莫斯科，據傳他與史達林對外蒙問題意見不協。周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續至，始將條約簽定，三月十七日偕同返國。

²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解放軍佔領海南島，五月十六日，佔領舟山羣島。

³台灣某要人私下語人，謂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意思是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

補充閱讀書目舉隅

一、通 紀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台北，1959）。
-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二冊（上海，1948）。
- 戴 逸，《中近代史稿》第一卷（北京，1958）。
-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北京，1954）。
- 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北京，1973）。
-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七冊（天津，1932-1934）。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二冊（台北，1963）。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稿本）。
- O. E.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1964).
- P. H. Clyde, *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Impact of the West on Eastern Asia* (Englewood Cliffs, N. J., 1958).
- T.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41).
- J.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 A. Feuerwerker, R. Murphey and M.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1965).
- 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70).
-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 F. H. Michael and G. E.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58).
- H. M. Vinacke,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Times* (London, 1960).

二、早期中西接觸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香港，1940）。
- T'ien-tse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iden, 1933).

-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68).
-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Boston, 1961).
- A.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1942).

三、兩次中英戰爭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香港，1941）。
- 林崇墉，《林則徐傳》（台北，1967）。
- D. B. Smith and W. R. Lumby, *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 (London, 1954).
-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1964).
- 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1937).
-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ade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1953).
- R.K.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 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1964).
- A.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 1958).

四、太平天國與捻回

-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三冊（香港，1962）。
-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北京，1955）。
- 羅爾綱，《湘軍新志》（長沙，1839）。
- 王爾敏，《淮軍志》（台北，1967）。
-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二冊（上海，1946）。
- 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上海，1937）。
- 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台北，1968）。
-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重慶，1945）。
- Siang-tseh Chiang, *The Nien Rebellion* (Seattle, 1954).

- F. H.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1966).
- Vincent, Y. C. 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 (Seattle, 1967).
- S.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1964).
- Ssü-yü Têng, *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9* (Paris, 1961).

五、自強運動

- 牟安世, 《洋務運動》(上海, 1956)。
- 王爾敏,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 1963)。
- 呂實強, 《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台北, 1962)。
- 呂實強, 《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台北, 1972)。
- 李國祁, 《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台北, 1961)。
- 嚴中平, 《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 1963)。
- 郭廷以, 《郭嵩燾先生年譜》二冊(台北, 1971)。
-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1964).
- K.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1961).
- A.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58).
-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1970).
- Kwang-ching Liu,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 (Cambridge, Mass., 1962).
- M.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1957).

六、邊疆、教案

- 邵循正, 《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北平, 1935)。

李恩瀚，《曾紀澤的外交》（台北，1966）。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1966）。

J. F. Cady,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Ithaca, 1967).

P.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 1963).

L. E.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Mass., 1967).

Immanuel C. Y. Hsü,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Oxford, 1965).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 to 1885* (London, 1939).

七、中日甲午戰爭及其後

王信忠，《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北平，1937）。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台北，1970）。

C. S. Campbell,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aven, 1951).

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London, 1928).

R. S. McCodock, *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 1899-1900* (New York, 1931).

P. A. Varg, *Open Door Diplomat: The Life of W. W. Rockhill* (Urbana, 1952).

八、戊戌變法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1965）。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1969）。

胡濱，《戊戌變法》（上海，1956）。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武漢，1957）。

湯志鈞，《戊戌變法簡史》（北京，1960）。

九、義和團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義和團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北京，1961）。

P.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 (New York, 1959).

V.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 (Cambridge, Eng., 1963).

十、改革、立憲、辛亥革命

-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1964）。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1969）。
- 亦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台北，1966）。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1971）。
- 胡繩武，《論清末立憲運動》（台北，1961）。
- 吳玉章，《辛亥革命》（北京，1961）。
- 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辛亥革命五十週年文集》二冊（北京，1962）。
- 黎乃涵，《辛亥革命與袁世凱》（上海，1949）。
-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1971).
- M.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eattle, 1969).
- H.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1968).
- B.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64).
- M.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s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十一、民國初年的政治外交

- 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台北重印，1962）。
-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台北，1966）。
- R. H.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 (New York, 1952).

十二、思想革命

- 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1935）。
- 華崗，《五四運動史》（上海，1936）。
- 丁守和等，《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北京，1957）。

Tse-t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M.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67).

十三、蘇俄、國民黨、共產黨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1966）。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1963）。

郭華倫，《中國史論》四冊（台北，1973）。

王實等，《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上海，1958）。

D.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1947).

C.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Mass., 1958).

C.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1962).

C. B.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R.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3).

———,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1952).

B.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S. Swarup,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Oxford, 1966).

A.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1954).

十四、抗日戰爭

曹聚仁，《中國抗戰畫史》（上海，1947）。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二冊（台北，1973 - 1974）。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台北，1971）。

D.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R.J.C. Bu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1954).

J. W. Christopher, *Conflict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from 1928-1933* (Leiden, 1950).

- H.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Atheneum, 1950).
———,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1953).
-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 F. C. Jones, *Manchuria since 1931* (London, 1949).
- L. K. Rosinger, *China's War Time Politics, 1937-1944* (Cambridge, Mass., 1963).
- B.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London, 1971).
-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1963).
- A.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1963).

十五、中共的勝利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北京，1957）。

- D.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1963).
- M.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1953).
- L. M. Chassin,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1965).
- J. F. 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1949* (Toronto, 1968).

書後小記

本書一九六九年秋先夫開始撰寫時，定名《近代中國史大綱》。及初稿完成，近七十萬言，為一般讀者閱讀，分量嫌重，為簡明起見，加以刪減，易名《近代中國簡史》。書稿完成後，一九七五年春，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九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委員會來函，譽本書取材豐富，態度嚴謹，建議改名為《近代中國史綱》。此時先夫已逝世一週，我在萬分悲痛中覆信同意。

先夫寫這本書稿的動機很早，而着手是在他生前的最後旅程！一九六九年春應國外友好之約來美（見作者《小記》），九月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訪問研究，開始撰寫。不久辭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職務，全力寫作。檀島四季如春，氣候宜人，生活安定愉快。次年夏離檀島時，書稿完成六章。一九七〇年，應哈佛大學之約到康橋訪問，繼續撰寫。地處北國，氣候酷寒，冬日苦長，常患感冒，是年續成四章。一九七一年訪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續撰未完成部分。

先夫來美三年，三易其地，暮年寄寓海外，相當辛苦。先夫性情積極而認真，尤重諾言，每次遷移，畧作安頓，不是跑圖書館，搜集資料，便是晨昏伏案，埋頭寫作。每一細目，參考查證，從不苟且，遇有問題，廢寢忘食，縱橫參證，直至問題圓滿解決時，喜形於色，這時我為他的喜悅也鬆一口氣；有時我也充當下手，做些謄錄整理工作，一桌二椅，對坐工作，每至深夜。

年來先夫偶感腦力減退，我勸他減少工作時間，他反對我說，時間有限，要做的事太多，希望再有十年工作時間，清理一下未完之事。可見他奮志勉勵之心，不敢一日少懈，奈何天不假年，未能了此心願！他生平處事，逆來順受，從不氣餒，雖年逾古稀，不服老、不怨天尤人，終其生站在自己的田園裏灌溉耕耘。

有時他與友好閑談，常說歷史是一門鄭重的學問，一涉偏私，貽

誤後人，並說寫現代史更是着筆不易，我既無驚人之筆，更不敢妄加私見，僅能就所知道的點點滴滴，平實的寫出來，作個交代，以就正於同輩後輩。這幾句話正足以代表他的個性與治學態度。

本書初稿完成後，刪減釐訂又近年餘，最後一章定稿是在他逝世前二日。就這樣默默的對中外友好們的諾言交了卷！往事歷歷猶新，而今長空孤雁，四顧茫然！走筆淚下，謹述本書稿撰寫經過以誌哀思！

還要謝謝吳章銓、亦冰峯、郭正昭三位先生在百忙中的細心清校。還有關懷這本書稿的朋友，皆感於心，永誌不忘。

郭季心顏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紐約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